

世纪前沿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陈海宏 等 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 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二卷）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
（1760—1914）

下

[英] 迈克尔·曼 著　陈海宏　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英)曼(Mann，M.)著；陈海宏等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

ISBN 978-7-208-13122-4

Ⅰ．①社…　Ⅱ．①曼…　②陈…　Ⅲ．①权力-研究　Ⅳ．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7331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陆智昌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
[英]迈克尔·曼　著
陈海宏等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58
插　　页　8
字　　数　791,000
版　　次　2015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122-4/C·494
(上下册)定价　138.00元

社会权力的来源

下

目录

第十一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一)：定量统计资料

现代国家的兴起是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中的老生常谈，然而对它的分析却很不充分。国家现代化包括着四个发展过程，这四个过程指：国家的规模、其职能的范围、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和政治上的代议制。争取代议制的斗争通常与其他三个行政进程分开，被认为是建立一个独立而全面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持续不断，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例如 Beer, 1973, pp.54—70； Eckstein, 1982)。1863 年，阿道夫·瓦格纳系统陈述了现代国家持续扩张的“法则”，并且这现在仍影响着统计学家在国家预算中对那些大规模的预算进行慎重的考虑(如 Andic and Veverka, 1963—1964)。现代国家的发展被描述为是“向前和向上”的演化进程。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曾着重研究过 20 世纪一些现成的财政统计数据，他们以职能和多元的方式来解释发展。希格斯(1987)把他们的理论区分为四种模式：现代化理论(国家发展到与更为社会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相协调)，公共财产理论强调民族防御(公共财产是由国家提供的，因为它们不是以私人的利益而是以公众的利益来投资，而且一个消费者的获益并不减弱其他消费者的获益)，福利国家理论(在复杂的社会中市场削弱了私人救济和国家介入)，政治再分配理论(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获取利益)。希格斯指出 20 世纪美国的发展不适合所提到的这四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其发展得到了三次剧烈危机即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推动。这些危机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向国家干预的方向偏移(皮科

克和怀斯曼在 1961 年对英国作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且这与根深蒂固的官僚利益相结合(从真正精英国家理论借用的一种理论)，并且阻止着政府组成回复到低层次化。

在扩张国家中战争扮演的角色已很古老，但它是否能被归入更为一般的“危机”概念是有争议的(拉斯勒和汤普森在 1985 年也提出这一观点)。 或许与战争相分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发生在 1850 年之前。 但它们并没有刺激国家的增长，1850 年前只有战争起到了这一作用。 政治干涉者对大萧条的反应看起来是独特的，而不是一般现象的一部分。下层社会阶级提出了被马歇尔称为“社会公民权”的要求，这在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 除战争之外，19 世纪的国家发展并不是对危机的反应。 值得称赞的是，希格斯承认了这一点并总结道：“大政府的发展无论它是多么的错综复杂和多维的，并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真正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动力是‘更为混乱’的，与理论家所设想的相比，对外生的影响或震动更为开放，在他们的结果上具有较少的决定作用”(1987： 259)。 他是正确的。 他的四种国家发展理论囊括了所有多元国家理论的缺点。 国家不能系统地反映他们的社会；他们也不是简单地实行一个基本的现代化、公共财产、福利、再分配，或者甚至是危机职能。 他们也不能系统地反映一场辩证的阶级斗争或国家精英的利益。 而是这些他们都做到了——并且进一步——置身于机构和职能的错综复杂中，这需要细致地进行分析。

韦伯也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国家发展理论：它是整个西方纵横几个世纪的独一无二的“合理化进程”的一部分。 他害怕规模和范围不断增长的官僚国家“高高在上”的权力，并且他也简短地指出了这种国家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原因：对一支现役军队和整齐划一的法律和税收的联合需求，资本主义企业对统一技术和可预测服务的需要，公民权要求对待一致性所产生的压力。 这是敏锐的，但韦伯却把这种分析从属于一种本质上向前向上的发展历程(尽管他也不确定是否喜欢它的结果)。

真正的精英国家理论(见第三章)也从本质上讲了一个向前向上的发展故事。在波吉(1990)看来，这是被国家本身的“侵略”倾向推动的，尽管也与阶级和多元机制以及一些附加的偶然性相互作用。斯科克波(1979)提供了一个更缺乏逻辑性的真正精英理论。她认为1789年以来的革命同时促进了国家的规模、范围和官僚主义(希格斯危机理论的另一种版本)。(我在第十三章中对她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吉登斯把韦伯和福柯(1975)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描述了一个独揽大权的、全面监督和控制的民族国家的兴起，他认为这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权力容纳器”。它“吸纳”了社会并实际上就“是”社会(1985，pp.21—22，172)。但是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这种集权国家在何时何地出现。他或者福柯也没搞清这个集权国家叫什么？谁控制它？谁应为它做什么？事实上是否有个国家精英在掌管着它？

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考虑给出了一个向前向上的解释。他们指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而是一种曾经扩张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着重地分析国家，但他却用维多利亚时期反对“过于膨胀的官僚机构”的冷嘲热讽对法国和德国进行了描述。他把法国描述为“这个骇人听闻的寄生体，像网一样缠住了法国社会的机体，并阻塞了它所有的毛孔”(1968：169)。这一章的图表表明法国并不比同时期其他的欧洲国家大。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一成不变地写着“资本主义国家”。米利邦德(1969)的书是这样开头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和行为的高度膨胀……已成为政治分析纯粹的最司空见惯的一种。”他的书名是《资本主义国家》，表明了他对这种膨胀的解释。沃尔夫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把发展和官僚主义归因于集中的资本需要，以便用可预测的、合理的公共财产和一种明显的中立机构来控制阶级斗争并通过福利改革来缓解它(1977，pp.59—79，263)。他的历史，几乎像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很少提到国家的军事活动。

这种向前向上的历程描述反映了国家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发展的可信

度。一些杂乱无章的数据在经过整理后也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如 Poggi, 1990, pp.109—111)。有人提到国家官员在数目上持续不断的增长时(如，Anderson and Anderson, 1967)，经常引用弗洛拉(1983)关于公共就业历史统计的汇编。布鲁斯 · 米切尔(1975, 1983; Mitchell and Deane, 1980)有价值的财政汇编也经常被引用。他们指出整个这一时期，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现金支付大幅度增长。财政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 · 阿尔当进一步宣称，国家花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尽管它在整个19世纪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张(1975, p.221)。在简略地阐明了统计学的两种类型并承认了19世纪发展的某些不均衡性后，格鲁(1984)转向了他的主要问题：在19世纪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程度的国家扩张？并且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家出现如此惊人的相似性？格鲁对国家的一味发展看起来是信心百倍的。

但情况真是如此吗？在本章里，我在国家财政和就业方面列举了系统的大量资料，把规模、范围和官僚主义细致地区分开，以研究哪一些增长了，它们又是在何时何地增长的。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情形迥异、错综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的进程。更令人称奇的是，在“漫长的19世纪”中，国家就其国内社会而言，并没有变得更大。然而这一趋势的缺乏使得三种进程相混淆——一支衰落而日益离散的军队，官僚作风日渐膨胀和平民范围的极大扩充。关于这三个进程我将在它们各自的章节中分别对其分析论述。

我已收集了五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规模、范围和官僚制度方面的系统化资料——低于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层次的所有的政府层次。在奥地利国土上，1867年前的“中央政府”仅仅指的是维也纳政府；1867年后，它指的是二元君主制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两个王座。在第一卷中我扩充了方法论，以便用它们产生的统计资料为国家讨论提供基础。税收和支出总数也象第一卷中那样进行分析。税收为我们提供了国内社会国家和权力运作者关系的线索，反映了在多大程度上它与国内社会权力网络隔离或相融合(这些概念在第三章已给出解释)。支

出反映了国家的职能，它给出了国家总体规模和其职责相对重要性的财政索引。由于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我对这些财政数据进行了调整；并把它们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以衡量国家经济的规模。

在现代我们能在国家就业上增加统计资料。官员数量也可以看作是国家规模的检测尺度，并且还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然而，人事部门的数据已被证明是极不可靠的——实际上，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官僚机构的胜任能力而不是规模。我在第十三章将进一步讨论人事部门的资料，以阐明官员的就业情况、他们的职责、组织网络和社会背景——揭示他们作为精英或官僚以及隔离或嵌入国内社会的均衡性。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些数据称作“统计学”而没有丝毫的不合时宜，因为这个词和它的同源词出现在 1800 年前的英语和所有的欧洲语言中，其意义是与国家有关联的数据——揭示国家现代化还在进行当中。

这一卷将会讲述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自相矛盾的历程。一方面 19 世纪已看到了一个理所当然应被称作现代的国家的出现——不比其公民社会庞大，但却承担了更多的国内职能，准代议制也变得更为集权化、官僚化和能人制度化，其基础结构也能有效地渗透到它所有的领辖部门。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并不是划一的，而是多形的，在每个阶段适应不同的政治定型。这在基础结构上导致了一个政权，并肯定不如它的前任具有协调性。

国家的规模：支出倾向

我首先把支出倾向作为整体国家发展的一个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花费的金钱越多就意味着国家越发展吗？

表 11.1 包含着可利用的支出数据，它是以当前的价格，按 19 世纪中期国家的货币来衡量(几个国家在这一时期改变了它们的货币)。对

于奥地利、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德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数据从一开始就是适用的；而对于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却是从 1790 年，即它建国后才开始适用的。奥地利的数据需仔细斟酌，因为它们有时指的是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而有时仅指西半部(奥地利帝国仅包括总人口的 60% 强)。地方政府很少被连贯地记录下来。英国的地方当局、法国的各个部和公社、德国的联邦州和乡镇的数据以及对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估计，贯穿 19 世纪中期，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适用的。奥地利的一些地方数据在世纪末变得适用起来，但我坦白，我不能完全理解它们的结构，于是就删去了。

像本章提供的所有数据一样，支出数据也将有所保留。后期的数据比前期的数据更加可靠，而且中央政府的数据比地方的数据更为可靠。一般来说，在这些幸存下来的统计的意义和准确性上，我会听从专业历史学家的建议。我并没有宣称这些数据是完全准确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然而，我只是宣称它们是这一时期所汇集的资料中最为全面的。

从金钱这方面来说，所有的中央国家都发展迅猛。1760 年，英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花掉了 1 800 万英镑；1911 年，它几乎花掉了 1.6 亿英镑。法国也同样发生了 8 倍的增长。其他国家的增长幅度甚至更大：奥地利和普鲁士—德国几乎增长了 40 倍(应该考虑到的事实是，从 1870 年起，在表 11.1 中的奥地利数据仅指奥地利帝国)；并且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骤然增长了 200 倍还要多(从一个很小的数据起)。

如加上地方政府的数据会使发展加速，但这较难解决。在这一阶段早期是存在地方政府的，但无论我们还是同时期的中央政府都无法知道它的规模或花费，因为它是高度自治的(后边会讨论一个重大发现)。那部分已知的地方政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说明的，对中央政府而言它开始很小，然后在这一阶段后期比中央政府发展得都要快。地方政府的开支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就下降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所有政府的开支(中央加上地方的)应该增到甚至超过表 11.1 所给出的数据。

表 11.1 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全部支出，1760—1910，当前的价格

	奥地利	普鲁士—德国		法　国		英　国		美　国	
	中央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年	百万弗罗林	百万马克		百万法郎		百万英镑		百万美元	
1760	58	61		506		18.0			
1770		51		333		10.5			
1780	65	64		411 +		22.6			
1790	113	90		633 +		16.8	23.0	4.3	
1800	167	106		726		51.0	67.0	11.0	
1810	216			934		81.5	94.0	8.7	
1820	160	201		907		57.5	70.0	19.3	27.7
1830	138	219		1 095		53.7	65.0	17.0	33.1
1840	165	204	234	1 363		53.4	64.0	28.9	67.6
1850	269	252	334	1 473		55.5	66.0	44.8	89.2
1860	367	323	496	2 084		69.6	87.0	71.7	171.7
1870	332	1 380	2 360	2 482	3 348	67.1	92.0	328.5	611.7
1880	432	519	1 851	3 141	4 180	81.5	112.0	301.0	621.1
1890	560	1 044	2 690	3 154	4 289	90.6	123.0	378.9	854.1
1900	803	1 494	4 005	3 557	4 932	143.7	265.0	607.1	1 702.1
1910	1 451	2 673	6 529	3 878	5 614	156.9	258.0	977.0	3 234.0

注：所有的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在所有的表中，对美国而言，1900 年实际上是指 1902 年，1910 年是指 1913 年。

资料来源：

奥地利：中央政府正常和额外的纯支出：

1760　Janetschek, 1959, p.188。

1780—1860　Czoernig, 1861, pp.123—127(在这些表和以下的表中，1780 年实际上是 1781 年，1860 年实际上是 1858 年)。数据指的是整个奥地利帝国。

1870—1910　Wysocki, 1975, p.109；奥地利帝国支出了奥匈帝国二元君主政体约 70% 的财政收入)。匈牙利的数据未能找到。

在 1858 年，100 个旧弗罗林约等于 105 个新弗罗林。在这些表中和以下表中我都没有调整这个数据。

普鲁士—德国：在这些表和以下表中相邻年份是：1821，1829，1852，1862，1872，1881，1892。

1760—1860：普鲁士中央政府的数据和 1870—1910 年间的所有德国政府的数据：Riedel, 1866，表 xv—xx；Leineweber, 1988, pp.311—321；Weitzel, 1967,表 1a。值

得注意的是，Andic and Veverka 在 1963—1964 年间给出的地方政府的数据比 Leineweber 和 Weitzel 给出的在某种程度上高一些。

1870—1910　德国中央政府的数据：Andic and Veverka, 1963—4。

法国：

1760—1770：Riley, 1986, pp.56—57， 138—48， 1761 年和 1765 年份的资料。

1780—1790：Morineau, 1980, p.315——一般的支出仅指 1775 年和 1788 年，比全部支出的数额要低估一些(因为在这两年未发生战争)。

1800—1810：Marion, 1927, Ⅳ， pp.112—113， 325；指 1799—1800 年(共和国 7 年)和 1811 年。

1820　Block, 1875， Ⅰ， pp.495—512。

1830—1860　1913 年法国统计年度回顾摘要，p.134。

1870—1910　Delorme and André，1983, p.722； 1870、 1900 和 1910 实际上分别是 1872, 1902 和 1909。

英国：

1760—1910　中央政府：Mitchell and Deane, 1980：公开财政表；到 1800 年是净支出，然后是毛支出。

1790—1910　地方政府：Veverka, 1963, p. 114；指的是英国并包括爱尔兰。 由于 Veverka 没有给出资料参考，我也无法核对它的出处。 他的人口数据不准确。 在所有表中 1800 年的数据实际上是 1801 年的。

美国：

1790—1910　中央(联邦)政府，1790—1910，和所有地方政府，1900 和 1910： 1795 年的美国人口调查局：表 Y350—6。 这种标准化的来源包含的仅是邮政利润。 我已经从美国减去了这一部分并增加了全部的邮政支出。 财政部 1947 年，419—422。

1820—1890　州政府 1820—90，从 Holt 1977 年的资料计算出来的。 Holt 不完全的州资料被转变成按人口计算的数据，然后被集中到全部的美国人口中。

1820—1890　地方政府，1820—90,来自 Legler 等人 1988 年的计算。 表 4 和 Legler 等人 1990：表 3。 注意(a)：这是全部的收入数据，而不是支出数据；(b)：我已经估计了 1820—1840 年间的数据，认为在 1820 年所有地方政府的人均收入是城市平均收入的 8%， 1830 年的 9%，1840 年的 10%(已知的比例是 1850 年 12%， 1860 年 16%，1870 年 21%，然后缓慢地连续上升)。 这些数据因此只是大约的估计。

像这样的数据为向前向上的历程提供了主要证据，然而它们并不是非常有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到通货膨胀，它侵蚀了这一时期所有的货币价值，并且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世界范围内快速的人口增长，尽管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普鲁士—德国和美国，因为它们的领土扩张了或有大规模的移民。 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支出增长，那么一个国家实际控制其国民的能力就削弱了。 在表 11.2 中我既考虑到了通货膨胀，又考虑到了人口增长，以固定不变的价格把支出占 1911 年人均水平的百分比表达了出来。

表 11.2　以固定不变的价格所表现的按人口计算的国家支出趋势，1780—1910，中央国家和所有地方政府(1910＝100)

	法国		英国		美国		普鲁士—德国		奥地利
年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1780			70						
1790			45	32	12		63		
1800			74	51	14		86		21
1810			96	61	9				19
1820	27		77	50	18	8	94		19
1830	31		76	48	14	8	80		14
1840	35		68	42	16	13	68	32	19
1850	43		87	53	22	14	82	46	25
1860	50		86	57	23	18	69	44	25
1870	67	63	69	50	57	35	118	83	35
1880	85	81	71	67	56	37	32	48	41
1890	92	89	75	63	68	51	63	66	54
1900	99	96	103	118	91	80	78	86	72
19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支出来源和注释同表 11.1。 以下是固定价格的来源。

法国：Lévy-Leboyer, 1975, p.64。 1908—1912 年的价格。

普鲁士/德国：1790—1860，普鲁士；1870—1910，德国。 1790 年实际是 1786 年；1800 年是按 1804 年的价格计算来的。 1820 年实际上是 1821 年。

1790—1800　Weitzel, 1967,表 1a。

1820—1910　Fischer 以及其他人等 1982, pp.155—157。 1913 年的价格。

英国：1780—1840，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3, p.41——他们对"南部城市最好的推测"价格指数——与 1850—1910 相接，Deane, 1968。 这两个指数在 1830—50 相交叠的阶段仅有轻微出入。

美国：美国人口调查局 1975 年，表 E52—89。 Warren, Pearson 在 1790—1890 大规模的价格指数与劳工统计局 1890—1910 年的指数相衔接。

奥地利：Mühlpeck 等人：1979, pp.676—679。 1914 年的价格。

这两种限制抵消了很多的国家发展，尽管是按照国家和政府水平来区分其发展程度的。 按真正的人均标准来看，地方政府的增长比中央政府延后，但却迅速，只有法国是个特例，它的两种增长率并没有明显差异。 法国和奥地利的增长是卓有成效和稳定的。 这一时期英国和普鲁士的中央政府实质上经历了停滞，并且在世纪中期后宣称处于衰落；

但它们的地方政府的增长是相当可观而又稳定的。在美国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百年不遇的向上的温和倾向，由于内战的巨大推动力，数据急剧增加扩大。我将在后面解释这些各自的倾向。现在我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发展尽管不尽相同，但却是真实可靠的。在本世纪，按照它们的支出来衡量，国家的确是变强大了，尽管不是气势恢弘；并且区域性国家的增长要比中央国家的增长迅速得多。

但我要增加第三种限制。这一时期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实际上集中于我们要讨论的五个国家。这样它们的经济增长就应该走在国家发展的前头，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在实际上都有所下降。

表 11.3　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或国民产值中的百分比，1760—1910

	普鲁士—德国		英国				英国		奥地利	美国		法国		法国
	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商品生产
年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a	b	a	b								
1760	35			22								12		16
1770	23			11								7		9
1780	22			22					17			8		
1790	24			12		16			27	2.3		12		13
1800	23		19	27	29	36				2.4		9		12
1810			27	37	31	43				1.5		10		14
1820	19		20	23	24	28				2.9	4.2	7		14
1830	17		16	19	19	23	12	15	9	1.8	3.5	7		12
1840	12	14	12		14		11	13	9	1.7	4.0	8		12
1850	9	12	10		13		10	12	11	1.7	3.4	9		13
1860	8	12	11		13		9	10	11	1.9	4.5	9		13
1870	15	18	7		10		6	9	11	4.5	8.3	10	13	14
1880	4	13	8		11		6	9	12	2.9	5.9	13	16	18
1890	5	13	7		10		7	9	13	2.9	6.5	14	18	19
1900	5	14	9		16		8	14	15	2.8	7.9	12	16	19
1910	6	16					7	12	17	2.5	8.2	11	15	15

注：在 18 世纪末和整个 19 世纪，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了国民收入约 15%，超出了商品生产约 25%。

资料来源：支出来源和注释同表 11.1 一样。
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商品生产。
普鲁士—德国：
1760—1800　Weitzel, 1967,表 1a，在资料遗失的年份是用他的预测。
1820—1910　Leineweber, 1988, pp.311—321——在生产要素费用方面的国民收入。
美国：全部年份：Mitchell, 1983, pp.1886—1889(国民生产总值)。
奥地利：
1780—1790　国民收入：Dickson, I， pp.136—137——估计 1780 年的国民收入为 3.57 亿弗罗林(他估计范围的正中点)，1790 年为 4.1 亿弗罗林。 我没有采用 Dickson 自己的百分比估计。 它们只是通常和平时期的收入，比实际支出要低一些。
1830—1910　奥地利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Kausel, 1979, p.692。 我已经计算了 1830—60 年间柴厄尼格支出的 70%。 1867 年帝国分裂后，奥地利提供联合预算的 70%，匈牙利提供 30%(1908 年，匈牙利提供的预算上升到 36.4%，但我并没有调整 1910 年的数据)。
英国：国民收入估计：(a)Deane and Cole, 1962, p.166；(b)Crafts, 1983——推测了 1770、1790、 1810， 1820， 1830—191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Deane, 1968, pp.104—105。
法国：国民生产总值 1760—1790： Goldstone, 1991, p.202。 国民生产总值 1800—1810(实际上是从 1781—1790 年和 1803—1812 年的数据计算出来的)：Markovitch, 1965, p.192。 1788 年的支出来自 Morineau, 1980, p.315； 1820—1910 的来自 Lévy-Leboyer, 1975, p.64。 商品生产= 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市场价值(即不包括服务业)。 1740—1767： Riley, 1986, p.146(1770 的数据实际上是 1765 的)。 1790—1910： Marczewski, 1965, p.LXX。

表 11.3 通过表示国家支出在国民经济——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全部商品生产中的百分比，来调查这种可能性。

这里有一点我要指出：对国民经济规模的估计甚至比支出数据更缺乏精确性。 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最好的测量手段，并且他们有时甚至会用国家间互不相同的基础来源进行分析测量。 他们的数据收集了特殊的工业、地区或涵盖整个经济部门的生产、销售或所得的数据。 在这一时期估计服务部门的生产尤为困难。 许多经济历史学家面临这种困难时，站在生产的角度上(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估计，一些站在收入的角度上(国民收入)进行估计，甚至还有一些人干脆把服务业忽略不计(商品生产)。 这样，除非差别悬殊，国家间的比较是投机的。 因为他们经常运用不同的方法，我也谨慎地在一段时期内对不同组的估计进行了比较。 因此这些数据不能为了特殊的目的而使用。 庆幸的是总趋势是明显的。

这种趋势显然是惊人的。相反——我信心十足——在多数读者的意料之中，从 18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早期，政府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下降。资料的确是不完整或不一致的，但大部分的总方向却是相同的。

英国的数据是最完备的。他们在 18 世纪以高水平和中等水平突飞猛进，在 19 世纪初达到顶峰，然后平缓衰落。然而我有点怀疑表 11.3 中 b 列的那些极端的英国数据，那是来自克拉夫茨(1983)对工业革命时期国民收入的估计。他对迪恩和科尔(1962)的估计下调的数据会造成 1811 年全部的政府支出(对此我们有精确的数据)占国民收入的 43%。尽管 1811 年是个重要的战争年份，我仍然怀疑在 20 世纪之前的政府是否拥有基础权力，在必要时征用这一份额的国民收入。甚至在一战时，英国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动员，再加上按比例扩充的武装力量，也不过征用了国民收入的 52%。在某一点上，经济历史学家倾向的数字在社会学合理性面前必须让步。然而，无论英国政府活动的精确比例是多少，它在漫长的 19 世纪却是大幅度下降了。

普鲁士—德国的这种趋势甚至更为显著。它的早期中央政府单独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比后来德意志帝国所有层次的政府占的比重都要高许多。奥地利支出最高的年份也是在早期，即 1790 年(尽管 1800 年和 1810 年的数据如果是可利用的，那无疑要更高)。在法国没有一个总的趋势，尽管在后面我会论述可利用的数据降低了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国家活动。除了受内战冲击的 1870 年的数据，联邦国家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增长。但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相对有差别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依赖的：与欧洲国家相比，每一层次上的美国政府都是小规模的。就像俗语警句所说的，美国拥有的政府权力比欧洲要少得多——像我们在第五章定义的、对资本主义自由政权所期望的那样。

在 20 世纪的战争之前，18 世纪后期的国家可能拥有世人瞩目的最高财政支出率。很显然，我们无法对早期的国民生产总值作出恰当的

估计，但大部分的猜测都认为17世纪以前的欧洲国家支出低于国民生产或收入的5% (Bean, 1973, p.212； Goldsmith, 1987, p.189)。 我们能冒险作出的第一次计算是1688年的支出，当乔治国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估测国民生产总值时。 他的数据已被林德特和威廉森修正过了(1982, p.393)。 我获得了他们从整体上对英国的估计，然后把1688—1692年间的平均国家支出进行了分割(前几年的支出资料是适用的；见 Mitchell and Deane, 1980, p.390)。 这认同了英国的国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 拉斯勒和汤普森(1985)也作出了一个相似的计算，尽管不幸的是，他们没有给出自己的方法细节。 他们估计1700年的国家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5%。

国王也估测了荷兰16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岁入，但他的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太低，国家岁入则太高。 他认为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 (Goldsmith, 1987, p.226以表面的价格接受了这一点)，但这简直高得离谱。 得到荷兰省人均收入的数据后(Riley, 1980, p.275)，曾对荷兰国民生产总值持不可知论的两个派别，作出了国家岁入占国民生产总值8%—15%的估计。 那些持高国民生产总值的派别(Mdddison, 1983；de Vries, 1984)比那些与国王立场相似的派别(如 Riley, 1984)更深地打动了我。 我最终赞成10%——这在一个国家是很高的税收。 17世纪的国家可能会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的5%—10%，并且这或许在18世纪早期仍然适用。 拉斯勒和汤普森估计英国在1720年的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9%，尽管没有计算方法的解释。 我能断定法国在1726年的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5% (支出在 Morineau, 1980, p.315；随后的国民生产总值，Goldstone, 1991, p.202)。 此后它就上升了：赖利(1986, p.146)估计在1744—1765年间的和平年份是8%—10%，战争年份是13%—17%。

因此表中所反映的18世纪向上的趋势早已开始。 这种推断是不完整的资料来源所能得出的最清楚结果。 像经由财政手段所衡量的，国家在整个18世纪迅速扩充，1815年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主角并一直持续到一战；然后在19世纪它们就衰落了。 在国家生活中的第一次重

大变化——它的规模——发生在 18 世纪。 如我在第三卷中将要指出的，国家规模第二阶段的增长发生在20世纪中期，且在“一战”期间已经开始。 因此韦伯对“高高在上”国家的担心，他在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 他或者是对“一战”作出了反应，或者是有过人的先见之明(他死于 1920 年)。 同样，那些向前向上的历程，即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一个国家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他们社会中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以目前的价格，来自国家绝对的财政规模是发展的，并且按人均标准来看也是平稳增长的，但与国内社会有关的国家财政规模现在是静止或下降的。

这是一个如此重要而又反直观的发现，以至于看似有必要花一些时间进一步考察资料来源和方法，以验证资料的可靠性与合理性，但我不会那样做。 下降趋势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很容易被解释清楚，并且也与其他趋势相吻合。 我们将要看到的是 19 世纪两种相反的趋势，并且通常无法互相抵消：国家民用职能的大幅上升和大多数国家更大幅度军国主义的下降相抗衡。

为什么国家传统的、军事定型在经历了 18 世纪剧烈的上升后，会出现下降呢？ 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总的下降趋势和表 11.3 中的例外。 首先，国家支出像它一千年来所做的那样，变化按照不管国家是处于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而总是以受到战争袭击的影响而上升。表 11.3 仅是部分地反映了这一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战争在奥地利和美国政府财政中的作用。 在奥地利，支出最高的年份是 1790 年，这是由镇压佛兰德和匈牙利起义造成的。 但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由于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对国民生产总值可估计的数字应该更高。 美国在表中所列出的所有年份都处于和平时期。 如果我们加上内战时期的支出，我们就会发现战争对支出的巨大影响。 1860 年，按照表 11.1，美国联邦支出是 7 200 万美元。 到 1864—1865 年间，战争双方的支出一跃达到原来的 30 倍，达到 18 亿美元——北方联邦在 1865 年达到 13 亿美元，其中军事支出占 90% (美国人口调查局 1961： 71)，南部邦联在 1864

年还不足5亿美元(Todd, 1954, pp.115， 153)。 这个总数远远超出了后来任何一年的联邦支出(尽管存在国家人口和财富大规模的增长)，直至持续到一战期间的1917年。 那时，支出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 如表11.3所示，这是国家卷入大规模战争时的平均水平。 和平通常会让美国软弱无力；战争却魔术般地使它在骤然间成为庞然大物，强大无比。

表11.3也显示了战争对其他国家的冲击。 普鲁士—德国的支出最高年份是1760年，这是七年战争的影响；1870年的上升是普法战争的影响，这也使其在表11.2中成为在1870年按人口计算支出最高的国家。 英国在18世纪支出的顶点是1760年和1780年，前者是由于七年战争的影响，后者是由于美国革命的影响，1800年和1811年支出的大幅上升表明了拿破仑战争对其造成的沉重负担。 对法国来说，早期支出最高的年份是1760年，受七年战争的冲击。 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并没有在1800年和1811年的数据中反映出来，因为法国得到了被占领国家的资助。 在1740到1815年间，大部分国家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战争，目的是为了争夺更多的人力、税收和工农业产品。 它们的国家已被军事化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普鲁士是完全符合这一模式的，布鲁尔(1989)强调了立宪制的英国是一个典型，但需指明的是18世纪后期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只不过是从军事教练员、征募新兵的官员、强征组和随之产生的征税官员的完善网络开始的。

直到19世纪这一国家活动仍未结束。 在我目前的时代结束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发生了常规影响。 到1918年，全部英国政府的支出激增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2%，并且军事和战债开支占支出的90%以上(Peacock and Wiseman, 1961, pp.153， 164， 186)。 在战争期间计算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并非易事，但军事和战债开支也占大幅度膨胀了的国家预算的90%(法国1932年度统计，pp.490—491)。 德国的增长情况类似，或许奥地利也如此(它的数据仅能支撑战争的头一年；见奥地利统计大全1918, p.313)。 只有美国在一战中幸免于难，它的中央政府支出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变为3倍，但在1914年到1919年只是从2%上升到6%。

这些要点直接阐明了19世纪国家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欧洲战争的频繁性和持续性在19世纪居高不下，然后在1815—1914年间逐渐降低。在欧洲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冲击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相匹敌。甚至18世纪中期的斗争，即奥地利继位战争和七年战争产生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相提并论。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虽然征用了千军万马，但持续的时间很短。克里米亚战争没有严重地牵制法国或英国；它们帝国内部持续不断的战役也没有(尽管都影响到了相关年份的国家支出)。只有美国内战可与早期的战争相提并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解释为什么奥地利、英国、普鲁士—德国的支出下降，而美国的支出却急剧上升。

表11.3所表明的这种趋势的第二个原因是，军事策略、组织和技术的发展减少了19世纪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波拿巴征用未经训练的民众持枪奔赴战场的巨大成功，意味着战士技能的下降，对专业士兵的需求越来越少。和平时期的常备军包括永久职业军骨干和机动的被征入伍的新兵以及预备役部队。这样在战争一开始军队就能够得到快速扩充。在18世纪中期，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军队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就扩充了两倍；在拿破仑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他们的军队扩充了4到5倍。在一战中，这种趋势继续存在，在战争开始两年后就扩充到8倍。这些军队发展并不适用于海军，海军仍需职业化士兵。这样其海军力量独占鳌头的英国，在和平时期的积蓄少而又少。我将在第十二章探讨这种国家军国主义变化的本质。

表11.3所反映出趋势的第三个原因是传统的。战争对国家支出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和平时期，就像它在上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所发生的那样。国家在战争期间负债累累，当战争结束时，它不得不偿还战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直接的军事支出趋近完结，但在以后的五十年里战债偿付占去了很高比例的预算。如表11.3所示，英国政府

的支出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逐年减少，直到 1870 年才开始回升。如果战争频繁，就像 1740—1815 年间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那样，或者像 19 世纪的奥地利那样，那么这种回升的发生也只是到下次战争发生时。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只有 19 世纪有望看到这种完全的回升。

联合这三个军事原因一起解释了表 11.3 中这种主要的、非常明显的趋势。事实上他们的解释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支出为什么没有下降得非常剧烈。答案是国家增加了其他方面、主要是民用方面的支出(Grew, 1984)。表 11.4 详细列出了民用和军用目的在中央政府支出中的比例以及民用在所有政府(中央加上地方)支出中的比例(地方性政府的军事支出微乎其微)。没在表中列出的剩余部分，是债务偿还费用。负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模糊了军用支出和民用支出的区别，因为在 19 世纪期间借债从支付战争转向支付诸如铁路、学校这样大型的公共资金项目。以德国为例，统计来源给出了每笔借款的准确目的，因此我们能修正这种不确切的低估。而即使没有这种修正，表中所反映的趋势也是一目了然的。

表 11.4　拨给民用和军用的支出在全部政府预算中的比例，1760—1910 年

	奥地利		普鲁士—德国			法　国			英　国			美　国		
	中央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年	民用	军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1760			9	86		14	50		6	75				
1770			9	90					15	39				
1780	28	51	8	84		24	33		7	66				
1790	21	62	25	75		21	27		13	31	36	26	19	
1800	14	61	22	74		24	64		5	31	36	12	56	
1810	15	57				9	75		11	59		16	49	
1820	33	35	45	38		48	25		17	29	31	16	56	60
1830	35	33	50	34		47	30		18	28	31	34	65	66
1840	35	33	53	35		49	34		19	26	31	34	65	72
1850	34	47	48	37		29	35		22	27	35	42	49	75
1860	39	51	49	36		17	39		34	25	41	49	46	79

(续表)

	奥地利		普鲁士—德国			法国			英国			美国		
	中央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年	民用	军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1870	46	24	22	40	35	32	26	49	28	32	50	24	35	81
1880	45	19	15	82	63	39	30	54	35	53	61	24	41	80
1890	39	19	25	78	65	32	34	50	37	36	59	34	55	75
1900	47	17	35	59	64	36	38	54	36	48	65	28	64	74
1910	60	16	40	52	67	40	37	59	47	40	68	29	68	79

注：民用支出 + 军用支出 + 债务支出(这儿没有列出) = 100%。

资料来源：也见表 11.1。

奥地利：

1780—1860：Czoernig, 1861, pp.123—127。

1870—1910：Wysocki, 1975, p.109—113；Wagner, 1987, pp.300，590—591；Mischler and Ulbrich, 1905：Ⅱ，p.95(只是奥地利帝国)。这有时已包括重新计算过的来源数据。所有 1870 年和 1910 年的数据和全部支出来自维斯基；军事支出来自 Wagner 重算过的数据剔除了匈牙利对联合军队和 honved 储备力量的军事支出。1880—1900 年的债款数据来自 Mischler and Ulbrich。民用支出 = 剩余份额，因此对奥地利的数据必须谨慎对待。

普鲁士—德国：1820—1870 年是普鲁士的；1880—1910 年是德国的。

1760—1860：Riedel, 1866,表ⅩⅤ，ⅩⅥ，ⅩⅧ，ⅩⅩ。

1820—1910：Andic and Veverka, 1963—1964, p.262；Leineweber, 1988, pp.312—316。我调查了他 1820—1870 年的数据，从民用支出中减去了“民用储备费用”(以使德国数据与其他国家的具有可比性)。

法国：

1760　Riley, 1986, p.56—57，138—148(这一年是 1761 年)。

1780—1790　Morinead, 1980, p.315，1775 年和 1788 年只是普通的支出(或许民用支出被过高估计了约 30%)。

1800—1820　Marion, 1927, Ⅳ，pp.234，238，241—242，325，1928：Ⅴ，14，19；Block, 1875，Ⅰ，pp.495—512。1800 年的数据是 1801 年、1802 年和 1803 年的平均预算，分配给民用支出的比例都是 23%—25%。1810 年实际上是 1811 年；1820 年的数据是 1821 年和 1822 年预算的结合，这两年的数据都是可用的，但只是近似值。

1830—60　法国 1913 年年度统计；Block, 1875，Ⅰ，491—493。

1870—1910　Delorme and André, 1983, pp.722，727。

英国：中央政府的来源像表 11.1 一样。Mitchell and Deane 给出的只是预算的“主要构成条目”。我猜测剩余的种类不全的条目都是民用的。1860 年这些条目共占总预算的 12%；在所有的其他年份，所占比例要低得多。地方政府，1790 年联合王国的数据来自 Mitchell and Deane, 1980,公共财政报表。所有可用的资料来自 1880 年(实际是 1884 年)。早些年的估计程序：1820—1860 年，贫乏的法律收据即英格兰和威尔士加上英格兰、威尔士各郡的收据，再加上 12.5% 英格兰的额外支出。注意 Veverka, 1963, p.119 估计联合王国支出在 1840 年占 34%，1890 年占 47%。

美国：来源像表 11.1 一样。退伍军人的津贴算在军事支出里。我没有考虑地方政府的军事支出(州政府负责国民自卫队的拨款)。

表中所有的纵列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民用支出的相对增长。到1911年，民用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60%—80%。再加上民用借债，德国的比例能增长到67%—75%(Leineweber, 1988, pp.312—316)，因此所有国家中全部民用支出比例的真正范围约在70%—85%之间。在这一阶段之初，我们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数据，因为缺乏区域性政府的数据。但资料中反映出的可利用的趋势引导我猜测。18世纪中期的范围仅比表中所给出的中央国家的数据略微高一些——也就是说，它们会在15%—35%之间。这种民用支出比例的提升——从18世纪60年代的约25%上升到20世纪的约75%——表明了现代国家范围的第二次巨大改变，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次增长从19世纪中期起稳步前进。它没有受到经济周期的巨大影响：从1873年开始的农业大萧条没有对其产生大的冲击(像希格斯的危机理论可能建议的那样)。我们也将会看到，为应付危机而上升的大部分支出像福利支出，也没有对其产生大的冲击。

除奥地利之外，大多数民用增长是在区域性政府的水平上。一种分工传递开来：大部分新的民用职责传给了地方或地方政府，中央国家仍保留着其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小一些的中央国家仍保留了很大程度的军事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内战后的美国，它的小联邦州甚至在1910年仍是军队占主导地位。中等规模的中央国家，像英国、法国和德国，其民用和军事职责的分开相对平均些。在奥地利的土地上，如我们在第十章看到的，它与各省宪法解决的失败，意味着中央哈布斯堡政府仍握有其大部分的权力和新民用职能的大部分(1867年后，与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中央政府“两分天下”)。

中央和地方职责的分配在不同国家间是互有差异的。美国从其数据是可靠的这点来看，联邦政府的支出少于地方和州政府。在德意志帝国，区域支出很快超过了中央政府，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最大的地区性土地是普鲁士自己，它的支出比中央帝国政府都要高，然而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德意志”国家。这两个国家中的这种悬殊直到卷入

“二战”时才又反过来。在奥地利、英国和法国，整个阶段的中央支出都远高于地方支出。中央与地方协调也情形迥异。在中央集权的英国和法国，所有层次的政府在 19 世纪末开始协调它们的行动，并且地方支出服从于国家政府。在部分联邦的德国，协调和账目计算落后了那么一点点。在邦联的奥地利，它更为特殊，各省和帝国在不断变化。在美国，联邦政府在整个这一时期与州或地方政府联系甚少，并且对它们的支出一无所知。协调可能会被认为是对自由的一种侵犯，并被最高法院禁止。国家，按照我给它们定义的“民族”定型具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是如此的集权化或联邦化。

这些差异使得总趋势中的相似性更加突出。如格鲁(1984)所观察到的，这种范围的拓宽遍及有着不同体制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欧洲国家。19 世纪介绍的主要是非军事政府的支出。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在和平时期民用支出的提升代替了过去仅仅是作为战争的一个副产品。1846 年，英国中央国家的民用支出与它在 1820 年以及每一个入侵年份比较都相差无几。但从 1847 年开始，几乎在每一个年份，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其民用支出都稳步增长。在所有可被利用的国家统计中，这个模式都已被确认。战争不再是国家发展的唯一推动力。

我们能够为中央国家的这种转变确立象征性日期：民用支出第一次走在军用支出的前面，并控制债务偿还结果的那个时刻。有解释认为这最早发生在 1820 年的普鲁士，尽管这是误入歧途的，因为军队仍由主要行政部门使用，并且其军费部分地来自那里。但英国在 1881 年真正实现了这一点——一个时代的头号强国把其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多地用于和平活动，而不是军事活动，这对有组织的国家而言，在全部历史中或许是第一次。中央政府仍是一台制造战争的机器，但它现在至少也有一半是民用的。我们可以通过标明这种半军事、半民用政府的一个“双形政府”来对现代国家的多形模式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审视(如第三章所期望的)。因为这是一主要成功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创新。在第一卷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样

的国家——冒着生存危险降低军费，像早期的萨克森或波兰所做的那样——不仅仅是一个特例。所有的大国都在效仿。就连比利时、挪威和瑞典这样的小强国也都在效仿(比利时 1895 年年度统计；Woytinsky and Woytinsky, 1955；挪威官方统计, 1969：表 234；Therborn, 1978, pp.114—116)。

这种相似性是显著的。小强国的军事化程度比大国略轻一些，在美国，整个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较少军事化的，但它中央政府的军事化程度却远远超过了欧洲一流强国。但这些仅是重要的区别。在此或者在后来给出的人事部门统计中用于频繁表达的概念很少能得到支持：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在某种程度上独特地扩大了其规模。我参考了马克思早期对法国的论述，肯尼迪(1988, p.217)在这一点上对 19 世纪奥地利的论述，以及布拉福德(1965, p.98—99)和布兰宁(1974, pp.11—15)在这一点上对 18 世纪德国的论述。但无论是财政资料还是人事部门的资料都不能恰如其分地说明这种陈旧的理论。

我也修正了戴维斯和胡滕巴克(1986)的论点，并且这一论点被奥布赖恩(1988)所重述，即在 19 世纪末，英帝国的军事支出已如日薄西山。按人口计算的英国支出是最高的，但它的民用国家支出也是如此。英国是最富裕的欧洲国家，两项支出它都能够做到，肯尼迪(1989)也这样认为。按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看，无论是英国的民用支出还是军用支出都与其他的欧洲一流强国不相上下。1910 年军事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高到低是法国占 4.1%，德国约为 2.9%，英国为 2.8%，奥地利为 2.7%，美国最落后，仅是 1.2%。[1]法国(像俄国)竭尽其资源来维持其主要强国地位。幸亏隔离在另一个半球，才减缓了美国的压力。从强国的规范来看，这是仅存的偏离。

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国家生活中的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规模宏大的军事国家已迈入 18 世纪，并在 19 世纪末变成了一个具有民事和军事双重职能的双形国家。18 世纪的国家已第一次把其实力渗透到整个领土——依靠征募新兵的官员和税收顾问和征税官员的网络。尽

管这些依靠存在，但它们已不再是简单的“国家”，而是进一步与民事官员共同主宰国家机构。

国家的范围

支出(也包括人事部门)从军事活动转向民用活动看起来就像拓宽的国家规模一样不同寻常(如 Grew, 1984 年强调的)。哪一种民事职能增长了呢？这种层次上的资料没有细致到能轻易作出比较的程度。我只能对 1870—1911 年间的资料进行半系统的研究。幸运的是，这几乎是所有的民事职能增长发生的时候。

传统的由战争主导的国家也已实现了三种主要的民用支出。(第四章指出它也产生了很多特殊的地方立法。)它的心脏是君主的家族和宫庭；它的肌腱是必须支持其军事活动的财政机构；它的大脑是法律和治安的行政管理机构。在 18 世纪中期，这三种支出占了奥地利、法国和英国小型民用支出的 75% 以上。(我们缺少对普鲁士和美国的说明。)然而表 11.5 表明，到 1910 年，这些民用支出的比例已下降到 5%—20% 之间，这是个很显著的变化。1870 年后，按照钱币的标准来看它们是上升了(尽管不在法国)，但以实际或相对的标准来看它们并没有上升。实际上 1911 年的税收官员比 1760 年少了；王室家族和宫廷也缩小了——在美国和法国已被废除；并且尽管平民的警察力量现在已实质性地增多，但司法警察却没有增加。

表 11.5 表明这些传统的国家职能已在世界范围内被超过，先是被两种主要的增长领域即教育和运输超过；然后被两种小一些的增长，即邮政电报服务和“其他的经济服务”，主要是环境活动和农业与工业津贴——所超过。这在所有的国家都惊人的相似，尽管它们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方面有很大不同。

英国上升的中央支出主要归因于普及基本的话语能力如教育、邮局

和电报的增长。到1901年，这些支出占了全部民用支出的70%。既是象征性又是物质性的通信、教育和公路主导了区域性政府的支出。在法国的预算中，教育和邮政电报服务，道路、桥梁和船坞占主导地位；在美国预算中，教育、公路和邮政服务是主导性的，联邦政府承担的只有邮政服务。在单个的美国州政府中，到目前为止，扩张最大的部门是教育(Halt, 1977)。

表 11.5　在民用支出条目中上升的百分比，1870—1910 年；以及它们在 1910 年的国家总预算中的百分比

	奥地利		法　国		德　国		英　国		美　国	美　国
	中　央		中　央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州政府
	Inc.	Cont.	Inc.	Cont.	Inc.	Cont.	Inc.	Cont.	Cont.	Inc.
行政管理/法律和治安	11	6	(33)	14	42	21	21	6	11	183
教育	67	3	429	9	248	19	531	19	18	400
其他福利			70	3	151	10	152	8	5	432
运输	398	29	34	9	89	11	338	12	17	238
其他经济	14	2					385	14	13	
服务业			}83	2}	188	2				
邮政和电报	74	6					259	8	8	
其他		14		1		4		0	8	

注：括号内的数据表示下降。
资料来源：参见表 11.1。
奥地利：Wysocki, 1975, pp.230—241。是奥地利帝国的数据。“其他”这一组来自维斯基提供的不完整资料。我猜测大部分的“其他花费”是财政部支付给不同部门的其他资金。
英国：时间跨度是 1880—1910 年：数据只是适用于从 1880 年(对某些条目来说是从 1884 年)到 1910 年，适用于联合王国中央政府加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政府。因此那些数据将略高估计了最先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条目在国家总预算中的百分比(如邮政服务)。它们也会过低估计了行政管理的费用，因为地方政府的费用没有单独列出。
美国：1913 年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来自美国。1976 年：表 Y533—566。只有在 1870—1900 年间，在州政府水平上上升的百分比才是适用的——从霍布特 1977 年的资料计算而来。

在德国，教育再次成为最大的发展领域，位居第二的是国家资助和拥有的各个企业，包括铁路在内。铁路在国家最大的部门中扮演了一

个特殊的角色，占用其全部支出的 50% 以下(并且在其收入中占的比例更高，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铁路占去了奥地利民用预算的最大份额，其花费由其他国有和私人企业的支出来支持(像德国一样)。在小强国之间出现了一种相似的模式：在挪威和比利时，铁路、其他国家直接管理的企业和教育占主导地位。切记这些是毛支出，国有化工业通常也会带来收入，通常是利润，我会在后边考虑这一点。

这些预算反映了增长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普遍的，另外两种是较为多变的——比格鲁(1984)认为的更为多变：

1. 这种随处可见的主要增长，我把它叫作基础结构的国家职能(像维斯基 1975 解释的奥地利增长一样)。这种基础结构使得国家能够把物质性和象征性的通信遍布到整个领土内。从财政角度来看，这是国家职能在这一阶段非常容易做到的、最大和最普遍的延伸。

2. 然而各国间在多大程度上对其物质基础设施和资源，尤其是铁路实行国有化，存在很大差别。尽管英国、美国和法国管理并经常资助铁路，但铁路并没有实现国有化；法国拥有铁路，但并不是铁路车辆；其他国家控制着铁路，还有许多国家控制着一些其他企业。

3. 表 11.5 也反映了福利国家、尤其是德国多变的开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提供的救济少得可怜(它的总水平通常因残存记录不完整而不明确)。一些中央政府一直为战争的退役人员提供福利(其水平因为我提供的资料而不明确)。现在中央国家正开始为社会公民提供最基本的权利。

第十四章将要分析和解释这三种民用范围内的提升。但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个导言：至少与历史上的国家民用支出相比，它们的扩张范围是很普遍的和一致的，这一时期至少在热衷于政治权力的多数运作者之间是这样。在旧的国家职能中，军队和法律与治安带有很大成分的军国主义色彩；陆军和海军也被派往国外，以为统治者和旧政权取得荣誉；宫廷支出是用作他们个人的消费。认为基础结构支出对经济和军事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种说法看上去是合理的；同时福利支出也许被

认为是对全体人民的幸福作出了贡献。现代国家的较大范围或许会比传统国家的较小范围更具有协调性。我将在第十四章讨论这个问题，但当然协调要取决于为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政府收入与代议制

在我对政治斗争的叙述中，政府收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就像它们在第一卷分配的那样。[2]提高收入或使之合理化的努力，在法国和美国引起了革命，在奥地利引起了民族起义，在英国导致了改革；而普鲁士却勉强维系着传统收入，使改革和革命的可能性降到极致。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政治实质上是财政斗争，与前几个世纪毫无二致。

财政与政治的这种紧密关系在19世纪有相当程度的削弱。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再加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降低了财政紧张状况。国家需要的收入在比例上已比早期更少(如Webber and Wildavsky, 1986, p.207也提到过)。通常抽取财政会带来原则性的抗议，但这是牢骚不满，而不是愤怒的叫嚣(除了在纠纷四起的奥地利)。因为伤痛减轻了，某些已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使早期的革命派和保守派同样大吃一惊。政党民主派与君主派相比，证明对这种低层次的收入支出更为温和。议会能按法律程序对呈递给他们的账目进行审察，批准款项，对可选择的款项进行辩论，并对收入投票表决。代议制使得收入的适度支出让双方都能接受。君主处于更为特殊的压力下，被迫接受早已确定的税额并豁免他们政治同盟的税收。在理论上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征税，但在实际上——如我自始至终所强调的——君主卷入了无休止的派系谈判之中。或许君主派比政党民主派更深地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政治中。但解决办法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

表 11.6　来自直接税和间接税收以及国家财产的国家收入百分比，1760—1910 年

	奥地利			英国			法国			普鲁士			美国		
年份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1760	53	35	12	26	69	4	48	45	7						
1770	48	33	19	16	70	4									
1780	41	37	23	20	71	5	41	49	10						
1790	27	36		18	66	9	35	47	18						
1800	29	45		27	52	12									
1810	30	42		30	57	11									
1820	44	50	6+	14	68	16				36	33	30	10	62	26
1830	39	45	16	10	73	17	40	22	38				5	71	21
1840	25	49	29	8	73	19	c30			24	34	41	18	42	37
1850	29	44	22	18	65	16	c28			22	32	46	23	58	20
1860	27	42	35	18	64	16	c23						26	54	18
1870	35	30	26	26	59	12	26	31	44	20	24	55	26	58	16
1880	32	31	37	25	61	16	21	38	41	17	25	58	15	67	17
1890			26	50	18	18	36	42	8	30	62	16	64	20	
1900	28	20	42	27	47	22	21	36	43	7	28	65	16	58	26
1910	28	29	43	(44)	(36)	(17)	22	33	45	9	22	69			

注：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数据仅指中央政府。普鲁士和美国的数据既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就像在正文中和附录表 A.6 和 A.12 所解释的那样。就美国而言，商业税收是包括在直接税收之内的。英国 1910 年的数据实际上是 1911 年的。1910 年的数据在附录表 A.7 中已给出。

资料来源：见附录表 A.6—A.12 各国的表格。

在表 11.6 中反映了被中央政府支出的普通毛收入来源的总趋势。首先要指出三个要点：

1. “毛”意味着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收集的费用已被加入到从收入来源中让渡的利润中(那就是净收入)。这意味着我有时会偏离更常用的统计数据——如把美国邮局的总支出加到利润中，为了美国收入统计，利润只出现在通常的来源中。

2. “普通”意味着我已从计算中减去了所有的贷款(偶尔的盈余也是早些年保留下来的)。减去贷款距理想状态很远，但贷款方面的来源资料各国都不一样，通常是不完整的。然而可用的贷款资料的确反映

了一种趋势：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因为战争尤为频繁，所以贷款也尤为频繁。 它们在19世纪中期的铁路大繁荣中异常活跃，然后便消沉了，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出现(奥地利比其他地区更为频繁)。 钱币的借入和贷出——现在通常是纸币——对放利者、富裕的外国同盟和降低铸币成色的行为而言，与通过温和的通货膨胀以系统而有意识的努力去借款支出相比，变成了一项更少有专门性的手段。 这种政策表明一种经济“体系”存在有限意识和(伙同关税政策)一种国家经济责任的最少意识。 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势头，这种政策在提供可观数目的钱币方面会很有效。 因此表11.6省略的其他小前提仍然是有用的财政镇痛剂。

3. 尽管我的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数据是准确的，但美国和普鲁士—德国的资料却出现了问题。 美国和德国(1871年后)的联邦政权其特定的收入——几乎是所有规定的关税和消费税——按法律转入了中央政府。 然而它们的地方政府获得不断变换的资源，即在其他国家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能发现的资源。 因此，把德国和美国中央政府的收入来源与其他国家的收入来源相比较，就会产生完全不真实的结果。 我们也应该包括它们的区域性政府的数据。 对德国我在表11.6中的解决方法就是继续计算1871年后普鲁士的收入(当普鲁士变成新帝国的一个区域性政府时)并把它加到被估测的构成联邦德意志国家收入的普鲁士上。 这两个总数在附录表A.9中已被区分开来，普鲁士毕竟是1871年前地位重要的国家，1871年后它仍然囊括了几乎2/3的德国。 在美国没有一个州政府能起到普鲁士那样的主导地位，因此我计算了已知州的人均收入数据，并把它们加到联邦政府的收入中。 这儿涉及了一些估计的整体数据，因为在这一阶段早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保留了它们的收入统计。 细节已在附录表A.11和A.12中给出。 普鲁士—德国和美国这两种层次的政府大致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中央政府。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收入组合。 这儿不能对差异作简单的、一般性的解释。 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预示收入来源。 代议制的国家成形有助于解释收入优势——君主国更倾向于“国家财产”——但工业化

政权很显然拥有选择权和施加给它们的不同影响。除了美国偏离外，最为普遍的模式就是当国家财产在收入中的比例上升时，税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下滑。在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直接税收下降显著；间接税收减少的幅度要小多了。在英国和美国，直接税收围绕一个适中的模式上下浮动，并且间接税收下滑轻微(在美国仅处在边缘上)。下面我依次解释三种收入类型：

1. “直接税”经历了三个现代阶段，即分别由地租、财产税并最终(但只是在我目前的时期之后)由所得税所主导。地租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要的直接税，对土地的整体规模进行征税和估定本地区的土地价值。大的土地所有者对他们自己和当地的农民进行评估。在更为商业化的英国和美国，繁荣的土地市场意味着其价值能被更精确地评估。所有的国家精英都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地主阶级，不会轻易让问题脱离他们的控制，因为这样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土地所有者的合作和农民的顺从逐渐减弱。他们抗议说，由农业为国家提供资金，而工业却逃避责任，这是不公平的。贵族政党提出不祥的警告：要注意农民造反。他们被处处留意。英国地租在 1816 年被废除。略微落后的经济仍与地租并存，但收取的比率降低了——像奥地利的主要地租用于军事支出。现在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被迫转向其他方面。

他们转向对像房屋和工业建筑那样的财富象征征税。对像马车和仆人那样的奢侈物品在 18 世纪末试行征税，但这种收入几乎不值对其进行评估所花的费用。法国大革命极大拓宽了财产税的范围，达到了后来我们熟知的，从 1799 年一直持续到一战都未改变。“四种旧的财产税”指对不动产，对房屋的租用价值，对商业和专业的执照费以及对不动产的门窗的数目征税。其他国家也临时效仿了这些模式，但没有革命的冲击，他们从自己也根植其中的阶级中征得的税收少而又少。1900 年前后，英国、法国和德国增加了遗产税，在遗嘱证明的辅助下实施。美国实行了法人税，尤其是对那些受益于国家管理，像铁路和保

险这样的法人团体征税。 法国征收的财产税最高，约占收入的 20%。其他国家就少得多了。 这对他们的需要来说是杯水车薪。

不像大多数研究税收的历史学家那样(像 Weber and Wildavsky, 1986, ch.6)，我对所得税一提而过，因为它对总收入的贡献不大。 美国内战时期的政治家对所得税期望值很高，但其收入少得可怜，并且不久即被宣布为非法。 只有在 1911 年后它才开始得到永久恢复。 英国政府从皮特 1799 年的方案起，拥有众多的所得税方案(Levi, 1988, ch.6)。 拿破仑战争时期所得税高到极致，几乎提供了全部收入的 20%。 它在 1816 年被废除，1842 年被皮尔适当地作了恢复，此后断断续续地得到扩充，并被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德国所效仿。

在财产税真正平稳增加时，所得税却收效甚微。 他们即使对某些财产来源和超高水平的收入征收的税率也很低。 所得税是自我估价的；纳税者通过发誓，将自己的财产列入卷宗交给地方行政长官。 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有产阶级感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民族”而战时，是有成效的，但这种办法在和平时期就不奏效了。 个人所得税评估起来也很困难。 除了政府的雇员，它不能直接从其收入中扣除，除非按正规计算的工资和薪水雇佣占主导地位。 大多数人的所得没法被估价，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有正规记录的个人收入。 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丹麦除外)所得税仅是对少数有家产者征收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战后(Kraus, 1981, pp.190—193)。

表 11.6 表明只有英国和美国的直接税几乎自始至终都维持了同一水平。 但它们的起始水平是很低的。 随着其他国家水平的下降，除了普鲁士已终结外，1910 年所有国家的水平都不相上下，维持在总收入的 27%—44% 之间。 但如果我们继续看下一年，即 1911 年，我们会发现英国的直接税突然由总收入的 27% 上升到 44%。 这种激增源自劳合·乔治对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极力扩充，这是法国大革命后第一次有意识的努力，即对富人征收重税。 自由党代表着一个混合的阶级—宗教—区域的利益，倾向于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他们日益增长的支出主要来自递

增的直接税，而不是由关税或销售税组成的递减的间接税(Hobson, 1991)。 美国进步党也寻求类似的改革，尽管没有成功过。

一个改良主义的政权策略只会出现在一些政党民主派中，它体现了重新分配的所得税。 如果不总是政府实施管理干预，它后来会主导政府理论。 当所得税的实际收集被官僚化和合法化时，国家收入就和社会再分配一样，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形式。 这将发生在“一战”期间和“一战”之后，显示了国家基础权力可观的增长。

但有一点除外，即直接税在19世纪的国家中并不盛行。 社会不再是农业的，但也没有完全成为工业化。 对农业征收的直接税少得可怜，工业也不可能榨出更多的油水，因为它仍然没有带来足够的可计算工资和有薪水的雇员。 进一步说，工业化时期对富人征收直接税从技术上更容易，但富人控制着国家，他们不愿对自己征税。

2. 政权采用“间接税”后，农业国传统递减的主要支柱，能否走出他们深陷其中的征税负担的泥潭呢？ 关税和消费税是对可看得见的运输过程中的货物和在边境、港口和市场——在这些农业国拥有基础权力的地方——的货物征得的税收。 但即使在这些地方征收技术也仍然是简单而特殊的。 间接税至少有一半自始至终地来自少数货物，通常是盐、糖、烟草和酒精。 后两种货物的存在为道德所不容，对其征税那时是(并且现在仍是)合法的，因此比较容易推行。 这种税收通常得到更为普遍的关税收入的补充，尤其对进口食品原料的征税。 间接税因此不成比例地聚焦在生计商品和非常普遍的麻醉剂像酒精和烟草上。 它们是递减的，对城市贫民的征收尤为困难。 18世纪的国家在财政上是保守的，尤其是商业繁荣的荷兰和英国，其收入的70%来自间接税(Mathias and O'Brien, 1976)。 但十年革命使得有产“阶级”对“民众”反对生计商品高价格的暴乱心怀恐惧。 这激发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所得税的随之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1848年，统治阶级永远扔掉了这个负担。 间接税在世界各地都下降了。

因此各国是否陷入了它们传统财政困境的一个更为紧张的局面——

去离间支持它们的有产者或被它们排除在外的民众，去冒来自内部的政变或来自下层革命的危险？然而，幸运的是，他们手头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总支出的相对下降，另一个是第三种收入类型的增长。

3. “国家”财产包括来自王室或国有化财产或出卖政府特权和垄断权的收入。传统上，这种财产普遍包括王室主宰的土地，并得到合法收费和出卖特权的增补。这些税收从相对意义上来讲(有时也是绝对意义)大大地减少了，而美国联邦政府19世纪中期从它独一无二的出售所谓的“处女”地的能力中获益匪浅——印第安人被粗暴地排斥在了土地所有者的行列之外。

但国王的权利能被现代化和扩大化。费用能被征收，垄断和特权能被认可，然后假定管理的经济和职业扩张的范围从银行、保险业和运输服务到医药、建筑和法律服务是“秩序井然”的。这种国家税收的削减被用一系列的印章和邮票进行了隆重纪念。这种收入有时与对法人征收的间接税相重叠(是我把一项收入条款的分配归入这一类或那一类，即直接税和国家财产，有时也是任意的)。国家财产的其他形式是极易区分的。国家的邮政垄断能产生一部分利润。然后我们必须加上传统的独特性，即私有财产只统治了“活人”本身。国王的权利包括在矿业和港口利润的份额。日益膨胀的采矿业和航运业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不论有无全部的国家所有权。国家的公路、运河、尤其是铁路也带来了收费和交通费。19世纪早期运河在美国某些州的收入中占主导地位；后来铁路几乎在世界各地举足轻重。这些新扩张的国家职能大部分是有用的，不仅没有争议，甚至是受欢迎的。在收入方面他们有优势，即能养活自己，甚至能产生利润。

各国所有收入都来自它们的财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国家受益最多的是国有及运行中的铁路和其他的工业(通常是采矿和其他通讯工业)。铁路是最大的造币机器，普鲁士是它们主要的剥削者，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实际掌管了所有的私人铁路。1911年，普鲁士从它铁路所有权中的获益不少于收入的58%和全部收入的47%(包括它的帝国收

入)。弗雷姆德林(1980：38)认为普鲁士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家，然而却有着一个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利润”概念。货物和乘客率受到财政、政治目标的影响，尤其是避免涉及到与普鲁士或帝国立法当局谈判的直接税或间接税。

美国和英国对国家财产的依赖较少。它们很难用自由贸易的经济哲学和政党民主解释这一点。后者意味着它们在收入来源上没有政治优先权，对国家财产的征税像所有的征税一样，需要征得议会的认可。然而这在二元制君主国家和(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更为集权下经济统制的法国却并非如此。在普鲁士对收入的选择总是政治与技术并重的。如理查德 · 梯利(1966)所强调的，直接税、间接税和借债暗示着国内社会某些有组织机体的同意，这是政权乐意避免的。国家财产提供的是“隔离”的财政资源。但奥地利政府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被迫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大量出卖其铁路网络来获取现金。专制的俄国获得了更多的收入隔离：到 1910 年，1/3 的收入来自铁路，1/3 的收入来自对酒销售的垄断(Hobson, 1991)。

国家财产在君主国有着很大的魅力。对国家精英而言，它提供了潜在的自主财源；对政党来说，它产生的财政麻烦比税收要少得多。代议制定型的确预言：政党民主国家在收入类型上不存在政治优先权。而其他政权比较偏爱这一点，有时占优先地位的就是国家财产收入，因为它为平民社会提供了隔离的权力。君主国已找到缓解税收的手段。

在这一时期，各国摆脱了数个世纪以来刺激代议制斗争的财政危机。主要是在有着繁荣经济、并能平稳增加流通的和平时期，它们被要求执行新的国家职能，通常能养活它们自己，有时能获取大的收益。对代议制的驱动并没有走到尽头。随着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相当多的阶级，它又怎么会走到尽头呢？但它已丧失了传统的财政来源。它会发现新的来源，但与此同时在 19 世纪末已发生了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减轻税收的问题。

民事和军事人员与官僚政治

在向前向上的历程中用来衡量国家规模的另一个标准是政府人员的数量，但那要预先假定我们——或者事实上是这一时期的各个国家——能计算它们。国家能否计算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计算其官员数量，它就不可能被称得上是官僚政治的。表 11.7 包含着我所发现的这种人员的总数。尽管是不完整的，尤其是在民事部门就业方面，然而与以前的所有汇编相比，它们都更接近于完整。

各国至少知道其军队的规模。可用的数据有三种类型：最小的数目包括野战集团军和作战海军；最大的意味着“纸上力量”，或者那些在理论上能被动员的；中间数目表明那些实质上能用作所有军事目的的(如不仅指战斗部队)。我努力估计这种中间数目：实际上在任何时期都有严格军事纪律的作战力量——野战集团军、驻军、指挥部参谋人员、补充人员，如果能实际动员的话，还包括预备役部队和服兵役人员(这在英国的资料来源中“体现出来”)，加上海上和港口里活跃的海军人员和补充组织。

我没有把纸上力量和预先估计用作从议会提取资金的目的。土地登记簿基本线索的纸上力量实质上导致了对奥地利军事力量的过高估计，并且依赖预先估计导致了对英国军事力量小的误差(这些曾被用过，例如 1983 年被 Flora 用过；1988 年被 Modelski 和 Thompson 用作截至 1820 年的海军资料)。我排除了那些实际上没有应征入伍的兵役适龄人员和预备役人员，但包括那些在国外服役的国民，包括那些在殖民地的军队，也包括了按人数拨款的欧洲雇佣兵。这对 18 世纪的英国来说尤为重要，它的相当多的黑森和汉诺威的军队有时被忽略了。但我没把从殖民地招募的军队计算在内。因此，例如，英帝国全部的武装力量比我提供的数据要多一些，但它们在帝国人口中的比例却少得多。在

这个例子中为镇压印度而必须维持的小规模军队与它两亿的人口比起来，英国的军国主义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相比，对英国的军国主义就严重低估了。 军事资料的可靠性和合理性为了比较目的而言是好的。

民事部门人员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表 11.7 中最为重要的优先研究发现是，没有一个国家知道公共官员的数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 与这些数据相比，综合档案会发现更多的数据，但它们仍然不会是公共官员的总数。 我的早期数据，除了法国之外，仅是由中央政府计算的官员数量。 对那些少得离谱的数据，我并没有包括它们。因此普鲁士政府对 1747—1748 年间和 1753—1754 年间的记录，使得约翰逊(1975，附录一)得出结论，约有 3 000 人被国王和大臣们认为对他们负责。 这的确测量了普鲁士的“行政机构”，但这在普鲁士所有执行公共职责的官员中仅是一小部分。 1804 年，在普鲁士王室工作的官员也远少于 27 800 人(Gray, 1986, p.21)。 普鲁士的平民政府因此包含一个小的行政核心，由中央控制；一个分权的王室领地管理部门；一个无法控制又不可知的大的行政中间地带。 前两者可能被潜在地隔离到平民社会之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第三者则被完全融入了平民社会。 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把普鲁士称作“官僚政治的”，这是很荒唐的。 (我将在第十二章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奥地利(与瑞典一样)是第一个产生职业统计的国家，包括官员统计，这发生在 18 世纪中期。 然后，约在 1800 年前后，美国和英国也开始统计计算中央政府官员。 所有的统计仅限于一定层次以上的全职官员。 我表中的法国数据与此不同。 它们是目前的历史学家对所有执行公共职责官员总数的估计，比任何国家的当代数据都要高。 如果我们对其他的国家作这种估计，同样也会得出更高的数据。 例如，表 11.7 中英国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的数据并不包括地方的土地税征税官员，只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 据估计约在 2 万到 3 万之间，比民事服务人员的统计总数多(Parris, 1969, p.22)。 在法国，财政部长内克尔估计有 25 万人帮忙征税，但猜测——承认没有精确记载——仅有约 3.5 万人

是全职的，依赖这一职位谋生(1784, pp.194—197)。只有随着19世纪中期的官僚化(后面讨论)，大多数公共官员才是可统计的。

政府就业的概念和因此而起的官僚机构的概念，在19世纪末之前是不适用的。谁“主宰”着政府？政府精英包括那些在部、局工作的少数高层官员，首都的委员会，再加上一些重要的地方官员。朝臣也处于政府的心脏，就像宫廷是大多数首都的中央政治机构一样。然而朝臣很难成为政府的雇员。他们是享有特权的贵族，与其委托人一道，因世袭而得到其职位。我们称之为“地方的国家精英”包括某些拿薪水的官员，尽管不必非得是薪水最高的官员。这些人或许是充当和平法官的兼职地方名流，朗拉特、麦雷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是这些人“主宰”着政府吗？是半自治合作组织的成员如像法国议会中的法官“主宰”着政府吗？这儿不确定的普遍因素是：那些在地区和地方层次上正常行使政府主要民事职责的根深蒂固的地方名流能否真正地“主宰”它。他们几乎都是兼职官员，然而他们的职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答案显而易见，当国家行政管理如此直接深入到它们的平民社会时，谈到“它”仅是一个有限意义的政府。“政府”并不是一个协调精英的整体，与平民社会明显不同。“它”是不存在的。

“政府雇用”的范围在低层次上也是模糊的，并且这持续的时间更长。常规的手工任务和职员任务是由全职临时工完成的，开始时他们不被列入官员记录之内。18世纪组织最好的政府机关可能是英国的间接税务部。1779年，它的中央机构几乎雇用了300名全职官员。但也就在那一年一份文件出其不意地揭露了还有1 200多名职员临时工(Brewer, 1989, p.69)。特威利尔(1976：11—15)指出：直到1899年，财政部中的临时工仍几乎与正式官员数量不相上下。尽管到那时他们已被计算在法国的统计之内(并且表11.7也反映了这点)，然而他们是何时进入官方统计的仍不清楚。范·里珀尔和沙伊伯(1959, pp.56—59)推测，美国的官员人数到1816年约低估了50%，在这一阶段的其他年份约低估了25%。

低估对女性公共就业的增长也是模糊的。在该世纪末，多数临时工是女性，但她们的增长仍然不清楚。到 1910 年，女性在英国和美国的政府雇员中占半数，而在法国和奥地利仅占 1/4。这种差异是真的吗？该时期法国大多数的详细人口统计证明并非如此。这显示了女性公共就业突然出现了一次中断。1891 年，在政府就业的女性逐渐增至 33.3 万人，然后在下一次普查中，即再次稳定增长之前的 1901 年，骤减到 14 万人。这或许是一次虚假的人为差异，即突然排斥兼职雇用和学校教师的结果。在这一时期对女性就业的调查估计通常是不可靠的。鲍斯(1987)重新分析了美国 1900 年的人口调查手稿，估计官方的统计数据，即女性在政府就业中占 20%，应该被翻番甚至更多。如果不对每一个国家准确的人口统计程序、工作组织和性别作出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我们就不能确定总的趋势。

我的早期数据来自有限的计算训练——其中两个德意志国家被称为公职人员，法国被称作法国政府——被国家统治集团正式雇用的官员和准职业身份的男性(除了在公职人员中计算的独立的专业人员)。随后 19 世纪中期后的计算能力拓展到了区域性政府且向下到了手工工人和小职员。约到了 1890 年，事实上所有那些执行政府公共职能的人——除了在低层次和女性就业中相互叠加的范畴——都被计算在人口之内。表 11.7 也是如此计算的。随后的民事官员的增长几乎可以被看作是真实的。

因此我们不能用浅显明了的方式解释这种上升的民事就业趋势(像大多数作者所做的那样，如 Anderson and Anderson, 1967, p.167； Flora, 1984； Grew, 1984)。这种绝对成比例的趋势看似是显著上升的。然而计算能力也是在加强的。只有 1870 年以后的上升才显然是真实可靠的。它在那时上升迅速，尤其是在区域性政府方面。这进一步促成了由支出得出的结论。在 19 世纪末，政府的民事活动增长是实质性的。在此之前，其增长的真正规模远不及对官员进行统计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本身是重要的，它反映了全职政府就业方面的真正增长。政府

现有官员在其领土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分散在 5%—10% 之间，应对他们在地方、地区或中央政府的上级负责(并可被统计)。除了美国之外，有时也不包括奥地利，他们在这种层次之间联合也是相当可观的。各国现在处于潜在地根植于“国家忠臣”的广阔覆盖下，其独特的政治性我将在第十六章探讨。

军事倾向则非常地明晰。除了美国之外，最高的武装力量，无论是从绝对意义还是从人口比例来看，最早出现在拿破仑战争或七年战争中。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内战时期之外都非常少。然后在内战时期达到了与其他国家持平的比例：占北方人口的 4.3%，南部同盟的 3.7%，除黑人奴隶之外南部同盟的 7.1%。(几乎没有黑人奴隶参加南部同盟的武装力量。)[3]这种扩张与民事政府的就业是平行的。联邦州在 1860 年有 3.7 万名官员。到 1861—1862 年，两个交战联盟的官员达到约 17 万人(Van Riper and Scheiber, 1959, p.450)。就这一方面而言，美国内战既像早期的欧洲战争(它没有导致民事官员的急剧膨胀)，但它可能更像一战。

表 11.7 奥匈帝国、法国、英国、普鲁士—德国和美国的政府就业，1760—1910 年(在全部人口中的百分比)

	民事部门														
	中央政府					所有层次					军事部门				
年份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1760	0.06		0.26			0.17					1.66	1.78	2.36	4.14	
											1.17	0.82	0.58		
1780	0.05						1.29				1.41	0.89	2.76	3.76	
1790					0.02		1.01				1.52	0.85	0.97	3.42	0.02
1800			0.18	0.37	0.04		0.91				1.35	2.93	4.91	3.73	0.12
1810			0.24		0.05	0.12					2.38	3.66	5.30	3.88	0.16
1820			0.22		0.07								1.02	1.33	0.16
1830	0.35		0.17		0.09	0.37					1.38	1.23	1.01	1.15	0.09
1840	0.37	0.26		0.11+	0.11	0.41		0.29			1.56	1.02	1.10	1.05	0.13
1850	0.40	0.41	0.24	0.20+	0.11	0.45	0.84	0.41	0.33		1.56	1.09	1.20	1.04	0.09
1860					0.12	0.57		0.41	0.47		1.60	1.23	1.74	0.82	0.09
1870		0.60		0.55	0.13	0.50	1.11	0.53	1.15		0.86	1.66	1.14	0.98	0.13

(续表)

	民事部门														
	中央政府					所有层次					军事部门				
年份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1880		0.87			0.19	0.53	1.53	0.46	1.56		0.73	1.40	0.96	0.96	0.07
1890	1.06	0.91	0.32		0.25	2.92	1.83	0.99	1.70		0.79	1.47	0.96	1.07	0.06
1900	1.14	1.10	0.40		0.31	3.30	1.80	1.66		1.36	0.88	1.59	1.51	1.12	0.17
1910	1.17	1.40	0.64		0.42	3.15	2.14	2.60	1.57	1.68	0.86	1.65	1.04	1.05	0.15

关于来源和脚注，见附录表 A.1—A.5 包含的各国独自的数据。

军事数据的可靠性使得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并且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普鲁士开始了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时期，然后在德意志帝国后期部分复兴之前衰落了。与盛行的自由模式相反，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竭尽全力发展欧洲最高水平的军事动员。从那之后，法国也倾向于在比例上保持最大的武装力量，奥地利则在欧洲强国中拥有的军事力量最小。如当代人所意识到的，奥地利落后于其对手的军事动员，表明了其作为一个一流强国的衰落。

这些数据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用被承认有效的不精确数据，能确定财政趋势。尽管我们不能肯定民事就业的本质，但国家就业总的增长再次被证明不比其国内构成的变化更为显著。军事就业下降剧烈(美国除外)，民事就业在这一阶段的早些年里在形式上是增长的，在以后的年份里在本质上是增长的。这与支出数据是相吻合的。第二，把对官员的统计能力作为官僚化的一个最低层次，这对军事国家来说在1760年就已达到了，但对公民国家而言至少到另一个世纪才开始实行。

临时性的结论

我证明了现代国家生活中两次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8世纪的国家在与它们的平民社会有关的方面突然变得规模宏大。我们是否认

为 19 世纪的国家是增长的取决于所用的衡量标准。 支出以金钱的标准来看增长飞速，如果我们控制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那么其增长就比较和缓。 但这一时期与平民社会有关的增长，在多数国家实际上衰落了。 漫长的 19 世纪更多的是私人经济增长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是国家扩张——除非战争的强加影响。 然而这掩盖了第二次剧变——在国家本质方面两次伟大的 19 世纪的转变：

1. 国家职责从它们狭隘的传统军事定型转向三种扩大的民事职责。最伟大、最统一的是提供了新的物质和象征性的通讯基础设施。 第二种尤其在君主国和后来的工业国中出现，即经济生活中的国家干预增强。 第三种也是最近的一种，在这一阶段末的某些经济最为先进的国家中发现，即提供了社会福利的现代方式。 这三种扩大的民事职责一起清楚地表明向一个新的双重职能即半军半民国家的转变。

2. 我只是临时提出了第三种戏剧性的转变。 国家在这一时期变得极其官僚化，但早期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军事而不是民事行政管理上。官僚化减少了直接的职位安插。 这会被更间接或许是更民主的渗入模式所取代吗？ 或者官僚化会导致一大批国家忠臣从平民社会分离出来吗？ 在民事和军事政府机构中相同的模式会是如此明显吗？

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向前向上的理论所阐述的相比，是一个更为错综复杂、各不相同的进程。 一个财政准确性较少、默契性较多的政府出现了。 但这种总趋势是通过三个不同的进程体现出来的：一个相对下降但却变得更为明显的专业化、官僚化，并且是潜在性的军事社会与平民社会的分离；官僚化的发展，首先是在政府的军事方面，然后是在民事方面，并且一个民事政府或许会默契地拓展了其范围，这些分别是下边三章的主题。

注 释：

[1] 这些数据与霍布森计算的军事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是相似的：法国占 4.0%，德国占 3.3%，英国占 3.0%，美国占 1.1%，俄国的比例在 3.5%—3.8% 之间。

[2] 政府收入最普遍的历史是由韦伯和怀尔达夫斯基(1986)作出的。他们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了这一时期。也见阿丹特(1975)和沃伊廷斯基和沃伊廷斯基(1955，pp.713—733)。然而他们的收入数据都不如这里给出的全面和可靠。霍布森(1991)给出了1870—1914年间最为全面的收入分析。

[3] 内战的数据来自库尔特(1950，p.68——人口)；克赖德贝格和亨利(1955, p.95——实际上在1865年服役的联邦军队)；利弗莫尔(1900，p.47——1864年服役的联邦军队，约有80%的入伍者处于备战状态中，像在联邦军队中一样)。这些是随时准备入伍的人员。很显然，从某一点来看内战期间入伍比例是非常高的。

参考文献

This bibliography includes references cited in the appendix tables. It excludes official statistical sources adequately described in notes to the tables in this chapter or in Appendix A.

Abramovitz, M., and V.Eliasberg. 1957. *The Growth of Public Employment in Great Brit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ddington, L. 1984. *The Pattern of War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lbrow, M. 1970. *Bureaucracy*. London: Pall Mall Press.

Anderson, E., and P.R.Anderson. 196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ic, S., and J.Veverka. 1963—4.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Germany since the unification. *Finanzarchiv*, N.F. 23, 2.

Ardant, G. 1975. Finan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s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an, R. 1973.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Beer, A. de. 1871. *Die Finanzen Osterreiches*. Prague: n.p.

Beer, S. 1973. Mod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is *Patterns of Government: The Major Political Systems of Europe*. New York: McGraw-Hill.

Blanning, T.C.W. 1974.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ainz, 1743—180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ck, M. 1875.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Comparée avec les Divers Pays de l'Europe*, 2nd ed., 2 vols. Paris: Guillaumin.

Bolognese-Leuctenmuller, B. 1978. *Bevolkerungsentwicklung und Berufs-struktur, Gesundheits- und Fursorgewesen in Osterreich, 1750—1918*. Munich: Oldenbourg.

Bose, C.E. 1987. Devaluing women's work: the undercount in employment in 1900 and 1980. In The Hidden Aspects of Women's Work, ed. C.E.Bose et al. New York: Praeger.

Brandt, H.-H. 1978. *Die Osterreichische Neoabsolutismus und Politik, 1848—186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Brewer, J. 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London: Unwin Hyman.

Bruford, W.H. 1965. *German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Literary Re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low-Cummerow, E. 1842. *Preussen, seine Verfassung, seine Verwaltung, sein Verhaltnis zu Deutschland*. Berlin: n.p.

Chandler, D.G. 1966.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New York: Macmillan.

Church, C.H. 1981. *Revolution and Red Tape: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rvisier, A. 1979. *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 1494—1789*.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Coulter, E.M. 1950.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1861—186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rafts, N.F.R. 1983.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zoernig, C., Freiherrn von. 1861. Statistisches Handbuchlein fur die Oester-reichische Monarchie. Vienna: K.K.Hof-und Staatsdruckerei.

Davis, L. E., and R. Huttenback. 1986.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L.E., and J. Legler. 1966. The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15—1902: a quant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Deane, P. 1968. New estimates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1830—1914.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

Deane, P., and W.A.Cole. 1962.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lorme, R., and C.André. 1983. L'Etat et L'économie:Un essai d'explication de l'évolution des dépenses publiques en France *(1870—1980)*.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Dickson, P.G.M. 1987.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ull, J. R. 1975.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Arms and Diplomacy, *1774—178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upeux, G. 1976. French Society, *1789—1970.* London: Methuen & Co.

Eckstein, H. 1982. The idea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from dignity to efficiency. World Politics 35.

Fabricant, S. 1952. The Trend in Government Activity Since *190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iner, H. 194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2nd ed. New York: Holt.

Fischer, F.W., et al. 1982. Sozialgeschictliches Arbeitsbuch. Vol. 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 Munich: Beck.

Flora, P. 1983.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2vols. Chicago: St. James Press.

Fortescue, J.W. 1915.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13 vols. London: Macmillan.

Foucault, M.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London: Lane.

Fremdling, R. 1980. Freight rates and state budget: the role of the national Prussian railways, 1880—1913.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9.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oldsmith, R. W. 1987. Premodern Financial Systems: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ldstone, J. 1991. Revolutions and Rebell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atz, A. 1949.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 von 1848—1948. In Hundert Jahre o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1948,* ed. H. Mayer. Vienna: Springer Verlag.

Gray, M. 1986. Prussia in transit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Stein reform ministry of 1808.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6.

Grew, R. 1984. Th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state.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C.Bright and S.Hard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ampson, N. 1959. La Marine de l'an II: Mobilisation de la flotte de l'Océan, *1793—1794.* Paris: M.Rivière.

Hansemann, D.J.L. 1834. Preussen und Frankreich: Staatswirthschaftl. u. polit., unter vorzuegl. Beruecks. d. Rheinprovinz. Leipzig: n.p.

Heitz, W. (ed.). 1980. Quellen zur Deutsche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i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Reichsgrundung. Darmstadt: Wiss. Buchgesellschaft.

Higgs, R. 1987.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bson, J. 1991. The Tax-seeking State. Ph. D. 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ohorst, G., et al. 1975.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Munich: Beck.

Holt, C.F. 1977. The Role of State Governmen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conomy, *1840—1902.* New York: Arno Press.

Janetschek, K. 1959. Die Fiananzierung des Siebenjahrigen Krieges. Ein Beitrag zur Finanzgeschichte des 18. Jahrhundert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Vienna.

Jany, C. 1967. Geschichte den Preussischen Armee, 4 vols. Osnabruck: Biblio Verlag.

Johnson, H.C. 1975.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ulien-Lafferrière, F. 1970. Les députés fonctionnaires de Fran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Kausel, A. 1979. Osterreichs Volkseinkommen 1830 bis 1913. In Geschichte und Ergebnisse der Zentralen Amtlichen Statistik in Osterrich *1829—1979.* Beitrage zur Osterreichischen Statistik, Vol. 550.

Kennedy, P.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Debat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46—1914. Past and Present, no. 125.

Kennett, L. 1967. The French Armies in the Seven Years' W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Kraus, A. 1980. Quellen Zur Bevolkerungsstatistik Deutschlands, *1815—1875.* Boppard am Rhein: Harold Boldt.

Kraus, F. 1981.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ed. P.Flora and A.J. Heidenheim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Kreidberg, M., and M. Henry. 1955. History of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Department of the Army.

Kunz, A. 1990. The state as employer in Germany, 1880—1918: from paternalism to public policy. In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80,* ed. W.R. Lee and E. Rosenhaft. New York: Berg.

Legler, J.B., et al. 1988. U.S. city finances and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1850—190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90. Growth and trends in U.S. city revenues, 1820—1902.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Georgia.

Leineweber, N. 1988. Das säkulare Wachstum der Staatsausgab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Levi, M. 1988.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évy-Leboyer, M. 1975.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histoire de l'administration. Histoire de L'Administration Française Depuis *1800* 23.

Lindert, D. H., and J. G. Williamson. 1982. Revising England's social tables, 1688—1812.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

1983. English workers' living standard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new look.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6.

Livermore, T.L. 1900. Numbers and Losses i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 *1861—6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ynn, J. A. 1984.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Motivation and Tactics in the Arm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91—9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acartney, C.A. 1971.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addison, A. 1983. Measuring long term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on a macro-economic level. In Productivity in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ed. R. Fremdling and P.K. O'Brien. Munich: Klett-Cotta.

Marczewski, J. 1965. Le produit physique de I'économ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13. Cahiers de 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s I, no.163.

Marion, M. 1927. 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715, 6 vols. Paris: Rousseau.

Markovitch, T. 1965.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64*. Paris: Institut de science économique appliqué.

Marx, K. 1968.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Selected Works*, K.Marx and F. Engel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sson, P. 1968. *Napoléon et la Marine*. Paris: Peyronnet.

Mathias, P., and P. O'Brien. 1976. Taxation in England and Franc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Miliband, R. 1969. *The Capitalist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ischler, E., and J. Ulbrich. 1905. *Osterreichisches Staatswörterbuch*, 2nd ed., 5 vols. Vienna: Hölder.

Mitchell, B.R. 1975.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Detroit: Gale Research.

Mitchell, B.R., and P.Deane. 1980,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delski, G., and W.R.Thompson. 1988.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orineau, M. 1980. Budgets de l'état et gestion des finances royales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263.

Mühlpeck, V., et al. 1979. Index der Verbraucherpreise 1800 bis 1914. In *Geschichte und Ergebnisse der Zentralen Amlichen Statistik in Osterreich 1829—1979. Beitrage zur Osterreichischen Statistik* 550.

Necker, J. 1784. *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de France*, 3 vols. Paris: n.p.

O'Brien, P.K. 1988.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46—1914. *Past and Present*, no.120.

Parris, H. 1969. *Co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Allen & Unwin.

Peacock, A.T., and J. Wiseman. 1961.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ggi, G. 1990.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rochnow, P.-M. 1977. Staat im Wachstum Versuch einer finanzwirtschaftlichen Analyse der preussischen Haushaltsrechnungen, 1871—1913. Ph.D.diss., University of Munster.

Rasler, K., and W.Thompson. 1985.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tax revenues, and global wa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Riedel, A.F. 1866. *De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Staatshaushalt in den likten beiden Jahrhunderten*. Berlin: n.p.

Riley, J.C. 1980.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e Dutch economy after 1650: decline or growth?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3.

1986.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Old Regime in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thenberg, G.E. 1978. *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cott, S.1978.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geborski, M.L., de. 1843. *Des Finances et du Crédit Public de l'Autriche, de sa dette, de ses ressources financières et de son système d'imposition, avec quelques rapprochements entre ce pays, la Prusse et la France*, 2 vols. Paris: Jules Renouard.

Therborn, G. 1978.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Thuillier, G. 1976. *Bureaucratie et bureaucrates en France au XIX e siècle*. Geneva: Droz.

Tilly, R. 196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Prussia, 1815—186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Todd, R.C. 1954. *Confederate Financ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Turner, R.S. 1980. The *Bildungsbürgertum* and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in Prussia, 1770—1830: the origins of a class. *Histoire Sociale-Social History* 13.

U.S.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Bicentennial Ed., Pt. 2. Washington, D.C.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1947.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an Riper, P.P., and H.N.Scheiber. 1959. The Confederate civil servic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5.

Veverka, J. 1963.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1790.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

Vivien, A.F.A. 1859. *Etudes administratives*, 3rd ed. Paris: Guillaumin.

Vries. J. de. 1984.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Dutch economy, 1675—1900.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3.

Wagner, W. 1987. Armee-Gliederung und Aufgabenstellung, 1848—1866. 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5: *Die Bewaffnete Macht*, ed. A. Wandruszka and P. Urbanitsch. Vienna: Verlag de Osterreichischer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r.

Webber, C., and A.Wildavsky. 1986. *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Weitzel, O.1967. Die Entwicklung der Staatsaugaben in Deutschland.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nberg.

Wolfe, A. 1977. *The Limits of Legitimacy: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Woytinsky, W.S., and E.S.Woytinsky. 1955. *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s: Trends and Outlook*.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Wrigley, E.A., and R. Schofield. 1981.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ysocki, J. 1975. *Infrastructur und wachsende Staatsaufgaben. Das Fallbespiel Osterreich, 1868—1913*. Stuttgart: Fischer.

第十二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二)：军事权力的自治

从第十一章我们可以得知，自1760年至1910年之间，军事活动左右着国家的职能，并且消耗了国家一半的资源。事实上，到1914年，甚至是整个20世纪，军国主义依然处于现代化国家职能的中心。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缘政治和社会和平思想主导着西方社会，这一特定时期导致了社会学对军事组织在现代国家中的重要性的忽视。本章则是介绍军事权力三大要素之间的总体关系，即谁控制着军队，军队的内部组织如何，以及军队的职能是什么。[1]

1. 关于“控制”问题，早在第三章讨论有关国家的主要理论时，就已涉及。军队是被统治阶级控制，是被多元化党派民主控制，还是由自治国家的精英所控制？或者军队可以摆脱外来的操纵，以一种“军事社会集团”的方式来实现制度上的自治？就本文所涵盖的不同时代、地区和政权而言，一个答案是远远不够的。

2. 军事组织包括两种体系(官兵关系与军队和外界各阶层的关系)和两个现代化进程(官僚主义化与职业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个观点：“公民军队”的出现同时削弱了军队中的这两种体系(例如，Best，1982)。当然，军事组织基本是“集中强制性”的。士兵需要有强制性的纪律，以使他们能在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消灭敌人。大多数的军队都有着严格的纪律制度。因为在这一时期，多数军队是以有序的兵团和运动作战。所以，军事等级制度便被异常地突出出

来。军队是部门性的权力组织，是经常用来镇压平民阶级和大众意愿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军事组织已经发生变化。它被官僚化地并入国家机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自身制度上自治权的终结。而是在阶级和国家官僚主义的困扰下，实现了职业化。

3. 军事职能一旦被国家垄断，就会成为我所定义的国家的“军国主义结晶体”。这包括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地缘政治，即进行对外战争；另一方面是指国内，即镇压不满分子。这两方面虽然都还存在，但也有所改变。

总之，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且相互矛盾的趋势：尽管在形式上，军事权力被纳入国家，尽管国内公民权已广泛增加，但是，在这一时期，军事集团的自治和部门性权力也在增长。这既对西方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也造成了一定危害。评论家曾问我，为什么要将政治与军事权力分开？(例如，在几次友好的争论中，Runciman，1987 和 Erik Wright 都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已经被分开，并各自独立，而且还带来了破坏性后果。本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西方军事力量为了一个显示权力的“世界性历史时刻”而在不断地加强自己。

职能：1. 国内军国主义

为了维护国内秩序，陆军和少量海军基本上留驻在国内。然而，这一时期，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地变化。[2]我把国内的镇压程度划分为四个级别。最低的级别是一个国家不采用任何镇压措施，而是通过调解、仲裁和仅仅劝说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秩序问题。很明显，从未有一个国家曾完全处于和平状态。因此，所有手段就会偶然地或者是常规性地演变成为镇压。第二级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维持治安——通过仅拥有简单武器并受过严格训练的武装力量与犯罪和骚乱作

斗争，无需诉诸军事力量。这几乎不是军队的职能。在18世纪，治安大多是由被正式委任并部分地受当地贵族控制的警察来维持的。甚至伦敦这座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由各教区拼凑起来的警察维持治安。但是，如果骚乱演变到第三级——暴乱，警察对此也会束手无策，常规武装部队、民兵和其他基本的准军事化组织就需要召集起来而显示力量了。

暴乱基本上是示威。当遇到更强大的军队与之对抗时，暴乱者通常会被驱散。权威人士可能仔细考虑相关的补救措施。这通常是暴力所获得的例行结果。如果这样也无法起作用，那么镇压就会上升到第四级，即全面的军事镇压。实际上这就是战争，通常使用正规部队。无论是政权还是军队都不欢迎这样的国家，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维持正常秩序方面是失败的。全面军事镇压的局势也是相对无法控制的。一旦开火，马队横冲直撞，骑兵挥鞭猛抽，暴动者和士兵都失去了控制，这或许只在一个有限的街区，也或许会蔓延到其他地方，都很难预料。这就可能导致更加混乱的结果——而政府通常的做法是抛弃作出镇压决定的官员。

从1600年到1800年，随着军队被国家从地方贵族和他们的家臣手中接管，大国都获得了更多的第三级和第四级的镇压权。此后，18世纪的专政权，在他们的首都，有时甚至是在全国，都增建起新型的准军事化警察机构。最著名的是法国骑警队，约三千名士兵由陆军部长直接指挥。18世纪80年代，在维也纳由一支三百多人的武装警卫队维持秩序。这些常规性准军事组织基本是一种威力的显示，他们的目的是进一步全面地监视并制止犯罪和骚乱(Axtmann，1991)。对常备军持谨慎态度的立宪政权，发展了民兵组织，但是由地方贵族来统领，其地位略低于军队。

19世纪最主要的发展是出现了市政的、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警察。虽然这些警察既不像军队那样拥有大量的兵力的军工厂，也不具备军队那种能诉诸第四级别的潜力，但是他们的组织能力与军队不相上下。

他们不对军队或教区负责，而是对更具广泛性的市政当局负责。英国的警察力量处于一种极端状况：没有武装，除了在紧急情况下由伦敦进行协调处理外，一般是由自治市和郡区域性控制。在其他国家，市政警察组织和准军事化警察组织是同时发展的。在法国，保安局最初由巴黎人组成，对内政部负责；后来增加了市政警察力量和武装宪兵。武装宪兵是由骑警队发展而来，配有武器装备，对陆军部长负责。尽管从1900年开始，普鲁士的警察就正式与军队分离，并逐渐有市政控制，但是它仍保留了大部分的军事化特征。在美国，军队与逐渐演变成国民警卫队的各州民兵合作。而各州民兵则进而与地方警察局合作。这些形式各异的警察力量和准军事化组织意欲在第三级的镇压中取代军队。现在，军队专用于第四级的镇压，因为有其他警察力量密切协作，政府只有在爆发了严重有组织的暴力时，才使用军队。

当代社会学家解释说，这些发展状况是受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在现代社会中，这两种理论都占统治地位且相对温和。他们已深入了解了这些发展状况，特别是常规化警察力量的发展，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弥散性社会变革：通过常规化的警察和“内在化的纪律”，市民社会便获得了自身的“和平”。福柯(1979)论证说，社会的惩罚形式由权威的、公开的、特殊的、惩罚的以及暴力的特点转变成为弥散的、隐蔽的、常规的、惩戒的和内在化的。他的证据仅来自于各类监狱及精神病院。对于更加广泛的社会来说，这种说法有欠公允。然而，吉登斯(1985，pp.181—192)和丹德克(1989)进一步扩展了福柯的观点，他们认为更广泛的“惩戒性权力”必须通过公共和私人管理机构的记录资料及时间表来使之常规化，并实施监督。这些记录资料和时间表包括：工厂生产的日常程序，政府机关和会计工作的惯例，无处不在的时刻表，正式的成文法，经济市场的各种强制性因素(特别是自由劳动合同)，以及学校教育的监督惯例。在最初的紧张时刻，顽抗被约束为内在的屈服，直至演化为暴力。

吉登斯引用马克思的评论，即工业资本主义将“模糊的经济强制

力”引入到阶级关系中，以强调工厂的重要。这恰恰符合了马克思主义者如安德森和布伦纳的观点。他们认为，鉴于历史的生产模式是通过暴力来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经济过程本身做到这一点的。埃利亚斯(1983)在论述西方“文明化进程”的发展时，也强调了暴力偏离阶级关系的观点。暴力在现代社会中是隐蔽的、制度化的(尽管女权主义者坚持家庭暴力仍然存在)。我们不再统计数量，而是用精神分析法去治疗各种受害者。

无论是埃利亚斯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军队所产生的后果，但是吉登斯和丹德克注意到了。吉登斯声称：“它涉及……不是战争的减少，而是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外向’的军事权力主要集中指向其他国家”(1985，p.192)。梯利(1990，p.125)支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作了补充说明，即在20世纪的第三世界并未发生类似的转变。第三世界的武装力量主要将大量军事力量用于对内解决自身问题。历史上的西方政治制度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抑制作用。梯利认为它与西方历史不同——西方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军事权力改革——从双重职能(战争／镇压)转变成单一职能(战争)，从而将军队从阶级斗争中分离出来。

这一变革真的存在吗？事实上，它是真实的——但是其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首要原因却与福柯、吉登斯、丹德克以及埃利亚斯所引证的不同。他们的正确之处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除去一部分美国的内陆城市——社会秩序是以远远少于历史上大多数社会所存在的镇压情况来维持，这使得当代西方社会将主要的军队用于对外方面。但是，这种状况主要是在20世纪实现的，并且主要归功于另外两个权力的获得：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公民权，以及对劳工关系调和的制度化。尽管在这一时期，这些权力开始出现，但是它们主要是在20世纪实现的。事实上，主要是在20世纪后半期实现的。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公民权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并未得到实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中，军队仍是主要用于国家内部。[3]有证据显示，直到1914年，这些国

家既没有“惩戒”的办法，也没有将军队从国内的镇压中解放出来。

丹德克和吉登斯依赖两方面的证据资料来证实公开暴力的减少；一方面是当代对18世纪以小偷小摸、流氓作风和拦路抢劫为特征的描述，另一方面，是19世纪普通暴力犯罪的减少，例如格尔等(1977)可以证实这一点。尽管众所周知，犯罪统计资料并不可靠，但是暴力犯罪率的下降却可能是真实的(尽管会部分地被日渐增长的非暴力性财产犯罪所抵消，Emsley，1983，pp.115—131)。正如丹德克、福柯和吉登斯所论证的那样(埃利亚斯认为这一改革过程应开始得更早些)，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日常秩序方面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友好和平，而这一改革的步伐开始于18世纪且历经了整个19世纪。然而，普通犯罪(相当于我对镇压程度所划分的第二级：治安)并不是18世纪的军队所需要关注的问题，除了在欧洲，那些仍然存在着有组织的盗匪的落后地区，小偷小摸和流氓行为是由那些警察、地方行政官员或者是地方贵族的家臣负责治理的。有时，这些行为甚至被视为社会的正常现象而得到容忍。只有在暴力行为升级到第三级，即有武装的暴动——主要包括粮食暴动、走私骚乱、劳资纠纷和反对强制性征兵的暴动(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叙述的)，军队和民兵才会被召集。

梯利(1986)以法国为例，对随后所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他论述到，集体抗议并非减弱，而是发生了双重改变：从粮食暴动到工人罢工，从地方性组织到全国性组织——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在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这两方面都达到顶点，并开始制度化，以至于工会和政党的宣传活动不再遭受正规军的镇压。但是在1914年以前，情况则截然不同。罢工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遭到军队的镇压，与早期粮食暴动者的遭遇十分相似。在1830年、1840年和1871年，大约有1 000多名政治抗议者在与军队的冲突中被杀害。尽管后来的事件没有如此激烈，但是梯利说，在与军队的对抗中，几百人数十次在公共场所遭到逮捕并被关押超过一天。1905年至1907年，法国

发生了工人和农民的暴乱，临近结束时，军队所采取的逮捕行动是最大的行动之一。在1851年和1889年都发生过类似的突然逮捕行动(1889年以失败告终)。

梯利将19世纪称为“反叛的世纪”(1986，pp.308—309，358—366，383—384)。19世纪，法国武装力量在镇压方面的作用仍同1789年以前的那个世纪一样。另一方面，国家的某些部门也陷入了相反的另一种调解的极端方式。正如我们将在第十八章中所论述的，在世纪末的法国，受劳工部支持的县长和城市区长们一直试图在劳资争议升级为暴动之前使之缓和。法国国内军国主义是多元化的。

法国的历史独具特色，但它的暴力事件却并非如此。在美国，直到1860年，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掠杀印第安人；随后内战爆发，当大量重组的国民警卫队从镇压印第安人和奴隶转而攻占南方并开始驱散罢工工人和城市暴动时，被占领的南方充满怒火(Hill，1964：ch.4；Dupuy，1971，尤其p.76)。戈德斯坦(1978，pp.1—102，548)以文件证明，在美国，从1870年到20世纪30年代始终存在着“大规模和持续的”对劳工的镇压，包括屡次调动国民警卫队支援那些需要军队的地方。这一现象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顶峰，随后有所衰退。但是，这种衰退是因为政府和资本家对劳工采取了双重策略——镇压公开的和社会主义的抗议，调和局部的，对杀害工人的抗议(参见第十八章)。即使有更多选择，美国国内的镇压仍是军事或准军事性的。仅仅是到了20世纪初，才有某些政府机构开始做劳资调和工作。

奥地利的暴力镇压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军队驻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要塞，并且每十年就要镇压数次民族纠纷。尽管1848年到1849年的革命没再出现反复，但是抗议和镇压都没有减弱的迹象。政府逐渐地更加依赖常规联合部队，而不是可靠性较差的地方准军事组织(Deak，1990，尤其pp.65—67)。无论奥地利还是普鲁士德国都几乎不存在真正的劳资仲裁。因而它们的军队也能够介入国内事务。刚刚跨进20世纪，德国的要塞和军事重镇就成为镇压暴动的主要目标。从

1820年开始，德国地方军的司令官就有权在没有市政当局要求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介入市政事务(尽管在通常情况下两者都是共同行动的)。在1913年臭名昭著的察贝恩事件中，这种情况达到顶峰。在这一事件中，一个地方军上校专横地驱散示威者并囚禁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这个上校因此受到军法审判——但他被宣布无罪，而且维护了他专断的军事权力。在德国历史上，军队介入政治的情况长期存在。1909年，荷枪实弹、上有刺刀的士兵仍在胁迫罢工的矿工。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军队极少真正大量地使用暴力。通常，一种基本是准军事化力量的仪式表演就已足够了(R.Tilly，1971；Ludtke，1989，尤其是pp.180—198；也可参见本书第十八章)。

在大多数国家，虽然军队的镇压职能依然存在，但新式警察和准军事化当局也同时发展起来——在党派民主的国家也最终实现了对阶级冲突的国家调解。因此，对于中等程度的骚乱，军队已不再被经常使用。虽然暴动仍像20世纪时那样频繁发生，但政府已拥有更多的镇压方式，特别是针对那些真正有威胁能力的暴动。几乎没有什么政府或军队司令总是喜欢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并开枪射击。只有俄国政府和军队才经常这样做；也仅是在美国，由于它所具有的个人或地方暴力传统，才需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参见第十八章)。军国主义镇压仍具有三种传统形式——首先是存在，其次是显示其存在，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真正使用暴力——但是现在它已增加了更为广泛的含义。

事实上，英国的历史才真正具有特色，是军队镇压逐渐减少的明显例证。在18世纪，和平时期的军队有10 000—15 000人之多，屡次用于镇压暴动，最严重的事件是1780年的戈登暴动，当时震惊世人，共有285人在此次事件中被杀。在法国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作好了镇压准备，它们多数不再驻扎在走私区域内，而是分散驻军，以防备法国和国内的激进派分子。两支由中上阶层组成的民兵——志愿军和义勇骑兵队加入军队。1816年、1821年和1830年到1832年的暴动者被士兵镇压了；在1839年到1848年期间，宪章主义者也遭到军队的镇压。由于被

英军占领，爱尔兰始终是一个反叛的殖民地。此后(在爱尔兰稍迟些)，英国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直到 1889 年至 1912 年罢工浪潮的到来。但是现在有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英国当局也开始着手建立自治城市和郡的警察力量。如果强大的曼彻斯特警力(在 1849 年，每 633 个人当中就有一名警察)无法控制当地的罢工者，伦敦的城市警察局和内政部会在一天之内派出 10 倍的警力。尽管在 1869 年到 1910 年之间军队至少使用过 24 次，甚至可能更多(Emsley，1983，p.178)，但是大多数罢工者要面对的是身穿蓝色制服的家伙们所制造的声势，而不是英国士兵(现在他们穿的是卡其布军装)。军事镇压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但自从 1848 年以来，这种情况已日趋衰退。

对于劳资关系的调和，主要的国家机构都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参见第十七章)。为什么在英国会出现这种独特的从军队到警察的转变(另外，党派民主国家也普遍存在调和方式)？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性质的和解？对此有三种主要原因：

1. 资本主义的都市化令有产阶层感到恐慌，他们无法再以地区性庇护人的传统特权来控制所在地区，有时他们偶尔也会通过军队来寻求支持。他们不得不忍受面对集权“专制”的警察部门时的恐慌。他们要比其他国家更早地面对这一切。因为他们经历了城市的混乱以及与工业化、资本主义相伴而来、并由法国战争所引起的独一无二的政治暴动和一直持续到宪章运动的改革时期(参见第四章和第十五章)。而且 18 世纪的爱尔兰也出现了严重危机，在那里，由于警察部门正有计划地实现集权化，新教的统治地位面临着威胁，而这一集权化已成为英国本土的榜样。

2. 军队本身也希望从镇压行动中撤出，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损害了军队的道德风气，而且与英国的帝国义务相抵触。英国拥有与之相称的最小型、最职业化的军队。英国无须对边界进行管辖，也无须其他特殊力量执行低烈度的维和任务，而这种特殊力量很容易转化成暴力

统治。

3. 1848—1849年，宪章运动的衰退不但使激进派抗议者的士气低落，而且使新兴的警察力量有了喘息的时间，在他们被要求进一步控制暴力事件之前，能够有效地对待最低程度的威胁，并处理犯罪行为。新的体系开始运转，到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时，伦敦警察已形成了“继续前进”的策略，它意味着，只要不导致正面冲突，不停地喊话和前进是可以允许的(Mcneill， 1983， pp.187—188)。 现在政府可以避免全面暴力所带来的不稳定、不合法的影响，并使军队从镇压暴力的职能中解脱出来，以保卫帝国。

是否是因为弥散的内在化“纪律”横扫了整个社会，才使新兴的警察力量发挥了作用？ 吉登斯适当地强调了19世纪行政权力和交通通讯发展的作用。 而这一点比弥散性更具权威且对两方面都起作用。 当完全自发的地方暴力可能减少时，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却可能增加——正如宪章运动期间所发生的那样。 此后，权力机构受益于在宪章运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工联主义。 警察也获得了权威性权力，在对中等程度的暴力使用武力时，可以快速反应，灵活用兵。 动用枪炮和骑兵的做法已被抛弃。

几乎没有迹象显示潜在的暴动者受到了傅科和吉登斯观念中的“严格约束”，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念中的纯经济方式的剥削。 宪章主义者们经历了物质上和组织上的失败(第十五章将对此作出解释)；农业工人屈服于人数减少、流放和暗中威胁(Tilly， 1982)；资本主义给城市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减少了粮食暴动；熟练工人转向地区性负责任的抗议行动(参见第十五章)。 这些形势转变的根源是来自权力机构的权力制衡，而不是来源于更具弥散性的“纪律”。 其他国家政权因缺乏类似凌驾于国内反对组织的优越性，所以它们需要更多的军事力量来支持正在形成的警察部门。

通过这种分级别的方式来分析历史上所存在的镇压状况，所得出的结论要比福科、吉登斯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单纯考察世界—历史

性改革而得出的结论更为复杂。我们应将军队和警察组织的特性以及政府运用策略的特征都囊括进去。而他们在论述中都忽略了这些方面。事实上，从大约 1600 年到 1800 年这一较早时期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国家控制的军队主要负责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镇压时，更重要的变革就已开始。然而，此后使用军队被认为是不适宜的手段，特别是在大城市。随着枪炮技术的发展，枪支的使用和射击时间都大大缩短，在人群中使用军队会造成大量伤亡。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了解到战争也变得更专业化，更注重火力的集中，而骑兵已很少使用。

战争与国内镇压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许多政府都注意到军队的这两大职能在战术、武器、驻营以及纪律等方面截然不同。这威胁到军队在其所主要扮演的对外角色中的实力。因此，专制主义政府——更多到依靠军队而不是依靠强大的弥散性纪律来进行统治——首先在他们最大的城市设立警察(第十三章介绍说明，专制主义政府一般首先建立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并建立起准军事化的全国性警察机构。英国在设立警察机关上，一方面部分地借鉴了在爱尔兰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国军队要扮演双重角色而过度紧张。

第二次改革大约开始于 1800 年，革命时期和工业化时期的骚乱暴露出军事手段的不适宜性。在 19 世纪前半期，由于警察、准军事部队和常规军队在处理不同等级的威胁时所处的位置不同，它们的角色也出现了三种分工(现在仍然存在)。此后，两种“绥靖”政策促进了这一改革。最低层次的威胁和普通犯罪开始呈现减少趋势，其部分原因可能应归功于新兴警察力量的高效率，同样也可能要归功于吉登斯—福柯—马克思主义式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和严格纪律的过程。其次，在此后阶段，尽管各政府的处理方式不同，但随着公民权和劳资关系的调和，国家减少了对较高水平武装力量的需要。戈德斯坦(1983)指出在 1900 年以后，军队虽然仍在四处活动，但是在更具宪法性和党派民主的西北欧政府内部，军队的介入已逐渐削弱。

戈德斯坦注意到了“安全阀”的特别作用。没有它，局势会变得

更加糟糕：从 1850 年到 1914 年之间，四千万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大多因对欧洲不满而离开，前往新大陆。但是他将镇压行为的减少主要归因于政治原因。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化，促进教育的发展，加快都市化进程。然而，这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终，在混乱与镇压的五十年之后，政府改变了方针，开始有选择地调和并吸收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对和谐共存地良好秩序的要求。现在军队镇压将被用于对付真正的极端主义分子——对工人运动采取有选择、有深远意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将在第十八章中讨论)。在党派民主政治的三个政府中，一旦政治公民权和劳资关系实现制度化，军队进行镇压的状况就会相应地减少。在世纪中期，英国中产阶级就已被统治者所联合；而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则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有类似举措。英国的劳资关系最为制度化，而后是法国，只不过法国的主要变化发生与战争之后(参见第十七、十八章)。至于德国和奥地利，它们都没能实现代议制，而奥地利甚至还没有实现民族化和形成为国家，因此它们仍同以前一样需要军队。我也注意到自己在选取国家实例时存有偏见。这些国家都是主要大国，与小国相比肯定要使用更多的军事力量。西方多数小国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政府缺乏镇压能力，实际的镇压程度较低，较早地过渡到完全代议制民主(包括早期的妇女选举权)，较早地实现了劳资关系制度化，并且较早地过渡到福利国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与德国人和美国人相比，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国家以及(1830 年以后的)欧洲低地国家的居民使现代社会的“强制性纪律”更为内在化。他们更有可能因较少受军队的强迫压制而获得更多的公民权(正如 Stephens， 1989 所论证的那样)。

多数大国的军队仍然是既对外也对内，但是现在它们得到警察和准军事组织的补充并且还有调和方式的多方辅助。如果社会变得更有纪律性，那么大多数纪律仍是由统治集团的强制机构来专制地执行，而不是由公民自己以弥散性内在化的方式执行。从长远来看，现代国家的发展应更多是国家的“平民化”，将国内的军国主义降低到较低程度。

国家的多数职员都是着装平常、举止普通的人，他们大多以非军事主义的方式工作并将野蛮暴力推到幕后(Poggi, 1990, pp.73—74)。但是在这一时期，民政官员促使野蛮的军事力量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与特殊的“半野蛮的”警察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许多“民事”调停者共存——并屈服于野蛮本身。这种状况在许多国家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以后。尽管国内军国主义工具已减弱到较低的力量等级，但军国主义仍然存在。

如果在一些国家中，某些社会团体现在能够更积极、更自发地服从，那么这主要是缘于他们所获得的宝贵的公民权，而不是缘于现代社会生活中无意识的常规化。因为政府权力的平衡与公民权力的获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所以军事镇压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就他们而言，政府同样要面对来自反对者的困扰，但他们拥有比以往旧式武器和武装骑兵更加先进，更为精准的武器装备，这使得大多数军队能够集中于对外战争。因此，对军队而言，只是调整而不是结束了它们的双重职能。国内的军事镇压仍具有直接针对性，那些不同阶级、种族以及地区和宗教的少数派为获得更多的公民权而战。因此，使军队层次化的两个等级——他们的阶级构成和他们的官兵关系——仍与他们国内镇压的职能息息相关。随后，我将阐述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导致了军队内部出现划分等级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受到在国内镇压中与之休戚相关的保守势力和中产阶级的限制。

职能：II. 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

战争和备战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国家的主要职能。第十一章阐明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在18世纪，军事力量的威胁和使用都毫无疑问地构成了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战争并非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通常外交官都会尽量避免战争。但是在18世纪，有78%的年份存

在着大国之间的战争，而到了 19 世纪，则只有 40%的年份中发生过大国间的战争(Tilly， 1990， p.72)。 因此，战争可能是人类社会所知道的最无情的竞争方式，这有一个不断了解的过程——处于一场战争之中，或近距离地关注一场战争，学习它的教训，使军队现代化，面对威胁，开始参加或密切关注战争，如此连续往复。 从未密切关注过战争并使军队实现现代化的政府是不可能长期幸存的。 军国主义也同样渗透着较温和的外交手段——诸如谈判联盟、皇室联姻以及贸易条约。 事实上，所有外交调停在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军事力量的平衡和本国的自身安全。 战争和军队都是国家领导者和外交政策所关注的中心。 所有曾定型为军国主义的国家——今天，也几乎都是如此定型的。

是谁在操纵着他们的地缘政治军国主义，并最终决定着战争与和平？ 持续了整个 18 世纪后半期的专制政府的传统实践已说明了问题。 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是君主的私人特权。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描述了他是如何在 1740 年夺得西里西亚的——这对普鲁士的世界历史性崛起至关重要：

> 在父亲去世后，我发现全欧洲都处于和平之中……以年轻沙皇伊凡为首的少数派使我企望沙俄能更多地关心其国内事务，甚至超过对维护国事诏书的关注[国事诏书决定，由一名妇女玛丽亚 · 特里萨继承奥地利王位]。此外，我发现自己可以支配已受过良好训练的军队，并且国库充盈，而我本人是个急脾气。正是这些原因说服我发动战争，与奥地利的特里萨，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的女王相对抗……雄心抱负，有利的优势，为自己博取声誉的渴望——这些都强烈地影响着我，一定要进行战争。(Ritter，1969，Ⅰ，p.19)

除去腓特烈在描述中的装腔作势，仍可以看到那令人生畏的对战争发动的个人决定权。 他还一一列出自己的敌人，这也是王朝外交的另

一个特征。

这一宪法特权是以另一个条件为保障的，即君主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玛丽亚·特里萨(1740—1783在位)是奥地利第一个获得最终权力保证的统治者：现在奥地利的士兵是向她宣誓效忠，而不是向自己的司令官。她从未率领士兵发动战争，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也一样；而普鲁士国王很快使这一切结束。他们需要指挥控制权的等级束缚(这将在后文进行介绍)。

19世纪的民主化是如何与这些君主特权相对抗的？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非常糟糕。君主成功地维持了对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领导权。正如第十章所论述的那样，当哈布斯堡家族在1867年承认了匈牙利王国的实际自治权时，其外交政策和军队仍作为是弗朗茨·约瑟夫的特权而大部分被保留。他应经过协商来缔结贸易条约，但是他可以通过免去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外交大臣的职务，而逃避这一点。在他的长期统治中，军队事务和财政预算都处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而他也将这些事务放在首要地位，远远高于对国内事务的考虑之上(Macartney，1971，pp.565—567，586多处)。当然奥地利政府也是一把与众不同的巨大保护伞，主要用于维持专制王朝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军事权力，并以此来防卫那些来自周围强大邻国且与他们存在摩擦的民族。但是哈布斯堡的特权并非典型。在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仍是总司令。他无须与德意志帝国国会协商，就可以决定外交政策或进行战争。他应该取得德意志帝国的参议院中其他德国统治者的同意，但是他的支配地位使这一做法仅仅成为一种形式。在这些国家中(包括俄国)，一个强有力的君主能完全控制外交政策或者将外交事务委托给他所信任的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

随着政权的不断民主化，我们也许可以假设情况发生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考虑一下欧洲最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即在1905年独立后的挪威。宪法只是象征性地保存了皇室的行政特权和在紧急情况下的动员军队权、宣战权、调停权、结盟或解除联盟的权力以及派遣公使

和接待外国公使的权力。在所有问题上，国王都应与议会正式地协商。但在事实上，议会对此好像并不介意。里斯特总结道(1965，p.46)，外交部“几乎从未强烈地感到民主社会的外交政策也与人民大众有关”。挪威的各个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态度都十分冷漠，这是因为它们被组织和吸收在国家之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现在仍是)这是19世纪的标准。

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阶级和其他主要利益集团被限制于国家范围之内，将外交政策的实施权留给了想象中“民主的”最高行政官员们，在这方面他们实际上与旧时的专制君主相类似。在最民主的意大利，到1900年，其君主就已失去了国内的主要权力，但并未丧失对外交事务的控制权。博斯沃思(1983，p.97)说：“外交政策是国王和其最亲近的顾问们的事情。国家主义者的‘舆论’令人厌倦，尽管予以组织和引导，也许会有积极的作用，但它却从未作出决定。”

因为英国是当时最大的党派民主政体，所以其决策权具有特别的意义。英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以及“军队行政机构、军队司令和军队部署”仍是皇室特权，正如通常的立宪君主制一样。然而，从1688年开始，军队的行动受到严格约束。议会决定陆军和海军的规模、财政以及内部法规。议会同意在英国使用外国军队并维持和平时期的常备军(Brewer，1989，pp.43—44)。外交政策的“最终”决定权正式归属议会。

然而，日常的外交政策则无须得到议会的同意，除非它违反了大陆法律或带来新的财政义务(Robbins，1977a)。在1914年，议会不得不批准宣战(如同法国一样，但不像其他参战国)，而在7—8月的危机时刻，每天仍主要是私下决定外交政策。外交大臣仅位次于首相。议会无法对他实行更多的控制。通常外交大臣是一个世袭贵族，位列上议院议员，而不是平民百姓——一个精心的设计以避免产生公开争执。平民了解情况的要求经常被以“与公众利益无关”为托辞而拒绝。外交大臣经常与首相协商外交事务，偶尔也在他的处理权限之内与相关的内阁

同僚及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协商。他很少与全体内阁成员协商。同罗兹伯里勋爵一样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人可以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Martel, 1985)，而像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样在点懒散的人则只驾驭着外交政策的大趋势，不存在要与“局外人士”协商的困扰。少数互相称之为“政治家”的人们通过乡村宅第间传递的信件进行交流，或者通过在缙绅俱乐部的交谈进行沟通。在自由主义外交中，宫廷已被俱乐部而不是下议院所代替(证据来自 Steiner，1969；Steiner and Cromwell，1972；Robbins，1977a；Kennedy，1985，pp.59—65)。与这种紧密联合的私人团体形成鲜明对比，公众舆论是不定型不统一的，并且难以专注于某些特定问题(Steiner，1969，pp.172—200；Robbins，1977b)。一个本质上是旧体制的行政机构在外交政上仍是孤立的，即使工人议员们正涌入下议院。英国各阶级关注的是国家大事。他们将日常外交政策交给专家们处理。

在最先进的党派民主政体中，我们希望美国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毕竟，美国革命是直接针对于类似的习惯做法——特别是未经同意就为外交政策而征收行政税。事实上，美国宪法已明确剥夺了行政部门的征税权，并将宣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赋予国会。然而宪法第二条又授予总统所有的行政权，而且在其他的条款中未对此做出任何明确限制。在当时，这些残余的权力主要被用来引导外交政策的日常行为，到了19世纪，又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批准。实际上，总统只要不宣战，不缔结条约或者不向那些已处于困境中的行政机构寻求附加款项，他就可以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这看起来就如同这样一个局势——在1990年到1991年期间，各方都大致同意发动波斯湾战争——尽管偶尔仍引起争议(参见西奥多·德雷珀和布什总统的法律顾问所进行的交谈，发表于《纽约书评》1990年3月的第1、17期)。

事实上，19世纪早期的美国总统受到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制约——主要是与英国、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和印第安人的关系问题——直接影响了北美的版图，影响了美国居民和利益集团的生存问

题。但是随着大陆扩张的完成，美国外交政策转向海外帝国主义，它抛弃了美国人以国家(或大陆)为中心的观点。行政机构的自主权得到加强。1900年以后，麦金莱总统和西奥多 · 罗斯福总统在随后的外交政策中操纵着国会和公众舆论。这些外交政策基本是通过行政方式来制定的。1908年，伍德罗 · 威尔逊论证说帝国主义已改变了宪法的含义："在外交事务中，总统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优先权，以使总统握有绝对的实际权力。"(LaFeber， 1987， p.708，本段依据他的文章)即使如此，在这个最完善的立宪制国家中，一旦各阶级和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形成了全国性组织，国家的外交政策还是由相当孤立的行政机构所控制——以宪法作为形式上的依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公众舆论和政治党派在正式的外交政策中仅起到极小的作用(Hilderbrand， 1981)。外交政策仍是一小撮知名人士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私有领地，而且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仅听从少数几个所谓"政治家"的政客们的建议(这一点将在本书第十六和第二十一章中作进一步探讨)。在党派民主政体和半独裁的君主政体中，国家精英保有日常外交上的自主权。

如果危机出现，这种状况就会发生改变。在美国，国会拥有(现在仍有)决定战争和开征新税的决策权。在英国，这些权力当时是(现在仍是)归全体内阁成员，并且在内阁中，根据可能出现的党派、议会或公众舆论进行讨论(现在仍是这样)。而如果战争逼近，对于所有的政权行动自由来说都会出现一个根本性抑制因素：金钱。即使是专制主义者，如果提出一项代价昂贵的外交政策，不论是谁提供税款或贷款，都必须按惯例通过批准。现在，在其他权力运作者之间，公众舆论开始变得重要了。

但是只有在出现危机或战争的情况下，控制权才会受到限制。外交事务比国内政治更缺少可控制性和可预见性。多国外交是指各独立政权遵循有限的常规约束不断地重新估计地缘政治的利弊而进行有选择的外交。一国的下述行为——包括以战争恫吓、缔结一个新的联盟、炫耀武力或进行海军演习、增加军队数量以超过那些被实施经济制裁政

策的国家，或仅仅是为了防御领土，私下对由商人或白人移民组成的富有侵略性的压力集团提供支持——这些都可能构成对其他国家的挑衅。国家的挫败暗示了它们的弱点，或者可能在国家之间产生预料不到的连锁反应。许多国家发现，在危机时刻，日常外交会将它们置于困境，使它们面对讨厌的敌人或联盟，陷入无法选择的境地，不是退缩就是参与侵略。秘密外交更进一步限制了选择的可能。

于是危机就突然降临到议会、统治阶级或纳税阶层面前，这时公众舆论就绝对占据优势并制约着政策的选择。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二十一章中所论述的，在 1914 年，政府通常仅给议会和公众舆论两种选择——参战或退缩并受到羞辱。我们已逐渐习惯了一种进退维谷的选择(最近在海湾战争中，这种状况导致美国和伊拉克再次遭受灾难)。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持战争。国家精英控制着全部日常外交和军事部署，因此他们避开了民主的抑制。事实上，对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的外交负有主要责任的是最高行政官员，而不是国家或阶级，正如君主们决定着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外交事务一样。在外交政策中，宪法与代议制定型化的重要性比在国内政策中少。公民权利和义务体现出民族性、狭隘性和蒙蔽性。它现在仍然如此。

但是君主和行政官员并非独立决定日常外交政策。他们会听取专业外交官的意见。这些外交官的社会基础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来自旧政治体制；君主的近亲、贵族、绅士和有祖传财产的资产阶级(总体讨论参见 Palmer，1983)。奥地利和德国是旧政治体制保留最多的国家，直到 20 世纪，外交部门仍由贵族把持。普雷达多维奇(1955)试图对两个国家在 1804 年到 1918 年的状况进行标准化的对照比较。他发现在普鲁士的“高级外交官”中贵族所占比例仅在 68%到 79%之间波动(末期比重为 71%)。在奥地利，这一比例则在 63%到 84%之间浮动(末期为 63%)。仅从贵族阶层来说，两国的发展趋势相同(这就限制了外交官因政绩而被封为贵族的可能性)。1914 年，德国外交使团的组成包括：8 名亲王，29 名伯爵，20 名男爵，54 名无爵位的贵族，仅有 11 名是平

民。在级别较低的领事部门，其职位则全部由平民担任。尽管他们通常是富有的、毕业于正规大学，并来自各类行会，但在外交部的全部548名官员中，69%的官员是由贵族担任并且垄断了高级官职。在1871年到1914年间，唯一明显的变化是容克阶层和于1800年被授予头衔的贵族势力出现衰落，与之相应的是西方化新贵族的兴起。这两种趋势产生的原因是：随着部门机构的扩大，普鲁士人和旧贵族在人数上出现短缺，而不是因为试图开放部门机构。近亲联姻、反动行会组织的会员资格和新教徒的优势以及对犹太人的完全排斥，使休戚相关的集团得到加强(Rohl, 1967, pp.106—108; Cecil, 1976, pp.68—68, 76, 79—86, 176—177)。

在法国，尽管旧的政治体制遭到革命的冲击，但它的外交官却得以幸存下来。在1815年至1885年之间，在所有的大使中，73%的人仍拥有贵族姓氏。在第二帝国时期(1851—1871)，法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中，已知有了70%的人出生于有地产的家庭，有祖传财产的资产阶级或高级官员家庭，其比例比其他任何政府部门都有高(Wright, 1972; Charle, 1980a, p.154, 172)。此后，衰落趋势最终来临：虽然1871年到1878年间，被委任的使节中89%的人是贵族，但到1903—1914年间，这一比例仅为7%，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不幸的是，这些人未能留下任何详细资料。我敢打赌，他们代表着与贵族、有遗产的资产阶级相等同的共和党人，只是手边没有资料证据(Cecil, 1976, p.67, 引用未公开发表的研究，也许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这个时期，旧体制仍在英国外交部和外交机构中占统治地位。其高级职员依然是由贵族和富有乡绅的子孙担任。他们都在最好的公立中学受过教育(特别是伊顿公学)，并升入剑桥大学(Cromwell and Steiner, 1972)。

尽管美国在革命中已推翻了贵族的统治，尽管美国外交机构的威望比其他国家低，但是美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差异不大。美国外交官和国务院代表着美国的有祖传遗产者和东部利益集团——这些人或许是更有教养，更缺少活力的后裔(据称，当时最有才能的孩子都进入银

行业)。 即使在进入20世纪以后，仍然要求新加入外交使团的人有私人收入，表面原因是为待遇低。 伊尔奇曼(1961)说，在当时外交使团的职员中始终充斥着古老而富有家族的子弟。 尽管资格考试取代了个人的出身背景，但“良好教养”仍是考虑的首要因素：在1888年至1906年间，至少64%的人来自东北部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仅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8%)。

有所有国家中，这种社会等级的不平衡是有其存在基础的：旧政权的统治者说外语，在国外广泛游历，娶外国女子为妻，并且是文化的世界主义者。 他们之间能相互理解。 对此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 这在过去是——现在仍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异乎寻常的特征。 当国家的内部活动遭到下层阶级或其他阶级的抨击时，当大部分内政部长和议会议员是由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中更为广泛的各色代表人物来担任时(参见第十三章)，外交政策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人员的任命仍存在局限性。 外交政策仍是十分孤立、私下进行的，它是由国家行政精英和旧体制党派所组成的特殊联盟来进行控制，尽管旧体制党派的经济权力已在衰落。

因此，军队首要的地缘政治功能使它在行使第二类国内功能时，出现细微的区别。 军国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使之与国家旧体制的核心产生一种极为隐秘的关系，而镇压功能又使之在总体上倾向于有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保护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资产阶级的利益，防备不满工人。 军队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环节，将以前和现在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连接起来。 现在我将详细分析军队本身。

军队：阶级，官僚主义化，职业化，1760—1815年

这是我第一次考察18世纪军官集团的社会构成。 这一工作比较简单：事实上，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贵族；绝大多数的低级军官也一样，

只有海军、炮兵以及英国除外(英国拥有最庞大的海军和数量最少的贵族)。军官是贵族，就好像从来就应如此。法国仅有5%到10%的军官不是贵族。然而，大多数贵族并不是军官，普鲁士除外(某些时候，普鲁士的贵族终生都是军官)。在其他国家，军官集团已形成一个特殊的贵族网络，但与社会上最强大的那个贵族网络不同。正如本书第六章所阐述的，在法国，这一度是一种颇有争议的发展状况，最终以将特权授予更古老，通常也较贫穷的佩剑贵族来解决。在奥地利，玛丽亚 · 特里萨曾试图授予军官们更高的贵族头衔，通常是授予那些贡献较少的贵族，但是只取得有限的成效。战争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主要任务。尽管军队在旧体制中仍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它已不再完全处于核心地位。

英国显然是军事化程度最低的旧体制。然而，英国国内的陆军军官集团几乎完全是旧的体制：军队的最高军衔由贵族支配；军队的低级军衔由乡绅担任(Razzell, 1963)。购买军官职位离不开财产，财富是政治生涯的保障。在较偏远的印度驻军中，军衔售价低廉且缺乏吸引力，那里的军官多是来自商人和从事专门职业工作的家庭。海军甚至更为开放，军官多来自乡绅、商人、职业工作者以及来自沿海地区的航海业团体(就像法国海军所做的一样)。海军不太注重对个人财富的要求。海军军官以其薪水加上独特的额外津贴及奖金为生。许多人都出身于尽管不富有但体面的家庭的年轻子弟。所有军官都必须先作为水兵服役两年，尽管他们是作为海军候补生或船长助理而有特定的军衔。大约10%的军官来自于“非体面”家庭，包括一个著名的雇农之子——詹姆士 · 库克船长(Rodger, 1986, pp.252—272)。如果在陆军中，他的升迁是无法想象的——并且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武装部队中也几乎如此。

在所有的陆军和部分海军中，仍然包括一些在世界各地“服役”的雇佣贵族——他们是来自移民家庭和边界地区的贵族或是来自偏远地区，像德意志小邦、苏格兰或爱尔兰的贵族。这些人经常四处迁移——弗雷德里克 · 冯尚伯格曾在五个外国军队中服役(Brewer, 1989, pp.55—56)。甚至在1760年，军官集团就显示出了社会集团的明显特

征，它不是一个仍嵌入在旧体制中的特权等级，而是一个正在不断职业化的集团，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习俗不再是上层阶级的作风。

军官与士兵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普通士兵和水兵被有文化的当代人描绘成社会渣滓，“卑贱的人”(Brodsky，1988)。在今天的学者当中这一绰号仍在使用(Jany，1967，p.619；Rothenberg，1978，p.12；Dandeker，1989，p.79；Holsti，1991，pp.102，104；Berryman，1988，赞同对美国军队使用这一称呼)，但是它的准确性令人怀疑。在那些年代，有文化的当代人存有偏见。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军官通常来自较高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十分普通的人都可能是“渣滓”，特别是对于那些被征入伍或强征服役的人，他们是不情愿地入了圈套，就像囚笼里的动物，而且受到残酷纪律的约束。当强征服役和四外搜索威胁到平民百姓时，平民所要面对的主要是军队。因此，他们也成为军队的敌人。军队中雇佣兵的比例占有1/3，他们与当地平民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因此平民对士兵和水兵们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士兵处于同社会分离的地位。

我们拥有18世纪后半期关于英、法两国军队的适量资料。法国的研究揭示，它的士兵并非是社会的渣滓，大多是市民、手工业者和有文化修养的人、农民以及基本上未得到充分代表的农业工人。到1789年，在已掌握的有记载的资料中，63%的士兵是手工业者和店主。(Corvisier，1964：Ⅰ，pp.472—519；Scott，1978，pp.14—19；Lynn，1984，pp.46—47)。许多城市豁免年轻人的兵役，使得多子家庭中的次子们可以跟随父辈学习生意，而军队也乐于接受有技能、有文化的人。英国军队的新兵主要来自制造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与全国总人口相比，这些人当中市民和苏格兰人较多，可能有文化的人略少些。因此他们虽是劳动阶层，但并不是社会最底层(参见资料在Floud，1990，pp.84—118；正如作者所述，这种显而易见的新兵文化水平较低的现象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个别军官自己对新兵文化程度作出评估，但可能

是在选拔除了具有标准能力外更具特长的人)。其他主要的欧洲军队可能比法国和英国军队更缺乏技能和文化，因为他们的征兵制度通常规定豁免有技能的手工业者(奥地利的军队首先是豁免自耕农)，并豁免那些可以出钱雇人服兵役者，那些代服兵役者也是社会最下层的人。然而，在一些较小的德意志国家，某些主要的新兵来源区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率。在英国和法国的和平时期，海军中的水兵主要是航海职业的典型代表，尽管在战时，会由于强行征兵而带来贫困的外行水手(Hampson, 1959; Rodger, 1986)。法国和英国军队的素质水平可能比其他国家更高，但是我怀疑具有极端社会背景的是军官而不是士兵。

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士是最关键的环节，他们几乎都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并且通常来自中产阶级。军士是从士兵中选出的，事实上形成了军队中地位较高的士兵，至于提升到军官集团最底层的可能性则很小。在和平时期，军官在自己军团中的作用很小：法国军官每两年就有七个半月的假期；英国军官拥有更多的假期而且存在滥用现象。军官不在时，军士与士兵关系密切。海军则完全不同。在海上，军官与士兵密切地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罗杰(1986)描述道：在纪律松散的英国军舰上，军官更多地是劝说而不是命令自己的士兵。有军舰上，专业技术人员同军衔权力同等重要。这或许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观点，也许情况在1797年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一年的海军叛乱揭示了人们对惩罚严厉的纪律怀有深深的敌意。

假设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和有限的联系，那么所有的国家和军官集团都确信纪律必定是惩罚性的。18世纪中期，有些战术是让士兵长时间地暴露于炮火之下，虽然这种描述不太准确，但是这里一种反复无常、逐步积累的致命因素。在海军的交战中，水兵不得不承受近距离的致命火力威胁。但至少他们还要在炮火中忙碌。而陆军士兵则经常是消极地站着等待或缓慢地向前移动。在需要面对类似威胁的任何军队中，都要求不断反复地去训练，以将可以理解的恐慌驱赶到意识的边缘。这种训练是18世纪军队所具有的显著特征。但即便如此，“纪

律”仍没有完全内在化。士兵整体地被抛弃，不是在战斗中，而是发生在和平时代，因为如果在战争中这样做不仅困难而且也太惹人注目。据说1/3的普鲁士军队——战斗力较高的部队——被雇用围捕另外1/3开小差的军队(留下1/3的军队作好战斗准备)。18世纪军官不断增加残酷训练，任意实施体罚并极少通过有人性的竞争，就像许多海军司令那样，在海上他们拥有十分专断的权力。斯科特(1978：35)说许多法国士兵是在接受纪律处分时，才与他们的军官有第一次个人接触。

因此，军界是一个特殊而残酷的等级集团，其中存在两个等级，它们之间由专断的、具有惩罚性的权力来连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被隔离的制度机构，不再反映外部更为复杂的市民社会。因此，具有等级制度的独特军界经历了三个演化过程：官僚化，职业化和民主化。前两个过程持续不断地影响了整个时期，最后一个过程则通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突然产生了影响，据推测，最后由于19世纪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巩固(Huntington，1957和Janowitz，1960提供了典型可靠的叙述；Dandeker，1989，最新版)。

在第十三章一开始我就提出了自己的官僚机构模式。其中包括五个构成因素：人事部门占两个因素，军官任命占两个因素，总体结构占一个因素。官僚机构的人事部门是带薪水的并且不存在对行政管理的所有权或转让权；人员的任命、提升和解职是依据客观的能力标准。官僚机构的各个部的机构是根据职责和等级来进行合理安排；各部门也同样被安排成单一职能，集中化的行政机构。最终，除了受政治影响的最高层，整体上与市民社会的政治斗争相隔绝。从一开始，军队官僚化就受到国家的引导。

职业化是现代化的总体特征，而且不仅限于军队。但是泰特勒(1977：6—8)注意到对于职业化较为通常的两个因素来说，军队增加了第三种因素。正如其他行业的职业化一样，士兵和水兵都获得了专业技术的垄断权。这使所有其他人都处于一种无法与之竞争的业余水平；其次，这一专业化整体还是具有独特的集体团队精神，并在自身的

传统和荣誉感中固定下来。但是，不同的是第三方面，服兵役是为了国家。职业化同官僚化一样是在国家内部发展的。

社会学家们经常注意到官僚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既密切又相互冲突的联系(例 Parsons，1964)。事实上，当他们与社会隔绝时，官僚机构就发展了一种职业化的团队精神和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可能与官僚机构的有效合理性发生冲突。至于现代军队，这种相互纠缠的官僚——职业的精神气质也包含了一种独特的阶层团结。这三方面的结合促进了军官等级的产生。

官僚化主义源远流长，尽管其主要历史阶段发生在我所生活的历史时期。它主要源自于国家机构以外，首先是教会，其次是私人的印度公司——尽管在最初，在塞维利亚的西印度群岛贸易法庭是由西班牙国家垄断控制[4]。他们有序的结算体系、确定的指挥程序、带薪的文职官员和军官都应对那些中等规模的行政机构所面临的困境负责。这些机构要应付一系列扩展到广大地理区域上的广泛职能。也许行政规模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有些起点水平过高。如果没有更好的合理化标准，行政管理就会十分困难。但是在对十个拥有 65 名到 3 096 名职员的现代组织的研究中，霍尔(1963—1964)发现这些组织的规模与六个官僚化的标准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重要联系。这六个标准与我本人所确定的标准十分相似。同样，在前现代化时期，官僚化的主要职能压力更多地来自扩展到大范围、有组织且多样化的职能问题，而较少来自于规模问题。

1500—1640 年的军队改革将官僚化带进国家机构。到 1760 年，陆军和海军被分为具有标准化规模和专业职能的两种部队，它们的军队与总部之间通过相互关联的两条指挥链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产生于 18 世纪，是现代商业组织的产物，它将参谋机构和战斗编队区分开来。另一个则是一体化的等级制度，具有标准化的军阶，从将级军官、上校、少校、上尉以及中尉逐渐降到军士和普通士兵。两个指挥链通过部门联合(一个陆军部队包含所有专业化领域，由一个参谋机构协调，

从属于一个指挥官)，通过一个“将级”军官领导的一个“总参谋”与其他部门协调。海军也通过相互间密切协调来克服在广阔海洋上，因舰队分散所产生的战术困难。专业的标准化供给，火炮和发展起来的海军战队，随着信号和指南手册的出现——所有一切都并入到一个有效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Dandeker，1989，p.77)。军官的任命也实现了官僚化，尽管最高层的君主和议会尚不情愿将作战总指挥权委任给一个将级军官。他们宁愿分而治之。陆军(通常不是海军)的创办者被保留下来，富有贵族投资建立并指挥自己的军团。但是到18世纪中期，奥地利、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的君主及陆军部长制定了集权法规以抵制贵族。1766年，当玛丽亚·特里萨牢固地掌握了军官升迁的控制权时，她取消了保留下来的领主，这可能是最后一个如此做的西方君主(Kann，1979，pp.18—19；参见Scott，1978，pp.26—32，Brewer，1989，pp.57—58)。

军政府是相对集权化、惯例化、纪律严明、特征相似且具有官僚作风的——18世纪最“现代化”的权力组织(Dandeker，1989，ch.3)。这些特征直接来源于军事权力的效率。战争要求引导了军队职能的多样化和武装力量的地理弥散性。另外，规模的作用远远小于职能和地域范围的作用，因为军事改革已集中于轮廓日渐清晰、定型的步兵、骑兵、炮兵以及其工兵部队和后勤部队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区别。专业化要求有能在更遥远的距离之间进行协调的新手段，特别是对海军而言。更加庞大的陆军和海军规模主要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官僚机构使军队可能膨胀。在战场上，作为非正式、松散的军事组织毁灭了，官僚化却获得了胜利。

人事政策较少官僚化。的确，薪金已成为平常事。水兵和士兵是付薪的“雇员”，从属于指挥链上的一个军官，军官的身份地位仍是变化的，多数军官是固定薪金的国家雇员，然而他们也是通过购买来获得最初的军衔和随后的升迁。普鲁士军官被授权通过他们的指挥权占有流动的国库资源。但类似惯例已逐渐被淘汰。

官僚机构在第二类人事标准——竞争标准上变得滞后。文化修养必不可少，但是除了炮兵和海军军官，其他官员极为缺乏正规的资格证书和广泛训练。随着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桑赫斯特在1802年成为英国的后方，建立了第一批综合性军事院校——1748年建立的玛丽亚 · 特里萨军事学院和1751年建立的陆军军官学校(1776年，法国又在十二个省区建立了同样的军事学院)。许多普鲁士的军事院校历经一个世纪之久。但主要征兵标准是社会背景，它假定一个贵族或乡绅在成长过程中就培养了军官潜力——有过竭尽体力的体验(特别是骑马)，勇敢，举止庄重，通晓如何对下级下达命令，以及有荣誉感。一个奥地利的陆军元帅曾经特别赞扬过一名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他拒绝赞扬贵族出身的军官，因为他说一个贵族就应该勇敢(Kann, 1979, p.124)。大多数军官是在工作中学习，借鉴于操练课本和简单的指南手册，并且他们在年轻且毫无经验时就陷于战争。升迁将根据战争中其调动各种关系的能力(以证明他具有适合自己军衔的能力)以及战功。

此后，战争强度的增加使久经战场锻炼的军官集团扩大。其经验即是新兴职业化的核心。非职业化的战争勇士正在消失并受到鄙视：因为只有我们专业人士才能了解什么是战争。一种独特的职业化精神气质正形成中，它仍是贵族化的，但不具有排他性和家族性特征。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强烈地影响着正在增强的官僚和职业化以及正逐渐引入的有限民主化，它似乎对贵族的统治和惩罚性纪律产生威胁。较高的战争强度使经验丰富更成为职业特性。当书本知识和正规学校教育并未取得进展时，非专业人士就已在波拿巴的军队中消失了。亲戚关系仍十分重要，但任何外行或不胜任的贵族及战争知识分子几乎得不到升迁。军官集团的竞争和猜忌，正如军事自传的读者所了解的那样，更多地集中于谁得到了提升，去指挥谁，而较少集中于家族关系。他们不再注重资格，更多地是注重工作业绩。

自然这对法国革命军影响最大，法国大革命带来贵族的移民出境和退出军队。军士的升迁机会突然增加，这些机会突然降临到那些原本

毫无运气升迁为军官的人，甚至包括普通士兵。与1789年10%的比例相比，到1793年已有70%的军官是由服役士兵提升而来，尽管其中大多是低级军官。最高级的军官仍主要由前贵族担任；战斗部队中40%到50%的上校和中校是贵族，与之相比，担任上尉和中尉的贵族比例只有10%到20%。但他们要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官员、商人和资产阶级的投资人分享军阶，后者的构成比例为40%的高级军官和30%的低级军官。手工艺者、商店店主，雇佣劳动者及小农占据了大多数的剩余职位，比例为5%和33%。在士兵中，资产阶级、中等集团和手工艺者的比例下降，农民的比例增加，尽管仍未被充分体现出来(Scott，1978，pp.186—260；Lynn，1984，pp.68—77)。

突然间，军队不再是对古老社会的拙劣模仿，而是具有新社会的模式。纪律的条文被编集成典并适用于军队的各阶层：现在法国军官比他们的士兵更可能冲在正战斗的队伍中。它用激情、个人化和部分内在化的高标准来平衡惩罚。林恩(1984，p.118)断定，普通士兵们是被“作为公民而不是臣民”来对待的。我发现所有有关军队的类似言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夸张。军队面对的是明确的死亡可能性，它几乎从未完全使纪律内在化；它不得不以集中压制的形式来完善纪律，或强迫士兵们笔直地站在炮火下，或去冲锋，而不是退缩或逃跑[5]。但是作为一种趋势，从18世纪到革命时期的军队，林恩的论述是充分的。

接下来的二十年，军官集团变得更为资产阶级化，因为对非贵族来说，贯穿军衔提升的机动性增加。在1804年，拿破仑的18个陆军元帅中仅有3个是前贵族，一半军官来自士兵(Chandler，1966，pp.335—338；Lefebvre，1969，p.219)。拿破仑失败以后，在随后的各届政府中，对社会背景的要求变化多端。1851年波旁王朝复辟，在最高级军官中增加了贵族，但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清洗一个同情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军队。在混乱的二十年后，终于找到了权宜之计。对军队共和派俱乐部的压制是与三项鼓励性措施相结合的——在阿尔及利亚征服地的升迁机会，军队退休金的增加，取消部长开除军官的权力。法国军队仍存

有分裂，无法抵制1848年的革命或1851年路易 · 波拿巴的复辟，但是它激进的“公民性”特点被削弱了许多(Porch，1974，pp.115—117，138—139)。那么革命战争是否改革了其他国家的军队?

关于军队的等级制度

革命战争改变了对普通士兵的控制，并使军官集团一体化和现代化。但是事实证明政府和指挥官们最初所担心是多余的，它不会是对“国家公民权利和义务”作出进一步认可。

官兵关系逐渐发生改变。大规模动员起来的士气和减少残酷纪律的影响是如此的明显以至无法忽视。它实际上在所有军官集团中都增加了“进步的”宗派信念。海军战役和殖民地战役也再三证实，当军官和士兵同甘共苦时，他们的战斗力较强。三年以后，普鲁士在德意志耶拿城的耻辱，使普鲁士军队废弃了任意体罚，扩充了规则手册，并开始将人道主义的责戒写入手册。在1818年，他们首次提到要将士兵的“荣誉”感与纪律协调一致——一个真正激进的见解(Craig，1955，p.48；Demeter，1965，pp.178—180)。在玛丽亚 · 特里萨统治下，早在1759年炮兵部队就引入了一个进步法规。它极力主张应“通过对荣誉的热爱和良好的待遇，而不是暴行，不合时宜的殴打和鞭笞”来鼓励士兵。但是直到1807年这一法规才被扩大到步兵集团军，并且直到19世纪末它才被经常充分地用来阻止野蛮行为(Rothenberg，1982，pp.117—118；Deak，1990，pp.106—108)。纪律仍基本保持了强制性——正如它今天所做的那样——但它逐渐变得合理化并成为指导性原则。军官和士兵之间不再如此隔阂，他们正逐渐变得屈从于所呈现出来的单一军事等级。

在1805—1807年和1813—1814年之间，奥地利和普鲁士可能比这走得更远，为了也成为“武装化国家”，它们调动爱国热情并允许官兵之

间的关系更加自由。 新兵中外国雇佣兵逐渐减少，以至于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军队变成了“民族性”的。 两国政权都开始建立后备力量即战时后备军。 但是，1815 年以后，所有政权由于害怕将武器交入自由民手中，而逐渐放弃公民军队。 奥地利大元帅，查理大公适时的建议，应在扩大征兵范围的同时将服役期减为八年(许多国家政府规定的服役期为终生)。 他的计划遭到拒绝，因为退役士兵有可能将专业性的领导能力用于领导反叛起义。 通过观察，科洛雷多伯爵在宫廷中使这一论据确定无疑：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一个省区来堵住胜利敌人的枪口，但武装人民简直就意味颠覆帝位(Langsam， 1930， p. 52；Rothenberg， 1982， p.72)。 1831 年奥地利放弃了战时后备军。 普鲁士人虽保留了战时后备军，但对之施以严格约束。 在整个 19 世纪，普鲁士人和其他德意志国家对“职业化”军队与“国民化”军队的优缺点进行争辩。 如果论争是以类似的措词提出，职业化的观点总会取胜。

然而，上文中提到的妥协观点“军事公民权利”却取得一定进展。在德国，这一观点作为对成年男子服役的回报而影响到了对成年男子普选权的承认(在被控制的条件下)(Craig， 1955； Ritter， 1969， I， pp.93—119)。 在法国将公民权利定义为“血税”，它穿越欧洲和北美，在许多国家产生回应。 在任何国家公民军队的形式都没能持久地流行，这种类型的军队曾在瓦尔密击败过普鲁士人(参见第六章)。 然而，大规模军队呈现出一种不太完整的参与形式，它由执政政权界定，被一个合理化军事等级来严格约束。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武装后不再是真正的“公民”，而是“民族—国家的忠臣”。

在军队的等级制度中，19 世纪的职业军官对待士兵当然比前辈们要好。 这一变化的发生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次是在 1815 年以后，伴随着军队规模缩小而发生的，到中世纪以后，随着军队的再次扩大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化。 在第一阶段，财政上的强制因素减少。 为了使军官和军士忠诚而实施福利计划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包括退休金和为老兵提供在国家机构中任职的机会(将在第十四章中进一步讨论)。 工资水平与

那些在民用企业中工作的已卸任的军官和士兵基本保持一致(可能奥地利的军官除外)。武装力量也提供了更多稳定的雇佣机会，能保证大多数人服役期较长(Porch，1974，1981，p.89；Berryman，1988，pp.26—27；Deak，1990，pp.105—106，114—125)。

此后，随着第二次扩张阶段的到来，各国通过扩大他们的预备力量来解决问题。在军队各个级别长期服役的专业人员成为骨干力量，他们领导并训练大量被征入伍的后备役军人。这些军人经过短期培训(在普鲁士是三年)，然后进入由正规军监管的预备役军队和本地军队。当真正出现战争威胁时，已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役军人就组成军队的大部分。整个19世纪中期，军队主要从农民中征募士兵且更确信他们的忠诚，同时给予有技术的城市居民和从事工业贸易的人豁免权。随着短期征兵在欧洲大陆的扩展，这种偏见消失了，然而，重要战争仍趋向于不征召工人阶级中有组织的核心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先锋队”——在矿业、交通运输和金属制造业中的熟练工人——被要求去进行生产而不是参加战争。仅海军从这些人中征募新兵。因此陆军士兵，特别是高水准的前线部队，趋向于既从农村地区，也从小城镇或工人阶级特性较弱的工业区征募新兵。工人阶级不忠诚的观点对军队的影响比恩格斯和保守派评论者所预期的要小。

吉登斯(1985，p.230)论证说恰恰那段时间，军官成为被隔离的专家，士兵成为大众公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指挥官们紧紧地控制着能统治士兵的军队组织，以减少士兵们对自己作为公民或阶级成员的认同能力。中世纪战争所带来的教训是那种由于过分细致的计划，在地图及时间表上进行协调所产生的各师之间配合松散的作战方式已陈腐过时(由波拿巴发展起来的，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在1870年普鲁士人的组织已压倒了法国人的干劲。这使得将军们甚至能够用严格纪律来控制那些与18世纪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相比要松散得多的军队。广泛的权威性组织取代了简单的训练。铁路、电报(最后是无线电报)以及参谋体系，这些都使指挥官们能够有效协调多支部队，每一支部队都

代表了每个士兵的最远地域，许多陆军部队是在本土征兵，他们部队的士气是基于地域的团结一致和同志间的友谊忠诚。

在美国内战中，新征的本土士兵确信大部分士兵是为了保卫自己家乡的完整或利益，而不是保卫原南方或联邦政府(或与之相关的价值利益)的完整和利益而参加战斗，甚至战死时，地方士气尤其显示了其威力。 六十万人战死沙场和较低的开小差率都证明了这一约束的惊人力量，它甚至约束了那些未经训练就被调上战场的士兵。

但是除了美国在内战时曾大规模动员兵力以外，在城市工业化占压倒之势的英国，地方性征兵仍对大部分落后保守的农业区存有偏见，而这些农业区能够提供习惯于上述部门性纪律约束的剩余劳动力。 普法战争以后，法国共和党人为寻求取代地区性征兵体系的方式进行了一场政治斗争。 但他们在保守力量与陆军部队高级指挥机构的联合夹击之下失败了。 陆军部队保留了其地方性和反动性。

为防不测，指挥机构增强了保守性。 区域性部队组织是由从地方军事后备力量中征召来的军士充实。 因此，军官和军士是以扩军和所谓的“阶级性”、“民族性”的公民军队为中心，相当成功地发展了部门性和区域性权力关系。 在士兵与自己军官的直接表面关系中，士兵被组织性所包围。 更高部门和参谋指挥部可以为了某些隐避目的，而调动他们的部队和舰队。 现在，士兵几乎没有能力在自己的部队或军舰之外采取集体行动。 正如我们在第三卷中将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即使是在可怕环境下，甚至是不合适的命令，他们几乎都必须绝对地服从——除非他们的军官也缺乏忠诚之心。 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正规军和后备力量都是绝对忠实的。

麦克尼尔(1983， p.260)论证说，一个正在工业化的社会同时也正在将“指挥的首位原则”奉为神圣。 如果这是指平民社会，就有些笼统，但是用于描绘正在扩编的武装力量，则极为精确。 那些所谓“公民的”、“民族的”或“阶级的”军队都仅仅是骗人的。 它们事实上是被社会保守派所约束的部门性权力组织。 到 1910 年，在大多数国家

中，大约20%的成年男子受到这样的约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的轮廓才进一步呈现出来，现代国家正在它们的军队中造就大批忠诚者(正如在它们的平民化政府中所做的那样，参见第十三章和第十六章)。实际上在1848年和1917年之间，没有武装力量会在它的部门性忠诚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在20世纪这一点对于军队的两大主要职能——战争和镇压都极为重要，并且通常是决定性因素。

随着熟练技能这类观念的不断发展，在军官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个持久性变化。技能教育的成分逐渐增加。制图学、后勤学以及战术的比较和历史研究成为军队骨干和总参谋部人员训练的一部分，这主要出现于19世纪早期。此后，在战争工业化的情况下，火力被大规模增强，要求对一些基本机械知识的了解不再仅限于炮兵部队，普鲁士军队的一系列胜利是专家治国的鲜明典范，尤其被法国迅速学习。大约1870年以后，受过军事学院的培训成为进入军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进一步学习则通常成为得以升迁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作为精英的参谋机构中。按惯例晋升名次与军官的服役记录和资格相联系，同时在广泛的专家治国的准则下，庇护人制进一步衰落。

由于不同原因，英国和奥地利略有落后。正如我们将很快看到的那样，英国军官集团的社会构成继续保留着乡村性和反动性，这与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社会并不相符。英国陆军仍保留着保守性和对参谋学院及改革派所作努力的轻视，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和布尔战争的惨败带来沉痛教训，才推动了其落后的军队职业化(Bond，1972；Harrles-Jenkins，1977；Strachan，1984；Brodsky，1988，pp.72—82)。奥地利的落后是由于政治上的混乱。它的军队主要作用是维持国内安全，它具有保守性，怀疑职业化是“自由化”(Rothenberg，1976)。但是在1870年以后，它也有所改变。到1900年，优秀的军事学校和毕业后的训练课程长期主导着升迁机会(Deak，1990，pp.187—189)。

最后，反动分子并不恐慌。教育无法取代古老的贵族原则或激进的军事政策。教育被融入其中。在对20世纪更为普遍的流动趋势的

预测中，随着教育成为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事实上士兵向上直接升迁的机会减少了。在1870年的法国陆军中，14%的师级将军来自士兵，但是到1901年则少于3%(Serman，1978，p. 1325；Charle，1980b)。由于不同原因，贵族除了让步别无选择——很简单，在19世纪末陆军的扩军中，没有足够的贵族担任军官。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异常幸运地坚持下来，甚至是在法兰西共和国时期，最高级军官仍完全是贵族。1870年师级将军的30%有贵族血统，到1901年，仍维持了20%的比例。比例的下降必定带来更多的资本主义化，然而，这也导致了更多地从罗马天主教徒中征募新兵，而不是从国家学校征兵。这样的军官集团保留了社会的反动性和政治的反动性。军官集团与共和国政府的反复冲突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达到顶峰，直到1941年才实现了政治妥协，这立刻就挽救了共和国(Girardet，1953；Charle，1980a)。

当然，有一支军队没有贵族。美国军队也有其独特的特点：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立刻既扩充了代表有产阶级的军官集团，同时也扩大了大体上代表受过教育的白人成年男子的军官集团，但是，一旦重新回到和平时期的体制模式，美国军官就缺乏代表性。海军军官绝对是来自现代化城市中的上等阶层，也就是说，来自东北部的资产阶级和职业化中产阶级。他们多是军官、银行家、律师和法官、制造商、官员、“科学上的”专业人士(医生、药剂师、工程师)以及商人子孙(按降序排列)。(Karsten，1972，表1-2。)

相反，陆军军官明显地是——由于美国内战的结果——南方人并来自乡村、来自可能正在衰败的旧体制，1910年在14名最高级军官中，有13名是南方人，并且大部分来自乡村地区。尽管缺少大量资料，但是可以看出大部分军官或者是军官的子孙，或者是种植园农场主的后裔，还有的是来自那些生活在小城镇或大城市的专业人士家庭——律师、医生、教师、政府职员以及部长大臣。贾诺威茨将军官集团概括为“老式家庭、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乡村、上—中产阶级”——正如美国所提供的一样近乎于旧体制。但是因为这样的阶层

不再统治着美国(除了南方)，所以它是一个有些被隔离的集团。 根据1890年北方的报道，陆军是一个“拥有它自己的领域，独立并且由于独特惯例和纪律而被孤立的团体，是被选拔出来的贵族，并拥有传统的光环”(引自 Janowitz， 1960， pp.90， 100；参见 Hutington， 1957， p.227；Karsten， 1980； Skelton， 1980)。

这种带有等级制度特征的小型集团，以独特的方式控制着它的士兵。 这些集团不是被征募的士兵，而是职业化的志愿兵，数量上占优势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早期外国雇佣兵的后裔？)，也包括黑人。 他们满意于陆军所赋予他们的安全进入(白人)美国社会的权力(Berryman， 1988， ch.2)。 尽管并不庞大也不具有影响力，但美国陆军忠于它那保守的主人，正如我们将在第十八章中所注意到的。

在其他国家，贵族和反动势力的优势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英国和普鲁士是最极端的，其次奥地利最与之相似。 拉泽尔(1963)指出英国陆军军官的个人社会背景几乎从未发生过变化。 贵族和土地乡绅(不及人口比例的 1%)1780 年占国内陆军军官的 40%，在 1912 年占 41%，在最高级将领中(少将及更高军衔)，他们的优势略有下降，从 1830 年的89%降至 1912 年的 64%，但这是通过在各团之间增加分层来计算的，同时精锐团甚至在构成上变得更加趋于旧体制，在风气上更具反动性。在高级军官中，普鲁士陆军也保持着贵族特性。 在普雷达多维奇(1955)对 1804 年到 1918 年之间普鲁士军队与奥地利军队的总参谋部所作的比较中，奥地利军队在 1804 到 1859 年之间，其将军中贵族大约占 95%，此后到 1908 年这一比例骤然跌落到 41%。 但在普鲁士军队中，直到1897 年，贵族稳定地占据 90%的比例，此后在 1908 年仅降到 7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扩大的总参谋部中，两国的数字进一步下降)。等级的降低使得贵族优势减弱，随着 1900 年前后的扩军，优势进一步下降——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考虑到贵族人数所占的固定比例正应如此。 1860 年 86%的上将和上校是贵族，1931 年 52%是贵族。 1860 年

更具资产阶级性的战时后备军预备力量的一体化，使低级军官的构成产生巨大差异。到 1873 年，仅 38% 的中尉是贵族，到 1913 年降到 25%——这也是在确切数据中唯一下降的比例。在所有军官中，贵族人数从 65%降到 52%(Demeter， 1965， pp.28—29)。

因此，德国和英国的模式十分落后。由于军官人数的增长，而贵族—乡绅的人数并未增加，使得贵族—乡绅的优势被迫衰落；旧贵族仍支配着最高等级阶层；几乎完全不接纳工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的子孙。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将陆军留给了旧体制。陆军(包括外交)是旧体制进入德国国家核心的一个桥头堡，与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相比，这确保了军国主义在外交政策和阶级关系上的优势。

但是“贵族”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当它融入明显的职业化精神气质时，它变得缺乏特殊性，而被所有军官共同拥有。在德国贵族中军衔依然如同在 18 世纪末一样，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给予较贫穷的小贵族，如内塞诺、沙恩霍斯特和克劳斯威茨以升到较最高职位的权力。19 世纪早期，军事教育的改革和强化使军团在职业平等中实现制度化。在大学的学生军团、学生斗争会、以及参谋学院中，教育增强了军队的精神物质。“教育”一词不再仅仅意味着“教育”而是培养——在军队中，就是荣誉感的培养。作为一种道德品质，“贵族”现在的含义为“荣誉”，成为军官的独特象征。

从迅速扩充的德国海军，这一显然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化的军事部门中，可以洞悉后果。海军要求广泛地进行技能训练，并大量地从城市港口征兵。近代海军缺乏传统和身份地位。因此，它只吸引了少数贵族。1890 年至 1914 年间，在海军学员的行政阶层中，仅 10%至 15%的人来自贵族家庭，尽管这比那些工业资产阶级或商业资产出身的人所占百分比要高。在 1907 年有文献充分记载的阶层中，在专业人员的出身背景中，占优势地位的是：45%是大学教师的子孙，26%是非贵族的陆军或海军军官的后裔。海军仍需要来自“有教养家庭”并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海军明确地拒绝那些来自社会下层阶级的申请人，因为这

些人可能会妨碍来自有教养家庭的青年人的申请。然而资产阶级没有服役经验。贵族最受重视，富有的人次之。成功的行政军官被封为贵族。在士兵的待遇方面，军官模仿了傲慢的普鲁士人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水兵的起义中普鲁士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工兵部队军官的骨干来自出身背景略低的家庭，主要是行政机构的中低阶层。他们被看作是“实用的”人员，不适合指挥职位，正如在陆军中那样，犹太人(除非接受过基督教洗礼的人)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分讨厌的人。尽管陆军和海军的特质并不完全相同——海军的军国主义更多的是反英和维护帝制——“海军展示了一条通向‘封建化’的上层资产阶级道路”(Herwig，1973，pp. 39—45，57—60，76—78，92，103—104，132)。在反动的贵族武装力量中，甚至资产阶级化的部门都仿效他们，就在德国人领导工业资本主义的时期，它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仍极力避开本国的武装力量，并且也正被本国的武装力量所回避。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德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1866年和1870年似乎就已证实了这一点，它的海军技术精湛，尽管与要求它所承担的作用相比，规模太小。但自相矛盾是它那非凡职业化的现代性在本质上却是旧体制。海军当然是技术性的，对军官有一个较高的资格标准，根据当代资料统计，它是唯一一支人员普遍具有文化的军队(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1913，p.181)，它的参谋机构对战争的工业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包括对铁路后勤学的大量应用。因为它的军官和军士集团具有社会内聚性，是依靠军官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与受竞争折磨的法国陆军军官相比更是如此。在1870—1871年的战役中，这一悬殊差别特别明显(Gooch，1980，p.107)。公众言论对“普鲁士的效率”这一自相矛盾的表达有一个缓慢的理解过程，因为这一军官集团具有技术的先进性和社会的反动性。这一联合体是一种高速发展的等级特质。因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士骨干被部分地灌输了下文所提到的价值观。但这正是对较普通矛盾的一种极端看法：那些具有社会反动性的军官集团正运用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先进的手段，掌握最先进的

专家治国技巧。

奥地利的军官集团也具有社会保守性，但它也有从其国家形式中剥离出来的独特特性(已在第十章中讨论)。 它保留了王朝的和(不稳定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 直到 1859 年，其军官的微弱多数还是从国外特别是从德国征召的，但偶尔也从英国大量征募。 王朝也同样依赖于罗马天主教徒而且主要是依靠奥地利的日耳曼人，这些人 1910 年占正规军军官的 79%，仅占总人口的 23%。 所有其他民族都未被充分体现。 最初贵族统治着军官集团，但随后衰落，正如在普鲁士德国的军队中一样，相对于人员扩充，德国贵族人数不足。 到 1870 年，职业的副职官员仅有 20%是贵族，并且部分是来自那些因在政府机构中工作而刚刚被授予贵族头衔的家庭。 随后，贵族将军的人数下降，正如我们所预期并且在上文得到证实的一样。 1867 年以后，政府对马扎尔人作出了让步；他们统治着自己德国部分的亨维德(Honved)预备军，并且在正规联合陆军中，有少数马扎尔人军官在升迁过程从身份差别中获益。

1870 年以后，奥地利也大规模扩充它的预备力量，并且完全资产阶级化，如主要的资格限制是教育程度。 这就排除了罗马天主教徒过多的加入，降低了日耳曼人的优势(降到 60%)，将捷克人和马扎尔人的人数提升到公平的比例，路德教徒被过分体现，并在总体上使犹太人被过分突出(他们在预备军官中占 17%到 18%，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4%到 5%)，其他民族和宗教仍未得到充体现(Rothenberg， 1976， pp. 42，128， 151； Deak， 1990， pp.156—189)。

这是一个特殊的军官集团，它被资产阶级化，并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而且采用专家治国的方式，但是特殊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调和了它本质上的王朝忠诚。 陆军更紧密地拴结于奥匈帝国，而不是领土上的统治阶级——与“民族”的联系更少了。 它在社会上的孤立和那不切实际的仪式(如它的纯白制服)增加了它类似于等级制度的一面和团结一致的一面。 奥地利的军官，无论他们的官衔和身份地位如何，甚至相互是陌生人，都能通过互相熟悉的将“你”发成“Du”的谈吐，显示出他

们的共同性(在其他地方仅是知己和仆人才使用)，而不是使用更为正式、更常在德国社会其他领域使用的 Sie。 这在此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奥之间极不愉快的场面，德国军官认为他们受到奥地利联军的侮辱或亵渎。

奥地利军官与社会的隔离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在俄国陆军中，非贵族军官的人数比例也在增加，从 1895 年的 26%上升到 1911 年的 47%，同时保留下来的贵族与大俄罗斯的贵族统治无关。 到 1903 年，这些至少拥有少将军衔的贵族中有 91%不占有土地或财产，甚至没有一处城镇居所(Wildman， 1980， pp.23—24)。 这一军官集团也正从阶级结构中分离出来。

但奥地利的军官也更进一步地与他们的士兵分离。 因为士兵是从各民族中按大约均衡的比例从本土征募的，并且还因为君主提防同一民族的军团，因此军官和他们的士兵很少说同一种语言。 因此，陆军指挥结构很少能从阶级结构或区域性语言共同体所提供的社会统治集团中得到增强。 奥托 · 鲍尔，社会主义的领袖描述了自己在军官训练中，所确信的那些受资产阶级化影响的东西(尽管没有民族的影响，因为他明显的是在描述全德国的统治)。 陆军的职业化精神特质要求军官尊重士兵中的上等阶层。 但是

> 阶级等级……在有身份的绅士阶层和工农阶级之间存在差别……整个旧式陆军的结构使乡绅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如此明显，以至于有时不是作为阶级分隔，而是作为等级的分隔显示出来。[但是与普鲁士兵面对容克军官不同;]奥地利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孙会以他的军刀作为上级命令，要求农民来见他。尤其荒谬的是……这存在于预备军官的关系中。(Kann，1979，pp.122—123)

无论荒谬与否，奥地利的军事等级——在当代人看来是这些大国中

最软弱的——仍在惊人地起着作用。除了他们有能力在俄军炮兵阵地上带领那些农民屡次进行自杀性冲锋，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就使半数奥地利陆军被歼灭，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类似等级制的职业化、资本主义化和王朝化军官集团的部门性约束力量。

军队旧体制成功地吸收了所有工业革命所抛给他们的东西，没有对民主公民权作出任何让步，资产阶级的子孙需要将他们的举止变得优雅以便成为军官；有才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需要军士的特权；其他阶层需要的是管理法则，而不是专断的纪律。这些就称得上让步？这与现代化国家的民政权力所作出的让步相比，其重要性要小得多。这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19世纪武装力量的独特隔离性和日益增长的部门性权力。一个军官等级通过军士和长期服役的骨干延伸到有部门性纪律的广大公民，使他们转变成国家的忠实者。“公民权利”不仅仅是马歇尔的普遍权力的实现；也不是国际和平主义的开始。它与军事力量的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国家”部分是部门性组织、中央集权和暴力。

关于独立自治的军事力量

也许这种职业化自治权的形式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它几乎接近于一种明显的军事等级制，并且拥有杰出的骨干力量和对士兵的部门性控制。历史上和当代的许多社会(如英国)都拥有一种不存在重大社会危害的职业化军事等级制度。事实上，如果战争爆发，可以考虑他们统治社会的权力，但是在和平时代，他们可以有自治形式，却几乎不能拥有统治市民社会的权力。然而，在19世纪的和平时代，欧洲“自治形式”可以导致“控制权”。我们前面注意到，外交几乎很少被市民社会所控制，它主要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私事，由类似于旧体制人事部门的军官集团来支配。这未必就意味着灾难。指挥官们通常在地缘政治方

面十分谨慎，对混乱和战争的破坏性十分有见地，对死亡的恐惧有充分的体验。 军官集团通常支持殖民冒险，以玩弄真正的战争游戏，开辟发展前景。 但是他们对于大国之间的战争十分小心。 战争的工业化是保持谨慎的另一个原因。 随着给略加训练的士兵供军事武器的可能性的增加，进一步扩大了可调动军队的规模，这意味着可以越出农民和边缘地区，来武装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过程——或者说反动的军官集团(完全是不必要的)对此持怀疑态度。

然而工业化增加了专家治国的权力和军队的危险性。 这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军官集团处于 19 世纪科学和工业发展的最前沿，使用着资本主义最先进的产品和组织形式，分享着实证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军队开始相信细致的计划和协作能给出一个精确的结果，并且可以通过推测取得胜利。 尽管现代化有益于军队，但它也能导致过于自信。 也许战争的教训及对下一次战争可能性的预言，便是战争的不可预见性。因为在两次战争之间，武器和战争策略都发生了改变。 同时也因为没有人会恰恰在上一次战争失败的地方再被打败，而且很少是针对相同的敌人，下次战争的命运完全是不确定的。 一支真正明智的军队——关心的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明确政治目的——将仅仅利用战争来威胁对方，如果它比敌人拥有明显的优势。 这种优势由外交来提供，使强有力的同盟国屈从，或使敌人丧失同盟国。 然而，最“现代化的”、专家治国论的、专顾自己的军队最善于藐视其他同盟国，它们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国内力量。 尽管外交官和指挥官是来自同一阶层，但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和职业经历是截然不同的。 外交官对于专家治国的战争知之甚少，而实际上将军对联盟如何建立也一无所知。在 19 世纪末，最现代化、最奉行专家治国的、最专顾自己且政治上十分无知的陆军是德国军队。 它忘记了俾斯麦的外交对取得 1865—1867 年和 1870—1871 年的胜利作出了同样多的贡献(参见第九章)。 并且它忽略了随后在其他并非纯粹专家治国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法兰西共和国和其新型军事纪律的加强。 它那专顾自己的军国主

义就是它的傲慢自大。

其次，在19世纪末，军队特权的专家政治过分抨击防御。在传统上“进行战争”包含着三个阶段。动员一国的军事力量，将它们按战时程序集结，并将它们送入真正的战争。但是工业化、重炮和铁路可以将大量的人力和火力输往前线。这有利于从铁路末端迅速地配合进攻。首次进攻火力可以更集中，但是防御也必须是迅速的协调作战，才可以将火力集中在进攻者身上。总参谋部的计划变得复杂且具进攻性，它详细计划了在紧急状况下采取的三个先发制人的行动：动员后备役军人，占领铁路网，并使用前进所需的海陆空间，有时是不受国家边界和领海的限制。不断向前推进，占有进入邻国的铁路控制权是最具挑衅性的行为，因为它构成了事实上的侵犯，尽管并没有宣战。俄国将军奥布鲁切夫认为动员就等同于战争。在他著名的1892年备忘录中，他写道，在现代战争中，胜利属于军事部署最迅速的一方，“抢在敌人之前发动猛攻”。他总结道：“动员不再被看作是和平的行动；相反，它代表着战争的最具决定性的行为”。

对防御准备和进攻之间的界线抹煞也首先发生在外交方面。1894年法俄联盟授予高级指挥机构以自主权。如果奥地利、德国或意大利动员军队反对它们中的任何一国，它们都将立即动员军队。1900年联盟被限制为仅针对德国出现军事动员的情况，并且在1914年这一条约实际上被履行。大幅度进攻步伐，短暂但可能是仓猝的战争，都超出了平民政治家和外交官的控制(Kennan, 1984, pp.248—253；他重复了奥布鲁切夫的备忘录，见p.264)。同样，1909年莫尔特克(德国的)将军和康拉德(奥地利人)之间的单独讨论中威胁要将俾斯麦的国家间防御联盟转变成一种鼓励对每个国家进攻的联盟(Albertini, 1952, I, pp.73—77, 268—273)，英法协约促使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军事准备，这一直对双方内阁长期保密(参见第二十一章)。

无论专家治国的信心还是高级指挥机构的计划都能在事实上先争取到那些依赖于可靠渠道的政治家们。正如我们将在第二十一章中所关

注的，政党民主的政治机构使军队比君主政体下更负责任。在 1914 年 7 月奥地利、俄国和德国展开了一系列先发制人的军事动员，首先倾覆的是它们自己的政权，随后是整个欧洲的政权。此后，自主的、有内聚性的军事等级制度被证明拥有统治社会的决定权。如法国大革命中的思想体系，它尽管仅是一种“世界历史性时刻”的力量，但却摧毁了旧的体制。

结论

通过回顾漫长的 19 世纪，我已对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发展进行了探索。大多数内在的发展都支持军事等级制度的理论——来自平民和国家控制的武装力量在制度上拥有自主权，陆军和海军的组织已更加完善，并且逐渐与市民社会更加隔阂，同样也更为脱离国家。在征募、训练和团队精神方面，军官集团已转而依靠自己。它是与旧体制以及资产阶级后代的独特融合，并且在前者的思想控制下，形成了一个与先进工业化社会中任何主要阶级都毫不相同的军官集团。内在的官僚主义、职业化和专家治国理论的发展增强了他们活动的隐蔽性。长期服役和军士骨干，加上指挥机构与个别区域性军事团体之间存在的更紧密协作，确保了在不对公民、民族或阶级作出重大妥协的情况下，对众多的士兵和水兵实施有效的部门性控制。许多国家已试图规划出军事上的永久防御措施和军事触角，以牢牢地拥有自己的领土和人口，并控制人民的忠诚。特殊孤立的并且具有内聚性的武装力量已成为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的产物，在现代国家和整个市民社会中产生出一个重要的、独立存在的军国主义结晶。

但我必须证实这一点。军队的职能也将军事力量与社会、国家纠缠在一起，在许多方面限制并减少了等级制度的自治。军队在市民社会中的持久嵌入是源于它们的第二类职能，即国内镇压，这使军官集团

能够进入广泛的政治权力网，并加入在经济上起支配作用的阶级。因为军官集团浸透旧体制的反动准则，他们普遍同旧体制和资本家一样对城市暴动和工人骚动充满敌视。然而作为来自农村的反动分子，军官不仅仅是现代工业资本家的傀儡。他们的职业化也使他们不愿将精心控制的力量显示演变成为真正的刀枪相向。这种勉强情绪促使他们与不断扩编的警察及国家准军事机构相勾结。职业性的谨慎通常使他们支持城市各阶级之间的妥协。正是因为这种重实效、有节制的镇压标准使他们的部门性训练组织几乎总可以提供忠诚的士兵。在他们的镇压职能中，军队因此代表了新旧两个统治阶级的结合。到 1900 年，军事力量网已通过调解帮助国家的两个阶级形式结合。一个形式是旧体制，另一个则是资本家。他们的等级制度所具有的内聚性和他们对士兵的部门化控制使统治阶级更加安全。

在某种程度上，军队、旧体制和资本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开始渗入到军队的主要职能——战争。在外交政策方面，军队与政府首脑、在本质上是旧体制的政府外交官及政治家的合伙人相勾结，它基本上独立于大部分政党或公众舆论(我将在第十六章和二十一章中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在专家治国方面，他们还与工业资本家进行勾结，这些工业资本家所生产的产品为军队提供了武器、通讯设施和补给(在第十四章中将探讨这一问题)。这种“军事—工业综合体”在某些时候也包括一些更为广泛的关系，如与国家的关系，与广大主张中央集权的中产阶级压力集团之间的关系(将在第二十一章中讨论)。但在其他造成战争的原因中，军队仅是一种隐蔽的因素。军队的专家政治鼓励了隐蔽的等级制度和被孤立的过分自信。它也贡献出了自己的秘密定时炸弹——战术的内在发展开始超出防御阶段，特别是逐步升级的现代化。

各方面的相互纠缠刺激了军事结晶中的双重性——等级制度的自治权及与之伴随而来的旧体制和资本主义的防御战术。1914 年，旧的自治权走到了尽头。官僚化、职业化、军事—工业的专家政治、旧体制中统帅部和外交的支配地位，以及制定军事和外交决议的孤立性，所有

这些方面的结合体重新创造了一个军事力量自主权，它融入国家的形式仅仅是一种伪装。作为军国主义的形式，最重要的是独立并且大大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形式。

有些人担心这会对旧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形式产生反作用。如果将军队推入大规模动员战争，许多指挥官怀疑会产生阶级危险。改革可能同样威胁到军队的等级制度、旧体制、政府及资本主义。大多数指挥官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他们最坏的担忧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会成为现实。但是，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毫无意义的屠杀中，军队的等级制部门性权力仍结合在一起。只有俄国陆军因破坏了团结而激起了革命。在所有其他实例中，部门性军国主义都幸存下来：在战胜的军队中强化了社会保守主义，在战败的军队中怂恿了激进的右翼独裁主义——并从此以后发展成法西斯主义。战后，阶级冲突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现在又与军队反叛者和忠实者之间的冲突相融合。多数反叛者是已退役的水兵和预备役军队，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控制他们的纪律已十分松散，同时大部分忠实者都是前线的骨干部队。这种纪律约束的士气差异，给了右翼独裁者和法西斯主义者 squadristic 和志愿军以决定性优势。军事力量——尽管它被 20 世纪的社会学家所忽视——被证实对 20 世纪的社会具有巨大的致命影响。实际上 1914 年的世界性历史时刻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注 释：

[1] 本章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来源于瓦茨(1959)、贾诺威茨(1960)、古奇(1980)、贝斯特(1982)、麦克尼尔(1983)、斯特罗恩(1983)、邦德(1984)、安德森(1988)以及丹德克(1989)。

[2] 埃姆斯利关于警察力量的比较研究为该部分的论述提供了广泛的依据。

[3] 第三世界国家劳资关系的制度化对其社会的非军事化没起太大作用，这可能归因于如下事实：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比西方国家薄弱得多。许多国家的工业工人阶级，如拉丁美洲，其所占的人口比例远远少于历史上同期水平的西方国家。

[4] 事实上，我将其归于 18 世纪的改革预兆，早在 17 世纪的西班牙就已初露端倪——尽管后者对前者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正如本卷所示，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几个国家上，难免会夸大它们的共同影响。

[5] 在第三卷中将涉及到对“一战”士兵士气所作的杰出研究，那时我将对这些强制性措施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

参考文献

Albertini, L.1952.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Vol.I.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M.1988. War and Society in the Europe of the Old Regime. London: Fontana.

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1913.

Axtmann, R.1991. Geopolitics and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s: The State Police and Public Order in Austria and Irelan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Ph.D.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Berryman, S.1988. Who Serves? The Persistent Myth of the Underclass Arm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Best, G. 1982. 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70—1870.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Bond, B. 1972. The Victorian Army and the Staff College, 1854—1914. London: Eyre & Methuen.

1984.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870—1970. London: Fontana.

Bosworth, R.1983. Ital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London: Macmillan.

Brewer, J.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London: Unwin Hyman.

Brodsky, G.W.S.1988. Gentlemen of the Blade: A Social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Since 1660.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Cecil, L. 1976. The German Diplomatic Service, 1871—1914.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D.1966.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New York: Macmillan.

Charle, C.1980a. Les hauts fonctionnaires en France au *XIX* ièm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80b. Le recrutement des hauts fonctionnaires en 1901.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no. 2.

Corvisier, A.1964. L'armée francaise de la fin du *XVII* ième siècle au ministère de Choiseul: Le soldat.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raig, G.1955.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andeker, C.1989. Surveillance, Power and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Press.

Deak, I. 1990.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meter, K. 1965.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in Society and State, 1650—1945.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Dupuy, R.E.1971. The National Guard: A Compact History.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Elias, N.1983. The Court Socie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Emsley, C.1983. Policing and Its Context, 1750—1870. London: Macmillan.

Floud, R., et al.1990. Height, Heal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Giddens, A.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rardet, R.1953. La société militair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815—1939. Paris: Plon.

Goldstein, R.J.1978.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Moder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1983.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Gooch, J.1980. Armies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urr, T.R., et al. 1977. The Politics of Crime and Conflict: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Four Cit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Hall, R.H.1963—4. The concept of bureaucrac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

Hampson, N.1959. La Marine de l'an *II* : Mobilisation de la flotte de l'Océan, 1793—4. Paris: M.Rivière.

Harries-Jenkins, G.1977. The Army in Victoria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erwig, H.1973. The German Naval Officer Corp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ilderbrand, R.C.1981.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Hill, J.D.1964. The Minute Man in Peace and War.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Guard.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Holsti, K. 1991.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 lchman, W.1961. *Professional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nowitz, M.1960.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New York: Free Press.

Jany, C.1967. Geschichte den Preussischen Armee, 4 vols. Osnabruck: Biblio Verlag.

Kann, R. 1979. The social prestige of the officer corps in the Habsburg Empire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1918. In War and Society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Vol. I , ed. B.Kiraly and G. Rothenberg. New York: Brooklyn College Press.

Karsten, P. 1972. Naval Aristocracy: The Golden Age of Annapoli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Nav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Father's occupation of West Point cadets and Annapolis midshipmen. In *The Military in America*: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 ed. P.Karsten. New York: Free Press.

Kennan, G. 1984. 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Kennedy, P.1985.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London: Fontana.

LaFeber, W.1987. The Constitution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Langsam, W.C.1930. The Napoleonic Wars and German Nationalism in Austr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febvre, G.1969. Napoleon: From 18 Brumaire to Tilsit, *1799—180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udtke, A.1989. Police and State in Prussia, *1815—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ynn, J.1984.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acartney, C.A.1971.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cNeill, W.1983. The Pursuit of Power. Oxford: Blackwell.

Martel, G.1985. Imperial Diplomacy. Rosebery and the Failure of Foreign Poli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Palmer, A.1983. The Chancelleries of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Parsons, T.1964. The profess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hi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rev. ed. Glencoe, Ill.: Free Press.

Poggi, G.1990.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orch, D.1974. Army and Revolution. France, *1815—184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The March to the Marne: The French Army,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eradovich, N. von.1955. Die Führungsschichten i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1804—1918*. Wiesbaden: Steiner.

Razzell, P.E.1963. Social origins of officers in the Indian and British home army: 1758—1962.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4.

Riste, O.1965. The Neutral Ally: Norway's Relations with Belligerent power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llen & Unwin.

Ritter, G.1969. The Sword and the Sceptre. Vol. I : The Prussian Tradition, *1740—1890*. Coral Gables, 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Robbins, K.G.1977a. The foreign secretary, the cabinet, parliament and the parties, and

1977b. Public opinion, the press and pressure groups. Both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Sir Edward Grey, ed. F.H.Hins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dger, N.1986. The Wooden World, London: Collins.

Rohl, J.1967. Higher civil servants in Germany, 1890—190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

Rothenberg, G.1976.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78. *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Napoleon's Great Adversaries: The Archduke Charles and the Austrian Army, 1792—1814*. London: Batsford.

Runciman, W.G.1987. The Old Questio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9.

Scott, S.1978.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rman, S.1978. Le corps des officiers francais sous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et la Second Empire. Thesis, University of Lille Ⅲ.

Skelton, W.1980. Officers and politicians: the origins of arm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In *The Military in America: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 ed. P.Karsten. New York: Free Press.

Steiner, Z.1969. *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 189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iner, Z., and V.Cromwell.1972. The Foreign Office before 1914: a study in resistance. In *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 Century Government*, ed. G.Sutherl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tephens, J. 1989.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breakdown in Western Europe, 1870—1939.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trachan, H.1983. *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 London: Allen & Unwin.

1984. *Wellington's Legacy: The Reform of the British Army, 1830—54*.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Teitler, G.1977. *The Genesis of the Professional Officers Corp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Tilly, C.1982. Proletarianization and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in East Anglia and elsewhere, 1500—1900. *Peasant Studies* 10.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Tilly, R.1971. Popular disord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a preliminary surve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

Vagts, A.1959.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Glencoe, Ill.: Free Press.

Wildman, A.1980.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V.1972. *Le conseil d'état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Colin.

第十三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三)：官僚机构化

在对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官僚制度”一词无处不在。然而，它很少有明确定义，并且经常被误用。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从韦伯开始，社会学家们就经常精确地使用这个词。韦伯(1987：Ⅰ，220—221)给官僚制度划分了十个构成要素：

1. 官员是自由的，仅在公职工作中服从于权力。
2. 官员被组织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公职等级制度中。
3. 每一种公职都有一个明确界定的权限范围。
4. 所有公职都通过自由签约来担任。
5. 对公职候选人的选择是根据资格，通常是考试和技能培训。
6. 支付官员以薪金并给予养老金。
7. 公职职责是政府任职者唯一和首要的工作。
8. 公职成为一种职业，包括被上级提升或因业绩而晋升。
9. 官员与行政手段的所有权相分离。
10. 在工作中，官员的行为要服从组织纪律和组织管理。

这的确比我们所需要的更详细——并且在对现代公职方面的研究表明，这十个构成要素大多是密切相关的(Hall，1963—1964)。为了进行宏观的历史性概括，我已将韦伯总结的十个要素简化为五个主要特征。其中，两个特征是关于全体官员的，两个是关于公职结构的，还有一个表明他们与广大社会关系的特征：

被称为官僚的官员，(1)由于处于受雇用和拿薪金的地位，而与官职

的所有权分离。(2)是根据客观的能力标准被任命、晋升和解职。

官僚制度的公职是(3)被组织在各部门之内，每一个部门都实行集权并体现着劳动力的职能划分；(4)各部门联合成一个综合的政府，这也体现着对劳动力的职能划分和中央集权等级制。

最后，官僚制度的先决条件是(5)从关于社会准则的广泛社会斗争中隔离出来。韦伯认为官僚制度受“形式上的”或“作为手段的”合理性所支配，从包含在政治和社会准则中的“本质上的”合理性中分离出来。各种官僚制度在贯彻来自自己政府以外的实质性目标方面是有效的。如果一个政府引入实质的或价值的合理性以及政党斗争，那么它将会融于社会之中，进而减少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官僚制度以行政管理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为先决条件。

这五种主要特征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每一种特征都可以在没有其他特征的情况下出现——尽管特征(1)不可能脱离特征(2)而存在，并且特征(5)往往是以其他特征为先决条件。所有政府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官僚主义性质，但是成熟的官僚制度要求五个特征同时具备。它也是一种普遍的、全国统一的民政类型。官僚机构化已伴随并鼓励了民族国家的成长。

假如现在西方国家大多是官僚政治，那么这一章依据经验提出两个简单问题：这些国家何时实现了官僚机构化，并且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声明，在这里我不是要对这些问题给出完全独创性的答案，确切来说，我是综合了现存的研究文献。众所周知，许多国家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实现政府的官僚机构化，但是就我所提到的五个国家而言，它们当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被证明是某一方面的先驱，因为它们都对社会权力根源纠缠在一起的现象作出反应。然而，官僚机构化仍是不完善的(正如它今天依旧不完善一样)，特别是在政府的最高层。正如军队中，官僚机构化和官员的社会身份互相约束，因而在国家政府中产生了一个双重性的形式：作为“精英”政府，它是温和的专家治国的官僚主义；作为“政党”，它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政策。国家仍未实现中央集

权制。

旧政权的行政管理

正如第十二章所示，官僚制度主要是通过国家武装力量进入政府的，在出现文官政府之前，国家已基本上完全实现了官僚制度化。到1760年，军事改革冲击着文官政府，尤其是在海军的后勤部门和财政部门。然而这并未走得太远。在18世纪的文官政府中，“雇佣”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那时存在着五种担任官职的情况和四种酬劳方式。

官职的担任：

1. 世袭的所有权主宰了最高层次官职的担任——当然这由君王来决定。高级官职可以直接传给男性后嗣。除了皇室家庭成员和宫廷侍女，这一时期高级官职没有女性担任。

2. 官员可以被推选出来，通常由与他同等地位的人来推举，任期终生或有一个固定的期限。

3. 官职可以贿买。根据严格的法律，这些官职很少能传给后嗣，但实际上，经常成为世袭的，与第一类情况很难区分。

4. 通常行贿与更高一级官员搞好关系，从而可以通过他的任命权获得官职。所有权归庇护人而不是真正担任职务的官员，他可能被解职，这取决于庇护人的意愿。

5. 以现代的方式，如能力或经历等类似的客观标准来获得和解除官职，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人能占有它。

酬劳：

1. 许多官员没有正式的酬劳，而是依据他们的社会地位来履行备受尊重的职责。

2. 官员享受官职的报酬，也就是适当的酬金和由职务所带来的

津贴。

3. 薪水不直接付给从事公职工作的人(正如现代的模式)，而是付给一个领干薪的庇护人，然后由他雇用并付薪给一个代理人去做公职工作。

4. 按现代社会的方式，薪水是直接付给担任官职的官员。

担任官职的情况和酬劳之间有许多种结合的可能，尽管有几种结合占有优势，仅有一种结合方式——财产所有权、只拿薪水、真正从事工作的官员——才能被认为是潜在的官僚，因此他们是18世纪中期国家行政官员中地位卑微的少数派。其他结合方式则嵌入了某些具有排他性、分散性和部门性行政控制的形式。正如韦伯所注意到的，官僚制度以官员与其行政手段相分离为先决条件(他采用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由于政府的官僚化，行政官员不可能从自己的决议中获益，他们必须受行政等级制的控制，如果不遵循客观的行政准则，那么他们一定会被免职。在18世纪这些条件无法实现，因为行政官员或他们的庇护人"拥有"公职并可以从中获利。所有者及庇护人的财产权阻碍了国家政府的中央集权化、合理化和独立性。

照我们看来，他们的权力像是"腐败"——并且它们最终被认为是腐败并被废除。但在18世纪，这样的权力构成了一种"行政代表制"，通过允许统治阶级的区域性政党来分享国家政府的控制权，以限制皇室的专制主义。在英国和荷兰，刚刚萌芽的政党民主不仅仅意味着议会；而且在专制主义的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官职所有权是对集权化专制统治的主要限制，同时减少了国家自主权。事实上，这使它很难像一个运作者那样去谈论"国家"。旧政权的官员较深地融入市民社会。

随后，出现了两种改革的努力，第一种是来自专制主义，第二种来自于对公职的民主拥有倾向。它是对代表制进行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重新定义。

第一阶段：王朝的君主政体和战争，1700—1780 年

现代官僚制度的第一代铺路人是王朝的君主们，在形式上他们高于自己军事和民事权力中的区域性社会。 皇室家庭和私人领地的政府实际上是属于君主的，现在君主也无可争议的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 国家精英作为一个“它”，一个运作者，潜在地存在于名流显贵的随从、朋友、亲戚以乃君王的侍从之中。 这个“它”仅仅构成君主政体核心中的一小部分，而不是整个国家的一小部分。 君主政体核心之外为由贵族、高级牧师和地方显要组成的政党，它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行使着有效的自治权。 专制暴君的实际权力受到软弱无力的基础结构权力的限制，其特征为依靠区域的——有时也是中央的——拥有公职的行政官员，王朝君主制定型为双重性的：作为宫廷及政府中的派别主义和阴谋诡计，实行中央集权的王朝和行政权力分散的旧体制政党都已过时。

由于原因略微不同，两个最不具代表性的政权，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发起了 18 世纪官僚制度的攻击。 其他的德意志各邦、瑞典和俄国也加入其中。 第一次主要倡导国家改革的思想运动，即财政学派，主要出现在信奉路德教的北德意志地区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奥地利各所大学中(Johnson, 1969; Raeff, 1975; Krygier, 1979; Tribe, 1984, 1988)。 在整个 18 世纪，财政学者们发展了一种“行政科学”。 他们通过论证认为，政府各部门(Kammer)应该实现中央集权化、合理化，通过系统收集统计资料来获得信息，并服从于普遍的行政和财政规则。 这将更好地实现三个政治目标：提供良好的秩序，鼓励臣民(而不是公民)的经济活动，并且例行抽取他们的财产收入作为国家岁入。 他们最喜爱的比喻就是：国家就是一台机器。

一个结构良好的国家必定与一台机器极为相似，在这台机器

中，所有的轮子和齿轮都能精确地互相调整；而管理者一定是工头，是主要的动力，或是灵魂……，这调动了一切。(贾斯蒂，一名财政主义者，由 Krygier，1979，p.17 引证)

18 世纪早期的财政学者都是法理学家、大学教授和知名的行政官员或其顾问，他们强烈要求君主废弃允许地方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政策。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官僚们”(约翰逊的措词)后来卷入了中欧的开明专制主义，要求实行大规模的国家改革。反教权主义也成为奥地利财政学派的特征。到 1790 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中有三十多名财政学派的教授任教，并出版了大约六十部关于这一问题的教科书。此后，在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者的影响下，财政学衰落了(Tribe，1988)。处于“现代化”理论中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阶段的中欧为英国的资本主义阶段奠定了基础。

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国家比西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王朝化，并更隔离于市民社会。它是一个庞大的联盟，其中，皇家中央政府和军队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等级，与许多省及历史上著名的王国中的统治贵族等级和权力行政机构相分离。正如第十章所示，哈布斯堡家族创造了一个勒索保护费的勾当：各省同意哈布斯堡的专制统治以避免潜在的更糟糕的其他人或相互之间的专制主义。皇室核心是一个中立的“它”，代议制的公职担任使之相对不受约束——在这个天主教国家中许多官员和军官是“中立的”外国人和新教徒；后来，许多犹太人担任了官职。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的后果之一就是突然发生了重要改革。周围的强国都企图瓜分由一个女继承人玛丽亚·特里萨登基统治的哈布斯堡家族领地。面对可能被瓜分的局面，精力充沛的女王被迫依靠她的核心皇室，在财政学派和普鲁士军政府提供的联合模式下，节约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库资源。她的高级官员们尤其受到普鲁士军队观点的驱使，普鲁士军队从西里西亚抽取双倍的岁入，他们已在 1740

年之前就这样做了，当时西里西亚已是奥地利的一个省(Axtmann，1991)。奥地利军队最终服从于君主并且职业化。大部分高级皇室官员开始领取薪金，他们的退休金被转化成为一种单一的合理化退休基金，这一措施比其他地区采取得都早。从1776年起，高级官员必须出示学过财政学派的证明，大学和报刊实现了自由主义化和世俗化。大部分主要的政府部门——特别是维也纳城市银行(事实上的国库)、矿业和铸币部门，以及财政部(核心部门)——现在成了官僚组织。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表格11．7所展示的奥地利早期的人口普查统计资料中。

然而，奥地利的官僚机构化受到两方面的限制。首先，个别部门没有被并入一个单一功能的等级制度的结构中。与更早时期集中于宫廷的国家机构并存，这些机构中没有独立的持久内阁，没有有效率的首相，反而是许多委员会和大臣们为了接近君主和影响宫廷而进行竞争。君主政体、宫廷、教会、高级军官和行政官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我们甚至可以将他们认为是国家精英，如果难得这是一个统一体的话。但是奥地利国家不是一种独立的官僚政体。它是一个君主政体。它的所有目标都是通过相互贯穿且政党渗入的政府来实现的。

其次，在政府中，仅仅是在中央皇室等级的特征中具有这种部分的官僚机构化，主要在维也纳，其地位高于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等区域性的行政机构，这些区域性行政机构的公职或是由社会阶层选举或是被地方贵族和教会中较高职位的人所拥有。正如表4.2所指出的，皇室行政机构比国家更缺乏地方性的基础权力，政府官员嵌入得更深。玛丽亚 · 特里萨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这个欧洲最大的帝国中，野心勃勃地实施了“开明”计划，但他们不可能使之制度化。约瑟夫二世有意识地与地区性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主张进行艰苦的斗争，但他失败了，匈牙利贵族和低地国家的贵族、商人和教士以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自由权和代表特权为名义发动反叛。当约瑟夫将他们推得太远时，这两部分人便开始与普鲁士谈判(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勒索保护费的行当)，约瑟夫的继任者利奥波德，恢复了他们的特权和官职。开明专制主义

回缩到首都地区(Macartney，1969；Beales，1987；Dickson，1987；Axtmann，1991)。一个独立自主并奉行原始官僚制度的18世纪国家，其基础结构是软弱无力的。奥地利没能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实行官僚机构化和现代化。

普鲁士政府几乎是一成不变地(尽管这毫无帮助)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官僚”制度，我主要依据他们对帝国的研究。普鲁士的皇室国家核心也明显地向官僚主义的人事制度转变——再次是由于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普鲁士，改革者与其说是财政学派的，不如说他们更多的来自军队。正如普鲁士在中世纪王朝战争的考验中获胜一样，一个不断膨胀的军事财政政府包围着皇室领地、王室特权(铸币厂和矿业)、社会阶层以及城镇居民。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统治下，一个由四名部长组成的总税务代表管理机构监管地方中负责战争和领地的部门，监督税务长官和地方官员(县长)。一名部长的名言是：“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国家是这支军队的司令部和粮仓。”(Rosenberg，1958，p.40)

因此，1750年以后，很少存在拥有公职的现象。中央和区域的高级官员领取薪金和退休金并且由君主任免。在财政学派影响下，18世纪30年代末，就开始了对法官的培训和考核。到1780年，法官必须得到大学的法学学位，经历两年在职训练，并且还要通过一次考试(Weill，1961；Johnson，1975：106—133)。参加任职考试的要求在1770年到1800年之间扩展到高级行政机构。大学学位成为正常的资格要求，它赋予行政人员一种“全国性”的文化内聚力——大学是“德国人”身份的主要标志。1794年的法律条文强调了所有这些资格要求，并承认行政人员的合法任期应视他们履行其职务的能力而定。他们现在不被称作皇室臣外，而是“国家的职业化行政官员”(王国的公职人员)。他们是真正的官僚，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官僚主义的铺路人，普鲁士已超越了奥地利。在“全国性”官僚制度方面，普鲁士走在了前头。

然而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化也是有限制的。如同它的前辈即军队一样，它是旧政权的定型，这是因为它是贵族，尤其是容克贵族相妥协的产物。正如表4.2所示，普鲁士国家的基础结构是有效的，因为它主要协调了国家精英和来自统治阶级各政党之间的关系。随后而来的是国家现代化和资产阶级扩张的紧张形势，直到19世纪20年代，少数贵族才进入大学，人们公开承认在接受私人教育、“有实践经验的”显要官员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富有平民及“国家”官员之间存在着冲突。君王在他们之间操纵着，既唯恐受贵族的过分控制，又担心官僚特权阶级的威胁。在普鲁士(随后在俄国)，旧政权和殷实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发生在国家政府的机构以内。

普鲁士人的斗争成功地实现了妥协。资产阶级的专家得到承认并且贵族开始接受教育。大多数高级文职和军职官员仍是贵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00年前，陆军、海军和民政部门的大规模扩充，当时贵族最终无法提供足够的后裔来任职(Bonin， 1966； Koselleck， 1967：435； Cillis， 1971， p.30；第十二章中所叙述的军事资料)。事实上，随着容克阶层丧失了其经济力量，他们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机构中的职业(Muncie， 1944)。考试也只是一种资格认证而不是竞争。高级官员可以选择推荐那些他们所喜欢并已通过考试的候选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行政机构仍陷于旧体制中。因此，行政人员虽然是为国王服务，但也拥有自己阶级授予职务的独立性。像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官员一样，他们通常选择不执行他们所厌恶的命令(Blanning， 1974， p.191)。

普鲁士的民政机构也是作为军国主义定型的。行政官员身穿制服并被授予正式的军衔。军国主义也扩展到中、低阶层中(Fischerand Lundgreen， 1975， pp.520—521)。陆军的动员依赖于一支强大的受地训练的后备役军队，尤其是军士。在战争结束后如何安置这些老兵，并如何为了下次战争而有目的地留住他们？甚至在18世纪，霍亨索伦王室就敦促大臣们建立一种由国家雇用退伍老兵的方式。作为城市审计员、工厂监察员、警察、小学教师甚至是牧士和以后的铁路雇员，老兵

都受到欢迎。从1820年起，假如有文化并且有计算能力，所有服役九年的军士都可以要求提升到行政机构，从事办事员和会计工作。此后，奥地利对那些服役十二年的军士作出此项担保，法国则在1872年将类似惯例写入法律条文。20世纪德国许多有关纪律和处罚的规则和行政机构法规，甚至将高于一切社会秩序和实施这一措施的军队视为首要地位。军事管制法保留了普鲁士德国政府一种长久存在(Ludtke, 1989)。

旧体制和军国主义这两种国家形式，赋予行政机构一种与众不同的"普鲁士"特征。这两种形式增强了对政府彻底控制。这与其说是通过韦伯的合理会计做法，不如说是通过集体精神和惧于惩戒的结合。这种结合方式是有战斗力的军事贵族的标志。这个现代政府就被传统阶级和各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所渗入。

对普鲁士官僚政治的第三个限制，从相反方面起作用，这减少了国家同质性。正如奥地利一样，普鲁士也没有成功地合并各个不同的行政部门。在各部门中出现了等级制度、阶层和职业结构。但部门之间的关系仍十分混乱。总理出现于战时遇到的一次入侵的危机。它的一部分大臣具有地方性的权限范围，另一部分有职能性权限范围。最初他们都位居皇室枢密院，但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下，这一机构被废弃了——腓特烈想将权力集中于他一人之手，而不是由大臣们来掌管。他的部门性分而治之政策减少了官僚机构化并使任何一个可能组织力量与他相对抗的首相被挫败(Anderson and Anderson, 1967, p.37)。所谓的内阁不是大臣委员会，而是与大臣维持独立联络的宫廷顾问们组成的顾问班子。随着普鲁士的扩张，新的机构沿着旧的部门激增：

> 五个主要的官僚制度按不同目的而运行，它们相互对抗并且只承认国王是它们共同的主人……1740年以后，独立的官僚机构不存在了，机构职能没有被逻辑地划分并分配给那些处于官僚等级制度中的人们。普鲁士政府变得越来越分权下放……被分成

相互对抗的几部分。(Johnson，1975，p.274)

行政机构混合了两种责任原则，一种是官僚集团做出共同决定的原则，另一种是受到大多数改革者支持的“一人决定原则”。普鲁士政府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中央集权化的。在它的高层，它融入了一个以君王为中心不愿放弃分权的贵族宫廷。大臣们，甚至在有了总理一职后的历届总理都依赖于宫廷阴谋和正式的行政职务来施加影响，其目的就是直接可靠地接近君王。专制主义仅是一种虚构的君主统一。尽管其官员是雇佣身份，但它也不可能是官僚政治。

然而奥地利和普鲁士国家是18世纪最具官僚制度(主义)的国家。两个国家都各自通过进一步的自治增强了王朝的君主政体，这种自治权来自奥地利的王朝联邦主义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法国尽管在形式上是专制主义国家，但并未如此孤立。几个世纪以来对地方贵族和共同团体的特权所做的调节甚至已融入到市民社会中的最高层，嵌入到一种仅仅能被描述为独特的腐败和“代议制”的专一形式中(Bosher，1970；Mousnier，1970，p.17；Fischer and Lundgreen，1975，pp.490—509；Church，1981)。

法国存在两种主要的雇佣状况。大多数行政人员被称为官员，通常是拥有通过花钱购买而得到的官职，他们的财产权受到法人团体的保护。少数人被称为“委员”，是领薪并实际工作的雇员。随着委员们对所有权的追求以及国王为减少贪污贿赂而进行的斗争，这两种雇佣地位之间的界限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到18世纪70年代，在法国有五万名拿薪并可免职的行政人员，大多在政府各部、海关和邮政局工作。他们身份低于行政官员，通常是从属于官员。尼克尔(1784)估计，仅在法庭、市政机构和财政机关就有五万一千个可贿买的官职职位。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加上以下几个可贿买官职职位的部门：皇室家庭、包税、其他国家和政府机关开办的金融公司，以及由行会监察员、督察员和执行官——甚至假发经营者来掌管的办事机构。泰勒(1967，p.477)和多伊尔

(1984， p.833)估计这些人总共占成年男子的 2%—3%——大约有 20 万人。 我们应再加上内克尔所估计的，在 21.5 万兼职国库岁入收税员中的大约 10 万人(其他职位可能被算入上文提到的可贿买的官职中)。 这些职务中有些是贿买的，有些是领薪的。 我妄猜一下，在这些官员中至少有 20% 是领薪的官员。 但这仅仅是一个猜测，因为没有人知道——哪一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发现(正如我在第十一章中更普遍地注意到的)。

在任何一个部门中，对于任命或晋升都不存在客观管理。 大多数高级官员都预先受过法定的培训，但这对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都是很正常的，它不是行政技能的培训(这在普鲁士也是行政技能的一种部分的训练)。 根据我们用韦伯的两个人事标准分析，法国行政人员中大约 5%可被称为官僚。 法国充斥着私人和团体财产权，并彻底地植根于市民社会中。

在各部门内部及部门之间，各种机构也没有多少官僚组织。 在关键的政府部门，从 18 世纪 70 年代开始等级制度就已发展，包括薪水的级差和职务的高低。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部门以及其他无法控制的地方，正如它们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上所做的那样，所有权超越了信息和管理的等级及职能界限，法国政府混合了集体管理和个人主管的形式，但随后二者都夭折了。 旧的行政法院已分成各种专门的立法委员会，部分委员会并入宫廷法院。 正如大多数国家一样，财政大臣已成为关键性官员。 但是他在顾问委员会和宫廷中却没有特殊地位，并且他甚至几乎无法对漫无条理地发展的财政机构行使权力。 在地方省份，他们更多地依赖一个个地方行政长官和他那一小撮职员的能力，但是他们必须与地方贵族友好协作，充满了专一特权。

改革者们知道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的政府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法国启蒙运动是在财政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提出了更具危险性的政治要求)。 在大臣当中如尼克尔，都有庇护人，他们计算人数和费用，消除大臣的贪污腐败，并且试图整顿主要的行政局面(没有

人能了解全部，更不用说改革)。但他们的进展，正如尼克尔所承认的，是有限的：

> 副代表、通过选举当选的官员、管理人、二十分之一税的收缴和管理人员、租税的收税员和国家特派员、盐务税官员、督察员、递送传票的司法人员、徭役工头、间接税的代理人、审计官、后备税官，所有这些皇室国库人员，根据各自特点，每个人都克制他那小小的权威并将无知的纳税人纳入他的财政学，这些纳税人不可能知道是否受到欺骗，但是却不断怀疑并担心这一点。(引自Harris，1979，p.97)

20世纪的主要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旧体制从未有过预算案，从未有过立法条例来预见并认可某一特定时期内收入与支出的总数……它仅了解破碎的不完整的国家"(Marion，1927，Ⅰ，p.448)。

许多历史学家被吸引去用"官僚主义"这一措词来描述这个国家，我认为这一点是异乎寻常的。例如：哈里斯将皇室总包税区——它是将占有的公职作为私有财产和利益的标石——称为"巨大的官僚机器"(1979，p.75)。在旧体制的法国几乎不存在官僚制度的痕迹。

王朝主义经历了某种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但在普鲁士特别是奥地利，政府机构仅仅与最高的皇室层次上的各个阶级隔绝开来。从总体上说，这似乎并不比旧政权控制下的政党统治更重要。这种旧政权是带有重要政治性的阶级和融合官员的联合，这在法国尤为显著。在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我们也发现了高度融合的旧政权——但存在于一个萌芽时期的政党民主中，它包含各种议会政党派别以及腐败的官员。这种结合体产生了一种与普鲁士一样具有内聚性的英国政府，但英国远未官僚机构化(对于英国与普鲁士的比较，参见Mueller，1984)。

大约1800年，在英国，那些抽取职务薪水和收益并雇用代理人来做实际工作的领干薪的人，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拿薪水并亲自工作的

高级官员。事实上，国家财政部所有的三百个职务全部是由代理人担任的(Binney，1958：232—233)。在海军部，财务大臣任命并付薪给自己的军需官，让他来做自己的工作，甚至在付清所有的部门支出以后，两名负责预付薪金的审计官员还保有自己原本就相当优厚的薪水的大部分(每年超过16 000英镑和10 000英镑)。据1780年的公开揭露，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财务大臣和审计官员从未真正介入过其部门的工作。在国务大臣的办公室，甚至办公室的清洁工都是另外雇用他人(Cohen，1941，pp.24—26)。在英国，除了在海关和税务局以及技术性的海军部外，对于官员晋升既没有正式的标准，也没有对预先资格和考核的要求。他们甚至将资助人也正式写入推荐信(Aylmer，1979，pp.94—95)。

在部门之间甚至是在部门内部都不可能有中央集权化的指挥系列。在每个层次级别上，它都被职务的自主财产权所挫败。但在18世纪情况发生了转变。在代表国王的上议院中，首席财政大臣逐渐成为“首相”，接着是两名主要的国务大臣和地位较低的大臣们以及控制特定部门的委员会。然而国王和议会两院的成员都有独立发挥自己影响的途径并拥有在各部门授予官职的权力。

> 公共事务是在若干个或多或少有些独立的部门中处理的，即无人监督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无人监督他们的支出细节……首席财政大臣不能对政府任何一年的费用支出作一个尚可过得去的猜测。(Cohen，1941，p.34)

直到1797年，从未试图对官员数目进行统计。

正如在法国，“贪污腐败”是受到坚决维护的。而在英国，则是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性腐败，因为它的根源来自议会中的国王和大臣们。腐败给业主和庇护人带来回报，但它也保证了皇室政府只能通过有产阶级的“第一国家”政党来发挥作用。政府并不与政治和阶级隔离。腐败而特殊的“代议制”对于后来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农业社会是十分适

合的。一方面，它们缺乏交流和政党纪律，这在以后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增强了议会代议制；另一方面，它们的人口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超出了控制，这种控制来自皇室顾问班子或从议会辐射下来的排他性家族网络。在法国，行政代议制产生了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但在英国则产生了高效的行政机构。事实上，直到18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从未发生改变，尽管市民社会产生了惊人的变化。

然而，英国的官僚却活跃起来，当时国家的军国主义使国库财政压力逐步升级——首先是在海军的技术部门(而不是在更贵族化的陆军)，接着是在海关和间接税务局。布鲁尔(1989)指出，间接税务部成为第一个由国家高级官员直接掌管的民政机构。一个“原始组织图表”中包含了四千八百名职员，他们大部分是领薪俸的(尽管这一用图表的表现手法当时还未发明出来)，体现了职能和等级上的联系与控制的正式途径，提出了正规的书面报告，事实上是实现了可预见的税收(这在18世纪是不同寻常的)。这与执行历史悠久的土地税的腐败政府形成对比，同时也冲击着财产所有者，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而精心策划了对官职的控制。间接税由异常高效且存在着专制暴君的国家即克伦威尔的共和国所采用。尽管在本质上存在争议，但间接税的征收并未在旧政权中造成太大痛苦。它是从商业上的超额利润和无权势的穷苦人的消费中征收的税额——它为有利可图的全球扩张提供了资金。然而间接税务部是一匹潜在的特洛伊木马。在18世纪80年代，到极力主张议会调查代理权的改革者们对它的官僚制度模式大加称道。

现在官僚政治存在许多外部压力。同时，更为矛盾地是对于全国政府也存在许多外来的压力。第四章用图表表明了一个猛烈抨击浪费和腐败的全国性“经济改革”运动的发展。这取决于两种刺激力量。首先，正如其他国家那样，这来自于现代战争的财政压力。由于七年战争创造出这次改革运动，它是英国迫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压力第一次进行的真正改革。其次，这次运动与旧政权的“在野党”以及正在形成的“受排斥的”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全国性联盟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互共

鸣。这一联盟的形成更多地归功于商业资本主义以及此后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弥散。它的高效行政机构理论也是归功于此。功利主义与财政学派不同：它的合理性是形式和系统的并且偏离了中心，被市民社会中各种潜在的关系原则所控制，不太需要国家权威性的指导。我在探查着那只藏在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背后的"无形之手"所产生的影响。

我已将国家现代化和官僚机构化的第一阶段用图表表示出来，这是针对那些可统计的、亲自工作并领取薪俸的合格官员以及各部门职务和等级的合理化。到目前为止，官僚制度的第四、第五个标准几乎没有变化，这两个标准使不同的部门相互结合，使党派政治与行政机构分开。主要的改革来自似乎不那么"现代"的权力关系方面。早期的改革运动产生于最缺乏代议制的君主政体中。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专制王朝，几乎不具备商业、工业和都市化(Aylmer，1979，p.103，也注意到的一样)。王朝主义可能是一个"它"，一个孤立的、实行中央集权的运作者，它有能力借助于一种自觉的行政科学来整顿"自我"。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王朝主义都由于联盟和军国主义的定型而得到增强。与之相反，处于(萌芽期的)政党民主的英国，政府是皇家的并且是带有鲜明特点的——中央集权化的和权力分散的；议会也是如此，在宫廷党派和农民党派之间，官员和郡县的缙绅之间有分化。任何改革都必须得到两派的同意。然而，由于它们历史性的妥协而使腐败制度化，可以从专制政府中收买王室有权势的人物和显要的特权。在这个方面，法国政权虽然在形式上是王朝制的，但其政权的融合和"腐败的代议制"几乎是一直达到最高层，这与英国极为相似。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王拥有高级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属于他们自己并需要实现现代化。在这两个国家中，可以考虑采用财政学，但在英国却不行。事实上，世袭君主仅能通过与贵族和教会的妥协而渗透入它们的领域，并融入到区域性行政机构中。但是，不像在英国(或其美洲殖民地)，没有人怀疑君主拥有支配他或她自己的权力。

对于改革，世袭君主也受到地面战争压力的驱使，这一点在中欧表现得最为严重。军国主义财政和人力的过度滥用推动了国家现代化的节奏；军事财政机构首次被合理化(普鲁士人的司法部，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外，是与军事机构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提供了一些组织化模式。在法国也感到了压力，但是政府没有能力使军事改革深入到财政部门，当拿破仑战争最终将类似的军事—财政负担带到英国时，改革也即将到来，并通过类似的部门程序进行。

因此，官僚机构化的第一阶段与其说由“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引起，不如说是由各国传统的军事体制引起的。这在最不具备代议制的君主制国家中能最强烈感受到。有一个例外：英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实施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是不成功的。官僚机构化主要是来自旧的君主政体和军事化国家，而不是来自新的市民社会，它的限制主要是产生于国家矛盾，与合理的行政机构相对的是部门性的分而治之以及来自贵族而又依靠贵族的自治权。

第二阶段：革命、改革和代议制，1780—1880 年

在这一时期，国家现代化转入了这样一个轨道，它主要由政治上的代议制和革命党人领导的全国性公民权的斗争来界定的。美国独立战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1]随着独立的获得，美国就不能回到“旧式腐败”。通过使州变小并对当选的政体负责，将会避免专制主义。原则上，国家的合理化首次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联邦主义者也沉浸于财政学派，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的理想之中。亚历山大 · 汉密尔顿是一个废寝忘食地读雅克 · 尼克尔著作的人(McDonald，1982，pp.84—85，135—136，160—161，234，382—383)。欧洲的意识形态共同体跨越了大西洋。

美国宪法主要发展了我所定义的官僚机构化的五个标准中的四个。

尽管这仅仅是在联邦的层次上，从 18 世纪 80 年代末到现今，所有联邦官员都是领薪俸的。 每一个部门都通过等级制和职能实现了组织的合理化。 在权力上实现了汉密尔顿所鼓吹的一人原则。 等级制的最顶点是三个部长(财政部长、国务卿和陆军部长)，此后又加上邮政部、海军部长和司法部长。 这些部对财政部负责，并在总行政官即总统的领导下在内阁碰面，他们必须向总统和国会递交书面报告，他们还从下属部门收取类似的报告。 除了总行政官仍是首席政治家以外，形式上的权力分割将政府与政治分开。 反之，州和地方政府设想出了更加融合的行政机构。 但在联邦层次上，美国政府机构则是被设想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官僚制度，在世界上至少有五十年内是官僚制度成熟的唯一国家。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改革者的国际团体将美国作为他们的理想而大加赞扬。 官僚主义的铺路人已跨过了大西洋。

理论和实践并不总是一致的。 白人的研究表明，早期的行政管理在依靠形式上的等级制度的同时，也同样依赖于庇护主与依附者的关系网。 改革者通过控制会计职能、合同招标和政府赠地的规定，将这些关系网砍除了一些。 1822 年，国会要求各部部长汇报所有雇员的工作效率。 陆军部长列出了他的雇员情况并附上以下的话：

> 部门中唯一无能的职员是亨利上校，他已七十四岁高龄，并且从 1775 年就开始服役。从其年龄来说，没有能力承担高级职员的职责，但是，从他对所有革命事件的回忆来说，他对革命赔款的审查是有用的。(美国国家官方文件，1834，vol. 38，p.983)

也许亨利上校正是部长的叔叔，或许陆军部真的喜欢听他讲关于美国革命的故事。 但部长不得不为他作出解释，可能在其他任何国家部长都不需要这样做。

然而人事部门并未如此实现官僚机构化，并且他们在整个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开始明显地减少了类似的做法。 他们是领薪俸的，但

任命、晋升和解职的标准却含糊不清的。华盛顿除了反对“家族关系、懒惰和酗酒”之外，没有确立任何原则。这已经是进步了。正如芬纳(1952，p.332)具有讽刺意味地评论道：华盛顿的三个标准在英国，后两个不是担任公职的障碍，第一个标准是一种积极的推荐。而正式的担任资格权却被滞后。1818 年，资格和考核才被引入军队，但在 1853 年(除了少数一些会计)仅仅用于行政机构。直到 1873 年它们才实现标准化，并且至 1883 年才得以普及。在良好行为中，职位占有权是早期的准则，但随着著名的政党分肥制的发展而衰落。

所有的总统都会将政治朋友任命到政府中。正如美国的民主化，重要的统治权让步于政党控制的政府公职。从 1828 年到 1829 年，杰克逊在政府所进行的党派清洗中，10%到 20%的联邦官员和 40%的高级官员被解职，这些职务由他所属的共和党中忠于北方者所取代。党派的清洗持续了整个 19 世纪中期，任意授予官职的权力主宰着大部分的州及地方政府。一旦总统所属的政党颠覆官僚政治，国会和司法部就会介入进去。联邦政府被迫将预算案提交给国会任命的委员会，以削弱对财政中央集权化的控制。立法机关负责调节各政党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竞争，为了进一步使政府官僚机构化，立法机关成为了程序上的代理人(Skowronek，1982，pp.24—30)。随着英国持续稳定地改革，美国政府的官僚机构化出现倒退，被商业官僚制度所赶超，特别是在铁路方面(Finer，1952；Yeager，1988)。

联邦政府的落后存在着三方面原因。第一，相对而言，美国没有卷入国外战争并且军事预算较少。在其他国家，军事财政的压力不断地使国家的中央政府扩大规模并趋于合理化。在美国，1812 年的战争的确迫使军队和会计部门组编，但这个幼小的国家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就没有任何大陆敌人。内战大大增加了南北各州的面积，但这仅仅是暂时性的，因为内战的结果毫无异议地保留了联邦。第二，形成了无法预料的特色。在美国，按照宪法，对不断增加的关税岁入实施委托管理。这些岁入的充裕被证明是惊人的，通常有大量剩余，这几乎不

需要那种从理论上讲国会所要求的“高效或节俭的组织机构”。这个国家很少体验到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而这在其他国家则对官僚机构化产生压力。

第三，宪法并未解决两个特殊的政治具体化形式——代议制和民族问题——这阻碍了被视为潜在专制政治的官僚制度。宪法表明同时代的人认识到官僚制度的技术可行性——早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前。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并不需要官僚制度。美国成年白人男子不赞同政府所做的一切，尤其是中央集权政府。政治权力网具体表现为由复杂的政治派别和政党组成，它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宗教信仰、经济部门、地区经济利益和各个州。事实上，美国政治可能经历过如此众多的利益集团的最快激增。为了确保政府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各政党和政治派别限制集权化的国家权力，并且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层次上，使他们自己融入于多重的州议会和政府机构中。

在任何一个单一政党都没有强大到能够控制国家的情况下，选择了“邦联”的解决办法。随着美国政府的成长，它开始被在政府各个层次上实现了制度化的各类政党所分化。因此内战的结果开始了缓慢而且部分地重新中央集权化(仍在联邦宪法的限制范围内)。纠缠不清的阶级政治和地方区域性(以及对奴隶的隔离，宗教等)使这个国家软弱无力，产生分裂，在整个这一时期仅仅实现了较低程度的官僚机构化。

法国是更加野心勃勃的第二次革命的发源地。在1789年8月4日，法国革命党人废除了与“封建制度”形影相随的公职贿赂。他们打算减少官职数量，只保留一群数量较少的领薪俸的核心官员，并将大部分公共职能移交给无薪俸而承担义务的公民。它的合理性如形式一样真实存在，体现了新公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经济都没能从法国大革命和恐怖统治中幸存下来。为了补给军队和城市，为了搜寻反革命分子并贯彻许多新的法律，需要重新创造旧体制国家的大部分机构。它现在是发薪俸的，不允许用金钱购买官职，致力于合理的等级制和职能的原则，并且表面上实行中央集权化。这

些都是主要的现代化形式。但是它缺少目标，也缺乏关于自己利益的现代化主张。

“正如洪水不断泛滥，水会逐渐变浅并混浊，因此，法国大革命衰退并仅仅留下新式官僚制度的淤泥。困扰人类的枷锁被作成官样文章，”卡夫卡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强烈谴责(Janouch，1953，p.71)代表了20世纪对革命遗产的冷嘲热讽——不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胜利，而是国家官僚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成功。奥布赖恩(1990)说，法国大革命没有带来自由的解放，而是导致了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共产主义。斯科克波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它们的中央集权制和合理化。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一个“职业化官僚制度的国家”，它“在社会中大规模地存在……作为一个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仅仅受到权力分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1979，pp.161—162)。梯利(1990，pp.107—114)声称法国大革命为中央集权化的“直接”政府提供了“最惊人的措施”。此后革命军队将此(随地区不同而变化)强加于其他国家。

然而斯科克波对20世纪革命的比较误导了人们，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仅在19世纪末，国家的基础结构权力就已有了很大发展。他们仍受到互相竞争的各类党派相互敌对的国家形式以及市场资本主义(斯科克波，承认这一最终的限制)的限制。如果革命党人夺取了一个20世纪的国家并废除或回避了资本和党派竞争的影响(正如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分子所做的)，他们也许会利用这些扩展的基础结构来大大强化国家专制权力。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革命党人即使夺取了国家政权，也无法掌握这种潜在的权力。

首先，法国大革命拥有第六章中所确定的独特的思想力量。他们宣布了由国家所领导的雄心勃勃的社会复兴纲领，并且他们能够动员起来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同美国人一样，他们已预先了解了官僚制度的国家看起来应是什么样的——借用政府的官僚经济学派的模式(Bosher，1970，pp.296—297)。在炽热的革命气氛中，他们扫清了一些

障碍——一举废除了公职所有权和地区行政机构的排他主义，并以薪水和各种部门正式取代他们。这一点十分重要。正如梯利注意到的，它消除了法国的城镇差别，资产阶级的城镇不再是从属于旧政权的行政城镇。其次，革命党人使政治代议制中央集权化，这样在国民议会和两个主要委员会中，主要派别就能够为整个法国制定立法。毫无疑问，拥有这些权力，它们比旧政权更有能力使国家政府现代化和官僚机构化。它们渴望直接而不是间接地进行统治——并在某些方面，它们确实实现了这一点。

然而，这没有增加整个政府的规模和范围。斯科克波(1979，p.199)用教会对所增加的领薪俸的官员的数据统计，来假设这样一个行政机构的扩大。但是正如表 11.7 和附录表 A.3 所显示的，直到 1850 年以后，公职人员的总体数量才上升到旧政权时的水平。从 1791 年以来，核心的内阁官员并未激增，国民公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引进了薪俸标准和职务合理化。关键的财政部根据职能和等级而进一步完善(Bosher，1970 对之简称为到 1794 年为止的“官僚制度”)。然而这一官僚制度的标准是与党派标准相混杂的。当委员会管理职务资格时，他们坚持要提交一份履历书，其中包括对革命忠诚的证明。

此外，除了在军事领域和反复无常的恐慌统治，革命政府的功绩极为有限。马加丹特(1988)指出它在税务上的无能为力是可悲的。如果一个财政机构设法收到它所需税收的 10%，是否可以称之为官僚制度呢？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见，革命政府被迫——在公安委员会控制下，据说在中央集权化最严重的时候——派出政治上可靠的特使来领导武装队伍，并允许他们更为策略地自由抽取所需的基本供给。通过德·拉·图尔·杜·平夫人(1985，p.202)的回忆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渗透力。在描述过她那散布整个法国的反革命网络后，她评论道，他们的通讯联络竟未被窃听。这一点很奇怪，他们遮遮掩掩地生活在地下室和废弃的农场中，在夜幕的掩护下溜到乡村的信箱发信，然后革命党人的邮政部门——是从旧政权中承袭下来的——做完剩下的事

情。恐怖政治的左派分子并不了解控制邮政部门的右派在做什么。

在督政府和波拿巴的统治下，一旦政治妥协和联合成为可能，斯科克波所强调的一些国家权力就成为现实。政府各部、县长和领薪俸的官员根据波拿巴所制定的《民法典》的客观法规治理法国(Richardson, 1966; Church, 1981)。伍尔夫(1984, p.168)声称，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在官员统计方面处于“不容置疑的领先”地位(尽管我怀疑这一资料的收集是早于奥地利的统计资料)。但它仍缺乏官僚制度化的特征：没有预先规定的客观任职资格标准，没有考核，各个不同部门之间几乎没有联系。部长们不是向国会汇报，就是向波拿巴本人汇报。国会是由不承担行政责任的忠诚知名人士组成。波拿巴采取部门分而治之的君王策略，寻求保证一个统一的官僚政治。他也采用私人金融家包税的安排，这使人们联想到旧政权(Bosher, 1970, pp.315—317)。行政分裂在波拿巴时期幸存下来。夏尔(1980, p.14)叙述道，19 世纪的法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但却存在着多重政府部门。直到 1848 年革命以后各部部长还将自己的任命、晋升和解职标准强加于他们的部门。

这一切中最普遍的是法国在政党政治中融入行政机构的做法：在整个世纪法国行政人员仍分为雇员和官员(Chaple, 1980)，雇员是从旧政权的代理制传下来的，在略带贬意的现代用法中，“官僚”只适用于那些由上层官员制定客观准则的中低级行政人员，它是一种旧政权的官员与革命的公民行政人员相结合(隐喻)的产物。官员和有组织的团体充实着高级行政机构。如军官一样，他们应该表现出为了共同理想而承担起党派的义务。波拿巴试图通过仅从帝国的知识人士家庭征召年轻人，并通过对他们进行服役训练来保证这一点。他的后继者仍使用忠诚者，但也青睐那些受过重点大学教育的多才多艺的杰出人士，并且从 1872 年开始青睐那些毕业于被视为高等专科院校的精英(Osborne, 1983)。学院集团本质上采用了政党合理化，减少了形式上的官僚机构化。

由于 19 世纪的法国政权的寿命没有能超过 20 年的，随着在各行政

部门、县级部门、司法部门和军队任职的高级职员被肃清，行政机构的党派不断变换。正如美国选举所做的那样，这导致了党派分肥制。保皇派知名人士与众议员—官员交换位置(Julien-Laferrlère，1970)。共和派仍然稳固地盘据于地方政府，这导致了19世纪中期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公社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县长通常扮演调停人的角色(Ashford，1984，pp.49—68)。共和主义的长期趋势逐渐带来了官僚机构化。由于共和体制的制度化，他们任用知识界精英并将政治与行政机构分开。1848年以后开始使用竞争性考核，它与非正规的在职训练共同分担职责，并且顶住了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最后反动(Thuillier，1976，pp.105—115；1980，pp.334—362)。共和主义者在1880年最终赢得了民政机构。现在的法国行政机构具有突出的官僚制度特征，尽管仍由一个党派集团所统治。

因此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一样，对于官僚制度所作出的允诺比行动要多。原因是相同的：政党政治没能从政府中分离出来。阶级和民族政治也未能稳定下来。政党民主是多形化的，定型于各种不断变化且相互纠缠的政治——行政的形式。然而，这些复杂的行政发展可能就像一个半满的水杯。我们可能强调水的容量，或者强调空气的体积。斯科克波和梯利强调的是官僚机构化和国家权力；我强调的是这两者之间的范围。比较是一种较好的衡量手段。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是否被革命、政府和波拿巴推向更大程度的官僚机构化？然而问题不能如此简单地提出。正如梯利所注意到的，革命以及革命期间发生的几次战争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冲击，也使它们的官僚机构化。各国不仅是独立的可比性实例而且是欧洲地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社会中的独立单位。我继续以这些实例进行讨论；然后，我将转向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第四章可以看出，英国在政治代议制上的斗争是与行政的经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带来财政压力，经济改革便首当其冲，依靠它实施公民权改革。战争时期，有产的纳税人认为

“旧式腐败”代价太大。旧政权的自我改革受到来自社会下层阶级压力的推动。从18世纪80年代早期，议会议长们宣布反对贪污贿赂，到18世纪80年晚期，议会开始制定立法，从90年代开始改革派的部长减少。在内政部的20名高级官员中，收入依靠薪水的人所占比例从1784年的56%上升到1796年的95%(Nelson，1969，pp.174—175)。到1832年，拿薪水成为正常现象，官职拥有权实际上已丧失。挂名闲职的废除使大多数部门内部实现了职能和等级制度的重新调整。立法禁止禄虫和议员担任公职。战争产生了首相对议会负责的真正的内阁政府。各部长在内阁和议会中花费更多时间，而他们所领导的各部由领薪俸的常任秘书来控制。1787年的一个法令把当时由各自指定拨付专款支付的各部财政合并起来。到1828年所有的收入和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从单一专款中收支，它的账目呈交给议会(尽管支出不受财政管理并且保留政治性)。到1832年政府已进行了改革(Cohen，1941；Finer，1952；Parris，1969)。

在官僚制度的一个标准上，英国处于落后状态：直到19世纪中期都没有引入雇佣和晋升的竞争标准——并且即使在那时，改革也是最低限度的。尽管功利主义和激进的改革者要求进行考核和技术培训，但没有一样得到实现。通过自我改革，旧政权坚持保留了新兵征召和任命部分官职的特权。改革的原动力是削减行政机构和节约资金。表11.7表明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在1797年到1830年之间文职人员的增加要比人口增长的比例小。议员们向议会汇报，“旧式腐败”已消除并且无需进一步减少费用。改革运动消退，到本世纪中期以后，官僚机构化未再深入下去。人们容忍了妥协。

在第二阶段，英国的官僚机构化存在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传统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所带来的国库压力，迫使旧政权提高税收，削减开支，实行合理化措施及中央集权制，但却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原则。第二，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对政治公民权和功利主义的政府施加了一种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压力。这两个原因相互促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

家正为它的地缘政治而斗争。 与法国相比，这种解决旧政权和新兴阶级之间斗争的方式更为稳妥。 与美国相比，这种解决方式更中央集权化。 再加上第三阶级的压力(很快就会对此进行讨论)，使英国超越了其他国家所出现的对官僚制度的限制。 现在官僚制度的铺路人是近邻的欧洲。

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之后，普鲁士王朝在19世纪仅仅实行了有限的现代化。 到1800年，它被党派争执所冲击着。 大多数改革者是贵族，他们在寻求行政合理化，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是资产阶级专家。 在地方政府中，他们将贵族和乡绅排他性的控制视为障碍，而在高层则是法院。 出于周密谨慎的考虑，他们建议采用代表大会和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 战争似乎是由他们操纵的。 拿破仑1805—1806年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摧毁普鲁士军队之后，君主政体开始寻求改革以期增加效率，避免社会动乱，但这没有引起新兴法国霸主的反对然而无法抵消新兴法国霸权。 改革者们极力主张通过有限的议会和单一的行政机构来操纵上至首相下到各地乡村的权力。 尽管在短期内他们获得了优势，但到1808年他们招致了更多贵族和法国的敌意。 在落后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太薄弱，无法施加更多的民众压力。 这些专制主义的现代化者离开君主就会一无所成。 为了缓和法国的敌意，君主便抛弃了他们。

在拿破仑战败以后，达成了一种妥协(Mueller， 1984， pp. 126—166； Gray， 1986)。 在区域性层次上没有变化。 容克和教会的机构直到1848年革命都完整无损地幸存下来。 在中央行政机构，学术资格和考核得到加强，各所大学都进行了改革。 贵族们开始进入大学，逐渐减少了旧的党派活动并使官员的民族性文化融合得到巩固。 在实现一人控制之前，同僚共享权力的状况开始削弱。 一个复兴的国家议会现在使各部部长和朝廷大臣们坐到一起，而更为内行的部长们已占据优势。 在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的软弱统治期间，官员的权力自然扩大了，与其说它是一种合理化的官僚制度，不如说是如欣茨所说的

“贵族—资产阶级的贵族机构”。这种权力使资产阶级成员“封建化”(Muncie, 1944)同时使普鲁士贵族“进步化”。但是随着专制主义的复兴，排他主义也复兴了。“内阁”恢复了，直属职位即军队指挥官具有单独参见国王的权利，这一权利还扩大到文职官员。官僚制度仍从属于任何一个君王选定并信任的人——专职化的部长大臣或贵族老朋友。党派冲突减弱了官僚制度的团结，并在 1848 年将其分裂——在那次夭折的革命中，文职人员和教师在两派中都是积极分子(Gillis, 1971)。

国家仍让人感兴趣，它的各党派扎根于市民社会。直到阶级和全国代议制再次得到公正对待，并且只有增加了 19 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罗马天主教徒，国家现代化才能进入到第九章和二十一章中所描述的半独裁主义。普鲁士促进了官僚制度的最初发展，但是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普通官僚制度的国家只存在于黑格尔的思想里，而不存在于德国人的现实中。

奥地利是第一个官僚主义的铺路人，它衰退得更早，更完全。因为对地方贵族权力渗入最少，奥地利王朝政府由于法国大革命和代议制运动而引起了更大的恐慌。约瑟夫二世的继任者在 18 世纪 90 年代退回到极端保守状态——现在主要的官僚机构化出现在警察机构内(Wangerman, 1969; Axtmann, 1991)。在与波拿巴的战争中遭受失败，尽管未受其羞辱，但是奥地利人仍限制军队改革并依靠天主教会来动员反对法国的支持力量。到 1815 年，奥地利政权已成为欧洲改革前进的阻碍。第七、第十章指出这个由多个地区组成的王朝国家正在与地区分裂运动进行斗争。在 1867 年，甚至连皇室政府都分裂成两部分。

这是国家生命中的一个过渡时期，即从军事占优势地位的国家过渡到具有相反形态的军事—文官国家。官僚制度用于铺路的形式正是代议制和全国性公民权，它是从君主制度和地缘政治军国主义转变而来的。军国主义仍对官僚制度的效率施加压力，但是大约在 1810 年，王

朝政权已达到了官僚制度的极限，君主专制主义与官僚制度中央集权化之间的矛盾，以及争取公民权的阶级压力的削弱，都成为进一步实行王朝主义的障碍。相反，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政权处于一种更为商业化的市民社会中，它包含着广泛的政治阶级，在旧政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已实现了相互妥协的制度化，这就允许存在更大的政党民主。因此在行政机构中就具有更为官僚制度化的职责。但是即使这些国家的党派民主和官僚主义也不是完全协调的。各政治党派经常与精英组成的专家政治官僚制度相冲突。国家保留了多型化。尽管大多数党派反对旧政权的排他主义，但他们担心国家效率。为什么要赋予国家更高的效率、更高的内聚性以及官僚制度的基础呢？这也许可以有助于国家精英的专政主义策略，也许会有助于与之竞争的党派。美国各政党改变策略，以便确保他们的国家更具融入性，并减弱官僚制度。英国各政党采取了妥协方式。一旦共和国得到挽救，法国各政党也采取了妥协方案。

在卡夫卡—斯科克波—梯利三人所声称的革命扩展的国家权力中现在包含了什么内容？我提供一些证据。通过革命，法国超越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法国也许会成为一个比奥地利更落后的国家。法国进行了改革——也许因为它以前如此地落后和懒惰。但是，法国的现代化不如美国走得远，也不如英国彻底。美国的推动力无可辩驳地具有革命性(尽管斯科克波已在其他地方否定了这一点)。然而，英国未发生革命，奥地利和普鲁士也没有因为缺少一次革命而落后。我的结论是革命对于国家现代化来说并不是必须的，或者它对国家权力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斯科克波和梯利都同意)。更确切地说，在这一阶段(尽管不是在较早的阶段)党派民主运动通过改革或革命强化了国家的官僚制度。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同，党派民主运动具有法国大革命中积极、民主的一面，而不是其消积、独裁的一面，这鼓励了官僚机构化。党派民主更希望官僚制度化，因为它们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它。那些解决了代议制和民族争端的

政权更希望官僚机构化。

对于那些相比较的观点，我另外加上有关相互依存性的看法。这种依存增加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和军国主义者的重要性。这很适合斯科克波和梯利的更普通的理论模式，因为他们都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军国主义的作用。战争继续存在并使国家现代化。但是，这些战争的主角即法国陆军，与它的军事前任者不同，从政治和民众的角度，它威胁着所有的旧政权，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生不同影响。从军事上，英国只经历了半总体战，普鲁士和奥地利在 18 世纪中期所经历的这种战争将旧政权转变为现代化政府。政治对于英国的影响更是难以估价，但是第四章提出了革命者和法国战争促进了旧政权和资产阶级的合并，这使有限的代议制政府制度化得以实现(避免了更为民众化、民主性政府的出现)。反过来这也逐渐地使官僚制度的现代化得以实现。因此，法国大革命可能加速了英国的国家现代化。但是，同样的力量可能在中欧却起到了减缓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在中欧，法国现代化陆军的压力要高于国家的压力并且使政治代议制受挫，以至于官僚机构化也因此受阻，这是由于温和的改革者和软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受到雅各宾主义的影响。不管卡夫卡、斯科克波以及梯利的观点如何，法国大革命为国家的发展留下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混合遗产。

第三阶段：国家行政机构和工业资本主义，1850—1914 年

第十一章指出所有 19 世纪末的国家都大量增加了它们的文职范围和人员，特别在中低级层次和地区性层次上。官僚机构化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并努力地与这一蔓延趋势保持同步。到 1910 年，英国和法国几乎实现了它们曾规划的官僚机构化，美国在 18 世纪 20 年代开始达到改革的巅峰，而两个君主主义国家正在它们所可能允许的范

围内实现官僚制度化。在这一阶段存在两个相关联的官僚机构化的原因。一方面国家使公民权制度化(尽管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增加了各国行政机构的、全国经济一体化和公司企业的官僚模式。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趋向削弱(尽管并未完全排除)国家职能与行政效用之间的有益冲突。官僚机构的发展伴随着直接反对的减少。

然而，面对那些将成官僚的人是令人畏惧的。大量的国家雇员是否会忠于等级制？他们是否将代表自己的利益或代表本阶级、宗教及语言团体的利益？由于大量的机构扩充是在地方政府一级，那么中央的协调作用是否会减弱？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是政党民主的，那么国家政策是否将由一些排他性的组织网络来决定？这些组织网络包括学院、技术专家官员以及通过正式国家机构获得权力的改革派压力集团。

公民权包括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纠缠的情况各国都不相同。到1850年，美国已使白人的两党民主制实现制度化；然而此时它才进入国内民族斗争最残酷的阶段，当主要的斗争猛烈冲击着相互对抗的联邦权力与各州政府权力时，行政机构不可能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在所有三个层次的行政机构中高效政府的协调作用既依赖于官僚制度，也依赖于政党的忠诚。在林肯统治下，分肥制达到了极点：在总统的权限范围内，他撤换了88%的行政人员(Fish，1920，p.170)。在内战中，民族问题由武力解决了。此后又由1877年的妥协来解决。这就减少了对由一个党派组成联邦政府的政治需要，尽管政党政治在短时期内转而削弱了各州和地方级别的行政机构。英国和法国经历了相反的政治状况：关于民族—国家更为一致，对于(阶级)代议制的意见却不那么一致。但是在英国1867和1884年的改革法令颁布以后以及法国共和国在19世纪80年代得到巩固以后，那些障碍就被排除了。所有的三党民主现在能更明确地确定主权统治并且随后部分地使它实现官僚机构化。

两个半独裁的君主政体在公民权义方面进展缓慢。中世纪的普鲁

士同时要面对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如第九章所述，到 1880 年，这两个问题都已实现了半制度化。在奥地利，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代议制和地区—民族问题仍威胁着政治性行政机构。然而，意见相左的各民族与其说是与哈布斯堡家族彼此为敌，不如说是互相残杀(参见第十章)。事实上的妥协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持续发生有关政治公民权和行政机构中语言问题的骚乱，哈布斯堡统治下的日常中央政府被允许行使自治权。

在所有国家中，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略微加强了这种更具共识的趋势，甚至是对落后君主制的一种补偿。邮政局和电报、运河以及铁路都不存在争议。学校也一样；因为它们通常遍及于一个相对世俗化的中央国家，这个国家反对地区性教会(对于奥地利还要加上语言问题)。1900 年以后，这些问题普遍得到解决，从而对中央政府有利。半独裁的君主政体尤其利用国家行政机构来支持其最后的发展，使主要的权力运作者普遍感到满意(参见第十四章)。在扩充政府低层次和技术部门方面，阶级和地区性利益集团通常赞成官僚制度的高效率(参见第十一章)。一旦付薪和考核在许多部门被视为惯例而执行，它们的扩大就相对不会出现争议。

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铁路业的繁荣，国家和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也与民族经济和官僚制度的组织结合在一起。民族经济(在第十七章中对英国的描述)减少了地区差别并进一步使人口“国籍化”。法人组织图表、多分部的公司以及标准化的销售目录都与国家统计、行业职务划分和财政控制相类似：这是对控制组织的官僚制度的反映，这些组织的规模，特别是职能范围和地域范围日益扩大(Yeager，1980)。随着代议制和民族斗争逐渐制度化，随着在许多国家职能方面达成共识，同时工业资本主义也提供了多种模式，国家主权和官僚机构化实现了扩大。

在这一阶段，官僚机构化甚至更多地影响着地方和区域性政府：英国的郡和自治市、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奥地利和德国的州和乡镇以及

法国的县和公社。大多数地方政府仍由地方公职拥有者或受尊敬的贵族控制。但是行政机构和福利事业的国家职能产生了常规的地方行政机构，为无报酬的贵族所讨厌。随着岁入分配的增加——尽管在美国联邦政府并非如此，中央行政机构的劳动力分工得到发展。

在中央政策制定的最高层次上，官僚机构化仍然最为薄弱，尤其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半独裁的君主政权延长了部门性分而治之的党派策略，并且阻止了一体化的内阁政府。因为各部、法院和议会都保留有制定政策的自治权力，所以压力集团的政治活动激增。在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的行政机构中重要的学院派和技术专家的改革联盟相互伴随并相互渗透从而使之得到发展——其中一些联盟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摇篮”(Rosenhaft and Lee，1900)。为避免分裂，即要依靠那些受过教育的官员的社会团结，同样也要依靠官僚制度。大约在1900年，部分官僚行政机构被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压力集团“殖民化”(参见十六章)。国家外交政策的分裂真正开始了——对世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将在第二十一章中进行讨论)。

但是官僚制度在政党民主中也仍不完善。现在英国显然成为精英统治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开始于1850年——通常是提高各部的效率，未与议会协商，在议会中任命官职的特权仍很重要。许多做法经常是从英国的殖民活动中得到的。内部审查也得到了改进。在1853年，按业绩而任职和晋升实现了制度化，并在1879年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885年占据了优势地位(Cohen，1941)。随着公立学校如牛津、剑桥以及教会中实施精英统治的改革，在征聘过程中废除了任命官职的特权。在行政机构最高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实行择优录取，然而仍保留了一定的限制，几乎所有新招雇的人员都来自公立学校或文法中学，并且主要来自两所古老的大学。与普鲁士不同，英国早在改革开始之初，缙绅和高层职业家庭就已占据了这些高等学院。因此在高层行政机构中阶级构成和民族团结已得到确定(Mueller，1984，pp.108—125，191—223)。在1904年到1914年间80%的职员上过牛津大学和剑

桥大学。

低级“技术阶层”的晋升变得十分困难；从 1902 年到 1911 年，平均的晋升机会是 0. 12%，集中于缺乏权威的部门，如海关。在陆军部和殖民部无人员晋升(Kelsall，1955，pp.40—41，139，162—163)。这些人普遍具有合理无私的公共服务思想。国家不再是一个家长式的家庭权力机关，它过去曾充满了“腐败的”庇护特权。它的“公务员”是公开中立的，被赋予国家市民社会的最高利益。黑格尔所认为的官僚们的普遍阶级状况，总是一个难以理解但适合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概念。如果这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概念，那么在 19 世纪末的英国行政机构中，就是一种似乎更为合理的表现——仅限于英国的统治阶级。

第十一章指出在这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内战时期)美国政府规模小、费用低廉，并且很容易筹措资金。19 世纪末它在规模上的迅速膨胀急骤地增加了分肥制和腐败，尤其是在没有官僚制度控制的地方政府，政府依赖贿赂和佣金来做事(Keller，1977，p.245)。但是最终出现了对节俭和高效的要求，尽管比英国要晚得多(Skowronek，1982)。美国创造发明的有限公司意味着高效的官僚制度模式已经出现(Yeager，1980)。1882 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对一部分联邦行政机构的工作进行了“分类”——保护他们免遭政治清洗并且通过竞争考核进行，被分类的职务从 1884 年的 10. 5%上升到 1895 年的 29%。在随后的时间中上升到 45%，并于 1909 年达到 6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比例更上升到 80%多，并维持至今。

最初，在保护背后的动机是相当复杂的，由于离开政府的各党派都是通过给予行政机构的职位来拉拢他们的忠实者(Keller，1977，p.313)。但是，借鉴于企业，受保护的行政机构逐渐采纳“人事管理”的科学(职务、专业、薪水、晋升、年金和效率报告等等的安排)以及“行政管理”科学(标准化的会计制度、档案和记录、采购和供应以及各种合同程序)。这方面的大部分也在北方各州和地方政府中贯彻实施。1913 年的塔夫脱委员会汲取芝加哥创立单一的预算和人事局方面的可取经验来

使联邦账目，考核和晋升准则、职位分类和薪金体系、个人效率记录和所有联邦机构的纪律规章标准化。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战争努力所带来的行政混乱的刺激下，这一改革以及单一联邦预算的巩固才得以实现(van Riper，1958，pp.191—223)。

官僚机构化的大部分成果是通过进步运动取得的。在行政改革中，进步运动的目标对准了国家“效率”。这是一种新兴的野心家和职业化中产阶级(Wiebe，1967)以及企业自由主义之间联盟的思想(Weinstein，1968；Shefter，1978，pp.230—237)。它要求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应有一个中立、高效的国家行政机构思想出现。美国政府现在最终可以克服党派的任命权和邦联主义，因为美国的行政机构已与国家文明社会中权力阶级的运作者密切结合在一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塔夫脱总统在行政机构改革方面有更重要的经验，这一点也有所帮助。任命权仍保留着——并且至今仍存在——在所有政府的三个等级的最高层。政治上的被任命者通常兼具教育和专业技术资格和效忠政党两方面。

双重性也成为英国和法国最高层中央政府的特征，与美国不同的是，它们的地区性政府已从属于中央政府。英国征召的高级文官几乎完全来自著名的公学(属于私立的)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来自那些忠实于国家权势集团的上中产阶级，法国征召的文官来自于重点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他们具有良好的教育和技术资格，也忠诚于兼具先进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共和体制的联盟，这个联盟就是20世纪法国政权的特征。

最高行政机构在整个20世纪完全融入阶级和全国性政党忠诚者之中。所有政权都排斥了邦联主义和完全成熟的韦伯学说的官僚制度。在这一时期，行政机构与政治的分离完全是在低层机构和中层机构的官员中，而不是在民族国家的最高层中。在大多数国家，这种分离是地方性的。“官僚”的常规性概念对于低级的文字工作者还有些真实性。高层国家行政人员保留的官僚性如同政治性一样多，尽管无私的

公共服务思想的社会化部分地削弱了他们的政党政治。

结论

在整个漫长的 19 世纪，我所提出的官僚制度的五个组成部分得到以下的发展：

1. 到 1914 年几乎所有的中央行政人员和大部分的地区性官员都领取薪金。通过等级特权和贿买而担任官职的现象已几乎消失。在地方机构中只有兼职并受人敬重的官职才大量幸存下来。

2. 通过客观的竞争尺度来任命和晋升的方式也得到发展，但是时间相当晚，到 1914 年在部分国家仍不完善。

3. 部门内的公职安排在最初变化相当大，到 19 世纪 80 年代几乎所有部门中的官职安排都类似于官僚制度模式，即在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下，根据职能的不同划分。

4. 美国最早实现了将所有部门合并成单一的、中央集权化的全国性行政机构。此后，美国在这一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倒退。在英国和法国，它的实现较晚，并且在所探讨的这一时期末，德国和奥地利还未完全实现。

5. 政党政治与行政机构隔离实现得最晚。在任何国家中央政府的高层都未完全隔离，但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分离是最薄弱的。

因此，所有国家在这一时期都发展了根据所有五个标准的某种官僚机构化。在 1760 年，各国离官僚制度不再遥远；到 1914 年，全国性官僚制度和行政制度已实现制度化。这增加了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力和程度较低的行政机构的内聚性。中央国家行政机构已趋于一元化，或者作为半独裁主义者——有执行君主政体决议的官僚——或者作为政党民主——有执行全国议会立法的官僚。

在任何国家，官僚机构化都是以它的思想为先导。财政学派、启

蒙运动、功利主义、进步主义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主要来自那些出身于旧政权和职业化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行政官员。所有这些人都提倡他们所称的“合理行政机构”和我们所称的“官僚制度”。引人注目的是，官僚制度化是如何被意识到的，在它实现之前，整个西方的思想家们又是如何清楚地将之系统化的。思想家们能够有说服力，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官僚机构化是有职能的。它是针对行政机构在职能和地区范围以及多样性方面迅速膨胀的一种有效降低开支的反应。因为思想家们是在国际间进行交流的，所以一国的权力运作者通常可以在国内采纳官僚制度的方法之前就获悉了其他国家已改进的方法(尽管我对此没有作系统的调查研究)。现代的官僚国家，首先作为设想而出现，然后不可抗拒而实用地展现在现实之中。

然而，详细考察各国就修正了上述现象。就近观察，现代国家行政机构的兴起不是进化或由直线发展而来的。在各时期之间，组织上的目标存在差异。如果没有这些目标存在，那么各种思想意识就证明是无效的。这些目标也影响着思想意识的转变(从财政学派到功利主义再到激进主义等等)。我所列举的每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领导着官僚机构的进程。随后它的发展又无法越过新的障碍。我将官僚机构化区分为三个阶段，受以下三方面控制：(1)君主政体和军国主义形式；(2)代议制和全国性公民权形式；(3)工业资本主义形式。构成这一切的潜在原因是现代中央国家从军事占支配地位到具有双重相对形态——半文明半军事的转变。

民政机构是国家精英深入市民社会的最重要方式。在 1760 年，它也是政党渗入专制主义国家甚至可能是政党民主国家(和议会会议一起)的重要形式。18 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拥有高效的行政机构，并通过它支持形式上的专制君主权来统治市民社会，因为“它的”民政事实上是充满着统治阶级和教会的所有制特权。在早期的军事革命以后，军政已不再完全充斥着这种特权，而稍微多地由国家控制(第十一章指出国家因此丧失了对部分自治的军事特权等级的某些控制)。

由于上述的军事控制和战争的压力，各国世袭君主发动了第一次官僚制度的攻势。然而，他们的官僚制度因素既是与部门的分而治之策略以及旧政权下各党派的依赖相紧密结合，又受到它们的约束。在第二次官僚机构化的过渡阶段，在大众(主要以阶级为基础)民权运动的压力以及战争、革命和政党民主的压力下，各政府带头领导和清除“腐败”公职拥有的特权。但是第二次官僚制度攻势也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政权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充分解决各国代议制和全国性的主要问题，从而使它们有能力管理一个具有内聚性、高效、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国家。在第三次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一些国家的政府在使中央集权的政党民主制度化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并且也进一步发展了官僚机构化。但是官僚机构化，尤其在行政机构的中低层，现在也得到了大家公认的新增加的国家行政机构极大的帮助，这些行政机构的大部分有助于实现全国工业化(也包括全国的重整军备)。只有高层行政机构抵制了完全的官僚机构化，因为政权仍然需要忠实的政党党员支持。

民政机构没有丧失太多的内聚性，甚至还获得了一些内聚性，正如他们在这一时期中的发展——但是具有两个限制条件。首先，与其说内聚性是自治国家的一个特征，不如说是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正如我可能是在第三章中所提出的。一个国家是否能高效并团结地运转，既依靠那些融入并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民族性内聚力的官员，同时也依赖于其本身对官僚制度的接受力。这种融入和表现形式经过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排他主义的和主要是权力分散的公职担任到被认为是普遍的并且主要是全国性择优录取。

正如表 4.2 所启示的，18 世纪的普鲁士和英国是代表了相对团结的民族性的文明社会，因此在行政机构上是有效的例证。旧政权的法国国家缺乏有效性，是因为它代表(并且有助于)的社会无凝聚力。奥地利国家正如一个高度自治的、但未能扎根于它的市民社会的国家所能达到的效力一样，它并不是非常有效的。再晚一些时候，三个政党民主的国家，真正代表了早期工业化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并且有全国性组织的阶

级(在成年男子中)，尤其代表了资产阶级和职业中产阶级的代议制，因此，它们更具效力。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有国家作为自治的运作者，如精英理论所提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相对团结，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主要的国家运作者保持了融入性，如果更具普遍性，它融入各种市民社会的权力网络，主要在全国各阶级中。在一个国家中其运作者如果从市民社会中得到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在团结行动上就存在困难。第三章指明，早期自治国家(例如，封建制度国家)通常已具内聚性，但软弱无力。也许在现代社会中自治的政治强国实际上是政党宗派化国家的自治。第二十章支持这一假说。

第二，各国没有完全实现中央集权化，这是因为它们权力网的扩展超出了这一章所讨论的民政机构各部门的范围。它们的武装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主权，与文职行政人员相比它们更融入于旧政权。它们的外交使团甚至具有更多的旧政权特点并且与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关系更密切。君主政体下的法院和政党(阶级的、部门的、地区性的以及宗教的)，又为之添加了它们独特的宗派性、社会的融入性以及被人们认为协调某些方面的能力。民政官员协调各方面的能力仅仅起到缓和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它们自己多重部门的协调仍存在着缺陷。它们或者通过政党忠诚者，通过官僚制度的确进行了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太可能成为分裂主义的源泉——或者它们没有进行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自己的职业化和专家治国的能力就被用来达到目的，而这些目的与其说是由“整个”国家需要和目的所决定，不如说是由更狭隘的专家治国—官僚政府形式所决定。第十四章探讨了这些可能性。

注释：

[1] 关于美国行政机构的资料，主要来自菲什(1920)、怀特(1951，1954，1958，1965)、范里佩尔(1958)、凯勒(1977)、谢夫特(1978)，以及斯科夫罗内克(1982)。

参考文献

Albrow, M. 1970. *Bureaucracy*. London: Pall Mall Press.

American State Papers. 1834. *Documents,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of the Congress of the U. S., 1809—1823*. Vol. 38, miscellaneous, Vol. 2, p.983.

Anderson, E., and P.R. Anderson 196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shford, D. 1982. *British Dogmatism and French Pragmatism. Central-Local Policymaking in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Axtmann, R. 1991. Geopolitics and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s: The State, Police and Public Order in Austria and Irelan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Ph. D. 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ylmer, G. E. 1979. From office-holding to civil service: the genesis of modern bureaucrac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0.

Beales, D. 1987. *Joseph II*. Vol. I: *In the Shadow of Maria Theresa, 1740—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nney, J. 1958. *British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1774—9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lanning, T. 1974.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ainz, 1743—18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nin, H. von, 1966. Adel und Burgertum in der hoheren Beamtenschaft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 1794—1806. *Jarh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le-und Ostdeutschlands* 15.

Bosher, J. F. 1970.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ewer, J. 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New York: Knopf.

Charle, C. 1980. *Les Hauts Fonctionnair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Gallimard/Julliard.

Church, C. H. 1981. *Revolution and Red Tape: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hen, E. W. 1941.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Civil Service, 1780—1939*. London: Allen & Unwin.

Dickson, P.G. M. 1987.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oyle, W.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ner, S. E. 1952. Patronage and the public service: Jeffersonian bureaucracy and the British tradi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30.

Fischer, W. and P. Lundgreen. 1975. Th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f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 Til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sh, C. R. 1920. *The Civil Service and the Patron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lis, J. R. 1971.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Crisis, 1840—1860: Origins of an Administrative Ethos*. Menlo Park,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y, M. 1986. Prussia in transit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Stein reform ministry of 1808.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6, pt. 1.

Hall, R. H. 1963—4. The concept of bureaucrac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

Harris, R. D. 1979. *Necker, Reform Statesman of the Ancien Rég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anouch, G. 1953. *Conversations with Kafka*. London: Derek Verschoyle.

Johnson, H. C. 1969. The concept of bureaucracy in Cameral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9.

1975.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ulien-Laferrière, F. 1970. *Les députés fonctionnaires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Paris: PUF.

Keller, M. 1977. *Affairs of State: 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lsall, R. K. 1955. *Higher Civil Servants in Britain, from 1870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oselleck, R. 1967. *Preuss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Stuttgart: Klett.

Krygier, M. 1979. State and bureaucracy in Europe: the growth of a concept. In *Bureaucracy: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ed. E. Kamenka and M. Krygier. London: Arnold.

Ludtke, A. 1989. *Police and State in Prussia, 1815—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cartney, C. A. 1969.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cDonald, F. 1982. *Alexander Hamilton: A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Margadant, T. W. 1988. Towns, taxes, and state-forma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leventh Annual Irvine Seminar on Social History and The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Marion, M. 1927. *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715*. Paris: Rousseau.

Mousnier, R. 1979. *The Institutions of Fr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 1598—178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ueller, H. -E. 1984. *Bureaucracy, Education, and Monopoly: 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Prussia and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uncie, L. W. 1944. *The Junker in the Prussian Administration Under William II, 1888—1914*. Providence, R. I.: Brown University Press.

Necker, J. 1784. *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de France*, 3 vols. Paris: n. p.

Nelson, R. R. 1969. *The Home Office, 1782—1801*.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O'Brien, C. C. 1990.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3.

Osborne, T. R. 1983. *A Grande Ecole for the Grands Corps: Th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f the French Administrative Eli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arris, H. 1969. *Co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Allen & Unwin.

Raeff, M. 1975. The well ordered police st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n attempt a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

Richardson, N. J. 1966. *The French Prefectoral Corps, 1814—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nberg, H. 1958.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haft, E., and W. R. Lee. 1990. State and society in modern Germany — Beamtenstaat, Klassenstaat, Wohlfahrtstaat. In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80*, ed. E. Rosenhaft and W. R. Lee. New York: Berg.

Shefter, M. 1978. Party,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olitical Parties: Development and Decay*. New York: Sage.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wronek, S.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G. V. 1967.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

Thuillier, G. 1976.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Ministères an XIX[ièm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980. *Bureaucratie et Bureaucrates en France au XIX[ième] siècle*. Geneva: Droz.

Tilly, C.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Tour du Pin, Madame de la. 1985. Memoirs. London: Century.

Tribe, K. 1984. Camer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6.

1988. Governing Economy: The Reformulation of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Riper, P.P. 1958.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New York: Row, Peterson.

Wangerman, E. 1969. From Joseph II to the Jacobin Trials, 2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nglish ed., 3 vol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Weill, H. 1961.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Samuel von Cocceji.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einstein, J. 1968. 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 Boston: Beacon Press.

White, L. D. 1951. The Jeffersonian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01—1829.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The Jacksonian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29—1860.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The Republican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69—1901.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The Federalist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789—1801, 2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Wiebe, R. H. 1967.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 Wang.

Woolf, S. J. 1984. Origins of statistics: France 1789—1815. In States and Statistics in France, ed. J. C. Perrot and S. J. Woolf.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Yeager, M. A. 1988. Bureaucracy. I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Vol. III, ed. G. Porter. New York: Scribner's.

第十四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四）：民事机构的扩展

第十一章证明了在国家的发展中存在着两次显著巨变。第一次变化历经整个 18 世纪并延续到 1815 年，其间国家规模迅速膨胀，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军国主义所造成的。前几章指出这种非常具有政治性的社会生活加快了各阶级和各民族的发展。本章所关注的是第二次显著变化，大约开始于 1870 年。它不仅大大扩展了国家规模，而且也扩大了国家中的民事机构的范围。在保留了(一种削弱的)军国主义加上传统的犹太教和慈善功能的同时，国家又获得了三种新的功能，围绕这些功能，正如第十三章所表明的，官僚化仍是中心问题：

1. 所有国家都大规模发展物资和信息通讯的基础设施：公路、运河、铁路、邮政、电报和大众教育。

2. 部分国家拥有进入各种物资基础设施和生产性工业的直接所有权。

3. 就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前，各国开始将它们的慈善事业扩展到更加广泛的福利计划中，即马歇尔的“社会公民权”的萌芽形式。

因此，各国加强了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尽管缩减了财政计划，但市民社会进一步政治化。人们不可能重新回到那种传统的无视国家的作法中。阶级—民族的牢笼依旧存在，只是更加趋于平静。因为缺少了世界历史性的喧嚣，社会生活变得更具“适应性”，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但这是何种意义上的强大呢？是否正如精英统治论的管

理主义者所设想的国家理论一样，在更多的基础性权力的支持下，独立自主的国家更专制地“介入”市民社会？ 抑或是国家的成长仅仅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在功能和基础结构上的反映？ 这可能增加市民社会的聚合性权力(正如多元理论所述)而非国家的权力，或者它可能使国家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分配权力(正如阶级理论所述)。 那些扩大了的、更加不同的国家现在是否固化成一种没有最终模式的多形性呢？ 而且如果它们变得更加多形化，是否也会变得缺少协调？

基础设施的增加、政党民主和民族

国家基础设施在政党民主的体制下增长最少。 这些较少国有化的经济资源，明显地服从于资本需要，并且在最初缓慢地转用于社会公民。 三党制民主政体明显不同——与美国早期是最软弱的国家，甚至在全国联邦范围内分裂政府相比，法国是最活跃的国家——但它们确有共同特征。 我首先以英国为例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认为英国变得更具多形性，它固化为军国主义，资本主义，更具意识形态化、联邦化，是更加彻底的政党民主。 在本章中，我仅讨论地缘政治军国主义对国内的一部分影响。 在这些政治形式之间是否存在某些明确的关系，是否有处于“最终首位”的可能？ 第三章论证了在辩证的正面冲突中，国家的各种形式很少相互对立，而是强迫它们作出直接的政治选择或相互妥协。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否就是如此？ 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是否也是这样？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 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人都希望它如此。 甚至不干涉主义的倡议者们也都毫不怀疑对国家管理的需要。 亚当 · 斯密希望国家提供公共设施，这些设施是私人运作者无法从投资中获得利益的——对外防御、国内安全、国民教育以及公路网。 还应加上铁路，而这是 19 世纪国家所主要进行的建设。 斯密

准确地看出，这正是市民社会(他实际指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身调整，而非国家干预。

19世纪早期的英国，如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随着法院和皇室的特许权及庇护特权网的衰败，独立国家的精英所提倡的激进主义事实上正处于衰落状态。在1830年以后，一种集体的“政党”，而不是精英，国家激进主义开始发展，它更多地关注于协助和管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立法不再是专门性的，而更多是计划性的，它不断通过各届议会会议来制定，并依赖于由内阁部长们始创的议会公法(而不是私法)。现在议会也采取例行的小型特别委员会和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研究社会状况并提出立法。其他类型的党派民主制同样建立了类似的计划机构。19世纪50年代以后，它们的行政基础结构也开始发展，尽管更主要的仍是协调而不是介入市民社会。

但市民社会和国家行为包含着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内容。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中，道德—宗教的争论产生了强烈共鸣(Marsh, 1979, Weeks, 1981, p.81, Cronin, 1988)。威克斯和福柯(法国)认为，这暗示了统治阶级用“高压统治”支配着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有几分道德——思想意识形式的经济简化论观点，但是由于工业化和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大，以至于道德的表述变得更加复杂并且更有争议。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区别对待商业事务和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对前者，国家应仅仅帮助资本主义自我管理，而对于社会问题，国家应进行干涉甚至采用高压统治都是合法的。因此，在议会中为《十小时法案》辩护时，麦考利勋爵声称：

> 我同议院中的任何一位先生一样，坚决赞同自由贸易原则，即……不需国家干预理智的成年人所签署的纯商业方面的合同。这一原则不应有任何例外，除非涉及到公众健康和公共道德方面的问题。(Taylor, 1972, p.44)

然而在现实中，正如其他辩论运作者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公众健康及道德”之间的划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两者彼此相互渗透。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化将思想意识潮流不同程度地融入资本主义——道德的新教主义、启蒙运动、进步的功利主义理论、个人和社会“改良”的概念、一种英国担负着全球道德责任的帝国意识，以及政权对下层“危险阶级”的恐惧。除非下层阶级真正反叛(正如宪章主义运动，或在1848年时那样)，政权很少注意到他们在政治上的阶级利益。下层阶级不仅仅从经济威胁的角度被认为是“危险的”。正如麦考利勋爵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社会政策的争议充满着将个人和阶级利益与“健康和道德”相联系的广泛隐喻。社会问题产生了“堕落”和“疾病”，它们继而传播了“腐败”和“传染病”。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迅速增加了社会密度，从而导致下层社会伤风败俗的行为有可能影响到各阶层，正如它们早期所肯定做的那样。1851年的调查显示工人或工人家庭很少去教堂或参加礼拜，这大大震惊了国家政府。引导下层社会走向健康、纯洁的道德和宗教，既是统治阶级的责任，也关乎其利益。

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公众健康运动，在早期理论中就达到顶点，这实际上是基于相同的起源理论：通过无数社会行为非针对性的作用，无形的力量进行扩散，不论这种社会行为是善意的、混乱的，或是恶意的。国家应支持善行，最好是用不易觉察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实施——最典型的也许莫过于铺设地下供水和排污的陶瓷管线系统。这些管线代表了人类集体力量的真正增长，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死亡率急骤下降，受到广泛称赞。于是在公众健康、街道照明设备、排污系统、最低住宅标准、基本保健、警察部门、监狱和《济贫法》的监督、对工作时间和雇用条件的规定以及让大多数孩子接受初级和部分中等教育等各方面，各种政策方针逐渐产生。高效的通讯系统、良好的公众健康和平民扫盲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人类的整体发展起作用。正如第十一章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增长超过了国家扩张，甚至国库财政对国家扩大的抵制都有所减轻。因此国家民事机构的扩大得到

了能够进行有效组织的人，即社会的主导阶级、宗教、少数民族组织及教会的共同认可。正如格鲁(1984)所述，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增长是与“国家中立”思想和保护自由思想的出现相吻合的，因为在大多数被限定的新“活动领域”中，市民社会的运作者可以发挥作用而不受国家干预。

然而，资本主义和道德可能发生冲突并会因此而相互制约，这种制约不是固定的，是随着复杂的政治进程而波动起伏。接近世纪之末，军国主义开始影响社会活动。大英帝国的权力更加依赖于“国家效率”，其核心是(仅仅是)健康的母亲和儿童以及国家的基本教育水平。事实上，从国家效率这一概念上说，资本主义竞争与军事竞争趋于融合，尤其是随着德国逐渐成为主要竞争对手。如果像宪章运动中那样，以正面阶级冲突的言语要求改革，这些改革就会遭到暴力镇压；资本主义国家会显示其威力。如果提出改革仅仅作为对阶级冲突的一种理性的互利妥协，在正常情况下也无法改变传统旧政权自由放任主义。技巧在于以缓和阶级对立、树立道德和国家目标的方式提出改革，这样那些不道德或无爱国心的资本家及纳税人便会遭受谴责，并在统治政权中造成分裂。与宪章运动同时的《工厂法》运动谴责对童工和女工在健康和道义上的剥削——也就是对家庭生活的剥削——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见第十五章)。大部分立法融合了控制社会的动机、慈善事业和对社会人口密度的增加造成许多国家服务功能面向全国的认可。社会生活现在不可避免地具有共同性。然而，国家的牢笼正捆扎它的围栏，这反而增加了真正的自由；城市中铺设的各种管道正戏剧性地延长着胎儿、婴儿和母亲的寿命。

然而至此尚无人能以马歇尔的“社会公民权”的观念进行思考，即仅仅在健康而有文化之上的层次，保证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尚无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因为(直到 1910 年)没有累进税制来支付它。但它却是一个有意识的立法改革方案，是激进派、反对派和折衷派斗争的结果，并逐渐在国家和政党精英中引起改变。到 19 世纪 60

年代，改革法案已不是由无公职的下院议员而是由各部部长提出。由于受基督教和世俗道德的影响，还受到民族主义和各政党竞选压力影响，自由资本主义已能够自发产生社会改革——条件是改革不是以阶级的名义，也不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

无论是资本主义、道德改革或军国主义都不能直接针对国家的进一步定型，即一个有一定中央集权却仍是“联邦制”的国家。根据表3.3，实际上英国(即使在宪法上不是)仍具有相当的“联邦性”，相当多的权力属于地方政府。诚然，维多利亚时代的法令、各议会委员会和大委员会也产生出一些“技术专家官僚”，一些明智的精英“渐进主义者”试图扩大中央政府的作用(Lubenon, 1971)。只要他们不抛头露面而只是以道德和国家的言辞，用特殊的补救方法来抨击具体的社会弊病，那么改革就会产生。但是如果他们提倡以国家干涉作为社会改良的普遍原则，他们就会与控制选举程序和议会的地方党魁发生冲突。

当国家问题以直接对抗的形式爆发时，中央集权者通常会遭到失败。他们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实际创建由地方名流充斥的国家权力机构。在皇家各个调查委员会，专家人士由贵族成员平衡，并且集权的提议在议会的立法中被打了折扣，而且在履行时将再次被打折扣。当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专家治国论者埃德温 · 查德威克公开提倡中央政府干预市政卫生时，他很快遭到质疑，并且其公职生涯也到了尽头。从《济贫法》改革，经历工厂立法到公众健康与教育，社会改革是由政府和议会在全国范围内宣布的，但是却由各自治市、郡、教区的地方名流以及其 19 世纪中期地方政府的 2.5 万个地方职能部门人士来履行(Sutherland, 1972; Macdonagh, 1977; Digby, 1982)。行政机构仍是联邦制，尽管英国“宪法”被认为是仍由(中央集权的)议会主权的学说来统治的，英国的各行政机构——国家精英和政党，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仍是在协调并辩论统治阶级的国家道德和物质问题，而不是作为市民社会中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国家对之进行干预。

到 19 世纪中期，三种国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道德意识的国家

以及联邦制民族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制约，并且随着国内民主政治范围的扩大对潜在的国家自主权形成了诸多限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不断增长的国家独立性、帝国的军国主义和第五种国家形式——政党民主的冲击下，联邦意识削弱(后文将进行讨论)。当然，即使对于成年男子来说，英国也不是一种完全成熟的民主制选举国家。但是1832年以后，选举权扩大到足以逐渐迫使那些在某些领域中超过仅仅部门性庇护—被庇护者的组织机构的党魁们相互进行有计划的竞争。在1867年和1884年，随着两党为了互相抬价而扩大选举权，加速了有计划的竞争趋势。现在带来更加持续不断的大量宗教性、地区性和阶级性的压力。保守党人代表英国教会和英格兰，自由党人则偏袒不信国教者和凯尔特人。小资产阶级和熟练工人得到了公民权，而追逐名利的职业化中产阶级却能在政治上施加影响。部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领导人在国家问题上互相转变立场，并在思想斗争中扯平，中间党和精英集权者现在博得了“现代”的称喻，而地方显要则获得“自由主义”的言辞。到1900年，部分主张实施中央集权并拥有全国性党纲和宣传机构的政党呼吁实施一种民众性选举，这一呼声有时甚至超过了地方名流的首脑，并减少了他们的自主权，节制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偏爱。

现在政府最大的国内职责是教育，这是为了适应中产阶级的要求(正如第十六章所指出的)，而中产阶级是主要的选举人。一种正在形成的“思想意识上的公民权”传播着同中产阶级全体选民一样形形色色的各类信息：忠于资本主义，国家高效，国教主义或非国教主义，“社会纯洁性”，禁酒和慈善事业，甚至还包括女权主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自由主义和自由党转向更进一步的福利主义；它使自由主义转向非国教主义并趋向于国家行动主义(以保护教育反对国教主义为条件)；并且它巩固了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省与英格兰的联合(主要是通过地区性党派联盟的手段)。教育也使许多工人具有地方政治性，尽管工人们的全国性政策集中于选举权的改革和工会权利。自由

党的中产阶级和道德主义者更加呼吁要求公共福利(Cronin, 1988)。然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相结合最终产生了战前最后一届自由党政府制定的政策。

正如第十七章所指出的，在各种工业关系中，积极的国家干预开始于 19 世纪 90 年代——也同样由于来自下层的阶级压力，但是只有当能够找到共同的实际道德的原因，并超越雇主和工会的“私利”时，它才会产生效用。道德压力补充了少数劳工立法所包含的强制力。与此并行的是对教育采取更多的干预，通常是通过财政刺激，这是因为在填补私立学校之间差距的政策上表现出众多不足之处。通过《济贫法》，公共医疗服务悄悄提供所有在实际上是最后手段和最低限度的国家基金健康服务。尽管对于严格服务水平的决定来说仍留有地区性，正如它们的行政权那样，但是，地方政府所作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更加一致的服务，尤其是在公共健康方面。这在全国均有保障性。所有这些都暗示了更进一步的中央集权化，限制了在资本主义中政党民主的各种“干涉”——通常通过道德说服、财政劝诱或隐蔽的专家政治，但有时也通过直接的立法压力——以及一个有限的国家自主权，它既不是从与资本主义或联邦制的正面挑战中衍生出来，也不是源于直接的斗争，相反它产生于地区、宗教和阶级的形式、道德主义和国家主义纠缠在一起的一种政党政治的无意识结果。由于这些方面无法正面挑战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独立自主的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如精英理论所预见的那样)几乎未能出现。因为出现专家统治一官僚化的干涉主义国家的先决条件是有较大的工人阶级压力和广泛动员的战争，而这两个条件都是到 1914 年以后才具备的。在战前“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中，道德和中产阶级占优势。它是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含蓄妥协，它适度地改变了国家的资本主义形式。

法国和美国的发展轨迹相同，但法国有着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在最重要的国家形式上它们与英国相当类似，只不过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远不那么明显。在 19 世纪末，实行中央

集权制共和国的政党最终牢牢控制了法国，政府与教士、贵族和金融资本的抵抗相抗衡，同早期的共和制国家一样，他们设计出了一个比英国和美国更加集权、更具干涉性的国家，但是其主要干涉的对象不是资本主义或阶级。相反，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主要在道德的思想意识领域进行斗争——反对罗马天主教教会在教育、家庭法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权力，以及共和国对控制军事力量的旧体制的讨伐(集中体现在“德雷福斯事件”中)。

资本主义继续支配着政治经济。我们再次看到一种双重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胜利；由第二种国家形式的政党民主改革、从天主教到一种世俗的中央集权化福利主义道德的思想意识以及改革国家军国主义的最后努力所共同做出的调解。

美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民主和邦联制的故乡。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它的国家权力最弱。内战猛然地转变了这一切。美国北方，尤其是南方，在国家干预方面比其他任何一个 19 世纪国家走得都要远。南部邦联严重武断地干预自由劳动和私人财产权并欺凌地方和中央的政府以及海关——是对为各州争取权利的政体的讽刺。资源基础更庞大、更丰富的北部联邦更多地依赖于对制造业商品供应的市场刺激。但是在创建第一个国家信贷体系和独立于英国的金融资本阶级方面，这种“北方式的利维坦政体”尤其信奉干涉主义(Bensel, 1900：ch. 3)。内战以后，虽然巨大的国家行政机构很快解体，但获胜的联盟保留了内聚性，并发起全国的经济大发展，在南方重建期间，它还直接控制了整个南方。正如本塞尔所观察到的，在内战期间，美国成为一党制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由北方金融界、工业界和自由土地农民组成的共和党显要们充斥着国家机构。然而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有效结合了专制权力和行政机构权力的各州不是依靠其独立自主的精英们，而是依赖于在市民社会的政党中被制度化的精英。

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强大的国家”联盟是脆弱的。大多数根源于地方性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在南方重建中失去兴趣并转而准备对付南方的民

主党。政党的派别性重新浮出水面。为保住总统职位，保守的共和党人被迫在1877年制定了一项选举政策，将自治权归还南方。政府又重新回到南北战争之前的形式：一种“法庭与政党”的形式，根源于地方的政党派别控制了占优势的小规模邦联，它的法院被放任主义和地方主义所统治，它那最具凝聚力和目的性的政党派别(南方民主党人)坚定地反对中央国家权力(Keller, 1977; Skowronek, 1982, p.30; Bensel, 1900, ch.7)。

同北方一样，美国的资本主义此时开始发展了，而南方仍是死水一潭，其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赋予地方资本主义以各种相当独特的形式，同时又存在着顽固地反对联邦国家的各种力量。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北方资本主义也经历了与中产阶级之间集中在宗教道德主义的紧张关系。但是它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因素：它的自由个人主义太强，而它的企业公司比其他国家发展的规模更大。由于各企业与政党派别活动密切结合并寻求地方和国家政府的特权，因此出现了“公司腐败”的恶臭。因此，同他们的极端对立面南方民主党人一样，改革者也在寻求缩小而不是扩大政府的基础设施(Orloff, 1988)。然而华盛顿与其他四个首都(如果算上布达佩斯，就是五个)不同，它不是一个主要的、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城市。作为一座小型的，前工业化的南方城市，华盛顿不容易受现代企业公司所控制。因此，部分企业开始在联邦政府一级支持“现代化”改革。进步运动推进了这些有点自相矛盾的潮流。另外，它还推动了中产阶级在教育、教派性的宗教福利主义、中产阶级女权主义方面的既得利益，以及有工会组织的熟练工人的利益。所有这些(除了女权主义者)都在两党中得到牢固确立。这些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同政府层上表现不同，但始终设法迫使在联邦政府的层次上与南方民主党达成一致，这给总结进步运动带来困难(对于专业历史学家以及非专业的门外汉皆然)。但是，一旦公司受到极小的限制，自由资本主义和南方各州的权力交织而产生的牢固的力量，就不容许中央国家对资本主义(及种族资本主义)有任何道德约束。

在所有三个党派民主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形式继续保持繁荣。国

家的干涉仍然有限并有助于资本主义(除了美国南方)。然而几乎不存在再分配。在这些领域中精英理论不再适用，多元主义则受到超劳工的资本支配权的限制——阶级理论在这里适用。但是集中于国家干涉的限制性因素低估了出现的各种民族国家形式。英国和法国——甚至弱小的联邦制美国——都是对历史的根本背离。19 世纪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没能根本地改变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或者市民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权力分配对比。如果这就是全部历史，那么最终资本主义形式将处于首位。但是这些国家也改变了聚合性权力关系，也就是市民社会自身的身份，资本主义本身也正是如此。随着对两种历史性可选择的相互作用网络，即区域性社会和跨国舞台的抵制，每个基础设施都趋于增加现存国家的领土边界和国民的内聚性。

尽管资本主义打破了地方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原则并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但其古典思想家们(以及反对者)更主要地是期待它能跨越国界。然而，很多人没有对此作出这样的打算，“全国性”铁路、公路、公共设施、公共健康、警察部门、法庭和监狱以及教育和使用国家主导语言进行扫盲，这些都为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中央集权化的基础设施。但是由于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都受到美国南部地方名流的蓄意阻挠，因此，美国民族保留了与众不同的地方性。在几乎所有的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毫无意识地驶离跨越国界的权力组织，向国家权力组织发展。

不仅政党民主，所有国家的全国性基础设施也都得到了发展。仅从 1882 年到 1907 年的二十五年中，五个国家的人均邮寄信件的数量就上升了 2 到 4 倍。到 1907 年，平均每个法国人每年邮寄 34 封信件或贺卡；奥地利人是 46 封，德国人是 69 封，英国人是 88 封，而美国人则是 89 封(*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1913, p.205)。几乎所有这些广泛的私人和商业通讯网络都被限制在一国领土之内。在整个西方，民众的正规学校的教育发展水平几乎惊人地相同。在五个国家中年龄在 5 到 14 岁之间的儿童在校比例从 74%(奥地利帝国)到 88%(法国)之间

(Mitchell, 1975, pp.29—54, 750—759; 尽管奥地利帝国的匈牙利部分处于落后状态，其比例为 54%)。 地区差别开始明显缩小，这一直持续了整个 20 世纪。 在所有的五个国家中，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地区工资水平处于或是停滞或是不断增长的状态，随后从大约 1880 年开始这种变化减弱。 对住宅估价的地区性差异显示了类似的倾向(Good, 1984, pp.245—250; Soderberg, 1985, tables1 and 2)。 不仅出版的文字而且复制的图片都增加了国家的一体化。 君主或总统挂在墙上的照片也都象征了地方行政官职并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报纸和杂志都再现了加冕典礼、检阅军队和议会开会这些全国性仪式的场景。

人口统计资料——女性生育率、私生率和结婚年龄——似乎与民族国家无关。 毕竟，这些方面表明了这一固有情况即主要的直接管理者是跨国的教会和民间习俗而不是国家。 然而沃特金斯(1991)指出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间，由于每个民族国家都明确得出了自己的标准化全国人口统计图表，各地区人口统计数据的差异正在缩小，但她没有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授予国籍的做法已采用了多久(或者到其他任何中间时期)；然而在很长时期里，性已民族化了。

考虑到第七章的讨论，这毫不令人惊讶。 在第七章中，我论述了阶级和国家的动员力量来自于它们将外部组织与由亲密家庭和社区关系所产生的内部组织联系起来的能力。 到 19 世纪末，这种能力对国家政策制定者来说已很明显。 英国的改革者开始发展集中领域作为全国公民的基本形式。 他们对家庭安排、父母责任、性道德、身体上和道德上的“健康”、“优秀的母亲”和“健康的”(指身体和道德的双重意义)家庭、邻居和学校等等的立法产生了影响。 优生学是家庭生育与国家联系最为紧密的思想意识。 政治家们和 20 世纪受人欢迎的作家们通常以一种惊人的帝国主义语言来表述它：

我知道帝国是不可能在步履蹒跚、垂头丧气的公民中建立。

> 因为我知道帝国“不是来自擦亮的枪支，而是来自孩子和婴儿们的口中，他们具有上帝赋予的力量，可以镇住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仇人……”
>
> 各民族的历史不取决于战场，而是由托儿所来主宰，最终取得胜利的军队，是婴儿的部队。(Davin, 1978, pp.17, 29)

对优生学的看法也是更温和，更随意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时，社会风气一改维多利亚时代在两性关系中过分拘谨的状态，鼓励女孩将两性关系发展成婚姻、生育的爱(Bland, 1982)，并且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运用一种“母性的民族主义”言辞来寻求福利收益(Koven and Michel, 1990; 毫无疑问，奥地利也是如此)。各阶级的家庭和邻居，不仅仅包括成年男性的政治公民，正作为一个互相影响、情感丰富的团结社团进入国家。

尽管我对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知之甚少，但19世纪的个人身份观念一定有巨大变化。私人的和社会的个人行为都被限制在国家之内，地方性和跨国界的身份一定是在无意识中衰弱的，它没有表现出许多权力冲突。甚至那些权力来自以前的地方或跨国组织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地方名流、天主教教士、马克思主义的斗士，也似乎在自己的感觉中更具“国家性”。这在以前各著名政党中已明显出现，并且正如我在第二十一章中所指出的，它也逐渐减弱了工人组织跨国界的说服力量。市民社会的全国性组织以及资本主义和它的各阶层的全国性组织大量增加。国家的基础造就了民族国家。

当然，每个国家都独具特性。在英国，一个世纪以来无论在工业化之前还是在国家职能扩展之前，国家和一个“统治阶级的民族”碰巧合二为一。到1800年，这一阶级—国家在整个英格兰都是同民族的，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程度略弱一些。英国的新教教徒统治着爱尔兰。语言和文字仅使用英语；这也是出于最实际的目的，在英国本土和海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它的生产、交易和消费严重依赖其军队；

它开始从政治上更加集中于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国家基础性权力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在国家和民族的融合上工业化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经历了二个阶段。英国的社会生活已经很大程度上英吉利化了(以它自己独特的英国和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的双重形式)。

法国和美国略有不同。早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法兰西民族的城市资产阶级就已实现了政治化。因此中产阶级可以比其他国家更早加入(或反对)一个共和化的民族。尤金 · 韦伯(1976)指出这一资产阶级民族只在 19 世纪末扩散入各省和农民之间，这主要通过我所认定的那些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邮政和教育等进行的。同样，在一个分裂的世纪中，大规模的公民军队(在这个世纪的多数时间中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其军队比例都是最高的)和共和国的政治运动也起到了某些作用。事实上，共和国政府在有意识地通过扩大国家基础设施来稳固它们自己的政权。它们的反对者(尤其是天主教教会)，更多地盘踞于地方社区，并主张权力分散。因此铁路修建背后的一个有力动机就是使分散的共和国要塞易于互相通讯和资本流通。从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共和党人的民族国家取得了胜利。

美国统治阶级也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但除了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在一项与众不同的工作上起到辅助作用——在讲多种语言的下层社会移民中创造出一个只讲英语的民族。尽管全国教育专家网确定了统一的教育模式，但大部分教育机构都是由各州经办的。美国相对孤立于其他先进国家，这也促使其发展了一种比其他国家更自足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更全国化的市场和企业组织。联邦政府的基础设施既可以说是民族的市民社会的起因，也可说是其结果(Skowronek, 1982，指出它更是一种结果，但以后才明白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民族呈现出的是更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化，而超民族主义。

但在整个西方世界，邮政服务、学校和铁路才导致了民族和具有全国组织的阶级产生。一部分国家服务机构——健康法规、警察、法院

和监狱——也提供了更多的官方干涉。但是大部分机构仅仅提供了“地下”设施，如光洁的瓷制排污管。通过这些设施，区域性(或移民)差异的混合导致了全国的权力界定网。在不知不觉中，国家基础设施导致了民族国家的产生。

然而有些国家却无此幸运。它们的语言和宗教团体混杂于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之中。而且，正如下文指出的那样，这些在工业化上相对迟来的国家经历了更加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部分经济可能比民族经济更紧密地与国外相结合。在这方面尤其混杂的有俄国、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在奥地利的领土上，国家、工业化、语言和政治公民权的斗争遏制着不同的地域范围(正如第十章所指出的)。君主制渴望工业化，但这也可能造成更多的跨民族性和地区性的相互依赖，甚至比其全部版图的依赖性更强。它希望扫盲，但如果有些人持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它将使用何种语言？如果它为了政治参与权而牺牲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要求，那将是加强他们对现存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忠诚，还是促使他们支持与其竞争的地方国家呢？四种相互支持的力量在其他地方创造着民族—国家——一个国家有着更协调的基础设施，相对平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共同的语言团体，以及各阶级普遍要求的政治参与权——在奥地利、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不具备这些条件。

晚期发展和军事工业的复合体

西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多重权力运作者的文明世界”，交流着文化信息、商品货物和受竞争的地缘政治外交和战争所控制的各种服务。一旦工业化在某些国家中实施，它会很快扩散到其他地方。正如它极大地推动了集体权力一样，它会立刻被其他大部分主导权力网络所接受和发展，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正在兴起的技术知识界的通讯网络起

到支持作用。在“后来者”的国家中，知识分子认识到早期工业化的长处与不足，并敦促国家精英党派计划他们自己的改革。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由后来者们发起的各种挑战也迫使早期工业化国家去适应它。尽管经济是主要手段(利用大量的工业权力)，但权力的运作者和目标不同。统治权力运作者的所有四种类型——思想意识、经济、军事和政治——在发展战略中相互结合。尽管美国和奥地利落在后面，但它们的结合通常是无意识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许多经济历史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发展战略问题。格申克龙(1962，1965)提出了后发展的经典理论。他将后起国家工业化的成功实现归因于：(1)在发展中存在一种比在英国更强烈的“爆发力”；(2)对生产者的商品有更大的压力；(3)更大规模的工厂和企业；(4)对大众消费水平造成更大压力；(5)农业扮演次要角色；(6)各大银行起了更积极的作用；(7)政府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后起的国家发展速度更快是因为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权威工业及金融公司之间密切协调的极大帮助。国家精英和各党派改组国家财政以寻求制定宏观经济适度通货膨胀的信用政策。他们组建信贷银行，为工业和农业提供贷款；吸引英国的熟练工人并资助典范工厂；能建立或资助铁路和其他通讯基础设施；尤其扩大教育规模。最后，他们鼓励合并和卡特尔，以建立可以在科学研究和机械设备上投资的大型企业。国家精英和资本主义各政党在共同的利益追求中结成了联盟(Senghaas, 1985 对上述后期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

由于事后的思考，我们也能领悟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即国家领土内的经济相对平衡。如果政府的扶持发展进行得太迟缓或不平衡，那么不同的经济部门或经济地区可能变得更加依赖于跨国经济而不是国内经济。在这种“本国境内的外国领土”发展道路上，“买办”阶层可能希望保持自己国家的软弱以便与外国资本联合，甚至与其他国家联合，这一状况在 20 世纪的发展中国家日显突出。尽管在 19 世纪跨国阶级阵线没有走得太远，但发展的不平衡能动摇一个国家，迫使精英政党关

注于内部社会的紧张局势而不是地缘经济的发展。

在第一次后起国家的发展浪潮中，普鲁士德国、瑞典、日本和意大利(仅在北方)拥有相当平衡、弥散和商业化的社会。德国的成功依靠于由国家调解农业与工业化的特殊关系(参见第九章)。毫无疑问，瑞典、日本和北意大利同样具有偶然性。但在这些强国之后出现了不同的情况。俄国和奥地利这两个较大的、更具多样化的后起帝国，以政治经济的不稳定为代价，获得了快速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1908年以后，俄国存在着政府支持工业发展的短期努力，前两个时期是由外国资本引发，而后一个时期则是由国内资本引起。在最后的阶段中，俄国的工业化是相当成功的(Mckay, 1970)。但农业更为关键，因为粮食出口换回资本和资本货物的输入。政府忙于进行农业改革，但在改革社会的动乱中受阻。奥地利发现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无法更多地增加本国的内聚力(参见第十章)，后期发展战略可能促使经济增长，但同样也会导致分裂。德国的后期发展行为被证实很难向东转移。

为什么国家精英和政党采取这种后期战略呢？为什么与发展相对应的是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主张？中央集权的地方性计划不是发展的必然特征，本书第一卷分析了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发展的两种类型：一类是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统治帝国”的产物，而另一类是政权分散的“多重权力运作者的文明世界”的产物。欧洲已成为后者的典型例子，并由于工业革命这只“无形的手”而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要来自军事征服与统治：很明显，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中央集权经济统制下经济发展的一种更和平的形式。我对此确定出六种原因，前四种原因与后期发展理论的经济主义完全一致(我特别取自Pollard, 1981；参见Kemp, 1978)，第五和第六种原因源自非经济的国家形式。

1. 所渴求的发展是明确的并且对之作出权威性计划。在后发展的欧洲和在相对发达并受欧洲大国影响的非欧洲国家，前途似乎很明朗。在竞争性地缘政治中，工业化国家能动员起更多更强的集体权力；其他

国家不得不作出反应或被统治。“科学先生和工业先生”——正如诸多中国作家所说的——由于他们权力的必要性，最终会引起所有权力运作者的注意。

2. 发展资源受益于权威的中央集权化的地区组织。很明显一些工业部门得到了大规模组织的更多帮助。铁路需要大量资本投资并带动了钢铁、煤矿和工程建筑这些投资密集的工业。1880 年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大了企业规模，尤其是扩大了金属制造业、化学工业和矿业的规模。权威组织可能得到公司支持，但国家可能适合于更加地区化的中心资源如关税、货币和主要信贷投机。铁路和其他输送物资和信息的设施有一个地区的、通常是“全国的”基础。在这方面有竞争力的后勤是关键。如果国家建起了一个全国性铁路网，国内市场就会被激活。在 19 世纪各国工业沿着交通线路，从关键的煤炭自然资源开始迅速扩散开来。尽管铁、钢和位于煤田附近的工程行业产量不及英国，但在国内市场仍有竞争力，这是因为运费较低。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者也是如此。到 20 世纪末交通运输网遍布全球，但 19 世纪的交通通信类似于第九章所论述的那些纵横交错的全国性交通网。市场在一国领土内实现了一体化。

3. 市民社会的运作者没有能力组织起如此集中化的地域资源。这种能力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变化。但经过漫长的 19 世纪，政府的组织和规划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私人经济机构。与政府相比，各资本主义企业仍然弱小。1910 年，克虏伯铸钢厂是欧洲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它拥有 6.4 万名员工和大约 6 亿马克的营业额(Feldenkirchen, 1988, p.144)。然而普鲁士—黑森的国家铁路雇用员工 56 万名，耗资 30 亿马克。政府的一个部，普鲁士公共工程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雇主，其员工比 68 万人的军队还要多(Kunz, 1990, p.37)。其他文职机构和军队的规模大致相当，资本主义公司较小：最大的法国公司是施奈德公司，仅雇用了 2 万名员工(Daviet, 1988, p.70)。

在每个国家众多的小型公司中，大型企业都如鱼群中的孤鲸。

1910 年，法国仅有 5%、德国有 8%和美国有 15%的劳动力就职于超过 1 000名雇员的企业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这些数字分别上升到 28%，20%和 30%(Pryor, 1973, p.153; Mayer, 1981, pp.35—78; Trebilcock, 1981, p.69)。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劳动力的集中率上升，但也仅上升到 20 世纪 60 年代水平的 1／2 到 1／3 之间：1910 年，法国百家最大的公司占全国制造业产量的 12%，在英国这一比例为 15%，在美国则是 22%(Hannah, 1975; Prais, 1981, p.4，附录 E；Daviet, 1988, pp.70—73)。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仅仅在美国那些最小的州和大多数企业，还没有明显出现国家代理前期的经济计划。

各银行、卡特尔和托拉斯所调动的资本远远不及国家精英。在早期工业发展中，英国资产阶级基本是自筹资金，而在较为落后或中央集权化较低的国家中，私人投资者仅在政策的帮助下，才能提供这种资本。国家精英用关税保护生产者，筹划地方投资者和银行的卡特尔，从国外银行家手中调剂贷款，并用收税来降低并保证利息率。大规模经济发展的计划依赖于国家。

4. 发展得到市民社会中国家精英及／或非经济性权力运作者的支持。[1] 在 19 世纪大多数首要运作者之间出现了一种经济共识。一时间仅有天主教教会反对国家和“现代主义”。19 世纪中叶工业发展得到大多数人的狂热拥护。国家基础设施由于技术上有助于工业而被接受，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概念加入到新古典主义的利率概念中：旧体制和资产阶级也指望国家来保护他们共同的财产权，以反对无产阶级。理查德 · 梯利(1966)认为，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在 1848 年革命中所造就的团结使他们能够共同扩大和发展普鲁士国家的基础设施。

但是即使所有这四种经济压力的联合也无法明确要求国家来协调发展。在国家的一些特别规章制度的帮助下，金融家的寡头政治协调了自己的大部分任务。20 世纪末，除了那些单一民族国家外，各种计划机构——协同行动的跨国公司、非官方机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类似组织都已建立起来。今天，在第三世界中，后发展的尝试趋于在相对

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与相对市场战略之进行间循环摆动。尽管这是必要的，但各种经济关系和利益是对19世纪的后发展国家为什么如此强烈地依赖于中央政府这一问题所作出的不适当的辩解。我将续继确定两个进一步的影响。

5. 军国主义的国家形式支持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经济发展。第十一章中的开支数据表明19世纪末，国家开始大规模军事化并以半军事化结束。地缘政治和军事压力不断地在后发展国家间增强了规模和权威组织，此后它们在各国中也是如此做的(Sen, 1984)。所有国家甚至美国在整个漫长的19世纪，武装力量是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组织。和平时期，军队是最大的私人企业规模的10倍，战争时期达到50倍。在大多数主要的工业国家，最大的客户就是政府，它购买士兵和水兵的武器、制服和弹药，另外还有官员、法院和首都城市的奢侈品。早先，军事供给来自国家控制的军舰修造厂和兵工厂或通过自主转包人的途径购于大量的手工作坊。这两种做法使国家机构与资本主义企业出现分离，从而使较早处于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经济发展速度降最慢。但是在19世纪出现了首次的现代意义上的一体化“军事工业复全体”，它历经向前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铁路加强了军方介入经济发展的动机。在最初的怀疑之后，最高统帅部看到铁路能够彻底改革军事后勤。甚至英国交通线路的规划都受到海军要求确保港口和海军船坞的通信设施的压力影响。在其他国家，最高统帅部、国家精英和资产阶级在建设全国铁路网中相互更加密切地合作。发展越晚，帮着设计路线的军队就越多，因为在许多战争中铁路影响了战争结果——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役中法国受益，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受益，1866年和1870年普鲁士受益。此后在法国、俄国、奥地利或德国，新的线路需要军队的允许和参与。国家的监督增加(Pearton, 1984, p.24)。

第二阶级随着19世纪80年代的军备竞赛开始发展，麦克尼尔(1983, p.279)称之为“指挥技术”。一直到世纪下半叶它是以资本家开辟的大

规模枪炮和弹药生产为先导——普鲁士的后膛装弹炮，法国的米涅式加长子弹和美国使用可替换机械部件的科尔特 6 发左轮手枪及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此后法国海军船坞率先使用装甲战列舰，军备竞赛随之而来。生产规模通过联合企业和卡特尔逐步升级(由于政府的鼓励)制造商(正如在今天的美国)拥有唯一的支配性顾客，对于这些顾客来说，产品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各军事国家不得不拥有这些产品，几乎无论费用如何。他们的“介入”，虽然主要是由于引诱力，但国家在一定范围内为武器生产提供的公共信贷，其规模使私人资本市场望而却步。特里比尔科克(1973)确信，在 1890 年到 1914 年之间，其规模比得上更早时期的铁路投资。技术受军事的“命令”而向前发展。从通过贝塞麦炼钢方法制造的可互换的机械部件，到全部轻金属合金、涡轮机、柴油机和液压机，这一时期主要的技术突破都是这种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副产品。制造商已有客户保障，在面对不断增长的国际竞争时，能够在研究上比其他工业倾注得更多(Trebilcoch, 1969, p.48; Pearton, 1984, p.77—86)。

面对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无畏级战舰的图片，这艘 1906 年军备竞赛的极品，我们发现很难理解，这种战争舰以其巨大的球状船体，角状的上层结构和那无数的隆起，曾经一度似乎是如同今天设计豪华的 F-17 歼击机或三叉戟级潜艇一样是高技术和极先进的。但无畏战舰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它们是由当时最大的工业集团所建造，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并产生了历史上最集中的火力。与今天的类似企业不同，它们同时也提供了大量雇佣职位。

美国军事的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发展首先仅在形式上不同，随后便落在后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更关注于扩张和大陆联盟的一体化，而不是与主要的强国进行军事竞争。但是对于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政府各部特许并资助纵横大陆的运河及随后的铁路修建，以辅佐军队屠杀印第安人，为军队提供工程服务。内战突然产生了大量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联邦得到维护，使大陆一体化并促

进了工业集中。大量的战争债务，由政府公债提供资金偿还，扩大了股票市场，同时也资助了铁路公司。正如本塞尔(1990)指出的，国家有效地创立了一个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

美国大型企业的兴趣通常以纯技术和资本主义逻辑的措词来解释(Chandler, 1977; Tedlow, 1988)，但是正如罗伊(1990, p.30)所观察到的，“创建各企业公司的决定性运作者是政府”。事实上，他指的是各州政府，因为主要是由各州政府进行协调管理。然而在接近19世纪末，随着对北美大陆的深入，且几乎没有地缘政治的压力，美国经济比其他民族国家更缺少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它那巨大的大陆市场引起了著名的企业革新——福特公司的T型车、西尔斯 · 罗巴克目录表、电灯泡——然而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另一个公司支柱——德国，具有实质上的“受控制的”经济。

6. 君主制的国家形式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经济发展。不像大多数早期工业化国家，多数后发展国家是集中在旧体制上的君主政体，独立的君主大国受旧体制党派支持，这些党派比那些统治阶级政党更具狭隘性。君主制与旧体制联盟拥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可以绕过议会来寻求国库财源。第八章和第十一章指出这些国家从国家财产中利用税收和岁入达此目的。而国家铁路提供给国库额外的收入，普鲁士国家的一半岁入都来源于此。为了国家岁入，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和国有化工业都受到所有铁路的压榨。

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军方和较少的君主政权推动后发展战略；而后，混杂在一起的军事动机与资本主义动机通过地缘政治的竞争扩展到政党民主制。因为主要国家各形式之间的关系是经双方同意而产生的，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前述的第四个前提。逐渐地，国家精英和政党、最高统帅部和资产阶级所制订的各项政策(尽管缺乏言辞修饰)包含着一个工业化社会所渴望的目标，但是如果不管市场那只跨国的“无形之手”，那么也无法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一目标。

因此，这又是一个国家干涉不利于市民社会权力运作者的难得例

证。正如吉登斯(1985)所提出的，随着权力的重新排列，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维坦式政体。对于地域渗透，后勤上的障碍正在消逝；国家基础设施均匀地遍布于市民社会，从而减少了国家中的历史隔离性；一部分统治阶级希望给予政治统治制定经济规章制度的权力，甚至是主创权力。但是在政党民主中，“干涉”主要是协调、劝说和劝诱，而不是压制。尽管君主政体利用国库岁入的便利规避政党民主，但它们并未使其反对资产阶级。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君主们、旧体制政党、最高统帅部和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有时为了利益相互竞争，但它们并非处于辩证的、正面冲突中。资本家欢迎国家的信贷、通信基础设施和保护。军备竞赛保护了它们的资金与商品市场，同时充分就业创造了商品消费市场。它们认识到虽然最高统帅部和国家精英的利益并不是它们的利益，而且双方共同利益很少，但总体上双方的交易是有益的。君主制政府声称它们修筑铁路，建立国家工业并特许私人发展工业，是本着一种中立的，专家治国的原则。一个普鲁士的商业部长声称“由谁修筑铁路不是问题，只要有人修筑这些铁路”(Henderson, 1958, p. 187)。后起的国家协助私人资本家发展经济并通过协助军队来掌握并扩大经济发展。同时它们也可以安心地利用岁入所得来规避政党民主。

由于资本家、军队和君主政权的目标及形式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无人能从它们之间作出选择。政府的形式是累积的结果，我们将发现其结果是一场灾难。国家精英和政党很少反对资本主义。事实上，它们需要赚钱的工业，以获取商品和税收。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也支持私人财产权。当政府与阶级问题发生正面冲突时，它们通常与统治阶级站在一起，尽管这可能由于它们对道德和公共秩序的追求而有所缓和。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外交中政府的自主权比在国内政策中要大的多。在国内政策中，政府的自主权更多地运用于从属阶级而非统治阶级。

但政府并非仅仅维护资本家的财产，国家资源的一半被用于同其他

国家的军事竞争。由于军事和资本主义形式交织在一起，政府和资本家阶级都拥有更庞大的全国性组织和更加地域化的利益概念。这并非任何一方的意图。由于地缘政治的竞争又反作用于各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因此它们的组织变得更具全国性，它们的利益概念更具地区性。这就是19世纪各国主要的权力自治，不是一国精英蓄意制定策略，而主要是四个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政府形式所产生的无意识后果。这四个形式是：资本家、军队、民主政党或君主政党，以及正兴起的民族国家。

社会公民权、军国主义和君主政治

从表11.5中可以看到国家民用范围的三大扩展部分。在讨论了基础设施的扩展和资源的国有化以后，我开始转而讨论三个部分中最次要的部分：福利事业，并讨论马歇尔的“社会公民权”的第一次运动。如表11.5所指出的，在福利方面政党民主并不是花钱最多的。的确，英国和法国刚刚开始现代福利事业的计划，而且英国在这一时期末，明确地转向实施累进税制。但德国仍是最大的福利支出国，最著名的项目是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尽管直到1913年，它的费用才超过由地方管理的社会援助计划和《济贫法》计划(Steinmetz, 1990a, 1990b)。表11.5也忽视了法国和美国从军费中支出的巨大福利开支。最早的福利国家运动大多出现在军事和君主制国家。

现在各级政权都存在着更大的“管理”问题。资本主义和城市化已削弱了对下层社会的部门性控制。无产阶级劳动者屈从于资本家市场，周期性地经历贫困、流动和反叛的状态。随着商业化横扫乡村，农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因为资本主义也给予工人和农民以集体行动的权力(参见以后各章)，所以需要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管理形式，尤其在新兴城市。

很久以来“良好秩序”的政权措施就是双重的，即“管理”与“福利”相结合。我们在第十二章中注意到，现在管理变得更为多样化，开始是准军事力量，后来是经济警察的出现。福利也更加多种多样。传统上，地方性的《济贫法》已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工业化，地缘政治的变动性和部门性失业，更加不稳定地增加了《济贫法》的费用，使这些法规的实施十分勉强。在英国和整个德国(以及也可能在有着更贫困记录的国家)，19 世纪前半期的《济贫法》成为最大的国内支出。救济是最低限度的，穷人几乎没有权利的意识尤其是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贫困、体弱或年迈的人，如能通过在工厂做工而表明自己“有用”，可能不会饿死。但另外两种福利方式也已发展起来：自我保险和选择性国家福利。这不是指广泛的公民权而是地区性特别是部门性福利，它寻求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建立起忠诚者的网络。

自我保险从下层社会出现，来自各类互助会，这是早期工会组织的主要“保护性”功能(参见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这些工会在相对熟练工人中和在稳定的行业中广泛发展，并且因此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有些时候甚至是鼓励，因为它预示了节俭和体面，从“危险阶级”的下层排除了手工业者。他们可能在社会下层中鼓励地方主义，但直到这个时期的最末期他们都没有更多地涉及到政府。

在此之前，许多国家都已推行部门性福利计划。现代的法国和美国诞生于武装革命斗争和大规模动员战争。许多成年男子在保卫“他们的”国家中丧失生命或者残废。对残废军人和阵亡士兵的家属，对那些孤儿寡妇进行补偿的旧式特别支出被制度化，其金额也得到增加。在法国革命人士提出了一项对老兵和受伤士兵的抚恤金计划，并由波拿巴进一步强化。到 1813 年，它要花费全部军事预算的 13%，超过 10 万名老兵接受了抚恤金。这一比例和数字一直保持到 1914 年(Woloch, 1979, pp. 207—208)。

美国联邦政府从 18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为老兵和被扶养的家属支付伤残和阵亡抚恤金，到 1820 年，抚恤金的数额超过了所有民用支出。在

每次战后的第二十年和第三十年这笔费用支出达到顶峰，然后渐减。内战将抚恤金扩大到名副其实的老年养老金系统。到 1900 年，有一半本国出生的白人老年男子接受了这种养老金。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老兵的投票者占全部选民的 12%到 15%。1890 年，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达到 42.8 万人，超过所有工会人数的一半。1892 年到 1900 年之间，军队抚恤金再次超过所有联邦民用支出以后，才有所减少。但是从 1882 年到 1916 年这些抚恤金花费了所有联邦支出的 22%到 43%。尽管更贫困的邦联各州未支付抚恤金，但是南方各州大多数从 19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批准了(拮据地)这些抚恤金。美国有了第一个福利州，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但它仅限于那些已对他们的州表示忠诚的人(这一段引自 Orloff 和 Skocpol 的研究，参见 Orloff，1988)。

事实上，美国和法国的公民权有一种军事色彩。有时，法国人将公民权作为兵役定义为——兵役的血税。美国宪法确立了公民军队——在宪法条款中通常被解释为保证携带武器的权利(包括自动武器)。这些州将自己根植于公民士兵中，报答他们昔日的服役并从那不包括老兵的社会团体中贿买政治支持。19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政体缺少在农民大众中的渗透性。一支大规模的、报酬优厚的军队在每一个法国村庄都建立一个忠实的基层单位。到 1811 年，大多数部门每 1 000 人中就至少有 3 个领取退休金者(Woloch, 1979, pp. 221—229)。这似乎并不多，但这可能是 19 世纪早期的国家向市民社会最彻底的渗透。美国则不同。白人成年男子选举权和两党体制导致了为争夺农民和工人的投票而进行的竞争。白人工人和工业资本之间的北方共和党人联盟出现了。北方工人对税收的赞同部分是用老兵的薪水买到的。这些“社会公民权”是有选择和部门性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各政权是从农民和工人手中获得了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忠诚，不像在农业社会里存在着对血统和地方的狭隘忠诚。

在老兵的养老金方面，普鲁士德国和奥地利没有跟随法国和美国。然而它们的老兵，尤其是军士级别，被给予在国家平民就业中享有优先

受雇权(在法国也存在这种状况)，正如第十三章中所解释的。另外，这一政策与第三种方式相联系：首先由俾斯麦提出选择性的福利方案。

后发展的国家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并预料到危险及利益。去英国访问的外国人不仅注意到其先进的技术、经济活力和议会，也发现其城市的污秽、犯罪和阶级冲突。日益以国家为中心的德国知识界，对宪章运动十分了解，并从如果将工业化留给“无形的手”来操纵可能发生的一切吸取教训。他们称之为“英国病”，即阶级冲突，俾斯麦认为正是这一弊病致命地削弱了1870年的法国军队。他们研究英国的《济贫法》、合作社和互助会，法国的全国性工厂，比利时和法国的疾病和老年退休金的保险基金，以及比利时的互助团体。在德国流行的保险模式是自由的自助模式，这是与一种“社会的”或“家长君主制”模式相对抗(Reulecke, 1981)。王朝君主已实行了特殊的福利政策。1776年普鲁士将矿工日工作时间限制为八小时，保证其固定收入，禁用童工和女工，并且使保险金制度化，所有这些都是免除矿工兵役的结果。在玛丽亚·特里萨和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各部长所采用的各种福利措施，后来却因资金缺乏而中止。

但是德国首先将特定补助金改成普通的补助金。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从1885年开始实行起，占德意志帝国费用支出的10%，在实施10年后达到20%，到1910年达到30%。鉴于几乎所有剩余的费用均用于军事，我们可以看到立法的重要性。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工人们保护自己免于贫困，并劝说雇主对他们施以援助。然而其他国家并未效仿。1885年到1887年奥地利采取类似做法，但它的保险范围很小(Macartner, 1971, p. 633; Flora and Alber, 1981)。即使德国的立法也并不是完全慷慨大方的。它提供了低水平的意外事故和疾病补偿金，但仅覆盖了受雇人员的一半，并且仅够给年满70岁的人以养老金(后来降为66岁)——如果工人每年已工作300天并工作了48年。只有养老金包含了国家对保险额的分担，所以这个计划更主要的是强制性自我保险，它没有触及更有争议的工厂安全或工作监察的问题，这些问题本来能防止意

外事故和疾病(Tampke, 1981)。这可能侵犯了财产权。

俾斯麦试图部分控制劳工，希望诱导有熟练技术、有组织的工人放弃社会主义。社会保险的立法是他的政治诱骗，《反社会民主党法》则是他手中的棍棒。他没有从工人那里寻找到积极的热情，仅仅使阶级斗争不能损害到国家和军队。但对于更多地缓解工业中熟练工人的基本贫困这一目的来说，似乎足以达到其目的了。

但是也潜伏着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俾斯麦的立法扩大了许多已在某些大型重工业中确立的政策(Ullman, 1981)。大工厂主是实施老年及残疾养老金和意外工伤保险立法的主要支持者(尽管后来他们反对失业保险)。最初，持反对态度的是较小的雇主。事实上，与早先的打算相比，由于资金的短缺，俾斯麦被迫更多地采纳自我保险原则，而这一原则正是由大企业的雇主们提倡的。此后，在新兴的轻工业部门中，福利计划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因为这些企业的合格产品具体地体现了工人的工作动机。他们趋向于按资本主义的方式使福利"商品化"(Steinmetz, 1990a, 1990b)。与其说俾斯麦的立法所预期的是福利国家(正如通常所争论的那样)，不如说是20世纪末美国和日本的企业：从公司内部劳工市场中获利的工人，成为资本主义的忠实者(有时忠于军国主义)，他们拒绝工会和社会主义。正如马歇尔所论证的一样，它试图使阶级冲突制度化，但是是以部门组织来回避阶级，这些组织将享有特权的工人与他们的雇主及国家拴在一起。

因此，早期的法国、美国、和德国减轻贫困的计划具体表现为两个原则，一个是从国家中得到的军事公民权，另一个是得到君主制度和公司资本主义支持的自我保险。两者都不是全体公民所能享有的权利(更非全部成年人的权利)。各项权利的给予是有选择的，仅仅给予那些为资本和政权提供关键军事或经济动力资源的人。其意图以及有时产生的影响，是将阶级意识一步步地改变成国家主义或地方主义。

然而，这两个计划彻底地扩大了国家的活动，并远远超出了地方部门的权力网络。它们通过政党民主也是可扩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许多英国的自由党人，美国的民主党人和法国的激进分子开始将福利与累进税制联系起来。 自由党由于受到一个有创造性和说服力的政治家推动，在 1914 年以前制订立法。 劳埃德 · 乔治将工会和私人保险公司计划纳入一个由政府管理的更加综合的体系。 享受保险仍不是普通的公民权利，因为这些保险金的使用被限制于有正式稳定职业的人，但这太过广泛，不适于部门性分而治之的战略，尽管实施保险金的意图是削弱劳工党。 但更重要的是，保险金是与累进收入税制相提并论的。 通过其他人的财富，将有组织的解除部分人的贫困：社会公民权首次得到国家承认。 现代化正开始经历它的第三次巨变。

隐藏在各式各样计划背后的是三个主要条件——在政治上处于下层的广大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动员的战争状态，以及公司资本主义。 如果继续保留这三个条件，部门的社会军事和阶级的地方主义权利可能被改革成广泛的社会公民权。 所有三个条件的确被保留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实际上成了总体战，它涉及了所有公民。 只有在美国，部门性权利有效地经受了国家生活中的第三次巨变即社会公民权的到来。 但这个巨变发生在更近的时代，在本书所讨论的时期之后。

第十一——十四章的结论

这四章讲述了西方国家生活中发生的两次现代化巨变。 历经整个 18 世纪，这些国家已成为较大的强国。 令人惊讶的是，相对于市民社会，它们大约在 1800 年达到最大规模，此后便衰落了。 但国内仍然是传统的、狭隘的而且主要是军事的。 各国只不过负责岁入的征收和招募新兵，尽管它们也在深深地费力融入社会生活，从而使其具有政治性。 在 19 世纪末开始的第二次改革中，它们不再从(相对的)规模上扩张而是在范围上扩展。 它们的民用职能是广泛的并仍在不断扩大。 现

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化更浓，尽管远不如 18 世纪末痛苦和强烈。 到 1914 年，它们成为双重的军事—公民国家。 两次巨变相当大地冲击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 由于国家精英和各党派寻求协调他们已扩大的职能，国家变得更具代议性和官僚化。 而市民社会则“归化”为民族国家，受国家主权和边界的限制。

第二次巨变是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展，不像精英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增加国家精英的自主权和专制特权。 而是与之完全相反。 国家具有双重性、中心地位和地域性的范围、精英和政党。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被政治化，各政党比精英们更加巩固。 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于国内的公民活动，那么相对于统治阶级的活动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简化论变得似乎有道理。 在这些障眼物中，马克思指出了要害，他把 19 世纪的英国政府描述成一个资产阶级的“相互保险契约”或者是一个“为了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尽管他有点低估了道德思想意识和政党民主可能产生的对资本主义的各种限制。 这些限制引起国家更多地“干涉”资本主义自由，尽管主要是通过劝说、劝诱和隐蔽的措施，而不是通过公开敌对的立法。 总的说来，这些国家更加明显地定型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其他。 就国内而言，国家在这方面不像是一个运作者，更像是一个权力角逐的舞台。 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唯一目的造成了国家机构的内聚性。

美国和法国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情况，尽管美国在各种不同的政府场所驱散了精英和各党派——美国南方仍是例外——相反法国却使他们集中甚至聚集于首都。 当然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半独裁君主制中，甚至更多地在独裁的俄国，君主政治下的精英和政党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力(尽管很少有精英团结)。 但就是总体而言，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国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国家，即西欧和北美的国家——在公开的权力与市民社会中主要资产阶级在国内政策的冲突方面，它也并非总是如此。 但是在 19 世纪的国内政治领域中，简化经济论引起强烈共振。

上面提到的简化论极大地忽视了两种更进一步的国家形式，当它们

联合起来，会给资本主义带来彻底革命，从实际上变革整个世界的社会生活。首先，国家基础权力的增长不仅仅是中立的。它增强了前几个世纪所推动的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和归化。这种加强不是通过直接的正面斗争实现的，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阶级斗争。另外，它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没有任何人有意这么做，权力网被转向国家领土、控制、社会生活国籍化的领域，甚至还发生在与它更密切的领域，如社会身份和利益的地域化。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现代化国家逐渐定型，然后与长期存在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些斗争是关于国家将如何中央集权化和民族性或者分权化和联邦制的，从而产生全国性中央集权化的补充形式(尽管，在这方面美国落后了而且奥地利偏离到邦联主义上)。阶级简化论也忽视了第三种国家形式，即军队，它是现代国家的形式。与以前一样，现在它并不支配着国家，而是在国家内部变得更具独立性，更有能力以基础权力来控制“它的”武装力量，并且更具潜在的极端危险性(正如第十二章所提出并由第二十一章证实的一样)。

历经整个19世纪，虽然有些不平衡，但这两个更进一步的定型使资本主义和社会生活又一次变得更全国化和更地域化——因为资本主义也正对它们再次做出调整。与其他形式相比，这三种形式——即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军队——在这一时期似乎在普遍因果关系的更高层次上起作用。然而这三者从未在正面冲突中相遇，否则我们也许可以从其结果中“最终”评价他们；或者在一种有组织的妥协中相遇，对此我们可用多元理论进行评价。多数国家看起来似乎是相对和睦的，关于政府目的，各党派和精英享有广泛的共识——在英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而法国、德国和美国开始的时间则要晚二三十年，在奥地利根本不存在这一状况。然而这是一种未经思考和验证的偶然共识。各形式是“累积的”。另外，在半独裁的君主制中，它们没有对相互之间的最终矛盾加以认真考虑——尤其是，如我们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一时期政党民主或君主政权的形式增加了更具体和多变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章节里看到。但是因为国家还不是完全的代议制，

所以多元理论仅具有一种有限的解释作用。

由于国家更加多形化，它们表面上的内聚性具有了潜在的欺骗性。在早期，由于被一小撮精英分子和相当特殊的政党控制着，许多国家已具有真正的内聚力，这些控制者包括王公诸侯、商人寡头、教士神父或武士阶层。他们在所控制的政治领域中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然而他们无法控制外界的社会生活。我们已看到自治权的衰退，控制权的增长。国家已开始以精英为中心，以政党为辐条，市民社会正是以此得到组织化。但是当国家起到这种作用时，便丧失了早期的排他内聚性。

我研究的基本宗旨是：社会不是一个系统。对于人类的存在没有一个最终的决定性结构——至少在社会中，社会运作者或者社会观察家还无人能够了解认识。我们所称的社会仅仅是形形色色的相互重迭交叉的权力网的松散聚集体。现在，国家已在代议制和官僚化的组织道路上前进了一半——但并没有系统地面对、评价并调解那些接踵而至的多形化形式，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是，这些国家正动员可怕的共同权力，而对于这些权力，它们——事实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很好地驾驭。第二十一章将指出在1914年7月，欧洲各国偶然累积的多型性开始倾覆了整个多权力运作者的文明世界。

注 释：

[1] 这里可以有多个事例证明，仅国家精英可能支持这一点，然而却能够强制性地获得他人的屈从——正如布尔什维克在后来所做的一样。但是没有一个19世纪的国家拥有这样的专制特权。

参考文献

Bensel, R.1990. *Yankee Leviathan: The Origins of Central State Authority in America, 1859—18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and, L. 1982. “Guardians of the race” or “vampires upon the nation’s health”?: female sexuality and its regulation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In *The Changing Experience of Women*, ed. E. Whitelegg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A. D.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Cronin, J. E. 198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7.

Daviet, J.-p. 1988. Some features of concentration in Franc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oncentration Proces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 H. Pohl. Wiesbaden: Steiner.

Davin, A. 1978. Imperialism and motherhood. *History Workshop* 5.

Digby, A. 1982. *The Poor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Historical Society.

Feldkirchen, W. 1988. Concentration in German industry, 1870—1939. In *The Concentration Proces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 H. Pohl. Wiesbaden: steiner.

Flora, P., and J. Alber. 1981.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ed. P. Flora and A. J. Heidenheim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a tool of analysis.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History*. Paris: Mouton.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ood, D. F. 1984.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50—1914*.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ew, R. 1984. Th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state.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C. Bright and S. Hard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annah, L. 1975.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Economy*. London: Methuen & Co.

Henderson, W. O. 1958. *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russia, 1740—1870*.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Keller, M. 1977. *Affairs of State: 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mp, T. 1978. *Historical Patterns of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Longman Group.

Koven, S., and S. Michel. 1990. Womanly duties: maternalis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s in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

Kunz, A. 1990. The state as employer in Germany, 1880—1918: from paternalism to public policy. In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80*, ed. W. R. Lee and E. Rosenhaft. New York: Berg.

Lubenow, W. C. 1971.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 Early Victorian Attitudes Toward State Intervention, 1833—1848*.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Macartney, C. A. 1971. *The Hapsburg Empire, 171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acDonagh, O. 1977. *Early Victorian Government, 1830—1870*.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cKay, J. P. 1970. *Pioneers for Profit: Foreign Entrepreneurship and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1885—191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Neill, W. H. 1983. *The Pursuit of Power*. Oxford: Blackwell.

Marsh, P. (ed.). 1979. *The Conscience of the Victorian State*.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Mayer, A.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Pantheon.

Mitchell, B. R. 1975.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rloff, A. 1988.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America's belated welfare state.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M. Weir et 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earton, M. 1984. *Diplomacy, War and Technology Since 1830*.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Pollard, S. 1981. *Peaceful Conque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ais, S. J. 1981. *The Evolution of Giant Firms i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yor, F. L. 1973. *Propert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Nations*.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Reulecke, J. 1981. English social policy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seen by German social reformers.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ed. W. J. Mommsen. London: Croom Helm.

Roy, W. G. 1990. Functional and historical logics in explaining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2.

Sen, G. 1984. *The Military Origi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ival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enghaas, D. 1985.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 Leamington Spa: Berg.

Skowronek, S.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derberg, J. 1985.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and dynamics, 1840—1914: a comparison between France, Great Britain, Prussia and Swede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4.

Steinmetz, G. 1990a. The local welfare state: two strategies for social domination in urban imperial German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1990b.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of an autonomous state: industrialists, Junk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imperial Germany.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2.

Sutherland, G. (ed.). 1972. *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 Century Governmen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Tampke, J. 1981. Bismarck's social legislation: a genuine breakthrough?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ed. J. Mommsen. London: Croom Helm.

Taylor, A. J. 1972. *Laissez-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Tedlow, R. S. 1988.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oncentra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Concentration Proces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 H. Pohl. Wiesbaden: Steiner.

Tilly, R. 196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Prussia, 1815—186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Trebilcock, C. 1969. "Spin-off" in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armaments and industry, 176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22.

1973. British armaments and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1890 —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26.

1981.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780—1914*. Essex: Longman Group.

Ullman, H-P. 1981. German industry and Bismarck's social security legislation.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ed. W. J. Mommsen. London: Croom Helm.

Watkins, S. C. 1991. *From Provinces into Nations. Demographic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1870—19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eber, E. 1976.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eks, J. 1981.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Longman Group.

Woloch, I. 1979. *The French Veteran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第十五章

英国工人阶级抵抗的兴起，1815—1880 年

工人阶级运动的理论

多数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事件都始于英国。在 19 世纪，英国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也是唯一拥有大量工人阶级的国家。正如表 15.1 所示，最显著的例子是，早在 1815 年滑铁卢战役时英国制造业的工人数量就已比农业工人多。实际上，英国的工业化要比其他几个主要强国早一百多年(正如表 19.1 所揭示的那样)。

英国工人的较早出现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在 20 世纪初，当其他主要强国正经历着劳动力规模类似的工业化时，工业化的性质、民族性质和阶级性质都已发生改变。在英国宪章运动中，发生在早期工人阶级身上的一切是无法重复的。尽管此后这些早期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并且现在仍认为是——未来工人阶级的原型。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在斯托克波特经营一家工厂)住在英国。他们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首先来源于在英国的经历，并在事实上影响了所有后来的作者。他们讨论了四个主要问题：

1. 资本主义将存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质的界限作为类似的“普遍阶级”而弥散到整个市民社会。

2. 制造业资本主义使劳动力一体化，工人们集体地相互依存于生产和劳动力市场。工人成为互相依存的“集体劳动者”，他们组成工会并承担共同的阶级行动。

3. 工作以外的广大工人团体强化了相互之间的类似和依存。这些团体有能力管理自治的社会和文化组织。

4. 三种集体行动的力量促成了阶级政治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如果有革命的必要，这个政党有能力获得政治权力。

尽管这些内容中的许多东西可以接受，但是在五个方面我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模式相违背：

1. 尽管在事实上工人的确发展为“集体劳动者”，但这却很难发展成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在相对单纯的经济冲突中。正如韦伯所谈到的，与马克思确信的情况相比，工人们拥有更加多样化的经济力量来源。

表 15.1　根据部门得出的英国劳动力百分比，1801—1881

	1801	1821	1841	1861	1881
农　业[a]	35	29	23	19	13
工业、矿业	29	39	44	49	49
服务业	29	31	34	32	38

a. 包括林业和渔业。

资料来源：1801—1821：Evans，1983，p.412 他也提供了有关 1841 年和 1861 年的略低些的工业数据。1841 年、1861 年的资料来自：Bairoch 等，1968。

尽管无人拥有生产工具，但是许多人控制了相关的职业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供应。帕金(1979)所称的“关闭”，即对于其他想寻求使用相同技能的人关闭劳动力市场。因为 19 世纪劳动力供应充足，“关闭”依赖于阻止使用“受雇顶替罢工者工作的人”(在美国使用“拒不参加工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使工人技能单一化，他们互相可以替换，很容易取代。因此为了发挥“关闭”的作用，工人们不得不将联合扩大到整个阶级，他们彼此都同意不做工贼。然而，资本主义

的发展没有统一降低技术这就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集合体：

A. 工人是与自己的同事及雇主之间存在一种部门化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不是与其他所有工人相互依存。雇佣关系本身就具有双重性：尽管雇主与工人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也必须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合作——雇主为了获得利润，工人则为了得到工资。对立和依存是各类关系的正反两面。如果稀有的劳动技能与雇主有特定联系，并且是在工作中培训的，那么工人的依存性就会增强。工人被剥夺了离开企业的权利，因为在外界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就成了非熟练工人。在罢工期间，雇主可能不愿使用工贼，因为这将牵涉培训费用而且短期劳动力的效率低下。这就使得雇主和工人可以共同发展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培训要求不同工作分为几个层次，在其中工人可以从低层向高层提升。尽管雇主和工人之间仍存在冲突，但是他们的相互依存性也被强化了。雇员从外界的工人大众中隔离出来，冲突只针对特定雇主，不能再概括为阶级冲突。

B. 相互依存的第二种形式不包括雇主，仅涉及工人，但是在较小的地方性团体中是由行业、职业和产业来界定。尤其是需要技能的手工业行业或职业可能共同行动以控制技能的提供。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不容易受到工贼攻击，也不需要争取更广泛的工人支持来制约工贼。他们的做法可能是纯部门性“工人贵族”的策略。熟练工人可能对雇主的反对十分强烈，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工人阶级整体。政府和雇主也可能安抚拥有上述市场权利的工人，同时保留着对不称心工人的镇压。因此工人中的地方主义使对手采取部门性策略。

那些不具备这两种狭隘依存性之一的工人更容易遭受工贼劳工的攻击。他们必须寻求更广泛的联合以限制可替代劳工的提供。这就形成了认同和对立的阶级定义。相比之下，两种更狭隘的团体意识到两个敌人——雇主和圈外工人。有特权的内部工人通过斗争来对抗被圈外工人取代的威胁。这一根本的地方—部门化错误路线将技术性职业和非技术性职业分开，使行业工会和企业工会、产业工会和普通工会分

开。 这些区分将在所有章节中普遍存在，它们是更广泛的阶级组织所并存的要素。

2. 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解决资本主义弥散性与权威性之间存在的紧张状态。 他们有时强调资本主义弥散的特性，有时又强调阶级斗争的某一特定权威性。 他们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劳动过程、生产特征和生产中的各种直接关系。 直到近代，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仍是“生产力主义者”，他们相信各种关系决定了阶级和阶级政治——通常以工厂的生产关系为模式。 然而，劳动过程与阶级冲突一样经常导致部门化或地方性。 在解释更为广泛的类似阶级的工人运动时，我更专注于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在市民社会的弥散，而对工厂和劳动过程关注较少。 后几章显示了这一点。 这不仅仅是学术争论。 生产力主义的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已削弱了无产阶级地位和社会主义政党更广泛的潜在要求。

3. 马克思主义也趋向于经济简化论。 其第三和第四论题——都涉及工人团体和政治——似乎要纠正这一点，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追随者将这些看作是主要由融人论题一和论题二的经济权力关系决定的。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也并不赞同这一点。

政治权力的定型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多数后来的作者都忽视了国家的作用。 他们认为，工人的政治在本质上是由其经济条件决定的。 通过观察政治是如何可能成为斗争本身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最初经济条件的产物，近代作者对以前的观点略作修补。但这仍然不够。 雇主和工人的冲突开始涉及国家，因此国家的其他具体化形式也开始构成工人阶级运动。 这尤其表现在弥合成强化工人阶级的错误路线方面。 正如我在第十一章中曾指出的，因为在这一时期国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的劳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各种政治权力的关系深刻地决定着工人阶级的兴起，或者使之无法形成。

4. 同样，工人团体也不仅仅是消极地接受各种以生产为中心的权力关系。 他们也反作用于生产关系，正如我在对美国工人的调查研究中

所认识到的(参见第十八章)。但是这也同样对更为密切的家庭和性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特殊影响。马克思对性的问题没有兴趣，恩格斯对此则较感兴趣，但是二人都认为工人阶级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男子，并且这具有普遍性。然而，阶级一直是与家庭、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本章主要讨论了 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经历的一个转变，即从重视家庭和团体到重视男子和就业。其结果是产生了与阶级组织相对的部门—地区性组织。

5. 所有先前的推论都是阶级冲突极少是一种辩证的正面对抗，因为它涉及了无数独特但却并不矛盾的逻辑学方面。我将证实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辩证的革命方法中，冲突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在正面对抗中，资产阶级相当清楚地看到来自下层的威胁，并且了解约束它的内部宗派性。在正面冲突中，工人阶级更可能是失败而不是胜利。

如往常一样，我集中讨论的是阶级组织，但是我也运用主观阶级意识的 IOTA 模式，关于这一模式曾在第二章中有所介绍。记住，理想的模式具有一致性、对抗性、总体性和选择性，强调发现于社会现实中各种不完善的部分因素是片面的。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或反对资产阶级，通常会使组织内部的工人意识与其他集体认同和反对的基础相互竞争，甚至在激进分子之间产生了缺乏阶级总体的强烈意识。现在我要探讨更多的工人选择。表 15.2 将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工人(及农民)在面临的资本主义时所设想的主要抉择进行分类。

表 15. 2　工人和农民面对资本主义的选择

斗争策略	对资本主义的战略		
	竞　争	改良主义	革　命
经　济	保护主义	经济主义	工联主义
国　家	互助论	社会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

工人运动在“激进”程度上存有区别——从竞争经过改良主义到革命——并且在他们是否寻求改造国家以及各种工业关系上也存有区别。

这产生了三对选择。第一组是最“温和的”——不改变资本主义但为工人在资本主义内部“竞争”提供各种机会。如果工人接受现存的市场规则和条件，仅运用集体团结以取得市场优势，我就将之称为保护主义。合作社通常是保护主义者，如同罗伯特 · 欧文的示范工厂、宪章运动的土地计划或今天规模巨大的巴斯克 · 蒙德拉贡企业。它们内部是集体主义的，但如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他们也是根据外界市场来运作。无处不在的保护主义大多是由工会保险基金提供支持，这使 19 世纪多数工会的实际名称——在英国称作“互济会”，在美国称作“慈善团体”，在德国称作“救济协会”。

但是由于现存的市场规则和法律偏见，通常迫使工人放弃仅有的保护主义。工人们要求从法律上认可工会，并立法以减轻合作社的信贷和资本问题。正如蒲鲁东所倡议的那样，这就是“互助论”。多数所谓的社会民主其实是互助主义，他们寻求的国家管理仅是为了维护工人组织的权利和自由。19 世纪的多数人们并没有体验到国家是“方便公民的”，并且倾向于将自由界定为从国家获取的自由。多数工会所期望的是互助权利加上通情达理并持调和态度的雇主。在本卷中我始终强调这样一点，如同先前的多数历史一样，人们很少对政治感兴趣。他们宁愿避开国家，但是在与国家发生冲突时，就对政治产生了兴趣。马歇尔说过，工会组织的权利在概念上与自己认为的公民权是截然不同的——这些权利尽管合法，但在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各种政权在整个 19 世纪都抵制类似的权利，有时甚至采取残忍的方式。因此马歇尔的公民权的进化阶段存有缺陷。在某些事例中，直到彻底进入 20 世纪集体的组织权利才得到承认。而这时人们获得大多数其他公民权利和主要政治权利已有很长时间了。在 19 世纪早期，国家财政的苛捐杂税开始减少，政权对承认工会的抵制就成为工人政治化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政府不允许自由成立组织，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造它。工人就会转向表 15.2 中所列的其他选择。

第二对选择是寻求通过改革从内部修正资本主义。经济主义描述

了工会寻求直接从与雇主的讨价还价中获取收益。经济主义不仅限于对工资提出要求，也可以就工厂中的控制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社会民主主义预示了政治改良主义(尽管这一措辞会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性言语产生混淆)。第三对选择是通过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那些以经济手段寻求革命的人——工业起义、大规模罢工——被标识为工联主义(有时是工团主义)；对于那些寻求夺取国家的人，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工联主义者故意避开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了实行中央集权下国家经济统治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暂时”阶段)。我们将看到，当面对充满敌意的资本家和政府时，许多斗士完全越过互助论，他们绕过改良主义直接采取两种革命性的选择。改良主义在一战以后才盛行起来。

这些都是理想中的模式。工人很少一心一意地追随，相反他们是将所有选择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它们的松散联合就是当时所称的“社会主义”。一旦工人开始了政治性选择，这一联合也会坚持赞成民主政治。鲁谢迈耶、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1992)指出，在整个现代世界，工人一贯迫切要求民主的。因为统治阶级所控制的国家不可能不干扰他们，所以他们要求国家应由人民(最初是指男子)来控制。在本章中，我给最早的一个民主运动提供了文件资料。

最后应注意到两个细节。因为制造业资本主义在整个 19 世纪的英国一直在扩张，所以主张“生产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预期工人运动也会稳步发展。然而，在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宪章运动中，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行为达到巅峰，此后工人运动变得更温和、更分散了。英国工人阶级已不再可能如宪章运动的早期阶段那样团结并富有战斗性。为什么工人运动不是直线发展的？其次，工人阶级的发展包含着一种组织上的新事物：工人能抵制有组织的迂回包围。这在最初支撑了社会的层次化。由于阶级结构是不对称的，人们很少能成为历史的运作者；与从属阶级相比，统治阶级能够组织得更为广泛。在 19 世纪的英国，他们的迂回包围遭到动摇。那么这是如何被动摇的？原

因是什么呢?

企业资本主义和大众政治，1760—1832年

第一章已经讨论了18世纪晚期的三次革命，正是这三次革命改变了英国的阶级关系：企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国家以及群众不系统的识字能力。我将依次讨论前两次革命，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探讨第三次革命。[1]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到1760年英国农业已实现了资本主义化，这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地主、佃农和无地的劳动家庭。许多无地者，包括男人和妇女，现在都被迫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这些工作由企业家来提供，他们是“中间接受者”。这些企业家拥有制造业和商业资源的绝对私人所有权。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分以及工厂、作坊或作为工作场所的街道的区分均毫无意义。

企业家也威胁着大多数手工业者。第四章讨论了手工业者在有产“者”和无产的“民众”之间处于一种暧昧的阶级立场。他们不确定地处于小资产阶级下层的边缘。在历史上，他们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组织。行会使城市居民区和需要技能的职业融入地方团体中，这些团体由“师傅”的家庭、其家庭成员以及“雇工”组成，他们的松散联盟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行会得到国家的特许和承认。作为回报，行会取得了提供手工技艺的垄断权。流动维修工人，如木工业、石业、制皮业及(日益增多的)金属业的熟练工人作为工匠组织起来。他们在全国各地流动，共同控制着从业和工资的评定(Leeson，1979)。到更近的时期，这两个组织大部分熔人更松散的手工业组织并形成流动者。手工业者利用地方工会的条件差异，运用流动网以获得流动工作的好处。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就业机会。所有这些组织在本质上都是保护主义者，它们自定价格，很少与雇主讨价还价。在各行业，18世

纪的流动组织能够比企业家组织得更广泛。 例如，1764 年，伦敦的 6 000 名制衣业罢工工人沿着组织网在全国“消失”了。 流动也可以避开《结社法》(在 1799 年到 1824 年这一法令宣布工会为非法组织)。 广泛的组织性和流动性使工人能够迂回挫败雇主和商人。

但是在劳动者中，手工业者仅占 5%到 10%的比例，他们的组织是局部的，不具有阶级性，仅限于一个行业。 他们与广大的农业工人或临时的城市工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而在 19 世纪早期，手工业者也受企业家的压迫。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全国化，流动迂回避开企业家的能力被削弱了。 手工业者也失去了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的控制权。 一些工业化的手工行业，尤其是磨坊和织布业，也丧失了对工场和从业的控制权。 因为企业家包围了它们的市场和工场并用机器和非熟练工人取而代之。 在两类大型现代化工业即棉纺织业和制铁业里，工厂无产阶级正在出现——在棉纺织业中主要是年轻的单身妇女和儿童。 拿破仑战争从各方面加剧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这些压力引发了大规模的失业和低工资，而人口的增长和大量向城市迁移又使这一状况更加恶化(O'Brien， 989)。 城市中较高的死亡率(通过传染性疾病)也平衡了劳动人口。

企业家针对手工业者的平衡攻势，一方面迫使工资降低，雇佣那些工资水平更低的妇女和儿童，另一方面还采用雇主控制学徒的计划，排除手工业者与原料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 各行业开始“密集化”。 部分手工业者成为受残酷剥削的家庭户外劳动者；到手工工场工作的其他人则幸存了下来。

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地正确评价工人阶级所具有的特性。 除了棉纺织工业，工厂中很少具有工人阶级的特性，甚至多数棉纺织工业中的工人数量也较少。 1851 年，平均每家纺织企业刚刚拥有超过 100 名的雇员，即使那些同时拥有精纺和织布的企业，其雇员人数平均每家也刚超过 300 人。 到 1890 年，这些平均数仍未增加到 2 倍(Farnie，引自 Joyce， 1980， p.158；本段所有其他资料均来自 Clapham， 1939， Ⅰ，

pp.184—193，Ⅱ，pp.22—37，116—133)。在英国有一些大型矿山和钢铁工业。1838年，英国康沃尔郡的锡矿工人平均近170人，全国的煤矿工人人数平均仅50人，但是也有大约十二个东北部的煤矿，每矿雇用了300多名工人。1814年，苏格兰卡伦钢铁厂雇用员工2 000人（“欧洲最大的制造业”)，但是平均每家苏格兰钢铁厂雇用员工才20人。在英国有大量制造玻璃、刃具、陶瓷或羊毛织品的工厂。1871年的人口普查估计，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量的1/4)的一半在“工厂”，但这些工厂平均仅有86名工人。制造业中，绝大多数工人是在小型工场。这些工场大部分没有使用蒸汽动力。通常每个机器都是独立人工操作的，工作结束后由人工维护。“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蒸汽动力和手工技术之间的优势平衡还远未建立”(Samuels，1977，p.58；Greenberg，1982)。

在“现代”工业中，多数就业问题也未解决。185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最大的部门是农业和国内服务业，其次是棉纺织业、建筑业、普通劳动者、女帽及妇女头饰的制造者、鞋匠、矿工、裁缝、洗衣女工、海员和丝织业工人。妇女就业人数几乎与男子一样多。多数工厂的工人是年轻的未婚妇女和儿童。大多数男子却带着自己或其家庭生产的商品进出于市场，这些商品一般是在家中或小型作坊中生产的。他们有时也生产自己的工具来维护机器，或者为在工厂中的工作商谈价钱。在较小的城镇和乡村，许多家庭同时从事制造业和农业劳动。尽管工匠们已丧失了某些自主权，但是他们仍是契约自由代理人，他们管理并付钱给自己的工人，而这些雇工通常是自己家族的成员。然而，他们的管理现在很难有保障。许多工厂的工作，如那些在家庭、作坊、牧场、矿山和街道的工作都是临时性的。工作的多样性和无规律性普遍存在。

因此，乔伊斯(1990，pp.145—153)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很少存在无产阶级化并且阶级的身份意识也较少。而我的结论却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段出现了工人的矛盾体，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被工人的多

样性所统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立足于生产力主义和就业或职业的现代概念之外，并深入家庭和社区。幸存下来的手工业地方主义和雇主的部门主义开始流行。但是这些很少能给工人家庭提供总体的特性。“工厂”伴随着“工场”、“家庭作坊”和“街头作坊”而出现，正式就业也与行业雇用和临时雇用同时出现。但是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界限。相反，它们互相渗透，从而阻止了任何一种单一就业形式笼罩着众多家庭和地方社区。最明显的地方主义本应使男子与年轻妇女和儿童相互竞争，然而，他们却通常共同存在并组成与手工工场和工厂相互渗透的家庭生产单位。

在这一时期，家庭作坊为阶级团结提供了一种衡量截然不同的劳动过程的标准，它使工作、家庭和社区之间产生了密切联系。随后，相对于临时就业的稳定就业将工厂从家庭和街区中分离出来，将男性从女性的工作中划分出来，并使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区分开。但是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工作的多样性涉及到大多数的工厂、家庭作坊和家庭，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工人单一化，而这从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与其说这是工厂生产方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工业资本主义弥散的结果。工业资本主义的弥散性通过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通过工厂、家庭作坊和社区表现出来。

这种阶级结构仅是部分情况，它几乎不可能单独导致任何阶级行动。但是它受到英国三种国家形式的推动——旧政权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联邦主义(在表 3.3 中所指定的意义)——现在由于中央集权趋势的影响而开始超越极限。在这一时期，政权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添加到中央国家的法典中，排除了行会和熟练工人的“行业限制”。在 1799 年至 1813 年之间，最低工资标准、限制学徒进入同行业的规定以及固定价格都被废除，而 1779 年和 1800 年的《结社法》禁止成立工会。手工业者在抵抗市场的力量中丧失了法律保护。他们简直是义愤填膺，但最初毫无政治目的，他们试图一个行业接一个行业地进行局部性反抗。但是正如众多缺乏技能的工人一样，多数行业面临同样的威

胁。 因此，行业工会放弃了经济上讨价还价的保护主义。 于是引发了一系列局部的罢工和资本家的停工：伦敦鞋业工人在 1818 年和 1824 年举行罢工；1824 年和 1828 年发生了兰开斯特棉纺织工人的罢工；1824 年造船木工罢工；1825 年布雷福德羊毛精梳工人罢工；1826 年动力织布机和手织机的织布工人罢工；1828 年基德明斯特地毯编织工人罢工；1834 年伦敦裁缝工人罢工。 所有的罢工都失败了。 其后果是工资削减得更多，血汗劳动加重，更多的妇女儿童在工厂和"家庭仆役工作"中就业，对劳动技能的要求更低，劳动力市场也更加密集。 工业行为对工人的阶级认同有所强化，但仍是一无所获。

因此工人被迫转向民族国家，首先是传统的示威游行和议会请愿。组织较好的上层行业如：丝织工人、制鞋业工人、钟表业工人、制靴工人、家具木工、木工、裁缝、马具工人和印刷工人等起了带头作用。在工人中，这些人拥有话语能力的发展基础，他们支配着技工学校和欧文派的"科学之城"(1850 年在 700 所技工学校中就有 500 间阅览室)，同时也控制着互济会、宗教组织以及杂志和报纸。 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向外延伸到了其他同样受资本主义攻势影响的团体，尤其是那些类似织布工一样在家做外包活的工人。 工人的需求现在趋向于互助论。 他们开始要求中央政府承认工会的集体权利，管理学徒年限，确立"公平"的价格和工资，并且补偿工人被机器取代的损失。 在议会中的两个极端，激进派和上层托利党人都对工人给予同情，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1824 年，《结社法》终于被废除，但是紧接而来的罢工浪潮又促使 1825 年制定了新的《结社法》，它仍以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限制了工人权利，仅给予工人集体组织的权利。 这种权利被认为是与表达个人的自我利益密切相关，而在道义上认为这具有合理性。工人只有参加那些在事实上仅严格限于要求增加工资、降低价格和工作时间的集会，才拥有合法的结社权。 其他所有更广泛意义上的结社则是阴谋非法限制行业的违法活动。 这就意味着，除了大部分仍控制生产的工业行会之外，所有普通的全国性工会都遭到排斥。 尽管法院承

认，地方性集会不能被有效起诉，但可以并实际对罢工进行起诉。对工会的镇压并不少于《结社法》存在的时代，劳工和手工业者之间更具一致性，早期的劳动者有能力避开《结社法》。旧政权认为对工人困境的怜悯不应阻止进步，而政治经济学家相信实际上自由贸易法是道德的。议会拒绝作出立法，这阻止了互助论的实施。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每当中央集权政府相当一致地镇压持保护主义和互助论观点的工人时，工人的煽动就会扩大到阶级和全国的层次。有段时间，改良主义在工人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国家不能保护他们，那么国家就应实行改革。第四章指出，选举权的要求在一些民众的传统思想中产生共鸣，E · P · 汤普森(1968, p.213)观察到，工人阶级不是产生于“某些即难以归类又毫无差别的人类原始材料”。历史赋予的其他社会身份——宗教、平民政治和“英国人生而自由的权利”的民族概念，以及新教徒的精神平等(正如我们后来在法国和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中所见的)——孕育了工人的反抗，尽管并非总是具有阶级意识。在传统激进的自然权利思想中，从洛克到潘恩，选举权的要求得到了社会权利的支持——生存权，为了公共利益土地应公有，限制财产。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注意到的，市民社会的出现、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地缘政治的竞争都推动了民粹主义向下层社会弥散，这一思想更具大众化，更激进，也更具有全国性中央集权的特性。

但这也是得到了国家军事形式的巨大支持。正如第十一章所指出的，18 世纪的战争要求大规模地强征人力和财力。由于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海军和陆军，陆军主要从国外和爱尔兰征募，因此英国更需要资金而不是新兵。它主要根据资本主义的旧政权形式所确立的优先权来筹集资金。英国从富人那里借款并偿还他们；它提高税收，主要是对日用消费品——啤酒、烟草、盐、糖、茶、煤炭和住房等征税。1800 年到 1834 年(直到债务偿还负担减轻)，英国的债务负担始终十分繁重，但税率却在递减，在有储蓄者和无储蓄者之间进行再分配。这也扩大了经济的影响。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率每年上升 3%，而同时工人的实际工

资却下降了。和平年代，失业现象仍大量存在，国家的主要民政活动依然是救济贫困。大约有一百万人申请救济，并遭受地方统治阶级的羞辱性统治管理，许多家庭被济贫院拆散。同经济一样，政治也不仅仅剥削男性工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庭。中央政府充分了解自己要优先考虑的事情。1820年到1825年之间，贫困救济的花费占中央政府支出的6%，而对债券持有者的现金转让则占了53%(O'Brien, 1989)。在如此严重影响他们生活并明显带有阶级不平等的财政剥削下，工人家庭为什么未被政治化？鼓动性宣传将选举权的改革与国家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连接起来。以手工业者的话语能力基础，政府因对人民不公平而受谴责——从大众的意义上说。

因此，三种鼓动性宣传密切结合在一起：由手工业工人和外包活工人为先锋反抗工业资本家的剥削；将这些不满转化为针对中央政府政治经济的互助论和民主政治；民粹派反对旧政权的资本主义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对人民的剥削。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许多工人开始激进化，他们的阶级认同感增强。1800年以后，他们日常使用的术语是"工人阶级"，并且"工人阶级们"成为更加常用的措辞(Briggs, 1960)。他们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们劳动，而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们却收获我们的劳动成果。1834年，欧文主办的报纸《危机周报》统计了两个阶级的人数："劳动大众"，包括"所有财富的生产者"和"各生产阶级"共有8 892 731人，而"非生产者"有8 210 072人。它控诉道，每年当生产者得到1亿英镑的财富时，非生产者们就会得到3.33亿英镑(Hollis, 1973, pp.6—8)。代表手工业工人的记者宣称："我们"—"他们"是一分为二的。"我们"依靠共同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建立在彼此互相保护的道德准则的基础之上。它赋予我们一种超越对手那自私自利思想的道德优势(E.P.Thampson, 1968, pp.456—469)。

我们是否清楚了解对自己的阶级敌人？在1832年之前并不具备这种意识，因为那时的政治敌人与经济敌人不同。实际上，政治上的同

盟经常在经济方面是敌人。小资产阶级，包括小企业家们也是消费者，而不是储蓄者。他们也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改革斗争与其说具有阶级性，不如说是民粹的。作为民主派的民粹派受到辱骂，如雅各宾派或平等派，它们不具有阶级的特征。激进派的目标与其说是针对工业资产阶级，不如说是指向那些“旧政权中腐败”的官吏，他们以租金和垄断国家特许权为生，并领取年金。富有活力的资本家使激进派感到迷惑。《危机周报》区分了第三类中间“阶级”，其构成包括“销售商、主管人和制造商”，他们(相当软弱地抱怨)是“必要的，但人数太多”。部分手工业工人的报纸将企业家确定为阶级敌人：“雇工和工人的利益完全对立，它如同黑夜与白昼一样”；或者“资本家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什么也不创造；他们由工人阶级来喂养，是工人阶级提供给他们服饰和住宅”(Hollis，1973，pp.45，50)。但是，工人也要面对议会、地方行政长官、地方牧师、政治经济学家、密探和汉奸、正规军队和地方自耕农组成的民兵。通常与工人的雇主相比，“旧政权的腐败”、“教会和国王”或者“政治经济学”似乎是更强大、更具暴力性的敌人。对他们的攻击也同样能从上述的阶层中得到支持，有时这些阶层与“勤劳阶级”建立部门性联盟，共同反对“旧政权的腐败”；有时他们又与旧秩序的家长式统治因素结成联盟，以反对政治经济学(这在后来出现的更多)；他们偶尔还会与新教徒或持不同政见的人民党联合。

这些弥散的部门性联系通常也具地方性，它诋毁了任何纯粹的阶级意识(Prothero，1979，p. 336；Stedman-Jones，1983；Joyce，1991)。在 1832 年前，工人的敌对者实际上并不是单一的阶级。尽管“它”大部分是团结一致反对劳工的，但是在公民权方面，对于它应该代表哪一个阶级，新教国家应该如何建立的问题上，都存在着很深的意见分歧(正如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这就削弱了地方对工人的部门性控制，他们的政治不满得到了激进企业家的支持，1830 年，工人甚至还得到了辉格派的支持。

这些政治阵线从根基上削弱了一个可供选择的阶级概念。最流行的激进主义经济选择方案是罗伯特 · 欧文的理论。他那保护主义的生产合作社的主张强烈地吸引着手工工人和外包活工人。他们迫切渴望市场能安全公平。互助论的潮流也紧随其后。在19世纪20年代，约翰 · 格雷、汤姆斯 · 霍奇金和威廉 · 汤普森以《穷人卫士》和《先锋报》为阵地，攻击资本家是寄生的中间人，干涉了手工业工人与市场的合理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国家应予以保护的。诺埃尔 · 汤普森(1988)称他们是“工匠社会主义者”。极少有人倡议改革生产关系，而不是市场关系，正如现代社会主义者们所做的。就这一时期手工业工人的不满来说，这本身就是不恰当的。但是，经济观点被淹没在争取选举权的政治斗争中。尽管许多工人对于他们同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改革法》的措辞时)，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如果没有这一联盟，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所渴望的互助立法。一个正在兴起的阶级正通过截然不同的劳动过程与工人家庭联合，但是政治使他们对敌人和其替代者感到迷惑。

E · P · 汤普森有一句名言，称这一时期为“英国工人阶级创造的时代”，正是这一观点使他遭到大量的批评。柯里和哈特韦尔(1965)称他的这一说法是“一个神话，一个绝对想象和理论预想的构思”。他们注意到，正如其他人对英格兰(Prothero，1979，p.337)和法国(Sewell，1974，p.106)所作的研究一样，19世纪早期的工人运动通常仅限于手工业工人；汤普森错误地假设了手工业工人与其他工人的联合；并且在地方显要的部门性控制下，“既冷漠又沉默的大众”没有受到猛烈反抗的影响(Currie and Hartwell，1965，p.639；Church and Chapman，1967，p.165；Morris，1979讨论了有关概念的问题)。如果说1830年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这在事实上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然而为了产生某些影响，它仅仅需要大众的政治斗争来部署与经济斗争相同的敌人——这在1832年后发生了。

宪章派的无产阶级起义，1832—1850 年

工人阶级的斗士们看到他们对已获批准的《大改革法》的担忧。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多数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旧政权结合成单一的资产阶级，同时国家定型为强有力的资本主义，并且更加中央集权化。尽管已获选举权的中产阶级仍保留了某些多样性并且难以驾驭，但是《大改革法》消除了他们对那些地位更低的人们的政治兴趣。一些激进议员敦促采取更进一步的选举权改革，但是到 1837 年多数资产阶级选区的投票将他们排除出议会。议会认为选举权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激进”包含着两种不同含义：对于手工业者集团，如伦敦工人协会，和部分中产阶级活动家，它仍意味着选举权的扩大和国家对生活标准的保障。但是对于其他人，它仅意味着自由放任的不干涉主义。

1834 年新的《济贫法》代表着新的政体，它扩大了对工人家庭的严酷控制，同时却减少了知名人士发放特定救济金的权力。在工人的抗议集会上，新《济贫法》被痛斥为“解除了婚姻关系——所有家庭感情的毁灭，甚至是在世界所有国家的穷人中实施暴力和最野蛮的压迫。”(引自 D.Thompson，1984，p.35)。内皮尔将军是镇压宪章运动的北方部队司令，在解释造反行为时，他强调了《济贫法》的作用：工人阶级已“被剥夺代表权”，他们的财产“几乎被国家为还债而收取的间接税所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且由于新的《济贫法》，他们所剩无几的财产也已“有名无实”(Napier，1857，Ⅱ，pp.1，9)。但是市政管理改革和新的警察当局也在巩固新政权的地方权力，以使它更具地方统治阶级的代表性。《新闻法》削减了新闻界的特权。《爱尔兰强制法》表明了镇压的趋向。所有普通工会却被视为“阴谋集团”而遭镇压。著名的全国统一工会成立于 1834 年，据推测拥有会员 50 万人。

因此，在 19 世纪 30 年代，新政权激起了全国工人阶级的认同感、

反抗性甚至整体性。新政权的经济攻势减弱了狭隘的行业地方主义的力量，刺激了家庭的道德暴力。新政权的政治攻势，尤其是《济贫法》，直接伤害了大多数最贫困的人。但是对手工工人的激进分子来说，更主要的威胁来自对工会组织权利的骚扰。他们都期望获得选举权，并且现在由于选举权具有阶级性，所以他们不得不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地方主义和部门性控制权都削弱了；工人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了。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宪章运动——正如本卷所讨论的任何一次运动那样，它的含义是以“阶级为基础”，是“大众的”和“彻底革命的”。

宪章运动的形式主要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成年男子的民主权，同时这一运动还拥有自己文件，即《人民宪章》。[2]《人民宪章》提出的六点要求包括：普遍的成年男子选举权，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无记名秘密投票，议员不应有财产限制，平等分配议会选区以及对议员支付薪金。许多宪章主义者支持妇女选举权，但是其领导人声称，如果现在对这一点提出要求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但是宪章主义者并未将投票作为最终目标。正如我在整卷中所强调的，政治的公民权不是其渴望追求的内在本质目标。大多数人更愿意避开与政府的冲突。但当政府开始剥削他们并在政治上如此排斥他们时，他们便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宪章主义者希望投票权能使自己从新社会和经济剥削中获得自由。他们迫切要求更低的累进税制，《济贫法》的改革，削减地方政府和警察的权力，“十小时工作制”法和反对“工资奴隶”的互助论保护，包括工会组织权。“‘宪章’和更多的东西”是他们最流行的口号。面对监狱审判者，一名被捕的宪章主义者辩护说：

> 严重的贫困是我们不满的原因——如果他们能得到应得的工资，我们将不会去关注选举权。只要雇主们愿意为工人做点事，使他们得到起码的生活享受，我们将是地球上最满意的。[D.Thompson，1984，p.211]

已有选举权的阶级不可能给予宪章主义者更多的支持，因为他们反对大部分的社会经济目标。在早期的领导层中，中产阶级的激进改革派给予了帮助，而后来，他们无法再次起作用，于是开始寻求温和的运动方式。在众议院中，约有 10 到 46 名的议员也支持先前宪章派的动议，尽管对此仅有少数人持支持态度。宪章运动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工人运动。

这一运动吸收了各种身份的工人群众。一些斗士、成员和被捕后幸存下来的示威者的名单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职业(细节见 D.Thompson，1984)。没有一个人是典型范例，但是他们又都有一致性。在他们中间仅有少数人失去了社会地位，有一部分人是职业工作者，如校长、牧师、临时医生和律师，但更多的是店主。而工人的数量最多。唯一大量未被充分体现的工人是农业工人和家庭仆佣，这些人被雇主压制在部门的控制下。在英国几乎没有独立的自耕农；第十九章指出，在其他国家自耕农可能具有组织能力并采取激进主义。事实上，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工人占大多数。贫困的外包活工人过多地用来作为代表——织布工人、框架编织工、羊毛梳刷工和制钉工。在较早的手工业中，人员最密集的行业也是如此，如制鞋业、裁缝和部分建筑业。矿工和纺织工人是“现代”职业的突出代表。虽然固定的工作日程意味着他们中很少有人担任组织者，但是他们常常遭到逮捕。矿工获得了特殊的暴力声誉，而裁缝工、金属制造工人和毛纺织工人则过多地作为和平抗议的代表。

几乎所有手工工人都参加了宪章运动，正如他们的工会所做的。仅有少数几个稳定的上层行业被证实进行了反抗。在伦敦，几乎所有工会都在宪章运动的组织中结成同盟——包括受到威胁的行业工人，如制鞋工，木工和裁缝以及受威胁较少的行业“贵族”，如砌石工、制帽工、皮革精整工、雕刻工、镀金工人及技师(Goodmay，1982)。在英国东南部的兰开夏郡，只有最稳定的工会——印刷工人、装订工人和马车制造工人的工会——没有加入宪章运动。几乎所有其他工会如：棉纺

织工人、棉布印花工人和染色工、裁缝、制鞋工人、建筑工人和技师等等的工会都结成了联盟(Sykes, 1982)。诺丁汉郡的大部分行业都加入了运动，尽管受威胁的框架编织工和制鞋工人被过分代表(Epstein, 1982, pp.230—232)。多萝西 · 汤普森总结道，在每个行业中，“从有技能的上流社会人士到售廉价成衣商人的各个分支都能在宪章派中找到，他们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1984, 233)。由于运动的平民性(很快将讨论这一点)，使地方主要行业起领导作用。工人职业的多样性没有阻止阶级的行动。

仅有职业分类无法表明这一阶级运动所涉及的范围，因为它是以社区和家族为基础的——正如早期制造业资本主义以及大多数早期激进工人运动一样(Calhoun, 1982，所强调的)。许多工业区是由工人阶级居住区环绕组成的城市或城镇中心。这就提供了比上述的部门控制更自由的组织空间，如同内皮尔所警觉地注意到的。在这些区的旗帜下，进军的有利条件推动了大量的示威游行。在工人居住区，运动主要集中于书面和语言沟通的公共集会地点——教堂、阅览室、学校、酒馆和报刊经销店。组织机构是集中于社区而不是职业。

因此，宪章运动中有许多支持宪章主义的妇女和妇女社团。政府当局通常不会逮捕(并且文献也是如此记载的)妇女；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反对鼓动女性。后来的回忆录贬低了她们的作用。但是，与此后直到20世纪中期的任何一次运动相比，在这次运动中，即第一次工人阶级运动，可能有更多的女性运作者。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后来，工人家庭的破坏、童工和女工、《济贫法》以及递减税率制对工人家庭的剥削都主要是针对男性雇工。男性斗士们甚至更清楚这一点。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标语(引自 Bennet, 1982, p.96)写道：

为了妻儿，
我们拼死战斗。
上帝，请帮助我们吧！

妇女也提出两项次要的宪章主义要求：更严格的教育管理、更严厉的禁酒。 多萝西 · 汤普森(这一段主要来自他的观点)认为，随着《济贫法》的不断人道化和工厂条件的趋于稳定，19 世纪 40 年代女性运作者逐渐减少(1984， ch.7)。 后来我论证认为，《工厂法》使宪章运动男性化。 宪章运动不提倡性别平等。 它的领导和运动纲领，尤其是《人民宪章》本身，反映了那个时代男性的支配地位。 但是当时是对整个家庭的剥削，在受剥削的关系中，男子和妇女并不存在明确的区别，而且男子和妇女共同分享剥削补偿的一部分。 早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并不象后来的运动那样，男子占主导地位——并且如此强大。

宪章主义者肯定能动员起来。 《人民宪章》先后三次被提交到议会，并且是以庞大的请愿书作为后盾。 签名是运动的最低程度。 1839 年仅有不足 130 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1842 年达到 300 万人，1847 年到 848 年间则有 200 万至 500 万人签名(对这一数字存在两种争论)。 大批群众参加了运动，但是从事农业和家庭服务业的工人却几乎没有参加签名活动。 由于制造业的成年人少于 500 万，因此多数人至少在一次请愿书上签过名(在运动中，中产阶级的签名者为数不多)。 在 19 世纪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没能与宪章运动相媲美的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

激进派的人数虽少但令人敬畏。 1842 年，全国宪章协会(NCA)在 400 个地方分会中共有 5 万名成员。 到 19 世纪 40 年代晚期，宪章派土地公司已拥有大约 7 万名成员。 宪章派的主要报纸《北极星》，在发行最多的年份拥有 6 万名读者。 在被杀害的激进分子的公开葬礼上，汇集了 5 万人。 激进派立即在几个城市发动了数次人数在 4 000 到 7 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具体人数并不确定，时间也存有争议)。 1842 年全国宪章协会的干事在伯明翰附近参加了大型集会，“普遍的呼声是我们必须拥有《人民宪章》——太棒了，噢，太棒了，千人之中无人使用(会员)证”(Epstein， 1982， p.229)。 宪章运动共有三次鼓动高潮：1839 年到 1840 年，1842 年和 1848 年。 我们不知道卷入运动的具体人数，但是双方都有人想一次总罢工以作为预防措施防止 1839 年事件的重演，

可是领导人却在最后时刻退缩了；1842 年的罢工是 19 世纪英国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罢工。

从中心指导的意义上来说，宪章运动从未出现过权威性的统一组织。因此它的思想和抉择观念(除了《人民宪章》)所包含的内容形形色色，动摇不定，而且很少被明确阐述。但是运动仍是积极的，具有相当的阶级意识，并且敌视资本家。费格斯 · 奥康纳尽管承认自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但仍怒斥资本家雇主，他认为他们是“吸食人类血液、吞噬婴儿骨头的奸商”。他的一个听众转述道：“他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富有的压迫者和贫穷的受压迫者。在劳资斗争中，全部问题将自行解决”(D.Thompson， 1984， p.251)。布朗特尔 · 奥布赖恩谴责“资本主义战争”。正如《北极星》报所述，激进派现在很少责骂“旧政权的腐败”，更多的是斥责“阶级立法”和“工业政体”、“商业政体”，“以及任何其他以牺牲人类生命为基础的政体”(Stedman-Jones， 1982， p.14)。

全国领导人惟恐在公众或委员会中出现煽动情绪(因为担心警方密探)，但是激进派的行动和轻率言辞往往过激。1842 年的罢工被普遍认为是试图迫使所有工人参加罢工。正如一封被截取的信件所述：

> 现在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刻。我们希望付给相当 1840 年水平的工资，如果他们不肯，革命就是后果，我们已让所有行业——裁缝业、皮匠业、制刷业、扫烟囱的工人、修补匠、驾货车的司机、泥瓦匠、建筑工人、煤矿工人以及其他所有行业，全部停工。

一名激进分子在曼彻斯特的集会上讲道：

> 罢工的蔓延将势必带来普遍的暴动。政府当局必将进行镇压；但是我们必须反抗。现在除了寻求确确实实的力量斗争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让人们走出来，进行战斗；如果团结一

致，他们就不可战胜。(D.Thompson，1984，pp.287，297)

宪章主义者经常得到现代作者的支持，因为从任何马克思主义和生产力主义者的意义上讲，几乎没有人是社会主义者(例如 Hobsbawm，1962，pp.252，255；Musson，1976；Stedman-Jones，1983)。但是这具有党派性的目的论观点，明显地来自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工党的理想幻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灾难性未来观点，作为目的论，它甚至没有说服力。因为他们受剥削的大部分直接原因来自中央政府，所以政府正是攻击的主要目标。当时(正如现在)选举权的确重要，而它的实现可以为激进派所期望的一切创造良好的机会——即一个更人道的《济贫法》，工会的互助主义组织权和更多的累进税制。

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宪章运动将明确的政治目的和互助主义的经济目标结合起来，这似乎符合资本家对工人家庭的剥削。正如多萝西·汤普森(1984，p.337)在其杰出的研究中所作的推断，宪章运动似乎有一个合理且更广泛的纲领——减缓迅速发展的中央集权化(除了国家的土地和交通运输所有权)，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调查经济单位的规模以及避免新的帝国主义。对此我们还应加上对儿童更加仁慈，这包括更多的教育和禁酒。她确信，宪章运动的纲领减缓了经济的增长。然而，通过使政治集中来解决工业问题，它就有可能纠正了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商业偏见(第四章中已作描述)。

部分宪章主义者已经准备更进一步采取彻底的革命手段，以达到他们的目标。“物质力量派”组织了武装俱乐部，拥有几千支长枪和上百支滑膛枪；他们反复按军事编队进行操练，举行火炬游行威胁地方当局。其中的部分人组织领导了1839年爆发的大起义，这次起义始于新港、纽卡斯尔和西约克郡。全国领导人几乎都反对这次起义，尽管有些人支持有组织的操练和武装这些较温和的做法。在计划中，很明显有些事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一旦纽波特的起义失败而无法蔓延开来，许多阴谋家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逃开了。在纽波特的起义中，大

约5 000名工人手拿长矛，试图在2万多名增援士兵从附近的山上赶到之前，卤莽地将狱中囚禁的宪章派领导人解救出来。1840年发生了重大暴动，同时在贝里、伯明翰和东北的煤矿产区发生了激战，出现了许多抢砸食品店和工厂的骚动，他们焚烧牧师的住宅和警察局，向军队投掷石块。1842年，宪章派民众控制了诺丁汉郡达四天之久，随后军队将他们驱散并逮捕了其中的400人。他们也控制了波特里斯两天，结果导致9人被流放，116人被监禁；在哈利法克斯，一群下层民众在被驱散之前严重打伤了8名重骑兵。1848年，制定了一份在兰开夏郡、西约克郡和伦敦起义的计划。在格拉斯哥，军队向一群反对《济贫法》的下层民众开枪，造成6人死亡。在布拉德福德，一群武装起来的下层民众击退了警察和临时警察，只有配着刺刀和枪的重骑兵才能驱散他们。

宪章主义者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少，或者具有地方性，或者缺乏凝聚力以及太胆小，而是因为他们的全国性组织太软弱，没有彻底革命的计划。这正是1917年以前所有“革命”运动的真实状况。只有当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混乱逐步升级到他们认为有可能推翻政府时，才开始成为革命者。事实上，在宪章派内部存在一个严重的弱点。他们发现很难筹措组织资金，这对于一个针对国家的运动来说是严重缺陷(这在1848年的大失败中是显而易见的)。在1801年到1851年间，当伦敦人口从100万上升到270万时，在资金上采取集体动员的可能性减少了。工厂和居住区的空间与整个城市政治层次的组织空间存在这巨大的鸿沟(Goodmay, 1982)。因为宪章运动是以地方社团为基础，所以它主要是在中心城市进行斗争。但是也有例外，如果革命不能发生，主要原因并不是由宪章运动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他们的煽动与来自法国1789年或1848年的阶级(尽管不是全国性的)运动中下层社会的任何鼓动一样有力。特别是，宪章派所拥有的一切(并且是与许多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者所共同具有的)是他们那热切的家庭和社团组织在道义和感情上所提供的热诚。

然而，工人的对立面所缺乏的是弱点和分裂，尽管多数史学家集中注意的是上层阶级而不是下层民众。与1789年、1848年或者20世纪早期的俄国不同，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分裂。在第五章中，我们注意到一些政权分裂的基本状况——在法院、法国议会与国民议会之间、教堂以及军队中——既促进了真正革命性危机的发展，又有利于起义领导权的左倾和阶级倾向。但是英国议会甚至没有讨论过《人民宪章》。正如马歇尔所提出的，现在不存在一个从个人公民权向广泛政治权利的演化。而前者是坚决抵制后者的。

没有一个拥有全国性或地方性权力的人对宪章运动抱有足够的同情，提倡对《人民宪章》的任何一个观点作出让步。温和的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改革家结成联盟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果。在面临威胁时，中产阶级就会保护财产和秩序，数千人加入临时警察的行列。正如约翰·萨维尔在对政府反应的详细研究中作出的结论，“在政府中，有财产利害关系的各社会阶层之间紧密相联，无论这一利害关系是多么少”(1987，227；参照Weisser，1983)。随后，在1848年的最后一次群众示威游行失败之后，宪章运动迅速衰落，一个内阁部长的妻子给另一个部长的妻子写道：“我十分幸运地确信整个事件的发生都显示了我们中产阶级的良好风气”(Briggs，1959a，p.312)。

因此宪章运动在最后阶段唤起了资产阶级更持久的阶级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就是一个正面阶级斗争所产生的事例。如往常一样，斗争不是产生一个辩证的革命综合体，而是统治阶级取得胜利。

资产阶级的团结使之有能力始终如一地、审慎地采取镇压手段——一个温和有序的军国主义国家形式。宪章运动没能遇上经常称颂的英国妥协和实用主义思潮。自从1832年以来英国就很少展示类似的特性，取而代之的是镇压的手段。内阁对这些政策争执是冷静的，不存在宗派之间的政策倒退，也没有导致过强的反应和严重的野蛮行为。军队通常只是为了将伤亡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才行动。仅在发生暴乱的

情况下，在适当的诉讼之后能予严刑——尽管与惩罚相比，冒犯者的暴乱经常相形见绌(惩罚包括死刑、流放和长期监禁)。 那些仅仅进行鼓动和组织的人被指控为“煽动叛乱”、“鼓励动乱”或者“阴谋集团”，通过适当的诉讼程序，仅判一年左右的监禁。 1848 年在 20 个推选出的宪章派委员中，有 14 人很快被捕，并被监禁达一年之久(Saville， 1987， p.162)。

理解英国法律的重要性及其相当中央集权的作用，这一点十分关键。 正如萨维尔所论证的，司法的警察机构实现了中央集权化，牢固地从属于政党民主的议会，而议会是拥有最高权力的法律制定者。 不像大多数欧洲大陆的政权，在国家中军事、警察和司法几乎没有独立自主的形式。 正如我们在以后讨论美国时所关注到的，法律和宪法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它们不会与更重实效、更君主化的成见共同分享国家。 这一成见认为，在对骚乱的控制下，将操纵法律来维持秩序或达到更高的政治目的。 这一时期的英国以及整个 19 世纪的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宪法，但是它们同样拥有一个(有限的)政党民主和代表资产阶级财产法则的最高法律。 他们都以政权的一贯性和统治阶级那无可比拟的伪善，将劳动者的煽动视为“阴谋”进行镇压。 正如我们将在以后几章中所注意到的，英国后来丧失了部分思想上的伪善性(而美国却未发生类似的情况)。 但是在 19 世纪中期，这种伪善思想仍很强大。它具体体现在托利党的内皮尔将军身上，他同情宪章派，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辉格党，但仍主张不惜代价来维护宪法。

内皮尔的军队已实现职业化，在世界上包括在爱尔兰和英帝国镇压平民骚乱的众多经历中几乎从未有过战败的记录。 内皮尔确信其士兵的纪律性。 他的策略也十分明显：集结军队。 因此，小股分遣队不会因孤立地留在驻屯地而被制服——他认为类似的小灾难将会立即被宪章派宣传为“巴士底狱”的象征，从而进一步鼓动起义。 如有可能，让骑兵用他们的军刀刀背来驱散手持镐头的矿工们，如果矿工不退让，就让步兵用滑膛枪和刺刀来驱散他们。 使用大号的铅弹以减少伤亡。

“击溃才是主要的，而不是要屠杀生命”(Napier， 1857， Ⅱ， p.4)。 警察、民兵或部队愿意服从命令，事实上，地方行政官、各级官员和士兵也不感到恐慌。 起义的成功——可能所有起义和革命的成功——依赖于恐慌的发生。 在纽波特的起义中，当30多名士兵被5 000多挥舞着镐头的示威者包围时，他们甚至也没有恐慌。 士兵们开了枪，当第二次射击的烟雾消散时(这次不是使用大号铅弹)，人群四散而逃，至少留下22具尸体。

击退宪章派主要骚乱的是指挥聪明、充满信心、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是具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民兵，是新组织起的地方政府机构和新的制度化的警察机构——所有这些都正确履行了国家法律。 演讲、乌合之众和长矛(内皮尔认为它设计得太短)如何能够反抗如此高效的中央集权化的武装调动呢？ 没有巴士底狱被袭取，也就没有任何革命发生。 正如列宁所认为的那样，与其说革命是头脑清醒的果断起义的产物，不如说是政府优柔寡断的结果。 因为英国统治政权是坚定的，所以就不会发生革命。

当1839年的一系列事件使这一点变得清晰明朗时，宪章派的反应出现了分裂。 可以听到关于道义派与物质力量派之间的争论。[3]大多数领导人知道议会将拒绝第一次请愿的道义力量。 对于最难作出的决议，他们仅是拖延：真的要采取下一步可想而知的措施，还是施加起义的压力？ 可能大部分的物质力量派领导人都将起义视作为一种压力而不是真正夺取国家权力。 法国在1789年到1791年的上半年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现在宪章派领导人也尝到了物质力量派所带来的苦果。 如果国家政权如此团结，对压力的反应如此迟钝，那么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多数人对物质力量派的抵制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正如韦德说过的：“如果没有先行的道义观和中产阶级与你联合，武器的呼啸将仅仅带来痛苦、流血和废墟”(Jones， 1975， p.151)。 奥康纳再三论证说，不管多么人多势众，人群总是被受过训练的军队打垮。 因此，主

要的分歧是在策略上，而不是在思想意识和政治上。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宗派基础：较稳定的上层行业与人数较多的下层行业之间，而下层行业支持物质力量派(Bennet，1982，pp.106—110)。进一步地分裂导致了衰落的开始，经过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骚动最终结束了。但是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拓宽视野。

对宪章运动衰落作出解释的传统做法是，不仅根据有效的镇压和随后的策略分歧，而且还依据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平民生活状况发生的两次普遍改善。第一，人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复苏，直到19世纪70年代经济才再次出现下滑，这结束了工人的绝望时代。第二，政府对严厉的社会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从而削弱了激进派领导人极力主张政治解决问题的基础。

这些讨论确实有些道理，但是仍需要扩充。宏观的经济趋势与社会运动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可能简单地因为经济的发展或衰退就导致起义。在这些方面，最好的解释是戴维斯(1970)提出的著名的“J”曲线，它的依据是革命发生在紧随经济高涨而来的短期骤降趋势之时。当民众的期望上升以后却突然受挫。这样的“J”曲线通常发生在革命前，尽管并不总是如此。根据这一理论，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发展达到高潮，随后70年代经济出现了急剧倒退，这时应该再次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但是起义并未如期而至。起义应是有组织的(正如资源动员理论所论证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具体的解释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组织起义之间所存在的联系。我随后将给出答案。

是否是因为政府缓和了社会政策，从而逐渐侵蚀了宪章运动(正如Stedman Jones，1982，pp.50—52提出的)？19世纪40年代发生了决定性的变革，即消费税负担的减轻(第十一章对此已作出证明)。这一结果不是由于政府观念的转变，而是因为(正如第十一章所指出的)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债务循环结束了，而且没有再次发生其他战争。因为自从18世纪60年代，倒退的战争财政使多数阶级政治化，但是它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工人家庭的政治化。正如第十一章所认为的，现在捐

税的减轻正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发生。在征税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时代，宪章运动，至少是它的早期阶段，是最后的运动之一。19世纪晚期，阶级政治化的新形式出现了，但是在19世纪中期有一个短暂的停滞时期。工人的骚动更多是出于经济原因，主要是限于直接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这使工人运动趋于缓和并非政治化。

有时需要指出较稳定的政权还具有另外两个标志：对《济贫法》的实施更为宽松(D.Thompson，1984，p.336)，在“勤劳阶级”之间(尤其在持不同政见者之间)进行协作，这种协作使工人与企业家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旧政权。从而保证了1846年废除《济贫法》，并鼓动禁酒和教育改革。然而，19世纪40年代反对《济贫法》的暴动仍然发生了，宪章运动的激进派几乎没人被协作运动所诱惑，而这并没有在宪章运动的衰落中产生积极的影响。阶级间更广泛的合作仍在《工厂法》运动中产生，但是它——以及经济和税务高涨——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在于改善不如说是加强了地方主义，正是地方主义最终战胜了宪章运动并使之解体。现在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复杂的过程。

《工厂法》运动主要反对对三种不同身份的工人——男工、女工和童工的剥削。对这三种工人实施“公平的工资”和“合理的工作时间”的主张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激进派支持，但是许多人还是希望控制或结束工厂对女工的雇用，而且更多的人——甚至包括工厂主和他们的妻子，大多是福音会新教徒和积极主张禁酒的人——攻击雇用童工。主要有两个极端派别即激进派的左翼和托利党的上层支持这些观点。有时这两个派别联合起来，正如来自利兹市的议员迈克尔·萨德勒提出了《十小时工作法》，就得到了宪章派的支持，在议会的选举中他也以此来反对自由党的对手。罗奇代尔棉纺厂的厂主约翰·布赖特虽然属于激进派，但也支持自由放任的观点，他反对《工厂法》，认为这是“限制贸易”并“侵犯了自由权利”。在议会中，来自各郡贵族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上层怒斥工厂主的不道德行为。这种家长式的政治形式所提供的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政权的不团结。这使工人能够从中获

利。 工人的利益获得是通过政权的分裂斗争，而不是通过辩证的正面对抗或体制的妥协。

议会始终为儿童制定立法。 老皮尔的 1802 年法案是《学徒健康和道德法》，这暗示了它在道义上的家长式风格。 皮尔是托利党人，在当时可能是议院中唯一拥有学徒的雇主。 他呼吁对儿童要采取道义上的家长式统治，而无须克服受保护的议会利益集团的敌意。 随后，托利党制定了 1819 年法案，禁止在棉纺厂中雇用 9 岁以下的童工。 到 1832 年，议会完全是工厂主利益的代表，战线更加牢固。 但是《工厂法》运动公布了童工在矿山和纺织厂工作中的惊人苦境，它通过斥责对女工的血汗雇用来呼吁施行父权制。 妇女作为家庭道德的承传者，被大多数宪章派和保守派人士认为是社会道德结构的根本。 他们认为未婚妇女应从事那些将来有益于为人母的工作，如家庭服务或零售业。 已婚妇女则应呆在家中。

在宪章运动期间，为了确保这些道义上的家长式目标，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辉格党制定的 1833 年法案和 1836 年法案，建立了控制工厂和童工工作时间的工厂委员会。 1846 年超党派的《矿工法》禁止雇用 10 岁以下的儿童和妇女下矿，并建立了监察员来执行禁令。 1844 年托利党制定的《工厂法》主要是针对纺织业。 它规定 13 岁以下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 6.5 小时，妇女每天工作时间最长为 12 小时；它也保护机器和扩大监察员的管辖区。 超党派的 1847 年法案将纺织厂女工的工作时间减少到 10 小时。 1850 年法案和 1853 年法案规定了女工的日工作时间。 尽管这些是补充实施的法案，但是它们也认可了在儿童不工作时，对他们进行教育的责任。 由于得到主教们的支持，所有法案都在上议院通过。 1860 年到 1867 年间，议会将立法扩大所有产业。 但是直到 1874 年，立法才扩大到男工。

这一立法依次揭示了童工、女工和男工之间的局部差别，这是以道义主要是家长管辖为借口的。 童工首先被控制并排除。 这很少引起争议。 据记载，工人阶级的男工和女工也意见一致：儿童不应成为工资

奴隶。因为这从体力和道义上都是对他们的贬黜，同时打破了家庭和父母的权威，并通过竞争降低了童工的工资。由于前两个观点得到议会的极力赞同，第三个观点，即“限制行业”也捎带通过。消除了劳力“拥挤”的最大原因，工人工资就可能提高到足以让孩子们呆在家中的程度。然而道义的争辩同样也限制了女性就业，尽管限制的程度较低。工人的观点再次相当一致。因为所有人都想减少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能确保妇女得到这些仍是一种收获。对行业和劳力拥挤的限制再次顺便通过；工资有可能再次提高。

但是这些进展也产生了一些意外的后果。对一个群体的工作时间作出限制，也会影响到其他群体。因为男工和女工是一起工作的，不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妨碍了工作效率(尤其是1850年和1853年法案制定以后)。这次运动认识到了这点，它希望能同样缩短男工的工作时间。有时工作时间会缩短。但是由于考虑到雇用童工的花费会较高(尤其是如果提供教育的话)，童工和女工对雇主的吸引力减少了。在工厂的就业中童工被排斥，同时女工的正式就业机会减少。男工欢迎这一点，他们确信收入将会提高到“家庭工资”的水平。妇女的反应不同，尤其是成年未婚女子和寡妇，现在她们的经济自主权被削弱了。“现代人”包围的就业场所——工厂、矿山和铁路工场——开始变得井井有条且男性占绝对多数。棉纺织厂仍十分混杂，但是现在男工和女工之间有了稳定的等级区分(不包括童工)。

这里不仅仅叙述了工人立法的进展，而且也叙述了资本家与思想道德和家长制政治形式的联合体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非预期后果。这些都削弱了宪章运动的家庭—社区的阶级团结，并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活动变成兄弟会式的狭隘地方主义。我们唯一能清楚地探索这一点的国家是英国。因为其他国家，在工人阶级大规模出现之前，家长式道德就迫使女工和童工离开了工厂。仅在英国存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人的反抗运动。现在这一运动也已地方主义化，并进一步衰退，但是随着经济和捐税的减轻，它又得到增强。工人阶级的非政治化、活动转向工作场所以

及更多的订货都增强了他们的经济武器。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正是在如此的地方主义和经济主义环境中，保护主义的宪章派土地公司出现了，它计划购买土地让工人耕种——这是政治失败的一种反应，也是向狭隘(并且是落后)经济行为的转变。正是由于宪章运动在正面阶级冲突中遭到失败，19 世纪中期以后才兴起了“体面的工联主义”。

地方性工联主义的兴起，1850—1880 年

19 世纪中期以后[4]，工会的发展速度虽然放慢了，但仍然在日积月累地发展着。据韦布斯(1920，pp.472，748)估计，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工会会员不到 10 万人。而最近估计，1860 年前后的工会会员在 50 万人到 60 万人之间，1867 年大约为 80 万人，到 1876 年则达到 160 万人(Fraser，1974，p.16)。但是工会充溢于更大的合作社和“互济会”中。1874 年，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估计，互济会拥有 400 万成员和 800 万受益者(Kirk，1985，pp.149—152)。大多数工人以保护主义的形式参加，政权对此没有反对。

然而工会也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到 1860 年，大多数工会具有地方性并主张经济主义，这对多数作者来说是保守的或贵族性的。尽管不再单纯是违法的，但按照阴谋集团的法律，工会仍备受困扰。正如我们在下面章节中所指出的，在美国(第十七章)，有特权的行会地方主义比工业工会或总工会容易钻法律的漏洞，尤其是如果他们控制了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多数工会仅限于上层的有技术阶层。除了城市手工业者，还应加上有技能的技师，在作坊和工厂控制下的钢铁工人和矿工，以及纺织工人和其他更多由工厂创造技能的行业。工会的重心从手工工场转移到大型的机械化工厂和矿山。国内劳动力市场在铁路、制铁业和炼钢业中得到发展。大多数工会试图限制行会的加入，阻止“熟练工人的助手”、“佣工”和“铆工”；限制女性就业；要求“家庭工

资”——仅针对男工(Savage，1987)。他们寻求对工厂和作坊管理实行制度化，与雇主消弭纷争，调和罢工，确保工会会员的工作效率，赋予会员一定的社会地位。此时激烈的罢工很少出现，大部分罢工发生在采矿业。对地方行业及部门性企业的认同比对阶级的认同更加巩固(Joyce，1980，pp. 50—89)。一名锅炉制造工(引自 Fraser，1974，p.59)在诗中写道：

> 资本和劳动似乎
> 是由我们的上帝把它们连在一起，
> 在精神世界里
> 难道它们不像一对孪生的巨人?
> 只有劳动又能做什么?
> 就如同转动那没有谷物的碾磨机!
> 那么资本本身又能做什么呢?
> 只能贮存它的种子，
> 吞下一粒金色的药丸。
> 我们被捆着
> 去攀登那通向光明前途的山峰。
> 困难使我们团结起来。
> 我们因此将同心协力，
> 向惊异的人类展示
> 资本和劳动，
> 是我们奋力划动船只的双桨，
> 是我们翱翔高空的翅膀。
>
> (Fraser，1984，p.59)

然而，体面的工会正向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转变，这就是

将社会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体制，认识到就业条件是与他们所能利用的行业循环相联系(Hobsbawm, 1964, p.350)。他们整体意识增长的另一个标志——佩林(1963, p.42)称之为“工会发展史的里程碑”——是1851年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全国工会，即技师统一工会(ASE)。尽管仅限于男性熟练工人，但是它承认了他们共同的全国性利益。技师统一工会为其他工会提供了一种从地方组织通过地区性组织形成全国性组织的模式。

技师统一工会的规章制度阐明了行业工会的主要矛盾：

> 如果对于那些还没有通过试用期的劳役(即学徒期)获得权利的人,我们被迫通过限制来约束他们加入我们的工会,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上述的侵害是罪恶的后果,当坚持不经审查就可以加入工会时,其结果是导致手工业者的生产条件降低到非熟练工人的状况,不会给那些被允许加入工会的人带来永久利益。(Clegg 等,1964, p.4)

尽管工会认为对非熟练工人的排斥是“被迫”的，但是这种排斥性强化了地方主义。然而工会仍在发展壮大，并最终使其成员的共同身份和组织实现了政治化。最初，技师统一工会最关心的是使互济会的利益标准化。但是1852年当雇主们在全国范围内胁迫技师统一工会时，他们和其他手工业者都被迫进入一个更广泛的组织和政治领域。阶级斗争具有日积月累的辩证因素。工会卷入到争取10小时和9小时工作时间的运动中，它迫使雇主求助于地区性和全国性组织；反过来，这又进一步迫使工会建立全国组织。到1880年，工会会员从最初的5 000人上升到4.5万人。事实上，被称为“新式”工会的威望并非是新型的(Musson, 1972)，但却是“全国的”工会。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全体工人的国家。

尽管政治化不是阶级的首要任务。但19世纪50年代，在改革同盟

中，工会和中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合作，它的格言是“有工作者应该拥有投票权”。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自由主义继承宪章运动，成为大多数工人激进派的政治信念。他们也参加了跨阶级的合作、教育和禁酒运动(Kirk，1985，pp.70，132—173)。作为回报，他们接受了互助论的立法，这一立法确保合作和互济会的权利以及改善教育。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赞同互助论的观点，即应授予劳工工会以共同的公民权利。伪善的资产阶级正在一个更加地方化的稳定社会中松懈下来。在政权中，宗派活动再次出现。更多人提倡建立体面工人的“自由团体”。

实际上，对于工人，英国现在也将其定型为政党民主。部分托利党人和自由党人开始确信，应将投票权授予那些体面的工人。这一时期，政党本身开始更加群众化，贵族性减少，同时更多地卷入真正的竞选中。如果支持改良，两党的各个派别都可望从选举中获利。1867 年的《保守党改革法》给予市镇中的户主以选举权，同时完整地保留了乡村的保守党权力——德比勋爵说，他的法案将“挫败辉格派”。自由党采取了报复行动，1884 年它将法案的涉及范围扩大到乡村。事实证明，在许多乡村选区和煤矿工人集中的地区，他们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1885 年，由工会提名并忠于自由党的矿工被选入议会。因此，工人也进入了议会，这是工会与政党民主的政权进行部门性协作的一个结果。

职工大会(TUC)是全国性温和的互助论者和与通敌者联合的全国性象征。在 1868 年到 1869 年间，它是作为辩论社团而创立的，通过工会的法律约束进一步扩大发展起来(正如劳工组织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所经历的情况类似)。1871 年《刑法修正案》将多数的工人纠察定为犯罪，这甚至威胁到行业工会。1875 年职工大会通过在资产阶级联盟中的游说，成功地将其撤销。

各工会也共同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努力来理解“社会”的性质。社会是一种受到本身法律约束的系统的整体。这一概念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学科中传播。英国实证主义者推广并普及了孔德的学说。

孔德是实证主义的缔造者；斯宾塞所著的有关社会进化的书籍，赢得了众多读者；马克思和更自由的社会党人都在讨论资本主义体制，后者还与激进派及工联主义者辩论这一问题。他们的理论大多对社会总体作了一种双重假设——“社会”即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体制，又是一个民族国家。因此它同样为社会主义和社会学而保留下来。

体面的工联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工人贵族”，当然也不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正如 Foster 在 1974 年所提出的)。宪章主义和阶级运动在工会拥有体面的地位之前就已崩溃。作为其失败的结果，此后许多人都不再拥护起义。值得注意的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手织机的织布工人大量消失。相反，体面是对下列情况的一种地方性合理反应：(1)宪章运动的阶级趋势遭到正面失败；(2)随之而来的阶级团结被分割为经济主义的地方性策略；(3)政党民主的政权原则承认，地方主义不构成任何威胁，并且在事实上还包含了积极的功效；(4)在经济的发展中，以经济多样性的新形式来促进 19 世纪中期以后的地方主义。我将从工厂开始叙述第四个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预期的，19 世纪中期以后，工厂的发展没能巩固阶级的身份。乔伊斯(1980)指出，棉纺织厂推动了部门性家长式统治，甚至是服从。这符合卡尔霍恩(1982)提出的论据。早期的激进主义在城镇的许多小型手工工场中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不是存留于工厂占优势的地方；同时吕德(1964)证实骚动的人群(除了在宪章运动的巅峰时期)是由不太遵守纪律的工人组成的，他们比工厂工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F·M·L·汤普森(1981)证明，从 1840 年到 1880 年，大型工厂是对工人实施部门性控制的主要机构。

这些调查结果也符合了纽比(1977)的“服从”模式。他写道，服从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态度，如果农场主操纵了工人的全部生活，这将导致 20 世纪的农业学(他的研究领域)。20 世纪的农场主和 19 世纪末的制造商不仅是积极的物主管理者，同时也是地方社会的教育和政治机构的行政长官和领导者。工人缺少向这种广阔空间挑战的权

力，但是能够通过控制一种惯于顺从的方式达到目的。他们甚至可以使顺从内在化：如果唯一可能的现实是雇主施行统治，那么这个词在事实和标准的双重含义中就变成“自然的”了。因此，乔伊斯指出，应给予(男性)棉纺织工人以选举权，使他们能够投票给雇主、辉格党或托利党。小型企业发生了更多的冲突，这是因为与手工业者相比，小型企业主几乎没有更多的社团控制权。激进主义主要存在于大城市，而不是中等市镇的工人中间；工厂主的寡头统治可以控制罗奇代尔、哈利法克斯和沃尔索郡，但是无法控制曼彻斯特、利兹、诺丁汉或伦敦。工厂集团并不鼓励阶级组织，但却支持部门性组织。上层社会从组织上阻挠下层社会的能力并未丧失。马克思认为上层社会受到挑战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已制度化的工厂有助于阻止挑战，就如同工厂的出现有助于它的开始一样。与其说工厂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不如说它是中世纪庄园的工业对等物。工厂里的工人成为大老板的部门性雇员。

此外，在工厂、繁荣稳定的商行与控制着劳动力供应的行会相交汇的地方，工会“产生”了劳动关系。尽管女工形成了地位重要的少数派雇员，但是在工会中男工仍占压倒性多数。家庭工资、男子作为养家活口者以及同志关系等等的劳动观念具有男性化的特征，正如大多数工会是在酒馆里召开会议的(Hart，1989，pp.39—60)。在工厂和稳定企业之外，以及与市场不确定因素的交汇之处，不定期领取救济的无组织的工人占据了优势，其中多数是男子也包括部分女性。在某些领域的男性临时工中，爱尔兰移民占优势。这导致了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裂，乃至暴动(Kirk，1985，pp.310—348)。在早期，当多样性还未稳定为地方主义时，爱尔兰籍工人已在宪章运动中明显的表现出这一点。兰开夏郡激进派的两个团体现在成了对手。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已注意到了新的分裂，尽管这种分裂通常是男人之间的分歧。马克思已经分析了19世纪中期的法国工人和不定期领取救济的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后来，他又强调了英国工人和爱

尔兰工人的冲突。同时代的其他人则将“工人阶级”多元化。正如激进的《蜂箱杂志》在1864年所写的：

> 工人阶级……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包括熟练的手工业者和技工，另一部分人则是体力劳动者、小商贩——这些人以他们自己都很难描述的方式来维持生计——以及形形色色的粗俗之人。(Fraser，1974，p.209)

梅休注意到，在“各行业”之中只有手工业的熟练工人拥有固定工作和工资：

> 手工业者几乎是狂热的政治家……，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是人民中的一个不同阶层。到当时为止，他们如同仆人一样对政治不感兴趣……无论如何他们都显得毫无政治观点，假如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也宁愿去维持“事态的原状”，而不去争取工人群众的统治地位。(Evans，1983，p.170)

在维多利亚时代，技术和性别的紧密结合在工人阶级中形成了一个主要的错误方针同时代的人开始将工人分成“体面人”和“粗人”。格雷(1976)和克罗西克(1978)指出，(男性)手工业者建立自己的协会，实行内部通婚，职业世袭；他们通过互济会拥有一定数额的积蓄并建起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像从非熟练工人中划分出来那样，他们也从中产阶级中划分出来。中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化”，相反却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宗派。他们比非熟练工人拥有一种极大的优势：由于控制了劳动力市场而就业稳定。非熟练工人是临时工人，其工资水平也未达到家庭工资的标准。这阻碍了他们为互济会和其他手工业组织捐款。也许最有力的对比是涉及维多利亚时代工人们最大的恐惧，即济贫院(Crossick，1978，pp.112—113)。在格林尼治，体力劳动者进入济

贫院的几率是人口平均数的 5.5 倍；传统的手工业者(裁缝、泥瓦匠、制桶匠)进入济贫院的可能是平均数的 2/3；机器工人则仅是 1/4。 技工的谋生机会比体力劳动者高出 20 多倍。

性别差异、手工行业、在家庭以外工作和临时的工厂劳动——加上更具部门化控制的农业和家庭服务业——几乎产生不了阶级认同。 大多数的集体行动仅限于有技能的“同业人”。 民族国家也由于鼓励部门性联盟而使阶级界限模糊不清。 因此，在工人阶级能够再次出现之前，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都必须结束。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尤其 1880 年以后，这两方面都未终结；但是如第十七章所指出的，它们都被削弱了。

结论

英国工人运动的早期发展是独特的。 在随后几章中将不再重提本章中所探讨的各种主要权力关系。 工业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早期弥散性，得到国家军国主义的进一步加强，也使其历史的“联邦”形式更加中央集权化。 三种紧密结合的力量产生了一种极早熟的工人阶级运动，它以注重家庭和社区为特征。 在 19 世纪 30 年代晚期和 40 年代初，爆发了宪章运动，这一运动同我们后来在其他国家发现的起义运动相同。 然而，它也遇到了一个同样果断的、有阶级意识并且伪善的统治政权和资本家阶级，它们控制了力量更大的、守纪律的军国主义。 宪章运动和政府及资本家之间发生的正面冲突，不存在逻辑辩证的解决办法。 工人阶级失败了，如同它已失去的所有类似正面冲突一样。 而且在随后的十几年中，由于几乎没剩下什么残余力量，它最终失败了。 这是因为工人的地方主义能够为行会工人获取统一阵线；这些行会工人在内部或外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排斥权。 第十七章描述了这些地方主义是如何遇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而再次发展更广泛的阶级组织，尽管要

比宪章运动更温和。

19 世纪中期地方主义对阶级的替代也涉及家庭。虽然早期的阶级运动从家庭和社区中获得了巨大支持——这种支持比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要强烈得多——但是，后来地方主义以男性为主，主要关注就业问题，是生产主义派。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我也将阶级作为一种关系来分析。在整个这一时期，无论国家政权还是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都没有始终如一的战略，无论这一战略是反动的、实用主义的还是进步的。他们的战略倾向——事实上，正是他们的一致性——随着相互作用而定型。例如，从《大改革法》的宗派主义到宪章运动直至 19 世纪 60 年代，政权由实用主义的让步转变为有纪律、伪善的军国主义，再转变为巩固政党民主所带来的实用主义退让。这样做是由于它自身的认同，外部的压力以及工人运动的一致性都发生了改变。

我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不同，没有将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为辩证的，由正面冲突和所有有组织阶级的决心构成。我以两种方法证明这种辩证法的正确性。首先，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也破坏和削弱了阶级。以现状为例，斗争的决定性结果是，政府虽然保持了一致性和团结，但是军国主义加上无法预期的后果造成地方的工人特性。后来，当政府松懈时，它又产生了政党的宗派主义。其次，阶级冲突极少是单纯和正面的。因为它包括了复杂的权力网，对于运作者来说，其中的相互关系不是系统和透明的。因此，对于双方来说，他们的决心产生了无法预期的后果。我已集中关注了家庭和阶级之间的非系统联系，以及在资本主义、思想道德、家长式统治和政党民主这些国家形式之间的非系统化密切联系。它们的紧密联系带来了一系列人们未曾期望的后果。例如，通过《工厂法》，工人获得的收益并非完全是国家政权所期望的。而工人运动基本成为男性化的运动，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我也许还要加上另一组非系统化的相互作用，即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作用，它也发生于这一时期。但是我还未能探索出它们的

最终后果。

注 释：

[1] 这一部分的主要资料来自汤普森(1968)、珀金(1969， pp.176—217)、马森(1972)、普罗瑟罗(1979)、亨特(1981)，以及卡尔霍恩(1982)。

[2] 关于宪章运动的主要资料引自布里格斯(1959b)、普罗瑟罗(1971)、琼斯(1975)、爱泼斯坦和汤普森(1982)中的不同文章，斯特德曼—琼斯(1983)、D.汤普森(1984)。

[3] 它们可能起源于爱尔兰人的解放斗争，因为许多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就是爱尔兰人。

[4] 关于这一时期的主要普通资料的提供者是佩林(1963)、珀金(1969)、马森(1972)、弗雷泽(1974)、托尔弗森(1976)、亨特(1981)、埃文斯(1983)和柯克(1985)。

参考文献

Bairoch, P., et al. 1968.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Its Structure*. Brussels: Editions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Libre.

Bennett, J. 1982. The London Democratic Association, 1837—1841: a study in London radicalism.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60*, ed. J. Epstein and D.Thompson. London: Macmillan.

Briggs, A. 1959a. *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 London: Longman Group.

1959b. *Chartist Studies*. London: Macmillan.

1960.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ed. A.Briggs and J.Saville. London: Macmillan.

Calhoun, C.1982.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Oxford: Blackwell.

Church, R. A, and S. D. Chapman. 1967. Gravener Hens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n *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E.C.James and G.E. Mingay. London: Arnold.

Clapman, J.H.1939.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egg, H. A., et al. 1964.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Since 1889*,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rossick, G. 1978. *An Artisan Elite in Victorian Society*. London: Croom Helm.

Currie, R., and R. M. Hartwell. 1965.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18.

Davies, J.C.1970. The J-curve of rising and declining satisfactions as a cause of some great revolutions and a contained rebellion. In *Violence in America*, ed. H.D.Graham and T.R.Gurr. New York: Bantam.

Epstein, J. 1982. Some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Chartist movement in Nottingham.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60*, ed. J.Epstein and D.Thompson. London: Macmillan.

Epstein, J., and D.Thompson (eds.). 1982.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London: Macmillan.

Evans, E. J. 1983. *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 1783—1870*. London: Longman Group.

Foster: J.1974.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Fraser, W.H.1974. *Trade Unions and Society*. London: Allen & Unwin.

Goodmay, D.1982. *London Chartism, 1838—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y, R.Q.1976.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Victorian Edinbur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reenberg, D. 1982. Reassessing the power patter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Anglo-

American comparis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Hobsbawm, E. J. 1962.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Mentor. 1964. Labouring Me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ollis, P. 1973. Class and Conflic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1815—185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unt, E.H.1981. 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Jones, D.1975. Chartism and the Chartists. London: Allen Lane.

Joyce, P. 1980.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r Victorian England. Brighton: Harvester.

1990. Work. In 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 2: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ed. F.M.L.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Visions of the People. 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184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rk, N. 1985. The Growth of Working Class Reform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Leeson, R.A.1979. Travelling Brothers. London: Allen & Unwin.

Morris, R.J.1979.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80—1850. London: Macmillan.

Musson, A.E.1972. British Trade Unions 1800—1875. London: Macmillan.

1976. Class struggle and the labour aristocracy, 1830—60. Social History, no.3.

Napier, Sir W.F.P.1857.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General Sir Charles James Napier, 4 vols. London: Murray.

Newby, H.1977. The Deferential Worker. London: Allen Lane.

O'Brien, P.1989.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793—1815, on the long-run growth of the British economy. 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 12.

Parkin, F.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Pelling, H.1963.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London: Macmillan.

Perkin, H.1969.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rothero, I. 1971. London Chartism and the trad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4.

1979.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London: Methuen & Co.

Rudé, G.1964. The Crowd in History 1730—1848. New York: Wiley.

Rueschemeyer, D., E.Stephens, and J.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muels, R.1977.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3.

Savage, M.1987. The Dynamic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ville, J.1987. 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well, W.H.1974. Soci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Marseilles. Past and Present 65.

Stedman-Jones, G.1975.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review article. New Left Review, no. 90.

1982. The language of Chartism.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60, ed. J. Epstein and D.Thompson. London: Macmillan.

1983. Languages of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ykes, R.1982. Early Chartism and trade unionism in south-east Lancashire.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60, ed. J. Epstein and D. Thompson. London: Macmillan.

Tholfsen, T.1976.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Thompson, D.1984. The Chartists. New York: Pantheon.

Thompson, E.P.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Thompson, F. M. L. 1981. Social control in Victorian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34.

Thompson, N. 1988. *The Market and Its Critic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ebb, S., and B. Webb. 1920.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London: Longman Group.

Weisser, H. 1983. *April 10: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England 1848*.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第十六章

中产阶级国家

理论问题

在第四章和第九章中讨论到了19世纪的政权，它们主要由数千个大家族控制着，且需要外界的援助。确实，直到19世纪末，工人才形成了有组织的威胁；农民组织起来较早，但是(正如第十九章将要表明的)其组织很少有破坏性。大多数工人对国王、国家和资本无论是热爱还是不满并不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稳定的权力组织，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然而组织上的迂回管理却需要较低阶层的管理者和忠于政府的人，以前这些人来源于特殊的部门性的网络，现在由于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普遍性，数量有所减少。然而令统治者们欣慰的是，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群忠心耿耿的部下——中产阶级。

自此，这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绝对是忠诚的。正如很多作家所认为的那样，国家政权最担心的是国家极端主义的那种周期性趋势。我将持怀疑的态度来审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被我称做过分热心和超级忠诚的国家主义找到一个更加特殊的社会定位。考虑到这种长期存在的阶级忠诚，本章将经常打破年代顺序的界限，概括延续至今的连续性。19世纪晚期创立的中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证明是属于我们的。在西方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中产阶级具有与工人阶级同样重

要的作用。

中产阶级的定义一向都是有争议的。“中间群体”的兴起立即为19世纪的观察家们提出了概念上的问题。由于受这个阶级中的不同层次的影响，大多数人使用了复数的“中产阶级们”。选举权问题尖锐地提出了阶级的定义问题：应当允许中产阶级拥有投票权。但是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呢？而且这个问题是由重实效的政治家，而不是由清楚的概念来解决的。同时代的人们下了定义，但历史学家把“中产阶级”仅仅用作“剩余的一类”。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格雷认为“生产关系”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了区别，但只是建立了“中间阶层之间的区别”，所以不能机械的运用(1977， pp.134—135)。这个模糊的建议被克罗西克响应，对他来说“低等的中产阶级”从分析的角度是薄弱的，但是作为一个“同一时期描述术语”(1977， p.14)是有用的。哈里森(1971， p.101)说，20世纪给中产阶级下定义是困难的，但是“在早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成员资格、身份的检验更加客观……尽管根本并不严格，甚至也不确切”。客观的也能是模糊的吗？社会学家能提供更好的概念吗？

社会学家确实提供了**更多**的概念——小资产阶级，有着旧的、新的和传统的一面；中产阶级，有其新的、旧的和分裂的特点；新兴的工人阶级、服务阶级；专业和管理阶级——这些阶级可能处于“对立的阶级位置”中。或者作为替换办法，有许多中间阶层、职业阶层或社会地位层次；或像“白领”、“职业”或“半职业”这类混合的阶层术语。法国的术语与之相同。德国则把阶级和“财产”的术语——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分为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这种过多的描述体现了五种不同的理论。中间群体就是：

1. 处在工人阶级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2. 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一种偶尔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

3. 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对立的阶级位置中(Wright， 1985，

pp.42—57)。

4. “分裂”，即各种中间阶级分裂成不同的阶级或等级——最普遍的观点(例如，Dahrendorf， 1959)。

5. 分裂的中产阶级(例如，Giddens， 1973)。

在这五种观点之间(由 Abercrombie and Urry， 1983， pt. I 再次回顾到)存在着无休止的争论。 我借鉴了这些理论，但主要结合了第四种和第五种。 我这里想说的是独立但(像其他阶级一样)仍然“不纯粹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包含着三个内在的部分，每个都有不同的权力组织。我也坚持认为以前大多数社会学因三个理由而未能充分理解中产阶级的复杂性，这三个理由是：

1. 大多数作者已经进入了有关另一个阶级问题的争论，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Blumin， 1989， pp．6—7 和 Mayer， 1975，也抱怨过)在涉及资本家和劳动力之间的斗争中可以看到，中产阶级(正如这一术语所暗示的)据称是现代阶级关系的明确特征。 从这一观点来看，中产阶级缺乏独立性，因为大部分都站在资本家一边(见 Ehrenreichs 对 1979 年的“专业——管理阶级”理论的批判，例如，Aronowitz， 1979 或 Goldthorpe， 1982)。 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劳资双方的关系，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正如我所反复证明的那样，社会并不是单一的，不能简化为社会权力的唯一来源。 现代社会并不能简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其阶级关系也不能简化为劳资双方的关系。

2.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合用了一个狭隘的“生产主义”，集中于常常是普遍存在于大的制造业中的雇佣关系。一些人把工人阶级局限于“生产劳动”中，几乎把所有的群体都放在资本家一方。 很多人利用“资本的全球功能”(Poulantzas， 1975；Carchedi， 1977)。 赖特(1985)曾试图用一个相当原始的“生产关系”的模式来涵盖中产阶级的多样性。 他区分了三种雇佣权力的来源——财产、组织权力和技能。 每一种都来自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模式(尽管他认为财产权力和由此产生的生产模式占统治地位)。 中间群

体倾向于在某一方面地位较高，而不是在三个方面都高——因此，他们处在一种“矛盾的阶级位置上”。我接受赖特提出的很多理由，但他的理论是生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只有雇佣关系真正在考虑之内，而权威和教育只是由于在功能上有助于经济生产才被引入。

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雇佣关系。达伦多夫(1959)论证说，在雇佣中，权力关系作为现代社会阶级中基本的决定性要素，已经取代了财产所有权。戈德索普(1982)用这样的术语定义“服务阶级”，即在工作中负责的专家、经理和高级的技术人员。他对服务阶级的其他特征，如普通的教育经历是相当敏感的。但无助于定义他的职业阶级(实质上是职业的聚合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再一次被解释为职业关系，这可能是我们走出中间困境的向导。

3. 新韦伯主义者对中产阶级的解释仅仅是把网撒得更宽。他们把共同的生活机会和生活风格、学校、社会影响和通婚、还有正式的职业关系等都考虑在内。而且人们都已超出了单一的经济功能。但是他们倾向于把这种多样性与主要由教育所定义的一般概念“市场位置”融为一体。帕金(1979)，论证教育“证书”使中产阶级较大的远离了劳动力市场。再如科林斯(1979)，他并不是实用主义者，但是对这一点却相当嘲讽：教育不仅仅是对经济需要作出的回答；它本身也是权力的一部分。

吉登斯把教育的权力放入一个更加宽广的理论中，即市场权力怎样在任何特定形式的市场容量关系中存在着流动的封闭，阶级便形成了(他强调说)。他的观点部分与赖特的相同，他详述了三种市场权力：财产、教育，或技术资格和劳动力。这就给了三种基本的现代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教育所定义的中产阶级。这样分类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即把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小店主、独立的工匠——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这也可能是一个奇怪的结论。吉登斯通过加入了一些辅助“阶级关系的近似机构”如在企业和消费模式中的权力关系，使得他的模式更加合理。然而总的来说，他的理论以教育所赋予的市场

权力代替了生产方式中以雇佣为中心的关系(1973, pp. 107—110)。

阿伯克龙比和厄里(1983)已经进行了敏锐的观察，我们应把生产和市场关系结合起来，而且起源于这两方面的总的作用也有助于给中产阶级下定义。这些步骤虽然必要但仍不充分。我进一步总结出三个步骤：

1. 三种总是不纯的生产关系：(1)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2)统治集团尤其是资本家的公司和现代国家的官僚政治(3)国家特许的权威职业，它们的撞击产生了中间集团。我有时在关系(2)中又分出私人等级制和社会等级制，但是全部的生产关系共产生了三个不同的群体：

(1) 小资产阶级：小家庭企业的业主。

(2) 流动职业者：涌向公司和官僚集团的带工资和薪水的雇员。

(3) 专业人员："有学问的人"，集中在国家特许的有组织的公司里。

当然，很多人处于这些群体之间"矛盾的阶级位置"上，另一些人则混在一起，分辨不清(如被公司雇佣的专业人员)，还有些人从事有个性的职业，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停留在直接生产关系的水平上，我们可能不得不把这三个群体看成是独立的阶级，因为他们的雇佣关系是如此不同。然而通过第二步和第三步，一个共同的阶级地位就产生了。

2. 我回忆起**权威的**和**分散的**权力关系之间的差异。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由权威的职业组织构成的。它还体现在分散的资本运作中，包括消费(正如很多作者注意到的)。我们将看到，这些有助于把我们的三个阶级派别统一成一个整体。

3. 资本主义永远不能自我建立。正如我所论证的，它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军事的和政治权力的网络中。我们也将看到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民族公民权，也使中产阶级成为一体。

确实，所有这三个标准——职业关系、分散的权力关系和所有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给中产阶级加上了一个共同的性质：他们与上层统治阶级主要是一种增强效忠的部门关系——如果对一些人来说，产生了令人担忧的"超级忠诚"。这样，他们就成了由常规所定义的、单一阶

级的组成部分：它是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等级制度中起辅助作用的中间参与部分。我将从经济关系开始讨论。

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拥有和控制它自己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力，并雇用非自由的工资劳动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定义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企业不按照市场税率(一般低于市场税率)使用从属的家庭劳动力，业主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或是朋友合伙，通常是建立在非契约的基础上——利润、损失和劳动义务按照家庭和朋友间的松散协定来划分而不像与个人无关的较大的合伙企业。小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权，但没有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它是专一家庭式的。

显然，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生意越做越大，上层小资产阶级就逐渐融入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是相对分散的，因此并不像别的生产方式那样，它不能经常排除别的阶层进入。

第四章讨论了为什么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组织实质上是小型的和分散的。工匠、工人、小贸易商和家庭企业带来了工业革命。小“资本家”与“熟练劳动力”的界限变得模糊，如同非体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通过技工在“中等阶层的阶级”中占优势，将他们融合在一起。然后，第四章和第十五章都讨论了技工的分裂。大多数技工在不太稳定的各个行业中沦为工人阶级，在19世纪中期繁荣的手工行业中，20%的技工也许会在十年内上升为小业主。这种新的小资产阶级成为“非体力的”，从下层“工人”中分离出来，变得更富有、更安全并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Blumin，1989，pp.66—137)。小业主仍然统治着中等群体。“商贩”构成了维克托里安斯所描述的中产阶级的半数以上，在19世纪中期他们的人数正在增长(Booth，1886；

Best, 1979, pp.98—100, 104—106)。

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小资产阶级仅仅是享受中等的财富和地位，不能被接纳进最富者的圈子，但是他们跟资本家合作。1880年后大型公司兴起在德国和美国(英、法、澳大利亚是1900年之后)，甚至最大的企业供应链的两端都产生了小的散工者。私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和合伙企业、承约人以及占优势的临时工人，还有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集中注意力，把他们的家庭财产转移到继承人那里。一些小公司为大公司和占统治地位的消费工业、建筑及公用事业打杂。它们的积蓄被律师、经纪人、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到政府债券和股份上。小资产阶级正幸福地分享着膨胀分散的资金。

它的忠诚有助于打败宪章运动、1848年革命以及此后仍然继续的革命。迈耶(1975)说小资产阶级在1871年之后只有一条路——倒退。正如威纳(1976)所论证的，这种讲法有些夸大。它的成员大部分是保守的，而不是反动的。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他们似乎是自满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成熟”与经济繁荣和大英帝国的优势结合在一起(Tholfsen, 1976)。1832年到1867年间，小资产阶级的选民比率接近多数，以后大约占1/3，但是选举仍然被“传统结构的顺从团体和顺从网络”采取分离的办法组织了很长一段时间(Moore, 1976)。政治消极跟感伤的理想主义走在了一起。小资产阶级起居室里的画面描绘了国内的安详、中世纪和苏格兰高地的浪漫主义以及孩子们的天真。布卢明(1989, pp.138—191)和瑞安(1981)还画了一幅美国国内小资产阶级生活舒适温馨的图画。

然而，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个飞掠而过的黄金时代吗？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了股份有限公司、卡特尔、贸易团体和保护贸易主义。像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阻碍了小资产阶级，这一点通常存在争议(例如，Gellately, 1974和Lash and Urry, 1987，综合了这种文学)。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不如美国和德国那么有组织性。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小资产阶级的零售部门，百货商店对所

有国家的小店主和商人都构成了威胁，而且英国和法国从国际竞争中蒙受的损失更大。 从19世纪80年代起，小资产阶级大概就受到全体资本家的威胁，数量和权力减少，引起了对社会地位恐慌的喧嚷和妄想狂的政治——这是爆炸性的，一般来说是右翼分子，最终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个骚动的阶级派别。

然而，这又证明是神话。 战前的小资产阶级是烦躁而不是激动的。 确实，直到现在还一直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小资产阶级对**经济**表示不满。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国家里，来自奥匈帝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来自德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一些集体行动的政治结构，其狭隘的经济表现倾向于重视实效和公道——是最有组织性的。 例如，当德国法庭裁决保险法律只适应于工人时，中产阶级表示反对，并在1911年制定了自己的保险法(Kocka， 1980， pp.258—259)。 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很少能引起国内政治的骚动；在对进步运动的辩论中，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并不积极。 查普曼(1981， p.236)记录了从1720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小公司之间的小冲突。 大多数问题起源于零售价格的不变，但由于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合作社，小资产阶级便大声抗议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Crossick， 1977， p.17)。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该阶级的分裂在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表现出来。 但即便不满足，小资产阶级也很少退出去形成他自己的政党。

在大公司有更高的效率以前，小资产阶级仍然在衰落吗？ 在经济学家们强调规模经济的半个世纪之后，效率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被提出来。 普瑞斯(1981)并未找到规模经济：大公司吞并小公司，不是因为它们的效率更高，而是因为它们对市场形成了更有权威的权力，也因为有了股票市场的特征。 尼古拉奥夫(1978)对希腊企业的研究发现小的和中等公司是最有效率的；清则(1981)发现比较小的日本公司有的利润很大，有的没有收益。 但现在还未能找到早期关于利润的数据。在历史文献中充斥了小资产阶级的苦恼，但没有利润和损失成本的计算，没有经济下降的证据。 (Gellately， 1974，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小企业的淘汰率是很高的，从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可能一直是这样(Blumin， 1989， p.115)。

小企业严重剥削家庭劳动力。然而，这是很少被经历的剥削。伯陶克斯和伯陶克斯—瓦米(1981)生动地描述了法国面包师傅的生活。面包师傅和他的妻子过着一种几乎从不间断的苦工生活。在每周的六天里，丈夫从凌晨 3—4 点开始烘面包，一直到中午之后，妻子从早上 7 点或 8 点到晚上 8 点在店里卖面包。然而生意就是他们的生命和成就，满足了理想主义者“意义”的眼光，物质主义者讲实际的眼光，即有创造性的自我表示。现代人很少能感受到在工作中自主和满足，然而这些目标仍然是较有价值的。即使利润和工资很低，很多人仍试图进入商业，并且大多数人体验到它是令人满足和辛苦的，等等。这没有产生不满——冗长的工作时间也没有促进阶级组织的产生。

在没有利润数据的情况下，数量常常被用来表明无产阶级化。结论几乎总是一致的：数量下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表明了经济下降和无产阶级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著名预测(在《共产党宣言》中)现已影响了其追随者和同样的评论家。在列出一些相当微弱的证据后，普兰塔斯宣称“小资产阶级的穷人化和无产阶级化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过程”(1975， p.152)。但是即使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也同意，只是补充道，一个新的工薪阶层已经出现去填补这一空缺(Geiger， 1969， pp.92—94)。吉登斯试图做得更精确：

> 这些数字……表明了一个一般的模式，这一模式适应于大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很大的差异：从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是小企业相对减少的模式……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继续下降，但下降的坡度却有了相当的减缓。(1973，pp.177—178)

20 世纪 80 年代增加了对这个正统神话的曲解：合作的有组织的资

本主义时代已经被无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所取代，一些小企业又兴旺起来。拉什和厄里(1987)争论说，合作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减少，然后又增加。

然而，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减少主要限制在制造业和相对的比例，并不是绝对数量上的下降。吉登斯分析了后者，但是他却将相对下降的时间表解释错了。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人口调查确实显示了小制造业的下降。1930年，英国有93 000家机构雇用的人数低于10人；到了1968年，只剩下35 000家。在德国、法国、美国下降的幅度更小。只有意大利和日本避免了下降的命运。到20世纪60年代，雇用人数少于10人的企业在英国仅占制造业的2.1%，在美国占2.4%，在联邦德国占6.2%，在法国占10.8%，在日本占12.2%，在意大利占18.2%(Pryor，1973，p.153；Kiyonari，1981：Prais，1981，pp.10—11，160)。但是总的职业趋势在各国和各个时期都是复杂和不同的。

1911年，英国的人口调查将“雇主”、“小业主”和“雇员”区别开来。前两者象征小资产阶级(尽管第一种也包括少数的大资本家)。在1911年和1931年间，他们净增长了14%，保持了对劳动力准确而相对的分担额。在1931年和1951年间，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减少21%；相对的分担额减少的稍多些。将农业排除在外使之净减少了28%，在采矿和制造业中减少得最多。但是雇主减少在时间上最早，比“小业主”减少得更厉害。后者起初是增长的，1951年的数字是1911年数字的141%，在农业方面增长更大，其次是交通运输、餐饮业和批发商(Routh，1965，p.20)。在1951年和1971年间，这些趋势颠倒了：雇主增加了近50%，几乎回到了1931年的水平(比例上涨25%)，然而小业主的数量略有下降。雇工方面最近的增长发生在大多数生产部门，包括制造业(Routh，1980，pp.6—7，18—20)。总之，绝对数量在1911年之后增长，但对劳动力的相对分担额却轻微下降。

这表明了英国的三种趋势：(1)尽管19世纪中期，小资产阶级上层

(雇主)轻微减少，但这被一个数量增长的家庭小资产阶级(小业主)所平衡。(2)总的趋势可能会掩盖部门间机会的转移。1900年，在建筑业中的机会最大，后来机会转移到别的服务部门。(3)小企业在不好的经济时代发展相对较好。例如在1962—1978年的纺织工业部门，小公司经受困难时期的能力比大公司要好得多，一些公司还获得了较大的利润(Champman，1981，p.241)。目前，在萧条的经济中，小制造业主正再次增长(正如在所有的国家里一样)。

如果较早时期有更充分的职业统计资料的话，那么，这些资料无疑会描绘出小资产阶级数量下降的另一种形式。1911年的人口调查，在经理、管理者、办事员、熟练工、半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中并没有发现小业主——只有3%的体力劳动者和6%的熟练体力劳动者(Routh，1965，p.4—5)。比1911年更早时，散工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在一些熟练技工当中。这几乎可以肯定，引人注目的职业转移影响了小资产阶级，切断了他与体力技工的历史性联系。小资产阶级也变成了贵族(Bechhofer and Elliott，1976)。但是，这与无产阶级化是相反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在1900年左右正在扩大，之后也没有缩小。

这样，英国的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组成部分**变得更加独特，在更加不确定的程度上，从下层和上层都分离出来。到20世纪中期，小企业的相对下降减少了与资本家上升的重叠，尽管这一趋势现在正在倒转。在下层中，散工的较早瓦解大大减少了与工人阶级的重叠，也减少了这两个阶级之间同代内的流动。在这两个障碍之间有一个滞后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减少，加上不断受较大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可能会增加小资产阶级对已确立秩序的忠诚。尽管很多人经历了艰苦的时期，但还有很多人在不同的部门里增加了财富。不平衡的经历可能会阻止集体政治活动的出现。20世纪30年代之后，上层阻碍的加强可能会强化局部的特征——集中体现为家庭组织、家庭和朋友之间非正式的规范协议以及分享对劳动力的剥削。

别的国家发展就不同了，正如拜洛克等人(1968)历史上人口调查汇

编所揭示的那样。它们的种类，“雇工和独立者”和“家庭工人”表明小资产阶级——在单一国家内部比在国与国比较中更加可靠，因为各国人口普查的定义各不相同。我也补充了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史国际委员会(1981)的研究，从而使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和政治情况更加详细。

首先，农业在任何国家里都是重要的。比利时、法国和德国提供了长期的农业数据。尽管经过20世纪农业中总的雇用人数下降了，但是农民业主(“雇工”和“独立者”)下降得最少。到20世纪晚期，农民业主实际上增加了对农业的统治，当时补助金有助于大的农场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60年和1983年间，农场主的数量下降了一半多(超出了本卷涉及范围)。

在别的地区，比利时的数字最早，它揭示了长时期内小资产阶级的相对下降：1846年占非农业劳动力的40%，1880年占30%，1910年占23%，直到1945年才稳定下来，然后到1961年下降到19%。下降发生在大多数部门，但在制造业中下降最大。但是绝对的数量是不同的。因为非农业劳动力在1846年和1910年之间增加了250%以上，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了50%。以后，数量就保持平稳。小企业从重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分离出来，进入消费商品和零售贸易中，其性质转变为补充性的，而不再与大资本竞争了。自治的政治组织表面上是以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出现的，但在比利时分歧严重的多党政治中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率重实效的压力集团(Kurgan，1981，pp.189—223)。

1866—1936年，法国在这方面没有总体的相对或绝对的发展趋向。小资产阶级在相对静止的非农业劳动力的33%和43%之间波动。1954年，相对地大幅度下降到19%，1962年下降到16%。尽管建筑业是上升趋势，但大部分部门下降了。但是当非农业劳动力上升时，绝对数字却保持平稳。尤其是独立技工在法国存在的时间较长。当别的国家转入批量生产时，法国提供了全世界的奢侈品——在路易斯安那的每一个漂亮的种植园里都少不了一架购自巴黎的钢琴(Gaillard，1981，pp. 131—188；Jaeger，1982)。大企业甚至跟小企业的合作生产在

1901—1931 年间也增长了，尽管小的家庭单位略有下降(Bruchey，1981，p.68)。小企业经受衰退的能力较好。与技工的联系确保 19 世纪小资产阶级仍是激进的共和党，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最终转向右倾。小资产阶级下降较晚，且只是相对不稳定的下降。

因为在领土和分类系统上的变化，德国数字是难以解释说明的。从 1882 年到 1936 年，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看起来一直有一个大的绝对增长和小的相对增长。然后，这两种倾向都发生倒转。1946 年劳动力的膨胀轻微的绝对增长才开始。这两种状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服务业增长一半多，制造业下降，建筑业和交通业保持平稳。考夫霍尔德(1981，pp.273—298)记录了独立的制造业工匠到 1900 年之前才发生瓦解。这种突然的瓦解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剩余的小资产阶级转向极右(Haupt，1981，pp.247—272)。但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当然也在增长，只是当他们据称支持的纳粹掌权时才下降了。

清则(1981，pp.961—989)表明，在 20 世纪日本的小企业在绝对职业中大量增长，在相对职业中略微增长。但是，是经济繁荣而不是暴跌，增加了它的份额。小企业既包括更多的受赤字影响的企业，又包括非常多的盈利企业。小企业充分参加了全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最近的阶段把共生的参与看作是集成工业、高技术改革和劳动密集型服务扩张的转包商。我找不到一种政治，这是自主的人数仍然较少而不满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

美国的人口调查并不承认像这样的瓦解，但是布吕什概括了美国的研究(1981，pp.995—1035)。技工的瓦解，小制造业的下降，小服务业的回弹——所有这些都和其他地方一样发生了。大小制造业的增长在 1870—1900 年经济膨胀期间，折射出日本的模式；但是在 1954 年的繁荣之后，当数量下降时，又转向法国模式。在银行方面，小企业更重要，这是美国极为明显的特色，是联邦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

尽管各国有其特殊性，我们还是看到了三种一般倾向：

1.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小资产阶级只是在相对比例上下降，而不是绝对数量上下降。

2. 最大幅度的相对下降发生在20世纪中期而不是之前，这在吉登斯的时间表和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定义中已经有所表明。当然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的极端主义之后，在中产阶级政治的法西斯主义阶段发生的。因此，小资产阶级经济的显著下降(正如数字所计量的)不可能一直都是这种混乱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1]

3. 相对或绝对下降，不平衡分布，导致了部门之间的流动。

这些趋势暴露出想象的小资产阶级的下降，经济的绝望和因此而产生的神话般的地位恐慌论。另外，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跨国经济；所以这一阶段巨大的经济增长，使所有的阶级都得到提高。虽有一些衰退和混乱；但是总的繁荣趋势却发展得很快，包括小资产阶级。尽管不再具有最主要的优势，但在绝对数量上仍然在增长。在大多数国家里，它被推到了制造业的边缘，不包括新旧殖民化的服务业。回到第四章的一个论点：英国的工业企业在一战前保持小的规模，是因为行业间的特殊行为不适合合作。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反对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垄断和权威组织的成见。同样的成就夸大了小资产阶级的衰落。

小资产阶级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或者遵循1870—1900年间的日本和美国模式(1945年之后的意大利模式；Weiss，1988)——小企业完全参与增长，找到新的可获利的产品和服务行业；或者遵循法国和更标准的欧洲模式——小企业能更好地经受衰退、增加劳动剥削和忽略利润。伯杰(1981)把这一点看作大资本和小资本正常的共生。在生产的产品需要简单技术和密集劳动力的地方，或者在需求不稳定的地方，大企业就将其承包给偏僻的街道企业，它们采用较低的工资和不统一的劳动。这些是对市场时机的反应，实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混乱而不是有权威的组织。

大小资本的共生比冲突更加普遍。去掉**中产阶级**政治和农民(在第

十九章被讨论)，小资产阶级没有促成有特色的反对大资本的激进经济行为。 它专注于资本主义和政体，因为它在经济上部分地依靠它们。它的忠诚引起了妥协，或是为了建立反对工人的支持而设计的运动，如战后意大利的情形(见 Weiss， 1988)，或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更出于本能的宣言，如美国的反托拉斯立法或撒切尔主义的政治。

当技工消失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很早就出现了。 除技工外，小资产阶级并没有无产阶级化，而是部分参加了资本运作。 当家庭与工作紧密结合时，小资产阶级的经验是明显的，但是它的经济权力依赖资本，并且在这种依赖中能做得相当好。 其保守主义并不是起源于像 C. 赖特 · 米尔(1953)或普兰塔斯(1975)所说的地位恐慌、意识形态或任何别的半妄想狂的心理作用模式。 不是失败而是适度的成功和全力以赴的努力地工作，确保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忠诚。 与老一套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在该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中并没有过多地表述小资产阶级。

流动职业者

流动职业者是指在资本家的公司和现代国家官僚政治的统治集团中被雇用并可以流动的人员。 1914 年以前，这两个等级制组织之间的差异有时是重要的，但它们更深地植根于政体政治而不是雇佣关系。 统治集团是分等级、守纪律和部门化的，其内部的封锁政策把流动职业者和别的派别或阶级区别开来。 封锁政策既是牢笼又是机会：**牢笼**是因为它使雇员从集体行动中孤立出来，并且允许资本和政体从侧翼包围流动职业者，**机会**是因为它允许职业向统治集团上层移动(大体上是向下)(参阅 Abercrombie and Urry， 1983， p. 121)。 流动职业者包括白领工人、经理、公务员、售货员、较高层次的技术人员和一些同类人员。他们有周薪或月薪，而不是按小时支付工资，在体力工人中按小时支付报酬是正常的；而且一些工作体现出明显的集体一致性(店员在服装、佩带饰物和生活风格方面经常是相似的)。 但是，全部的生存机会与其

说是由目前的工作所决定，不如说是由获得一项**职业**来决定。

达伦多夫坚持认为社团和官僚的职业定义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一个“天生分裂的阶级”。他得出结论(我就不这样认为)认为中产阶级的两个主要部分处于两个不同的阶级中，即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

> 在属于官僚阶级组织的一部分有薪雇员和不处于这种位置的有薪雇员之间能划出一条相当清楚的重要界限。邮局职员和会计，当然还有较高的行政人员，这样一些职业都是攀上统治地位的阶梯：女售货员这样的职业却不是……统治阶级的理论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官僚政治的社会职位，而工人阶级的理论同样地适用于白领工人的社会职位。(1959，p.55)

这种陈述包含的内容既有道理又有些奇怪。尽管女售货员的工作与工人阶级的工作可能是相似的，但为什么那些有职业的人被认为是“统治阶级”呢？这样称呼邮政职员看起来是奇怪的(并且达伦多夫后来在 1969 年修改了他的观点)。像在邮局里，那种高等形式化的等级制度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大多数店员只是在这些部分的最底层移动的。他们被更多地看作是非体力钢铁工人的变体，在体力劳动市场的内部向上爬，很少获得很高的地位。钢铁工人仍然是钢铁工人，邮政职员也仍然是职员，不是经理，当然也不会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了。实际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不太官僚化的机构中，获得职业的机会经常是最大的。这又因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依仗权势而组织起来的。

职业雇用是近来出现的。在农业社会中，除了在一些教会和军队之外，统治集团集中控制他的人员的现象是很少见的。第十三章表明早期的现代国家并不是官僚主义的。这两次工业革命仅仅引起了缓慢的职业发展。英国 1851 年的人口调查，计算在薪金职业中被雇用的人员占人口的 1%至 2%，主要是在铁路和邮局中，其次是在商业和财政

业中。1870年之后，在整个西方，商业店员、旅行者、会计、银行和保险公司工人是增长最快的种类。制造业和公共事业仍然没有提供管理性的职业。到1911年，办公室和管理方面的雇员构成了英国劳动力的7%，主要是在交通和商业中。贝劳克估计在比利时占9%，在法国占12%，在德国占13%，但是差异可能会起源于不同的分类系统。在各个地方的薪金职业中，4/5的人是男性，就是这个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我将分别介绍办事员、售货员和经理的职业。

1. 国家、商业和公司产生了**职员**。工作和顾客的关系通过聚集、储存和回顾过去、整理现在活动的书面措施而常规化。这就需要能读会写的基本技能，这种技能最初是相当欠缺的(Perkin，1962)。起初，文字工作的任务没有跟更高层次的需要经验的任务分离。到19世纪中叶为止，在商业工业和行政机构中从店员(和售货员)到经理的位置的晋级是经常的，并且比体力工人向上爬的幅度更大(Blumin，1989，pp.120—121)。但是随着进一步的程序化，仅仅文字工作与别的技能分离开来。男孩女孩所受的大量中产阶级教育使过度的需求饱和。单身女人成为一支“后备大军”，但文字工作不再被男人们认为是可以提升的理由。因此，办事员的工作就退化了，而且在一些部门比另一些部门更厉害：1909年，46%的保险公司男性职员每年获得160镑(收入税降低到最低额)，相比之下，铁路职员每年只有10镑(Klingender，1935，p.20)。

2. 消费者商品和服务的扩散，使销售人员扩大，他们需要具备的是文字技能和“高尚的品格”，因为大多数的消费者是中产阶级。再者暂时的需求过剩让位于同样的三种压力。在同一时期，教育和女人施加了同样降低了的压力。在销售量大、收益低和例行业务的地方，最显著的是在大商店里，对工作的技术需要也就减少了。在销售影响企业财富的地方，仍保留着较高的业务往来，并且保留了销售职业。

3. 复杂的合作组织产生了**经理**，这些经理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具有处理各种不同信息的经验和文字工作能力。一些信息是在工作中学到

的，但是其他技能则是通过现代高等和中等教育培植起来的，这些技能有的是技术性的，有的是从无法记忆的大量现象中寻找联系。教育机构中的分层(后面将作讨论)对经理的造就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通过有差别的教育资格所层化的多水平的新成员，提高了工薪阶层中的职业分化。1900年，办事员及售货员的工作和管理之间的鸿沟，以及在行政机构中的“机械的”与“智力的”等级之间的鸿沟都在进一步扩大(正如第十三章指出的)。

结合了这三种位置的大组织在1900年出现在各个部门。办事员、售货员和别的正面化职业从经理的同等级职业中分离出来。在国家管理并有稳定产品市场的工业中，受过独特教育和培训的人进入了离得很近的职业统治集团。面向中产阶级顾客的组织中，中产阶级的雇员较受欢迎。在市场不稳定的行业，尤其是在金融业和商业中，有更多的职业。当教育和性别关系的变化加强了大组织的增长以及金融和商业领域职业机会的增长时，有薪水的中产阶级发生了分裂。独特的流动职业者和“较低的中产阶级”——有无产阶级化的工作和集体行动的潜力——刚好在1900年之后分离。

因此，白领工作在20世纪变得无产阶级化。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即有正式职位者是否也无产阶级化了？阶级行动可能来自这一社会学问题。要记住所有的薪金职业都在扩大。从1911年到1971年，在英国非体力雇员在绝对数量上几乎增长了4倍，在对劳动力的相对份额中增长了3倍。经理的膨胀率几乎与办事员和销售工人的膨胀率一样大(Routh，1980，pp.6—7)。由于总的流动机会上升，也许在他们自己的工作生活中，相比父辈母辈而言，没有人失业。

斯图尔特和其合作者从他们对1920年以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数据分析中得出结论：“个人团体或雇员类型实际上并没有被无产阶级化。”(1980，p.194)正在扩大的办事员和销售职业分化成三种。第一类是最低等的工作——很少有人从事的一个职业——由体力工人和从劳工以外新吸收来的妇女(随着妇女受教育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增长)所担

任。 仅仅通过分析性别关系(超出我此处所写范围)，我们就可以估出这一点对社会层化的真正意义，但是它并未向下流动，或在客观上经历无产阶级化。 第二类别的大部分重要性降低的工作，尤其是在制造业中，由受雇用的以前从事体力劳动的年纪较大的男人所担任，这些前体力劳动者移入不太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中(也许是由于衰弱的健康)——又一次没有无产阶级化。 第三类是真正的职业，它留给了那些低水平的办事员和在售货员位置上的年轻男人。 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在 1970 年与 1920 年是一样的。 目前的工作头衔像店主或销售助理，并不能表示一个清楚而不含混的阶级位置。 最大群体的占据者女人们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性别而非职业，而且较年轻的男人们仍是中产阶级的流动职业者。 由于职业、教育和性别关系紧密结合，办事员和销售的重要性降低并没有使人们无产阶级化。

这些发现适应于 1920 年以来的时期。 一些英国作者论证了无产阶级化发生的时间更早。 然而，他们的证据是微弱的，大部分是一些年轻店员的零星抱怨，诸如“以这样可怜而微弱的薪金或津贴，一个人怎能生活和养活一个妻子，同时又穿得体面呢？”(被 Price 引用；1977，p.98；参阅 Lockwood， 1958， pp.62—63； Crossick， 1977， pp.20—26)。 对一个年轻男人来说，以他那最初的薪水来养活没有工作的妻子及孩子永远都是艰难的。 店员长期依靠他每年的利润和晋升来维持生计。 在英国没有证据表明，一战前年轻男人无产阶级化；在美国则有证据表明，这些年轻的男人并没有无产阶级化(Blumin， 1989， pp.267—275，291—292)。 这儿还有一些来自几个国家的证据(Crew， 1973， 1979)，在这些国家里实际并没有从非体力职业到体力职业的向下流动。 然而，一战确实对穷人进行了再分配，它的负担主要落在薪金较少者身上；在德国魏玛时期，后来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恶化了这种情况。 像这种相对的恶化，可能会影响中产阶级转向极右派和纳粹党(Blackbourn， 1977； Kocka， 1980， pp.28—29)。 但是，在法西斯主义统治前后和在别的国家，白领阶层没受什么苦。

我们研究人员不容易在专业和流动职业间就位。我们很多人并不喜欢流动职业者，并清楚的感到他们蒙受的痛苦。历史学家经常描绘19世纪晚期流动职业中不吸引人的个性和神经官能症，他们大概是“传统的”较低的中等阶级价值系统的发明者。据说是在残酷环境中对失败和夸大了的个人野心的绝望恐惧，孤立了市郊的中产阶级。外表的特征，如干净和礼貌，经受的压抑、沉闷孤独和挫败受到极大的关注。这种让人印象深刻的神经官能症的分类是由克罗西克(1977，p.27)从这个群体中的个人自传中得出来的。也许专业学者们也大部分来自于这个阶级(自从战后大学大规模扩招以来)，他们共同憎恶这样的出身。白领文化被认为是病态的，只有转向精神压抑的社会苦难可以解释，厌恶使含义模糊不清，正如克罗西克在书中引用的一个同时代的人的话：

> 较低的中产阶级受到了挫败，并且是孤独的。尤其是在其自传中，有自我强加的隔离和孤独感。“这儿有真正的家庭生活，”马斯特曼写道，“家庭强烈的爱、小的花园和装饰的别墅以及对孩子们的希望”。(1977，p.27)

挫败和孤独感或强烈的家庭的爱——究竟哪一个是呢？

流动职业者是很容易被哄骗的。职业将经理、官僚融入到部分的等级制度中。对等级制度的尊重是职业提升的条件。除了家庭以外，个人最依赖的也可能是组织。从《小人物的日记》(1892，1965)里的克罗西克到在《政治者》(1956)中的怀特，作者们都取笑流动职业者的顺从、整洁和干净，对上级的紧张及适当的尊重，以及对上层社会生活风格和价值的模仿，这使他们有些略微古怪的行为。在这种担忧中，缺乏男子汉气概从而长期是男性的职业尤其受人嘲笑。但是，这并不是病态的。流动职业者要获得权力主要是靠进入由他们的上级所决定的有组织的等级制度中。他们的“眷属们”依靠这一点。他们的世界观受到他们所能领会到的统治集团的水平以及进一步设想到的人物(也可

能会感觉错了)的影响。 他们一直是资本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忠诚守纪的下级。 他们将来似乎也是如此。

因此(和其他许多别的人一样)，我拒绝接受由伯利和米恩斯(1932)、伯纳姆(1942)、钱德勒(1977)和加尔布雷思(1985)所提出的“经理革命”的观点。 他们都认为：公司经理已经成为一个独特阶级，经常反对控股的资本家，改变企业目标——长期的公司增长最大化(因为薪水依靠这一点)，代替了短期的企业家利润。 但是研究表明，公司的成就和目标由企业家控制和由经理控制并没有什么大差异，而且经理不会支持控股者所反对的利益(Nichols， 1969； Scott， 1979)。 该证据的收集是在新近一系列的企业合并、资产倒卖、废除契约等高潮到来之前完成的，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公司是资产阶级的。 赖特甚至使用了“资本经理重组”的概念更好地描绘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极限”。 正如斯科特说的：

> 由于他们在大企业上的位置，公司经理负责处理计算表格和货币账户，利润和增长的标准……这些都是资本生产所需要的……企业被市场客观的约束所包围，客观的市场约束用来保持企业与资本家的理性方法相一致。(1982，p.129)

流动职业者直接依赖公司权威的等级制度，而后者则依靠分散的商品市场。 被认为与所有有效而弥散的权力混合在一起，它是作为理性本身而不是约束而被体验的。 流动职业者的忠诚是理性而真诚的。 资本主义尤其是为它自身而运作。 由合作的资本主义和官僚政治国家所提供的经济扩展和稳定已经在职业发展中反映了出来。 作为个人，一些流动职业者获得成功，而另一些则失败了。 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成了为维持 20 世纪经济发展负有责任的组织成员。

我的大部分论据是从英国经验中摘选的。 但在流动职业者之间，而且确实在这些被讨论国家的低级白领工人之间不存在什么经济上的差

异。科克(1980)对美国白领工人与德、英、法白领工人的比较揭示了在阶级组织方面国与国的差异，但他把这些或者归结于不同的政体，或者归结于不同的民族的工人阶级(第十八章也把这一点大体上归结于政治权力关系)。在民族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从经济的差异中暴露出什么来。在整个西方，流动职业者经历了一个成功而乐观的社会环境(正如布卢明对19世纪所强调的)。他们的价值已经统治了我们的时代。个人流动和成就价值的统治并不是由他们原先的企业形式而是作为有组织的职业来实现的。流动职业者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作为个人(不像小企业家那样，他们已经促成了工业革命)，而是在更广泛的部门权力组织中作为一个忠诚的下级而存在。

专业人员

专业的唯一性并不容易与普遍的阶级理论相适应。“专门职业”一词经常被各种职业用来要求获得特权。定义不能同时既适合医生、军官、建筑估算师、图书管理员和护士，又适合不同的国家。但是作为理想的类型，专业就是“有学问”(包括技术上和文化上有价值的知识)的职业，它需要特殊的教育，并且在国家和职业组织之间的谈判结束之后，颁发其业务执照。我根据约束进入和控制业务的执照等级来区分专业权力的等级，这种执照等级实际上由该专业所控制。因此专业权力实质上是官方的和特殊的，它将大多数专业人员从大部分流动职业者中鲜明的区分开来——戈德索普(1982)、阿伯克龙比和厄里(1983)把他们归入单一的“服务阶级”。

我借用了强调权力而不是功能的专业社会学家的观点(Freidson，1970；Johson，1972；Rueschemeyer，1973)。而且，我还接受了一个实用主义者的论点：专业部分地依靠社会上有价值的相关知识，对于这些知识永远不可能是纯科学和纯客观的，因为社会权力影响了对权力的分类。在西方，因为有组织的教会权力的影响，关于终极意义的知识仅仅需要教士的职业；关于生病和健康知识已经主要受到医生权力的影

响；为什么需要得到“精华的”普遍教育和狭隘的技术技能的教育，其答案也是模棱两可的。构建在文化基础上又行使部分职能的这种知识分类形成了我进行分析的背景，并给予专业人员提高了的证件。

现代社会产生了专门知识，这使它的实施者能潜在地发展专业权力。他们是否这样做，要依靠其消费者的能力，看他们能否靠权力组织起对这些知识的供应。主要有三种消费者：资本家企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政府。前两者组织(见第四章)19世纪的政府是软弱的(见第十四章)。没有人能控制从他们自己的需要中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当职业在官方权力的缝隙中组织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专门职业。但是，专业机会在20世纪早期减少了，因为资本主义公司和国家官僚政治使官方的权力增长。战后，最强的自立专业特别是医学，为分散的个人和家人(不管属于什么阶级)服务，而较弱的“半专业”是为公司和国家服务。然而，这种官方权力的平衡只是解释了个别专业的权力。为了达到中产阶级专业的普遍位置，我补充了更加弥散的权力网络。

“专业”原先指人，他们把宣讲基督的信仰作为生活的使命。到1700年，它已经扩大到教会、法律、医学和军事这四个组织。这些专业成为(1)有学问的；(2)有技术的；(3)带有团队精神的(在医学中最弱)；(4)讲授服务于调解社会的道德；(5)服务于国家(对大多数圣职人员来说最弱)。第十二章讨论了在国家内部作为独特阶层的军官是如何进一步变的专业化。然后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了其他职业，同样具有以上特征。

当资本主义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时，它的技术基础扩大了。对机器与工厂的固定的投资以及对劳动的技术需求都随之增长。技工和做散工的工程师与企业家一起领导了早期的工业革命。他们的行会和熟练的工人组织(在第十五章中进行了讨论)现在分裂了。那些技能无论怎样提高，都集中在资本家企业生产的过程中，在企业内部受到控制和学习的人仅仅变成了工匠。而那些技能影响企业组织，太通才化，在企业内部不能进行有效学习的人，大部分可能获得专业自主。现在大部

分工业都与科学相通并进行了合作——如从含磷量低的矿石中制造钢，或者用电来收发电报。其他是技术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如建筑物和装有沉重震动机器的车辆都需要建筑学和测量学上的改进。因商业财政变得复杂，而产生了会计，由于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产生了商业律师。企业仍然是小型的，这些服务还不是企业活动的重点。

知识的消费者和供应者都求助于政府来给有竞争力的专家整体发放许可证书。正如第十一章证明的，政府是热心的，因为他们能从颁发许可证书中得到收入。在英国，发许可证的高潮从 1818 年(军事工程师)经过 1848 年(建筑师)和 1865 年(测量师)一直持续到 1880 年(会计师)，并在此过程中吸收了内燃机工程师、电机工程师、市政工程师和化学家。所有分享进入管理权的专家团体都与国家的(和私立的)教育机构进行谈判，他们现在仍然这么做。

正在出现的股份有限公司于是扩大了对雇用的全体专家工作业务的权威控制，这些专家服务于"职业"管理(比它起先军队里的表现具有更鲜明的特征)。这些成员从专业中半路退出来转向职业。1900 年，会计受公司领导，首先受公司内部领导，然后以公司审核的方式向合股公司的外部风险持股者报账。在 20 世纪，很多专业公司本身变成了大的股份有限公司。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大的会计公司正在审核主要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账簿，与"公司百万律师"的出现相平衡(Galanter，1983)。会计师和律师所保留的专业自主可能起源于对分散的小商业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服务。但是在与商业和政府联系的专业中，专业人员的任务(尽管不是最初的进入权)并不能从公司的业务和官僚的流动职业者的任务中明显区别出来。

各国都发展了各自的专业业务。革命的美国对专业垄断和较弱的国家管理的强烈抵制与早期的经济集中结合起来，用以提高管理专业人员的公司权力。在别的地方，后来的工业化带来了更大的公司和更强有力的国家管理，这两者都减少了专业的教育自主。德国和法国的专业人员资格在与优秀的国家教育和行政部门职业的结合中开始变得更为

重要——在法国是与高等的院校结合；而在德国，国家甚至对受过大学教育者和公司人员(通过“专业官僚”的观念)更有权威性。然而，这些都是在一个主体上的变化：专业权力在早期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组织的夹缝仍然有用，但是，后来就变得更服从于日渐增长的官方权力。

医疗专业的权力并没有下降。在18世纪以前，外科医生、内科医生、药剂师、杂货商、面包师、乡村神父、有学问的人和乡村男女贤人都从事诊断和治疗。然后随着科学和培训的发展，地方医疗团体的出现，接着合并，使规则标准化。城市密集传播的疾病威胁了所有的阶层。阶级利益、慈善团体以及在科学进步中产生的启蒙和功利的信仰都要求得到国家的特许。在1855年，伍斯特医药和外科协会成为英国医学学会。1858年立法把所有有执照的公司都放在已成为协会的总理事会领导下，汇编了一本有资格的医生执业者的登记册。这个被国家准许的团体对于“谁是医生”下了个定义：“医生就是由主权国家的法律授予达到一定权利特权和职责的人，在该国司法权的范围内不能授予他人”(Mackenzie, 1979, p.55)。弗赖德森嘲讽地评论：“专业最有策略、最宝贵的特征——它的自主权——因此被归于主权国家，从这一点，它最终是不能自主的”(1975, pp.23—24)。

但是，弗赖德森用文件证明的，官方权力对医学专业的统治是失败的。当消费者和国家都倾向于认为官方权力无效时，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医学专业都控制了自己颁发执照证书的权力。尽管激进主义者争论说消费者能够控制自己的保健事业——医疗权力的产物比实际所需多得多(Illich, 1977)，但是一个高技术的健康医疗模式却统治了保健事业，并证明消费者不能对健康事业作出评价，因为医学对过去150年大众健康改善的贡献不如在饮食、工资、住房和环境方面的贡献大(Mckeown, 1976；Hart, 1985)。医疗模式在制度化的同时也获得了专业权力。在整个19世纪，医学权力都在增长。以前只是为上层家庭看病的医生，现在为不知名的郊区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服务。病人不再集中传播疾病，医生也能以技术和专业术语为他们的服务下定

义(Waddington，1977)。古德(1969)也观察到医生——和别的自主的专业人员像精神分析家、神职人员、律师和大学老师一样——强行进入了私人领域。当事人对不健康、疯狂、死亡、犯罪、应得惩罚和智力评估等的恐惧，使他们陷入难以与别人分担的忧虑和脆弱中。当事人厌恶组织，因此他们拖延。对个人隐私的需要保证了专业人员的权力。当处理分散的当事人时，专业权力便能更好地幸存下来。

政府也失去了对颁发执照的控制。正如第十四章所强调的，19世纪的国家很少插手国内社会的习俗，没有公民压力，英国政府便几乎无所事事。而这种压力是针对中立的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干预管理——对穷人的管理除外。政府缺少检查专业的专家知识，而且它的一些专家本身也是专业医务人员。枢密院要监督1858年执照的发放情况，但是在一阵关于公众健康利益的最初兴奋之后，它的医学职位被专业所控制，专业现在能使更高的教育、市政保健和新《济贫法》深入人心。《济贫法》医院开辟了20世纪“英雄般的外科手术”。像这样的专业权力在国民保健制度创立之后仍保留了下来。

对业务和(更少程度上)对资格的医学权力，现在在西方世界中是统一标准的，与很多阶级理论所强调的正式职业关系相反。无论是被国家、资本家保险企业雇用或作为合伙人、个体业主，医生都是杰出的专家。他们的技能，最初是为资产阶级家庭服务，到20世纪就为所有的公民服务。公民和国家都不能对他们实行权威的控制。也许最大的审查现在正出现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保险公司拥有更大的权力。

国家在对待更多的即将专业化的人员时权力更大。在第十四章中描述的国家功能的增长——在20世纪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新的专业知识。19世纪晚期出现的第一个大的群体是学校教师，他们的政治重要性在后来变得更清楚。在他们之后，大约1900年出现了一些其他有学问的职业——社会作者、图书管理员、城市规划者等等——他们有较低的权力，经常被称作“半专业”人员。政府经常是一个垄断的雇用者，更直接的控制了服务的供应。在20世纪，半专业出现了女性化趋

势。在大部分半专业工作中，女性现在占大多数，并且妇女在社会上的权力更少。半专业人员使得职业和较低的白领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但是，较高专业的直接的“生产关系”不同于别的阶级和阶级集团，并且他们比小资产阶级或官僚这样的流动职业者的职业更加远离资本主义。他们不能很好地适应马克思主义者的分类系统，比如赖特的分类系统。但是专业人员也卷入了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分散的组织。考虑到这些，我们就能把这三个部分中分散的权力看成一个整体。

1. 专业人员收费，部分由专业人员决定(也许是与政府、保险公司等谈判)，部分由分散的市场力决定。比起流动职业者，他们更少受以向上为中心的部门雇用组织的约束。所收的费用能使他们大多数人在中产阶级上层范围内生活通婚并购买特权消费品。近来公司与专业人员就专业服务订立契约的倾向，为专业人员的收费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2. 专业的进入受到资本主民族国家的两个弥散特征的影响：这两个特征是有活力的教育和培训要求，还有(不是很普遍)资助没有报酬的师徒和专业合伙人资金。这些条件限制使得初入行者只能是来自相对特权家庭的人，高等教育使得专业人员能参加到精英文化中。不过，对教育的依靠也许会把他们从真正的资本家阶级中分离出来。正如帕金(1979, pp.54—73)观察到的，大部分资本家的财产被他们的儿女直接继承，而大多数教育证书的继承却是不直接不完善的。教育把专业人员的子女推入有竞争的流动性中，同别的中产阶级的子女竞争。然而，作为成年人，教育使他们置于更高的社会群体中。这些差异就减少了形成单一的资本家——专业阶级的可能性。

3.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事人影响了专业人员。当事人的要求来源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家庭与商业，主要来自于对半专业化和对医学的期望(普遍的健康保健事业的进入是由政府和保险计划提供的)。专业人员为他们的当事人提供了阶级服务。正如凯恩观察到的英国律师：

> 当事人是一些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机构(法人)和中产阶级分子[因此律师是]概念上的思想主义者……他们认为并因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重要关系……以及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式。(1983，pp.111—112)

律师分散地参加了资本的循环。

4. 分散也影响了专业组织。他们有的为国家或企业工作，有的操纵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在那些企业中，费用按照企业来划分，它们是一些垄断固定价格的公司)。准资本主义企业或准国家部门部分的行使专业权力。

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就这样对专业施加了分散的约束，它的直接的“生产过程”不同程度地有自主权。因此，就政治经济而言，专业人员一般是资本的忠实盟友。在再分配上，他们的利益与财富、安全、工作管理和较好的教育联在一起。在财产所有权上，他们反对集体控制。确实，在关于人道主义和道德问题上，他们经常是自由的，部分是由于优异的教育，在20世纪变得更加自由。在这些方面，半专业人员是更加自主的。他们的顾客更多了，在公民需要和社会控制之间，他们的专业角色经常受到干扰。他们依赖的教育，是一种普遍而非保护特权的教育；他们很少依赖财富和公司组织，他们的收入一般来说是比较低的，尽管生活非常舒适。妇女占很大比例。因此，一些半专业人员在20世纪温和地开展了激进的政治运动。

单一阶级的三个阶层

单一阶级的三个阶层都有不同的生产关系。正如在一些生产主义的理论中，如按照划分阶级位置的唯一标准，这将会产生三个分离的阶级。但是他们也都部分参与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那我就从资本主

义开始谈起。

1. 这三个阶层参与了经济等级制度。达伦多夫认为这就支持了一个分解的理论。在小资产阶级中从投资顾问到做散工的建筑工人，在专业人员中，从外科医生到小学老师，在流动职业者中，从市场管理到售货员——不同位置间的差别很大。然而这将中产阶级合成一个矛盾的整体。对流动职业者来说，这是明显的。“预期的社会化”确保了等级制度是各等级之间的共识。在小资产阶级中产生的抱负也合而为一，大部分小商店变得更大，使它的顾客升级，发展了与更大的商业或更富有的消费者的共生关系。专业等级制度包括获得合伙关系和荣誉。所有这三个结构在整个中产阶级中向上流动。阻塞可能会使以前的流动职业者与温和激进的半专业者合并，但是等级间的流动性也把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捆绑到受纪律的对上忠诚上。

2. 中产阶级的消费不同(正如新韦伯派指出的)19 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参加了消费经济，购买了多种多样的食物和衣服，购买或更安全地租赁单独的住所，雇用女仆。家庭中的男成员在财产特权下通常有资格投票选举。利用更广泛的公民权，他们可能会控制当地郊区的政治。雇用另一个劳动力的能力就是一个重要的阶级标志。在 1851 年的纽约，60%的“小店主、较低的专业人员、农场主等”雇用至少一个仆人，相对熟练而实际非半熟练或根本不熟练工人的比例只有 10%(Armstrong，1966， pp.234， 272—273)。我祖母对 1901 年的说法是：一个经营小型园艺业的男人，他没有工作的妻子要付给睡在厨房里的女孩“两先令六便士”的周薪(大约是一只鸡的价格)。

后来，中产阶级的独特消费被改变并最终下降了。累进的所得税和一战使国内服务减少。群众也逐渐被允许进入安全的多种多样的消费经济中。在除了一个特征(雇用仆人)之外的所有特征中，工人阶级的消费倾向于反映前十年或二十年中产阶级的消费。工人获得品种繁多的食品、衣服、安全的住所，住在郊区，汽车、保险抵押——甚至包括致癌物质——已经与中产阶级联在一起了。

3. 这三个阶层都把收入转变成小的投资资本。 在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繁荣中出现了这种情况(见第四章)。 在自己的小商业上投资对小资产阶级来说是必要的，有很多专业人员都购买了一项合伙企业或业务。 流动职业者在他们的公司中得到股票，并可在咨询和投资中使用个人的专业知识。 大多数人都能传给子女一部分资本。 在英国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早期，中产阶级的婚姻不同于工人阶级的婚姻，因为前者的父母能帮助购买房子，而后者的父母却办不到(Bell， 1969)。经过20世纪中期，占优势的中产阶级储蓄与职业抚恤金计划、保险和抵押等互相使用。 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欧洲更晚一些，这种投资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从工人阶级的家庭中分离出来。 他们的储蓄债款和生活计划(住房、职业、退休)进入到资本循环的中心，并从资本主义的繁荣中获益。 工人们没有积蓄，而且他们还经常向一些亚文化的赊买者(放债者)或当铺借款。 中产阶级的积蓄与极富者的财产在形式上是相同的。

因此，无论他们的特殊性和内部的多样性是什么，中产阶级的三个阶层在部门的等级中共同分享了资本主义：阶级消费标志以及将过剩的收入转成投资资本。 1900年，中产阶级正在到处扩大、繁荣和参与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的模式。 正如关于两者的德国名词：中产**阶层**、**团体**所揭示的，平民社会**是**中产阶级的社会。 但是，这个社会也被意识形态与政治公民权相缠绕并部分定义。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公民权

前几章论述了出现在19世纪的“国家”是以现代化的旧政体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各个联盟为中心的，现代化者主要是一些自由的公务员和专业人员。 很多国家组织都接触过产生于意识形态的公民权的话语能力网络。 现在新的阶级需要政治上的公民权和意识形态上的公民

权，这主要是由国家资助或国家管理的教育，有助于将民族和国家合并成一个民族国家。[2]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产阶级的财富越来越依赖正式的教育。而小资产阶级却依赖的最少，但另外两个阶层无论与资本家还是与工人阶级相比都更多地依赖教育，尤其在一战以前。国家教育的扩展部分属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政府工作所需要的一项职能，正如前几章描述的。但是它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对政府控制的要求和附属阶级对意识形态公民权的需求——揭示了阶级和国家的具体形态。经常作为中产阶级生活中心的“文凭主义”本身也是由这些所定型的。

在教育上的阶级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欧洲存在学校的三级分化(虽然美国除外)。由于教育几乎是普遍收费的，所以财富也按层次排列。最低水平的初等教育学校一般不是为中等学校做准备。它包括下层阶级全部的教育经验。中等教育然后分成了低级的“现代学校”和高级的“传统”学校，后者控制了大学的入学。德国大部分学校由国家控制。政府开办了传统的高级中学和现代的实科中学和职业中学，并设置了大学入学的资格必要条件(一般来自前者)和进入行政部门、专业的必要条件，法国政府控制了传统的公立学校、学院以及“专业的”——从1891年开始称为“现代的”——学校和他们所授予的不同资格证明。在整个欧洲，大学预科是典型的传统学校：对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的学习在1890年占了大学预科学习时间的77%。在英国大部分学校是私立的，但是在1902年后，国家控制增多了。三个独立的皇家委员会体现了英国的“三方面主义”。克拉伦登委员会(1861年)评估的是培养国家领导人的九所大的公立(意即私立的)学校。汤顿委员会(1864年)评估的是为“由包括最高层和最低层之间的人组成的英国社会的那些大阶级”所开办的学校。纽卡斯尔委员会(1858年)则是审查为“劳动阶级”的11岁以下子女开办的收费低廉的学校。

因为美国缺乏文化贵族和专业，也缺乏大的行政机构，所以它的公共教育是落后的。直到20世纪末，层化还没有波及到学校或大学，只

在很高层次上有所体现。甚至当大批学校出现时，阶级分离仍然受到学校问题上的政党民主政治化所限制。大部分学校是由当地政府办的，地方政府在美国联邦政体三个等级中是最民主的。南部的例外——只为白人办的有效率的学校——则保留了下来。

在这个时期，中产阶级已成为完全的或几乎完全的政治公民。这主要是教育扩展的结果，它使得中产阶级家庭能分享国家的文化生活，并把他们与工人和下层农民区别开来。教育一开始就包括女孩和男孩。在 19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1913 年之间，国家资助的初等教育和现代中等教育扩大了两至五倍，西方国家的大学生数量扩大了三倍。但是欧洲的扩大仍然是分开的。英国的男孩子大多在私立小学中所学的不过是“读一小段报纸上的普通文章，从听写中写一篇相似的散文，练习计算包裹单上的款数”。人们认为这是必要的，它能使男孩获得店员的资格，能参加国家的文化生活。只有少数工人子女能上这种学校，并非所有工人子女都能读会写。后来 1870 年和 1902 年之间的一系列教育法使国家的初等教育扩大，这使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子女出现了分层。工人的子女学的守纪律、诚实、清洁的内容和文化课内容一样多，而且他们的教育一般不是为中等教育做准备。中产阶级的子女包括许多姑娘，大部分升入中学继续读书。

教育扩大也使中等层次的职业从较高层次的职业中分离出来。德国较高的行政机关和专业塞满了来自传统学校和大学的人员；中等行政机构的低级专业人员和管理位置的成员则都来自现代学校；而那些从中学或大学辍学的人比那些完成学业的人更趋向于充当低级位置的成员——从现代学校中辍学的人填充了较低的白领职业。在法国和美国，同样的模式是明显的，只有一点例外，大部分金融业和商业的位置仍被受过一流教育的人员占据。在欧洲和美国大学中，存在着一种从商业网外流的现象；进入大学的商人子女比进入商业的毕业生更多。大学仍然是分层次的。古老的上流社会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常青藤大学联合会等等)仍然是出类拔萃的，大学联谊会向那些可能成为“上

升的资产阶级”的人灌输传统价值。

因此，经过大学训练的专业人员、公务员和金融与商业的流动职业者便成为“有学问”和“有文化的”，而不像在他们下层以及在制造业中的人，只是在技术上有资格。教育隔离也把不同于大部分职员和销售人员的“经理”作为表面实用的类型分离出来。它让能读会写的中产阶级女孩大量进入这些位置。虽然被性别关系弄的模糊不清，但非体力劳动者更明显的与体力劳动者分离。职业阶级关系现在完全与教育隔离联在一起了。

参加该时期社会流动性激烈辩论的几乎所有撰稿者都同意教育隔离是统治政府有意发明出来的，它阻止了更大范围的向上流动。因为最高位置的增长远远少于中层位置和技术位置的增长，并且，因为教育正在扩展，统治政府意识到在“有学问”的职业中潜藏着过分拥挤现象。隔离因此成为保护自己子女的尝试。然而这并没有在中产阶级中招致大量不满。毕竟，中等水平的职业机会正扩大到极点，隔离也使他们免受下层的竞争，而且教育本身还规范了子女的思想，使他们形成对三层等级的忠诚：“传统学习”最高，“现代技术”次之，“能读会写”最低。

在20世纪，大部分正式教育的隔离结束了。所有的孩子们可以免费入学(除了最高水平的教育)，并且在形式上不靠任何背景取得了进步。一战后，教育也不再被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所专有。有选择的中等教育扩大了，接受了很多工人的子女。现在，阶级背景的影响变得不太直接了。20世纪，在英国有选择的中学中，专业人员、经理和巨富的子女大约有70%入学，低级的非体力劳动者子女有40%入学；工人子女有20%—25%入学(Little and Westergoard，1964；Halsey等，1980，pp.18，62—69)。国际比较分析表明，各国在较高水平教育的不平等方面并无不同(尽管美国看来比欧洲国家更开放些)。20世纪早期，所有的学校都允许工人子女入学，尽管中产阶级的子女占支配地位。首先是有选择的中等教育，将20世纪的中产阶级统一为整体。

上述情况都是在一个主题上的变异：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公民权的增长。经济权力依靠国家教育，并因此依靠争取公民权的斗争。中产阶级分享了意识形态的公民权，其内容和机会由他们中的较优越者来决定。

但是，教育不仅仅加强了阶级。它也加强了国家的**民族**成形。正如我全面论证的那样，政治斗争实际涉及了国家在任何阶段的**行为**。第十四章表明 19 世纪晚期教育是主要的国家增长和公民活动。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中央政府、地区政府和地方政府)接管了私立学校或扩大了他们自己原有的学校，而将私立学校留作在增长的公立系统中的孤岛。因此这个时期可以看作世俗的中央集权国家同分权者和教会的地区宗派联盟之间的政治冲突(经常是很严峻的)。在已建立教会的国家，异教派联盟一般是乡土主义者和少数派教会的联盟，如在英国和德国。那些最依靠教育的人——首先是老师和政府的流动职业者，其次是别的专业人员，然后是私人部门的流动职业者——对世俗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变得更加忠诚，与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国家本身是多种形态的，而且中产阶级的人们也有地方区域和宗教社区的身份，那么正在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公民权和民族主义也是形形色色的。

中产阶级政治的民族主义

我已经说明了经济权力关系将把中产阶级的男人们推向保守主义。部门统治集团的忠诚、繁荣、文化特权和自满，无产阶级化的稀少，资本家投资渠道的统一，在消费、文化和资本方面从工人中区别他们自己的愿望——所有这一切就鼓励了保守主义。我们不期待政治兴奋和极权主义，也不能预料无产阶级联盟或社会党人的同情，但是应当预料到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如果国家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没有别的具体形

态，中产阶级可能会使历史学家厌烦。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历史学家已经觉察到了在中产阶级中存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政治民族主义**。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每项关于民族主义和正在萌芽的国家压力集团的研究都表明，国家实质上是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正如在别的非劳工自愿协会中，带着这样的先决条件：在压力集团中的最高位置被名人所占有)。但是这些研究事实上并不包括验证这种主张的证据。它们仅在德国是这样的，被引用的这些德国证据，确实表明了一个不同的模式。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鹦鹉学舌般地提出了有证明文件的另一个主张，然后继续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级是民族主义的。

霍布斯鲍姆(1990，pp.121—122)，在捍卫他关于战前国家主义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主张时，实际参考了战后纳粹的证据。然而，甚至在那儿他也是错误的：纳粹证据证明了与战前德国同样的(非小资产阶级的)模式。科齐(1990)是一个例外，他承认他的关于谁是民族主义者的证据不带普遍性。想象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据说反映了焦虑、不安全和在祖国内对权威人物的渴望——是对经济集中和劳动侵占的“挫折”“不幸”及“地位恐慌”的反映(Howard，1970，pp.103—104；Wehler，1979，pp.131—132；Hobsbawm，1989，pp.152，158—159，181；Hobsbawm，1990，pp.117—122)。别人把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看作是通过转移灾难给外国机构的经济和性别失意的纯化。我拒绝接受小资产阶级经济行为是病态的理论(尽管解释得很好)。现在对于中产阶级的政治我持同样的观点。

病态理论注意到了一个共同的西方模式，是由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引起的。然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不是一致的。它也不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反映了——有时是夸张地——各种统治政体的两难境地。

我首先评价来自下层的威胁。从19世纪80年代，大量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接踵而至。第十九章表明农民政治并没有对中产阶级形成很大

威胁。 相比之下劳工更成问题。 然而在它的直接的生产关系中，劳工面对的只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抵制组织工会的权利。 专业人员相对而言没有卷入资本——劳工的冲突中；尽管流动职业者有时卷入，但在劳动关系任何单独的解决方法中，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利益。 尽管经理和官僚可能会利用“资本的全球功能”(Carchedi, 1977)，但他们也会通过镇压或和解来解决问题。 因为，实际上，工人政党寻觅的是共同主义和联合管理，而不是打败资本主义，所以经理和官僚支持他们。 从他们直接的生产关系中，我们可能会预料到小资产阶级的敌对情绪，而不是不同的专业人员和流动职业者流动到劳工中去。

“政治经济”又一次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的经济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开始有了更多的冲突。 如果工人在现实中正式拥有公民权，国家实质上将不再是中产阶级的。 工人将在数量上超过中产阶级的投票者，并可能再一次引导政治、经济转向他们自己的利益。正如我强调的那样，政治通常将利益集中在国家的费用和收益上。

国家**费用**意味着岁入，现在则是在来自“国家财产”中潜在的递增的直接税和递减的间接税和岁入之间进行选择。 正如第十一章表明的，尽管税收负担现在并不重，但税率是递减的。 当军事消费在 1890 年之后上升时，工人和农民政党的反对声音更大。 在 20 世纪，国家利益出现了相当大的转移，在传统的腐败意义上，“政府机关的果实”不再存在。 但是官僚化意味着政府机关有助于受过教育的人的进入，并且最好的政府机关促成“有学问的人”的进入。 在商业和制造业中的流动职业者的位置是这样，专业人员的垄断也是这样。 技术学历体现在一个全国性的文化生活中。 中产阶级的男人(甚至妇女)能够参与这样的文化生活，而工人却不能。 劳工运动对意识形态上的公民权的需要增长了，这就是说比起来自政府的任何其他东西来说，教育是劳工运动更需要的，当然工会组织的权利除外。 但是，因为政府正在获得很多别的国内职能，其他政府服务也变得有利可图。 劳工只是开始寻找

对其自身的直接服务，并把国家控制转移到别的服务中去(例如《济贫法》进入到社会公民权之中)。在政治经济上的冲突直到一战晚期才变得很剧烈，但是它在1900年业已出现。国库岁入的再分配和普及教育现在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

但是，这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并很少导致领导阶级的反对。在美国，其主要阶级政党并不是按阶级划分的，在英国和法国，只是有一部分按其划分。别的政治形式与阶级冲突交织在一起，在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各不相同。科克(1980)证明尽管美国白领工人看起来根本不害怕无产阶级，但德国的白领工人仍很害怕。两个美国“阶级”加入到同样的政党——并且，即使美国职员感到伤心，他们仍加入到类似的工会中。但是德国职员却加入到敌对工人的政党和工会中，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彼此是阶级的对手。在英国和法国，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落入到两个极端之间，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各国间不同的结果是由于阶级和政治经济主要跟三种政治定型交织在一起。

1. 在19世纪期间，虽然中产阶级获得了政党民主，但是它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获得的。到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更早)，在所有的三个自由党的国家中，中产阶级有完全的政治公民权。到1900年，他们的选举很少被名人和部门赞助的当事人的政党控制，而是由大量的有会员资格的政党和压力集团所控制。群众集会和与个人无关的竞选主要是针对中产阶级的。在澳大利亚和德国，财产投票权以及有限的议会主权赋予更少的党派民主和政府行使更多的分而治之的权力。中产阶级被允许进入政府的只是政党，而工人阶级却被排除在外并遭压迫。在奥地利分而治之也使一些民族卷入，且有时将爱国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美国处在相反的极端上，没有阶级排斥现象。英国和法国处在中间。英国公民权的扩张正好贯穿了整个19世纪，法国情况是多变的，只有在19世纪80年代，才形成按照财产分配公民权的制度，但是，并没有纯粹分离出阶级。例如1900年，大部分有技能的工人与中产阶级一起拥有投票权(和集体组织权)，然而没有技能的工人却没有这种权

利。美国政党民主政体包括了跨阶级的联盟；在英国和法国，部分是这样；在德国和奥地利(不过如此而已)，则是按阶级划分的。

因此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经济使得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其次是法国和英国，这种情况在美国很少发生。有着相同的经济权力关系的中产阶级对较低阶级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它们被分别融入到政党民主中。

2. 正如前面几章证明的，教育也涉及到多种**国家**形式，集中在宗教和地区的网络系统中。这为跨阶级的联盟创造了很多可能性——例如，世俗的中央集权之间的进步联盟(法国)，世俗主义者和少数宗教派别之间的联盟(这种联盟在德国永远不能成为现实，但这种可能性却深深地影响了那里的民族主义)。这些联合体实际上支配了奥地利的政治，使得阶级、地方政权和宗教缠绕在一起，更广泛得多地威胁到国家。

3. 战前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因为国家**军国主义**的形式是如此不同。美国是扩张主义者，但并不反对其他列强。英国起初只是期望保持全球自由贸易和保卫它已经形成的全球帝国，但是，不久即转向加强防备正在崛起的德国强权。当法国和其邻国的领土看起来受到德国威胁的时候，它从领土扩张转向了防御模式。尽管这个时期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看成是侵略者，但奥地利和德国政府渐渐认为攻击是最好的防御模式。对跨国的民族主义(奥地利)和被(德国)包围的恐惧，导致它们陷入更加好斗的地缘政治中。如果在各国不同的地缘政治氛围中，中产阶级到处拥护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那它确实是中产阶级不合理性的妄想狂的特征。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所有这三个政治形态与阶级冲突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非比寻常的民族主义。

美帝国主义在 19 世纪的扩张，并没有冒与别的列强进行战争的危险。美国只是击沉了西班牙笨拙的军舰。因为美国在卷入古巴、菲律宾和中国时，是小规模的，冒的风险不大，那里没有支持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动员。民族主义的压力集团是软弱而特殊的。帝国主义更多

的是被总统权力所驱使，并得到那些有利害关系的参议员，像马汉海军上将那样的地缘政治家、一些报业巨头、传教团体和(尤其)一部分对该地区有兴趣的商业集团的支持。但也受到一些形形色色人的反对，这些人是另外一些特殊的商业团体、自由党人、企图避免跟非白人发生纠纷的种族偏见者，以及欧洲军国主义和征兵制度的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Lasch, 1958; Healy, 1963, 1970; LaFeber, 1963; Beisner, 1975; Welch, 1979; 也可以参看 Hollingsworth 的散文，1983)。里斯塔德(1975, p.167)有些不同意见，他强调了这个时期在民主党中增长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但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政治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难找到的。因为(正如后面我们将要看到的)国家教育实质上促成了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美国学校的稀疏和地方控制可能使民族主义减弱。

在 19 世纪的美国并没有多少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英帝国正处在好的时候，不需要国民的防御。印度的强硬抵抗遭到了小型专业军队的反击。这些军队靠在印度征集的兵源——由其他地方土著人组成的分遣队增强了攻力。关于"我们"是谁的英国民族主义，是更坚定的统一信念而不是分裂(尽管有特殊的英格兰——不列颠、苏格兰——不列颠等等的双重身份)。英国和美国都发明了相当理想化的、自由和表面上爱好和平的民族主义。英国在全球传播了文明、议会和大不列颠的和平，美国提供了"在山顶上的城市"、"地球上最自由的人们"这些闪闪发光的指路明灯。这两个国家都实施了相当大的反对"土著"的野蛮行为。但是在政党民主中，并没有人看到攻击其他列强的很多特征。(我调查了第二十一章中"自由党"的政府是爱好和平的一般论据。)

在 19 世纪的法国存在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但在中产阶级中是很少的。的确，伟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创造了流行的帝国主义，但是 1815 年之后，它后悔了自己的卤莽。中产阶级对由君主政体、路易 · 波拿巴和试图在国外寻求利益的经济压力集团所信奉的帝国主义保持了相当的漠然。它正在努力奋斗以使共和政体免遭暴力。当胜利最后于

1870年降临时，中产阶级为共和党人，仍然是反对教会并主要是反对军国主义的。流动职业者和专业人员的中产阶级集团特别忠诚，因为各种教育机构坚定的拥护共和政体。相形之下，小资产阶级组织从19世纪90年代起转向右倾，向着社会天主教教义和保守但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发展(Nord，1981)。但是，在法国，民族主义是一个有争议的空论，就忠于共和国的意义而言，教师和公务员似乎一直都是最“爱国的”。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教育慢慢变得世俗化和标准化，整个国家都在灌输共和政体的美德(Moody，1978)。在法国乡村和城镇中极具人格魅力的学校校长极力颂扬共和国、爱国主义和世俗的公民义务(Weber，1976，pp.332—338；Singer，1983)——但并不是攻击性的：教科书里对其他西方大国敌视的内容很少，尽管书中教育人们，法国对于教化落后人种有特殊的文化义务(Maingueneau，1979)。

妄想狂患者的理论忽略了自由资产阶级文明的成功和它颂扬民族主义的心境。在英国，它更多的关注道德、浪漫和感情而不是更加激进；在美国，它更积极地肯定自由和个人的男子汉气概；在法国，实质上是现代和世俗化的。这种中产阶级，地位上升并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把统治阶级的国家变成了民族—国家。它们的民族主义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成功而不是失败。

对美国来说社会地位平等一直持续到一战。但是1900年，英国和法国的民族感情发展得有些更具军国主义色彩，因为德国想做大国的野心似乎在膨胀。法国在1870年至1871年间受到侵略并被打败，1900年后，很多法国人再次感到了威胁。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左派一直是爱国主义的代言人，但现在已为右派所取代——尽管其君主制度和神职制度削弱了爱国主义的要求。法国的中产阶级也分裂成为两个看似敌对的阶级，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它对旧政权的厌恶，引导它将大的激进党与左派建立了联盟，以确保世俗教育的政府和民主党对军队控制的成功。一旦成功了，仅在1900年后，资产阶级政党就有些转向右派，同时德国的威胁又一次出现，这将民族主义从全球的殖民扩张转

向地区的国家防御。那些更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政党在战前大大缩减(尽管大学里仍有很大影响)，因为共和党和激进的中间派和类似的法国政府变得更加爱国，同意重整军备。但他们的爱国主义绝对是防御性的：重整军备以对付预料中的德国进攻。许多法国爱国主义者(有点过度自信地)在狂想：这将导致阿尔萨斯—洛林的收复，但主要的政治家不提倡进攻德国(所有这些人都受惠于 E.Weber，1968 的著作)。他们调和政治、经济和征兵制度的冲突，只是及时巩固了 1914 年防御努力的成果。法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阻碍了政府，而是再次鼓舞和挽救了它——有较大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因此使民族国家得到增强。

安全和自由竞争的英帝国主义，采取了自由和表面上爱好和平的意识形态。在 1880 年以前，帝国主义刚刚形成，还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仅有的几次游行示威有的是由抨击帝国政策或研究政党政治的人道主义和宗教团体所组织的，有的是由与国外或与扩张的军队有经济利益的压力集团组织的。1885 年戈登将军死于苏丹，标志着“土著”更顽强抵抗的新阶段，从而引发了最早的帝国主义的街道游行示威。19 世纪 90 年代，帝国主义是一个“受欢迎的医治商业萧条和失业、缓解国家不安全和确保未来繁荣的政治改革方案”，罗宾森如是说(1959，p.180)。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起先更多地集中在反对“土著”，而不是反对欧洲的感情上，但是法国、德国也先后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帝国主义和“对民族效率的要求”影响了两个政党，在这个时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中引起了共鸣。自由帝国主义者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身心健康和教育以此来发展民族力量；保守主义者主要集中在海外帝国和权力方面。我在第十四章中说明这一切是怎样打算为广阔的国家重新集结家庭和母爱主义的强烈感情。

1900 年后，种族偏见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矛盾情绪。它较早且清楚地表达了欧洲对于“落后”人民的优越感(有时混合着脆弱性)。用自然科学的有共同性的生物群体来解释人种：白色人种统治黑色、棕色和黑

色人种。 尽管帝国主义的种族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滥用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它同样是遍及全国的。 但是日益增长的社会密度、国家基础和语言有时也是宗教的社区，现在也给种族偏见一个民族定义，尤其是在政府增强的民族中(现在为止也包括德国)。 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条顿人和斯拉夫人来说，“种族”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发展了一段有共同世系的虚构历史。 在20世纪里，在讨论帝国问题和关于同德国甚至与美国竞争的问题时，英国政治家和受欢迎的作者以很普通的方式，用单词“种族”来指英国人。 因此种族主义在政府和民族之间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因为欧洲一直是分裂的。

但是，从一个常识性的民族种族概念到进一步倡导侵略的准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大相径庭的。 就当代生物科学而言，与其说可持续的种族主义，倒不如说是优秀的种族主义。 在英国，它有时由报业巨头和右派压力集团像海军联盟、全国服务同盟、帝国海上同盟和樱草花联盟所支持。 一些历史学家声称，这些压力集团有中产阶级的根，尽管没有人提供这些成员和参与政治活动者的阶级成分的证据(Fieldhouse，1973； Fest， 1981； Summers， 1981)。 预备役军官、预备役和训练团、男童子军和国际文化组织提供了被认为主要是中产阶级的更体面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茁壮成长(Kennedy， 1980， pp. 381—383)。 最近科齐(1990)的研究显然被这个“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模式所吸引，然而由于证据缺乏而使其谨慎。 实际上库切关于在民族主义的压力集团内部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者的有限数据证明，该集团已被退休的军官、传教士、记者和有特殊物质利益的商人所统治。 曼根(1986)已经指出，帝国宣传主要是在当局者的子女所在的公学(即私立的)中传播，这些学校不是中产阶级的子女所在的学校。 当我转向有文献记载的德国民族主义时，我将给压力集团的成分作一个不同的解释。

普赖斯(1977)毫无根据地认为好战主义是下层中产阶级的。 然后他用以下的术语解释了这一点，即中产阶级面临封闭的流动和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所引起的地位恐慌。 我已不接受他论证的经济基础——这个

时期的下层中产阶级正顺利发展——然而接受工人阶级就可能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产阶级可能希望保持这个国家是它们自己的，保持税收下降，保持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

但在英国的政党民主中，阶级动员起来的地区、宗教和部门的国家形态相互交织在一起。保守党领导层不同情工人并反对很高的社会支出；但是它仍维持的是国教会和农业与附属于农业的商业费用，并支持军队的开支。因此，英国中产阶级分裂了。它的制造业人士，不信国教者和凯尔特文化的保卫者们，还有很多的专业人员，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高尚、自由的自我构想中，被教育而呆在自由党中。一些人信奉了罗斯伯里或霍尔丹的自由帝国主义。但是其他人却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看似由专业人员统治，并督促与劳工达成选举上的协议。这就鼓励了工业主义者的进一步背叛，鼓励一些所谓的“上层中产阶级”转向保守主义。然而党内仍存在阶级紧张关系。尽管自1906年以来，有一个真正的左派再分配政党，也即“不信国教的商人在众议院中仍是自由党的支柱。”(Bernstein, 1986, p.14；参阅 Clarke, 1971； Emy, 1973； Wald, 1983)。中产阶级的自由党人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仍井水不犯河水。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压力集团与右派保守圈子有紧密的联系——有的与官方保守党保持联系。他们与那些同与自由左派有联系的国际和平主义者进行竞争。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人数有所增长，因为德国的行为看起来证实了他们的论点，但在1914年，尽管自由党内阁里有反战派，但更多的人却与之相反。

确实，英国政府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的两难问题：是保持旧的注重道德民族自由主义还是加强军国主义。但是，这儿有个**防御**警备的折中立场：如果受到攻击我们就应战斗，现在就准备我们的**防御**。这成为像尼科尔森和艾尔 · 克罗的外交家和两党领袖的观点。在坚定的全国防御政策上，他们同意温和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因此，大多数英国民族主义者既不特别好战，也明显地不属于中产阶级——虽然也不是工人阶级(见第二十一章)。

1914年，英国自由党政府与其说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它自己的极端和平自由主义所左右。如果当权，保守党可能受到党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影响(正如在德国那样)。英国的中产阶级仍然是忠诚的——但只是对它的模棱两可的国家形态忠诚。我认为受过最高等教育和政府的流动职业者**都**患有“超级忠诚的精神分裂症”，受他们国家传统的自由主义和新的帝国主义影响。我没有实际的证据，但是这将与有充分证据的德国的结果相似，后面将详述之。这也与政府流动职业者的国内政治相似。很多人讨论了民族国家的自我形象，因为它能够将妥协和实用主义的发展独特地融为一体，它们在调和阶级冲突方面比政党领袖所希望的更出色(如我们在第十七章将要看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和政府流动职业者使得国家竞争的学说超国际化了，令他们的政治头子感到很不舒服。然而，一旦两党进入战争，中产阶级便会团结起来(除了一些勇敢的和平主义者)，忠诚地抛洒热血——使得英国的民族国家进一步地走向没落。

在德国和奥地利，融合着阶级、民族和君主主义的国家形态产生了中产阶级不稳定并最终不忠诚的民族主义(在第十章论述了奥地利)。因为阶级和民族彼此交错并对政府保持忠诚，所以也没有任何一方单独对哈布斯堡提供充分的支持。同样，在19世纪晚期，政府内部故意互相挑拨离间，有附属阶级和民族的地方，就有狭隘的统治者。对阶级和民族的支持仍然是老谋深算的。地区中产阶级很少有明显的等级制度，在此基础上把保守主义和忠诚拴在一起。正如从本章讨论中我们可以预测的那样，奥匈帝国中产阶级没有攻击无产阶级的社会党联盟。但是也产生了其他联盟。一些中产阶级贵族(尤其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专业人员和地方官僚)控制了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运动；其他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农民、非社会党工人和民粹党中的下层中产阶级，以及与社会基督教的异教者尤其是德国人和(捷克人)组成联盟，其他人(大部分在落后省份和匈牙利)与反对哈布斯堡的当地旧政权联盟；此外制造商、金融家、公司经理和中央政府官僚(尤其是奥地利的日耳曼人或犹

太人)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及其最后的侵略。要分析上述情况，会浪费很多篇幅，但是中产阶级忠诚的保守主义很少发现一个合适的对象。奥匈帝国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有些保守和明显带有侵略性的，但总是令人兴奋的是，通常总有国家被推翻——战争失败后，导致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的兴起。

德国分而治之的形式也不一样，政府为了不让劳工和少数种族进入政权，因此把中产阶级带入政府的边缘状态。这就致使中产阶级向右转反对工人阶级；也使北部和路德派的中产阶级(和农民)转而效忠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而天主教徒和南方却转成了温和的地方-地区的不忠分子。但中产阶级的政党被挡在政府的核心之外，这就使旧政权和资本家占优势。比如不像自由党国家，奥地利的群众政党没有控制政府。因此，尽管中产阶级强烈反对社会党，以保守主义及民族主义为主，但它并不能与现在的政权强烈区分开来。它的自治也得到其独特的公司组织的支持。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政治有时是激进的，一般是反对无产阶级的(Gellately, 1974; Winkle, 1976; Blackbourne, 1977; Kocka, 1980)——它的自治作为其敌人的反对力量甚至受到君主制分而治之的鼓励。

1900年之后民族主义者的压力集体具有影响力，因为德国人对被包围的恐惧在增长。到1911年，殖民团体、日耳曼联盟、东部边界协会、海军联盟和防御联盟比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有更大更多的发言权。有些较小的压力集团(老兵协会、青年德意志联盟)是政府宣传的力量。有些(东部边界联盟)是与容克、军队和法庭相联系的单一问题的集团。但是这个最大和最有毅力的团体(海军联盟和泛德联盟)成为自主的，它受人欢迎并具侵略性，限制了政府和政党，不采取外交和解政策。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起先蔑视这样的民族主义，后来在选举压力下，两党逐渐衰落了(Eley, 1978, 1980, 1981)。

因为在这些压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工人，在大多数压力集团中也没有农民，因此通常把它们描述为中产阶级的团体(Wehler, 1979;

Eley，1981)。然而数据(Eley，1980，pp.61—67，123—130 和 Chickering，1975 表 5.1—5.2；参阅 Kehr，1977)允许更大的精确性。

最大的是海军联盟。它由富商、教授和前军官组成，它的全国领袖仍然是贵族。在 1900 至 1908 年常务委员会 26 个成员中，有 10 个大商人，5 个是土地贵族，9 个是前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1 个是教授，1 个是退休的公务员。这些人都是大学毕业生。1912 年，在 9 000 个分会官员中，20%是较高的政府官员(经常是市长和县长)，19%是教师，18%是中层和低层的行政官员(尽管如德国经常的统计中，这个种类包括很多在私人部门的办事员)，11%是资产阶级，9%是专业人员，8%是土地所有者和前军官，8%是企业主和经理；还有一些神职人员、技工和农民，实际上没有工人。国家雇员的过多代表是惊人的——占 2%到 3%和 50%到 60%的海军联盟官员(包括教师和一些新教教士)。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他们提高了的教育水平：1%的人口和 61%的地方领导者在大学水平的学校中学习过。

泛日耳曼联盟也同样是不平衡的：在将近 2 500 个地方领导者中，没有农民、工人或技工。大约 66%的人接受了大学水平的教育，54%是国家雇员(其中一半是教师)，长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者甚至更不平衡：77%已经参加了大学水平的学习。奇克林证明：在所有的民族主义压力集团中，大多数公务员都来自中层到高层的行政部门，但没有人来自最高层。

东方边界协会以乡村居多的东普鲁士为中心，拥有更多的农民和技工，大约各占 20%。但是，即使在这里，公务员和教师也都占优势。在 1894—1900 年 26 个分会抽样中，他们占会员的近 50%，后来这个比例上升。仅仅是教师就单独提供了 10%—14%的会员，在协会工作人员中，在总委会中占 25%，并且别的公务员占了总委会的 30%。在奇克林的当地协会领导人的抽样中，74%的人上过大学水平的学校。

其他组织的普通成员成分有相当大的臆断。埃利认为海军联盟拥有比例不相称的小资产阶级，但没有说明原因；奇克林猜测泛日耳曼联

盟主要还是中产阶级的，尽管来自受教育人士和公共部门的人不成比例。 所有的压力集团实际上都来自德国北部和路德教区。 天主教乡村和天主教小资产阶级相对没有受社会帝国主义的影响(Blackbourne, 1980, p.238)。 路德教是普鲁士的官方宗教，因此有点国家主义。

请允许把奇克林(1975, pp.73—76)对温和的和平运动的研究与极端民族主义者作一个有趣的比较。 大多数和平主义者来自“非农村的中层到低层的中产阶级”，以小商人和企业主为最大群体(尤其是做海外生意的人)，然后是来自小学的教师和专业人员。 与地位恐慌论非常相似但是在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平主义者。 妇女也构成了1/3的成员。 然而民族主义的压力集团主要是男性成员。 奇克林得出结论：和平主义者主要是那些在民族国家的主要机构——官僚机构、大学和军队中被免职的人们。

国家教育正式来说是民族主义的，学校被认为要鼓励一种民族军事感。 正如皇帝在一个会议上告诉教育工作者说：“我正在寻找战士。我们需要有活力的一代，他们能担任有智慧的领导人和国家的官员”(Albisetti, 1989, p.3)。 小学教师是否服从皇帝还不清楚。 很多学校(大部分在巴伐利亚)是天主教的，进行了抵制，出身工人阶级的小学生看起来没有几个人得到过这些信息。 国立中学的老师作出了努力，在中产阶级学生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然而孩子们的热情很少集中在政府和皇帝身上，而是更多地集中在抽象的人民和帝国上(Mosse, 1964; Albisetti, 1983; Schleunes, 1989)。 大学的影响最大，失去了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色彩。 人道主义的概念培养了受腐蚀的教育。 学院鲜明的主张国家主义，尽管只有少数人直接在政治上活跃，但这些人大都是右派。 学生社会生活出现了“保守—忠诚的”学生团体，学生联谊会以及别的民族主义学生组织的增长。 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影响，自由主义也衰落了。 “学术青春的‘精神重生’所集中注意的并不是目前的政府而是两个标语，德意志民族主义和世界政治”(Jarausch, 1982, p.365)：因为两千万德国人正住在国外，帝国应当扩大。 国家教育不仅

仅是对政权的忠诚社会化，而且是一个更抽象的民族主义。

因此，并不是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政府雇员(对国家依赖性最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路德教徒(最多地融入到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可能成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奇克林(1984，pp.107，111)指出这些男士是皇权文化的监护人，然而他们也许正在远离皇帝。小资产阶级并不专门是民族主义的政党成员。技工、农民和小商人的旧的中产阶级和白领工人新的中产阶级两者也都不能很好地被民族主义所代表。

这就将民族主义置于一个极其不同的情况中。也许我们应当真的称它为“国家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另外这些运动的情形很少与地位恐慌的妄想狂患者的理论所描绘的消极形象一致。它体现的不是政权核心而是国家内部部分人过度热情的超级忠诚的民族主义。一个特殊的压力集团已使从中层到高层的国家殖民化。它们正督促政府履行其已被争论过的真正价值，因当前要求实行的国内政治的分而治之的外交政策和皇帝本身的局限正在起破坏作用。超级忠诚主义并没有把它本身看作是焦虑或反动的，而是看作轻快、牢固而现代的，带着一个未来的形象——一个真正流动的统一而团结的民族国家，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而且一定没有君主政体)是这样的。犹太人、天主教徒、少数民族和社会党人正试图破坏国家统一。但是如果政府把它的首脑交给真正的国民，他们将可能被扔到历史的垃圾箱中。让这些民族主义者肩负未来的历史重担是不公平的。大多数人并不打算给德国当局造成实质上的极大伤害。只有当旧政权在 1918 年崩溃且魏玛的那些敌人变得更强大时，他们的继承者——现在得到更多的农民和资本家的支持，但仍然集中注意国家和路德教义问题——就变得极端卑鄙无耻。

经过所有这些变化，现在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至少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与公认的观点相比，出现的民族主义很少是中产阶级的，更明确地具有中央集权制的特色。中产阶级的所有三个阶层在阶级问题上对它们的政权都表示了忠诚。然而它们的政治观点是变化的。因为宗教和地区的身份影响了它们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民族主义者大

部分是由政府流动职业者、受过较高教育的流动职业者和专业人员形成的。但是它也随政体特征而变化。民族主义有时过度热情地夸大了对政府的偏爱，产生了主张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但是甚至在德国，这也仅仅是要求一个表面上积极的旧政权为它的花言巧语负责，并变得更像民粹主义者。英国和法国在外部威胁下，产生了凝结起来的党派化的民族感，以巩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奥地利和美国党发展了民族主义的独特变形，一个目标是反对政府，另一个仍未被地缘政治的清慧声音所唤醒。这些变形并不是从直接的生产关系中产生——因为后者在国家中是恒定不变的，而是由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公民权交织而成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性多于经济性，然而政治使国家分派，减少了"它的"内聚力。我在第二十一章解释一战的起因时，将证明这一点是重要的。

结论

中产阶级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已有一百年了。只有两个中间群体无产阶级化，并且这两个群体都没有给中产阶级造成多少混乱。大部分技工那么早那么完全地就无产阶级化了，以至于他们对中产阶级未留下什么烙印。后来，办事员、售货员和一些没有职业前途的技术工作变得与体力工作一样，然而，他们中占优势的女性职员几乎没有经历无产阶级化。如果低层白领工人比体力劳动者更少参加劳工运动，这并不是假定的中产阶级地位意识，而是因为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在体力工人中也减少了参与：较高比例的女工，占优势的雇工组织以及在中产阶级占优势的地区。中产阶级一直被无产阶级化；中产阶级"分裂"的出现主要反映了性别的差异。

男性占优势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三个阶层，每一个都由独特的生产关系所定义：小资产阶级、公司和官僚政治的流动职业者以及专业人

员。他们是中产阶级的三个阶层，因为他们拥有了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弥散的特征。这些特征中的一些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在等级制中参与分层的职业和市场关系、特权消费的标志和把收入转化成小的投资资本的能力。但是在这个时期，他们也共享了与国家教育相联系以获得就业权利的意识形态的公民权并享有拒绝接受在他们以下的人们的政治公民权。民族平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受到资本的支配，由中产阶级下属水平的人来充职员。到 1914 年，在联邦制度化的地方，正如在三个政党民主政体中，大的阶级变动没有发生。随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公民权主要以中产阶级的民族公民权的模式而制度化。

在与劳工的斗争中，中产阶级大体上始终对资产阶级表示忠诚。没有一个国家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联盟相接近。当它们能够跟非阶级的、像宗教和地区那样的政治团体建立联盟时，它们的距离最近。下一章将集中论述劳工和农民怎样勇敢地对付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极大的限制了他们的选择权。然而，我并不希望陷入这样的陷阱中：认为中产阶级只是与资产阶级和劳工(加上农民)有关，为此我批评过陷入这种陷阱中的其他人。不能把中产阶级降为仅仅是资本主义和政权的忠实仆从。20 世纪初，它也是民族国家的主要支持者。此外，两个阶层——政府流动职业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职业者以及专业人员——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独特拥护者。

美国、英国和法国没有中产阶级社会党人(直到 20 世纪中期国家职业的扩展)，但是，产生了一些关于民族国家的相当有竞争力的观点，从保守的(尽管有点防御性)民族主义到自由的和平主义。在整个奥匈帝国和德国，中产阶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国家的流动职业者，都表示了更加自主、好战和抽象的民族主义，且能戏剧性地转而反对统治政权。在奥匈帝国这一情况现在发生了。在德国，超忠诚的国家主义已使政府不舒服，而且在不到二十年之内就转变成了革命。“一战”强化了自由国家中的民族建设，也激化了别的国家关于民族含义的冲突。业已证明，民族—国家和各民族与资本主义和阶级一样对

20世纪文明的建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产阶级为20世纪文明的出现配备了成员，它那更具国家主义的各阶层充当了它们最激烈的有时是破坏性体制的成员。

中产阶级的出现与独特的权力来源有关，它有自己的组织和集体意识——通过“不纯粹的双重信条”所概括的一种关系，即分散的资本循环所产生的在组织上部分中间参与和在权威的民族—国家里更独立多变的参与。分散的资本主义和权威国家的相互作用再一次塑造了现代社会。

注 释：

[1] 其他经济因素的威胁，如通货膨胀或税收政策，可能也导致了20世纪20—30年代小资产阶级的混乱。但在1914年之前，即在本卷涉及时间范围内却没有这种状况。

[2] 关于19世纪的教育，材料来源如下：英国：穆斯格罗夫(1959)、珀金(1961)、史密斯(1969)、萨瑟兰(1971)、米德尔顿和魏茨曼(1976)、赫特(1979)、里德(1987)、西蒙(1987)和斯蒂德曼(1987)；法国：哈拉金(1975)、吉尔德(1980)和明奇(1987)；德国：马勒(1987)和哈劳斯德(1982, 1990)；美国：克鲁格(1964)、科林斯(1979)、科克(1980)和鲁滨逊(1986)；还参照了林格(1979)、凯布尔(1981)和霍布斯鲍姆(1989：6、7章)的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Abercrombie, N., and J.Urry. 1983. *Capital, Labour and the Middle Classes*. London: Allen & Unwin.

Albisetti, J. 1983. *Secondary School Reform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rmstrong, W.A. 1966.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early census returns. In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E.A.Wrigle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Aronowitz, S. 1979. The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or middle strata?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P.Walker.Boston: South End Press.

Bairoch, P.et al. 1968.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Its Structure*. Brussels: Editions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Libre(in English and French).

Bechhofer, F., and B. Elliott. 1976. Persistence and change: the *petite bourgeoisie*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7.

Beisner, R. 1975.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1900*. Arlington Heights, Il.: Harlan Davidson.

Bell, C. 1969. *Middle Class Famil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erger, S. 1981. The uses of the traditional sector in Italy. In *The Peti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neasy Stratum*, ed. F.Bechhofer and B.Elliott. London: Macmillan.

Berle, A., and G. Means. 193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Bernstein, G. 1986. *Liberalism and Liberal Politics in Edwardian England*. Boston: Allen & Unwin.

Bertaux, D., and I.Bertaux-Wiame. 1981. Artisanal bakery in France: how it lives and why it survives. In *The Peti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neasy Stratum*, ed. F.Bechhofer and B.Elliott. London: Macmillan.

Best, G. 1979. *Mid-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Fontana.

Blackbourn, D. 1977. The Mittelstand in German society and politics, 1871—1914. *Social History*, no.4.

Blumin, S. 1989.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American City, 176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th, C. 1886. On occupations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01—1881.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49.

Bruchey, S. 1981. Remarques complétant les conclusions générales [and] Etats Unis.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Burnham, J. 1942.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London: Putnam.

Cain, M. 1983. The general practice lawyer and client: towards a radical concep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ed. R.Dingwall and P.Lewis. London: Macmillan.

Carchedi, G. 1977.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handler, A.D., Jr. 1977. *The Visible H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man, S. 1981. Royaume-Uni.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Chickering, R. 1975. *Imperial Germany and a World Without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We Men Who Feel Most German: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PanGerman League, 1886—1914*. Boston: Allen & Unwin.

Clarke, P. 1971. *Lancashire and the New Lib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etzee, F. 1990. *For Party or Country: Nationalism and the Dilemmas of Popular Conservatism in Edwardian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1981.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Crew, D. 1973. Definitions of modernity: social mobility in a German town, 1880—1901.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1979. *Town in the Ruhr: A Social History of Bochum, 1860—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rossick, G. 1977. The emergence of the lower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a discussion. In *The Lower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1870—1914*, ed. G.Crossick. London: Croom Helm.

Cunningham, H. 1971. "Jingoism in 1877—1888." *Victorian Studies* 14.

Dahrendorf, R.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The service class. In *Industrial Man*, ed. T.Burns.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Ehrenreich, B., and J.Ehrenreich. 1979. The profession-managerial class.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 P.Walker.Boston: South End Press.

Eldridge, G.C. 1973. *England's Mission*. London: Macmillan.

Eley, G. 1978. The Wilhelmine Right: how it changed. I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ed. R.J.Evans. London: Croom Helm.

1980.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Some thoughts on the nationalist pressure groups in Imperial Germany. In *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 ed. P.Kennedy and A.Nicholls. London: Macmillan.

Emy, H.V. 1973. *Liberals, Radicals and Social Politics, 1892—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st, W. 1981. Jingoism and xenophobia in the electioneering strategies of British ruling elites before 1914. In *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 ed. P. Kennedy and A.Nicholls. London: Macmillan.

Fieldhouse, D.K. 1973.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Freidson, E. 1970. *Profession of Medicine*. New York: Dodd, Mead.

1975. *Doctoring Together: A Study of Professional Social Control*. New York: Elsevier.

Gaillard, J. 1981. France.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Galanter, M. 1983. Mega-law and mega-lawyering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In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ed. R.Dingwall and P.Lewis. London: Macmillan.

Galbraith, J.K.1985.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4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eiger, T.1969. Class society in the melting pot. In *Structured Social Inequality*, ed.C.S.H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Gellately, R. 1974.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Sage.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Gildea, R. 1980. Education and the classes Moyenn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Making of Frenchmen*, ed. D.Baker and P.Harrigan. Waterloo, Ont.: Historical Reflections Press.

Goldthorpe, J.H. 1982. On the service class, its formation and future. In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d.A.Giddens and G.Mackenz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de, W.J.1969.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n *The Semi-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 ed.A.Etzioni. New York: Free Press.

Gray, R.Q. 1977. Religion, culture and social class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dinburgh. In *The Lower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1870—1914*, ed.G.Crossick. London: Croom Helm.

Grossmith, G., and W. Grossmith. 1892 and 1965. *The Diary of a Nobod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Halsey, A.H., et al. 1980.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rrigan, P. 1975.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s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

Harrison, J.F.C. 1971. *The Early Victorians, 1832—1851*.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art, N. 1985.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Medicine*. Ormskirk, Lancs.: Causeway Press.

Haupt, H-G. 1981. République Fédérale Allemande.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Healy, D.F. 1963. *The United States in Cuba, 1898—190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U.S.Expansionism: 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obsbawm, E. 1989.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Vintage.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ingsworth, J.R.(ed.). 1983. *American Expans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ist or Anticolonialist?* Malabar, Fla.: Krieger.

Howard, M. 1970.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his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Temple Smith.

Hurt, J. S. 1979. *Elementary Schooling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60—191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Illich, I. 1977. *Disabling Professions*. London: M.Boyars.

Jaeger, C.1982. *Artisanat et Capitalisme*. Paris: Payot.

Jarausch, K.H. 1982. *Student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Rise of Academic Illiber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German professions in history and theory. In *German Professions, 1800—1950*, ed.

R.Cocks and K.H.Jaraus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T.J. 1972.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Joll, J.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Kaelble, H.1981.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in Europe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ed.P.Flora and A.J. Heidenheim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Kaufhold, K.H. 1981. République Fédérale Allemande.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ᵉ et XXᵉ Siècles*, 2 vols. Paris.

Kehr, E. 1977. *Economic Interest, Militarism and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nnedy, P.1980.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Kiyonari, T. T. 1981. Japan. In th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ᵉ et XXᵉ Siècles*, 2 vols. Paris.

Klingender, F.D. 1935. *The Condition of Clerical Labour in Britain*. London: M.Lawrence.

Kocka, J.1980. *White-Collar Workers in America, 1890—1940*. London: Sage.

Krug, E. 1964.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New York: Harper & Row.

Kurgan van Hentenryk, G. 1981. Belgique.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ᵉ et XXᵉ Siècles*, 2 vols. Paris.

LaFeber, W. 1963.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sch, C. 1958. The anti-imperialist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inequality of ma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4.

Lash, S., and J.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Little, A, and J.Westergaard. 1964. The trend of class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5.

Lockwood, D. 1958. *The Blackcoated Worker*. London: Allen & Unwin.

Mackenzie, W. 1979.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Health C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Keown, T.1976.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London: Arnold.

Maingueneau, D. 1979. *Les Livres d'école de la République, 1870—1914*. Paris: Sycomore.

Mangan, J. 1986, "The grit of our forefathers": invented traditions, propaganda and imperialism. In *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ed. J. MacKenzi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yer, A.J. 1975. The lower middle class as historical problem.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7.

Middleton, N., and S.Weitzman. 1976. *A Place for Everyone*. London: Gollancz.

Mills, C.W. 1953. *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dy, J. 1978. *French Education Since Napoleo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Moore, D.C. 1976. *The Politics of Deference*. Hassocks, Sussex: Harvester.

Mosse, G.L. 1964.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uller, D. 1987. The process of systematisation: the case of Germa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 D. Muller, F. Ringer, and B. 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sgrove, F. 1959. Middle-clas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2.

Nichols, T. 1969. *Ownership, Control and Ideology*. London: Allen & Unwin.

Nikolaou, K. 1978. *Inter-size Efficiency Differentials in Greek Manufacturing*. Athens: Center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Research.

Nord, P. 1981. Le mouvement des petits commerçants et la politique en France de 1888 à 1914. *Mouvement Social* 114.

Parkin, F.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Perkin, H. 1961. Middle-clas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ritical not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4.

Poulantzas, N.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Prais, S.J. 1981. *The Evolution of Giant Firms i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ice, R.N. 1977. Society, status and jingoism: the social roots of lower middle class patriotism, 1870—1900. In *The Lower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1870—1914*, ed. G. Crossick. London: Croom Helm.

Pryor, F.L. 1973. *Propert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N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eeder, D. 1987.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n England, 1869—1920.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D.Muller, F.Ringer, and B.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nger, F. 1979.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On segmentation in modern Europe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French secondary education, 1865—1920.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D.Muller, F.Ringer, and B.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 R.E. 1959. Imperial problems in British politics, 1880—189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Ⅲ, ed.E.A.Benians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uth, B. 1965. *Occupation and Pay in Great Britain 1906—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Occupation and Pay in Great Britain, 1906—1979*. London: Macmillan.

Rubinson, R. 1986. Class formation,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Rueschemeyer, D. 1973. *Lawyers and Their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Germany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yan, M. 1981. *Cradle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Family in Oneida County, New York, 1790—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ystad, G. 1975. *Ambiguous Imperi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Stockholm: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Books.

Schleunes, K. 1989. *Schooling and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in Prussia and Bavaria, 1750—1900*. Oxford: Berg.

Scott, J. 1979. *Corporations, Classes and Capitalism*. London: Hutchinson.

1982. *The Upper Classes. Property and Privilege i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Simon, B. 1987. Systematisation and segmentation in education: the case of England.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D.Muller, F.Ringer, and B.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nger, B. 1983. *Village Notable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riests, Mayors, Schoolmast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mith, R. J. 1969. Education, society and literacy: Nottinghamshir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istorical Journal* 12.

Steedman, H. 1987. Defining institutions: the endowed grammar schools and the systematisation of English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 D.Muller, F.Ringer, and B.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wart, A., et al. 1980.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Occupations*. London: Macmillan.

Summers, A. 1981. The character of Edwardian nationalism: three popular leagues. In *Nationalism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Before 1941*, ed.P.Kennedy and A.Nicholls. London: Macmillan.

Sutherland, G. 1971.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Tholfsen, T. 1976.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Waddington, I. 1977.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d consultant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e sociology of an inter-professional conflict: In *Health Care and Popular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ed.J.Woodward and D.Richards. London: Croom Helm.

Wald, K. 1983. *Crosses on the Ballot: Patterns of British Voter Alignment Since 188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eber, E. 1968.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in France, 1905—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hler, H.-U. 1979. Introduction to imperialism. In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ed. C. Emsley. London: Croom Helm.

Weiss, L. 1988. *Creating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Small Business Since 1945*. Oxford: Blackwell.

Welch, R., Jr. 1979.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Wertheimer, M. 1924. *The Pan-German League 1890—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hyte, W.M.1956.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Winkler, H. A. 1976. From social protectionism to National Socialism: the German small-business mov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Wright, E.O.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第十七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880—1914年(一)：英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1880至1914年间，大部分西方国家经历了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见表8.2和8.4)农业发生了变化，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和海外的人口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大城市出现，高科技产生，尤其是综合技术应用于三个工业部门——钢铁业、金属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农业和工业产品在国内通过公路，在国际上通过蒸汽船输送到各地。银行和证券市场用闲散的资金在全球投资，然后以利润的形式获得收益来提高消费。因此，第二次工业革命加强了各地的经济统一，尽管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因素，从总体上意向不明。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改变了社会。集体权力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整个西方大众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并稳定的保持在基本生活水平之上。因此，人均寿命开始了显著迅速地延长。从1870年平均40岁——这可能仅代表另一个像马尔萨斯历史周期那样的最高点——到1950年增长到70岁。女性的平均寿命超过了男性。社会日益城市化、工业化。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经济权力关系的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引起的。

整个这一时期，在我们的理论中必然有经济决定论的成分。

经济革命也改变了分散的权力关系——这是接下来三章的主题。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阶级力量在不断增长，而且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政治化。首先，土地所有者、商人、工业资本家联合成为资本家阶级；正如我们看到英国已发生的那样(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和德国正在发生的那样(参阅第九章)。第二，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员和流动职业者正融合成为中产阶级(参阅第十六章)。第三，大土地所有者阶级融入了全球的商业资本主义并且卷入了所有的阶级冲突之中(参阅第十九章)。现在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均衡的分离。(只有英国例外，是唯一的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因此我把这种双重性留到下面的这章节中。)第四，工人阶级运动的出现，主要集中于冶炼行业、采矿业、交通业，并是工人阶级运动在职业和政治方面集体组织起来。在这种体制下的阶级斗争——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政治化。正在成长的国家基础设施的权力，公民权的出现，和各国资本部分限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所有这些都变成了国家组织内的冲突。阶级之间变得更加对立，阶级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个别权力关系得到变革——这个过程实际上开始于18世纪晚期，完成于20世纪初期。

然而，这些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分散权力关系革命实际上比马克思意识到的更为不明确。我们在第十六章中看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兴起有点支离破碎。第十九章中证明土地所有阶级(除大农场主之外)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城市工业阶级的关系尤其多样化。这一章和下一章也将证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集体组织中，在意识升华和政治观点方面——实质上并不明确。就组织而言，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加强工人阶级组织而且还加强了三种形式的工人组织、阶级组织、地方性组织和部门性组织。实际上，产生阶级化趋势的核心工业是最注意区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上是最注意部门性的。这三种组织都是关于政治性的新型组织，是在经济权力关系各个方面真正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组织联合起来并未像马克思设想的那

样向统一的革命运动发展——也没有像其他作者设想的那样进行改革——而发展成为十分模糊的个别权力关系。西方社会学家采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那些模糊的问题。解释那些方法是下一章主要的理论目的。

这一时期的模糊性最明显地表现在工人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在表15.1中，我区分出服从现在资本主义的工人(和农民)的三对策略。这三对策略在整个这一时期都摇摆不定。这两个富于斗争性的策略并不是在寻求改变，而是同资本主义展开竞争。从经济角度说，这些策略是保护主义的，在劳工运动中以最温和的形式存在。于是，工人们结合在一起组成合作社和提供福利和保险的互助金。在此，这种策略转向政治化时，为工人企业和组织权利(集体公民权)而向政府寻求帮助时，我称它为“互助主义”。改革家也实行两种策略。从政治上——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进行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我把这称为社会民主，这一政治上的策略在这一时期仍然罕见。比较常见的是经济策略——工业上的调解和集体就工资和条件达成一致协议——我将此称为经济主义。这一对革命策略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集权论者所看到的，通过政治革命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也是工团主义者、工联主义者所看到的，通过迂回国家的一般经济打击所取得的革命成就。

所有这六种策略对于进入现代雇佣关系的工人有着明显的吸引力，甚至革命者也要为维持日常生活而同雇主合作。他们也不反对互助金、投票箱、失业保险、免费教育或者其他保护主义、改革主义的诱惑。甚至主张和解的工人一直都发现资本主义总是将财产权置于首位，如果资本主义市场力量发威的话，工人就会受到粗暴的待遇或者予以解雇。然后他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价值论和替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方案。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人接受国家主义的方案，因为他们没有与对工人友好的政府打交道的经历。像霍尔顿(1985)提到的那样，可能工团主义尤其适用于那几十年，尤其是管理权延伸到非产业的工人，他们不习惯有纪律约束的工厂生活和有规章制度的工会。到1914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工人或雇主的策略制度化。所有的策略

都行得通，吸引着各种竞争的激进团体，从而分配权力关系极为模糊。

对于工人的各种选择方式的吸引关键在于这种统治制度下的政策漂浮不定。资本家虽然不愿作任何让步，各州的资本家都联合起来，各州运用立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手段来支持资本家，如果工人们顽强抵制，集体组织起来造成劳动力匮乏，并且同其他阶级结成联盟，那对于政府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如果资本家仅仅是压迫工人，那么改革和互助主义将没有任何成果，所有的工人也将处于相同的境况下。工人们可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无能为力的局面，退而转向掩饰最少的保护主义，他们也可以参加游行，集体罢工或进行政治革命，就像沙皇俄国发生的那样。大部分雇主和管理机构也都意识到其他的策略。他们更加小心翼翼地压制工人——实行有选择的部分压制。资本家需要工人的合作，国家精英需要工人们顺从地纳税、服兵役和遵守公共秩序，政党需要拉选票。资本家可能会和工人们和解，其他政府形式可能劝说并迫使国家精英和政党进一步妥协。因为工人和农民拥有不断变化的组织力量，资本家、国家精英、政党可能作出实用主义的、有选择的反应，加强地方主义，同那些有技术，有财产或有选举权的工人进行和解而压制其余的工人。

地方合作政策一旦实施，保守派、经济学家和互助主义者就会比革命者占优势。集体罢工和政治革命——甚至是机构改革的迫切要求——需要人数上的分量和阶级团结。与此相对，“温和派”和地方主义只需要资本家、精英或政党分子对某些工人们作某些让步以便使革命的幽灵减退。一旦这些工人通过这种方式获益，他们就不可能站在革命者一边。阶级团结现在被打破，革命的幽灵又消退了。只要某些资本家，精英和政党同某些工人妥协，保护温和的改革，地方主义、部门主义，革命势力的削弱从长远来看，会比革命更有可能实现。

但是，这种可能性现在看起来似乎减少了。1883年马克思去世不久，他的理论得到了证实。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他所预料的“集体劳工”。实际上，这是它的第二次出现。但是它不像第一次宪章运动

时的工人组织，这时的工人阶级是由大的资本主义工厂和国家企业中的正式职工组成。尤其是来自冶炼业、采矿业和交通业的正式职工组成。手工业者大部分都消失了。技术的区别仍然存在着，但是它们受到半技术工作的调和，所有这些都被同一工资和经理制度连接为一体。这一革命也具有宏观的经济后果，并且加剧了国际竞争。雇主们反对过时的技艺保护主义，他们想出"科学管理"的方法来控制劳工，有时借助于司法和警察压制的方法。这些攻击增加了确定工人阶级身份的可行性，然而也经常会对它无能为力。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熟练工人的反应。他们会不会运用其组织和劳工市场的剩余力量来寻求他们的保护主义的部分利益？他们会不会像马克思坚信的那样，同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阶级运动？资本家和国家精英政党面临着两种同样重要的选择：冒压制所有工人会激化阶级斗争的风险或者是同部分有威望的工人妥协去压制其他工人。在下两章中，我研究了这些策略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我认为各种形式在解释结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分散的权力关系方面的经济革命仍保持着其内在的不明确性，要完成经济革命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帮助。我从"权力先锋"开始，即这一时期前半期的先锋国家，唯一的工业化社会的国家以及产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会运动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对英国劳工的增长所作的解释

可以将这一阶段劳工的大体情况简单总结一下。[1]第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 18 世纪 80 年代晚期随着新工联主义出现而产生的。新工联主义更富于激进性，它吸收了非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变得更加广泛和政治化，部门化越来越弱。这一运动在 1890 年以后被遏制，然后稳定下来，又不断发展，尤其是从 1910 年以后不断发展壮大。

但是工会成员90%都是男性，女性成员只是在1888—1914年间，从2%增长到10%。甚至在纺织行业和教师行业大部分职员也都是男性。工会男性手工劳动者增长非常引人注目，由12%增长到32%。这500万人组成了工人阶级的核心——他们在工厂督导团监督下的工厂里，在采矿业和运输业中工作，其中工会成员占大多数。在政治上，工会首先与自由党合作。然后有一些工会组成工党为工会谋取利益。到1914年，一多半工会成员加入了工党，1910年在战前的最后一次选举中，工党通过斗争在56个工人阶级选区中赢得了42个选区——尽管是在与自由党的选举协定的帮助之下取得的。在这一时期以及以后的时期，劳工通常被描绘为改良主义者，经济学家工会将经济与社会民主的工党联合起来。但是，它的政策更加温和，它的经济策略通常介于经济保护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然而，互助主义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这些都同少数派的趋势竞争：马克思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在满怀希望地鼓噪着，而随着劳工组织的影响渗入政府机构里，便产生了一种没有想到的改良主义。

我们先从工会开始，许多历史学家借助于第十五章中马克思的四篇论述来解释工会的成长。他们论述道：

1. 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定型分析扩散到整个经济，它替代了更加多样化的生产关系。

2.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劳动过程的转变导致“集体劳工”出现，形成了单一的工人阶级。

3. 这种情况由于城区工人居民区密度增大和隔离得到加强，尽管也有人指出这造成了一种主要是“防御性”的团结。

4. 劳动过程的转变产生了政治上的要求，这种政治要求由于工人阶级的社区得到了加强。这就使劳工组织向改良主义的工党转变。

在第十五章中我在五个方面批评了这种模式：

1. 出现的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带有竞争性的“集体劳工”组织——工人阶级、部门技工和国内劳动力市场所造成的部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相

互依赖。

2. 在这种模式中有种紧张不安的关系，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领域里的扩散，尤其是表现为工厂劳动过程中的权威性组织的场所。在早期，扩散比劳动过程更能决定工人阶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强调劳动过程的转变。我不同意这一点。

3. 由于这种经济主要是在民族国家的领域里占优势，它的各种政治定型也起到了决定劳工运动的作用。

4. 从更深层意义上说，劳工运动的出现是区域性的。它的参与者主要是男性，而且主要以雇佣劳动者为主。由于生产的转变，这影响了行业和某些社区劳工运动的联系。

5. 所有这些后果是，阶级冲突通常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是对抗性的，要用辩证法解决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通常情况下也会集团化和区域化，从而产生更复杂和竞争性的后果。我认为工人阶级通常情况下一般会失去阶级对抗性。

本章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阶级的身份；但这仅仅是一部分；它将雇佣关系与家庭、社区分离，将男性与女性分开。但是结果却也取决于政治的定型。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形仍不明确，但是其他的国家成形却不这样。国家的非军事化——其他文职范围的扩大，极力将军国主义推向国外和(爱尔兰)各地区——以及它的政党民主与更集中地解决民族问题(除爱尔兰问题外)的办法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都促使劳工奉行温和的互助主义。主要是因为不同运作者没有想到的结果，改良主义最终成为英国工人的主要策略，但仅仅是在大战期间和大战之后。

工人阶级社区和民族平民社会

到 1900 年，工业化大大影响了居民社区，工业化减少了本地特殊

的部门控制，并且从生态学上进一步将工人同其他人分隔开来。城市发展快于经济的集中。到了1901年，大部分工人居住在人口超过2万的城镇中而其工作的同事却不足50人。有75个城镇的人口超过5万，每个城镇都有很多雇主，都缺乏内聚力并且缺乏部门的社区控制。在这些城镇中，大部分有组织的冲突都发生在稳定的工厂或车间中。这也许涉及到约一半工人，剩下另一半工人仍处于区域控制之中或者无固定工作。电车和火车也将中产阶级带往市郊远离了工人。等级制度不再是在某地，而是跨地域重新产生，甚至是在区域内部产生。资本家集中在伦敦、保健的温泉区、海滨和南方。而工人集中在北部充满烟尘的工业区。为了社会秩序有必要对偏远地区进行管理，因为工人们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意识。

斯特德曼—琼斯(1974)认为自19世纪90年代起，一种明显带有防御性的工人阶级文化主宰着大城镇。传统的部门性控制，如慈善学校、夜校、图书馆、互助会、教会和自由教堂让位于国家教育、公立图书馆、体育报道、赛马报道、足球赛和音乐厅。他认为音乐厅的歌曲表明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变得具有防御性，内在的转折加强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而远离激进的社会主义。(工人们远离了想象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这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十分困惑。)

有证据证明了这一点。社区工人意识到他们不同于小雇主。尽管1900年以前在普莱斯顿大部分投票的工人是托利党的人，他们不想同中产阶级的保守党同流合污，工人们建立了自己的保守党人俱乐部(Savage, 1987, p.413)。然而他们的社区并不仅仅是设立障碍。工人家庭迫切加入到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消费市场中，在1870年到1890年间，商品零售价下降了20%，周薪提高了20%(Feinstein, 1976，表65)。商店和分散贸易使全国市场和统一的广告牌遍布城镇、地区甚至全国。地方保护主义消费和信贷网络仍然存在，但家庭也加入到国家经济消费者的行列，家庭消费市场的控制扩散了，成为非个人和国家化了(F.M.L.Thompson, 1988)。体育运动从乡村转移到

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娱乐行业，职业足球成为其核心部分。这里，直接的地区管理削弱了市场的力量，足球、板球和其他俱乐部都由当地的名人经营(Hargeaves, 1986)。体育成了各个阶级政治活动家的流行语——“这可不是板球”。“这是击打腰部以下的犯规行为”——这些都是共同的注重“比赛规则”的证据(Mckibbin, 1990b)。这些发展并未将工人们隔离开来，却使他们融入了国家的主流。

生态上的阶级隔离，一半男工人享有选举权，公开选举权使工人涉足政治。但到目前为止，阶级合作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集中在熟练工人和中产阶级的自由党和不信奉英国国教者之间的合作。现在政府的主要民事活动就是教育。越来越多的工会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同自由党人和非国教徒合作担任本地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文化普及率剧增。1900 年，已婚者只有 3%不会在登记册上签自己的名字。与此相对照 1860 年有 3%(Stone, 1969)。从 1892 年起，义务教育促使工人更多地参加到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来。

工人社区中男女之间的隔离看来有所加强。这一阶段，女性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化普及的最后一次浪潮主要在工人的女儿们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使女性参加到国家的文化生活中。现代节育办法开始普及，死亡率颠倒过来：不再是女性比男性早去世，而是女性开始比男性长寿。工资增长，物价降低和消费经济意味着女性依靠男性维持生活的程度降低了。女性的身体状况能承受住生育(Hart, 1989, 1991)。男性维持整个家庭的经济，尽管他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再那么重要。在家庭中主要有两种习惯，或者是男人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女人以作家庭花费，剩下的留给自己自由支配，或者是他们将所有的工资都交上去，再得到固定数额作为己用。大部分女性找到临时的兼职工作，她们一般把挣到的少量工资用于家庭或者是个人消费。消费分为两部分：男人的自由花费和女性的家庭开销。酿酒，运动和烟草行业为男性提供了娱乐活动：“拥有体面工作的男人聚到一起，他们穿着便装，戴着手表手链、戴着礼帽，远离工作，这时女人主管家庭，”

达维多夫谈道(1990, p.111)。

减轻广大工人在社会雇用中的压力，难道会使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分离和更具有冲突性吗？ 我们必须警惕把早期阶段浪漫化。 节制仍是19世纪女性的首要原则，所以一些隔离和冲突长期存在。 然而在职业两极化的这一阶段，女性和男性的社会生活仍是部分隔离的。 前面章节表明，在早期小资产阶级的骚动和民权运动中，社区加强了阶级运动的整体性。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缺乏这种力量。

因此，社会的发展趋势相当复杂，阶级居住区和文化有点处于分离状态。 有些看起来是内在的和具有防御性的，有些鼓励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性，有些鼓励工人参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党民主生活。 男人和女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 但总体来说，家庭和社区生活并不只是简单的雇佣趋势向阶级极端化的趋势发展。 不像国家那样，阶级变得越来越广泛却越来越分散。

资本和劳动力的经济策略

集体劳工的论著强调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人的非技术化过程促进阶级发展的作用。 我现在是批判地评定这些论著。 它阐明雇主们用机械化和理性化生产来限制技工的特权，它抑制技工，同时提高新兴的半技术工人，这两个群体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一起参加到内部的劳工市场中。 技术工人都很激进，半技术工人，甚至一些非技术工人开始形成自己最早的工会。 他们首先是在“新工会”中，然后更长时期在激进的老工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中逐步融为一体，这是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以普赖斯为其代表(1983—1985)，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佩林(1963, pp.85—86, 98—100)的赞同。 此外还有格雷(1976, pp.167—169)、克罗西克(1978, p.248、1981, p.162)、贝恩斯(1981, p.162)、亨特(1981)和塞恩(1981, p.230)。

他们的论点在20世纪70年代工业社会学家中盛行的劳动过程和非技术化理论中得到了共鸣（例如，Bravorman, 1974; Fridmann, 1977和Buravay, 1979; Hill, 1981, pp.103—123给予了关键性的解释）。这些理论以制造业的大公司作为典型来描写20世纪早期劳工形成过程。在当前社会学对这一阶段“福特主义”的理论的强调中业已引起共鸣，该理论以1907年福特汽车公司大批量生产T型车为例。利用的经典理论，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作为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同目前的时代形成对照，他们认为目前的时代是“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和“灵活的重组”。

爱德华时期的英国公司与这一理论似乎格格不入，乔伊斯(1989)和麦基宾(1990)观察到在生产、采矿、交通等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只有一半，另一半劳动力在商业领域、小规模的出版行业或是仍“在街道上”工作，同工会没有接触。甚至典型的生产企业或是家族公司的联合(私人公司)。只到20世纪20年代联合公司才占据优势。1905年在资产方面最大的50个生产企业中，有28家企业生产饮料和进行蒸馏生产(其社区的重要性在前面我已经取得强调过了：10家纺织企业，只有23家企业生产工业品(Payne, 1967, p.527;参见Ashworth, 1960, pp.90—102)。大约有100多家公司，每个公司雇用了3 000个工人，分布在平均每个公司的3家工厂中。

在所有国家中，甚至最大的工厂在国家组织面前都会显得相形见绌。排在军队之后的最大部门是邮政，1908年邮政拥有11.4万工人，比任何一个私有企业的工人要多4倍。在10个最大的生产企业中，国家拥有2个(皇家造船厂和皇家兵工厂)。另外8个企业，每个都有1.3万名雇工，这8个企业类型多样化：2个纺织企业，每个企业有25个多厂，3个铁路公司或工厂；2个同国家关系密切的军械公司，另一个是工程公司。第11位的是联合批发协会(Shaw, 1983)。如果把采矿企业包括在内，这两个采矿企业将排在前10位(Taylor, 1968, pp.6—65)。如此多样的企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吗？

是的，相对大一些的企业都用蒸汽动力，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象征，但是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蒸汽动力才占据主导地位。蒸汽机用于交通业之外的行业在1870—1896年间增长了25%，在1870年有一半多蒸汽机的应用仅限于纺织业，到1907年低于1/5，蒸汽尤其应用于采矿业、钢铁业、机械制造业、造船业和铁路以及公用事业。但是其他能源也出现了，直到1907年，有1/4的发动机是由电力驱动的，煤气和内燃机(煤气和油作燃料)在小企业中战胜了蒸汽(Ashworth, 1960, p.86; Musson, 1978, pp.166—170)。使用这些初级动力的技术改变了整个经济的工作地点，从主要的生产过程中淘汰了手工劳动。根据1901年统计，国内失业率减少到2%(主要是服装行业的失业女工，但是这个数字很可能低于实际数字)。这些技术使个别工作实现了机械化(尽管两台机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在工业中心及其周围地区工人的工作任务也得到改变，工作时个人技术的要求降低了，操作机器的压力增加了。但是它不仅仅在制造行业，也使整个国家经济的雇工统一。这些主要的动力机械需要大量的煤，在各工作地点以外均需要煤的运输及贮备。尽管制造业仍然停滞不前，但是采矿、交通和分流业则不断增长，正如在表17.1看到的那样。

表17.1 英国劳动人的工业分工

	1851	1881	1911
农业，林业，渔业	21.6	13.0	8.6
矿业，采石业	4.1	4.6	6.5
制造业	33.0	32.1	33.3
建筑业	5.2	6.9	6.5
贸易与运输	15.5	21.4	21.5
公共服务，专业人员	5.2	6.1	8.1
家庭，个人服务	13.4	15.3	14.0
百分比总和	100%	100%	100%
工作总人口(百万)	9.7	13.1	18.6

资料来源：Deane and Cole, 1969, p.143。

唯一减少的阶层是农业工人，但制造业雇佣工人同总人口和雇工人数的增长保持同步，制造业工人的增长比率落在采矿、贸易、交通、公用事业和专业人员后面。 1907 年对生产的调查显示，采矿业的净产值是 1.6 万英镑，使其他的大企业相形见绌：工程业(500 万英镑)，棉纺织业(4 500 万英镑)，建筑业(4 300 万英镑)，钢铁制造业(3 000 万英镑)。采矿业雇工增长的人数比 1850—1919 年的总量还多，这表明当时是劳工人数增加，并非现存劳工的工作强度增加了——可能这在大多数第三产业内也是如此。

贝恩和普赖斯(1980)提供了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工会成员的统计表。 我把从克莱格等人(1964, p.1)得到的关于 1888 年的数字加进去。通过工会的密度水平——即工会新成员的潜在比例，我发现了两个关于工会权力的原始标志物。 对于工会来说，那就是工厂中的劳动力；对于整个劳工运动来说，那就是一个国家的非农业劳动力。

1. 在 25%的密度水平时，工会变成重要的部门性权力运作者。 雇主仍然能绕过他们对工人实行家长制式的控制；但是现在这样做就要冒险。 动员它们成员的工会现在就可能分裂。 如果在危急状态下，它们还能动员非工会成员，这样将导致广泛的阶级冲突。 如果通过技术、工业，或通过宗教、伦理信仰，或通过社会身份，将工会成员同非工会成员隔离开来，这风险就会降低。 雇主进行公司合并并向有组织的可控制市场的工人作出让步，即严厉制裁其他工人。 英国的地方主义主要是用技术，有些地方用种族(如英国反对爱尔兰)。

2. 在 50%的密度水平时，工会成为阶级的运作者，工会可以领导整个工人阶级。 这是政府可能更倾向于订立国家或地方协议，分而治之的策略已经不太现实，如果不愿妥协的话，剩下的办法就是大规模镇压，而这样做法往往代价颇高。

1888 年，全国的密度只有 5%， 3/4 的工会成员集中于 4 个工业行业中：工程业和造船业(25%)，采矿业和采石业(20%)，纺织业(16%)，建筑业(12%)。 除了采矿业超过 50%，工业密度都在 20%以下。 只有

采矿业工会接近于将所有阶层联成一体，尽管有些企业技工仍存在部门性权力这种现象。从全国意义上说，这意味着部门性、通常是技术性权力运作者的松散联盟，它能使重要企业分裂，但却不能瓦解阶级之间的敌对——就像这一时期所有国家的劳工运动那样。政治体制和资本家可以试图通过全方位的压制，而取得某些成功：在采矿业和一些技工中使用军队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小规模的抵抗会被孤立起来。换一种做法，将这些工会进行地方性的合并就可以避免普遍的让步。

仅仅在1888年后的四年中，“新工会主义”成员增加了1倍，达到了150万人，在密度上达到11%。采矿业和工程造船业，各占全国成员的21%，是棉纺织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人数的2倍。“新工会主义”成员密度呈曲线上升。直到1901年，它的比例是19%，然后比例保持稳定。到1911年，工会成员达到了10万人，密度达到19%。采矿业居于领先地位，交通业工人人数跃居第二位——铁路业工人(其密度稳定增长)，公路运输业和海运工人(有两次人数猛增的时期即1888—1892年和1910年以后)。建筑业工人被地方政府和教育行业的工人超过。到1914年，建筑业成员才再次增长到410万，密度增长到25%。在所有这些工业部门以及在煤气、印刷和邮政行业中，密度现在都高于5%。

工会成员仍然是男性，1901年，女性占劳工的3%，但只有8%是工会会员。1914年，男性密度为32%，女性为9%。这里所给的女性密度比例偏低，男性的密度比例偏高。在制造业，采矿业和交通业这些核心工业中男子的比例还要高。女性被排除在可能产生工会的雇佣关系之外。1911年，被雇用的女工39%仍是家庭女仆，然而，许多激进分子具有煤气工人领袖威尔·托雷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女人不会成为优秀的工会会员，因此，我们认为把精力花在工人组织上会更好(Hinton, 1983, p.32)。

总之，工会首先在各个部门地位变得重要，然后成为阶级的运作者，遍布一些重要行业，但仅仅是在男性工人中。工会在采煤业中力

量最强大，然后是工程业、造船业和铁路行业、棉纺业、再后是建筑业和政府部门。 现在在采矿业中，甚至部门性的镇压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可能失败，而在其他主要行业中也是很危险的。 雇主在对付女雇员时相对来说仍是随心所欲。

我开始讨论个别工会同企业的斗争，这为集体劳工理论提供了一些支持。 早期的建筑业工会是在小的，分散的工地和流动的劳动力之间发展起来的。 像第十五章所说明的那样，各行业之间的工会组织在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曾经非常普遍。 建筑业工会现在落后了，但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个人技术要求的降低，尤其是在泥瓦工和石工中，扩大了工团主义并引入了激进的工联主义——但延续至惨重失败(Holton, 1976, pp.155—163)。

工程业受到劳工形成过程变化的严重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双重的。 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尽管这种影响是双重的(Burgess, 1985)。 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大批量生产对机器商店产生重要影响。 许多新的塔吊和纹盘机，然后是机械铁床、磨床、钻床，都是由半熟练的技师操作，技师取代了熟练的钳工和锻工，随着现场学习的增加，师徒关系减弱。 然而，这些机器也提高了维修工人和机器制造者的技术。

这种情况转移而非冲淡了技术，并打破了旧的部门领导和寻求各层面团结的新的激进分子之间的联合。 雇主们趁着这一阶段的不团结发起了攻击，声称他们应像美国和德国的业主那样有权做“自己工厂的主人”。 19 世纪 90 年代，他们在整个国家内组织起来，1897 年鼓动工程师联合会为八小时工作日而罢工。 雇主选择了滞销的一段时间。 六个月以后，工程师联合会按照提出的条件妥协，撤回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承认雇主给工人分派机器的权利。 工程师联合会接受的学徒减少，而半熟练工人增加(到 1914 年工人队伍中半熟练工人占 20%)，还接受了计件工。 由于不能破坏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会仍然保持分离状态。 工会的许多分会要求制造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共同规章制度，并吸收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作为他们的成员。 雇主的胜利渐

渐鼓舞了不同阶层之间更广泛的团结。然而到1911年，工程师联合会重新恢复了工会，新的麻烦又开始酝酿。

雇主的攻击扩散到设立技工工会的其他工业部门——造船业、印刷业、制鞋业和家具生产行业。由于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整个19世纪90年代，雇主们组织起来，他们利用贸易循环来选择对抗的时机。他们的两个主要策略是：运用权威的国家组织，利用无序而分散的国际市场，他们的阶级力量有两个领土上的来源，即国家的(很快成为他们的主要薄弱地区)和跨国家的(最终成为他们力量的主要地区)。

虽然有些雇主试图捣毁工会，但这几乎不可能。英国雇主的策略开始时或多或少地同任何一个地方雇主的策略有相似之处。但是英国的技工工会比其他国家的熟练工人有更多的武器进行战斗。他们的历史悠久得多，在罢工谈判和国家精英和政党方面均根深蒂固。他们通过影响立场来提高集体公民权。1874年以后，再一次是1906年以后，英国法律要比其他主要国家的法律对工会罢工和罢工纠察有利。因此英国雇主被迫采取了经济策略，雇主被剥夺了司法权力或者警察压制工人的权力。他们没有得到公众的同情，而且来自政党和政府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劳工冲突中协调解决。

也没有任何一方的经济武器能够完全理想地适用于战争。大部分改组和机械化出现在那些非传统的公司，这些公司的雇主很少与那些老牌的技术工会对抗。比较新的工会部门像制造业、木材加工业、制鞋业、服装加工业、稀有金属加工业、自行车、电力和发动机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化学工业等等。在这些行业中产生了新的技术级别，这些产业工人的技术得以提高而不是像手工匠那样降低。这些技术是真正稀有的技术，但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要比通过学徒学到的更多。在他们的中心地区，在工程业已长期建立的地区，手工技工仍未遇到挑战，他们能控制学徒工，他们同学徒工的报酬也不一样，这种关系保持得相当稳定(Penn, 1985)。

然而有一些变化是普遍的。在任何地方，技工失去了受雇和解雇

的权力，失去了订立契约的权力。非技术工人从普通工作加入到相同的生产组织中，所有级别的工人都拿工薪，并且有类似的雇佣条件。不再像原来的手工技工那样，工人已没有阶层之分。手工技工工会只有放弃新的工业部门，新的熟练工人和未熟练工人才能维持完全的部门主义，这是他们不愿做的。雇主拥有的非罢工工人比其他国家更少。农业已被剥夺了劳动力，只有爱尔兰组成了“农业”劳动力(许多雇主采用英国效率低的爱尔兰模式)。雇主也援助新的熟练工人。他们在整个行业内部的劳动市场雇用熟练工人，这些工人在他们的劳动力队伍中都是些有责任心的工人。在这种交流中，雇主控制劳工但变得依赖技术工人。工人得到雇佣保障而且雇主的专断权也下降了。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雇主能够像美国那样理顺法庭和议会力量的话(参看第十八章)，大部分雇主将会坚定地争取无工会工厂。但因为英国是国家法令制定平民化的国家(像第十二章证明的那样)，他们做不到。许多雇主只能同工会谈判。到 1875 年，工会和谈判规则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合法地位，这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早。在给皇家委员会的证据和与当时调查者的谈话中，雇主们均认为工会是不会消失的。正像一个作者在 1906 年所提到的。

> 我在德国或美国……从未听到过雇主说一句支持工会的话。雇主憎恨和害怕工会。在英国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绪。我曾听到不利于工会的批评，有时有谴责，但是没有仇恨。我更常听到的是雇主和经理对工会公平甚至是友好的观点。(引自 Mckibbin, 1990)

工会也会寻找盟友，他们把目标对准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并吸收更少技术的工人加入工会。他们朝着政治和非技术工人努力——这是新工会主义的两大特点。

这些都是集体劳动力产生于以工厂为主的劳动过程这一观点的全部

证据。工会增长的其他领域都无法以此解释，开始出现的阶级意识的特点即使在这些行业内部也不能只用这些术语来解释。我现在转向其他工业部门。

采煤业是最主要的部门。英国矿工联合会的成长是以地方联合会为代价的。这部分是矿主对国家组织的反应，即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又因为联合会支持联合各阶层的两大传统要求，即坚持八小时工作日和反对用滑准法按煤的价格来计酬。采矿业工会也已朝着政治联合的方向努力，这是由1884年郡选举法案开始的独一无二的地理中心位置使他们通过选举议会“自由党—工党”成员未影响共同的政党民主。

所有这些在1893年大罢工中是显而易见的。采矿业工会抵制按滑准法将工资降低25%，并且全国性的停业。在议会中的自由党—工党议员的警告和压力下，政府进行了干预，显然这是自由放任政策胜利之后的首次工业争端。随之发生的和解确实是工会的胜利。罢工鼓励了一线采煤工(他们至今仍是工会的主要力量)，其他地下工人和地面工人的团结。矿业联合会成了“新工会”，吸纳非技术工人加入。阶级团结是国际压力迫使雇主加入国家组织的结果，是传统工会要求的结果，是政党民主政治定型的结果，机械化和非技术化很难形成阶级团结。矿工能接受非罢工工人，是因为他们就工资和工时问题团结一致，并且因为隔离的孤单矿工社会不怕使用暴力，他们寻求互助主义—工业关系由政治法规来约束，实行最低工资，限定工作时数，这些要求仍然是自由党—工党的。只有在1909年他们才隶属工党，直到战后一直保持党内自治。

尽管在采矿业中劳工的历程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采矿业工会的要求却具有代表性。十小时，然后是九小时，再后是八小时工作日，是19世纪工会的主要要求。1880年以后，在工商业衰退时期，国际竞争导致工资下降，迫使工会要求最低工资数。滑准法计工资在棉纺织业、制鞋业和钢铁制造业中非常普遍。棉纺织业工人加入他们的工会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熟练纺织工人支配着他们：这使得较低层次的工人

形成，并转向半社会党人的新工会。加入民主党的纺织工人，在兰卡斯郡他们成为选举者，但仍受雇主部分控制(Joyce, 1980)，他们通过纺织业工人联合会给两党施加温和的压力——不像约克郡激进的纺织工人建立了独立工党，即工党的前身。雇主协会对国际竞争作出反应，又一次领导雇主攻击工资。1893年棉纺织业的普遍罢工促使工人各阶层更加团结一致。最终的协议是将削减工资10%降到3%以下，并且不是通过罢工而是设立政府议事程序来解决争端，这就是《布鲁克兰协议》，它建立了协商解决的政府协议模式。

所以，在一些重要的“老工会”中，在国际市场力量的压力下，雇主们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促使工人更大程度上团结起来。不是团结一致就是衰退，甚至对许多专业的技工同志会也是如此。尽管某些部门非技术化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他们的要求基本上都是传统的。由于更大的经济力量导致劳资双方建立更加广泛的阶级组织，所以在工厂里绕开了技术差异和特权问题。工会的范围更加广泛，政治性更强，但是形形色色的民主广告超过了在劳工发展过程的各种变量，这些广告正在建构政治结果。

“新工会”一般要追溯到1899年煤气工人和船坞工人罢工。煤气工人工会是由威尔 · 索恩领导的，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同盟成员，他的秘书是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该工会在成立的头四个月便在伦敦拥有两千名会员。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增加了煤气产量，劳工的劳动强度增大了，而并不降低技术要求，像观察到的那样，这正是所有新工会的模式。工会要求三班倒，而非两班倒，以把劳动时间由十二小时减到八小时。工会的核心人物是有技术的锅炉工，这些人在工作方面受过相当长的训练并能控制生产，难以被不参加罢工的工人代替。伦敦煤气公司没有进行斗争便作出让步。国内劳动市场脱离了创立者的意愿。煤气工人工会遍及全国，经常得到社会民主同盟的帮助，他们的情况很具传播性。在1889年8月，工资的问题遍及伦敦船坞。有秩序的集体游行赢得了公司的同情，并使劳德市长和曼宁

大主教干预此事。和谈的结果是工会取胜。工会成员激增到3万人。在社会主义组织的帮助下，新工会遍及全国各个行业，包括船坞工人、海员、搬运工人、卡车工人、铁路工人和各种各样的生产行业。制造业、建筑业、白领职员，甚至还有农民。到1890年，这些工会共拥有35万会员。

大部分工会不能保持所取得的成果。成功主要是在煤气业工会、白领工会和铁路工会。从1910年起，白领工会增长的速度比体力劳动者工会的增长速度要快，主要是通过吸收政府雇员，尤其是教师(包括许多妇女)和邮政工人。商业和工业职员几乎完全没有组织起来，销售行业的工会主义者大体上都局限于合作运动。在20世纪，公务员仍继续主宰着白领工会，因为政府比雇主更有妥协性(Bain, 1970)。甚至有限的政党民主选举权也迫使政府雇主同工人和解。

铁路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属于排他性的技工工会，但是在1889年它突然产生了铁路工人总工会这一竞争性对手，铁路工人总工会面向所有阶层，而对保护主义不屑一顾："总工会将是一个保持战斗性的工会，而且不会为任何弊端或偶发事件资金所害。"它斗争的焦点是工时，也迫使技工工会这样做。雇主进行反击，称他们受到相对总收入而言工作支出比例增长的压力。总工会几乎被他们的攻击所击垮，但是19世纪90年代，一个技工工会接管了它的斗争。铁路工人联合会，即现在全国的铁路工会的前身，通过对各阶层开放而变"新"，新工会已成功地推动了老工会的发展。各阶层的团结再一次集中在传统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争端上，即工时，而不是关于劳动过程中的任何转变，工会正向着更广泛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像阶级一样的组织喜欢共同的规章制度。这届政府执政后期说服雇主达到了这一目的(Bagwell, 1985)。

但大部分新工会失败了，旧有的很快消失，有的慢慢衰退了(直到1911—1914年罢工浪潮时才复兴，由此才产生了20世纪的总工会)。从1891年起，雇主才同政府的攻击步调一致。新工会几乎得不到老工会的支持，尽管它们的状况激起了中产阶级的同情，但是它们的社会主义

未能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尽管在1893年大萧条的打击下，停止和解雇工人使大部分新工会遭到破坏，然而它们仍取得了重大成功，它们的一些阶级意识被老工会利用。我将用我的IOTA模式来阐述如下：

1. 新工会和老工会都寻求更广泛的各阶层团结并形成了一个大工会，阶级(更准确说是一般工业的阶级)而不是部门技工的身份得到了加强。

2. 它们动员了积极进取的团结性，用力量和决心来压制雇主和舆论，而且阻止破坏罢工者上工，但由于它们缺乏全面控制而使雇主转而收买某些工人复工，于是它们使用暴力。它们强烈而广泛地抵制它们的阶级对手，然而它们最终的目的在于和解。

3. 工会的扩大鼓舞了整个阶级，虽然只是从广泛而非集中程度。工会发展壮大拥有更多的全职官员和行政机构，这是由工会全体成员而不是地方附属机构选举产生出的，有了更多的跨工会联盟。关于棉纺织业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更加一致。工会联盟将代表选进了议会和政府委员会(Martin, 1980, pp.58—96)。工会更加强大有力地卷入地方政治中，工会分会工人俱乐部、合作社、互助会、社会党人俱乐部、贸易委员会和劳工政治委员会等组织进行合作，最明显的是在选举学校委员会方面——运用了永久的“劳工意识”，包括互助主义和改革主义两者的结合(Thompson, 1967; Crosscick,1978, p.24)。这些组织的成员主要是男性：职业、家庭和社会区都被性别分隔开来，并不是所有激进分子的生活都来自职业身份。在利用职业、家庭、社会区生活中所产生的宪章派产生的执著的宪章派并未出现。宪章派产生于职业、家庭和社区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剥削。

4. 如果IOTA的前三个因素增强了阶级的形成，那么第四个则减缓了阶级的形成。工会向国家精英分子和政党寻求帮助来反对雇主，更新了跨阶级的部门性联盟，这种联盟在近来英国政党民主中非常普通。政府的技术管理人员和一些中产阶级表示同情。大概有一半工会会员拥有选举权，两党竞争选票以避开独立工党。因此，跨阶级政党民主

折衷了这些需求，从而使可供选择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数目更少。

因此，工会的发展包括社会党人的改革和抱有联合自由主义思想部门同盟之间的行业内部矛盾。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并不存在，大部分工会会员的收入都在平均收入以上，拥有保险和工作技术。工会男性成员站在工会一边，反对工会以外的男女工人。但是工会的团结和扩张也在不断增长，工会和罢工超出了以前仅局限在技工中的范围，而囊括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的许多阶层，因此其结果不仅仅是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垄断本地工作和关闭工厂同盟。为免我们迷失在工业的特殊部门中，请记住同样的模式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所有工会成员的密度都在增长，加入英国工会联盟和工党的人数在增多。大部分增长发生在两个相同时间，1889—1892年和1911—1914年(正像在所有国家一样，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集中传播)。到1914年，在工业部门中工会成员的密度比开始阶段变化小了。几乎每个地方部门会员的密度都占25%以上。现在工会已成了劳工关系中的正常组成部分。考虑到各种产业中的条件和过程的不同，这些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更加深刻，它促使我们把劳工增长更多地解释为整个经济和政府特性的扩散，而非作为直接劳动过程的反应。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生产关系是重要的，劳资双方之间性质的根本差异遍布于整个经济。其中其他形成的职业——国内外工人、分色、临时雇佣——都在急剧下降，尤其是在男工人当中。前两种工会现在被委托给少数民族，第三种主要是女性工人，女性已不再是典型的非技术工人。能参加集体行动的绝大多数工人，无论是正式的技术人员，半技术人员或非技术人员，都加入到同业主经理的正式雇佣关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划分的两个阶级，恰恰存在于他们所认为的整个广泛分散的体系中。经济的兴衰，国内和国际上的工资，工时、成本、价格、需求、供给、生产、消费和竞争之间的关系促使两个阶级作出一致的反应。全国罢工和停止，政府裁决和全国协议变得更经常了。在1899年有一个全行业的协议，到了1910年有七个(Marks, 1989, p.86)。

雇主的阶级身份由于力量的增强而扩大了。联合起来的雇主的进攻策略，只能是动员使用民法和警察来进行镇压，主要依靠经济组织——全国性停业、全国性的破坏罢工的劳工组织(受到法律和警察的保护)——来坚持没有共同竞争的长期对抗。当雇主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时，便没有任何空子可钻，本位主义的技工最终处于下风。

但是雇主是以一定的代价取得成功的。工人的组织能力得到提高，尤其是四个部门(工程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政府部门)的工人现在是劳工的核心。工程技术进入工厂使他们成为领导者，他们过去常常组织起来，运用权力来控制劳工市场。位于单一阶级居住区内的大工厂，铁路车间或者是采矿厂使工人能在雇主不在的情况下形成集体的团结，这给工人留有更大的空间，从而导致隔离的工人群体“脱离所有者的直接控制”(Kerr 和 Siegel 1954 年分析说明了阶级团结的增长)。交通运输业工人特有的流动性使他们能同各种职业的工人保持接触——工人不得不充分了解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而交通运输工人最适合在全国工人中传递信息。政府雇用的重要性进一步为工人活动提供了空间：大型海军制造厂的工人、小邮局的工人或学校职员，并不与“雇主”直接打交道，而是与一个负责分化政治雇主而且主要是促成和解的非个人的政府打交道，双方在同一地方，即民族国家的领土上相互对抗，彼此对抗新的权力，对未来毫无定识，对自己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

劳工的政治策略和体制

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全体男性劳工被迫参与政治，这时他们便遇到现存的国家定型。有些政治传统经过这一时期并未有何损伤。工人可能仍然处在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或保守仁慈的专制统治之中(许多仍这样保持着)。但是 1867 年的各区和 1884 年的各县中大部分男性户主被

吸收入政党民主。66%的成年男子现在拥有选举资格，包括40%以上的男性体力劳动工人(尽管有许多因带有偏见的登记手续而不能参加选举)。大约有一半选民是工人，随着专门控制的减弱，政党政治发生了变化，由于各党派竞相争取工人的支持，按照财产获得选举权部门性地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1867年法案是托利党制定的，1884年法案是自由党制定的。在某些地区，托利党安抚工人的经济主义和合作主义(Preston，见 Savage, 1987, pp.13—61)，大多数自由党是这样做的(对伦敦来说，见 P.Thompson, 1967)。政党在关税问题上的分离加强了跨阶级的行业联盟：伯明翰工程业支持保护主义，兰开斯特支持棉花自由贸易。

国家文职官员范围的扩大确保了政党民主为地区宗教的政府形式获得了更大的民权。政党民主现在将焦点放在控制工人的教育上：更多的英国国教徒和英国工人站在保守党一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和凯尔特人则站在自由党—工党一边。在爱尔兰之外，大部分地区(也可能是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牢牢地坚持国家政党民主。这两大政党最终使主要通过中央集权解决争端的办法制度化。英国现在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民族国家(见表3.3)，至少在英国本土是这样的。民权范围的扩大也增加了政府职员的数量。从而形成了相对中央集权的和解和统一，正像20世纪那样的市政厅。在地方贸易委员会的选举压力下，为争取雇员接受工会费。1891年，保守党政府的“公平工资决议”同意中央政府契约中工会费决定。公务员是积极的和解者，尤其是商业委员会中的公务员。到1904年，委员会适用1896年《和解法案》在整个工业中创立了162个联合谈判委员会。从1909年起，自由立法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点：劳工介绍处扩大了委员会同工会和雇工的商谈，1911年《健康及失业保障法》纳入工会福利基金，从而使工会保守主义的核心人物进入了国家政府(Davidson, 1972)。全国性合并——中央集权制改革作为对责任的回报——进一步促进了和平。

然而，19世纪90年代的政党合并踌躇不前，劳工中的激进分子跃

跃欲试。1899 年工会联盟代表会议选举以很小的优势投票支持独立工党。下一年成立的劳工代表委员会，除了获得“劳工成员重返议会”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政策，而除了工会外没有其他组织。但是在 1901 年塔夫河谷案的判决中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在保守党的“法治”政府统治下，法庭认为工会在法律上应对个别罢工工人造成的损失负责，这是另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民权概念的表现形式。保守党政府支持的进一步的法律判决使的法律的打击进一步加重。保守党的工会主义消失了，并且劳工代表委员会成员两年内增长为原来的两倍多。保守派大体上成为一个阶级政党。工人们仍然投票支持他们——尤其是在英国南部和中部，另外还有国教徒——但他们不是作为工人投票，他们力图联合有组织的劳工已经完成，即使他们的地方性控制在小城镇或乡村地区仍然有效。

但是自由党作出了反应，它的右翼“新自由党人”为互助主义者组织起来的权利和社会改革提供了保证，如贫困救济，加强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英国的道德—意识形态定型体现在与自由的非国教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布思的社会调查唤起信仰者对贫困和失业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更多的是国家结构的问题，并不是穷人和失业者的过错。对自由的道德同情是记者和教授们动员发起的，商人很少有人这样做(Emy, 1973, p.53)。布思本人称这个计划为“有限的社会主义”。它大体上都是合作主义者。在劳埃德 · 乔治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即他的 1911 年关于健康和失业保险计划以及他从递减间接税制到进步的直接税制的重大转变。国家将进行重新分配并且鼓励人们通过国家管理的保险制度自立。只有大公司的工人才可以享有保险，但保险是由政府、大部分工会、大雇主和私人保险公司一起提供的。从 20 世纪来说，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第一次真正的改良运动。这种改革较少地来自劳工，更多地来自试图召集工人、中产阶级、一些地区和宗教的跨阶级的政党。

然而，自由党并非推进改良主义的理想工具，这两大党都继承了旧

体制的利益，托利党(广义上)是英国国教、农业和商业资本的政党；自由党是非国教和工业政党，托利党变得更加英国化，尤其是在英国南部，自由党更加北方化和凯尔特化(尽管不在爱尔兰)。在这些方面看来，这两党都是跨阶级的政党，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尽管这一时期许多雇主脱离了保守党，自由党仍包括工业家和工会(因为工会多集中在北方和凯尔特地区)。在下一个工业对抗不断增长的时期，这导致了政党内部的宗派主义。除了劳埃德·乔治外，政党领袖使政策偏离了社会整体的战略，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分离。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改革方案并未被采纳，只有一部分改革被采纳。地方政党更难逃脱。所有劳工运动都将工人选举作为政治公民权的关键要求——实际上就是工会官员——到文职机构。在英国这一点由于激进分子强烈的阶级身份意识而得到加强。实际上，英国劳工醉心于人事和手段，而非其他的目的：它的三个首要问题是普选权(尽管以男性为主体的运动给女性选民的实际帮助很少)、工会的集体公民权以及选举工会官员担任公职。自由党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向联合起来的劳工作出让步。

随着政府新的行政机构权力的产生，政治与人民生活毫不相干的世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也可能躲不开政府，现在最好能参与管理影响许多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收益和支出。选举权是令人向往的公民权的象征，所有国家的女性和工人一样都清楚这一点。但是工人遭受深重政治剥削的半个世纪也一去不复返了，税收负担和《济贫法》减轻了，工人代表参与地方政府，一半工人参加选举。工会想为所有的工人争取选举权，自由党并不反对，尽管他们不很情愿(他们赖以得到公众支持的地方大多也是工会获得力量的地方，即广大女性)。如果不是战争的干涉，自由党不久将扩大选举权。自由党的领袖也转而为工会争取集体公民权。自由党领袖认识到工会领导应对此问题负责并为它所困扰，所以一上台便制定了1906年《贸易纠纷法》以调整塔夫河谷案判决。工会现在享有全部的集体组织，这是英国(到撒切尔时期)合作主义不满的终点，现在在自由党—工党的传统内最终制度化。如果它发

生于1820年，工人们甚至可能满足于没有投票权。但是宪章运动和后来政党民主斗争的历史，被扩大的政府公民权的范围所加强，从而使得这成为阶级政治的核心。

真正的问题在于选择自由党候选人。如果只能在工业家或律师这二者中选其一，那么选举权又有什么用呢？就在自由党候选人当选的工业选区，他们的活动家大部分是按阶级来划分的。例如，在约克郡西部，不是新自由党分子而是工商业巨头控制政党并将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排除在外(Emy, 1973, p.289; Lavbourn 和 Rayndds, 1984)。甚至最温和的劳工活动家都意识到在自己的政党之内也被挡在真正的权力之外。尽管合作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合作主义的原则和改革政策，但它缺少同志友谊。它的激进分子都是理性主义的技术治国论者，他们对群众大选感到不自在，对于工党缺乏政策却又集体联合感到迷惑不解。自由党是社会名流的政党，并不是进行社会运动的政党，这就是它的主要缺陷之所在。

社会主义提供了同志友谊——团结的、重感情的、整体的——注重工人主宰自己生活这一观念。工党，首先是阶级政党，它的领袖都是以前的工人，它没有单个的党员，只有工会的集体成员。许多激进分子当面对雇主们一致的攻击时也感受到阶级对抗。这些雇主受到宣判劳工行动非法的法庭规章的支持。许多激进分子也感受到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发展趋势的威胁；他们得到了自由党员的资助。英国社会党人源于民粹主义和激进非传统习俗，增加了新经济制度的含义。它把最初的小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和男性劳动阶级的同志友谊以整个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松散的马克思主义化，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信徒海德曼到哲中主义的汤姆 · 曼和威廉姆 · 莫里斯，到实用主义的基尔 · 哈迪，工党的最早领袖——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工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弊病在于需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第二次革命促进了阶级融合。社会主义思想和同志友谊能扩大对字面意义上的理解。汤姆 · 琼斯记得南威尔士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这样的：

> 在这次工人运动期间，社会主义像新的宗教传遍了山谷，年轻人彼此询问，你是社会主义者吗？语气就像一个救世者问，你得到拯救了吗？在一代人眼中，矿工的前途有了转机。

乔伊斯敏锐地评价说：

> 社会主义如此奏效并不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可接受的思想意识在起作用，而是它破坏了几十年人们对赖以生存的专制主义和顺从的理解。它闯入了雇主对当时形势的控制……穿入了工业社会的中心地区。专制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详细说明人们前途范围的能力。(1980, p.229, 335)

工人现在能和雇主在同一地区内组织起来，并能运用思想体系去理解它。劳工受到经济、雇主、敌对的法庭、扩大了政府行政机构的压制。

它的选择将是什么呢？那时社会主义已经崩溃，他们转向带有合作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1914年以前的多数劳工领导人都缺少改革主义的思想。很少有人讨论劳工进入议会后有何见解。正如一个公务员评论他和劳工领导关于1911年《国家保险法》的谈判时说："他们不为他们的工人说话，不知道他们的工人想要什么，也不能束缚他们的工人遵守法令——对付他们的工人相当困难(Moore, 1978, p.113)。他们没有伟大的政治方案，甚至几乎没有基本的争论。工党和工会联盟更多的是为互助主义和手段而战，而非为改良主义的结局而战。他们对直接税而不是间接税感兴趣(尽管新自由派人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在公众事业方面减轻了失业，但没有实际的方案。令激进的自由派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工会甘愿接受集体的讨论还价也不愿接受政府的干预(Emy, 1973, pp.293—294)。就像其他国家的劳工那样，劳工对国家福利立法几乎不感兴趣。所有的劳工运动都不相信国家行为，因为国家通

常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不是带给他们好处。”

除此之外，民族问题仍起作用，虽然现在只是在政党民主内部，这更加强了工党对国家的不信任。新兴工业的核心，也就是劳工的核心，集中于苏格兰、威尔士、英国北部，这些对首都持怀疑态度的地区，与不信仰国教的劳工力量交织在一起，对于已经建立的英国国教会持怀疑态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劳工才归附英格兰—不列颠民族国家。直到那时，政府的思想还是保守的，最好能避免这一点(Pelling, 1988, pp.1—18; Heclo, 1974, pp.89—90; Cronin, 1988; Brown, 1971 的观点同这一观点不同)。

然而，一旦社会福利方案制度化，工会就会参加管理(Marks, 1989, pp.105—106)战争期间工会的参与大大地扩大了。劳工艰难地参与国家的改革，自由合作在两次战争爆发的时间转向了改良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分子、互助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在社会民族国家中身份的不明确。劳工是不是市民参与者呢？ 1867 年和 1884 年以后，许多人拥有选举权，矿工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议会代表；其他人拥有强大代表席位，能够施加压力。许多激进分子在地方政府和教育委员会任职。工会的集体公民权最终得以实现，但是需要对法官保持戒备。实际上政府认可比雇主认可的程度大得多，有时比政治家认可的程度还大。但是和解的国家不是他们的国家，不是真正拥有民族公民权的国家，正如严格的选举制度、法律判决和英国国教的建立所体现的那样。无论劳工领袖多么小心谨慎，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是被排除在议会中心之外的。

除了坚定的革命者和忠于自由党—工党的成员，对其他所有人很难说他们不明确的地位会产生什么。他们的分裂、部分联合和部分公民权，使工联主义，但首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不真实、不合理的。1913—1914 年间是一个逐渐增强的工业对抗时期，当自由党和劳工政治没有获得任何让步时(政治家正为爱尔兰危机所困扰)，工联主义重整旗鼓。仅仅是在 2 000 个工会主义者的影响下，便掀起了全国性的罢工浪

潮，并形成更广泛的工业工会。但是随着这些工会同国家所支持的集体契约的扩展有关系，它们变得与其他工会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进行的实际行动熄灭了工联主义所迸发出的短暂火花(Holton, 1976, p.201; Hinton, 1983, pp.90—93)。由于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工会联合在一起，“他们罢工是支持而不是反对工会控制”(Hyman 1985：262)。

集体谈判象征着工人阶级的进步，然而却熄灭了指向对手的阶级仇恨的火花。像斯特德曼—琼斯阐述的那样(和像第十五章所证实的那样)，尽管积极进取正是新工联主义的特征，新工联主义没有把政府想象成进行血腥镇压、剥削和腐败的机器，而政府在1790—1850年期间正是那样做的。他说，政府现在被看作使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一个中立机构(1974：479)。这一章揭示了这是一个基本正确的观点：国家的强制性和腐朽性减弱了；国家剥削的不是工人的全部生命。

关于是继续保留自由党—工党还是决定与工党一起奋斗一直争论不休。但这仅仅是策略问题。工党于1906年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突破(这一段基于Mckibbin, 1974)。有29名劳工代表当选为议员，他们都是工人和工会官员，同剩下的众议院形成明显的对比。但是有24人当选，是因同自由党签订选举协定的结果。如果工党保持它负责的压力，那么它的领袖就相信自由党将对普选权作出让步。在有限选举权方面，协定给予两党真正但是有限的实惠。这比互相反对要好，假如相互反对，则保守党一定胜利。在1910年的两次选举中，工党先是获得40个席位，后又获得42个席位，但是仅有一个自由党候选人。在1910—1914年期间，工党赢得了更多选票，但没有赢得任何补缺选举。工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然而工会仅仅只有勉强多数的成员支持其政治要求，自由党仅凭协约在矿区拥有的席位，它们的群众激进主义在工业区衰退了。

欣顿(1983, pp.80—81)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最可能的后果是协约的失效(由于活动家们的憎恶而撕毁协约)，这对于两党和将工党与集权制的自由党重组为一个真正的社会党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从而使得三党民主将保持更长一段时间。 麦基宾(1990)认为自由党在赢得工人选票方面已经失约了。 他相信，选举权的扩大将进一步加速其衰退，两党(保守党与工党)民主将重新出现。 然而选举权将在穷人和妇女中扩大，这二者均拥有很少的工会成员而且不会立刻被工党吸引，三党民主原本会扩大的。

但是战争的确发生了，从 1920 年起，工党选区人数大大增多，工党脱颖而出上台执政。 自由党现在分裂了，部分由于内部阶级分裂，部分由于劳合 · 乔治和阿斯奎斯的派系斗争。 如果工党领袖更精明一些，也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工党的激进分子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想拥有自己的议员，但工党却不能给他们提供这种人。

英国劳工在其他行动的压力下开始奉行改良主义，政府文官范围的扩大，雇主的催迫及平民政府方面的压制，迫使它坚决争取建立全国组织，如可能时它就和两党合作使互助主义和联合制度化。 然后保守党决定成为敌对的阶级政党，而由于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冷漠，劳工和自由党领导人的积怨将使劳工放弃自由主义。 在自由党和战时政府方案中，管理方面的牵连，使它转向福利国家。 在这一时期之后，便是它的选举前景和计划，这一计划难以适应预见的整个战争后果和全体男子，然后是全体女子的选举权。 然后它设计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民主方案。 阶级政治将出现，但是是以男人为后盾的。

结论

全国劳工选举或自然采取的策略主要有四点决定性因素。

1. 如马克思的理论所认为的集体劳工阶级部分出现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其原因不是当时生产工艺的改变，而是完全扩散性经济的出现。 资本家感到了这种“完全”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但他们的反应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劳工阶级的进攻。 为了防御，一个更加全国

性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尽管是由一些具有部门利益的熟练工人领导的，而且部分被组织成部门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在英国，工会作为一个阶级的运作者出现，然而它们同时追求的是部门性和地区性的目标。经济权力关系的模糊性并没有自己澄清。

2. 工人运动的扩大仍保持在男性工人之间，而且随着职业的两极分化使它与复杂的家庭和社区发展隔离开来，从而使它的剥削本质狭隘化。阶级尽管变得更加广泛，但可能变得不那么激进了。

3. 因为国家政治仍然摇摆不定，男性化的阶级斗争主要是由英国政治定型，即主要通过跨阶级的政党民主、民族问题和国家的部分民主化来解决的。这些限制了资本家和体制的压迫，而且革命的社会主义，限制阶级政策的部门性和地区性变化，使阶级冲突的集中制度化进一步加快，国家缓和将占据主导地位，除非爆发一些重大的灾难，如战败、罢工等等。

4. 直到1914年，政府对劳工的温和政策的形式还未确定，尽管可选择的范围已经很小。占主导的是互助主义者，并带有一些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以两种政治之一而出现，有的来自自由党，有的来自自治的工党。

到1914年，20世纪英国阶级斗争的大部分参数似乎均已到位，这是资本家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产生了广泛政治性和模糊性的工人运动，而政党民主平民化的国家政治定型解决了大部分模糊的问题。然而，我忽略了英国一个重要特性，因为它涉及到英国所没有的东西，即只有英国才不存在大规模有重大影响力的农民阶级。

注释：

[1] 这一部分关于工会材料的来源是韦伯斯(1926)，潘林(1963：85—148)，克莱格(1964)，克罗宁(1979，1982)和马丁(1980：58—131)；和关于工党的材料来源是麦克考宾(1974)和摩尔(1978)。

参考文献

Ashworth, W.1960.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870—1939*. London: Methuen & Co.

Bagwell, P.1985. The new unionism in Britain: the railway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Bain, G.1970. *White Collar Trade Unio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ain, G., and R. Price.1980. *Profiles of Union Growth*. Oxford: Blackwell.

Baines, D.E.1981. The labour supply and the labour market, 1860—1914.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 2, ed. R. Floud and D. McClos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verman, H.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own, K.D.1971. *Labour and Unemployment, 1900—1914*. Newton Abbott: David & Charles.

Burawoy, M.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gess, K.1985. New unionism for old? The Amalgamated Society for Engineers in Brita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Clegg, H.A., et al. 1964.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Since 1889*, Vol. Ⅰ.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ronin, J. 1979. *Industrial Conflict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Croom Helm. 1982. Strikes, 1870—1914. In *A History of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1875—1914*, ed. C.Wrigley et al. Brighton: Harvester.

198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7.

Crossick, G.1978. *An Artisan Elite in Victorian Society*. London: Croom Helm.

Davidoff, L.1990. The family in Britain. In *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2: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ed. F.M.L.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dson, R. 1972.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n *A History of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1875—1914*, ed. C.Wrigley et al. Brighton: Harvester.

Deane, P., and W.A.Cole.1969.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my, H.V. 1973. *Liberals, Radicals and Social Politics, 1892—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instein, C.1976. *Statistical Tables of National Income, Expenditure and Output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55—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n, A.1977. *Industry and Labour: 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Gray, R.Q.1976.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Victorian Edinbur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rgreaves, J.1986. *Sport, Power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rt, N.1989. Gend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 politics. *New Left Review*, no. 175.

1991. Female vitality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healt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Sociology, Marburg.

Heclo, H. 1974. *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ill, S. 1981. *Competition and Control at Work: The New Industrial Soci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inton, J.1983. *Labour and Socialism*. Sussex: Wheatsheaf.

Hobsbawm, E.J.1968.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olton, R.1976. *British Syndicalism, 1900—1914*. London: Pluto Press.

1985.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 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Hunt, E.H.1981. *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 London: Heinemann.

Hyman, R.1985. Mas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ncy in Britain: contrasts and continu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Joyce, P. 1980.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r Victorian England*. Brighton: Harvester.

1989. Work. In *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2: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ed. F.M.L.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rr, C., and A. Siegel. 1954.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Industrial Conflict*, ed. Kornhauser et al. New York: McGraw-Hill.

Lash, S., and J.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ybourn, K., and J.Reynolds.1984. *Liberalism and the Rise of Labour, 1890—1918*. London: Croom Helm.

Lovell, J.198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reat dock strike of 1889 in British labour histo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McKibbin, R.1974.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1910—19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Why was there no Marxism in Great Britain? In his *Ideologies of Class. Social Relations in Britain, 1980—19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ks, G.1989. *Unions in Politics: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R.1980. *T.U.C.: The Growth of a Pressure Group, 1868—197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oore, R. 1978. *The Emerg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1880—1924*.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More C.1980. *Skill and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870—1914*. London: Croom Helm.

Musson, A.E.1978.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London: Batsford.

Payne, P.L.1967. The emergence of the large scale company in Great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20.

Pelling, H.1963.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London: Macmillan.

1968. *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Penn, R.1985. *Skilled Workers in the Class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lard, S.1985. The new unionism in Britain: its economic backgrou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Price, R.1983. The labour process and labour history. *Social History* 8.

1985. The new unionism and the labour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Savage, M.1987. *The Dynamic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w, C.1983. The large manufacturing employers of 1907. *Business History* 25.

Stedman-Jones, G.1974. Working-class culture and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London: 1870—1900. Notes on the remaking of a working clas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Stone, L.1969.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42.

Taylor, A.J.1968. The coal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75—1914*, ed. D.H.Aldcroft. London: Allen & Unwin.

Thane, P.1981. Social history, 1860—1914.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 2, ed. R.Floud and D.McClos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F.M.L.1988.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London: Fontana.

Thompson, P.1967. *Socialists, Liberals and Labour: The Struggle for London, 1885—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ebb.S., and B. Webb.1926.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London: Longman Group.

第十八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880—1914年(二)：工人阶级运动的比较分析

理论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全国统一的经济、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和农业的商业化。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它都导致了资本集中、工业科学、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采矿业和交通业的扩大及合并。在每一个国家这些部门都急剧扩大，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也急剧增多，这导致雇主在工资、工时方面以及对不熟练工人施加了压力。这次经济革命在所有国家都惊人地相似，工人们反应相似，尽管不明确，但还是建立了集体组织。本章通过图表说明在数个国家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冲突。它主要集中解释令人感兴趣的结果：这些国家经济具有如此明显的相似之处，产生了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第十五章中有六种不同类型的思想意识——还有工业中阶级斗争的不同结果。俄国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德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准革命的道路；英国走的是互助主义的温和道路；美国主要是奉行没有社会主义的地方主义；法国仍在激进地讨论这六种观点。第十九章列表说明这一时期在农业中相似的各种各样的斗争。两者都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把国家看作独立的个体。我把关于劳工运动没有可比性的方面如跨国组

织、政府组织、民族主义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放到一边，直到第二十一章。我用基本上相同的工业经济和农地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工业经济和农地经济多方面的相似性主要是由政治成形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团体的结构所起的作用要小一些。这加强了本卷广泛的概括性：现代社会结构更多地被经济和政治权力组织所围绕和支撑。

正像第十七章对英国证明的那样，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阶级组织、地方组织和阶层组织，这三种有竞争力的工人组织的形成：因为它们都得到发展也都削弱了其他组织，劳资关系相当模糊，并不是所有组织都按照单一的逻辑发展。然而，在工人阶级组织参加争取公民权斗争之前的五十——百年，就有了各种各样争取公民权的策略。正如罗坎(1970，pp.102—113)所观察的，劳资斗争在现代西方四个主要分裂趋向中出现得最晚——出现于中央集权和地方主义之争、国家和教会之争、旧的土地所有制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之争以后，我应该加上一点，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主要是军国主义的，因此在工人阶级出现以前，现代国家定型于“代议制”、“民族”和“军事—文职”的问题上。然而，整个西方资本家和工人反应都相似，模棱两可，在生产领域有相似的变化，工人政治在不同相当程度上受这些定型的影响。

一种大趋向是可以作为所出现的复杂的政治经济交织现象的基础。在国家至少让一部分工人参与政党民主的地方，工人的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就分开了。在这方面阶级组织、地方组织和宗派组织并肩发展，后两者削弱了潜在的阶级团结。因此，社会党人的思想意识更加温和，更加经济化，最多等同于互助主义和工联主义，偶尔为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牺牲工人阶级的团结。只有在政党民主方面未对某些工人作出让步的体制才能克服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阶级团结才能得以发展。只有这样才可能进行激烈的改革甚或进行革命。

这并不完全是最初争议的问题。当然，我借用了列宁 1902 年著名的宣言：“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产

生工会意识”(1970， p.80)。

就“工会意识”而言，列宁的意思不仅仅是经济主义，因为狭隘的工会利益也要互助立法来保证组织起来的自由。但是列宁认为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成分是富有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代表——知识分子从外部加到工人阶级斗争中去的。这些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自觉的成长中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

列宁的论断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些论著的核心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它所强调的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和榨取剩余价值都不足以解释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出现。他们自己所产生的这些经济远远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甚至通常也称不上是改良主义，他们所产生的阶级力量还不如部门煽动者的力量(参看 Marks, 1989, p.15)。但是列宁论断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一定是外部知识分子带来的是不正确的(就像列宁在其他地方意识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一样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尽管仅仅是在他们多样化的生产经验被普遍的政治剥削经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借鉴了更近代的作者的观点。伍思诺(1989， part 3)曾强调这一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尽管他没有提出全面的观点。李普塞特非常有名的论断是政党民主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分崩离析(1977， 1984)。李普塞特认为国家可以被置于连续的单一政治体制之中，从封建制度到自由制度，从其可以预测工人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和范围。他说，因此封建体制产生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混合体制产生的是社会主义改革，自由体制不会产生社会主义，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有许多正确之处。但是我反对他过分使用了“封建制度”。我也反对他对劳工历史和民主过于温和的观点(尤其是在美国)。他的观点是将镇压缩小化，而忽略了各国政府中的军事和文职的变化。和几乎所有人一样，他也忽略了民族问题。

国家并不是一维的，本章区分了四种基本型的国家成形。所有国家都被定为资本主义，因此这对于预测整个时代的阶级成果的变化没有

多大帮助(除美国这一非常特殊的例子之外)。 军事主义和政府文官职责范围的扩大如果不平均的话，可以提供多一点的帮助。 但是总的来说，代议制和国家定型能解释大部分劳工斗争的多样性。

关于国家劳工运动的数据比较

我提供的是关于所讨论的五个国家再加上瑞典等这些国家劳工运动的简单数据比较，然后我再转向对于这些国家的细致分析，以俄国代替奥地利，因为关于奥地利的研究很少，对俄国的研究却很多。[1]

表 18.1 所列出的工会成员的比例，是在能得到所有国家数据的时候开始的。 这些数字只是大致的。 工会和政府的记录有很多不精确之处，国家的统计资料是用不同方法搜集到的。 我排除了农业和军事力量。 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很少能团结起来，然而在不同国家，农业和军事力量比例的变化很大。

表 18. 1　1890—1914 年非农业平民劳动力中工会成员所占的百分比

	奥地利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瑞典
1890	1. 0	12. 2	2. 2	3. 2	3. 5	1. 2
1895	2. 0	11. 6	4. 0	2. 7	3. 5	1. 6
1900	2. 3	13. 7	4. 2	5. 9	7. 8	7. 0
1905	3. 4	14. 0	6. 6	10. 2	14. 3	10. 2
1910	6. 5	18. 8	8. 1	13. 5	12. 5	11. 0
1914	6. 5	23. 6	8. 3	12. 5	13. 4	12. 2

注：非农业劳工数据也排除了军队成员。 所有估计的数据由其他可利用的数据直接算得。

奥地利：非农业劳工(NALF)——《法国年鉴》(1913， p.183)，1914 年的数据事实上是1912 年的，Bairoch 等(1968， p.85)。 所有数据仅是奥地利帝国的。

英国：NALF——Bain and Tilly(1974,附录 B)； Mitchell(1983， p.171)，这些年是 1891，1896， 1901， 1906， 1911，1914。 1896、 1906 和 1914 年的数据是估算的。

法国：工会成员——Shorter and Tilly(1974,附录 B)； Mitchell(1983, p.163)。 1890 和 1914 年的数据是估算的。

德国：工会成员——Bain and Price(1980, p.133)，排除带薪雇员联合会。

NALF——Mitchell(1983, p.164)，数据是1882、1895和1907年的。NALF数据是根据这些估算的。

美国：Lebergott(1984, p.386—387)。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劳工数据要想精确是不可能的，Lebergott的数据来源排除国内的公务员(Bain和Price的数据包括公务员，但也把在那年有两份工作的人记录了两次；他们的工会成员数据也包括加拿大的)，因此，我的工会密度数据可能有偏差，或许偏差1%到2%。

瑞典：工会成员——Bain and Price(1980, p.142)，NALF——Bairoch等(1968，p.114)。

在这整个时期工会会员在所有国家却是少数派。直到1914年，英国的比例到那时是最高的，但它仅是非农业劳动力的1/4。因为每个地方的工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男性，男性的密度高，女性的密度低，男性密度至少高1/3。但是图表表明整个时期工会会员的数量稳定增长。对工业的分析将揭示同英国激进派的相似(在第十七章中讨论过)：直到1914年，在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属制造业中，男性熟练工人的密度达到50%。所有国家工业和职业的相似之处如此引人注目，所以在这一章我很少讨论特殊行业的关系，除非谈起相反的。我对英国的讨论能大致代表作为领先行业所发生的变化。

国家工会的密度不同主要是因为各国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不同，没有严重的落后者。特别指的是按照思想意识或政治上的厌恶程度对工会一致或不一致。尽管法国工会的密度比期望的要低。这可能部分归因于法国的调查数据有误，部分归因于法国早期有特色的工会的出现，法国工会成员被限定为军事人员，他们能动员非工会成员举行示威和罢工。总之，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工会成为男性熟练工人，然后是非熟练工人和女工组织起来减轻痛苦的正常手段。工会是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集体反应；它们恰恰是马克思关于出现的集体劳工的中心观点。

罢工的比率通常被用来表明集体劳工经济上的激进程度。表18.2表明国内非农业劳动力参与罢工斗争的比例。与另两个相比，我倾向于这个标准。罢工损失的工作时间的长短受单一大罢工的影响而没有规律的波动，而罢工的数量由于很小的罢工而膨胀，衡量一般的激进程度则更轻。

表 18.2　1891—1913 年(五年均数)罢工的非农业劳动力占平民的百分比

	奥地利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1891—1895	—	2.5	1.0	0.1	2.7
1896—1900	1.4	1.1	1.1	0.7	2.3
1901—1905	1.2	0.6	1.6	1.2	2.9
1906—1910	2.2	1.3	2.5	1.4	—
1911—1913	2.2	5.0	2.0	2.0	—

资料来源：劳动力见表 18.1。 罢工：奥地利——《法国年鉴》(1913， p.184)。 英国——Cronin(1989, pp.82—83)。 法国——Perrot(1974, I, p.51)。 德国——Cronin(1985，表 3.4)；自由工会数据，1890—1898；官方数据：1899—1913。 美国——Edwards(1981)。

罢工非常少，每年罢工人数只占劳工的 4%，一次大罢工浪潮的罢工人数是它的 2 倍，就像 1912 年英国的罢工那样。 1905 年俄国革命使罢工人数增长了 10 倍。 尽管罢工不统一，但整个时期罢工都在增长，在美国罢工没有持续增长。 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管这些国家工业水平如何，罢工比例却是相同的。

所有国家都受到资本主义跨国传播的影响，尽管有些国家比较先进，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然而不同国家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特色(德国与美国的卡特尔—托拉斯、法国的乡村工业等等)。 所有的资本家都对国际市场状况和技术有所反应并采取行动。 俄国可能是落后的，但是它的大企业装备有最新式的机器、账目结算和科学的管理等等。 每个地方的冶炼业、采矿业和交通业这三个现代工业部分也都有点双重性。 它们包括了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然而它也(加上化学工业)产生了最大的企业，这些企业拥有最发达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以鼓励雇主和雇工建立部门组织。 这些企业还拥有强大的雇主对工会进行抵制。 尽管有这种双重性，在不同国家的同一行业大部分工人的行动方式惊人地相似。 就像格里特(1985， p.126)观察到的那样。

因为贸易周期和雇主竞争超越国界的扩散，雇主和工会的进攻也是如此。 罢工浪潮遍布西方世界。 五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有这样的数据，1889—1890 年有罢工浪潮；六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有这样的迹象，

1910—1912年六个国家都这样——这些日子任何国家都没有发生其他罢工浪潮。(Boll, 1985, p.80, 1989, Cronin, 1985；这些作者也尝试着提出1870—1873有早期的国际罢工浪潮)。社会党领袖(像第二十一章所表明的那样)建立了稠密的国际交流团，并认可马克思的基本的工人组织跨国理论。

如果经济权力关系相似，甚至是跨国相似，但是政治不是，表18.3表明劳工社会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不同命运。劳工中社会党人的选举增加了，但是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比例增长，德国、奥地利、瑞典(加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2]处于一个极端，直到1914年它们的社会党成为最大的单一党，获得了大部分男性工人的投票。另一个极端是英国的社会党为获得5%的选举而斗争——或许是男性白领工人10%的选票。英国工党也使用严格的选举权而进行反对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它获得的实际选票少于工人的支持。因为一半多的男性工人没有选举权，政党在压倒多数的工人阶级选区支持候选人，在表18.3的第二行，我对工党的选票作了相应的调整。任何调整都是猜测性的，但是我估计英国工党的选票可能与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获得的选票不相上下，比北欧社会党获得的选票少。

表18.3　1906—1914年国家选举中投票给社会主义者的(男性)选民的百分比

	1906—1908	1909—1911	1912—1914
奥地利	21	25	—
法国	10	13	17
德国	29	—	35
英国	5	7[a]	—
调整以后[b]	10—15	14—21	—
瑞典	15	29	33[d]
美国[c]	—	—	6

a：在1910年的两次选举中，工人的投票率为6.4%和7.6%。

b：调整是将34%的英国人(几乎都是体力劳动者)从特权阶层中排除出去。假定这与成年男性投的票相一致，那么劳工的候选人数会翻一倍。

c：注意，所有的黑人男性都没有公民权。

d：在1914年的两次选举中，社会主义者的投票率为30.1%和36.4%

资料来源：Cook and Paxton(1978)。

很难衡量雇主的思想意识。他们的思想极端程度的标志是通过采取的行动所杀害工人的数目(他们的过失行为杀害的工人数量，比在恐怖工厂和采矿业以外事故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在劳工争端中，没有关于劳工死亡的官方系统的记录。通过梳理每个国家都在本章参考文献中列出的二手资料文件，我已经对每个国家作了大致的估计(见表18.4)。挑起暴力反对工人的是雇主和当局，事实上所有的牺牲者都是工人。

表18.4　1872—1914年劳工斗争和被杀害的工人

英国	德国	法　国	美　　国	俄　　国
7	16	可能有35	可能有500—800	可能有2 000—5 000

英国的谋杀记录是最少的。它的七次死亡事件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和1910—1913年间。令人吃惊的是，半独裁统治的德国紧排在后面。在死亡的人中，有8个死于1889年，3个死于1899年，2个死于1905年，3个死于1910—1911年间。在法国，1872年死亡人数为1个或2个，1891年死亡人数是9个，1905年的死亡人数是1个，1907年死亡人数是19个再加上好几个。英国、法国和德国死亡的总人数可能被低估计了，但是偏差不大。它们的范围同俄国和美国的范围遵循了完全不同的规则。美国估计的范围变化是由美国劳工历史学家提出的，尽管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对美国南部黑人施行私刑或枪决(被排除在总数之外)将涉及到劳工的争端。然而美国实施暴力的规模仍不及俄国的规模，俄国的伤亡人数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因为劳工争端融入更广泛的城市抗议，新出现的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之中。但是区别如此显著以至于是真的。看起来雇主和政治体制对工业行为的反应在方式上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国内军国主义的水平同它们在代议制国家成形中的地位没有关系。俄国是君主专制最严重的国家。但是美国是政党民主最完善的国家。

工会的密度、罢工、死亡和对特定的人为政党投票只是工人战斗性

和社会主义最粗糙的标准。但是它们提出了一种更广泛的倾向：经济关系在整个西方世界有以共同模式扩散的趋势，政治关系却不同。我现在将更加密切地关注个别国家，集中考察它们的政治成形。除非所说的情况相反，应该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所有国家的扩散大致相同。

美国：政治成形和社会主义的衰落

对于“社会主义为什么如此少”的十三个答案

关于美国劳工历史的讨论，传统上将中心放在假定“美国例外”上面，尤其是美国缺少社会主义。桑巴特提出的经典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美国缺少社会主义至少有十三种解释(对于这些观点来说看 Lipset, 1977; Foner, 1984; Laslett 和 Lipset, 1974)。把根据美国是否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民主代替了社会主义，而把这十三种解释分成三组。

个人主义

1. 小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大部分殖民地是小农业主建立的，他们仍是革命的中心，是杰斐逊运动和杰克逊运动的中心。小私有者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占主导地位。早期美国不同情“封建社会”，后来的美国不同情社会主义(Hartz, 1955; Grob, 1961 强调了五个关于个人主义的论题)。

2. 边疆理论。最早是特纳在1893年提出来的，特纳认为，在残酷的环境中开拓边疆的斗争就如同对敌战争，这导致了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产生而反对集体主义。由于边疆拓展要求对神话般的文化引起共鸣，它影响了整个美国，是种族优越感和生存空间，而不是阶级斗争得到了鼓励(Slotkin, 1985)。

3. 新教教义鼓励个人主义。没有国家宗教，拥有强大的新教教派，美国鼓励个人从自己的伦理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

4. 迁移的机会鼓励个人寻求个人发展而不是集体发展。

5. 资本主义财富在美国人中扩散。 他们一直不愿干预私有财产关系。 美国工人一直就是物质主义者。

地方主义

6. 种族主义、奴隶制分裂了早期的工人阶级。 直到二战以后一直存在种族隔离制，每个地方黑人和白人的阶级团结依旧很难，尤其是 20 世纪早期大批黑人移民北方的时期(Laslett, 1974 年强调了所有地方主义的解释)。

7. 移民。 移民潮加剧了伦理、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分裂。 老一点的移民群的据点已确立，加强了具有种族特色的地方主义。 19 世纪晚期的天主教移民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因为教会后来进行十字军东侵反对社会主义。 克拉迪特(1981)声称移民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伦理而不是以阶级为归宿的。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自给自足的种族文化社区，而不是工人阶级社区，工人社区并未加强而是削弱了集体劳工的力量。

8. 大陆的多样性。 美国大陆的面积和多样性使不同地区的工业化程度不同。 不同工厂的工人在空间上一直相互隔绝，并且工厂一直在向没有团结起来的地区迁移。 为了确保不出现世代相传的工人阶级社区，工人们更多地迁移。 全国性的阶级团结从未真正出现过。

9. 宗派意识。 美国劳工由于派系斗争而内部分裂，像劳动骑士团、美国劳联竞争的社会党、工联主义者、产业联合会和共产党等。如果它们更多地同资本主义战斗而更少地相互争斗，结果将大不一样(Weinstein, 1967:Bell, 1974)。

美国民主

10. 早期男性民主。 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工人阶级出现以前，美国成年男子获得了民主。 曾用珀尔曼(1928， p.167)名言“自由投票权”，这是赞成美国民主观点的绝妙用语，不用求助于其他像社会主义一样的思想意识，而是通过自由民主，工人们就能缓解不满情绪(Lipset, 1984)。

11. 联邦主义。 美国宪法规定在相对较弱的中央政府(拥有很小的非工业资本城市)和相对强大的州政府之间实行分权制。 在政府的三个分支：总统、国会两院和独立司法权。 工人不得不分散对政府各机构的注意力，这就削弱了国家的阶级政治化和阶级团结(Lowi, 1984)。

12. 两党体制。 直到劳工出现，两个跨阶级的政党才建立起来了。国会选举建立在大的选区之上，总统选举，只建立在全国范围内。 出现了第三党，包括劳工党；都不能通过首先获得少数代表而在国家政治方面稳步前进。 由于劳工在选举总统或参议员方面不够强大，它在能赢得选举的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就能发挥作用，而不用去组成一个不能赢得选举的劳工党。 然而，政党在联邦体制中要比在更加集权政治中要弱。 这就放松了对政党的约束，它们对更广泛的阶级纲领没作出什么回应。

13. 压制。 关于美国民主比较愤世嫉俗的观点是强调非凡而特别的压制水平，即动员司法和军事来镇压美国工人阶级运动(Goldstein, 1978; Forbath, 1989)。

这十三个论据在解释美国社会主义相对弱小方面有一定价值。 是这些决定了结果吗? 这就是说所有这些不平等机会都摊在社会党人身上，社会党人怎么可能取胜呢? 但是在美国无论是敌视还是特别之处都不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的程度。 美国并不是一直都如此例外，像它逐渐在劳工关系中代表一个极端。 美国同其他国家的情况在性质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同其他国家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不是类型不同——我们已经看到1914年以前英国社会力量相当小。 美国并不是生来就极端化，美国是逐步走向极端化的。 因此，维护美国从开始并且一直都是例外的观点——或者是极端解释——第一群体的大部分——它的正确性非常有限。 我们将看到美国的极端主义产生于这一时期。

截止到“一战”时美国劳工的发展

我首先关注的焦点是美国极端主义的本质和形成时间。 有几个作

家认为它在于美国的政治权力关系而不是经济权力关系(Montgomery, 1979; Forer, 1984, p.59; Marks, 1989, p.198)。美国同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不同是因为在1912年总统选举中从没有一个政党获得的选票超过尤金、德布斯的政党所获的6%的选票。美国同英国不同，美国白人社区没有一个工会占主导的劳工党。美国既没有重要的社会党人，也没有工会为主的劳工党。但是极端主义也不仅仅是在政治上，20世纪的工会也变得激进，最终削弱并变得无足轻重。1990年，美国工会会员是不到劳动力的15%，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最低的一个国家，而且仍在明显的衰退。1958年艾森豪威尔重新指定5月1日为法定的劳动日——得到美国劳联的称赞——这是美国劳工史上一项聪明的重新命名(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作为一名外国居民，我一直对美国国家政治或州政治缺少工会而感到震惊。《共产党宣言》对美国大学生就像《吉尔伽美什史诗》那样陌生。

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两种极端主义是什么时候兴起的？表18.1和18.2说明1914年以前美国工人加入工会或多或少是我们对工业化水平的期待。确实，根据霍尔特(1977，pp.14—16)对钢铁业大部分精确的比较研究，1892年美国工会密度大约是15%，而英国落后，在11%到12%之间。对于国家工会成员是早期那个时代的估计证明，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工会密度大约是6%，美国是5%。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工会密度大约是10%，美国是9%，直到1880年，美国工会的密度下降到4%，在再一次增长之前是英国的一半(Ulman, 1955, p. 19; Rayback , 1966, pp. 104, 111; Montgomery, 1967, pp.140—141; Fraser, 1974, p.76)。由于英国工业化的程度较高，我们期望英国工会的密度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定。这些数字表明，美国工会在开始时并不比英国工会的势力弱，因为美国相对低的工业化水平将证明这一点。

这些数字都是不确切的，即使完全精确，它们对阶级组织的衡量也是粗略的。高工会密度和高罢工比例表明，阶级意识觉悟高的工人以

及“商业工联主义”一般都被看作是典型的美国特征。在对20世纪美国劳工关系特征的分析中，下面三点是显而易见的。

1. 几乎在整个19世纪，美国工人经历的工业化水平相比较而言并不比欧洲落后。美国工人积极参加早期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美国不需要像宪章运动或1868年起义那样的准革命运动。但是美国的好斗分子是激进的，被灌输以民粹共和主义思想。因为工人大部分在北部，各州的主要民族问题并未将他们分开。美国工会是激进的但不是革命的，美国工会或多或少的像英国那样发展，与英国相比有点落后。小的行业工会花费心思确立社会地位，制定福利计划，试图单方面制定比率惯例，雇用它们自己的劳动力，严格限制其他的互助会，逐渐成为地区组织，然后是国家组织。超出它们能力之外的是在大的工业工会方面的数次努力，它们面对贸易周期和雇主的攻击是脆弱的。很少有工会同情社会党人，大部分工会都奉行保护主义或者是温和的互助主义，它们期望使它们自己的“立法”生效——同19世纪中期英国的经历非常相似。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极右主义或极左主义没有什么市场。(Ulman, 1955; Rayback ,1966, pp. 47—128; Montgomery, 1967, 1979, pp.9—13； Wilentz, 1984)。

然而，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一种想象的面貌已经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家庭和本地社区的联系倾向于支持工作的团结一致。但是在英国大部分城市中，这种支持被伦理—宗教社区削弱了，伦理宗教社区这样的组织比工会更容易争取当地两党民主的政治支持。(Hirsch, 1978; Katzenelson, 1981)。

2. 英国工人随后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作出断然的、像阶级形式那样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比美国工人的反应更加强烈在铁路联合会的领导下，美国企业、采矿业、银行业从1870起开始合并成更大的企业，托拉斯和垄断组织受到不确定的排斥，但是股权公司兴盛起来。大约在1900年开始了企业合并高潮并且开始有了科学管理的观念。1905年，100家最大的公司占国家工业资本的40%，超过任何国家。公司合并可能使任

何一个国家的雇主对技工自治、技术、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猛烈的攻击。技工和工会尤其受到攻击。大规模雇用非罢工工人、不熟练工人和不加入工会的人为先锋，他们大部分是移民和从农业迁移而来的。雇主变得更有组织更有进攻性，更加有创造力。他们的间谍渗入各种水平的工会，直到劳联自身的最高委员会。古德耶橡胶公司雇用了800人的“飞行中队”，训练了他们三年以胜任工厂的任何工作以防罢工(Montgomery, 1979, pp.35, 59)。19世纪晚期的极端主义者是雇主而不是工人。

根据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的论证，雇主的极端主义应当增进团结和对劳工运动的进攻。它确实如此。工人们是在几次大罢工浪潮和工会扩张中作出回应的。群众罢工的主要武器是工联主义，1870年以后的七十年内在美国像英国或德国一样普遍。在1872年，10万纽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日。下一年接着至少有8个北部的主要城市举行反对失业的示威游行。1877年铁路工人罢工，受到许多城镇的同情和普遍示威游行的帮助。“19世纪最大量的工人卷入到劳工冲突中”并且赠予“全国范围工人的阶级觉醒”(Rayback, 1966, pp.135—136)。19世纪80年代有一个“大工会”运动，劳动骑士团要求技工和工业公司团结一致反对资本。直到1886年，骑士团有70.3万成员，占非农业劳动力的10%。1886年5月1日为缩短工时有一次全国性罢工；19万工人走出工厂，另外15万工人未罢工而缩短了工时。这一年底，又有10万工会会员参加了罢工。

像许多早期工会那样，骑士团不能稳固它们的组织而衰落了。现在，劳工开始同主要的技工工会合作。这样将会有更大的罢工浪潮。1889—1894年第二期罢工规模是后来罢工规模的2倍(Montgomery, 1979, pp.20—21)1892年，一次总罢工使新奥尔良三天处于瘫痪状态；然后是缓慢罢工，它破坏了全国的铁路网。1897和1898年，10万采矿工人罢工。1902—1909年西部矿工联盟罢工，要求对“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一次彻底革命”。在所有情况下非工会成员和工会成员一起参

加罢工，许多罢工是社会党人领导的。

在罢工人数方面，在好战的社会主义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到1900年美国工人运动并不落后(表18.2证明了第一部分的观点)。1872年德国有10.9万工人罢工，1889—1890年有39.4万人，1900有13.2万人，1905和1912年大约有500万人。法国的罢工浪潮也有类似的上升趋势(Boll, 1989)。19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有相当可观的罢工浪潮。1894—1895年罢工浪潮相对1889—1893年间较小。然而，1910—1912年间，罢工人数上升到新的高度，那时有100多万人卷入罢工(Cronin, 1989, pp.82—83)。这一阶段末只有美国有所不同，1905年后，劳工的不安没有较大增长。外国的社会主义观察者像恩格斯、爱德华·埃夫林、埃莉诺·马克思谈到社会主义早期的激进性。他们欣赏美国具有共和特色的社会主义。骑士团在其宪章中宣称："我们宣布劳工的工资体制和国家的共和制度有着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冲突。"但是外国社会党人期望本国的共和主义和小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像德里昂的社会工党和德布斯的党那样达成有创造力的妥协：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党在美国可能不一样，但为什么英国式劳工党和技工与工业工联主义的合并不能发展成单一的工人阶级运动呢?

3. 直到1900年，美国的劳工政治也没有落在英国后面(美国是一个有着最可观的政治和思想历史的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党人领导大罢工要早于英国。他们的思想影响劳工骑士团将政治和经济口号融为一体，像"废除工资体制"和"解放工人阶级"。劳联劳工、骑士团、农场主和激进的政治分子多次试图成立统一的劳工党(将在第十九章中讨论)。这些政党在工业城和农场的地方和州选举中取得的胜利早于英国劳工。英国社会党人将美国模式看成是可以模仿的典范。

在1893—1894年，劳联获得很大发展。它讨论了改良主义的计划；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公共设施、交通、采矿公有，废除血汗工厂和劳工契约；实行义务教育。序文强调"独立工党的政治基本原则"，

它们的最高要求是将产品实行全民所有，全民共同分配。这由个别工会加以讨论，然后在1894年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大部分工会同意这一要求，但是劳工领袖，尤其是工会主席塞缪尔·龚伯斯，反对政治工联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这一要求。工联宪章允许国家工会派比州和地方工会——社会党人主要的根据地更多的代表参加投票(Grob, 1961, p.141)。因此，1894年大会有部分舞弊行为，会议陷入僵局。个别目标得到批准，但是对公民权的要求由于提及土地国有而被削弱。序言以1 345票比816票而失败，这个方案作为一个整体以117票比735票而失败，社会主义因将龚伯斯逐出职位而遭到报复。

1895年大会开始澄清结果。龚伯斯通过向个别目标让步而重新任职，但是他组织了大量选票反对政党政治。他得到许多工会宪章的帮助，这些宪章禁止政府候选人——跨阶级的两党制方法，政党成员只能因政党政治而不和。因此，龚伯斯仍任主席一直掌权到1924年他去世为止。尽管社会党人有好几次动员了大多数成员(1/3以上)，劳联一贯反对工党，社会党人能够通过他们喜欢的所有方法议案，但是如果劳联依靠两党来实现立法议案，他们必死无疑了。

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工会在英国之前有点向改革的工党靠拢。英国工会联盟只在1899年为工党投票，基本上没什么政策。美国的结果最初是封闭的，并不是过多地由对美国例外的长篇大论进行解释而决定，然而它却因此一贯被批准，但我们不能仅仅将它归于龚伯斯的阴谋诡计。投票表明了两种相关的模式。

1. 美国这个国家相当支离破碎。像大部分国家一样，宗教至关重要，教会因以种族、本地、社区为中心而大大加强。劳联成员和领导人有一半是天主教徒。劳联大会的社会主义运动很少得到来自天主教代表的支持，但是他们动员了2/3的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我在这一章的结论中解释这一时期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

2. 技工和其他工人之间的宗派界限也很重要。在五个一般的采矿业、纺织业、酿酒业工会对各阶层开放，规定会员人数要低于劳联会员

的25%；但是劳联大会上左派选票占49%—77%。行业工会从失去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到失去内部劳动力市场，像制靴工人和制鞋工人、机械师、木匠给工会提供了断断续续的支持。捍卫者关闭了技艺工会，像印刷工人、塑造者、机车工程师，他们大量的为龚伯斯“纯洁而单一的工联主义”投票(Marks, 1989, pp.204—210， 235—237; Laslett， 1974)。但是劳联宪章允许这些国家技工工会操作选举。

因此，劳联的“集体劳工”被宗教—种族，本地社区和技工宗派分裂开来。它算不大上是国家阶级运动。我必须尽力解释其原因。

从这一阶段开始，美国劳工发展为独立的有组织的党派。三种发展趋势进行竞争，每一种发展趋势在每个不同的组织中占主导地位——同其他地方的劳工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劳联的大多数以及整个运动大多提倡保护主义、宗派的技工工会主义。第二，一般的产业工会，劳联成员占少数，寻求广泛的阶级合作运动。“二战”以前，这两大工会的成员如表18.1所示，合起来的数目并不落后于与之相比的其他国家；并且它们分裂后本质上并不比英国或法国工会差。但是激进产业工联主义者也转向奉行工联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the “Wobblies”)。从1905年起，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了不熟练工人和边缘工人的短期罢工，这些人经常是没有选举权的女性和移民。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并未太多干扰付费成员(在1912年高峰期只有1.8万会员参加)或者同雇主谈判契约。但是它们充满豪言壮语的罢工引起了有产阶级的恐慌。战争对它们起到了破坏作用。然后它们分裂为新的形式。产业工会形成了同劳联敌对的组织——产业组织大会。

第三种趋向是改良的社会主义，是少数产业工会发展为改良的社会主义，并且在西方发展为社会党。到1912年发展到不大可能再有发展的阶段时它的成员增长到11.8万人。1914年它选到市和州办公室有1 200名代表，控制了许多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和城镇的市政厅以及大部分小产业部门、采矿业、或铁路枢纽。但是1912年后它很快衰败分裂了，其活跃的部分组成了共产党。

因此，宗派化有三种倾向——技工工会主义、产业工会主义、改良的社会主义——都缩小了。尽管20世纪30年代在成员和战斗性方面有实质上的膨胀，但仍不及欧洲发生的情况。美国的工会运动基本上是支离破碎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劳工运动几乎销声匿迹了。现在劳工关系组织的主要形式是非工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和授予雇主特权的比较稳定合作的部门，还有二级部门赤裸裸严重地剥削主宰着劳工。

因此，像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早期的经济和政治行动看起来是第一个主要的转折点[3]。广泛的国家阶级本身和社会主义的崛起，然后都撤回到占主导地位的有美国特色融为一体的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宗派主义。我们发现了其他地方非技术技工的阶层界限和一些国家(例如法国、德国)的宗派主义的思想意识，但是，独有美国将二者融合，外加一个自称的地方主义，独有宗派主义与党派思想和地方社区有关，这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的身份和力量。为什么综合？编年学最能使第一组解释无效——通常是对于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自我称颂的看法——声称持久的“美国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为这一时期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一部分(Wilentz 1984年也谈到这一点)。19世纪美国工人阶级表明：美国有和其他国家一样多的阶级组织，有和一些国家一样多的早期社会主义。世纪末美国的阶级组织和社会主义怎么了？我的答案紧密结合有美国特色的四大政治成形。

美国的四大政治成形

1. 国内的军国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雇主的极端性。因此，一种看似合理的答案是美国工人阶级受到暴力镇压。大部分大罢工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在相对有利的19世纪早期以后(根据Katznelson, 1981, pp.58—61)，内战后美国发生剧变走向另一个极端。培夫脱和罗斯(1970：281)简单阐明了最主要的因素：在世界上所有工业国家的劳工历史中，美国劳工史是最血腥和残暴的劳工史。实际上，专制的俄国情况更糟，但是这个例子除外，关于美国这一时期尤其例外，或者说美国

工业暴力和辅助军事镇压极端化。许多作者颂扬美国例外甚至未提这一点，而更糟的是他们宣称美国实际上几乎没有暴力(Perlman, 1928; Hartz, 1955; Grob, 1961; Lipset, 1977, 1984)。但事实恰恰相反。

自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工人面临着两种压迫。第一，他们被(自由派资本家)对宪法和劳动合同的随心所欲的解释所侵扰。就像我们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看到的一样，公民权被认为其本质是个体，而非集体的。虽然工会和罢工从原则上自1842年起就是合法的，但是大部分次一级的行为，因同情而加入的罢工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合抵制都被认为是否认雇主控制自己财产的合法权利的“阴谋”。如果雇主雇用不参加罢工的工人，而罢工纠察队员阻止他们上班就被认为是非法。雇主劝说警方执行法律或者他们自己去法院获取强制执行法令。法官把工人的策略说成是个人基本财产权的“暴行”、“专横”、“篡权”。大多数劳工法都是各州自己制定的。但自1894年开始，最高法院开始介入，把《谢尔曼法案》从防止企业垄断的初衷改为防止工会的垄断。如果罢工或联合抵制不涉及工人自身的工资或工作条件，也不源自合法的个人权益，就被认为是“恶毒”的。自19世纪80年代，因同情而参加的罢工有15%以上被法令禁止，在20世纪则高达25%之多。雇主没有被禁止其继发性地关厂和开放工厂；他们可随意处置自己的财产。

法庭同样干扰行业工会方面的立法。到1900年，州和联邦法院已经废除约60部劳工法，尤其是关于反对惩罚罢工工人，用代币券支付工资(在企业的商店中消费)，为男人规定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虽然法院通常对女人和孩子负有道义责任)，减少阴谋的法律等等——所有这些法律都被作为“阶级立法”而废除。司法对普通工会或者社会党人的镇压最为严厉，因为他们能发动基于个人利益的广泛罢工和联合抵制活动。对能够把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组织在一起的罢工，法院颁布禁令，称这些罢工是“专政”、自由的对立面(Fink, 1987; Forbath, 1989; Woodiwiss, 1990)。

第二，法律得到军事和准军事力量的支持。在大罢工中逮捕了1 000—2 000人，在小罢工中逮捕了100—200人，工人是习以为常的。警察和迅速膨胀的全副武装的力量完全应付得了大多数罢工。但是在少数规模较大，被认为有危险的罢工，或者当不参加罢工者需要保护时，正规军、州民兵和雇主的私人武装力量通常代表合法的权力——这在欧洲是不为人知的。1877年和1903年间，在500余次争执中使用了州民兵，有时这些武装力量还得到联邦军队的支援。最大的私人军队——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拥有比美国军队还多的人员。

他们不仅仅逮捕人。这一时期，在劳工关系方面，仅有沙俄的死亡统计数超过美国(如表18.4所示)。为什么美国这么残暴？可能因为枪支更普及。任何见过罢工的人都知道罢工的场面：人们你推我挤，拳头挥来挥去，特别在工厂的罢工纠察队活跃时更是如此。双方手中都拿着枪，很容易造成死亡。目睹了英国足球流氓和美国少数民族骚乱者与警察的搏斗，我无法相信在美国造成更多死亡是因为美国年轻人比英国年轻人在情绪上更具有“暴力”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美国人有枪。但是，我们必须为美国的屠杀加上第二个原因：美国的雇主和警察不愿妥协，所以暴力倾向会演变成行动，并允许使用含“炫耀性的武力”。这种僵化、不灵活是美国和沙俄共有的特征。

在沙俄和美国，几乎所有的暴力都是由雇主，政府当局实施的，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工人。在1877年的一次铁路工人罢工中，4.5万人的州民兵和2 000人的联邦军队造成了至少90名工人死亡。在1894年的铁路工人罢工中有34名工人死亡。在1902—1904年的罢工浪潮中，根据可靠数据，至少有198人被杀害，1 966人受伤，5 000多人被捕，这是暴力的高潮期。在这之后，暴力仍零星可见，特别是在西部，如1914年在科罗拉多煤矿工人罢工中死亡74人。

暴力，像合法的镇压，集中针对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罢工，针对想联合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建立大工业工会的罢工。难怪记载暴力行为的主要编写人罗伯特 · 戈德斯坦总结道：镇压对削弱美国劳工扮演了重

要角色，并且是劳工激进主义和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1978， pp.ix, 5—6, 550)。威伦茨(1986， pp.252—253)指出1886年至1894年间受镇压后的失败是工人罢工事业的转折点。谢夫特同意劳联手工业工会主义战胜了统一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者被完全打败了。霍尔特(1977)指出镇压可以解释美英钢铁工业工会的不同发展轨迹。尽管最初美国钢铁工业工会比英国钢铁工业工会的力量更强大，但1892年对霍姆斯泰德罢工的镇压最终摧垮了他们。他们于1901年被美国钢铁公司毁掉，尽管公司最初谨慎地提供给导致手工业工人后来分裂的养老金和股票持有者的权益(Brody, 1960, pp.78—95)，但工人们最初表现得很团结。他们没有对雇主决定赶走工会的做法作出相应回应。雇主雇用了大批工贼、平克顿手下的人和联邦军队，并把罢工工人列入黑名单，进行工业间谍活动。最终雇主们可以把许多手工业工人从团结的整体中剥离出来，从而镇压其余的工人，这是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美国极端主义——这一段令人吃惊的时期已经深深地留在美国政治和学术回忆录中。

用军事主义来解释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为什么美国的镇压不像我们后来看到的欧洲镇压那样，反而增加了工人的团结性和社会主义性？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美国的三种政治形式。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工人会作出那样的反应。

2. 资本家自由主义。在美国，资本主义形式呈现出极端(就像前面提到的十三条解释中的第一条)。镇压由国家来实行，国家已经特别根据法律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它体现了一种彻底神圣合法化的资本主义概念。宪法把自由、个人及其财产这两种合法原则结合在一起，并在已制造出来的**成文**文件中将其神圣化。如果在镇压水平方面与沙俄比较最合适，那么两个国家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沙俄的镇压源于专制君主制，它的法律是受政治利益约束的沙皇的意愿。虽然俄国资本家欢迎镇压工人，但他们很少发起或控制这种镇压。甚至德国和奥地利的资本家，虽然在政府中有更大的权力，也不得不与王权和贵族分享政权，他们承诺提供秩序和权力以促进除私人财产自由外的其他原

则。用韦伯的话说，美国资本家们，一个“政党”，特别是通过司法制度，控制他们的政府。它的神圣的法律和警察制度，使财产权和自由权神圣化。

就像我在第五章所解释的，美国还把政治概念之上的法律概念中的秩序和公民权神圣化。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过。自1900年起，当总统因为国家经济的分裂而进行调停时(像所有国家的政权做法一样，甚至德国和俄国)，上述做法在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罢工中有轻微影响。但在美国，法律概念特别体现在不罢工的范围上。如果欧洲的雇主引入工贼，他们就不能指望获得警察和军队的坚决保护。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国家精英们也许认为是工贼，而不是罢工对社会秩序构成的危险更大。他们经常迫使雇佣者与工人修好，重新建立关系(见 Shorter 和 Tilly 1974 年的参与后者的大量法国事实)。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却很少发生，国家精英严格地遵从财产法，雇主可以和他们喜欢的任何人签订私人雇佣合同。如果雇主和工贼签订合同，法律和州政府会尽全力保护他们。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控制着文人—军队体系。

美国资本家的信念得到这部神圣法律的支持。他们自以为是地相信他们的私有经济利益、法律和根本的自由的价值的平等。在争执中常常搬出上帝。1902年，无烟煤矿的领袖说：“劳动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保护和关心——这不是由工人煽动者，而是由基督徒来实现的，对这些基督徒而言，上帝用无穷的智慧控制了这个国家的财产利益。”(Rayback, 1966, p.211)

美国资本家也正处在政治和经济的巅峰。他们发明的企业经济正欣欣向荣；他们在国家和除南部以外各州的政治中占主导地位。杜波夫斯基(1974, p.298)说：“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人和社会党人失败了，不是因为美国例外，而是因为当国的统治者最有信心，团结最紧密时，他们分别到达了各自的顶峰。”

我们从1840年的英国可以看到英国统治阶级团结一致，摧垮了宪章主义者。但是现在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没有再表现出如此正义的强

大。相反，英国的企业家就像工联主义者约翰·霍奇(后任工党内阁首相)所说的：“因为一直打板球，而得到了荣誉。”(引自 Holt, 1977, p.30)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工业资本家几乎别无选择，因为不是他们，而是玩板球的旧政体成了政府和政党的核心。以前已经消灭了反叛的工人阶级，这个政府现在面临重大的部门劳工运动，这个政体需要他们的选票并且准备与之握手言和。保守党和自由党都不愿让雇主实行他们的阶级政策，都认为法律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就像所赋予的真正的议会自主权一样。美国的国家精英和各党派支持法律，而且这比政治利益考虑变换得慢。因此，个人主义较少地由工人内在化(如美国例外论的第一部分解释)，而较多地由集中于司法的国家精英和资本家阶级内在化。

这种明显的美国司法压迫并不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在今天，它的现代版非常盛行。存留的工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恫吓，尽管受警察和准军队恫吓的次数比以前少了。更底层的工人阶级，主要是黑人和拉美人，因为有强大的警察和准军事组织，而被控制在内城区的绝望中。政党民主的议程上也没有经常出现镇压——这些集团不资助政党，而且几乎没人投票。

这引起了对传统政权一个尺度概念的怀疑。比较政治社会学的主要传统是把政权分为专制派对君主立宪派，独裁对民主政权，其基础是“右—左”连续的统一体——我对代议制的称谓。持此观点的作品从摩尔(1973)、李普塞特(1984)直至鲁斯切梅尔、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1992)的、实际上也包括我第一卷中的后面章节，甚至还有最近的作品(Mann, 1988)。然而，像鲁斯切梅尔和史蒂芬斯承认的那样，美国历史在这种传统中坐立不安。在穆尔之后，他们提出为什么美国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同时却在南方有庞大的压抑劳工的农业存在。像他一样，他们寻求解释为什么德国型的工农业资本家之间的专制联盟没有发展。他们的原因很充分，而且和我的类似。

首先，联邦制允许南方地主实行镇压；其次，工业资本家们在民主

国家内似乎也能适当进行镇压。但我的理解更深入一些。美国政治制度完全由联邦主义控制(稍后探讨)，其多样性极大地压制了大众自主权的表达，像第五章所描述的，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这种定型第一个是以司法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限制了社会真相和反对权力的运作者的策略选择。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政权”暗示的一样，这些限制不受外来政治制度影响。司法力量体系是政权的一**部分**，而国家的形式是多样的，让我们转向第三个美国政治成形。

3. 党派民主。美国在19世纪拥有世界上最制度化的两党民主。两党操纵着镇压大权，妇女不能投票，且南方黑人已丧失了他们短暂的投票权。但是工会人员基本上是男性和北方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投票了。工作上男性居主要地位，共和主义也许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正如蒙哥马利所指出的，对老板的“男士”风度是美国工人阶级的美德“它的含义包括所有的尊严、声誉不服从的平均主义和男性的统治权威”(1979， p.13)。美国工人的骄傲，他们说话时的武断，他们系在(手枪)皮套带子上的工具——所有这些都给外国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认为这些是对权力的有力声明。男工也许因这种状态而感到从国家那儿得到了权力。与俄国甚至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不同的是，美国工人不会轻易将暴力和法律强迫看作是应该被推翻的政府的可预料的特征。直到1896年，参加投票的比率都很高——高达85% (75%在城市)——而且移民也更容易登记。大部分工人，包括工会成员，能“自由”投两党的票，而两党的行政却支撑着他们的镇压统治。李普塞特说道(1984)，比起欧洲工人，美国工人的政治不满少一些，不需要把经济不满政治化为社会主义。1896年后，白人男性民主削弱了。居住和公民权要求，对准了移民，而且进步立法的目的是反对城市机器大大降低了参加投票率，特别是工人参加投票率(Burnham, 1965, 1970, pp.71—90)。

但是美国政党民主轻微削弱会给工人带来好处吗？它是像李普塞特说的是一个宽厚的、负责的政权吗？镇压表明不是如此。要记住美国

政党民主组织的两个特点。第一，政党更多地植根于地方区域，种族宗教分离的权利体系，而不是国家或阶级体系，工人并不是赞同或反对镇压而是为了**不同**利益，这些利益是关于“战利品”，及他们地区、种族、宗教团体的利益。因为工会正变成立足于工人的地区组织，它们自己经常支持反移民的政治。因为在美国宪法制度下，镇压不是由政治家，而主要是由法庭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从选举中除去了(类似于现在)。

第二，在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里，工人仍占少数。到1914年为止，他们仅占人口的1/3多一点，大体和农民平分秋色，也许是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双倍。工会工人是少数。他们必须关注许多无组织工人，许多部分地由当地贵族控制，而且也要关注其余的两个阶级群体。他们最后失败了。工人提倡降低财产自由，然而农民和中产阶级深深地依附于财产并能摆脱许多地方劳动依靠。劳工企图使拥有少数财产的防卫从大的、团体财产中分离出来，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失败了，因此失去了农民、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和很多没有组织的工人的支持。失去农民的支持特别具有毁灭性。尽管很多人反对当权者对工人的暴力，并且也对团体“垄断”表示非常不满，但他们并不支持仍有争议的“工会垄断”的解决办法。农民—劳工政党的失败(在第十九章中讨论)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两者的联盟，大多数地主阶级可能会镇压少数工人。主要是地主阶级(加上他们各自权力的依赖者)，而不是工人，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国个人主义更加国际化。

美国政党民主对工人并不宽容。给予他们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民主党和共和党是跨阶级、地方—地区、种族—宗教、部门的联合。工人确实热情支持工人的竞选人(Bridges, 1986)。但政党却并不适合表达阶级利益，特别是在民主党变得更为乡村和基督教化时，它具有明显的南方保守派的特征，而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党北方派，以工业的(工人和生产商)和清教徒为特征。许多当地的例外也加深了分离主义。党派的全国团结被政党和行政之间明显的**联邦**分离削弱了。是总统，

而不是政党，组成了内阁并起草纲要。因此，政党不像那些在宪法体制下体现议会主权的政党，很少因为需要形成连贯的纲要异化而受到适当地约束。派系之间继续进一步分化。

工会必须给两个政党的个别政治家施加压力，龚伯斯说：“回报你的朋友，惩罚你的敌人。”尽管在城市工业选区，这样能产生有同情心的政治家，但它不能用立法纲要驱动一个国家政党，也不能选举参议员，更不用说总统，或者委任法官到高一级的法院。它的成功大部分在地方和国家政治，但他们的立法可能被法院搁置一旁。

在联邦水平上，工会的直接影响可能少于在英国或甚至德国国家政治中的工会影响。这种观点和这时期的一些说法相反(比如 Rayback, 1966, pp.250—272)。这看起来也是与直觉不一致的，因为德国是专制王权国家，而半数的英国工人不能投票选举。但德国政府必须机敏地策划以推动反工人联盟，而且采取一些创新进步的计划，像社会保险，以使社会主义处于绝境之中。在英国，工会能够选举议会议员而且这影响了两个党派，特别是自由党，因为它需要工人阶级的选区。在议会里，政党对行政和法院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塔夫 · 韦尔案件中，法官在取消了某些工会组织权利后仅仅五年，1906 年自由党政府选举立即获得《贸易争端法案》，授予工会以它们需要的组织自由。不像大部分自由党立法，这很容易便通过了托利上议院。

相反，美国工会从全国政党那里得到的很少。众议院对限制罢工禁止令法案表示同情，但参议院并不如此。政府颁布了严格的童工法，并限制女性雇佣的条件。但在其他国家，跨阶级的道德和男性舆论存在以“保护”妇女和儿童。比起英国和法国，工厂安全法规更少、更晚。美国劳工部的建立引入了和解程序，并把工会带入行政的势力走廊，但这也只是在 1914 年，继英国和法国之后。州际铁路的八小时工作制，对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和海员的改善是真正的收获。1914 年的克莱顿法案规范了公司，有时被认为是工人的收获。该法案断言“人类劳动不是商品或贸易货物”，工会是合法的，也没有违反反信任

法。但这的确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留下了“阴谋”和滞后，同情行为(Sklar, 1988:331)。实际上反工会禁令的频率在克莱顿法案之后上升了，达到了20世纪20年代因同情而举行的罢工的46% (Forbath, 1989, pp.1252—1253)。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组织者也对新劳工法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疑问：“他们是怎样实施的?”(Dubofsky, 1969, p.158)

直到1932年，《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才授予工会组织权，但英国早在1906年就已颁布。他们在被镇压中付出了代价之后，美国民主最终让工会获得了集体公民权。拉斯莱特(1974，pp.216—217)指出，威尔逊政府作出的让步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党：它大部分的附属工会已转向民主党。如果这样，它们被诺言而不是被行动所诱惑，而且它们勉强接受了比欧洲同行更不好的一些条件。工人取得了一些收获，主要是作为大众选举人，而不是作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大众选区(例如中产阶级和农民)一起为政党服务。通过直接的参议员选举来扩大选举控制力，规范商业垄断，广泛的义务教育，现代的收入税，这些改革是通过现代的跨阶级合作达到的，其中，有组织的工人起了辅助作用(Lash, 1984, pp.170—203；Mowry, 1972; Wiebe, 1967)。不是所有的马歇尔“社会公民权”必须来自阶级行为。1913年引入的现代收入税(尽管直到战争时仍然很少)，受到来自竞争性党派体系，而不是来自工会的压力(也像英国那样)。但总之，在最严酷的镇压期间，工人利益并不经常受助，而且更经常地被美国的党派民主阻碍。

4. 联邦主义。美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成形首先是邦联，然后是联邦。是权力分离的政府而不是中央集权的政府实施了镇压。工人的抵抗运动在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之间，在法庭和各政府机构之间的作用下逐步瓦解。在这期间，民权国家范围的扩大，在大部分国家都注意使工人运动全国化，但却进一步分裂了美国的工人力量。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执行了大多数新的职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在和工人相关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意义(我间接引自Lowi, 1984)，这分离了潜在的民族阶级统一。大部分劳工法是由各州自己制定的。到1990

年，各工业州如马萨诸塞和伊利诺伊都有比联邦政府更多的抚慰性的劳工法。大部分政策都是镇压性的，有些政策还非常残酷。这种不平衡性对这个广阔大陆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每年，北部一些州可能会通过一些进步法案。并且对保守的法庭统治提出方案，而西部一些州可能会刺杀几个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人员，西南一些州会攻击平民党，南部一些州则不断强化种族主义。全国范围广泛的阶级**整体**这一概念难以实现，即使对那些被枪杀了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南方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联邦问题。种族主义者支持国内军国主义者打败在以土地占统治的南方形成阶级动员的企图。这就意味着在联邦这一阶层上，由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坚实的利益集团，在选举中基本上未遭到反对，利用资深的国会委员来保护他们的保守统治。正如富兰克林 · D · 罗斯福后来所发现的，他们很难控制亲劳工立法。他们的“一党政权”在南方正在增加对国会山的选票，尽管它是反动的，但它还是民主党。

地方、地区政党和社区组织在联邦宪法强化以后繁荣起来，它们得到了种族—宗教移民浪潮的不断补充。市政府把这些利益分给下属部门，特别是通过从政府法律颁布“不同意见”和经济利益的许可和赞助。许多工人的利益——包括居住条件、健康、运输控制和公共设施，以及公共场合的人员雇用——都由市政水平决定，通过分散的权力关系，而不是阶级关系进行渗透。商品是通过种族、宗教社区和城市赞助机制来分发的。土生土长的熟练技术工人在这些机制内产生重大的本土影响，跨阶级联盟经常直接反对新加入的移民工人。联邦主义、分离主义政党派别和种族分子相互作用，削弱了阶级的整体意识。阶级和国家不是对抗的双方，它们相互加强——或者说缺少任何一个则会彼此削弱，正如在美国一样。阶级被局限于雇佣关系是这一时期非常普遍的趋势，而且变得更深刻了。

国内的军国主义、资本家自由主义、党派民主和联邦主义——所有这些同时对美国政治和阶级起到了分化作用。斯科罗内克(1982)客观指

出，“这个法庭和政党国家”阻碍了美国国家政权官僚政治的发展——但联邦主义也是如此。美国国家政权基本上仍是军事化的，正如第十一章的资料所揭示的那样。因此，在文人—军队问题上，美国内部机制的形式仍以军国主义者为优势。

工人的反响：地方主义

但这些自由资本主义者、民主政党和联邦军国主义最终完全彻底成功地击败了工人，因为这增强了他们固有的趋势，不是用阶级，而是用**地方主义**来作出反应，镇压指向一般的工联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不是手工工会主义。技术工人宁愿逃避，而不去做些有用的事。雇主们部分根据贸易循环选择可选的，或选择更普遍的镇压。当满额订单要求全力生产时，他们便会承认手工业工会的力量，并同意劳联要求国家允许的请求。大多数手工业工会压力是地方上的，是针对个别雇主的，需要市政的政治支持，而且需要无罢工行为。技术工人的非正式牢固团体建立起来，对于警察的渗透或镇压相对是无懈可击的(Marks, 1989, p. 53)。有选择的镇压加剧了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工人的正常分裂，成为更策略性的、组织性的地方主义。[4]手工工人迈步走自己的路，留下一些不太受欢迎的同志去听天由命。

在这点上，美国与沙俄截然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俄国国内的政治暴力对所有技术水平都进行同样的镇压。第二，俄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允许技工组织逐渐成熟起来。技术工人没有组织的来源，并让它发展下去。镇压分裂了美国的工人阶级，却联合统一了俄国的工人阶级。正如社会主义的伟大战术家列宁分析俄国事例那样，主要战术家塞缪尔·龚伯斯也分析了美国事例。

龚伯斯和他的劳联通常避开政治，尽管劳工联盟1908年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对议员进行游说的组织。但这一组织并不活跃。龚伯斯和米切尔对国家市政基金的会员资格更加忠诚；这是一个先进公司领导者的压力集团。龚伯斯和米切尔想要国家市政基金说服

商业巨头们加入劳联和雇主协会之间的协议中来，该协议会减少大型罢工的可能性。当当地许多工会正活跃地在国家和市政水平上呼吁支持劳工立法时，劳联在全国倡议“志愿捐助主义”(Fink, 1973; Rogin, 1961/62)。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按法律条款执行的：因为法律禁止工会的“压力”，非正式的志愿协议是工会的主要保存力量(Fink, 1987, pp. 915—917)。但龚伯斯走得更远一些。他反对以社会保险立法作为降低工人独立的手段。甚至这并不是唯一的因为工会有如此强大的保护主义和互助主义作基础，他们领导中的许多人对这些政府干涉表示怀疑。但龚伯斯强烈地反对工厂的法规和工业争议的仲裁使工人步入“超法律主义”的陷阱。他甚至反对禁止开除工会成员的法律：

> 我对试图确保通过涉及雇主解雇雇员权利的议案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如果我们保证颁布一项使此行为非法的法律，我们的敌人肯定会主张以任何理由单独或集体即(作为一个整体)退出工作都是不合法的，他们将努力保证颁布一项能达到如此效果的法律。(Fink, 1973：p.816)

这看起来很古怪，但是他自己作为雪茄制造商联合会的组织者的经历教会了他避开政治和立法，集中精力对私企营业主施加直接的经济压力。这个联合会努力游说以制定一项纽约州的法律来消除廉租公寓的建设(雪茄生产家庭在雇主所有的廉租公寓的单元里居住和工作)。法庭裁决新法律不合宪法，工会成功地为一项修订法律展开游说，而且法庭也裁决这是不合宪法的。龚伯斯的阐述如下：

> 我们讨论了进一步立法行动的可能性并决定加强组织工作。通过我们的工会，用罢工和鼓动宣传来给制造商施加压力，直到他们相信——也就是对他们而言，用很小的代价放弃公寓生产体制，让工人在像样的工厂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因此我们通过经

> 济力量成功地实现了我们通过立法没有获得的东西。(1967，I, p.197)

因为这项法律对劳工造成了很大伤害，我们应该放弃它转而支持“经济力量”。他的雪茄制造联合会的顾问阿道夫·斯特拉瑟在1894年说：

> 在联合会，不改变美国的宪法和各州立法你就不可能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我反对为了争取在我们死后才可能颁布的法律而浪费时间。(Forbath, 1989; p.1145)

与政治激进派和社会党人的联盟只能伤害劳工。龚伯斯的自传对社会党人就像对资本家那样表现出了很大的敌意。尽管他一直宣称尊重马克思和他的观点，他说他对社会党人的不信任是在1874年“汤普金斯广场暴乱”中产生的。当时他跳进地窖躲过了警察的追捕。他的经历

> 成为将来我理解劳工运动的指南。我看到激进派和制造轰动新闻的人是如何集中所有有组织的社团来反对劳工运动并提前使正常的、必要的活动无效，他们是多么地专业——我看到知识分子与联盟结合在一起的危险，这些知识分子不懂拿劳工运动作实验就是拿人的生命作实验。(1967，I, pp.97—98)

龚伯斯提倡回到“单纯简单的”工会主义，意识到那是一个回归。正如他在1914年写的，劳联“是被过去的历史指导，并从过去吸取教训——它沿着很小阻力的线路发展”(Rogin, 1961/62, p.524)。

龚伯斯相信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群众运动扩展得过了头。劳工不得不从有“永久”组织的最强大据点开始慢慢重建，提

供给组织成员职业、福利、丧葬保险、医疗报销和罢工基金等。尽管这些是内在的愿望，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成员和工会之间永久的关系(Gompers, 1967, I, pp.166—168)。只有资金充足的组织能够经得起长期的罢工和停产。说服这些没有类似资源的群众是没有用的。他们必然会失败。龚伯斯说那是整个时期的教训。那就是他为什么那么蔑视和憎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因为他没有充足的资源，没有罢工资金，甚至没有正式的成员就领导工人进行罢工。他说，**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叛徒，不是美国劳联的领导人。

但龚伯斯的策略对整个工人阶级不利；实际上，他们预料说阶级统一并不存在。对政治的放弃减少了活动的范围，削弱了“集体劳工”的整体，因为它意味着放弃了也许对工人阶级家庭和社团有利的社会政策。劳工运动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严重的限制，成为男性雇佣经济主义。甚至龚伯斯的策略都是地方主义的，因为它们要求工人有罢工基金，企业主找不到破坏罢工的人。原则上，不罢工的工人会被整个阶级的“一个大工会”排除在外，但这一策略在群众暴动和镇压中失败了。龚伯斯相信，组织大批非熟练工人实际上伤害了手工工人。20世纪的许多美国工会，如著名的卡车司机工会，通过暴力抑制了不罢工工人。但是这些不罢工工人很少能成功地承担技术工作。

虽然龚伯斯说这些持续的、有耐心的组织会逐渐为其他工人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但实际上，除了手工工人，其他工人很少能提供大量的工会资金，也很少能限制本行业的技术培训。在实际操作中，他的这种理论等同于手工艺保护主义。在宪章运动之后，新工联主义产生之前，劳联退回到了英国工会在1850年到1890年的水平。1900年之后，美国的工人运动变成了所有发达国家中最软弱的——部分是因为龚伯斯和劳联在面对无情的合法镇压时，持有一种不很坚定的意识。

但是通过限制候补工人的数量，劳联手工保护主义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劳工运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移民。这样，关于美国所谓“自然”的地方极端主义的第二种解

释，在应用到1900年之后这段时期内是有效的。当然，从一开始，种族主义和移民分化就没能促成工人阶级的团结，特别是在政治上。黑人白人的分裂大部分局限于南方。这段时期，经济利益中最持久的分裂实际上出现在亚洲的移民和其他的移民之间。大部分美国工人组织对华工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这种敌意一部分来自对“黄色人种”的歧视，一部分是因为在西部，来自中国、经过训练的劳工正在取代白种工人的位置。除此以外，美国的种族—宗教对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出现在兰开夏的英国和爱尔兰的对立，在德国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的对立或德国人和波兰人的对立。

起初在这方面美国也不例外。实际上，在劳工骑士团和像在1877年或在霍姆施塔特那样的大罢工中，或在煤矿工人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经常包括黑人)、男人和女人之间显示了惊人的团结精神。但种族经济关系却变得更糟。部分原因是因为从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数量的增加，使居住地和工作的种族分化变得更为严重。在工人运动中的分化使情况更为严重：一方面，劳联主要吸收本土和北欧的成员，另一方面，普通的组织和政党组织吸收东欧、南欧和黑人作为成员(Shefter, 1986, pp.205—207， 228—230)。劳联反对移民的游说活动现已成为一种主要立法上的行动，这更加深了地方主义。

关于美国的结论

我没有提到对美国例外论解释的全部十三个理由，但我的观点是比较明确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点也不例外。美国不是从一建立就存在着这种极端分化，而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转折点出现在1900年左右，主要是因为四个“高水平的政治成形”加剧了工人之间的分化——如国内军国主义者、自由资本主义者(司法集中的)、民主政党、联邦主义政党。像李普塞特所说的那样，统治的形式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它对工人既不友善也不爱惜——一维“民主”就是这样——像他提出的。政府是多形的，而不是唯一的。面对残酷的镇

压，美国劳工的分化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手工工人和非手工工人之间的区分也就更为明显。绝无仅有的是，熟练阶层、国内劳动市场的地方主义和思想派系主义相一致。占主要地位的劳联派使阶级范畴狭隘化了的同时，机构分裂为派系化的工人组织，并不断加深，扩大了地方主义和种族—宗教分裂主义。

虽然还要继续战斗，还要进行一些决策，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工人运动再度兴起，但美国已不再有工人阶级，工人可以称自己为“劳动者”而不是“工人阶级，他们深受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Halle, 1984)。我认为这是偏离社会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正如李普塞特所说的那样，也正如这些章节里强调的，美国政府不像其他的保守政府一样，并没有强调工人阶级的身份。不像大部分欧洲国家，仅通过国家公民权的一般战斗，一个国家范围的阶级整体地位是不会给予工人的。普通政治需要并没有消除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种族、宗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联邦主义和派系主义更强化了这种差异。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工人阶级不能取得公民身份，如果工人争取自己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就会遭到全国范围的镇压。在中央阶层和阶级敌人的政策推动下，工人们被迫进行全面罢工，以期实现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并最终建立自己的政权。这种因政治上的强制而使全国阶级最终实现团结的现象在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小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小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的零星的影响可能过多“决定”以后的结果。但白人男性工人在军国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及民主政党和联邦政府的早期介入，加速了工人的分化和纷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阶级本身逐渐消失。

社会主义理念需要一种社会整体感或两择其一的东西。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提供社会整体化的经历。私营企业或单一贸易、工业等类似的组织联合是最接近于真正的可实现的社会整体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联合网络渗透到世界各地，这是局限于小社区的人所无法体会到的。因此，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动向就不容易被个人以同样

的方式体验其整体性。 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对不同的公司，工业和技术行业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 工人们可能会有过激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可能会因行业、地区的不同而稍有差别。 因对政府不满而引起的骚动使不同的运动变得逐步统一起来。 阶级和政府相互加强，派系主义和地方本身也是一样。 除此之外，工人也被分为有组织的熟练工人和无组织无技术的工人。 在历史上，美国工人一直是这样划分的。 美国劳工没有清楚地表明权力关系整体性的一种意识，或发展他们可选择的一种模式。 到1914年，这已经相当清楚了。

美国不是一个“例外”，但它确实变得“极端”。 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没有抱怨，而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成形进一步加强了它们的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 这种极端主义可以解释如果资本主义可以跨国界，也就是说如果工人运动和国内战争无关，就会发生不存在的与事实相反的情况。 正如马克思所坚信的，离开单纯的工人阶级去实现社会主义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斗争。 没有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资产阶级就可能真正拥有了霸权。 在当今这个国家交往日趋紧密的世界，拥有真正的霸权对世界的威胁是相当大的。

俄罗斯帝国：军事独裁与革命

俄国在这一时期所爆发的工业化和农业改革是剧烈而不均衡的[5]。1861年废除的农奴制加速了因土地而引起的纷争，对此我们将在第十九章予以分析。 大约在1900年后，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俄国尚处于雏形的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了。 大型工厂和许多无产者移入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促生了一个更致力于后勤的工人阶级。 通常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这种集中并没有按俄国发展水平和产业工人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所期望的那样，而是真正产生了一个更加庄严、植根于团体的工人阶级。 俄国

是因为政治成形而导致了革命，而不是因为工厂规模的大小。

在表现方式上，沙俄表现出的是不同于美国的另一个极端。直到1900年，它一直是欧洲唯一的君主专制政权，唯一不用党派民主来进行粉饰的政权，一个国内精英和政党大多以宫廷派系相互联系的政权。在保持俄国核心领土周围的大帝国时，其军国主义色彩也很突出(虽然英国的军国主义也保留了附属的爱尔兰岛)。这样对内对周边的地带都不同寻常地宣布了自己的军事政权。沙俄政府确立为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高度独裁化，军事化和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它拒绝了“国民”或“国家政府”的标签)。

但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团体的东部边缘也受到了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的影响。正如我们在第十四章所讲的，经济发展得越晚，宣称科学知识和着眼未来的技术治国和知识分子就会涌现得越多。在俄国的专业人员、绅士、贵族还有政府管理人员中，一个有自知之明的、部分自治的知识分子兴起了，促进了另一种进步方式。政府精英分子派系化，右翼宫廷政党主张实行专制主义，支持沙皇实行18世纪的策略——给原来的农奴以财产，进行全民教育，赋予公民权。保守主义被涂上民粹的色彩，激励沙皇成为沙俄或斯拉夫人民或东正教教会集团的首领。另外也有左翼人民运动。自由党提倡民权和部分政治公民权。在本土的人民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相结合之外，形成了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在其他国家，这种多样的策略出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在俄国的沸腾中，知识分子们同时争辩所有这些首创的法规——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形象生动描述的那样。两种政治被混淆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比较敏锐的权力。

这个国家陷于内部党派纷争与国外暴乱的包围中。因此随着19世纪末国家平民阶级的壮大，派系主义也在膨胀。像其他地方那样，平民化也导致和解政策迅速发展，但它仍是国家政策的从属部分而不是主导。具有不同背景的国家部门、官员提出了军事镇压、家长政治、政策协调、有限和解、劳工组织自治等各种治国策略。财政部与安全部

显然发生了分歧。

政体也有多种选择，但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一种。国家成形为独裁国家。极权政治被专制君主批准，他的话就是法律，其大臣单独向他汇报，他的喜好、脾气、决定都至关重要。但没落的罗曼诺夫家族中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亚历山大二世是最后一个明确采取开明或保守专制主义政策的沙皇。他于1881年被谋杀。统治到1894年的亚历山大三世把工业化同强力镇压结合起来。尼古拉二世后来面临更大的混乱与犹豫不决，不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国家事务中，这对专制君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缺乏远见，他总被别人的意见、看法所左右——其中包括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反动的歇斯底里——他和他的宫廷转而实行摇摆不定的军国主义。

以“战略”一词来美化这些互相倾轧的不同党派精英的政策，可能会误导别人。大多数的传统与天性都是反动专制的。但面对内忧外患时，这些政治家在温和改革与血腥镇压之间徘徊不定，由于对深植于平民社会的自治力量的恐惧，内部争斗的解决通常有利于军事镇压。专制镇压在俄国与其说是国策，不如说是一种暂时的观望政策。这种政策为规定政令，满足国外势力的企图要求，或鼓舞国内士气提供了脆弱的基础。一个更好的沙皇可能会做得更好。

在俄国，是政治精英而非资本家主宰政治舞台。他们应付劳工联盟、罢工和社会党，正如他们对付类似的团体组织的宣言一样。而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扰乱公共秩序而被取缔。武装军警被调来驱散示威游行或罢工队伍。在1895—1905年间，军队对罢工游行进行了两千次镇压。政府给来自别国的工厂工人签发护照，若他们违反雇佣合同，护照就被取消。政府还拟订了详细的规则文件，用来规定劳动纪律。其中部分是关于体罚与对雇主和经理完全服从的规则，所有这些都源于俄国军规。工人与农民出身的士兵之间的独特的合作经历使他们于1917年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家的统治。甚至当政治精英试图和解的时候，他们采用的是强制的家长式作风。工会中最奇怪的是由莫斯科警长自

1896年创建的祖巴妥夫协会，一方面，它体现了像祖巴妥夫这样的改革派在劳工关系中实行中立家长政治的真实渴望，另一方面，体现了赞成专制与保护财产权的极端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个协会在1905年革命中崩溃(McDaniel, 1988, pp.64—88)。工人没有国民权，更不用提政治权利了，但农民和中产阶级也比他们强不了多少。

因此**没有**一种温和的工人策略——保护主义、互助主义、经济主义或改革主义——能自由组织，取得成果。也没有出现处理劳工关系的稳定的法律制度框架。实际上工厂内存在相当多的潜在的合作，而个别大臣、省长、警官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中的一些人作出了改革的许诺，却没有可靠的政府来实现。尽管无政府主义派试图采取恐怖主义，工联主义也无法让人相信罢工可避开这种状况。由于共同的军国主义经历，资产阶级民主派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1900年以前，民主派——资产阶级派和无产阶级派——都标榜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讨论马克思，主张民主要求政治经济的根本变革。大多数想实现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者寻求真正的解决办法。

因为工业化的步伐决定了手工业者还不够成熟，因此，作坊组织和地方主义一开始还比较弱。它们经常遭到政府镇压的破坏。因而政治家与雇主，同其他国家一样，很难在“负责”或“值得尊敬的”工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很少向技工作出让步，目的是迫使工人脱离群众。俄国劳动关系中几乎没有地方社群主义。即使当国家出资的互助社会保险计划被大肆宣扬时——在其他国家划分工人的标准是根据其收入的水平和稳定性——所有的工人组织要求有一个普遍的国家资助项目。政治家与资本家，或许是无意的，将工人逼进了革命分子领导的阶级。列宁早在1899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 俄国工人阶级身受双重压迫；它既受资本家的掠夺，又受地主的剥削，为防止他们反抗，警察束缚他们的手脚。每一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只是使警察军队放松对工人的控制。每一次经济

斗争必然成为一次政治斗争。社会主义民主也必然会把二者结合成**无产阶级斗争**。(1969, p.36，他强调过；1902在《怎么办》中加以重复，1970，p.157)

1905年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加强自我意识。他们的统治能力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遭否定。在远东几个省，领导无方、供应不足的军队四分五裂；城市粮食供应中断；在许多农村地区，农民通过抢地夺取了政权真空。1905年大约2 080万工人举行罢工，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时期的任何一年，是任何其他国家任何一次罢工人数的两倍。这次反抗与社区游行，面包工人罢工及各地的“国家”自治运动遥相呼应(西方和苏联历史学家仍在研究)。发生在1905年和1917年的暴动、游行在某些方面更类似早期资本主义和宪章主义时代的街道、社区革命，而不是像现代工人阶级的以雇佣关系为中心的斗争。俄国革命使群众队伍壮大，也激起了家庭和社团经济政治斗争情绪的高涨。独有在这个时期，俄国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才变得“统一”——目的是建立一个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高度集中、高度政治化的国家。

但大多数工人还没有革命倾向，或者除在请愿书中表达不满之外的一致其他选择。在城市中心，1905年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广泛发泄不满情绪的游行示威，还不是一次全国性的运动。地方—地区上有组织的参与反叛的军人、农民、郊区示威者和地区—国家的持不同意见者单独行动，因此可能遭到分单独的镇压。许多组织仍保持纪律性，这就足够了。在圣彼得堡，仅“血腥星期日”一天，军警就杀害了至少130名示威群众，300人受伤。对此列宁(与在本章开头引用科钱的他的早期观点矛盾)评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在这一天的进步要远大于以前几个月几年取得的进步。”(Kochan, 1966, p.80)第二年，军队对波兰全国暴动及工人暴动的镇压中杀死了2500人。政府又以集体绞刑对付不断扩散的恐怖主义。

但沙皇现在害怕了，原因是要求公民权的农民群众、地区及全国的

工人、城市反抗者在耗尽刚刚战败的统治阶级的力量。温和派趁机说服沙皇，只有把土地改革同工业发展相结合，才能打败德、日等对手。政府应该同意给予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杜马(议会)还是召开了，尽管有举足轻重的选举体制。工业采取了互利性让步：从 1906 年 3 月起短时期内，工会合法化了，条件是它们不干涉政治，也不再举行罢工。劳工权利意识，即使是家长制的，也比没有强。劳工分化成乐观互助派和改革派(与统治自由派希望的一个与社会主义辞令和实际妥协联合的更“西方”的工会出现相重叠)和持怀疑态度的革命派。

统治阶级显然在考虑采取德国式的合并。这就要求将部分和解与镇压相结合。最明显的策略就是满足资产阶级对公民权的要求，制定一个土地分配计划，并镇压工人和地方暴乱分子。但从心理上，统治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不屑一顾就如同他们害怕群众一样。这就要求自由派控制改革运动和工人，限制农民。但即使经济学家联盟，也就是立法者，也对互助者不断扩大组织权利与政治公民权的要求感到压力很大，这远非沙皇或宫廷所能达到。尼古拉犹豫不决，听信妻子之言。为使它更顺从，将杜马两次解散，宪法也被修改，但仍以失败告终。自由派也失去了权力和对工人的影响力。这时另一个人物出现了，即令人生畏的斯托雷平。他下令发展经济，实行军事现代化，土改，所有这些政策在抵制公民权，镇压城乡暴动的同时，也分裂了农民阶层。杜马宪法第三次修订，将 50% 的席位给人口只占 1% 的土地拥有者。这最终保证顺从的杜马可以持续到 5 年任期满为止。体现对劳工阶层镇压的斯托雷平的分裂政策接管了国家权力。

1907 年劳工联盟被非法取缔，这使具有全国组织经历的立法者们很痛苦。工人阶级领袖和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找到了更多的革命理想的实施者，尽管他们很少冒险公开行动。到大约 1910 年为止，革命道路的选择已局限至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三个非法政党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但是由于政府对工厂、社区的大规模的镇压，无论是经济派、互助派、改革派，还是革命工联主义、无政

府主义者，都不能担当工人和工人社团的领导者。

斯托雷平于1911年被秘密暗杀，其政府又被第二次和解所围攻。其检查职能被削弱了。劳工联盟再次被赋予半条生命，既合法，又受迫害。立法者们1906年7月也经历过类似的矛盾，被允许组织工会，却无法进行改革。当罢工、游行进行到一定程度，军队就会干预镇压。然而军事镇压使革命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尤其是在1912年连那金矿大屠杀后，200个矿工的死亡在所有的主要工业中心激起了大规模罢工，一直持续到1914年。

统治阶级在军队现代化后本来可以被说服实行改革，斯托雷平的全面的土地改革本来可以发生在1917年2月的，但德国先发制人(见第二十一章)，挑起了战争，阻止了这一切。这场战争增强了保守派的力量，加强了镇压。但随着战势恶化，军队、后勤与政府产生了分歧，分崩离析。1917年革命爆发，这些革命基础更加牢固了，不满的官员、造反的士兵和海员也加入了工人、农民、民族主义者的队伍。工人中的布尔什维克核心支持力量由以前的立法者，变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派。

一系列的镇压干扰、温和改革计划、和解以及更残酷的镇压，疏远了工人阶级中的民主派与温和派、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到1914年止，政府战略从未最终确定下来，但它的敌国却加速了这一进程。国家公民权的主要要求没有被否定，其中一些具体措施被接受。国家成形变化无常，也不一致。但在危机时刻，政府似乎暴露了真面目。若改革派不能担当领导，革命派就要领导革命了。

毫无疑问，在1914年，甚至在1917年早期，大多数俄国工人比煽动家还“保守”，这主要从两个意义上讲的。一是对革命道路的怀疑，二是对立法派、温和派甚至沙皇寄予改革的希望。但十年来，温和派和分离派并未有有影响的运动。史学家指出了对工人阶级一般层次的划分——熟练钢铁工人对更年轻的、以前是农民、非熟练工人以及女工和城市的无产阶级(最近又由麦基恩在1990年加以强调)。但这种

划分没有像美国那样深入到不同的工人组织，也比英国的程度小。但却明确了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前者对后者的领导权。

除非有一场改革运动能推翻君主专制，走上西方合作的道路——像盎格鲁—美国或德国那样——其劳工运动很可能要经历一场革命。当然，事实确实如此，正如另一超级强权国家美国一样，这场革命证明具有巨大的世界影响力。战争与农民阶级在革命发展中起了非常显著、必要的作用。我在第十九章将讨论这个问题(战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下一卷讨论)。但即使没有战争和农民阶级，俄国工人已经成为一个独立阶级，并且同激进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分子一起被逼到反抗的边缘，因此他们在这样一个既趋于和解，又实行高度军政集权的专制国家，不但在雇佣关系，而且家庭生活中都有共同的经历。剥削，既广泛又深刻。若这个国家屈从于外敌，镇压的手臂被折断，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共同反抗，不管后果如何。

法国：有争议的政治成形和社会主义竞争对手

根据惯例，我把法国劳工运动中有特色的地方归于政治成形[6]。然而，国家的工业化特色，对此也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法国的工业化开始较早，但进展异常缓慢。举例来说，手织工人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甚至在本行业1882—1890年的大萧条中也是如此，比起在英国、德国的同行业的消失时间要长一些。其他国家类似的早期工人组织也有较强的生命力。手工工匠很长时间控制着工会。由于革命的帮助，农民紧紧抓住他们的农场和劳动力，减慢了城市和制造业的增长。在19世纪50年代里昂地区的5个城镇中的工人例子中，54%—66%的人做着父辈曾干过的活。43%—53%的人在1902年后的10年仍然如此(Lequin，1977，I，pp.222，251)。劳工短缺引起了潜在的不罢工工人的短缺和高比例已婚女工。工业在法国郊区扩散的目的是与劳工资源

和消费者联系得更紧密一些。

无产阶级因此以某种分权方式出现。工业、农业、雇佣和当地社团很少分离，靠工厂工资生活，居住条件很差。工业化产生了通常意义上的工会组织。记者联盟解散，互惠的福利团体取而代之；手工工匠受到使用机器和女工、童工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威胁。比起英国，法国的无产阶级化进程更缓慢，尤其是北方的纺织工业，仍保留着家庭组织方式和雇主控制方式，和从事生产的工匠中心明显不同，这其中最大的生产地是巴黎和里昂(Aminzade，1981，1984)。直到20世纪的重机械行业中的“新工厂”才有家庭、工厂、市镇的明显区分，虽然影响着周围的“红色郊区”，但还是有工会占据中心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工厂(Perrot，1986；Cottereau，1986)。

法国工业化的这些明显特征使得工人阶级的发展缓慢下来。在数字上它们确实反映出来了。但在阶级意识和组织上，法国劳工的激进分子是早熟的，大部分是因为争议政治成形使革命传统仍然很活跃。只有国家成形被解决了，因为所有的竞争性政党都赞成一个相对集中的政权。但在民主共和党派、君主派和波拿巴派之间，代表权相互竞争，导致了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相当的反动性，国内军国主义不断发展壮大。

面临这些威胁，巴黎和里昂的政治社会党人提早控制了劳工组织。在1815—1848年间，工匠们要求从王权统治那里取得政党民主和组织权利，这刺激了国家的阶级组织，超过了我们从停滞的工业化所预料的水平。无套裤汉主义转变为工匠社会主义，早于其他国家——正如被流放的二十五岁的马克思在1843年发现的，即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他第一次实际与工人阶级的交流中。共和社会党首先发展了巴黎的，然后是国家的报纸杂志思想力量体系，还有带阅览室的俱乐部，而且包含整个19世纪30年代在工匠中流行的咖啡馆。到19世纪40年代，社会党人正把福利团体组织成奇特而集中的国家组织，并在不太熟练工人中间以基础方式扩大。

在1848年，革命先锋中的工匠联盟形成了“小共和国”，把它推向左派(Gossez, 1967; Lequin, 1977; Aminzade, 1981: ch.6; Sewell, 1986; Traugott, 1988)。尽管被镇压并被迫后退到地方、地区水平，社会党在拿破仑三世时仍保持着对工人组织的秘密控制，拒绝了他的融合双边互助组织的企图，他希望以此来分裂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幸而，地区工联主义几乎没有出现，因为革命传统在面临广泛的普遍镇压时，繁荣了阶级组织。工人通过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协同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雅各宾主义的革命口号转变为更具工人阶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和工联主义。

从1875年开始，表面上法国类似美国，享受男性的政党民主。男性工人拥有政治权利。然而，某种程度上被限制的政党民主没有顺利实行制度化，只是通过危险的中间派联合而幸存下来。1875年，共和党只以一张参议院选票战胜了分裂的专制分子，而且只是在1879年接受到一份明确的选举命令。统治者拒绝给工人以组织权利。对于左派来说，19世纪70年代对巴黎公社的军事镇压(死亡三万人)和统治者对劳工的继续仇视占了主导地位。红色，血的颜色，成为工人的代表颜色。极左主义仍然很强大，不断公开，在地方地区工人团体中广泛扎根。大约1880年，统治者开始在集中民权问题上和解。首先大赦了幸存的公社社员，然后在1880年，使工会和罢工合法化。但王权派和波拿巴分子的威胁仍然存在，又得到军队派系主义、教权主义和教会国家舆论支持。有限的党派民主政权在左派和右派都有敌人，其中一些敌人(像右派主义者军官团)渗透到了政权本身。

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政权的民间范围扩大到其他任何地方，和中间派共和主义结合在一起。国内军国主义变得更公正和警惕。所有的政权精英和主要政党都对政党感兴趣；秩序保护是他们主要的国内职能。因为没有秩序，他们就会崩溃。他们能对公众的不满作出要么军事镇压，要么让步的反应。如果他们相信暴乱，而不是承认公众不满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而且如果他们害怕军队本身——他们

也许要求让步。只要基础财产不受影响，政府也许会和解。19世纪的多数政府不完全是由工业资本控制的，而且除了俄国和美国，他们的司法警察力量经常干涉以求和解。因为他们害怕左右派，包括政府军队。因为政权现在是党派民主，法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肖特和梯利(1974，pp.30—32)对19世纪法国罢工的定量分析表明地方行政长官不断干涉，通常是应工人的请求来阻止或终止暴乱。分析表明，当政府干涉比不干涉时，工人的需求有容易得到更多成功的趋势。长官和副长官的行为不同，有的寻求和解，更多地站在雇主一边，但大部分寻求何种方式能更快使他们的管区平静并保持他们个人良好的治安秩序的行政记录(Perrot，1974，Ⅱ，pp.703—714)。资产阶级共和党对工人的态度也不稳定，镇压和合作相互交替，是为反对派从上面寻求支持。

作为对这种不稳定国家成形(与俄国不同)的回应，这种形式没有最终的决定方式，法国工人具有它主要的特色：思想上的派系主义。它在两方面踌躇，一方面是互惠者和改革派与资产阶级极端派的合作，另一方面是由醒悟产生的更多革命机会与共和党和国家精英。觉醒有三种主要形式：雅各宾传统的社会党形式，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于19世纪90年代废除的无政府恐怖主义；工联主义。相对分权的工业扩散也刺激了工联主义。经济主义、互惠主义、社会民主、工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出现了，互相竞争和辩论削弱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内聚力。

法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一样，大约于1900年，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威胁了手工业控制时，采取了进攻行动。工匠们被迫保护工联主义。和大部分国家一样，直到20世纪，中型车间的工会和罢工比起主要工厂(仍然有效地控制在厂主手中)更普遍一些(Lequin，1977，Ⅱ，p.129)；而且在工匠和手工工人共同生存的城镇，比起工匠缺少的地区，出现了更强大的运动(Hanager，1980)。不管怎样，大部分法国工会缺少人员和统一性来挫败企业主。这刺激了思想的保守

主义。

尽管人们之间由于技术造成的本位主义很少，工会形式上仍然很弱，会员费也很低，会员几乎全是男性。激进分子——在19世纪很罕见——主要转向政府而不是工会以寻求社会保险和其他集体福利。到19世纪末时，当工会发展了保护主义的劳工交流时，这些很快变为“直接行动的工联主义”的有广泛基础的组织。在争取男性选举权期间，在19世纪90年代的激进社会党联合期间和1906年后的改革社会主义潮流期间，工人的政治承诺增加了。但这些趋势也分裂了激进分子和激进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而且集中于政治，忽视了工业，使一部分激进分子转向了革命工联主义。主要的工会联合会CGT，是由工联主义者从1895年开始领导的。然而他们根据宪法上的偏见(给国家的，而不是地方的附属组织以特权)来反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改革派，此偏见支持了美国保守派龚伯斯。

从1899年起，亚历山大 · 米勒兰成为第二个进入资产阶级内阁的西方社会党人，工联主义者强大起来。政治社会党人现在分裂了。右派和米勒兰加入了现在的激进派政府，左派为避开政治加入了工联主义，并宣称用大规模罢工作为革命武器(Brecy，1969)。CGT的成员很少(低于联合工人的半数，低于所有工人的5%)，但他们领导了多数罢工和游行示威。我们应当记得在这期间法国的政治是更多地围绕激进的**国家**而不是阶级，是由共和党的集权运动控制的，以从地方上植根于天主教的反集权者手中夺取对教育和家庭法律的世俗控制。因为工人激进分子一般都支持这种趋势，工联主义者不能动员**整个**阶级意识——工联主义是针对经济问题的；政党是针对政治问题的。这种分歧主要是来自政治成形，而不是因为法国工业的特色。

但是，与联邦制的美国不同，革命的共和传统的广泛推动，特别是雅各宾主义，促进了国家集权和思想认识的统一。领导者自豪地称自己为“革命者”，承认全部的法国国家资本主义，禁止敌对的，可选择的社会主义。尽管商业、工业和熟练水平的断层出现线出现了，但没

有一个转变为明显的地区性组织，而且，也不与思想派系相对应或强化它们。在 1906 年总罢工失败后，军国主义分子欢迎饶勒斯的统一才能。他于 1905 年创立的社会党融合了革命口号和政治改良——广泛的选举权，市政的社会主义和社会福利的扩展。它甚至由于开始融合革命口号，集中化组织和集体谈判，改善了与 CGT 的关系。到 1914 年，出现了一场思想的社会党—工联主义运动。它宣称目标是发动革命，尽管我们也许怀疑它的能力(Gallie，1983，pp. 182—195[7]，Lequin，1977，Ⅱ，pp.297—370 是明显持怀疑态度的)。

法国社会主义也集中在经济和男性职业的政治上。许多已婚女工没加入工会。大多数工人忽视了她们。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节日和旗帜，但“红色郊区”很少能产生足以能激活整个工人阶级家庭的社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在美国，是男性选举权的存在。活跃的社会党人和工联主义者已经有了选票。他们对流行的妇女运动不大感兴趣，这一运动关心非职业问题，如妇女选举权和婚姻法。在大多数国家，男子选举权的早期获得确实延搁了妇女选举运动的开始。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斗争这一时期，统治者内部表现男子选举权的政治斗争也趋向把男子和妇女区分开来。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在工人阶级生活的整个经历中深深扎根。

总之，这种派系化，不是普遍的地方社会主义，大部分是从法国工人进入政权推断出来的，在制度上，这个政权是高度集中的，但在其他任何方面——特别是政党民主和国内军国主义方面是派系化的。

德国：专制的混合

到 1914 年，德国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霸头，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党。它提供了一个压制性的国内军国主义完全可能现代化的最明显的例子。沙皇的劳工关系部分是条件反射，部分是犹豫不

决，但德国政权试图用一种现代化的战略来驯服工人阶级，以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罗思(1963)定义为工人阶级的“消极联合”。 但对战争命运而言，这也许已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内部制度化阶级冲突的主要方式。

正如第九章证明的那样，德国的经济兴起已经和政治、军事政权相互关联。 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交通建设和国家统一促进了工业化。 比起自由或天主教国家，工业化在普鲁士和其他保守的路德派邦国，如萨克森，进行得更深入一些。 工业化很快就打上了半主权国家主义的烙印，但也有经济特色。 和英国或美国的共同职业相比，小手工业、家庭小作坊、国内服务业保留得更完好，还有不同寻常的重视重工业，创造出了明显的二元的工业结构。 多数熟练工人在转移到大型工业之前开始了手工业，而且他们很早就在手工业内形成了工匠的社会价值观念。 另外，也存在明显的性别之分，妇女很少被正式雇用从事生产，尽管她们的临时雇用对家庭生计是必不可少的。 在工业时期的生活中，有组织的德国工人阶级是工匠居多，但比起法国来，男性居多，只有 2% 的社会主义团体成员是女性。 因为这些特殊性，德国劳工的经济轮廓基本上类似其他地方(Kocka， 1986)。 像往常一样，受威胁的短工和失业工人发动了早期的骚动；更安全的手工业中工匠占据了第一稳定的工会；工厂工人(大部分是纺织业)相对温顺些，他们受雇主控制，不可能去罢工。 工匠们经历了频繁的经济压力，特别是来自迅速、广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约 1900 年，金属行业和矿业的工人(不存在和政府、军队密切相联的铁路业中)和半熟练、非熟练工厂和作坊的工人联合发动了大规模工人运动。 这是一场根本上归因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特殊运动(Tenfelde， 1985，也论述过)。

第九章描述了德国代议制和国家政治成形。 1848 年革命迫使德国政权和阶级作出关键的决定。 德国政权接受，而且被迫形成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国家，部分上是联邦的政府，而且它们提供有限的政党民主化改革来联合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犹豫了，但是被工人激进主义和

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秩序施加的压力所困扰。激进的工匠被孤立了，结果左派增加了。他们开始称自己为“工人阶级”，与工匠俱乐部，教育社团和当地工会合作，并通过政治流放和进步的欧洲社会党人取得联系。但他们人很少，经常陷入困境，并被镇压，不能与政权对抗，或利用政治同情来挫败军国主义。国家和由许多国内前线哨所支持的地方警察力量控制工人的联合，而且比西方国家更直接(Ludtke, 1979)。工人们被迫形成防御的阶级意识，但在普鲁士和路德教派的地区，他们也使相对的国家主权政治观念深入人心。

一旦普鲁士政权顺利地制度化，它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放松了。在19世纪60年代工会团体(主要是福利社团)。甚至表示直接的、代表工人利益的罢工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合法化了，尽管仍被警察密切监视(农业和家庭工人甚至直到1914年还没有获得这些权利)。随后的工会和罢工的扩展由于各地的行业而地方化，由于各地的宗教和政治而派系化。1870年，在7万名工会成员中，40%属于自由联盟，40%属于社会党组织，20%是独立派或基督教徒。工人政党在19世纪60年代从教育联合组织中兴起，不受自由派失败的约束，支持完整的公民权和政治公民权。1867年男子选举权的突然引入产生了政权所期望的影响，削弱了自由派联合工人的企图。然而有组织的工人不可能支持占统治地位的政党，而且有比例的抗议取得了未曾料想的结果，即允许工人政党取得逐步的选举成功。工人政党发展了改良的社会主义，比法国晚，但比英美早，而且是在国家工会形成以前。工人政党在1875年联合为社会民主党的前身，接着帮助联邦地方团体成立国家工会联盟。这个政党很早就获得了国家政权和绝对的路德教对劳工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仍有争议。在1867—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创立过程中，普鲁士对自由派和国家权利作出了让步。这个复杂的过程让普鲁士政权对两个阶级和国家战略有不同寻常的警觉。尽管有男子普选权，普鲁士君主仍对帝国议会和私人地产(旧政权)持有庞大的权力。大规模党派民主选举程序出现，但政权仍能选择党派进入它的智囊团。

男性工人阶级只有部分政治权利，正如仅有部分民权一样。社会民主党在城市工业区赢得选举，但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特色没有确立。像英国(更脆弱)和法国，工人政党仍能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和资产阶级和基督派政党联合。

俾斯麦自觉地参与了指挥半独裁政权联合的统治策略。作为1871—1890年的帝国宰相，他提出了一大堆民权来分而治之——从政权中踢出激进劳工、少数民族和分离主义分子，同时也包括中立中产阶级自由派、基督教派和一部分工人。此策略有四项主要条款：

1. 普鲁士德国政权在中欧的扩张会分散国内阶级斗争的注意力，经济扩张也会和政权的军事扩张相一致，这在第二十一章讨论。

2. 如第九章描绘的，俾斯麦分离了自由派。多数资产阶级政党被吸收到政权中来，只留了少数自由激进派在外，使他们和劳工联合。

3. 1878—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限制了工人的集会和政治公民权。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实际上所有的大型团体都被禁止；然而，根据授予每个公民政治军事的参与权利，他们能在选举运动中进行组织。但这并不起作用。政权培养出的分离主义，也遭受了挫折。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也遭受同样待遇(不像许多自由国家的财产特权)。选举特权也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实行控制。甚至在《反社会党人法》废止以后，工人也没有取得完全的公民权。集会的权力不完全，而且警察和军事当局几乎总是为雇主们调停劳动纠纷，军国主义也制度化了。尽管士兵们全副武装，但他们如其说是暴力的武装，不如说是仪式上的武装。正如我们早期看到的，实际上德国人在劳动纠纷中很少被杀，远远少于法国、美国，这两国都是男性民主国家。这是独裁联合，不是专制或党派民主镇压。举个例子，根据奥地利立法，工人集会要通知警察，警察会坐在看台上。如果他感到有破坏发生，就会戴上钢盔，这就表明是非法集会的信号，必须马上解散。几乎总是如此。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警察的钢盔也许恰恰是劳工与半独裁政权联合的象征。

普遍的排外，加上社会党的领导，使手工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在不断扩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内，鼓励了享有阶级身份的概念。在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中，该党拥护国家主权并在表面上拥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一般的行会垄断和在雇佣关系中发生内部对外部的抗争，工会并没有地区性组织。主要的分裂是思想上的：存在于最大的社会主义(绝对的路德派)“自由工会”，基督教联盟和雇主支持的“黄色工会”之间，这是一种重工业中内部劳工市场的表现，也存在一点工联主义：整个时期不能回避君主制，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权力的联合(Saul，1985)。

4. 俾斯麦通过体现表面社会权力的立法，来削弱阶级本身和社会的呼声。通过1883年的《国家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意外灾难保险法》；1889年的《老年及残疾保险立法》。正如第十四章指出的，这第一福利政府限制了覆盖面，对象只限于熟练工人和重工业内部劳工市场有特权的那些人。大企业主也提供住房和其他福利措施来维持一个稳定的劳工群，多数人支持这项立法。大工业家和国家精英的合作(在第九章中有注释)给予国内劳工市场地区主义以政治意义。社会党、社会主义团体和罢工一直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中的熟练工人中，这种情况持续到1914年，晚于其他国家。在大型企业中，工人们由于国内劳工市场特权而更被孤立于阶级团结之外(尽管许多清教徒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俾斯麦对于他的福利政策很明确，强调养老金水平应根据收入多少来划分，因为这样“对雇主更有利，因为它会联合工人阶级的上层，也就是对总体安全中的每个企业最重要的支撑，并因此鼓励它为它的目标而奋斗”(Crew，1979，p.127)。“工人中的上层分子”能有很少的“地区的社会公民权利”。

俾斯麦是少有的“政治家”，对当代政权的范围扩大很敏感，他的政策通常把国内和国外策略交织在一起。他对1870年表现出来的法国军事弱点进行研究，总结出四项政策教训。不像拿破仑三世，他会让大部分中产阶级，甚至部分工人参与支持德国的军国主义。如果小资

产阶级和工人激进派不进行联盟，他们可能会发展革命的幻想——但是他们不可能执行或削弱德国在国外的力量。 高尔(1986)被俾斯麦政策的有机统一所打动，他把此称为“白色革命”。 但在对熟练工人的姿态中是矛盾的，而且俾斯麦自己也阐明了这一点。 在文化斗争中，他对天主教会反政权和对南方分离主义煽动的担心导致他反对这一点。 这就迫使天主教社会党人左倾。 他对议会的轻蔑导致了他 1888 年开始的颠覆阴谋，并导致了他下台。 没有与农民、中产阶级和主要少数教会中至少两者的妥协让步，是很难在半工业社会中保持君主专制的。 因为法西斯社团主义还没出现，议会的设立便是代价。

在俾斯麦下台之后，这项策略被部分恢复。 基督教和农民对政权的支持得以恢复，影响了劳工、民族和分离主义极端分子的孤立。 我将在第十九章深入讨论。 《反社会党人法》以失败而被撤销；社会党人能通过选举产生的秘密组织经受住镇压。 但对工人的权利，特别是集会权利的限制被保留下来。 福利国家沿着俾斯麦的道路继续前进，扩大版图，但对那些被排除在民权和政治权利之外的地方化的工人影响不够。

但社会民主党仍是孤立的，缺少联盟，实际上趋向疏远了这些盟友。 它的马克思产业主义制止了农民的支持(见第十九章)。 不明朗的路德主权说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疏远了天主教会，阻碍了反对专制的、坚实的、潜在联盟的形成。 这样，天主教会转向支持自己的农民和协同劳工运动，后者在 20%—25% 的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中变得更重要。 工人阶级团体和社会主义在城市工业路德会的集团中变得孤立。 甚至到 1914 年，德国也只是半工业化。 选举分配结果在自耕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几乎相同，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比例是 6.5 比 3.5。 社会党控制了新教工人阶级并争取天主教工人的选票——因此选出许多代理人——然而仍不能影响政府贯彻互惠派或改革派的政策。 而且，没有联盟，就不能影响它正式提出的革命。

俾斯麦下台后，一部分天主教徒和自由派分子，甚至少数工业家赞

成自由化。集会的自由——个人权利的最终完整——在1908年终于通过。随着团体成员的增多，工会从社会党那儿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更倾向于互助主义(Mommsen，1985)。但统治政权不愿进一步和解，而且它们有充分的宪法权力来分离自由派。在各个部门和警察专权的支持下，多数企业主继续阻碍工会集会，这就更正式且真实地提出了民权让步。尽管表18.1表明工会在增长，但除“黄色工会”外，很少被企业主承认。工会帮助管理日益扩大的社会福利，而且，当雇主被迫在罢工中讨价还价时，工会会有实际上的认识。但很少有集体讨价还价共识(确切数字不同，见Schofer，1975, pp.137—164；Stearns，1975，pp.165，180—181；Crew，1979，pp.146，218，250—251；Mommsen，1985，p.382；Spencer在1976年谈到1914年让步性的讨价还价在鲁尔区增长)这样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团体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缺少重要联盟，苦恼且有孤立。

对劳工的影响经常有记载(Roth，1963；Morgan，1975；Geary，1976；Kocka，1986；Nolan，1986；还有Evans，1982年的许多文章)。虽然被排除在外，但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而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路德派马克思主义核心转向了产业内部，发展社会主义亚文化群，组织工人与合唱团、乐队、体育俱乐部、图书馆和形成社区节日。这些是基本的娱乐活动，但他们也通过社交活动(Lidtke，1985)统一联合了工人整体。尽管多数工会成员是熟练工，地方主义仍被社会党人和自由工会中央委员会挫败。工会逃避危险，把大部分战略和选择问题留给了政党(Schönhoven，1985)。类似其他人民被有效地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的国家，社会党支持广泛、完全的议会主权，包括妇女选举权。因为政权精英分子坚决提倡家长制标准，另外政党也出台了家庭纲要，尽管当地集会男性占绝大多数(直到1908年，国家才不禁止妇女和少数民族参加政治组织)。尽管政党和工人阶级文化体现了这时期的普遍的性别不平等，在(男性)雇佣家庭和社区组织间，仍有低于同时代标准的歧视。族长性政权维护了德国社会主义广泛的整体意识。

社会党发展成有实力的选举力量，占据了1/3的选票，到1912年，组成了最大的帝国议会党，它的政治控制着主要工会，表达了产业主义者，中央集权口号以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目标。然而它没有为超议会策略，甚至议会改革结成联盟。它坚持尽最大努力为选举而战，但仍处于国家政权控制的体系中。罗思称之为“消极统一”，“允许敌对的群众运动合法存在，但阻碍它进入权力中心”(1963，p.8)。政党右翼赞成温和的改良主义，并与政权达成妥协——但只是在卡普里维时期和贝特曼—霍尔维格时期偶尔发生。少数的极左派提倡革命，但缺少人员和联盟来反对武装到牙齿进行镇压的国家政权。大多数追随中左派，赞同革命——但只是在将来。德国最终完全工业化，社会民主党成为多数党。如考茨基所指出的，政党不得不为革命而组织，而不是组织革命。

国家统治部分转移，部分有意识地修改相对成功的半独裁策略来联合劳工。这种策略转变比美国偏离马歇尔“进化民权计划”偏离得更远，因为统治集权整个时期只部分地作出了民权和政治权利的让步，同时以社会权力的不完全让步给予来进行实验。劳工们披着马克思产业主义的外衣，戴着政治家眼罩，什么也没贡献(第十九章详述)。

鉴于劳工的孤立和“消极的统一”，像马歇尔指出的，看起来没有明显的朝向自由或社会民主的道路。或像马克思或考茨基指出的，没有明显的革命道路。这是绝对君主专制和各阶级要求的政党民主，地区政府和要求分权的教会对峙的结果。德国的经济与其代议制和国家定型相比没有特色。相对仪式上的国内军国主义更没特色。事实上，“专制国家资本主义”和“消极统一”，如果没有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加快，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最近可与之相比的发生在美国的工业革命，促进了不同的阶级关系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同形式的制度化，主要是由不同的国家定型，而不是由工业化导致的。

其他欧洲国家

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形介于德国的半独裁主义和英国、法国的党派民主之间。奥匈帝国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德国，直到1891年都在不断镇压工会和工人政党，使工人由左派转为一个马克思社会主义政党。但是王权面临更强大的联合。这也影响到工人，从单一的跨国家到许多地区性、全国性的运动(Gulick，1948，pp.21—24；Shell，1962)。虽然集权，但土地贵族和军队相对较弱的瑞典和丹麦王朝已让渡一些党派民主权利给农民和资产阶级自由派，而且崛起的工人与两者联合起来，推动远离英国的互惠主义成为改革者的社会民主(见第十九章)。半民主化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政权也以法国为榜样，在冷静地游移，尽管伴随着更多的“国家”竞争。在日本，明治复辟分子修订并采用了德国的战略。

在所有这些国家，王权和旧王朝试图在半议会的政权中保持中央集权(在斯堪的纳维亚失败了)。中产阶级没有像美国、英国或法国那样，被纳入政党民主之列，也没有像俄国那样被完全排除于政权之外并被镇压。显而易见，这些国家大不相同。在一个极端激进的地区内，资产阶级仍然对王权提出最基本的要求，就像西班牙或(根据地区、国家而不同)奥匈帝国。另一方面，在政权中，比起德国，资产阶级被纳入一个甚至更独立的地位，类似于日本。前者是极度扩大的联邦主义，而后者是集权制国家。

就像在德国，我们可以从这双重的代议制和国家定型推断出工人的大部分权利。就阶级而言，工人运动既不是部分地在国内(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也不是被完全排除在外和被军事镇压(如俄国)。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特殊路线实际上不是“自己的”，而是被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改变后的，它的可行性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工人的影

响也是深远的。比起英国，这些国家有更积极的社会主义，有比法国(尽管西班牙是个例外)更一致、更统一的以政治为主的战略；比起俄国，更缺少革命性。每一处的工人组织支配着地区。除了西班牙，最紧密的平衡是德意志帝国的消极联合：名义上有部分的民权和政治权利，但又被排除在国家和消极的统一之外。

唯一的例外是西班牙，因为它的阶级表现和国家问题相互交织[8]。在西班牙，工联主义达到了它的最强大的欧洲方式；而且它在 20 世纪的发展已经稳入正轨。这种入轨能用我的政治中心范例来解释吗？答案是肯定的：工联主义在西班牙的强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明显的政治构成，包括重要的民族和地区公民权利之争。就像在奥地利，问题出现了，各阶级应当从哪个邦要求权利？

从 1876 年开始，西班牙有了宪制王权、正式的(即使是腐败的)成年男子选举权、合法的工会(尽管带有通常的资产阶级组织权的限制)。但它在经济上落后(大约俄国的发展水平)，没有广泛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主要在地方的资助人—受益人网络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不是在阶级之间。自由党和保守党在政府中交替执政，背后有银行业、工业和地方权贵的支持。政党精英们分配权力，控制了暴动的途径，而且在所有阶级中扩充成员。这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的半外围国家中很普遍(Mouzelis， 1986)。兴起的工人阶级将在哪些地方适合这一点呢？政治也包含阶级和左—右倾思想，特别呼吁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敌人。工人运动也许会附属于激进主义，因此有现代的法国或英国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但在地方贵族势力牢固确立的地方，这种政治不能改变他们。工人和有组织的农民一起对国家政治不抱希望，并转向了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

这种可能性由于卡斯提耳的统治而引起的地区愤恨而更进一步，有时达到了民族分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策略，转向中央政权，在西班牙的部分地方变得似乎合理起来——乡村未被影响地区有无政府主义，工业中有工联主义。我不是宣称对西班牙地区复杂的不同

情况我有专家的评价，但这两个政治原因——在广泛的阶级组织出现以前，部分民权和政治权利，加上地方分离主义——看起来能解释西班牙劳工中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事实上的分裂。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明显的地区形式，在加泰罗尼亚强调工业化，那里分离主义和工联主义加强了，在卡斯提耳和阿斯图里亚斯加强了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现在的情形朝着1917—1918年和1936—1939年的悲剧性的分离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西班牙在细节上，而不是在我说的总体规模上发生了偏离。西班牙阶级斗争的明显性主要是由于国家权力的竞争，其次是工人运动的进程——就此而言，就像奥匈帝国，权力政治唤起了严肃的、与阶级斗争相互交织的“国家”。

结论

引用无数个别细节来支持本章的全部论点是没有必要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像工业化转型那样发展，其间交织的，首先是代议制的、国家的、国内军事政治定型方面的变化，其次是不同形式的工人组织。在第十五、十七、十八章中我提出了19世纪劳工工业转型的三点描述：

1. 像马克思预见的那样，工业资本主义不止产生了一个劳工集体，而是三个。他们互相竞争和削弱。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工人中普遍产生了阶级身份的意识，和一个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意识。一些工人也许还以为资产阶级支配着他们的全部生活，并产生了可选择社会(尽管这些选择很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尽管工业化也促进了另外两个更小集体化的工人团体：地方集体，由技术和劳工市场的权力产生；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局部**的互相依赖。广泛的政治性阶级发展起来，但只是和地方主义、部门主义不完全地、持久地竞争。

2. 我描述了阶级身份加强的两个时期。第一次(第十五章)来自(第

一次)工业革命，但只限于英国。这是特别的集体化，因为革命促进了混杂的职业状况：工厂、技工贸易、街头工作、家庭作坊都互相渗透。但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熟练阶层、近邻、家庭成员都受到了影响，这就深化了人们对熟悉的工人阶级身份、矛盾的雇佣关系、家庭以及当地社区反抗外来压迫的意识。第二(第十七、十八章)，第二次工业革命遍及所有这些国家(不管它们是否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处都产生了集中的资本、大型工厂，还有雇主们讨厌的简单技工，同时把临时工升为正式工和半熟练工人。这使广泛的工会和被禁锢的工人发展了他们自己居住社区之间的交流。作为回应，工人们发展了广泛的、政治性的、能清楚表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阶级组织。

工人**阶级**确实产生了两次。但它的产生是受限制的。在第一时期，它集中于技工身上；第二时期，集中在熟练和半熟练金属工人、矿工，和大城镇的运输工人身上。在这些中心之外——在第一时期，在未受威胁的商业领域，在多数农村，在家庭仆人之中；第二时期，在其他工业和小镇上——大部分工人仍然受到分散的控制，对阶级身份没有意识或采取敌对态度。这使激进分子觉醒，意识到他们对广大选民的影响有限，对武装军队的影响更小。甚至在中心，工商联合会和分散的劳动力市场控制能减少阶级统一，使对立双方相互妥协，从而远离阶级。整个19世纪工匠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熟练工人。主要的地区断层线是在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之间。中心内部工人市场发展了，产生了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新的部门的相互依存，以及有组织的工人和无组织的临时外部工人之间的分离主义。当这些人被定义为“工贼”或“拒不参加罢工者”，地方主义就变为暴力，尽管有人称为“社会党人”。这样产业工人阶级的兴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阶级，而且也作为一个**部门**或**地区**。为争取工人身份和精神的斗争仍在继续。

3. 在第一时期之后，职业和家庭—社区生活也没像马克思预料的那样简单地相互强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正式的职业将生活分成两部

分，更多地是因为有正式工资的职业——特别是在工业和产生了大部分工会的熟练阶层中——变成以男性占主导地位。 集体劳工的领域、组织、意识仅限于变为集中雇佣的生产性的。 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关心生活的整体性。 不足以像宪章主义者和雅各宾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们热情减退，内在的士气也削弱了。 就像我们在第十九章见到的那样。 在多数国家，产业主义和国家主权说也导致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削弱，这妨碍了对农业人口的有效的吸引。

这样，劳工经济的发展是含混不清的，也许能转为马克思所期望或渴望的轨迹，也许下降为更加分裂或保守。 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政治的柔韧性上，工人和农民是相似的，像农民一样，他们拒绝许多不同的道路。 道路的不同很少由资本工业化的差别来决定。 德国和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个领导国，发展了西方最大和最小的社会党。 法国由于工业化的落后，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是早熟的。

工人运动多样性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权力的定型，是有军事王权和代议制以及民族敌人之间的斗争推动而开始的。 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后来大部分国家定型为强大的资本主义类型，而且大部分也开始大幅度平民化。 但它们实质上已经把不同统治策略制度化，工人对此的反应是作为阶级、地方和部门的运作者，而且带有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当统治政府直接面对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时，有四种主要策略或倾向，夹杂着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代议制。

1. **专制军国主义**的例子是沙皇俄国。 工人们一致地(尽管并不是完全一致)被否决了权利并遭到镇压。 因此，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和社会主义只取得了有限的、不稳定的发展。 俄国工人变成为工人阶级，他们的激进分子，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2. **自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例子是美国。 工人的权利很不平衡，尽管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已经很牢固地制度化，集中民权还是被限制并遭到残酷镇压。 因为这种镇压是选择性的，工人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美国劳工变为部门性和地区性的，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且首

要的是没有社会主义。

3. **自由改良派内部合作**的例子是英国，也包括英国的白人自治领和荷兰、比利时。法国与此相类似，尽管用复杂方式在以前描述过。资本自由主义在欧洲并没有制度化——瑞士是最好的说明。自由民主逐渐扩散，同时阶级越来越受到注意(还有财产)。旧政权把中产阶级和农场主融合入政党民主的最高机构中。政权中的资产阶级政党看到了以阶层和阶层、组织和组织方式与工人、地区、部门让步的益处和必要性。当它们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兴起。不愿展开国内军国主义，在自由主义、现代互惠主义派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改良派形式之间，在阶级和工人组织的地方形式之间妥协。后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把这种策略更深远地推向全面的**改革合作**中。

4. **半独裁联合**的典型例子是日耳曼帝国，然后是奥匈帝国和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介于半独裁主义融合和自由融合之间)。君主制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农场主的首轮交锋中取得胜利，在执政党民主方面没有让步。借助于半议会制使部分的分而治之策略制度化，并且使军国主义缓和为军事力量的礼节性表演，这就成功地瓦解了它们，把它们绝大多数融合入这种制度。极少数不包含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极端分子与手工业者的联合，形成了表面上的革命社会政党和联盟。但是它们的孤立以及它们对有限的政党民主政治的介入，实际上削弱了影响任何革命抉择的力量——或者，实质上，削弱了任何重大的改革主义或互惠主义——对两者的抉择。

但是这些策略或转变不能完全解释结果，因为我也增举了变化着的**国家**定型的例子。让我们就有无阶级特征和有无社会主义来考虑这两个极端的结果。俄国独裁统治高度集中。工人们经历了这样一种全民族共同的压迫和剥削，以至于他们形成一种在就业、街道及社区等关于他们自已身份以及他们对于身份的强烈的阶级感和民族感。军国主义者变得像马克思希望的那样从属于信奉革命的中央集权学说的社会党。可能他们的革命激情会被无限地抑制，但是这种制度也离间了城市自由

主义者、地区民族主义者和农民，导致他们在全民族动员的战争中失败。 无产阶级和整个民族一起起来推翻了它。 美国在结果上是相反的一个极端。 但是美国是仅次于最严重的国内军国主义的一个例子。 这里的镇压是由强大的资本主义和俄国的两个对立的政治极端政党民主和联邦主义联合实施的。 因为它加强了地方—地区、民族—宗教和熟练工人内部劳力市场的地方主义。 美国社会党人派系化，然后又分裂。在由这两大力量统治的20世纪中叶，这两大极端的例子有重要意义。

中间的结果也是部分地由国家与代议制成形的显著结合产生的。在德国，相当部分的工人被排除在集会权和政治权之外。 在俄国，这加大了阶级统一，削弱了地方主义，但激进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选票威胁。 甚至连阶级也是根据竞争性的国家成形来划分的。 尽管这加强了路德派和北方派的统一，但在天主教和南方派中间削弱了，同时它们削弱了工人、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的可能性。 德国工人阶级也许是像马克思可能希望的那样组织和成为社会党人，但规模很小，而且没有得到好的领导。 根据国家成形，由工业和劳工的地区—宗教介入调节，工人运动有时是高度国家主义者(如德国)，有时是高度反国家主义者(如西班牙部分地区)，最常见的是综合妥协。

对农民而言，国家成形帮助他们认识到了宗教差异。 为什么天主教徒比清教徒更抵触社会主义？ 最直接的原因是教会财产驱使他们如此。 但是为什么？ 也许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是无宗教信仰的——但这应疏远所有的教会。 也许这类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保守”。 它支持等级制度，但国家路德教也如此，它对北欧的社会民主和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起着传导性的作用(后来是法西斯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一批不成比例的带有路德派背景的工人变成社会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或有的后来成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

但另外天主教会在两种意义上是反国家主义的。 它是过渡性权力组织，而且是以提倡地方地区主义进入“国家”政治的。 在这时期它尤其反对国家主义，因为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成形为世俗的，并在天主

教地方权力主要主管的两个领域——教育和家庭进行蚕食。国家教育和民权，尤其是家庭和法律是它所害怕的。因此，教会激烈地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主义——在法国最为明显。而在奥地利、德国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持续存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另一种国家主权说，因此教会绝对反对它，这样教会能倡议它自己的保护主义、经济主义，甚至互助的工会。我们发现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型式的趋势(尽管不是一种完美的集合)——马克思主义和有争议的社会民主——在北欧路德派之间或作为世俗的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反对天主教统治的南欧已经发展起来。相反的，非政府的清教主义(像英国不信教主义或大部分美国新教教会)与温和的经济主义和工人协同作用相互联系。第十九章把争议扩大到农民。教会的政治姿态很少取决于正式的教义，而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是多数还是少数派教会以及国家的身份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这时期，教会政治主要围绕国家问题进行成形，甚至在农民阶级中更加强烈。

注 释：

[1] 这两个国家的数据贫乏，近来的东欧革命或许可弥补。它们工人阶级斗争的民族成分(方面)被忽略了。

[2] 1912 年，挪威工党占选票的 26%。1915 年上升到 32%，1913 年，丹麦社会民主党获得 30%的选票。其余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英法选举之后，到 1909 年，意大利社会党获得 19%的选票，然后在 1913 年，合并独立党和改革派，它们包括了 23%的选票(库克和帕克斯顿 1978 年的数据)。

[3] 正如美国同事曾劝我的，或许在 20 世纪 50 年代存在第二个转折点(尽管我不太相信)。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增长(看起来是增长了)是相反的——再一次的由于政治成形而不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我认为，在 1914 年以前，对美国来说事情就已基本定下来了，但是为了恰当地支持这一论点，就必须对 20 世纪的发展作全面探索。在本卷中将不涉及这个问题。

[4] 这部分是马克斯对美国地方主义不精确的分析，否则，他对地方主义的分析将会是杰出的。他错误地把美国和经常受小小镇压，如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那样的国家归于一类(1989：75)。

[5] 关于工人阶级，我主要是依据邦内尔(1983)、曼德尔(1983)、史密斯(1983：5—53)、斯温(1983)的研究。关于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工厂制度的有趣的比较，参见布拉沃伊(1984)。关于制度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参见霍布森(1991)。关于沙俄劳工政策，见麦克丹尼尔(1988)。关于劳工镇压，见戈德斯坦(1983：278—287)。

[6] 关于这时期的法国劳工史，我特别参考了诺兰德(1956)、勒弗兰克(1967)、里德利(1970)、佩罗特(1974)和莫斯(1976)的作品。

[7]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一点我不同意加利。他弱化了战前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力量，这点是对的(他把后来的力量归因于“一战”，这部分争议我将在第三卷评论)。但他

弱化革命性质或相当于性质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它已派系化。马克思主义和工联主义在1914年前已完全确立，正如他声明的，它们不是“一战”的产物。

[8] 这几段主要依据马莱法基斯(1970)，他过度强调阶级，还有米克(1974)和吉纳(1984)。

参考文献

Aminzade, R. 1981.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patterns of industrial pro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Bain, G.S., and R.Price. 1980. *Profiles of Union Growth*. Oxford: Blackwell.

Bairoch, P., et al. 1968.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Its Structure*. Brussels: Editions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Libre (in English and French).

Bell, D.1974. The problem of ideological rigidity. In *Failure of a Dream?*, ed. J.H.M.Laslett and S.M.Lipset.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Besançon, A. 1986. The Russian case. In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ed. J.Baechler, J.A. Hall, and M.Mann. Oxford: Blackwell.

Boll, F. 1985. International strike wav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1989. Changing forms of labour conflict: secular development or strike waves? In *Strikes, War and Revolution*, ed. L.Haimson and C.Ti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nnell, V. 1983.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ecy, R. 1969. *La grève générale en France*. Paris: Etudes, et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es.

Bridges, A. 1986. Becoming American: the working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ody, D.1960. *Steelworkers in America: The Non-union Era*.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Burawoy, M. 1984. Karl Marx and the satanic mills: factory politics under early capitalism in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Burnham, W.D. 1965.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univer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

1970.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Cook, C., and J.Paxton. 1978. *European Political Facts, 1848—1918*. London: Macmillan.

Cottereau, A. 1986. The distinctiveness of working-class cultures in France, 1848—1900.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rew, D.F. 1979. *Town in the Ruhr: A Social History of Bochum, 1860—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ronin, J.E. 1985. Strikes and the struggle for union organization: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1989. Strikes and power in Britain, 1870—1920. In *Strikes, War and Revolution*, ed. L.Haimson and C.Ti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bofsky, M. 1969. *We Shall Be All*.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4. Socialism and syndicalism. In *Failure of a Dream?* ed. J.H.M.Laslett and S.M.Lipset.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Edwards, P.K. 1981. *Stri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974*.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Evans, R.J.(ed.). 1982.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0—193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Croom Helm.
Fink, G.M.1973. The rejection of voluntarism.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26.
1987. Labor, liberty, and the law: trade unionism and the problem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orde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4.
Foner, E. 1984.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7.
Forbath, W.E. 1989.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Harvard Law Review* 102.
Fraser, W. H. 1974. *Trade Unions in Society: The Struggle for Acceptance, 1850—1880*. London: Allen & Unwin.
Gall, L. 1986. *Bismarc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London: Allen & Unwin.
Gallie, D. 1983. *Social Inequality and Class Radicalism in France and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ary, D. 1976.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1848—1919.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6.
Giner, S. 1984.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atalonia*. Sheffield: Anglo-Catalan Society.
Goldstein, R.J. 1978.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Moder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1983.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Gompers, S. 1967.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An Autobiography*, 2 vols., 2d ed. New York: 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
Gossez, R. 1967. *Les ouvriers de Paris*. Vol. I : *L'organisation, 1848—1851*.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Grob, G.N. 1961. Workers and Utopi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Grüttner, M. 1985. The rank-and-file movements and the trade unions in the Hamburg docks from 1896—1897.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Gulick, C.A. 1948. *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Vol. I : *Labor's Workshop of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imson, L.H. 1964—1965. The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in urban Russia, 1905—1917. *Slavic Review* 23 (1964), 24(1965).
Halle, D. 1984. *America's Working Man: Work, Home, and Politics Among Blue-Collar Property Own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nager, M.P. 1980.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Artisans and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ree French Town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artz, L. 1955.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Hirsch, S. 1978. *Roots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Hobson, J. 1991. The Tax Seeking State: Protectionism, Taxation and State Structures in Germany, Russia, Britain and America, 1870—1914. Ph. 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olt, J. 1977. Trade unionism in the British and U.S. steel industries, 1880—1914: a comparative study. *Labor History* 18.
Katznelson, I. 1981.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ntheon.
Kochan, L. 1966. *Russia in Revolution, 18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Kocka, J. 1986. Problems of the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Germany: the early years, 1800—1875.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aditor, A. S. 1981. *The Radical Persuasion, 1890—1917*.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Lash, S. 1984. *The Militant Worker: Class and Radicalism in France and America*. London: Heinemann.
Laslett, J.H.M., and S.M.Lipset (eds.). 1974. *Labor and the Left*. New York: Basic Books.
Lebergott, S. 1984. *The Americans: An Economic Record*. New York: Norton.
Lefranc, G. 1967. *Le Mouvement Syndical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Payot.
Lenin, V.I. 1970. *What Is to Be Done?* Manchester: Panther Books.

Lequin, Y. 1977. *Les ouvriers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1848—1914)*, 2 vols. Lyon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s.

Lidtke, V.L. 1985.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M. 1977. Why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Radicalism*, ed. S.Bialer and S.Sluzar.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4. Radicalism or reformism: the source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his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Lowi, T.J. 1984.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ederal analysis. In *The Cost of Federalism*, ed. R.T.Golembiewski and A.Wildavsk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Ludtke, A. 1979. The role of state violence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example of Prussia from 1815—1848. *Social History* 4.

McDaniel, T. 1988. *Autocracy, Capitalism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cKean, R. 1990.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lefakis, E.M. 1970. *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ndel, M. 1983. *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 London: Macmillan.

Mann, M. 1988. 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 In M.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Marks, G. 1989. *Unions in Politics: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eaker, G.H. 1974. *The Revolutionary Left in Spain, 1914—1923*.: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B.R. 1983.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Detroit: Gale Research.

Mommsen, H. 1985. The free trade unions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imperial German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Montgomery, D. 1967. *Beyond Equality*. New York: Knopf.

1979.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Labor and the republ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60—1920. *Le Mouvement Social*, no. 111.

Moore, B., Jr. 197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Morgan, D.W. 1975. *The Socialist Lef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oss, B.H.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1830—1914: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ouzelis, N. 1986. *Politics in the Semi-Periphery: Early Parliamentarianism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alkans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owry, G.E. 1972. *The Progressive Era, 1900—192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olan, M. 1986. Economic crisis, state policy,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Germany, 1870—1900.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land, A. 1956. *The Founding of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1893—190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lman, S. 1928. *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Perrot, M. 1974. *Les ouvriers en grève*. Paris: Menton.

1986.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R. 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yback, J.G. 1966.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Free Press.

Ridley, F. F. 1970.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in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gin, M. 1961— 1962. Voluntarism: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an antipolitical doctrine.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5.

Rokkan, S. 1970. *Citizens Elections Partie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Roth, G. 1963.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Totowa, N.J.: Bedminster Press.

Rueschemeyer, D., E.Stephens, and J.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ul, K. 1985. Repression or integration? the state, trade unions and industrial disputes in imperial German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Schofer, L. 1975. *The Formation of a Modern Labor Force: Upper Silesia, 1865—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önhoven, K. 1985. Localism-craft union-industrial union: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in German trade un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Sewell, W.H., Jr. 1986.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848.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efter, M. 1986.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 R. 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ell, K.L. 1962.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strian Soci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Publishers.

Shorter. E., and C.Tilly. 1974.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lar, M. J. 1988.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19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wronek, S.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t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lotkin, R. 1985. *The Fatal Environment: The Myth of the Frontier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1800—1890*. New York: Atheneum.

Smith, S. A. 1983. *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1917—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mbart, W. 1976.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Macmillan.

Spencer, E. G. 1976. Employer response to unionism: Ruhr coal industrialists befroe 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Stearns, P. 1975. *1848: The Revolutionary Tide in Europe*. New York: Norton.

Swain, G. 1983.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Legal Labour Movement, 1906—1914*. London: Macmillan.

Taft, P., and P.Ross. 1970. American labor violence: its causes, character and outcome. In *Violence in America*, ed. H.D.Graham and T.R.Gurr. New York: Praeger.

Tenfelde, K. 1985. Conflic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erman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Traugott, M. 1988.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8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

Ulman, L. 1955.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Trade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instein, J. 1967.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2—192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2—1925*, 2d e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Wiebe, R.H. 1967.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 Wang.

Wilentz, S. 1984. Against exceptionalism: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790—1920.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 26.

Woodiwiss, A. 1990. *Rights v. Conspiracy: A Sociological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ur Law*. Oxford: Berg.

Wuthnow, R. 1989.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European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第十九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880—1914 年(三)：农民

对农村阶级进行的比较研究很少。工人被反复谈论得令人厌烦，而农民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可是，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农民人口最多，是最大的选举团体，大部分士兵也是农民。在这一章[1]里，在我看中的五个国家中，拿四个来比较它们的农村阶级斗争，此外，再加上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挪威和瑞典——另外加的国家足以让我代表“左派”农民政治。这里未谈及大不列颠的情况。从马克思开始进一步发展的阶级划分理论大多数是以英国状况为基础的。表19.1 表明了这是怎样在误导人们视线的。

表 19.1　各国劳动力的部门分配(每一部门所占百分比)：

国　　家	年　代	农　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合　计
大不列颠	1871	15	47	38	100
	1911	9	52	40	100
法　　国	1866	45	29	27	100
	1911	41	33	26	100
丹　　麦	1870	48	22	13	836
	1911	42	24	30	96
德　　国	1871	49	29	22	100
	1910	36	37	27	100
美　　国	1870	50	25	25	100
	1910	31	32	37	100

(续表)

国　家	年　代	农　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合　计
瑞　典	1870	61	8	12	816
	1910	46	26	14	96
奥地利	1869	65	19	16	100
	1910	57	24	19	100
匈牙利	1870	70	9	21	100
	1910	64	18	15	100
俄　国	1897	59	14	25	100

a. 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

b. 丹麦和瑞典的官方统计数字包括大量未充分说明的职业，尤其是在早期。

资料来源：奥地利—Kausel(1979：698)。德国—1871 数据来自 Fishcher 等人(1982：52)。所有其他数据来自 Bairoch 等(1968)。

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我们看到英国(除了它的爱尔兰殖民地外)都保持这种异常。1911 年，它的农业劳动力仅占 9%，比其他任何大国的这一比例的 1/3 还少(小国比利时次之，是 23%)。在其他两个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国家德国和美国，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劳动力那时刚刚超出农业劳动力。除英国和比利时外，在其他任何地方，这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虽然，在 20 世纪初美国的阶级关系中，农业并不重要，但在别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前面几章列表说明的资本、劳动力和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结果将决定性地由主张平均地权的人改变。为了透彻地分析现代阶级关系，我们必须分析农村的人口。

但是，分析农村政治的普通理论有三个障碍，马克思的遗论是灾难性的。他预言农业人口会减少，就像英国一样。结果确实如此。但仅在 20 世纪中期，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基本制度化以后，他还固执地认为农民无力组织阶级。他的错误让社会学家犯了巨大的政治偏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其次，一种反农民偏见已支配着西方大部分思想，把农学家们看作是保守的、传统的和反现代化的，并且注定被扫入历史垃圾堆(Gerschenkron, 1943; Moore, 1973; E. Weber, 1978; Jenkins, 1986)。再次，农村政治在事实上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为理论提出非

常艰难的任务。什么样的理论框架能将它们的教权主义、君主主义、费边主义、民粹主义、共和主义、社会民主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融为一体呢?

理论的发展，经济方面比政治方面要好，20世纪的第三世界比西方的要好。林茨(Linz, 1976)、佩奇(Paige, 1976)、索罗金(Sorokin, 1930)等，斯廷奇库姆(Stinchcombe, 1961)和沃尔夫(Wolf, 1969)都主要分析了现代第三世界的经济利益、集体生产力以及对全球商业化作出的反应。然而，正如我在全文所强调的，阶级斗争也是政治。一些斗争目标放在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勒索、税制和军队征募上，经济问题转换成政治问题，因为政党追求掌权——中央的、地区的和地方的——以便实现它们的目标，因而政治具体化也构成了农民运动。尽管这些作者承认用经济变化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是不够充分的，他们把政治看作“外界”影响(Wolf, 1969, pp.290—291, Paige, 1976, pp.43, 47)，或者将它们作为以经验为依据的细节加以补充(Linz, 1976)。其他人把政治理论化，却仅用它来解释阶级政治(Moore, 1973; Rneschemyer, Stephens, and Stehpens, 1992)。我认为农村政治的差异主要是随着民主政党和国家政治具体化互相结合而产生的，因而决定性地构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

农村的阶级

我划分了三个主要的农村阶级。在这一节里，我分析它们的经济利益和权利。在下一部分我叙述一下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土地所有权的动力，即资本主义商业全球化对农民的影响。最后，我考察政治权利关系是怎样与这些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这些阶级是:

1. 庄园主——贵族、绅士或对他人土地有使用权的人——拥有大片土地，中等或大规模地雇用劳动力。

2. 农场主——欧洲大陆的术语，农民——通常拥有他们自己的土

地，雇用自己家的人耕种。

3. 无地劳工，为第一阶级，有时也为第二阶级工作，可以是偶尔、季节性或长久地，以实物领取工资，自由或契约身份。

两点说明：第一，租地自行经营产生了居间的身份。根据拥有土地的规模和是否雇工，拥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法律特权的租地经营者，为共同利益与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结合在一起。相反，缺乏保证的佃农或面临失去租佃权利威胁的佃农与无地劳工的关系更密切。第二，农民是参差不齐的，既有富裕的市场型农场主，又有生产的粮食只够自己食用的小土地持有者。大部分富裕农民雇用劳工，一般说来是季节性地从家庭外雇用，而穷困的农民受雇用人不仅要在他们小块土地上劳作，而且，还要以自由身份、契约或交谷租种的方式受雇于较富裕的农场主。我特别注意佃农和小土地持有者(dwarf-holders)。

这三个阶级中的两个阶级将不会耽搁我很久。第一阶级的利益和权力是明显的。庄园主和地主处于欧洲新老统治政体的核心。他们控制着美国南部，影响着其他地区的大商业财团。他们在每个地方组织保守的“秩序政党”(Parties of order)致力于维护财产关系，反对民主(Rnese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第三阶级即无地劳工的利益和权力也容易掌握，尽管他们是矛盾对立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受雇于大农场主，通常受到明显的剥削，遭受低工资、专横职权和无正当权力的折磨。大部分活动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政党将它们的努力集中在这一部分人身上。但是劳工不善于在集体组织中，劳工是贫穷的——他们分散于不同地区，几乎没有文化；在雇主的直接控制下生活和工作，经常吃住在农场，有时被作为债务奴隶；而且他们要服从农场主部分控制的当地慈善机构——教会、行政机构和政府。尽管这是一个潜在的阶级，但无地劳工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广泛的或政治的阶级。

第十五章赞同纽比(Newby)的解释(1977)，部分控制怎样导致了与其说是阶级意识，不如说是“依从”：农场工人从农场主那儿得到他们的

必需品，而不是反对他们，而且，发展并内化了吸引他们的依从策略。农村的社会鼓动家实际上在威胁着这种依从的成功。劳工(和租地经营的农场主)可能把他们自己看作与其说是一个阶级的成员，不如说是跨阶级的村庄和集体庄园的成员。阶级身份和激进政治通常不出现于地主所有制中，其中地主和佃农都有地方自治权，尤其在南部欧洲常见的以谷物交租的形式中(参看，例如，在西班牙，Malefakeis, 1970)。在所讨论的这些国家中，这种情况仅出现在法国东南部和美国西部的一些州——它滋生了激进主义。除非地主的局部控制机构被取消，否则农村无产阶级会成为一个最突出的潜在阶级。

第二阶级即农民农场主是个问题。他们对于其他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清楚。虽然大部分农民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这一点他们与大土地所有者、无地劳工和城市阶级截然不同。但是按照马克思的生产中心论，他们没有固有的阶级敌人，因为他们的生产是自主的。大多数的生产剥削发生在家庭内部，一般为家庭中年长的男性所实施。大部分小土地持有者都受到一定的劳务剥削，尽管这几乎还没提供一个总的阶级身份(因为他们也是财富私有者)。

然而，韦伯的阶级分析是基于市场上的信誉斗争而非生产斗争，这可能更适合农民。韦伯认为阶级是随历史转化的：从消费信誉斗争开始，首先，转向商品市场的竞争冲突，然后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争议。“历史上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债务奴役的威胁，反对城市债权人”(1978, Ⅱ, P.931)。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比韦伯预测的还要长。

19 世纪晚期，农民主要遭受信贷和物价的剥削——在抵押契据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谷物扣押制度、垄断价格方面——这使债务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债权阶级处于对立。马克思也注意到这种发生在 19 世纪法国农民中的现象——将要来临的无产阶级化。但他怀疑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组织能力，在《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他出色地剖析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农民们尽管彼此相似，他们却不互相依存，他们的生产方

式使之彼此分离——“只有地方的密切联系”，使农民好像一麻袋土豆中的土豆一样，个头大但形状不一，是有活力、无能力组织的阶级。这是错误的。可以把农民非常有效地组织起来(如 Wolf, 1969)。

然而，无论它们的阶级利益怎样，三个农村阶级都有部分共同的特性。它们都易受气候和谷物疾病的影响。用所有亚文化群的意识形态的反响来表达它们“比较接近土地”，它们被地域分割成村庄，有明确的本地区组织和政治。大部分工业工人由工会或企业组织，而农民则由社团和当局组织。我们将看到，进入 20 世纪，这使得宗教与中央—外围组织远远超过罗坎(Rokkan)所构想的时间框架之外，这也是恰当的。最后，欧洲(尽管不是美国的)的农民比城市工业人口更传统，与旧政体和教会的关系更长久、更制度化。农村政治更多地与旧政体和教权主义有关系，无论是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而言。

行业主义使得作为生产者的农场主与消费者城市工人处于对立状态中，农场主的利益在于食品高价格，而城市工人希望价格低些——由于物价受到价格支撑体、税收和关税的影响，这些不同点容易政治化。可是，农场主通常要买一些产品，而所有的农场市场几乎不发生变化。当谷物生产者追求保护制度时，块根植物、葡萄酒和牛奶生产者却去追求开放市场。因此，行业经济利益往往范围较狭窄。然而，农民具有与城市工业工人不同的亚文化。如果他们的经济利益确实冲突，那么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就会很快扩大他们的利益。

所以，除了庄园主的保守主义以外，很难从农业阶级及其阶层推断出任何一种必要的集体特性或政治。在大农场主和无地劳工之间，马克思最显著的阶级划分理论是最难组织的。别的冲突界限看起来模棱两可。罗坎所谓的土地对工业的矛盾尤其似是而非——实际上是信贷阶级斗争与生产者——消费者行业斗争的混合物，其中的每一方都可能是农民反对不同的敌人。当全球的资本主义改革影响到 19 世纪晚期的农业时，农民就这样做了。

农业的全球商业化

当西方经受商业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之时，农业为其提供了农产品和劳动力。 铁路(从 19 世纪 40 年代)发明以后，甚至各洲大陆也在商业上联为一体。 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投资资本，因此加剧了农村的分化。庄园主和富裕农民在损害公有土地、贫穷农民和教会的情况下，扩大他们可以占有的土地。 正如梯利(Tilly, 1979)所表明的，工业革命中，大部分无产阶级化发生在农村。 无地劳工移居到工业区和海外。 由于制造业集中于城镇，农村的工业和手工业衰落了(这种情况在法国和瑞典很少产生重大影响)。 《共产党宣言》预言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要快于城市工业的两极分化。

但那时，两极分化停止了。 在 1860 年到 1886 年间，人口普查委员会的统计数字表明，农民并未像预料的那样消失。 卡尔 · 考茨基在《农民问题》(1899， 1988)中，提出了当代最好的阶级分析理论。 考茨基看到农民家庭雇工比自由劳工受剥削要深。 为了保住他们的土地，农民家庭劳作得更辛苦，消费得更少，以此度过不景气的日子。 他们的自我剥削——实际是家长制剥削，男性家族头目剥削消费不足的妇女、年幼男子和孩子——以及他们不愿出卖土地，从而导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恰亚诺夫(Chayanov)宣称这是一种新的“农民生产方式”。 可考茨基也声明农民家庭成员不是自主的，他们的生产与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 小土地所有者或村民和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双重身份的家庭成员在大农场或工厂干白日工，在他们村舍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生产部分生活必需品(也许有一些市场产品)。 小农场也培养了季节工、零工，这也是军队新兵的来源。 在农民家庭、资本主义和军事国家之间已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 考茨基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预想，面临着工业雇佣制，农业雇佣制将会消亡。 但他认为农村的两极分化结束了。

考茨基的主张是正确的，尽管没有充分表述出来。农民为什么兴盛，也有着正面的原因。土地拥有的集中具有成本费用和效率界限。韦伯在他 1894 年的论文中指出，普鲁士容克地主为了筹集资金投入到他们剩余的庄园，被迫将土地卖给农民。这样，由于工业争夺劳动力，农业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农场工人节省资金，投到他们拥有的小块土地上；另外，庄园主的工资高于正在剥削他们住户的农民的收入(Granthman, 1975)。许多食品生产出来，其价格小庄园和大庄园是一样的。粮食产品的情况并非如此——因此美国中西部的农民情况也不是这样——但是欧洲农民可以专门种植根茎植物(在德国西部；Perkins, 1981)、奶制品(丹麦)，或蔓生植物(法国南部)；农民也结成合作社来购买机器和耕作技术以及分配产品，这就驳斥了马克思“一麻袋土豆”的比喻。正如早期的发展情况那样，到 1900 年，大部分的大庄园并不是先进的农业经济而是滞后并起反动作用的——在欧洲易北河东部、俄国、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和美国南部都是这样。在先进地区，庄园主、农民和无地劳工的经济共同联合成最先进的工业和金融部门。

这就导致两种有选择的农村政治：阶级民粹主义和部门性分割主义。当农场主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网络，信贷冲突加剧。凭土地(若是领主)或收成(若是佃农)作抵押可增加借贷，在美国大草原诸州，农场主抵押土地来购买铁路股份，这是他们销售能力的生命线，但是，铁路公司与银行相互勾结，耗费他们的投资并威胁着土地的赎回权。小农场主从大农场主和银行家借用资金。佃农被迫遵行谷物留置制和交谷租田制。更为贫穷的农民受到的威胁最大，尤其是在那些可分割的继承权分割了拥有的土地的地方。农民认为受到城市和农村大资本的剥削。他们要求取消或减少债务信贷，根据有利的条款借贷，对银行、铁路公司和化肥农机生产公司进行调节。这就是阶级民粹主义；基于信贷和市场的关系，韦伯式的阶级冲突，将“人民”和合作资本主义对抗。在左派联盟中，将工人和农民与相似的对手潜在地联合在一起。

但是，市场竞争使农场主的部门特性凸显。农业萧条扩散得很

快，因为生产者被迫降低价格。一个州之外的形势改善可使他们的廉价产品倾销到当地市场，如 1880 年左右美国的谷物和阿根廷的牛肉在欧洲倾销。分工细化更易受到商品市场的变化的影响。如果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如在 19 世纪 80 年代葡萄根瘤蚜虫毁坏了法国的葡萄园)或外国竞争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如在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农场主提高了碾磨技术，廉价出售普鲁士的黑麦)，那该怎么办？一项政治补救措施是：国家通过津贴、贷款和关税强制保护市场。但是农业关税招致外国的报复，伤及其他产品的生产者，因此通常遭到城市制造商的反对。部门政治时常使农民和工人相互处于对立状态中，若工人是左派的，农民就倒向右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类庄园主能领导部门性抗议；而庄园主可能领导分散的和保守的运动，农民则领导部门性的民粹主义。

因而，农村的政治经济产生了矛盾的阶级和部门利益，由于债务、信贷和关税，这种经济被政治化了。从 1873 年起，农业大萧条加剧了这种变化。许多人认为萧条使农民变得保守，抵制危及他们生存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例如，Jenkins, 1986)。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化退潮，就没有多少农民去反对现代化。他们不需要反动或革命，而需要有限的国家介入以在短期内减少苦难，以使他们公平地参与长期的现代化。如果不满针对资本主义的运作者如银行或铁路公司，那就可能变成激进的了。但这些不满也隐含了切实可行的政治补救措施：关税调整、信贷和互助合作。政治活动通过国家得以展开。在那方面，农民将会面临怎么样的政治具体化？

国家和农村阶级：四种一般形式

如前面各章所示：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代议制的和全国性的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正如罗坎(1970)所认为的，这不仅仅发生在阶级和部门之间，也发生在中央集权者和分权者之

间、教会和国家之间。代议制运动以两种方式抵制绝对的君主政体：减少中央国家权力或接受中央集权化以及分权化，既引起了政党问题，也产生了全国性问题。在这些斗争中，教会在农村尤其重要，它们为本地区动员提供了主要的基础结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有三种可能的地位：作为国教(新教比天主教更有可能)、多数人教会或少数人教会。因而，它们的地位与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不同。

尽管与农民有关的政治具体化是复杂的和独特的，但是它们在某一方面比工业具体化要简单。到 1900 年，农民是欧洲的主要兵源，大部分国家正向农民妥协(部分原因是避免工农联合运动)。因而，军国主义在农村的阶级关系中衰落，除非那里的地区民族主义激发它们。(这里讨论的国家主要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外省，而就美国南部来说，情况不大一样。)因此，我把农村的政治具体化简化到二维空间内，依据二维中任何一方的三种立场来区分它们，即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在这一时期，君主制在所有先进的国家都受到政党民主的挑战。目前的结果各国也不同，从力量均匀平衡到处于困境的君主制，再到已经被制度化的政党民主废除或由于组织政府而变得无权的君主制。民族问题产生更多不同的后果，但在我的这些国家里能区分出三种结果。表 19.2 细分了九种理想类型，尽管我的这些国家仅占其中的六项。

表 19.2　19 世纪农业国家的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

集权化对联邦主义	君主制对政党民主		
	公平竞争	弱化的君主制	政党民主制度化
大部分政党中央集权化者	德国	斯堪的纳维亚	法国
君主制	奥地利和德国	俄国	
中央集权化的民主人士	大部分奥地利国土	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	
联邦的			
大部分政党			
联邦的			美国

在这两种互相结合的政治具体化的基础上，就可以预测农村政治的国际变体。但因为我没有涵盖许多国家，也因为把国家作为单个全体来讨论只有叙述的意义，所以，我把它们简化为四种广泛的形式：

1. 政党民主(对大多数男人)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法被制度化。在法国政治组织中出现集权化，在美国是邦联制。但在这两种情形中，存在的政党被严格制度化，而新的政党包括农民的党派相当无力。但因为一个邦联国家能允许更多的地区变化，因此主要的例外出现在美国，在某些地方和州的政治中，暂时由农民政党控制。

2. 平衡竞争的力量仍在争夺政党民主，它们中的大多数赞同国家集权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这主要是独裁主义的君主制度与同样集权化的、主张中央集权的工人阶级处于对立状态。这里，大部分农民运动犹豫动摇，最终倒向右派，加入到旧制度的政党，或形成自治的保守党或为君主政体所接受的“中右”政党。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核心奥地利和日耳曼地区，这是主要的形式。

3. 政党民主仍被公平地争夺，但是在集权化的独裁的君主制度和邦联民主派之间进行的。在这方面农民政治上倾向阶级民粹主义，在农民自己控制一切的地方，通常是左派民粹主义；在他们不能控制一切的地方，它便显示出右派倾向。这种形式遍布奥匈帝国的其余地区，但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它却是一种失败的形式。

4. 政党民主仍被争夺，但是与较弱的君主政体站在一起反对同最终成功的城市自由者农民和工人联盟——双方都是集权主义者。在这里，农民倾向左派，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潜在联盟。如在斯堪的纳维亚那样，旧政体被和平颠覆，实现了社会民主；就像在俄国那样，推翻(旧政权)需要革命，农民和工人同样被迫倾向左派。目前，对在沙俄国内的少数民主主义者研究得还不充分，这就使我不能对反对邦联对手的君主制斗争予以适当关注。

法国和美国的政党民主

19 世纪，法国仍是中央集权制国家，1890 年后，其政党实现了民主制度化。它的经济是多种多样的。各地区的农业发展不同，工业化速度缓慢，并且多是小企业，这些小企业遍及小城镇，与家庭农业共有劳动力。1789 年革命者与农民建立联盟，使农民财产制度化，然而他们要求高税收，降低食品价格，还要农民当兵时，农村人口就逐渐后退。西部佃农的行动则更进一步，在地主和教权部分控制下进行武装暴动，这主要发生在 19 世纪(Bois, 1960)。一些地区和城市共同进行了非基督教化；但在其他地区，教会加强了对学校、慈善机构、医院和社区娱乐场所等的部门控制。由于不能直接向集权化进行挑战，教权主义成为本质上的邦联主义：宗教职权的范围扩大，使国家中央权力的范围缩小。在保守的西部和激进的东南部，存在总体的区别，还有许多小的教会宗派，其中城镇和它们的内地仍被共和派和保守—教权派分成几部分(Garrer, 1973, Ⅰ, pp.515—516; Merriman, 1979)。但法国太复杂，无法细分，只能是农村对城市、农民对工人。

因而，农业萧条使农民的不满发展成不同的地区运动。在东南部，大部分农民和专业化的小土地持有者(生产葡萄、橄榄、水果或花卉等)，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1900 年后易受生产过量的影响，容易受到大种植者竞争的影响(也降低了小土地持有者的工资)，还受到中产阶级商人在价格和信贷上压榨的影响(Smits, 1975; Judt, 1979; Brustein, 1988)。1880 年后，他们从共和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结构松散的法国左派(在第十八章描述过)开始变得善于发展项目，这些项目符合信贷阶级农民利益，适应以谷交租者和无地劳工增加生产的要求。他们划出土地，重新分配，扩大税收特许权和津贴范围，提倡累进税，鼓励合作社(不是集体拥有土地)，打击垄断，在一些地区领导反教权主义运动(Loubere, 1974; pp.206—233; Brustein, 1988, pp.107, 169)。

农业萧条也威胁着右派的农村基础，因此右派也学会了政治的灵活性。当地贵族动员农民和佃农参与信贷、保险和合作计划(Berger, 1972;

Garrier, 1973, Ⅰ, pp.518—522)。 教会害怕(如德国的天主教中心就是这样)对农民经济的不满可能会削弱它对部门的统治，因此也作出反应。教会的一个派别放弃了它的君主主义以及与地主的联盟，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农村社会基督教运动。

布鲁斯坦(Brustein, 1988)提出了一个关于西部—东南部的教会宗派的阶级解释。 他提出：在农民所有权的地区和左派投票区之间，在中间地带和小租地(与地主土地)及右派投票区之间，这种正面关系持续了一百年。 他还重新解释从前的研究(Bois, 1960; Tilly, 1967; LeGoff and Sutherland, 1983), 指出这些土地使用权的不同是农村支持或反对革命的基础。 他的结论是：农民天生是左派，而佃农天生是右派。 类似的，贾德(Judt, 1979, pp.113—114, 134—136, 279—280)总结关于东南部左派的研究：“农民总比组成现代社会的其他群体，对革命具有更大的热情。”本章表明，对这一说法是如何概括过度了。 但对法国来说，为什么它看起来似乎又是合理的？

布鲁斯坦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农民的“利益”是左派是右派。 他用某种乐观的语言来描述西方地主与他们贫困依附者的关系：佃农同他们的地主一起分担“有益的冒险的安排”；以谷交租者也这样做，而实际上，他们的契约劳工比其他地方的工资更具安全感。 但是，这使所有三种人所经受的剥削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一些右派政策与他们的利益相左——例如累进制和反对农村民主。 实际上，正如本章总的论点，农村经济“利益”是相互矛盾的，并且比布鲁斯坦所考虑到的更具政治适应性。 生产关系既涉及到利益也包括控制。 积极的农场地主们对他们的依附者实施地方分割控制，这种控制在引导他们走向保守方面更具决定性。 像在其他国家那样，经济和政治权利关系交融在一起注定了农民的结局。 主要因为革命对地方的影响仍然存在，将这种变化的农村利益定义带进了 20 世纪是具有法国特色的。

美国政党民主和邦联制很早被制度化。 尽管内战和失败的南方重建时期需要充分解决邦联主义的问题。 但战争期间也促进了农业的商

品化(Bruchey, 1965, pp.155—158; Darhof, 1969, p.11)。 棉花和食品的国际市场刺激了现购自运的谷物生产。 东部的农场主专门从事乳制品那样的活动，而大平原和西部的农场主则从自给自足的种植变为小麦和渔民的现购自运生产。 农场主们需要运输和信贷，但易受较低农产品价格和债务的打击。 内战产生了通货和信贷缺乏、高税收、高海关税(为了保护工业)和南部农业歉收，从而使形势恶化。

这并非是不可克服的，但不幸的是，美国的政策对农场主变得不利。 像在第五和第十八章所讨论的那样，国家具体表现为资本家的自由(财产权神圣化)、政党民主和联邦制。 它的民主紧紧掌握在两个政党的手中。 民主党继承了农民的利益，但在内战中失去了权利。 现在共和党人和工业资本家控制着政权。 重新组合的全体选民与其说是由于阶级而两极化，不如说是由于地方的和种族—宗教的社团而两极化(Burnham, 1974, p.688)。 共和党人现在控制着北方诸州和联邦政府；民主党人控制着南方诸州。 为在全联邦范围内竞争，民主党人也讨好并得到了商人的支持。 他们的小农场主代表变得寥若晨星，劳动者的代表都可以忽略了。

政治上的忽视滋长了农场主的抱怨。 运输的高费用激发了对调整铁路规章制度的需求。 购买工业制品的高价格使农场主对城市工业利益和当地零售商抱有怨恨情绪。 国家银行对农场主不利，它们将货币制度还原为金本位而对商业有利。 但农场主从他们的产品中得到的钱更少，而购买却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钱，并且还要支付债务。 资金短缺增加了抵押债款，使他们依赖借款者和信贷商。 在小私有者和有租佃权的农场主之中，南部盛行的谷物扣押信誉的制度扩大到别处。 信贷阶级和部门关税之间的冲突激化。 与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同，美国的关税保护制造商，但对农场主不利，尤其是对南部和西部的农场主不利(Buck, 1913, p.21)。

因为现存的两大党派对农场主无助，他们便自主地组织起来。 19 世纪 70 年代，保护农业社的成员抱怨，低价格和高浪费，这是由铁路

公司携制造商和中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他们求助于一些小的第三党：改革党、美钞党和反垄断党。19世纪80年代晚期，更为激进的农民联盟抨击租佃和单一作物制，尤其是在南部，为合作社和农民交易要求补贴。两个政党对商业的控制促使它们更加左倾，与人民党的劳工团体结成联盟，该党在南部和西部最为强大，在中西部还有另外的据点，它的反垄断纲领为小农场主要求更有保障的土地，得到公司的庇护，建立一个联邦国库的“分库”保护农民免受降价和高利贷之害。

进入20世纪早期，在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下，左倾运动仍在继续发展，集中在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等州。那里的农民被迫租佃和抵押谷物，被迫种植棉花，受到由大农场主、地主、商人和债权人组成的当地政府的统治。他们与人民党成员不一样，人民党成员受到外界大都市的商业及金融利益集团的剥削，南方和西南方的小农场主和佃农则受到地方贵族的控制。因而，裂痕与其说是由部门，不如说是由阶级造成的。政治上，资本家支持的民主党控制着西南部(Rosen, 1978)，像他们在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巴伐利亚的对应者一样。西南部的社会主义者倡导温和的农民社会主义。他们不把小农场主看作是资本家，而当作积极劳动的生产者。他们采取激进的阶级人民党主义——将土地给予直接生产者——在选举上和民主党人竞争。最终他们超越人民党主义，而要求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

这些第三党受到当地广泛的支持，赢得许多地方和州的选票(Fine, 1928; Dyson, 1986)。然而，由于两个政党的选民规模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统治，在联邦选举中，第三党未能冲垮两党政治，因此最终都趋向衰落。工农联盟对双方来说都是必要的，但共同的敌人并未产生真诚的团结。农工政党仅在威斯康辛州和明尼苏达州成功地建立起来。与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奥匈帝国某些地区的农工政党不同，为了加强相容却不同的经济纲领，它们并没有一起被排斥在政治公民权利之外。

面对着用资本主义充分灌注的政党，如此脆弱联盟的双方分道扬镳了。第十八章表明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894—1895年是怎样脱离第三

党政治的，在劳工里面只剩下社会主义党这个少数派了。 农场主也分裂了。 人民党被民主党合并，削弱了它的政策。 西南部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开始趋弱，同时又受到地方民主党人的压制(Burbank, 1976, p.188; Green, 1976, p.382)。 在南方，多种族的人民党运动反对谷物抵押制度，但由于种族界限，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这弱化和分裂了运动。 南方在政治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种植园主和商人寡头的控制下。南方的国会代表们在华盛顿紧密结合在一起持保守态度，妨碍有利于保护工人和小农场主的立法。 美国劳工持续不断的弱化也有助于谴责激进的农场主运动。 我们再次看到了美国政府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政党民主和美国政府联邦的具体化所产生的明显的抑制作用。

在这一阶段，美国农场主运动成效不大。 后来在 20 世纪，在佃农和以谷交租者运动失败后，大、中农场主的联合体在现存的两个政党中赢得了相当大的影响。 农场主的许多部门要求得以实现。

强大的君主制受到挑战：德国和奥匈帝国

如第九章和第十八章所强调的，在关于德国的描述中，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因为普鲁士人和新教徒掌握着国家政权。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政权与天主教教会的文化斗争失败后，宗教问题变得不那么直接了，但它仍然与民族问题渗透在一起。 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依赖地主和资本家，再加上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变成了国家的中央集权者；它的敌人是劳工运动和当地支持邦联主义的甚至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少数派(波兰、丹麦、阿尔萨斯和汉诺威的分裂主义者)。

农民属中间力量，既不是整体的核心，也不被看作敌人。 但由于把扩大的劳工运动和邦联主义者作为敌人，政府几乎不能疏远超过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 此外，因为政府冒险估计广大农场主能够部分控制劳工和佃农，所以它引入了不利于城镇的成年男子投票权。 农民的选举发言权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所以他们对民主的扩大持观望态度(Rueschemeyet,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ch.4)。 尽管德国工人为争取

公民权利进行了共同的阶级斗争，但该国的工人和农民与斯堪的纳维亚的不相同。

因此，农民倾向于右派，但这种倾向各地区不一样，因为在东部和西部农村的条件不同。农奴制的废除使东部农奴转化为容克门下的农村劳工，但西部农民长期自由并且继续保持繁荣(Conze, 1969; 54; Brenner, 1976)。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经过19世纪中期，直到1873年经济萧条，才受到打击。这时物价下跌，债务增多，既加剧了农民和城市工业工人之间的部门冲突，又加剧了信贷的阶级民粹主义反对资本家的部分冲突。1882年以后，一半以上的德国农民成为小徒弟持有者，被迫受雇为劳工。军队兵员也受到严重打击，出现了象征社会主义者那样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农民，如社会主义者一样，也反对受保守派支持的税率递减的间接税。但是，如果农民的不满被理解为反对土地税，而支持海关保护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那么，容克和其他庄园主就会结成一个部门性的局部联盟。他们将转向哪一条道路呢?

在易北河以东，农民在容克的局部统治下倾向于右派。但在德国的西部和天主教区，发生了自主的政治运动(Blackbown, 1977, 1984)。然而，农民在由地区和宗教引起的彼此相依的方面，也对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持矛盾态度。在普鲁士北部的路德教派支持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南部各邦的大部分天主教徒——1905年占帝国的37%——拥护邦联主义。因此，天主教徒能被他们的教会动员起来反对中央集权论的路德派旧政权和那些主张中央集权的不信上帝的无产阶级。北部路德教派的农民在抑制工业工人方面没有特殊兴趣，但却支持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然而，南部天主教区的农村却不这样。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有利于他们的决定(Hussain, 1981)。它长期忽视农村民众，认为他们注定要走向英国式的衰落。然而，1890年，它最终开展了一场农村的选举运动。在信教的黑森和其城市地盘中的农业腹地获得了某些成功，在梅克伦堡州河东普鲁士部分地区的劳工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在这些地区，它的主张中央集权的社会主

义被路德派教徒接受。但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信奉土地社会化的理论的阻碍，并且它的城市选民被动员起来部分地反对农业保护和津贴，它对农民没有多大吸引力。因为大部分劳工是小土地持有者，他们希望保护而不是废除私有财产。农民不理解社会民主的思想，从他们身上寻求部门性让步是徒劳的。这项运动大体上是失败了(Eley, 1980, pp.23—24，几乎没有强调它的任何成功)。社会民主党本可以做得很好，正如它的南方姐妹政党所证明的：巴伐利亚党抛弃社会化，而给农民提供抵押保护，这些农民适时地让社会民主党议员返回州议会。

作为南方人和天主教徒，南部的农民支持邦联主义。天主教中央党带头提出了南部要求。因为该党是由城市贵族领导的，所以它对农民的不满不会作出反应。在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那时它支持自由的卡普里维政府减少关税，农民投票者抛弃了它，而在威斯特伐利亚、莱茵河区和巴伐利亚组建了持不同政见的农协，它反对交权和军国主义，支持累进税制和土地保护制度。这是一个左派和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盟的开端。但是警觉的中央党也形成了它自己的天主教农民联盟，调整了它的关税态度，倡导土地信贷计划。这个联盟现在衰落了(Faw, 1978)。中央党通过将自身转变为一个部分的农民政党，以及寻求平息部门性不满，重新维护了它的统治。它与北方保守主义者联盟，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保护农民。通过中央党对政府的内部影响，南部农民得到了许多想要得到的利益。

在北方，得不到农民的拥护的卡普里维政府，依靠民族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党分子。他们的农民派别现在衰落了。由大农场主支配的保守党加入其中，它拥护保护政策，并且劝诱农民加入他们的农民联盟。在新教区，保守主义者势力较弱，农民转而倾向右派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反城市、反垄断的言论变为好战的路德派教徒、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者的言论。在黑森和普鲁士的农村，犹太人容易成为债券民粹主义者的目标，正是在这些地区，社会民主党人确立了初步的地位。后来，纳粹党便在这些地区掌了权(Eley, 1980; Farr, 1986)。

因而，德国农民比大部分国家的农民更偏离社会主义者。他们可能采取天主教中央党温和的“基督社会”的态度，或者是被大农场主保守主义者控制的部门性分割主义，或者是右派的阶级民粹主义。德国农民中不满的人渐渐趋向右派，这是政府的两个特征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特征引起的。首先，独裁的君主政体有助于自上而下部分分而治之的农村政治。如果贵族党派对农村的不满有所反应——保守主义者和天主教中央党就是这样做的，但进步党分子和民族自由主义派反之，他们在政体里的影响使他们便于排斥民众的党派，而且他们能使农村不满者屈从右派。其次，如果贵族党派没有作出反应，那么受到民族问题、宗教和地区的影响，自发的农民运动就会出现。北部路德派教徒拥护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化，一些有专支持国家民粹主义，有的左转为主张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在路德派的德国，极端右派和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天主教南部联盟包含着激进的农民运动的更大潜力。然而，不信神的主张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政党不是农民运动的最好代表，于是，中央党得以重新恢复了控制。第三，社会民主党人的生产力论马克思主义由于忽视了农场主对信贷阶级的不满，而进一步促进了导向右派的趋势。这些都是占优势的政治形势。

奥地利的国土主要是农业耕地，为大庄园主所控制，由无地劳工和小土地持有者耕作。极度的地主剥削、高利贷和某些省份的落后导致极端贫困和债务，向新大陆的大批移民几乎没有缓解这些问题。农民生产和信贷阶级以及部门斗争可能是激烈的——除非受到地主分割统治的压制——但关于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他们由奥匈帝国三个鲜明的特点构成(参阅第十章)。

第一，哈布斯堡王朝的人不仅是君主，而且是世袭君主，即使他们的权力有限，他们也相当专制。尽管他们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来抵制所有的民主，然后，改变策略，企图利用有限的政党民主在阶级和地区民族之间实现分而治之。1896 年和 1907 年，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作过试

验后，政府允许成年男性选民参加主权受限的议会(在匈牙利实施滞后)。在此以前，城市自由党派和农民保守派对被剥夺选举权的农民和无地劳工几乎不感兴趣。突然给予公民权产生了群众性的农民和工人的党派，这些新党派还没有受现存党派的分割控制。他们的目标是政党民主，即议会主权。不像德国，而像斯堪的纳维亚，共同的政治反而暗地里团结了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工人和农民。

第二，由于没有议会组织教会非正式地代表了大多数外省他们现在倡导政治党派。天主教交汇在某些外省市准国家的教会，但最终他是超越国界的，而不是仅仅属于一个国家的。在其他外省，它表达了当地不满者的心声。少数新教教会更经常这么做。农民运动是反教权的或是教权主义的取决于地方教会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于宗教几乎从不冷漠。

第三，多数民主人士支持邦联主义(符合俄国的第三种形式)，除了在奥地利和德国领土的核心地区(这符合第二种形式)。后来，他们成了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者。这迫使君主政府更加依赖奥地利和德国人，1867 年以后，与其他民族的平民相妥协。因而，地主与劳工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经常也是“地区和民族”的，因为剥削者经常是德国人，或是受保护的匈牙利人或犹太人(在国家行政机构和银行确立了他们的地位)，然而，被剥削者通常是当地的民族。经济上的不满和民族主义相互加剧了。奥地利和德国的民主党派仍旧是中央集权者，而非德国人支持邦联主义，而后是民族自治。考虑到匈牙利人在东南部作为初级剥削者的地位，他们对此的心理是矛盾的。

因此，农村政治在地区之间变化巨大。在奥地利、日耳曼的奥地利南部，所有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围绕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世俗化，阶级和部门的划分使他们两极分化。1903 年，保守反犹太的基督社会党、天主教和人数占优势的农民，在享有特权等级的议会里占了 2/3 的多数，他们大加追求农民利益和保障债务延期偿付权，抵押限制宅地保护法和农业合作农场。他们的主要对手是社会党。该党聚集了

一些无地劳工，但实际上没有农民的选票。犹如他们德国的对应者一样，社会党人在农业计划和无用的生产论及主张中央集权的马克思主义交易方面(Lewis, 1978)影响。

波希米亚是另一个主要工业化地区，捷克工人阶级，与它的奥地利和德国同志一样，起初拥护社会党和主张中央集权的马克思主义，但随着捷克民族主义传播开来，捷克(像巴伐利亚的)社会党人就变得矛盾起来。许多庄园主是德国人，大多数天主教会卷入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它使民族主义变成反教权的。所有这些都减弱了农村对社会主义的抵制。就是在欧洲的这个地区，马克思主义党最成功地吸引了无地劳工。确实在他们当中，马克思主义党的主要竞争者是民族的社会党，结合了其各称所示的思想意识(不是希特勒那帮人！)。大部分农民投向中右的农民政党，它支持捷克自治和扩大民主，但它反社会党人，对无地劳工表现冷漠(Pech, 1978)。

在比较落后的斯洛文尼亚，天主教会领导民族异己分子。大部分农民支持教会积极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党，它致力于民主改革和农民经济利益。改奉社会主义的人很少，主要在民族主义影响很少的种族混杂地区。波兰的加里西亚也是落后的乡村地区，历史上有农民起义和大量省份自治权允许波兰贵族和富裕农民剥削鲁赛尼亚的劳工和小土地持有者。波兰的民族起义因此有所抑制，天主教会立场中立，而阶级控制着政治。天主教和主张互助的社会主义各党派为农民的投票与社会党争夺无地劳工。

匈牙利在君主制度中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大庄园的比例最高，1867 年后，强硬的匈牙利就贵族对帝国的控制制度化。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因此有所抑制，在匈牙利本国贵族的控制封杀了农民和工人中的阶级组织(Edclie, 1967; Macartney, 1969, pp.687—734; Hanak, 1975)，然而，萧条引起巨大灾难，农民起义在 1894 年和 1897 年两度爆发。幼稚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其中一些活动，但当激进的民粹主义的小农政党开始与地主党派竞争时，它更衰

弱了。

但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农村不满者由“地区和民族的”转而反对马扎尔人的统治。首先是新教徒，然后是天主教会领导了斯洛伐克的民族抵制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直到一战后才有些影响，民族和宗教的政治忽视了农民和无地的不满者。克罗地亚的农民反应几乎相反。其他的贵族——一个软弱的贵族资产阶级天主教统治集团——是马扎尔人最高领主的委任统治着。由于贵族们的妥协，在被排斥的大多数农民中产生了强有力的持异议的民族主义，这给农民以荣耀——他们是激进的，反教士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在所有的巴尔干省和国家，贵族和绅士被土耳其统治者大肆杀戮，因而他们的力量很弱。农民和小土地持有者控制着激进的民粹主义运动。

因此，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阶级生产和信贷和部门利益很少直接导致政治组织的产生。民族问题处于半公开状态的一场关于分散政党民主的讨论——影响到多种结局的产生。捷克民族不满者加强了生产阶级的斗争，形成了一个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的联盟。在巴尔干各国，信贷阶级和民族斗争相互加强，在农民中产生了激进的阶级的民粹主义。在奥地利和日耳曼人中，工业主义是先进的，而民族主义却独一无二地拥护中央集权制，这在工人之间团结了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但是像他们的德国同志一样，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落入城市工业独立小团体的陷阱之中，在别处结果更保守。除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外，民族自治的要求消弱了贵族和牧师的保守主义，但农民由于民族主义基本上偏离了激进阶级的民粹主义。城市资本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合到一块儿，正像中间派的和右派民粹主义发展。后来，与反犹太主义联合导致了一些严重后果。

软弱的君主制度受到挑战：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

在我所涉及的范围内，包括了丹麦、挪威和瑞典，因为在农民和城市社会主义者之间，他们结成了最成功的二十世纪联盟。这三个国家

经济上不同但政治上相是：很多农民被推到左派那边，首先与自由的资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而后又与工人结盟。 三国都有相对软弱的拥有土地的贵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样使许多农村摆脱了强大的统治。较富裕的农民一般拥有共同的政治权利，这证明在整个 19 世纪，这些权力也可以扩大到教贫穷的农民身上。 1905 年，在挪威实现独立后，所有这三个国家都是相当中央集权的在种族和宗教上是相似的。 他们共同的命运看起来都是类似于国家政体和政治联盟的产物，而不是他们经济的产物。 像城市政治一样，农村政治也具体化为政党。

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先把农民和城市自由分子连接在一块，后与工人联合。 第一，大部分小农场主是自由商人，按十九世纪的看法，他们是“自由派”。 在丹麦，这是因为畜牧和奶制品业在世界市场保持了成功，丹麦的城市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也赞成给佃农合法自由，这些佃农是一个重要的半工、半农团体。 挪威农民支持自由贸易，因为这意味着内部自由贸易和摆脱统治他们一直到 1905 年的外国所征的税收。 在瑞典不论是大农场主，还是小农场主，更多的是保护贸易主义者。 与欧洲大部分国家相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只有较少的地区冲突把农民从城市产业工人中分离出来，瑞典和丹麦的(还有法国)工业化也是有特点的，工业明显分散在整个农村，有助于促进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将它集中在城市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

第二，农民在斗争中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为争取政治公民权利，而反对相对脆弱的土地贵族和君主制度。 瑞典自由派不成比例地来自自由教会和禁酒运动。 他们与农民的联系尤其来自他们对民族教育方案的资助。 随着劳工的崛起，许多日益扩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趋向右派，因为他们开始反对民主和扩散。 剩下的自由派和小农场主倒向了工人社会主义党的民主联盟。 因为这些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和路德教的、社会主义者最初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们通过削弱马克思的生产力论正统派来对城市自由主义和农民激进主义作出反应。 (丹麦社会主义者从来都是一无所为)例

如，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暂缓了他们从德国社会民主人那里得到的目的在于取消任何关于希望发生暴力革命的建议。

因此形成了三种政党政治：城市和农村的资产阶级以及许多中产阶级组成的保守党，农民和少数中产阶级组成的自由激进党，还有工人(手工的而后为白领)变成了社会民主人。介于后两者的实用主义联盟在第一次选举中获得成功，从而导致了现代文明中那种独特而成功的左派形式，即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体制(Munch, 1954, Semmingsen, 1954; Holmsen, 1956; Kuuse, 1971; Osterud, 1971; Kuhnle, 1975; Thomas, 1977; Castles, 1978; Stephens, 1979, pp.129—139; Duncan, 1982; Esping-Andersen, 1985; and Rueschemeyer, Stephers, and Stephens, 1992; ch.4)。[2]农村各阶级本身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的部门利益、信贷阶级利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公民政治利益引导他们左倾。

迄今为止，农民政治集中于经济威胁，这是对农民所有权和在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上的农民激进主义的威胁。俄国是一个特例，因为一开始条件就不具备。俄国也是唯一的一个培育了革命农民的国家。因而将俄国的政治和经济融合在一起的要求就具有明显的特点。

正如第十八章所指出的，俄国是一个专利的君主国家，直到 1905 年它才产生了政党民主。此后，仅仅是稍微提了提，现在这个政府主要是遇到城市——工业代表和地区——民族代表运动的反对。看起来国家是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关于俄罗斯帝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我们缺乏证据，而且，也许来自少数民族的农民，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分权者一样，比这里所提到的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当中，但贵族看起来是通过地区的自地方自治机构来控制农民，这是建于 1864 年的地方政府部门，而在农村一级，历史上信奉平等主义的公社(米尔)仍然发挥作用。像法国那样，革命前，大部分贵族已不在农村。

1862 年解放农奴并没给农民带来自治，他们被以别的方式束缚在土地上，这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俄国农民，见 Pavlousky, 1930; Robinson, 1932; Volin, 1960; Wolf, 1969; Shanin, 1972, 1985; Haimson, 1979;

and Skocpd, 1979)。不像奥匈帝国，解放农奴产生了为数不多的商业大庄园。农业萧条和物价下跌，迫使农民在市场上出卖产品，还迫使市场通过出口来换取进口的工业品和外国贷款。经济压力耗尽了牛群，由于土地未被休耕，传统的三圃制造成土地贫瘠(通常质量低下)。在富农和大多数贫农之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拥有的肥沃土地太少，以致不能养活他们自己，也不能为市场生产剩余产品及缴纳国家的形形色色苛捐杂税，政体现代化计划看来只是加重他们的痛苦并使他们参加政治活动。

1905年战争的失败，使国家分崩离析，各地农民抓住时机，机会发动起义。起义主要直接反对地主和当地政府的行政机构。1905年，大部分农村的罢工。抢夺财产和没收土地，是直接反对土地所有者，尤其在中央黑土地区和几个驱逐了农民的大资本家庄园，一贯的支持大多来自中层农民和在城市工作受过革命思想影响的年轻农民(Perrrie, 1972, p.127; Wolf, 1979)。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废除或减少地租、税收和劳务。暴力很少直接反对富农。富农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劳收；而贵族则不这样。农民“那些在土地上劳动的人们有权利得到它的思想”。掩饰了宗派活动，这是农民觉悟的提高；自来外界的政治鼓励很少成功,而突袭经常由“米尔”组织(Waling, 1962; Perrie, 1972)。

1905年革命遭到了镇压，但惊恐不安的政府建立了一个权力受限的杜马。政府和贵族土地所有者现在觉察到了农业的危险状况。政府废除了赎金，地主减少了地租并继续出售庄园土地。当农民在杜马里和通过暴动继续提出要求时，政府改变了方针。它废除了大部分的政治改革，取消了杜马中农民的代表席位，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企图在富裕农民之中发展资本主义农业。

斯托雷平劝诱农民从村社里分割他们的公地，公社被分成几部分，富农能利用这个机会，而最贫穷的农民也能分割出卖他们的小块土地，用这些钱迁到城镇或国外。中农大部分反对分割土地，希望公社保持完整。这些政府内部产生的冲突意味着分裂，几乎不能将所拥有的土

地联结成私有大农场。个体农民的条状地田公社保留完整，这仍是共同行动的强大力量之派。中农支持征用贵族和绅士们的土地，也许是它的国有化，但他们不想按照资本主义的或布尔什维克的集体主义精神模式来重新组织。当地的公社仍是他们的理想。政府对它的打击所激发的怒火于 1917 年爆发出来。

由于深受农民政治的影响，临时杜马席位被取消了(Haimson, 1979; Vinogradoff, 1979)。现在，农民被卷入与左派政党的接触。由于都一起被排除在公民权利之外，使平民阶级团结起来，转向了左派，这种情况我们别的国家也能看到。他们正统的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论阻碍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发展，但社会革命党强调更多的是韦伯的关于收入分配和信贷的阶级观点，而且他们的农民联盟在 1917 年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像在 1905 年那样，政府由于战败和行政机构分崩离析而陷入崩溃，像 1905 年一样，农民起义是革命进程的中心；像 1905 年一样，中农起了领导作用，像 1905 年一样，农民骚乱的出发点是要求土地。

因而人们必须这样理解俄国的农民运动和工人一样，实际上他们被完全排斥全公民权利之外，而且政府干预当地的经济，大部分俄国农民不是独立的业主，他们也不想成为所有者。他们要求土地和共同耕作，这并非基于由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安全感，正如沃尔夫和詹金斯所坚持认为的，而是出于他们对专利资本主义的负面经历，认为对他们不会产生任何益处。和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的是，在俄国，几乎没有成功的资本主义农业，甚至大庄园也是如此。在 1917 年前后，只有俄国农民抵制现代化，仅仅是要求土地，拒绝割断与公社的纽带联系。俄国农民并不希望参与政治，但是他们为政府所迫不得不通过革命来自卫。

结论

我已经确认了农村政治的复杂性。问题不在于大庄园主，他们的

政治无一例外是保守的，也不在于无地劳工，他们的政治演变仅仅来自于他们从当地局部统治解放自己的能力。农民业主中许多是小土地所有者(dwarfholders)，为理论提出了主要问题，正如他们为当代政治所做的那样。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到他们自己是一个共同体，通过有效组织来确保他们的利益——与马克思的“一麻袋土豆”理论完全相反。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既不保守(像 Marx、Moore、Paige 和 Stinchcombe 所认为的)也不革命(像 Wolf、Brustein 和 Judt 所认为的)。他们的经济要求大多含着温和的农村改革，这些改革，将韦伯的信贷阶级和局部利益混合在一起。马克思的生产阶级仅在租佃和以谷交租者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出现，并且他们有组织空间。当农业商业化时债权人——债务人阶级冲突便增多，由于部门分裂进一步加剧；因为大部分债权人属于城市资产阶级。这里他们的敌人主要是资产阶级。

但是，农民一般是改革者；他们追求具体的政府干预来反对无管制的为大资本所控制的国际市场。俄国之外的农民有相似的要求：通常要求高关税，总是要减少信贷、运输和工业制品的费用，平等地占有土地和要求法律保护小领主。除此之外，农民像大部分的主张平均土权的人一样，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央政权并希望回避他们。只有在教育领域有的时候，农业工人和农民才欢迎日益文明的十九世纪末的政府。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改革者的社会主义，尽管它确实追求有限国家对再分配目标的干预。农民共同的阶级身份和利益，甚至比工人的更令人莫衷一是。

因而从右派到左派，改革运动跨越了大部分政治范围。如大多数作者所主张的差异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当然，经济差别的确重要，尤其是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所指出的那样，但与政治具体的关系更大。农民政治首先发源于他们参与和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的议会代表的斗争全国性斗争。这些斗争就使他们卷入了城市工业政治的两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有地的旧政体保守主义的斗争，以后是工人对抗资本家。他们也卷入了关于国家如何民族化和集权化的

斗争。 因为农民在地区上是分散的他们通常支持分权的地区运动。

教会在农民政治中的重要性主要不是由农民巨大的宗教狂热引起的，尽管宗教狂热分子在许多农民运动中站在前列。 更确切地说，它的根基在于在相对分散的联邦国家里一些教会和农村人口的共同利益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十八章)，在工人政治中也有这种情况，宗教和地区(最终在奥地利的“民族”)的农民政治是交合在一起的，政治上，构建于产生于全球农业商业化的农民的身份和利益。 关于国家公民权范围的扩大，也经常使他们感到自相矛盾，这一时期，它的重点放在国家提供或调整民众的教育上。

农民很少形成政治多数派在农民占多数的地方，他们的权力被有限的特许权和议会主权限制所弱化。 他们需要四个主要阶级部门联盟中的一个或更多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旧政体的保守派资本家或工人。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他们与所有四个部门都结成联盟：在北德和旧政体的保守派，而后与资本家；在瑞典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而后与工人；这四个联盟在法国都出现过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有许多正在变化的联盟。农民看起来与任何人都联合——这是第三个原因，除了他们的人数和实用的中庸，这就是构成了这整个时代关键左右不定的投票的原因。

为什么农民选择或偏离一个联盟而不是另一个？ 信贷阶级的部门特性和反对方的定义是易变的。 反对方和联盟可能选择他们自己。 工人是一个问题众生的联盟。 尽管农民和工人经常把公司资本家当作敌人，他们的要求很少统一，除了要求较低的累进税和较少的征兵。 有时候，农民与工人的要求互相冲突，如在要求关税，降低土地税和农业产品的高物价方面。 更常见的是他们仅仅是意见不一致。 右派和左派的城市工人运动经常忘记有他们自己要处理的事情。 据称，保守派错误地假定指望用传统方式对农民实行分割统论，但是农民业主几乎不接受他们得不到好处的统治，左派政党通常是些更糟糕的违犯者。 与实际出现的相比，本该有更多的农民左派主义，更多的工农联盟。 左派自身实质上应受指责，受城市产业工人聚居区经验的蒙蔽，它将重点放

在工会互助合作的需求和争论生产者的社会主义。

最糟糕的冒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党。 他们的生产力主义在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也受到批评；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有实际后果。 马克思主义党对社会发展本身持有一种以制造业为中心的观点。 他们认为农业正在垮掉，而农民将要被无产阶级化——这几乎不是个农民热心的消息。 即使实用理论家如考茨基和列宁也不能把自己从这种观点中解放出来。 因为制造业生产的权威性和他们自己被排斥在独裁主义国家的公民权利之外，马克思主义党发展了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社会主义。 这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几乎很小。 大部分农民支持分权的邦联国家，在 20 世纪晚期之前很久，在东方和西方，工人拒绝中央集权的经济统治，而农民也不理睬它。

这里，工人运动正在犯它最致命的错误。 工人阶级在任何地方都是非武装的，并且，在除英国之外的每个国家都是少数派。 没有农民联盟，它不能对付其阶级敌人的挑战。 然而生产者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思想，体系阻碍的就是联盟。 工人在毁掉实现革命变革的机会。 没有农民，在另一个五十年它的进步将很小——按英国的方式，直到最终农民数量的解减少，结果被大量忽视了，而且，可能太晚了。在 20 世纪，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所留下的是列宁和斯大林伟大的令人不快的机会主义。 他们领导农民和农民起义，反对中央集权的独裁政府和军国主义，使他们服从生产者所主张的，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甚至有高度独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然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 在斯堪的纳维亚、捷克和法国部分地区，人们追求和建立工农联盟。 这有特殊的环境因素，第一，他们的国家在早期就变成相对民族的，这儿没有严重的分权化和农村人口中的邦联运动(在捷克地区农村人口指低于省和国家的饮食标准的人)。 第二，在瑞典、丹麦和法国，农村里也发生了工业化。 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之间有较少分离；实际上，在家庭内部，他们互相渗透。 在瑞典和丹麦，这鼓励了社会公民权利观点的传播，这种

观念由非马克思的社会党人支持；在法国，它鼓励思想体系的宗派主义。 在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两种分离的政治政党运动，一个是工人的，另一个是农民的。 在别处，这个结果是可能的。 在大部分国家，人们可以听到并热烈讨论生产力论和主张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论。但到最后，它们消失了，它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正如一些旧政府犯了致命的错误而灭亡，而别的政府可以学习和借鉴，工人运动也是一样。 当革命者犯了错误，他们通常得付出生命。

因而，右派的错误，尤其是左派的错误，其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农民没有找到现存的合意的政党，他们就形成自己的政党，如美国人民党(不成功的)和各种奥匈农民组织(某些很成功)，此外，还有符合主流的党派，如德国的天主教中央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最后的名称)，与之可比的法国各党派，它们认识到了农民支持的重要性(尤其当选举权扩大时)，因此修改他们的党纲来赢得选举成功。

经济问题几乎不决定农民政治，尽管它主要推动了政治行动。 恰恰相反，国家具体化解释了农村斗争的主要特色，其中农民追求他们的利益，没有认为政治简单地决定阶级斗争，而是从某种最终意义上权衡经济对政治的变化因素。 相反，结果由(1)和(2)决定，(1)是阶级和部门利益的潜在相反性，受资本主义基本相似的全球商业化的影响；(2)是在代议制和全国性问题上的相似性与政治具体化相互作用，用根本不同的方式，把农民与国家政体和政党联盟联系起来。 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后果，与我的结论极其相似。

注 释：

[1] 本章的研究是我和 Anne Kane 一同进行的，我非常感谢她。 关于我们研究的完整的文章已经出版了(见 Kane 和 Mann, 1992)。

[2] 与丹麦和瑞典相比，这些总结不怎么适合挪威。 挪威的经济更具有部门性变化，它的人民讲的语言多种多样，并且这鼓励了地区和宗教的重要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只有在 1935 年，社会民主党人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与农民联合。

参考文献

Anderson, P.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Bairoch, P., et al. 1968.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Its Structure*. Brussels: Editions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Libre.

Barral, P.1968. *Les Agrariens Francais de Méline à Pisan*.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Berger, S.1972. *Peasants Against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lackbourn, D. 1977. The Mittelstand in German society and politics, 1871—1914. *Social History*, no. 4.

1984.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871—1914.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14.

Bois, P.1960. *Paysans de l'Ouest*. Le Mans: Vilaire.

Boyer, J.W. 1981.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enner, R.1976.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no. 70.

Bruchey, S. 1965.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 New York: Harper & Row.

Brustein, W. 1988.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litical Regionalism: France, 1849—198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ck, S. 1913. *The Granger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bank, G. 1976. *When Farmers Voted Red*.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Burnham, W. 1974.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litics of heterogeneity. In *Electoral Behavior: A Comparative Handbook*, ed. R. Rose. New York: Free Press.

Castles, F. 1978. *The Social Democratic Image of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onze, W. 1969. The effects of nineteenth-century liberal agrarian reforms on social structure in central Europe. In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789—1914*. ed. Crouzet, Chaloner, and Stern. London: Arnold.

Danhof, C. 1969. *Change in Agriculture: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82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vring, F. 1965. *Land and Labor i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Hague: Nijhoff.

Duncan, S. 1982. Class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creation of the rural and urban questions in Sweden. *Research Papers in Geography*(University of Sussex), no. 12.

Dyson, L. 1986. *Farmers' Organization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Eddie, S. 1967.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leadership in Hungary, 1867—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

Eley, G. 1980.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Change After Bismarc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spingn-Andersen, G. 1985.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rr, I. 1978. Populism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easant leagues in Bavaria in the 1890s. I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ed. Richard J.Evans.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easant protest in the empire-the Bavarian example. In *Peasants and Lords in Modern Germany: Recent Studies in Agricultural History*, ed. R.Moeller. Boston: Allen & Unwin.

Fine, N. 1928. *Labor and Farmer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8—1928*. New York: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Fischer, F.W., et al. 1982.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Vol. 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 Munich: Beck.

Garrier, G. 1973. *Paysans du Beaujolais et du Lyonnais, 1800—1970*.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Gerschenkron, A. 1943.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odwyn, L. 1976. *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ntham, G. 1975. Scale and organization in French farming, 1840—1880. In European Peasants and Their Markets, ed. E.L.Jones and W.N.Park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een, J. 1976. Grass Roots Social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aggard, H.R. 1971. Rural Denmark and Its Lessons. London: Longman Group.

Haimson, L. 1979. Introduction: the Russian landed nobility and the system of the third of June, and Conclusion: observa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the Russian countryside(1905—1914). In The Politics of Rural Russia, ed. L.Haim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nak, P. 1975. Economics, society, and sociopolitical thought in Hungary during the age of capitalism.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9.

Hicks, J. 1931. The Populist Revo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obsbawm, E. 1989.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Hohorst, V.G., et al. 1975.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Vol. 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Munich: Beck.

Holmsen, A. 1956. Landowners and tenants in Norwa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

Hovde, B. 1943.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1720—1865. Boston: Chapman & Grimes.

Hussain, A. 1981.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Vol. 1: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1907 . London: Macmillan.

Jenkins, J.C. 1986. Why do peasants rebel? structural and historical theories of modern peasant rebell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Jonasson, O.G. 1938. Agricultural Atlas of Sweden. Stockholm: Lantbrukssaellskapets.

Judt, T. 1979. 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ne, A., and M.Mann. 1992. A theory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grarian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6.

Kausel, A. 1979. Osterreichs Volkseinkommen 1830 bis 1913. In Geschichte und Ergebrisse der Zentralen Amtlichen Statistik in Osterreich 1829—1979. Beitrage zur Osterreichischen Statistik 550.

Kautsky, K. 1988. The Agrarian Question. London: Zwan.(First published 1899.)

Kuhnle. S. 1975. Pattern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Nordic Countries. London: Sage.

Kuuse. J. 1971. Mechanisation, commercialisation and the protectionist movement in Swedish agriculture, 1860—1910.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

Le Goff, T.J.A., and D.M.G.Sutherland. 1983. The social origins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western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no. 99.

Lewis, G. 1978. The peasantry, rural change and conservative agrarianism:

Lower Austr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81.

Linz, J. 1976. Patterns of land tenure, division of labor, and voting behavior i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8.

Loubère, L.A. 1974. Radicalism in Mediterranean France, 1848—191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yashchenko, P. 1949.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o the 1917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Macartney, C.A. 1969. The Hap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alefakis, E. 1970. 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rgadant, T.W. 1979.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and F.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edvedev, Z. 1987. Soviet Agriculture. New York: Norton.

Merriman, J. 1979. Incident at the statue of the Virgin Mary: the conflict of the old and the new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moges. In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ed. J.Merrima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1897. Statistique agricole de la France; résultats généraux de l'enquête decennale de 1892 . Paris.

Moore, B., Jr. 197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ouzelis, N. 1986. *Politics in the Semi-Periphery: Early Parliamentarianism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alkans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unch, P. 1954.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Norway: a study in class and cultur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

Newby, H. 1977. *The Deferential Worker*. London: Lane.

Osterud, O. 1971. *Agrarian Structure and Peasant Politics in Scandinav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ural Response to Economic Change*.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Paige, J. 1976. *Agr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avlovsky, G. 1930. *Agricultural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ech, S. 1978. Political parties in Eastern Europe, 1848—1939. *East Central Europe* 5.

Perkins, J.A. 1981.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Germany, 1850—1914.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0.

Perrie, M. 1972. Th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of 1905—1907: its social composition and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Past and Present*, no. 57.

Raeff, M. 1966.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bil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Robinson, G. 1932.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kkan, S. 1970. *Cities, Elections, Partie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Rosen, E. 1978. Socialism in Oklahoma: a theoretical overview. *Politics and Society* 8.

Rothstein, M. 1988. Farmer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s: numbers, gains, and losses.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Rueschemeyer, D., E. Stephens, and J.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ndgruber, R. 1978. *Osterreichische Agrärstatistik, 1750—1918*. Munich: Oldenbourg.

See, H. 1929. *Equisse d'une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aris: Alcan.

Semmingsen, I. 1954. The dissolution of estate society in Norwa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

Shanin, T. 1972. *The Awkward Cla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Russia as a "Developing Society": The Roots of Otherness—Russia's Turn of the Century*, Vol. I. London: Macmillan.

Sked, A. 1989.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psburg Empire, 1815—1918*. London: Arnold.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J.H. 1975. Work routin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a French village: Cruz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

Sorokin, P. A., et al. 1930. *A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ephens, J. 1979.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Stinchcombe, A.L. 1961.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and rural class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7.

Thomas, A. 1977. Social democracy in Denmark. In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ed. W.Paterson and A.Thomas. London: Croom Helm.

Tilly, C. 1967. *The Vendée*, 3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1979. Did the cake of custom break? In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ed. J.Merrima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Tomasevich, J. 1955. *Peasants, Politic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Yugoslavi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U.S.Census Bureau. 1910. *U. S. Census, 1910*.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inogradoff, E. 1979. The Russian peasantry and the elections to the Fourth State Duma. In

The Politics of Rural Russia, ed. L.Haim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Volin, L.1960. The Russian peasant: from emancipation to kolkhoz.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 ed. C.Blac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kin, J.1962.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 New York: Praeger.

Weber, E. 1978.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is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f, E.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第二十章

理论总结：阶级、国家、民族及社会权力的来源

本卷有两个总结性章节。这是第一个，从第七章遗留的地方开始，概括了现代两个主要权力运作者——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在此期间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因为所涉及到的五个国家(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以及美国)各不相同，我必须在一般概括和肯定特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但是因为历史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得出了它自己对漫长的19世纪的结论，所以最后一章将分析那次战争的根源，举例说明该卷书的理论基础并证明其合理性。

正如我们所知，国家和阶级、民族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我将不再概述我关于国家的研究成果，相反，我愿让读者参看第十四章的结论。在这里我只重复一个基本观点：由于国家通过18世纪后期军事扩张和19世纪后期工业资本主义扩张而变得更具社会性，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给西方社会和阶级"赋予了国籍"。

阶级和国家

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西方正逐渐实现工业化。而英国和比利时早就完成工业化了，大多数国家的工农业之间是均衡平稳的，农业也彻底商业化了。资本主义已经极大地加速了人类集体权力，这些

权力主要是分散性的，它们席卷了这个多重权力运作者的文明社会。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突进提高了各个阶级和男女两性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人们能够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并使寿命延长近一倍。尽管分配不均，但是利益分布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大多数权力运作者都赞同权威性权力机构应该支持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拓展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范围。资本主义和国家官僚主义化同样也扩散到整个西方。

资本主义也改造了各国的权力分配关系，造就了历史上规模空前广泛的政治阶级。首先兴起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随后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所有这些非统治性阶级都是随着集体组织权威性权力的扩大而兴起的。所有这些阶级都认为(尽管利益不同)他们受统治阶级和政治体制的剥削，并且所有人都共同发动了寻找选择办法的抗议。这对马克思和其后的大多数追随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它对统治阶级和统治政权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马克思未能预料到权力分配冲突的后果，这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 因为资本主义主要是分散性的权力组织，所以它的权威性阶级组织从一兴起就带有基本的两难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是异质的。如果没有社会权力其他来源的介入，它们和统治阶级及统治政权的冲突会是局部、温和和排他的。在这个时期的前半期，他们之间的许多妥协甚至合并，都没有太多的戏剧性。农业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发展的异质性，造就了三个相互竞争的集体组织：即“生产阶级”、“信贷阶级”和一个经济部门(与大土地农场主结成部门联盟，它们的对手通常在另两个方面)。无产阶级也造就了三个集体组织：阶级、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多种集体组织，在这些集体组织中尽管生来就带有马克思所预料的辩证冲突，但是毫无疑问阶级决不会占上风。

2. 这三种竞争的经济组织相互争夺的结果主要由更具权威性的统治阶级和统治政权的战略或趋势所决定。毕竟，它们控制着现有的各个

权威性国家和武装力量。假如它们把精力集中在新出现的阶级对抗上(正如我们所知，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大多数统治阶级和政权就会制定一个有效的对策。这是很常见的。我曾经指出，哪里的阶级斗争相对明朗——也就是说，哪里能产生马克思所预料的能导致革命的那类激烈的阶级对抗——那么，那里的统治阶级和统治体制就能最有效地利用更大的制度化的权力去镇压和瓦解它们的敌人。我认为，革命只发生在那些统治阶级及政权被多样化的、非辩证的但相互交织的斗争所迷惑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对付激烈劳资冲突最有效的统治政策是一方面通过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对一些工人和农民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对剩下的工人和农民进行镇压。用这种手段它们就能瓦解革命或激进改革所必需的阶级团结。这三种工人组织形式的同时出现削弱了整个阶级，因为它要求对工人的领导权，而其他两个组织则没有要求。

3. 继而，统治阶级及政权的政策或趋势以及工人阶级自身主要由其他三个社会权力来源决定。我请读者参阅第七章，我对截止 19 世纪 30 年代或 40 年代的经济斗争的总结。其中我强调了分散性意识形态，特别强调了权威性军事权力，随后是政治权力的来源。第十七—十九章对后来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作了更具政治色彩的解释。因此，在 1900 年前后，遍布西方的劳资冲突后果由(1)和(2)的相互作用决定：(1)基本相似的资本主义全球扩散导致了各种集体组织和利益关系的普遍混淆；(2)各种权威性国家的成形，即意识形态、家长制、军事，尤其重要的则是它们的两个公民定型，即“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

4. 这种相互作用不像台球那样的独立个体之间的碰撞。阶级、部门、地区都和各种权威性政治形式“非辩证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样有助于彼此相互塑造。运作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不为其所知的情况下被行动的意外后果改变了。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运作者们易于犯“影响全局的错误”。第六章证明 1789 年法国政府是如何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其敌人正在兴起和发展的本质，而犯了毁灭性的错误。第十五章阐明了相反的情况。非同寻常的是，统治国家的统治阶级“辩证

地”面临着单一的、完全同质的阶级敌人——宪章运动。在与敌人面对面的对抗时，他们没犯错误，坚决镇压激进分子，用更强大的市场力量把工人逼向地方主义阵营。最后几章揭示了在马克思主义或路德主义影响下极富成效主张中央集权的劳工运动所犯的更持久的世界历史错误。他们尤其不能理解农民斗争所特有的复杂性，从而把潜在的农民联盟变成了敌人。

这四个决定因素彼此之间不只是表面的。它们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相互塑造着彼此的形式。各种政权战略动向、议会和全国公民的斗争、意外后果、各种错误，它们的关系都源于它们根据背景加强阶级、地方或部门特性的方式。阶级、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继续争夺对工人和农民精神的控制权。从它们和生产方式的关系来看，十分矛盾地把这一时期工农业中的斗争联在一起，可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当然，长期存在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确实削弱了阶级运动所需的广泛团结的基础。在一个没有国家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与资本相比这可能会永久地削弱劳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将会防止革命的甚至激进改良主义的后果。但是，资本主义栖息于一个国家林立的世界中。在这个时期，权威的议会定型和民族政治的定型往往是无意间促进了阶级组织、地方组织和部门组织发展的矛盾趋势，或使之倒退，尤其当它们冲击工农联盟时。阶级不是纯经济性的；国家也不是纯政治性的。

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都估计过高。它们的分散性权力超过了权威性权力，对于后者它们更依赖于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并被其塑造。尽管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二者极大地加强了集体权力，但是个别权力——社会分层——却改变得不太多。现代阶级关系受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农业商业化刺激而兴起，但是它们沿着内在的矛盾运行轨迹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后果都由很早以前就被制度化了的权威性政治成形所决定。

为什么国家是各式各样的？查尔斯·梯利提醒我们欧洲国家源于

中世纪的各种形态——领地君主制、松散的国家—领主附庸人际关系网络、征服的国家、城市国家、基督教城市国家、城市联盟、市镇等等。虽然梯利列了一张近代早期国家形式衰落表，因为领土国家逐渐稳定下来，并开始占上风，多样性依然存在，崇信基督教的国家的分裂也增加了宗教的多样性。国家尤其在中央和各个地方之间关系上各有不同。1760年，英国圣公会是相对同质的中央集权，吸收了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新教教徒，但是却有一个毗邻的帝国殖民地，即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天主教国家法国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但却与地方当局有着十分独特的关系(法国的地方也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宪类型)。信奉路德教的普鲁士是君主制和贵族地方统治结合相当严密的国家。天主教国家奥地利是一个邦联君主制国家，包括各种信仰地方宗教的少数民族和语言。美国是一系列独立、扩张的殖民地。所有的国家大体上都不一样，各国都是地域性的，其地域又各具特点。

农耕经济强化了领地特权，而工业经济则削弱了领地特权。今天，在先进的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英、法、德三国的经济活动极其相似，因为现代经济使大多数自然产物多次变了样。但农耕经济依赖生态环境——依赖土壤、植被、气候和水——这些条件都是因地而易。欧洲的农耕生态差异很大，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凌乱的资源总汇”。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民族”经济变得更加相似(见第十四章注释)。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寻常的分散性权力组织形式，而国家基本上是权威型的。尤其是在国家的工业阶段，逐渐从领地特权中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以极其相似的形式遍布西方。它的分散性权力也完全允许集体运作者和个体运作者“自由”选择其他的战略和没完没了的竞争。工人和雇主、农民和大土地农场主可以作各种地方安排，以允许阶级、地区和部门战略继续竞争。但是国家由于其本质即社会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权威性地进行分配和制度化。尽管各党派和国家精英可以争论并削弱国家凝聚力，但是必须权威地制定有关民权、选举权、中央集

权政府、征兵、税收、联盟等等的法律。

现代政府首先把欧洲的许多领地特权制度化了。然后当面临两个普遍的管理问题浪潮时，政府便极大地扩展了。而这两个浪潮则源于18世纪日益加强的军国主义和持续到1914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此期间，政府变大，与社会相联，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现在看来这个过程发展的方式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政府扩大的角色中，它们首先解决了在更加“地域化”的时代中形成的特殊制度。在扩张的第一阶段，军国主义和这些相互作用在每个国家都造就了各自的“现代化”制度：美国使其独一无二的宪法制度化；法国使与其宪法冲突的地方制度化；英国使旧政府自由主义制度化；普鲁士使半专制主义制度化；奥地利(不那么成功)则试图给它的王朝主义赋予更具基础性的渗透力。由18世纪军国主义和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引发的各个现代国家，这以后极大地增强了其社会意义。因此，在早期年代和军国主义阶段互动中铸成，现代国家现存的权威性机构的权力构筑，也成长起来。大约19世纪30年代之后，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有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吸收了工业社会能够抛向它们的几乎所有东西。

在我所谓的“间隙中兴起”和“制度化”之间，出现了与马克思的阶级辩证并行的又一种辩证。因为社会由多样性的、重叠的互动网构成，它们终年造就了自然产生的新兴集体权力运作者，这些新运作者和旧运作者之间的关系仍没被制度化，但紧接着就会变成制度化了。阶级和民族是同样优秀的新兴运作者。它们令统治阶级和政权大吃一惊，现有的制度并非针对它们而设计的。相反，统治阶级和政府用为时间上更久的、区域上更特殊的目的而设计的制度勉强应付。各国的发展不是从根本上去对付新兴的阶级和民族(而是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然后促进工业化)，但是它们扩大了机构承担了大部分控制社会的压力。这样它们便日益决定了阶级和民族的结果。

在第十七章和十八章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即美国、英国和德国劳工运动分散的发展。这里我只重点论述两种类型的权威性权力，即国

家代议制形式成形和军国主义成形(如果想了解更完整更充分的解释，请参阅第十七、十八章)。 18 世纪的英国已经形成民主政党的雏形主要是为了把“法庭”和“陪审团”、王朝和宗教冲突制度化。 英国也缺少一个有效率的国内军队(爱尔兰除外)。 因此对付新兴的中等阶级主要依靠国会，而且国会确实起了作用。 到 1820 年，普鲁士已经把主要发生在皇家政府和军队中的贵族与专业人士的冲突制度化了。 这也有助于政府把中等阶级制度化，尤其是当军队在把普鲁士变成德国的过程中获得合法地位时。 接着德国政权也创造性地利用了有限的民主政党，它也改变了中产阶级的右派倾向。 美国政党民主主要源于使大小农场主之间的关系制度化。 美国的军事性和准军事性组织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屠杀印第安人。

当无产阶级兴起时，这三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和政府对待无产阶级的方式大相径庭。 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具有“天生的妥协性”(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它们的镇压多于妥协)，也不是因为德国是独裁主义国家，更不是因为美国患了精神分裂症。 三国的大多数资本家和政治家都希望同一件事：既维持现有秩序又保留特权。 但它们有不同的权威性政府机构，而这些机构早已着手履行这些任务。 英国有各种竞争性政党和选举权，选举权和阶级分界线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动，而且还会发生变动——但国内军队的变动不大。 德国已经把分而治之的政党政策制度化了，不包括各种激进党派——它们拥有大规模军队；军队的力量炫耀已经有了相当的国内法定地位。 美国人拥有竞争党派——但他们也拥有具有国内镇压经验的军事力量和准军事力量。 因此，类似的新兴劳工运动被各个不同的有效国家机构以不同途径疏导了。 英国产生了温和的互助主义；德国则在反动的政府、资本主义和貌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了一种相当程式化的冲突；美国产生了更大的暴力活动、地方主义和小规模的社会主义。

在所有这些冲突中，国家机构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比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兴起缓慢得多。 适用于世界历史这个阶段的理论模式——普遍

弥散的资本主义和更独特的权威性国家机构相互交织在一起——是一种“政治滞后”的理论，正如我在第三章所述的国家机构理论中梳理出的。在这个时期，各个国家机构之间的变动促成了形形色色的“集体劳动者”。这给断言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某一套决定资本主义和劳工之间权力关系的理论画上了问号，无论这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集体劳动者比这些理论所说的更具可塑性，顺从于(或不能改变)一些政权，且能以许多形式成形。

的确，这个时期比近期发达的资本主义似乎使受政党民主支配的更复杂的阶级关系制度化了。纵观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独裁政权十分坎坷。独裁政府和半独裁君主制作为统治策略已经从西方消失了，尽管类似的非君主制政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大多数西方理论认为，随着“工业主义逻辑”、“民主时代”或“阶级斗争制度化时代”——各种现代化理论形式的产生，这种多样性的减少和独裁主义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苏维埃集团专制社会主义的突然瓦解激励了进化论。但是存在这样的逻辑吗？为什么沙皇专制、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大部分的现代化政权——都灭亡了？是它们走入歧途并设计了一套可行的、取代政党民主的现代权力关系吗？这些问题有待在第三卷中回答。但是这里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因为独裁政权把军国主义更直接地用于阶级调和中，这可能使它们易于在战争中灭亡。在开始评价它们的可行性时，大战的根源就变得至关重要。

各种国家成形的复杂性也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战争。当代权力运作者发现很难控制结果，正如我们发现很难解释这些结果。权力运作者的许多行为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经常是意想不到的。阶级斗争——农业的、工业的、或这两者的——并不是按它们自己的纯粹逻辑进行的。它们和意识形态、军事、政治权力关系，自始至终都交织在一起，这些关系又反过来塑造阶级自身。现在当国家军国主义强化时，这些关系甚至变得更复杂了。第二十一章追溯了这种大变动介入的源头。

民族和国家

第七章介绍了关于国家的四段式理论的前三个阶段。宗教和商业的资本主义——主张国家主权的阶段出现在这卷开始的时间段之前，只属于我所谓的“早期民族”。然后是在第七章中详细论述的军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造就了作为真正的、在某种程度上跨阶级的和偶尔激进的运作者的民族。但是民族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国家强化的(例如英国)、国家创造的(如德国)、国家颠覆的(如奥地利各地)。现在我又总结了这些不同民族的第四个阶段，即工业资本主义阶段。

在 19 世纪后半叶和 20 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阶段。它的阶级斗争及其对国家的影响促进了民族的兴起。国家第一次承担重大的民事干预功能，资助交通系统；负责运河、公路、邮局、铁路、电报系统，最重要的是建立各种学校。国家主要是回应主要由资本家，但也由其他阶级，即军事集团、国家精英所提出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需求。因为几乎所有各方都重视日益增长的工业社会集体权力，它们敦促国家向着社会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接着，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又增强了社会交流的密度，但受国家领土范围的制约。我们看到社会行为——甚至亲密的社会行为如性道德——变得“自然化”，更具民族同一性。不知不觉地，大部分国家行为促使民族成为一个经验老到的社会，把内在的、情感化的家庭邻里组织和更广泛的、机构性的权力组织连接在一起。

民族不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地方主义仍然存在，正如民族内存在着地区的、宗教的、语言的以及阶级的屏障一样。而西方意识形态共同体和全球资本主义也保留有跨国组织。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军国主义、大众语言文化和工业主义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密度，为更加民族化、更加跨国化的组织留有空间。

民族也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共同体。普遍的、跨阶级的民族必定要涉及到各种公民权概念(尽管类型不同)。但是这些概念孕育着19世纪两个支配性政治定型，引发了“代议制”问题——谁应该是完全的公民——和“民族”问题——公民权应该被限定在哪里，也就是说，国家和民族的中央集权化程度如何。我一直在强调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并且和代议制一样是有争议的。很少有国家以在民主上的同一性为开始时期：大部分国家包括带有不同宗教和语言社区的各个地区；而且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政治机构或自己的政治历史。

国家扩张的军国主义阶段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强化了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18世纪末增强了的军国主义财政和征兵的后果导致了更严重的代议制压力，但在民族问题方面不同的定型，从雅各宾派革命者尝试的中央集权制到大多数奥地利持不同政见者主张的联邦制，各有不同。但是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加强了更代议制化社会和更民族化社会的压力。“自然化”特别有效，因为它是不知不觉在意外的缝隙中产生的，因此难以抗拒。它既包括情绪原因，也包括方法上的原因，微妙地改变了隶属集团的观念。

但是国家扩张在工业资本主义领域仍存有争议。尽管多数国家基础设施的扩展得到各方的共识，但是大众教育与少数派教会和地区语言社区产生了冲突。如果少数派教会在地方上扎根，这就会强化颠覆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在爱尔兰或奥地利的一些地区)。教育的扩展也能传播一种微妙的反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观念。在来自新兴阶级的逐渐壮大的代议制压力下，没有一个中央政权能够简单地把它的语言强加于有自己本地方言的行省。例如，在波希米亚行省的教育扩展，传播的是捷克的而不是奥地利的民族情感。相反，在“大德意志”和意大利，教育助长了跨过现有国界向外延伸的一种民族主义情感。因此，据上所述，民族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促进了民族的三种不同类型：国家加强的民族、国家创立的民族和国家颠覆的民族。

根据各地情况，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也刺激了民族的三种类型。

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在本地方言环境下成为有文化的人。这使现存的国家进一步自然化，或者把国家分裂成了许多更常见的地区性民族(国家分裂)或超国家民族(国家建立)。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要求政治代议制，其结果又是不一而论的。截止到19世纪末，大众化民族——以三种形式——在所有欧洲国家，调动了中产阶级、农民及工人。

在这个阶段，民族也变得更激昂更好战。这种激情主要源出于国家和家庭里交流的强烈的情感范围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其中国家教育和身心健康基础显得十分突出。意识形态把国家视为母亲或父亲，家庭观念得以彪彰。好战是因为所有的国家继续被定型为军国主义；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所有国家都是军国主义者，一些国家从国内角度来说仍然是军国主义的。

在镇压它们的帝国主义政权不能授以地方—民族自治权和代议制的地方，颠覆国家的民族主义日益采用暴力手段。尤其是如果宗教强化的地方，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者会展开激烈的、情绪化的反抗。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地方社区生活强化了与剥削他们的民族的差异感。压迫民族反过来认为用国内军国主义对付他们是理所应当的。每一方都在煽动另一方的激情和暴力。

因此，当非代议制的帝国政权开始失去其镇压手段时，颠覆国家的民族主义就有了最大的激情和狂热。把阶级关系尤其是地方—民族代议制制度化了的西方国家并没有经历狂热的暴力运动，甚至当其被根深蒂固的种族争端所困扰时也没有出现狂热的暴力行为。比利时和加拿大可能会分裂，但也可能不会发生伤亡之灾。相形之下数百个北爱尔兰人被杀害，因为这个地区从来没有把少数民族社区的代议制制度化，而是隔离了两个社区的密切生活。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人现正在遭到杀戮，或许将来在不止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处在独特的语言社区，有时是宗教、地方社区，(许多社区有它们自己的历史上的政治机构)之间的代议制政府制度化。颠覆国家的种族暴力是独裁政权，而不是政党民主制的产物。在漫长的19

世纪就是如此。今天看来仍是这样。

国家强化的民族主义暴力主要集中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上。1900年，大约40%的国家预算仍用于备战。用战争作威胁仍是这些国家外交的中心。军人的英勇仍是男性文化中受重视的部分；妇女被尊为未来战士的养育者。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正在变的拥有更多的代议制和更加民族化。人们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农民，有时候甚至是工人开始认为自己同反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本国政府拥有同感的利益和荣誉，从而支持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一个敌对的阶级理论则着眼于这些国家代表的是什么人。它的结论是全体政治公民，主要是中产阶级，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旧政权的联盟的基础。确实，我曾强调过的资本主义利益的概念，在这个阶段也被纳入了假定的“民族利益”的范畴。

然而，总的来说，我对这些对抗性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在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民族社区的一员(即把它社会化成共同种族，甚至共同的“人种”的神话)与支持任何国内外民族政策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人们在激烈争论有关民族代表什么的大部分观念。在法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如共和主义者、君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强烈而感情激动地坚持“法兰西”含义的敌对观念。但在英国内陆大众民族过去激进的“新教”观念，现在变得更世俗了，与更保守的帝国主义观念进行斗争，而且一些自由主义者还提出了一种更温和的帝国主义观念。在每个地方只要经历过国内军国主义突然死亡的少数民族和阶级，普遍反对军国主义，尤其反对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在任何国家，正如阶级理论家所指出的，完全的公民更可能支持他们的政府并对其军国主义更有认同感。但我也证明了国家的外交和军国主义仍是秘密的，躲开了民众团体的监督，不论民众有没有公民权。因此，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确实，任何强硬的对外政策的支持)实际上不能在多数中产阶级团体中深入地传播——尤其不能在名声不佳的小资产阶级中传播。

但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已经扩大了它的号召力。随着工业资本主义使各国得以发展延伸出两套大纲即民事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罩住

了民族社会。千百万管理者现在靠政府为生；上百万青年被部队军官训练成特有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即是强迫性的，又得到其拥护，这是现代大众军队的特点。这两个男性团体以及他们的家庭——不是更广泛的阶级和社区——是多数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他们就是我所谓的“超级忠诚派”，对他们所设想的国家理想具有极端的忠诚。由于各国的理想各不相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军国主义者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英国的文职官员可能会倾向于自由主义理想；法国的文职官员倾向于共和主义理想；德国和奥地利的文职官员则倾向于较具独裁性的理想。但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是军国主义的，它们的公务员通常至少可以为一种表面上是“自卫性的”军国主义而战。

所以在工业资本主义相对短暂的第四阶段，民族按着三个基本途径发展。首先，大部分人口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国籍，使民族变成了一个相互影响和情感依附的广泛社区。因此，我所谓的“民族性”组织在较大地消耗了地区性和地方性组织(除非当时变成国家自身)较少地消耗跨民族组织的情况下增长起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民族之所在。第二，许多公民——在这点上源于中上层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社区和语言社区——被进一步引向民族主义组织，把民族利益和荣誉看作是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和荣誉的必然冲突。第三，实际的民族主义核心不成比例地源于国家在文职和军职雇佣方面自身的扩张。然后国家的理想在公民家庭中产生很肤浅的共鸣。结合在一起，他们能动员民族剩余的人。正如我们将在第二十一章中所见的，问题是民族人口更加被束缚于牢笼中，而这个牢笼和其他民族牢笼的关系不是由作为整体的人民界定的，首先是由秘密的国家精英和军队精英，其次是由民族主义者界定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会出现，但基本上是不为构成民族的大多数人所知道的。

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强化的民族被简单地描述为三个同心的环带：外层由全体民族国家圈定，并依附于全体民族国家，中层和内核联系更紧，内核即国家主义。漫画家的作品较为贴切和生动地表现了

民族的状况，民族被描绘成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一个黑色的、带着导火线的圆球。这根导火线由主张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者构成；导火线由全体公民构成，他们肤浅的侵略性压力忍耐了很长时间，足以引发爆炸，这是军事政府向外掷出的爆炸物碎片的巨大威力，强制地约束着工人和农民。然而，导火线需要火种。

当欧洲没能控制住欧洲各国的传统军国主义时，火种出现了。当民族主义和阶级，有时候和宗教、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时，它的破坏性尤其厉害。极端民族主义者会和市民阶级和宗教混在一起，把未获民族公民权但想获得的那部分市民——工人阶级和地区、语言、宗教少数派——视为民族国家的敌人，在德国称为“国家的敌人”(Reichsfeinde)。但我的理论模式并不把这些最极端的人看作“非理性的恶魔”。为了预告第三卷：纳粹——可以看作只是欧洲主张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更极端的例子，他们的出现我已经在这里说明了——更具暴力、更具独裁性、更加种族主义。他们代表了三种西方国家的形式——军国主义、独裁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极端的结合方式。他们受到来自“叛逆的”、“超级忠诚的”前线部队和国家雇员超常的核心支持，并且他们的意识形态在路德资产阶级和德国农业人口中得到最大的共鸣。

迄今为止，我不是在叙述一个民族国家兴起的常见的进化故事吗？这个民族国家不断加强它的主权、基础权力及民族动员力。显然国家主权被拓宽加深了。但是我怀疑这些后来扩大的国家是否真的和18世纪末的英国和普鲁士国家那样团结一致。因为随着更多的社会生活被政治化，其冲突和混乱也得以政治化。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政党和国家变得更具多形性。到1900年，政治涉及到外交、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政治经济、中央集权制、世俗化、大众教育、福利政策、禁酒、妇女选举权以及许多具体问题。政治使国家精英反对群众政党，阶级反对阶级，部门反对部门，教派反对教派和世俗国家，边缘地区反对中央，男女平等主义者反对父权制——以及许多其他的对抗。比较之下，18世纪的政治是相对简单的。国家仅仅处在一种过渡阶段，获

得了现代成形，而没有抛弃所有传统的成形吗？ 对于半独裁君主制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的确如此，那里的国会与宫廷对抗，派系在各部门纷争，并最终在君主面前争宠。 但是在各国，外交政策都最终产生了独特的结晶。 外交主要是由少数几个旧政权家族左右，与受民族主义限制的阶级和群众政党有一些隔绝，尽管偶尔由于民族主义政党有所缓解。 军官集团通过把官僚职业和旧政权的阶级成分及民族精神结合起来，保留了自主权。 军官和军士成了军事特权阶级，与市民社会和公民国家有些隔离。 更普遍的是，虽然民主主义、官僚主义和合理的预算都力求确立整体一致的政治优先权，但是到 1914 年它们仍然极不完善。 甚至现在民主主义对外交和军事的控制依然薄弱。 很难把整个国家视为单一的内聚实体，更确切地说，多元精英和政党以混乱的不同方式彼此混合在一起。

纵观 20 世纪，随着国家职能继续拓展，政治成形也进一步多样化了。 今天，美国在限制堕胎问题上，可以在一个星期里成形为保守的家长制天主教国家，下一个星期在调节银行储蓄贷款丑闻问题上则成形为资本主义，再下一个星期在不是为了国家经济利益而向海外派军的问题上，则成形为超级大国。 这些不同的形式很少协调一致或辩证地统一，通常它们只是各不相同。 它们调动这些不同的，甚至是重叠的交叉的权力关系网，它们的解决方案往往造成一些彼此意外的后果。 我作品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社会不是体系。 我们的整个社会历程没有终极决定性的结构——至少，没有一个是身处其中我们能够识别的。 许多历史上的国家精英受特殊的社会集团——君主、教士或武士——的控制。 他们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又不受社会生活的限制。 他们的国家体现了系统特征，这些特征恰恰源于他们自己的特殊性。 但当国家变成圆心和赖以调节社会生活的半径时，便失去了那种系统性的内聚力。

多形性已经证明是现代国家的永久特性。 当国家变成物质和利益、意识形态、亲密的家庭生活、以及外交、战争和镇压的重要管理者时，许多政党在政治上就变得活跃了。 在考察不同的具体国家时，我

列出了它们的主要成形，并证明它们如何以非系统、非辩证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些成形构筑了阶级和民族的真正身份，而又通常不为运作者所自知。在第二十一章中，我按照实际的事实研究这个问题，“达到了顶点”。

社会权力的来源

这一卷继续支持在第一章开头陈述的基本命题。为在人类社会“终极”结构方面——至少就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时空范围而言——作出重要的、但非唯物主义的总结，有可能要在马克思和韦伯之间穿插。在讨论了所有条件之后，我们可以划分出两个主要阶段，在这两个主要阶段中，从 1760 至 1914 年的西方社会的整体构筑都表现为以二元性为主。

第一阶段，大体上从 18 世纪延续到 1815 年，分散性的经济权力关系和权威性军事权力关系支配着西方社会。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革命持续的影响使欧洲及其殖民地能够支配全球；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国家完成了早期由教会开始的大众语言文化的扩张，广泛深入地超越阶级界线增加了社会密度。资本主义加强了人类集体开发自然的能力，它扩展了人口，推动了广泛阶级的兴起和工业化进程。军国主义在有争议的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上使平民社会包括它们的阶级、宗教、语言社区都政治化了。军国主义壮大了大国，灭亡了小国。

此后，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双重统治的主要产物)，抛弃了它那微不足道的历史框架，在夹缝里兴起——没有任何一个人预料到它——凭它自己的权力就成为一个主要的权威权力组织。18 世纪末，公民权斗争已经结构化，因为各国政府已经把增加税收和征兵的冲突制度化了。19 世纪，资本主义继续革新集体生产力，因为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变得越和平，军国主义在各国就变得越多变(尤其是在国内)、越“隐秘”，

有如封闭的城堡。这样，19世纪中叶以后，二元决定论的第二阶段就出现了。一个占优势的(虽然不是完全的)分散性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权威性民族国家就成了西方社会的主要的重组者，前者提供了基本相似的推力，因此如此分散(并因为所有国家都这样渴望)，后者——主要通过复杂的代议制形式和民族形式——提供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权威性解决方案。

因为在两个阶段中的两个主要改革者不是互相撞击的台球，而是相互交织的，而且因为它们造就了相互渗透的新兴集体运作者——阶级、民族及现代国家，再加上它们的对手——这不可能强化它们的相互关系。也不可能赋予它马克思所崇尚的那种赞誉，说它是具有唯一"终极意义"的社会操纵者，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力仍然是二元性阶段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这个文明像任何以前的文明一样接近单一普遍的发展过程。在其他时代或地方还没有支配自然和支配其他文明的人类集体权力扩展得如此广泛迅速。除了处在前沿的具有权力优势的蒙昧主义者和无意识的革新者外，其他时代或地方的权力运作者，没有对如何增长权力有这样清晰的认识。几乎所有人所渴望的、称心如意的未来模式，以最新最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形式、军事职业化形式、科学思想意识形式变得伸手可及。因此，其他时代或地方还没产生出如此多的进步和进化的理论。

但是对单一的社会有机体来说，发展不是一元的或系统的，而是"内在的"。甚至现在这也不是进化。我们可以原则上抽象出单一理想型的资本主义"逻辑"。我们可以称之为"边际效用法则"或"价值法则"。我们也可以抽象出一个军事主义的"逻辑"。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敌人的武力。但是一旦我们在第一阶段听任双方自如，而且一旦在第二阶段我们再加上混乱的更多形的国家，那么理想型逻辑对它们的坚持者来说，便变得不纯和模糊了。我强调市场的相对"效率"(即纯资本主义的)对领地(更多军事的或政治性的)利益概念，在这个阶段从始

至终一直很模糊。竞争的政治经济依然是加强集体和个人经济权力的貌似合理的手段。通观这个时期，可以看出一些世俗的趋势：趋于更资本主义工业化、军事职业化、政治代议制化、国家官僚化、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发展。每一个都和其他的结构安排竞争并“获胜”——不是最终意义上的，而是作为一个明确的趋势。在此期间它们的胜利或者是因为对广大权力运作者更具吸引力，或者是因为它们真正变得更强大，但是这些趋势没有一个从单一“逻辑”中兴起，民族国家受到所有趋势的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化也是如此。

尽管我把“终极”简化成(大体上的)两个二元定论阶段，但我还必须加上防止误解的说明。社会权力的其他来源也有其分量，更排他也更不稳定。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宗教和语言社区(后者在该时间内被其他权力来源赋予了更大的集体权力)与现存的国家界线不一致的地方。意识形态权力在法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时刻”对阶级和民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军国主义在西方对付世界其余国家并在保留专制君主制的对内政策和美国的对内政策上，仍很重要。军队等级制度为了它自己的“世界历史时刻”也在 1914 年 7—8 月遮遮掩掩地炫耀武力。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的一般概括仍很粗略。

也由于这些原因，西方个别权力关系对当前的权力运作者来说，仍然不清楚。利益和荣誉的身份认同和观念被不止一个互相交织的权力来源和行动的意外后果微妙地改变了。也由于这些原因，个别权力关系也仍然是客观地含混，任何人都很难揣摩清楚。经济运作者作为阶级、地区、部门同时出现，使得国内分层的前景不明确。它的国家现在是二元的平民—军人国家，每一个 Reichshalf 面对着不同的方向，受精英和政党之间不平衡权力的控制。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西方同时对一系列部门的民族国家“社会”和更广泛的跨民族文明妥协，各种意识形态，如和平与战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宗教；种族主义——都在民族和跨民族之间摇摆

不定。对这一矛盾心理系统没有任何解决方案。但是这里有一个更特殊的矛盾心理。大部分含混状态，在现实中得到了解决，并且所有这些矛盾心理的运作者和意识形态有助于解决和实际干预了大战。所以，到最后，我们本末倒置了。

第二十一章

经验主义的巅峰——超越巅峰：地缘政治、阶级斗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本卷在分析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达到了经验主义的巅峰。该大变动结束了那个时期并极力阐明我的现代社会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社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后果明确地决定了20世纪的命运。查明战争的原因对理解现代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这次战争也引起了令人震惊的迷惑：这次战争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任何一次战争。它作为道德教训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它的根源和屠杀。几个世纪以来支配世界的欧洲多国文明几乎自取灭亡。它给人以希望的主导哲学，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在1914年8月一个令人疯狂的星期里被消灭了。那些主导强国眼睁睁地走向灭亡或加速衰落。大家都认为表面上理性的实践者，即那些外交家和资本家，把他们的技术用于战争，而战争几乎毁灭了他们。那流血成河的四年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或人类社会是有理性的吗？

有无数的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外行能给论述战争根源的庞大文献里补充些什么呢？我对历史文献的综合不会比乔尔更高明。但是社会学家可以做出一些有特色的贡献：关心基础社会模式和通晓一般社会理论。甚至经验主义历史学家也意识到理论有助于查明战争的根源。

大多数争论集中在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是基本根源这一问题上。那些赞同国内根源首要性——内部政治首要性(始于德国的争论)——的

人已经在前面几章中划分的六个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中的两个因素中找到了终极根源，即经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经济帝国主义下，所谓的对资本的需求会产生民族主义经济竞争和战争。在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所谓的对外侵略作为统治策略可以缓和国内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那些宣称外交政策是首要性的人——现实主义或外交优先——也分裂了。“宏观现实主义”学派强调整体的地缘政治逻辑，这些逻辑是由代表大国的政治家表达的。战争是解决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理性方案。地缘政治危机的“微观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则类似于我在第三章中加以分析的国家理论“混乱”说，强调国家的松散性和易犯错误性。微观现实主义指出特殊的地缘政治结构导致不可预见性、危机和错误估计。那些强调混乱甚至更坚定地抵制所有有关战争理论的人，把战争归咎于纯粹偶然性或人类的非理性。

习惯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社会学学者，能给争论中内部的一方补充概括的才能。确实，大多数社会学学者对研究内部表现出职业上的兴趣。把社会变革归因于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因素是我们的惯用方法。但是，这个独特的社会学学者，承认外部政治的重要性。他也将把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交织起来作为他一般社会理论的一部分，用以阐明多种权力网络对基本多形国家的影响。1914 年事件并不是根本上源于国内结构或现实大国利益的逻辑。它们也不是源自人类的非理性或偶然性。主要由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谈到的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重叠的权力网络中的四个权力，它们互动的意外后果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四个权力网络是：阶级、“政治家”、军人和民族主义政党(第五个是特别压力集团，虽在殖民政策上很重要，但几乎未被算作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素)。因为这些权力网络以不同方式与不同的政权相互交织，再加上错误估计和意外后果，大国之间也就很难相互理解。1914 年，它们“非辩证”的交织达到了本卷所描述的权力进程的社会大变动的顶峰。

滑向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两种冲突的“核聚变”为开端。首先是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制和其持不同政见者南斯拉夫之间的巴尔干冲突，而南斯拉夫受其邻邦斯拉夫塞尔维亚的援助和斯拉夫大国俄罗斯的保护。其次，是两个大国阵营之间的敌对，即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三国同盟和俄罗斯、法国、英国三国协约之间的敌对。在每个阵营中，另外两个强国都保证，如果其盟国受到攻击，就会得到它们的援助。虽然意大利和英国没将自己的军队正式投入战斗，但都期望它们作出些支持。巴尔干冲突很难协商解决。或迟或早奥地利都将竭力打垮它的令人讨厌的塞尔维亚邻居。但是为什么这也应该是强国联盟之间的世界战争？在总共持续了仅仅一个月的一系列事件之后，“核聚变”发生了。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位继承者弗兰兹·费迪南大公，在奥地利行省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市被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地利的调查证明该阴谋由塞尔维亚政府集团策划(虽然塞尔维亚政府并不承认此事)。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于恐怖主义的足迹暗暗地深入到富有同情心的各个政府里。然而当时这是很罕见的，甚至引起了更严重的暴行。在它的盟国德国的支持下，奥地利政府于7月23日给塞尔维亚下了一道严厉的最后通牒，要求如此控制塞尔维亚的政治运动，以至于会侵犯它的领土主权。塞尔维亚恳请德国给予帮助。如果俄国或奥地利采取行动，两个联盟就可能会卷入其中。

各大国能意识到地方危机正变成重大危机。7月25日，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做出和解的答复，但奥地利一心想要一决雌雄，拒绝接受调解。同一天俄国开始讨论动员其军队反对奥地利，并求助于协约国。从技术原因上来讲(后面将解释)，军事动员是迈向实际战争的一个步

骤。7月28日，奥地利在德国怂恿下，对塞尔维亚宣战。奥地利的进攻准备进展缓慢，为调解留下了时间。但是德国和奥地利表现得对此没有一点兴趣。7月30日，沙皇命令驻扎在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俄国军队总动员。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迅速援引了双方的条款。7月31日和8月1日，奥地利(既反对俄国又反对塞尔维亚)、德国(既反对法国又反对俄国)、法国(反对德国)随后进行了军事总动员。8月1日后，各国相继宣战。8月4日，德国入侵法国和比利时，战斗在西线开始。英国于8月6日加入战争。8月8日意大利宣布中立，但1915年加入协约国一边。

这样，一些大国在危机中表现得比其他国家更具侵略性。塞尔维亚、德国、奥地利发起挑衅行动，而德国和奥地利实际上则是侵略。一些人把这次战争视为奥地利和德国的责任(泰勒 1954：527；拉斐 1965：268)；另一些人则单指占支配地位的合伙人德国(斯通 1983：326—339)。然后是俄国，它对塞尔维亚的鼓动是挑衅性的，它的军事总动员是战争逐步升级的媒介。作为最后一个参战的国家，英国的直接责任相对较少。但德国宣称英帝国主义是使大国处在不稳定性之中的。1914年，德国政府通过把罪责从眼前危机中转移开去来证明其“侵略”是合理的：德国正在保护自己以对付强国长期营造的包围圈。德国只要求获得一块平等的“阳光下的地盘”，而英国和法国不愿德国与其分享。战争植根于英国霸权之上。我考虑并主要反驳这个论点。不过，英国受到“指责”，是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没能向德国发出一个明确的威慑信号，而直到7月30日德国依然指望英国中立。法国只不过支持它同俄国的联盟并捍卫其自身安全，就如它早已声称的那样，尽管许多法国人赞成通过战争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法国的秘密外交政策亦有可指摘之处。

那么，这就是查明直接原因的优先次序：略过不太重要的国家塞内加尔，我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德国和奥地利上，之后是俄国，再次是英国和法国。前三个国家是专制君主制，后两个国家是自由主义政权。

这就提出了有关代议制国家成形的显而易见的内部政治问题：与政党民主制相比，君主制就有些特别危险吗(记住我把英国划归后者，而非前者)？ 我将回答这个问题。

问题的深度是显而易见的。 几个根源的过程迅速交织在一起。 一个特殊的结构性冲突——在奥匈君主制中民族主义者相互斗争——超级大国的对手和开明的君主制军国主义，这两个一般性结构问题熔和在一起。 这些交织的过程造成了两星期内形势的急转直下：忙乱的外交、奔波的军队、误解以及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接着是五日之内世界战争的爆发。 因为这种战术混乱的特殊深层结构，所以内部和外部因素就结合起来。 由于这场战争是为公认的地缘政治理由而战，所以我就从外部政治开始进行简单分析。

现实主义者的大战理论

受现实主义支持(实际上，得到所有合理的选择理论支持)的外交史，根据由“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统帅解释的国家地缘政治利益来寻找战争的一般根源。 它作了三个假设：各国有各自的“利益”，或者至少政治家们表达了这些利益；国家利益之间一直在相互冲突；如果有危险，战争就是维护利益的惯用手段。 战争总是一个潜在的结果，因为它是达到国家目的的合理手段(除非它变得太具破坏性，因为核战争时代已经来临)。 为解释真正的战争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何爆发，现实主义补充了第二层分析。 战争爆发或是因为强国有意识地挑起战争，以重建国际秩序(宏观解释)；或者是因为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大国之间的误解和猜疑导致战争(微观解释)。 在宏观情况下，侵略者理直气壮地认为战争是合理的；在微观情况下，战争仍是合理的，但处于环境条件和人类知识的较低层次——当任何政策抉择都带来危险时，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风险。

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世界中的运作者共用了现实主义的假设。这涉及两个前提：

1. 如果政治家体现了运用不同假设的社会身份，现实主义就不会起作用。显然，政治家确实体现了社会身份；而不止是自己国家中立的标志。但是这些身份可能没有什么差别，或者它们可以暗中破坏现实主义者的假设，劝说他们通过其他方式参与。最终，他们的社会身份确实可以说服他们自己作为现实主义者参与。对人类来说，现实主义者的预测越不具有普遍性，政治家的著作就越能体现某种社会身份。尤其对这一点提出质疑，因为，正如第三章中所述，在现实主义者的外交中有两个动机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民主荣誉感实际上是混合在一起的。

2. 政治家必须是有责任感的权力运作者，但在实际上却受政策和事态的左右。如果他们是其他权力运作者的傀儡，或受宗派化的其他权力运作者压力的折磨，他们可能不会像现实主义者那样参与。理性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其他权力运作者的特征。

本章说明社会身份实际上倾向于在政治家中间强化现实主义者的行为，但是混乱的宗派压力过分加强了这种趋势，导致了从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完全无法理解的后果。

第十二章证明 19 世纪政治家的主要身份和旧政权一样。他们是君主的白人男性亲属和受庇护者，来源于贵族、绅士、“旧”商人集团，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宗教和地区社区。在共和国中，他们不是来自不同的“显贵”家族，而是来自残余贵族、旧乡村士绅或富有的“旧”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民族”目标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由其阶级鲜明的反动目标和其他依附社区界定。这很清楚，例如，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及以后不久，当时“国际秩序”意味着像法国一样镇压社会改革运动，而且当时的外交被社会意识形态大肆渲染。就在 1914 年之前这也仍是真实的吗？

大多数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已经相信社会身份在政治家们的估计中没

有什么关系。许多身份已经使政治家们完全失去个性，授予他们一个相当显贵的头衔——他们就变成了权贵——这样就在外交文献和外交分析中形成了诸如“德国侵略”、“英国啰嗦”等等完美的常规辞令。在背后隐藏着真正的社会身份的转换。除了俄国和奥匈帝国，政治家们现在正式代表的不是封建王朝而是民族国家。“国家的理由”变成所谓的“民族利益”——在涂尔干追随者的意识中这是公认的，甚至是“神圣的”，这个目标和物质利益的估算不同，并且优于后者。正如凯南所说，公子王孙的犬儒哲学消逝了：“在[民族国家]自己看来，它羡慕自我陶醉的观点。它的象征总是要求最高的尊敬；它的事业值得最大的牺牲；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这些都不是有限的目标。”(1984，pp.256—257)

通常国家甚至不用“它”指代，更确切地说，国家被人性化，大写成基本的权威形象，这就是母亲或父亲。根据语言习惯，出现了把温柔气质安在国家身上的风俗——因此，在英国和俄国是“她的”利益、道德、荣誉、尊严和民族安全，在日耳曼人的祖国则使用“他的”。奥地利政治家与众不同，使用更古体的“君主”作为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的代表。政治家之间的交流中，通常也指政治家和国家这两类运作者，以及指首都和外交部或大使馆馆址两个地方(凯赛道或威廉大街)。由其政治家运作的、人性化的国家(母亲或父亲)落户在其首都的外交部大楼内。民族国家也有神圣的象征，尤其是国旗和国歌。公众游行表现出的行为像在教堂里一样：虔诚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全神贯注的地站着)和强烈的情感(热泪盈眶，满腔激情)。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仍是——神圣的。

因此，通常不能像算计物质利益那样仔细地算计民族利益。它们通常不能清晰地交替反对其他利益。如果不能不知不觉地带来这些利益，就根本不会带来利益。有效规范的团结和偏见，像非正式的英裔美国人联盟或为所有这些列强所分享的对非白人种族的蔑视，位于深层，很少被表达出来。当讨论殖民地或谈判贸易条件时，外交家确实

承认地区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在这里经济压力集团扮演了它们最强硬的角色。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没有参与边境地缘政治的讨论。因此斯通(1983， p.331)作了略有夸张的评论：外交文件和该时期的私人信件“仅仅表示对权威、战略、高层政治的关注。”正如我们所知，“荣誉”至关重要。

运作者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全社会中多么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一个比较有思想的参与者，俄国将军基洛依夫，1910年在他的日记中吐露心声，他总结这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我们像任何强大的国家一样奋力拓展我们的疆域，拓展我们的‘正统’道德、经济和政治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Lieven, 1983, p.22)。虽然基洛依夫通过给“正统”加上引号，稍微拉开自己和该词的距离，但是他最终“理所当然的”给该词增加了分量。因为大多数参与者确实如此，地缘政治可以更接近合理的现实主义体系，包括共同的规则和信号。残存的旧政权和跨民族主义甚至加强了现实主义的假设。亲戚关系和全世界的贵族文化仍和政治家们结合在一起。尽管大多数人用他们的母语写作，但许多人用至少三种语言讲话。他们的公文里夹杂着法语和拉丁文的时髦用语。他们通常能彼此很好地理解，尽管我们将看到他们对彼此的国家了解甚少。

19世纪末，地缘政治也把追求的“民族利益”系统化了。“地缘政治”在19世纪80年代由凯杰雷创造出来用以表示“把国家想象成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科学——充满活力，受空间限制的强国，按照明确的政治重要性行动，通过殖民吞并和征服拓展其空间”(Parker, 1985, p.55)。地缘政治学家当时界定了四个“关键的”(这个词意思是“生活必须的”)民族利益：

1. 捍卫国家的领土高于一切；

2. 通过正规的地缘政治帝国主义或作为友好联盟或国家代理人的保障来扩展对领土的控制；

3. 利用19世纪革命的广泛权力确立全球战略控制的殖民范围和海

军范围；

4. 通过在大国体系中运用经济和军事权力来保证前三个“关键”利益。

这些目标体现了利益和社区鲜明的中央集权的领土观念。我们在地域上被界定为国家的成员，而不是地方地区或跨民族集体的成员，获得对未来领土而非市场的控制权，可能会在集体利益的界定和评价上占主导地位。政治家们并不拒绝市场获得和利益，但设想这些东西会随领土的扩张滚滚而来。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民族利益服务。地图室成为外交部和最高统帅部的中心，地理学家成了国家权力的学术仆人。外交家彼此心知肚明当权者会按照地缘政治行事，根据领土的地理位置和他们的政治能力所带来的领土的主要经济和军事资源，对其他国家的这些资源施以压力。皮套裤和地图是帕默尔提出的这些旧政权地缘政治的简明特征(1983， p.xi)。

并非所有强国都同样致力于领土扩张，而且没有一个为寻求这个目标而排除其他所有目标。德意志帝国刚刚统一，就出现了有关领土贪欲是否得到满足的讨论(俾斯麦的论点)。实际上，在 1871 年到 1905 年间与其军事实力相比，德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相当的妥协性，因为美国政客没有把美国土著和“黄种人”算作完全的人，他们相信其自身是爱好和平的，并且在对西方列强的关系上也是如此。英国很早以前就已经构筑起它的帝国，现在只希望维持它，并确保英国的和平和海军演习所展示的影响，由于割去了阿尔萨斯—洛林，法国的利益在新领土范围内缩减了。所以英国和法国的政客们觉得还是采用较少的领土权力理论更可取，尤其是海军上将马汉的海权论只要求殖民地港口和中途港口——“非正式”就不是正式的帝国(Mahan, 1918， pp.26—28)。地理学家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盛行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另一学派则主张以法国为首的强调地区、边境的渗透性及国际合作理论，这是早期论述过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理论。

然而，综观漫长的 19 世纪，国际基础权力和民族公民权的增加弥

散了身份和社区的“民族”感。地缘政治作为集体利益的“账户”变得越来越受欢迎。麦克金德把马汉、领土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论证世界历史是在大陆人和海洋人之间的循环冲突。哥伦布曾经将优势建立于海洋人一方；现在铁路又将优势赢了回来。俄国或普鲁士命中注定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已经是地缘政治学家牟取私利的场所。在19世纪90年代的“新帝国主义”时代，列强们疯狂争夺贫瘠的非洲领地，它们结成了有承诺的正式联盟。到1914年所有的政治家都认为在地缘政治上和全球范围内，它们的“民族利益”概念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

伴随着公民权、民族主义和神圣的地缘政治利益，现代民族国家应运而生，这就明显地加强了现实主义者的假设。政治家更可能按现实主义者的方式行事，比如说，如果他们正竭力去压制自由主义(正如他们以前所做的那样)。那么现实主义在诠释1914年时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学解释的帮助。但许多现实主义者并不赞成这一点：摩根索(1978年)把战争归咎于政治家们操纵的危险的权力平衡体系，这样，无论政治家具有什么样的其他身份和动机，它都可以在任何年代发生。然而，罗斯克莱司(1986， pp.86—88)却指出是强化使然。他认为许多领土更大更多的国家，民族主义广泛流行，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创造出更多的“军事-政治化”的民族利益的定义。尽管如此，在分别估量权利平衡或军事政治化的世界前景时，两位作者还是同意富有侵略性的地缘政治思想是系统的，看上去像是现实主义的。我仅仅希望证明地缘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一致性及系统性比上述任何观点更加软弱无力得多。

导致1914年战争的所谓系统的、现实主义大国格局是什么呢？自1815年后地缘政治已经有所变化。然而，如在第八章中所描述的，俄国和英国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防御上固若金汤，觊觎着最大规模的欧洲扩张路线——俄国进入亚洲，英国横跨向西的海上交通线。英国的商业势力也相当于我所说的准霸权或特殊霸权。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及奥斯曼帝国。在该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外交稳定依赖

于英国和俄国，依赖于特殊的英国霸权和共同协作以及全部六个权力关系网络中的权力平衡。到1910年，英国仍主导潮流并领导贸易，但它在工业上逐渐落后于德国，而德国已经击败了奥地利和法国并在欧洲大陆上占主导地位。法国逐渐在衰落，奥地利则衰落得更迅速，土耳其更是病入膏肓。俄国在防御上仍是牢固的，在亚洲还在扩张，在欧洲则进行现代化，但它的政权很不稳定。

在两个阶段出现了转变。首先，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至1902年前后，存在两个分裂的冲突领域。欧洲大陆中心的强国奥地利、德国及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反对从侧翼包抄的俄法协约。德国和法国在莱茵河岸为敌，奥地利和俄国逐鹿于巴尔干，现在随着土耳其的灭亡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在全球范围内，每个强国都是独立的；然而冲突主要是在英国、法国、俄国(在亚洲)之间展开。但是德国及其海军的崛起，以及1905年对日战争中俄国的失败，导致了重新组合并进入第二阶段。英国解决了和法俄两国的主要分歧后，部分加入了协约国，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许诺。这就是1914年，除了意大利宣布中立之外(后来加入协约国)现实的国际组合格局。

最早的现实主义学派宣称，地缘政治最主要的逻辑来自这些转变，该学派提出了犀利的反诘：世界秩序中的这些根本变革怎么能不伴随着战争呢？不正是这些列强的兴衰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和日俄战争吗？在世界历史的其他时期发生在权力平衡上的类似改变不是已经被战争验证了吗？我们不能完全从这些变量中推算出1914年的两条战线吗？不正是俄奥在东方的敌对造成巴尔干地区的不稳定吗？不正是英德在西方的敌对把巴尔干争端演变成世界战争的吗？不正是德国对俄国现代化的恐惧——德国已经达到恐惧的极限，这种恐惧可能是相对衰落的开始——导致1914年德国首先在两条战线上发动进攻，把两条战线上的战争连接成一场世界性战争的吗？

宏观现实主义承认在解释1914年7月真实事件的困难。在滑向战争时，几乎没有多少可贵的真实材料可供利用，相反却是大量的人为编

造的材料。这样第二代混乱的微观现实主义学派强调的就是形势迅速变化的不确定性和错误估计。失误当然很多：德国领导人对英国中立和法国军队的恢复力估计失误；英国的警告声响不大；俄国拙劣地修改其动员决定；奥地利则在蛮干。阿尔伯蒂尼关于六、七月外交的不朽巨著(1952、1953、1957)说明上述所有这些失误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格雷、沙泽诺夫、贝特曼、贝希托尔德以及其他人的愚蠢自负和误解，战争本可以避免发生。

但甚至在这样的外交混乱中，都有微观现实主义的模式。正如摩根索(1978，pp.212—218)所强调的，一个权力平衡体系，尤其是以联盟为基础的权力平衡体系诱发了内在的不确定性，大国不能完全预测同盟或假想敌的行为。因此，尽管体系要求平等的权力，但是每个大国都必须会全力争取优势赋予的安全地带。但是由于体系是动态的，并非任何大国都可以以同样速度增长它们的权力，先发制人的战争(在相对势力恶化前发动战争)本来就具有使权力平衡的可能性，大国承认这种潜在的合理性。如果列强们在平衡中失去自信，其中一个强国就可能发动战争。

在日益恶化的危机中，决策制定也可能变得越来越狭隘。因为列强们不能预测其他国家的行动，它们在更狭窄的范围中进行选择。然后它们的选择波及其他强国，令其选择范围更狭窄。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引起了外交的旋转直下，并最终导致战争爆发。侵略战争开始于巴尔干，接着它的后果波及其他列强，反过来，它们的反应通过外交链环反弹回来。因为最初的运作者进一步运动，战争部分地成为它们行为的后果。是刺杀大公的凶手还是塞尔维亚或奥地利应该对五千五百万欧洲和美国人的死亡负责吗？加夫里洛·普林西波至死仍不明白他开枪的后果。接近原因链的开端，孤注一掷的运作者冒险把局部战争作为两个选项中损失较少的一项，这是直接明显的罪恶。大规模战争可能不会发生——这取决于许多其他国家的不确定反应。

因此，奥地利政治家决定，不惩罚塞尔维亚会促使其他持不同政见

的民族主义者转向造反。当局不能在耻辱中生存，即使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总参谋长康拉德宣称："君主制已经被掐住脖子了，被迫选择要么让自己被勒死，要么作最后的努力捍卫自己，抵抗进攻"(Albertini，1953，Ⅱ，p.123)。俄国当局肯定赞同这种说法，允许惩罚塞尔维亚以防鼓动恐怖分子。这也是德国政治家的观点：奥地利是它仅有的可靠盟友，必须允许其存活下来；巴尔干争端应该被限制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这个责任推卸给了俄国。俄国当权者感到在保护塞尔维亚时，被迫以武力相威胁，但是也期待调停解决争端。

只有到了 7 月 25—28 日，当时俄国显然没有让步，各大国瞪大眼睛面临着一场大规模战争。奥地利和德国找到了为战争冒险的新理由。奥地利的国家领导人感到进退维谷：要避免战争，现在该是它们而不是塞尔维亚要作出让步，这使民族主义者得寸进尺。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双方领导人似乎不愿意妥协。但德国政治家们使奥地利变得更强硬。球踢到了德国的身上。德国政治家们对俄国人的过激反应有点恐慌，但是现在受到先发制人战争的诱惑。令人惊讶的是俄国人尽管意识到三国同盟中的德国将保护它的盟国，但似乎还是愿意对奥地利甚至是对德国作战。如果俄国集中全力最后一决雌雄，从德国的观点看，最好在俄国军队现代化完成(1917 年)和奥地利进一步削弱之前马上开始行动。德国的力量已经达到顶峰，将会被永久地剥夺其在阳光下的地盘吗？外交大臣贝特曼—霍尔韦格沮丧地说，"未来属于俄国，俄国越来越壮大，日益恐怖的噩梦笼罩着我们"。贝特曼和德国总参谋长毛奇(不是 1866—1871 年的胜利者，而是年轻的那个)，曾谈论过对先发制人的对俄战争的"风险估算"(Stern，1968；Jarausch，1969)。他们可以指责俄国"侵略"。指责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能影响其他大国，也能影响国内民众的看法，尤其明显地是能影响犹豫不决的英国。

现在英国的反应变得至关重要。对于德国来说，同法俄较量是成败参半的风险；和英国较量也几乎是自取灭亡。但是大多数德国领导人相信到 7 月 29 日后，英国不是拖延参战就是宣布中立。为了使奥地

利生存下去，德国应鼓励奥地利侵略塞尔维亚，德国应迅速进攻法国，用奥地利人阻挡俄国人，直到人力物力资源能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在英国表态前，法国很快就会被迫接受1870年缔结的条约。然后用法国的殖民地收买英国。这样就值得冒险，因为将来的形势对德国会更加不利。于是德国宣战了。法国和俄国别无选择。它们必须根据协约国军事条款来保卫自己。英国政治家们犹豫不决，但确信德国侵略会威胁英吉利海峡后，英国决定参战。在最后时刻，所有强国都努力证明它们的对手是侵略者。

没有一个国家作出让步，因为如果从狭隘的角度出发，表面看每个国家都很有理。在每个阶段，每个强国的政治家推测他们只能在逐步升级和更加恶化之间进行选择(Remak, 1967, pp.147—150)。甚至在1914年7月，政治家们仍在以前分析的更广泛地地缘政治参数上，迅速算计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的时机。现实主义者的合理性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能产生合理的目标，那可能是由于很难在瞬息万变的形势里预测其他国家的反应，因为最大的侵略行为(塞尔维亚、奥地利、俄国、德国的)更接近连锁行动和连锁反应的开端。第二代混乱现实主义学派补充了这些推理。

对现实主义者辩解的初步批判

在本篇论述中存有遗漏和没有前提的推理。但是两个现实主义外部学派的观点——政治家们所谋求的神圣的民族地缘政治利益(或许是由普遍的民族主义加强的)，长期以来适当的追求，在危机中给搞乱了——看起来可能还能解释一些滑向“一战”的原因。直到最近二十年，考察解释的几乎全是外交，并几乎总是用这些术语来表达(Mansergh, 1949； Albertini, 1952，1953，1957； Taylor, 1954； Lafore, 1965；Schmitt, 1966)。但是关于这一点有三个基本问题：战争不是权力平衡在地缘政

治上的重组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次战争并没有被看作是这些重组的合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结构力量导致了现实地缘政治逻辑和外交错误。

在这个时期，为什么能平静地对待大国的兴衰，有两个原因：1.这个“权力平衡”实际上不像本卷中所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也不像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一个。它第一次像真正的赌输赢的比赛，在比赛中，如果一个大国获胜，则另一个大国必须失败——而现代战争可能会使双方都同归于尽，战争并不是大国间某种排次序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正如摩根索所断言)。一个相对真实的“现实主义”方法会从战争导向目标这一事实着手。正如韦伯所说的，它们为“物质利益或理想利益”而战，以维护利益或把思想价值观强加给世界。但是到了此时，突然两方面都不是了。正如我们所知，几个世纪以来，战争已经维护了主要大国在殖民地和欧洲的贸易和领土。但是现在没有可以轻而易举夺取的有利可图的殖民地了(“土著们”正在用任何可能的办法奋力反抗)。没有可以吞并的大国，正如欧洲仅仅被分成大国和被所有大国保护的小国。只有制度化较小的巴尔干地区；战争在那儿可能是合理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活动，但不是一个总爆发。同样，也不像过去年代那样(20 世纪后期)，没有伟大的意识形态，如天主教、民主、文明、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强加给被征服者。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最初所有的大国都声称是自卫。

最近的欧洲战争所关注的是由小德意志联邦中的普鲁士(两次)在欧洲进行的有利可图的最后大扫荡。这一点非常重要：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获得了大量领土。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Mann, 1988)，各大国把那些领土进行分配并建立行政体制，而这些领土分配的体制又使它们更强大。关于这些战争的根源，或许我们应该更严肃地对待这些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而不是大国之间关系的总爆发。

第二个原因强化了第一个原因。当时实际上有两个大国已经赶上

了英国。战争是由德国而不是由美国引起的，双方对战争都没有深思熟虑。英国外交家对待这种改变很现实，当在美洲的军事资源根本不可能赶上美国时，它只是耸耸肩，撤回了大部分军舰，并私下里建议政治家，如果美国人想入侵加拿大，英国是不可能阻止的(Kennedy，1985，pp.107—109，118—119)。在下半个世纪里，两国和平地甚至是合作地实现了美国对英国准霸权的取代。战争与地缘政治的结伴而行是可以避免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美国远在三千英里以外，而德国却近在咫尺。工商业甚至海军的竞争可能令人感到头疼，但是德国对北海、海峡口岸和英国海岸的威胁顺序不同。英国没有资源同时招架德美双方。地缘政治逻辑建议集中精力对付更近的德国威胁。但是美国人没有攫取加拿大，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他们也没有用海军优势封锁美洲大陆和英国的联系。他们不是罕见的有道德的人，因为他们已在太平洋显示了其帝国主义，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基于跨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休戚相关。两个国家讲着共同的语言，拥有(占领导地位)相同的种族和宗教集团，共同拥有类似的政党民主，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当权者不想相互战争；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很难说服其公民为这样的战争而战。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社会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分散的规范的共同体，一个意识形态的权力网络，这个网络使战争远离它们之间的吵吵嚷嚷。

这些盎格鲁—萨克逊的准则比大多数跨国操作规则更强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只不过是对整个欧洲准则的夸张描述。西方社会是一个多权运作文明。它的宗教、文化、世俗哲学、政治制度、经济、君主和贵族血统，以及日益增加的种族主义——所有这些都给大国之间带来一致的标准。当时许多人相信这会抑制逐渐增长的地缘政治和领土利益的界定。外交也被设计成确保和平谈判冲突的手段。例如，总的来说，殖民地差异被安排在有规律的次序中——从一个轻率动作引发的“偶然事件”，到相互武力威胁的“危机”，再到调解和共同

探讨，最后妥协解决。外交并不是在无政府主义的黑洞中进行的威胁和炫耀。它也是规范的理解和有教养的妥协。

确实，在协调外交背后隐藏着分散的反战准则。启蒙运动的遗产，尤其是通过自由主义遗留的遗产，就是人类社会能够通过理智的和平讨论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正如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跨国方面主要是加强不同国家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平的议会以讨论自由主义贸易和金融资本为主。它们的理性权力能扭转战局吗?

和平议会可能会向人们提出有关现实主义者叙述的非常为难的“现实主义”问题。为什么德国像美国一样，在所谓英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次序上早已超过英国时，却冒着毁灭的危险与英国交战？一个领导德国的工业家胡格 · 斯迪纳司，1911 年以预言性言辞辩护道：“如果让我们有另外三到四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德国将成为欧洲无可争辩的主人。”(Joll, 1984a, p.156)。斯迪纳司的话是正确的；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他还是正确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的话再次得到验证。让我们希望他那暗示和平的主要市场支配(我的国际政治经济六种类型的前三种的联合)的言论最终在对德国和欧洲的第三次机遇中将会让德国的当权者听到(我在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重新统一之日写下的这些)。如果他们听到过这些言论，对德国和整个世界来说，以前的各国政府本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因此，关于德国发动战争是为了获利或者仅仅为了反抗包围和英国霸权而进行自卫的言论，简直是一派胡言。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的，英国不再称霸。其他大国不再给它专业的“霸权主义”商业机构提供积极帮助。最后，我们看到“包围”之说部分是德国行动的后果，部分是民族主义者的夸大其词。但首先，德国的侵略不是自我防御，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进行防御。现状在保障德国现实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利益方面——如果你喜欢，可以称现状为包围或英国霸权——远远超过发动战争。因此，和大多数历史已经确信的一样，谴责归咎于德国权力运作者，其他大国也该受到谴责。我们仍需解释如何克服集

体利益和西方相对和平的规范。显而易见，它具有社会学根源，超越的仅仅是现实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利益。

当旧政权招募他们时，我们或许可以返回到政治家的社会组成上来，对他们来说，历史上的战争是一项标准的体育活动。但是战争不是在君主国旧政权的士兵和政客中间唾沫横飞的军国主义者直接引起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赞成和平，旧政权中的跨民族主义并没有灭亡。君主们仍保持着家族的团结；贵族则参与了带亲属关系的启蒙运动和教会的跨民族文化。尽管他们崇尚战争，但这是秘密的职业军人进行的有限的战争，而不是由民族认可的全民总动员的战争(在 1792—1815 年期间，这种战争已经把它们弄得满目疮痍)。旧政权是军国主义的，但是它并不期望一场全民总动员的战争来威胁进行大屠杀，打乱经济正常秩序，甚至颠覆当权者。许多将军明白什么样的恐怖会被迅速释放出来；海军上将也不想派出他们华而不实的战列舰去葬身大海。

因此，更具侵略性的大国的许多政治家和参谋长实际上警告过政府不要参加这场战争。许多奥地利人指出，君主制在对俄战争中将不复存在。奥地利最高参谋长曾警告说不能有效地动员军队同时对抗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但是 1914 年 8 月却要同时对双方动员。德国警告过不要让三心二意的奥地利把它们拖入战争，不要指望奥地利的有效军事援助，不要同时与法俄交战，如果没有首先获得英国中立，不要对任何国家开战。德国海军元帅也警告说，他们不能挑战英国海军。但是，在 1914 年，所有这些都被要求去做。俄国指出秘密行动是到君士坦丁堡最好的途径；对德战争只会威胁政权的存在。俄国将军指出现代化项目是防止开战的折中办法；海军元帅告诫军舰将会被困于东波罗的海和黑海，但是 1914 年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事实。

诚然，在全部三个君主制国家中其他政权宗派不是如此悲观，并且其他的宗派还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或犹豫不决。甚至占卜家们在 7 月底 8 月初似乎也把恐惧抛在了脑后。但是在相对平静时期，许多人估计了不利因素并发现了他们的缺陷。他们的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所有这

些担忧被证明是对的。对三个君主制国家来说，战争形势在恶化。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

因此，战争不是理性的地缘政治的理性后果，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奥地利、德国和俄国的君主制——被战争摧毁了，许多人知道存在这种可能性，甚至可行性，并且很可能会发生。于是当欧洲滑向战争时，政治家们发现很难解释正在发生并且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是什么。许多人求助于命运的隐喻。8 月 3 日黄昏，爱德华·格雷勋爵透过外交部办公室的窗子看着街上的风景，发表了著名的宣言："全欧洲的灯正在熄灭。在我们有生之年将不再会看到它重新点燃。"外交大臣贝特曼—霍尔韦格宣称"事态正在失去控制，石头已经开始滚落……我看到厄运在欧洲人民和我们自己人民的头顶上盘旋，它比人权更强大"。俄国外交大臣沙泽诺夫 7 月 25 日忧心忡忡地说，他"将在这次事件中被摧垮"。当德国大使告知沙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除非他停止动员时，沙皇指天宣告："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他的内务大臣接上说："我们在劫难逃啊！"甚至连有魄力的行动也会被视为命运。皇帝弗兰兹·约瑟夫最后下定决心，奥地利必须惩罚塞尔维亚并面对其后果。他对总参谋长说："如果君主制注定要灭亡，至少要让它体面地灭亡。"他对礼仪有一种古怪的心理(Albertini, 1953: Ⅱ, pp.129、543、574；Joll, 1984a, pp.21、31)。

这些运作者没有对自己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们坚持认为在工作上武力胜过人的理性。后来的评论家不能如此轻松地为他们辩护。由于战争在形式上是非理性的(它不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又由于当它的发动者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或甚至知道就该如此，他们必须是非理性的。争论被拓展开来，牵涉到整个旧政权和统治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甚至整个欧洲文明。战争被解释为旧政权的傲慢自大，在向后的猛冲中"大动乱中的骑士……准备闯入历史"(Mayer, 1981, p.322)，以德国为典型的独裁军国主义君主制不可避免的命运(Fischer, 1967；Berghahn, 1973；Geiss, 1984)；"强烈的民族主义"外交的毁灭(Schmitt, 1966, Ⅱ,

p.482)；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胜利(Joll, 1984c； Koch, 1984)或“有组织的”合作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对工业革命的自由竞争的胜利(Hilferding 和 Lenin 的说法)。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正好这些年出现的弗洛伊德的理论(1914 年弗洛伊德是一个奥地利爱国者)在这方面是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死神，萨纳托斯受“国家主义者的胡言乱语”的引诱，缠住了欧洲(Todd, 1979, pp.60—61)。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所有这些解释以及在我的整个讨论中存在一个问题。 恰恰和现实主义相反，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理性或非理性的语言归咎于“列强们”，因为它们在现实中不是单一的运作者。 在重要的正式感观上，它们是单一的。 “他们”谈判、威胁并且宣战。 实际上，政治家们做的就是这个。 但是政治家是多元的。 当外交事务大臣伯克托尔德、奥地利首相斯图伊克和匈牙利首相蒂斯扎，以及皇帝弗兰兹 · 约瑟夫赞成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时，当皇帝签署由总参谋长康拉德上呈的总动员令时，当皇帝签署由伯克托尔德上呈的宣战电报时，“奥匈帝国”发动了战争。 但是这五个人代表了各种性格和信仰，他们也代表了对形形色色政治权力关系网络的定型观点。 小心谨慎的老皇帝所关心的是维持他的王朝，宁可由斯拉夫人一致同意不发动战争。 总参谋长代表了主战派。 他一直确信为挽救君主制就必须打垮塞尔维亚人——并且他似乎想成为战斗英雄，为的是让他的爱人最终嫁给他(Williamson 如此暗示,1988, p.816)。 优柔寡断的外交大臣易受德国施压的影响，奥地利首相缺乏经验，而匈牙利首相则对外交事务根本不感兴趣。

“奥地利”意图的决定或执行是神秘的。 最后，奥地利大胆地对塞尔维亚行动是因为德国通过伯克托尔德(他也对大公的遇刺感到震惊)施压给康拉德，克服了皇帝的顾忌和两个首相的软弱。 这甚至使复杂的奥地利政策权力网络过分简单化了。 “大国”奥地利与其说是运作者，不如说是以各种各样非辩证的方式定型的，把弗兰兹 · 约瑟夫作为其中心的势力范围。 正如我们在第十章中所见，他故意让宪法、权力和他的内阁构成含混不清，以便使部门分而治之的处理权达到最大。

结果导致了宗派主义。

有时候皇帝感到他的中心地位令各宗派感到不快。1911 年，他给总参谋长康拉德发牢骚，抱怨康拉德对待外交大臣艾伦塞尔的态度："对艾伦塞尔这些频繁攻击，这些刺耳的话，我禁止他们……对意大利和巴尔干问题的指责应该指向我。政策是我制定的……它是和平的政策。"(Albertini, 1952, Ⅰ, p.351)。但是，弗兰兹·约瑟夫没有制定政策。在这个多形国家里，更确切地说，他是大量权力网络定型的中心点，这些权力网络有些是国内的，有些源于国外(像德国的压力)，另一些则跨越了边界(像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者的"合理性"是对他和他的顾问提出的许多问题：目标的一致性和为达到目标选择有效手段是相互交织的争夺各种权力形式的斗争的主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欧洲社会普遍的非理性，更确切地说，合理评价的两部分正在以两种难以预料的方式相互作用。第一，在所有国家国内和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尽管各不相同，但是每个国家都处于不稳定状态。第二，因此，其他大国对自己外交政策的反应就变得很难预测。问题不在于非理性的运作者，而在于具有多重身份的运作者寻求各种战略，这些战略的互相作用是不可预测的，并最终具有破坏性。所以我必须列举隐藏在政治家和"大国"背后的主要权力网络。我将从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向外运动，把在代议制问题上国家定型的两种主要方式分成君主制和政党民主制。

君主国的政治家

第十二章说明传统上外交政策和战争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孤立的"。在三个君主制国家中，君主特权在宪法上依然是私人拥有的。因此，君主的观念和气质至关重要。它造成英德关系上的分歧，威廉二世尊重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但是女王继承者、

他的叔叔爱德华七世的无礼行为激怒了他。再加上威廉易冲动、夸夸其谈的性格和他神气活现的军服“对恶化英德关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肯尼迪说(1980， pp.400—409；参看 Steiner, 1969, pp.200—208)。但在滑向战争时，实际上还没有有个性的君主来支配外交政策。沙皇尼古拉二世软弱无能。他自己情感上希望和平，但是顾问劝说他参战。无主见的老弗兰兹 · 约瑟夫长期的痛苦经历使他变得相当谨慎。但是他也被说服加入战争。威廉二世反复无常——在好战的军国主义者和口头上的种族主义者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在危机真的发生时甚至受到了惊吓。他被说服对采取行动表示支持。我们必须在这些当权者中找出是谁如此巧舌如簧。

接近并影响君主的是独裁半独裁政权下的政治中心。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行，这些过程变得更复杂了。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在德国至少有十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治权力网络围绕着这个中心定型。在德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四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网络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影响皇帝：

1. 民政网络，由总理、外交大臣和普鲁士军机大臣领导，传递其内阁成员包括外交官的建议。尽管按宪法他们不对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普鲁士议会负责，但是他们关心公众想法，包括在国家政府自身之内逐渐加强的民族主义“政党”(正如我们在第十六章中所见)。民政网络是松散的，因为政府包含现实主义政治家和“超级忠诚的”国家民族主义者，鼓吹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而非小心谨慎的外交估算。

2. 军事网络，主要是陆军最高司令部，再加上海军部和临时战争委员会。因为这些机构被一条看不清的指挥链连接起来，尽管在机构上也是松散的，但是它们具有社会一致性。它们主要从容克和其他贵族集团中吸收成员，部分代表这些人，部分代表狭隘的类似等级制度式的军国主义。在这段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它逐渐壮大。

当含混的宪法不能解决前两个网络内部或它们之间的争端时，其他两个临时权力网络出现了。

3. 三个“内阁”(陆军、海军、民政)，创始于君主的宫廷，被认为是在君主和大臣之间传递消息，但实际上是宫廷机构自主运作。

4. 直辖系统，是显要的军事官员在没有大臣参加的情况下单独觐见皇帝的原始权力，在 19 世纪，这种权力被扩大到包括文职官员和其他官员。因此，门第等级高的贵族们能够越过任何其他渠道，竭力直接影响皇帝。

这四个网络之间，有时是内部的，其关系是不清晰的，而且常常是不稳定的。它们作为对特定危机的临时应变措施而出现，但是(正如第九章中所证明的)它们也是专制君主制部门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在近代工业社会，这个战略在维护霍亨索伦王朝权力方面做得非常好。它们把目标瞄准在减少国会、行政官僚机构和军事官僚机构进行解释义务的透明度上(显然，非常不幸地受到有关皇帝行使了多少个人权力的争论的支配，见 Hull, 1982； Rohl， Kennedy 和 Deist 的文章，见 Rohl 和 Somhart, 1982; Eley, 1985)。因此，塞西尔(1976, p.322)总结说，在外交政策中“阴谋诡计、阴谋集团以及世仇是能够扩散的”。以前的章节中已经追溯了这个德国悲剧。与其普鲁士祖先相比，德国没有使任何一个能够执行最终决策的地方形成制度。尽管有君主，但是没有君主制度。

第十章论述了奥地利权力网络是多么松散，因为弗兰兹·约瑟夫王朝的分而治之的形式，是更个人化更王朝式的，比德国的形式更少制度化。这个君主试图把自己身上真正的君主权力制度化。但(正如以前几章证明的)近代国家的扩张范围——被该国的多民族复杂性进一步恶化——已经使有效的个人君主权力成为幻想(这里没有尼采式的超人)。尽管我对俄国行政机构的论述不多，但是它也是王朝的，甚至是独裁的，在争夺沙皇信任的大臣们和宫廷的流言蜚语之间造成严重的宗派主义。三个君主制国家中没有一个把有效的君主权力制度化。

但是形形色色的阴谋宗派主义和混乱状态不一样。德国诡计多端的政治权力网络依附在第九章所论及的四个高层定型的周围。在那里

我指出分而治之政策的后果，是没有能够放弃权力运作者的竞争目标(除了那些社会党人、左派自由主义者和少数派政党之外)。 因此，像在国内政策上一样，各个成形没有被优化，但被迫“加”。 在题目之间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选择。 我们将明白这是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因。

四个定型中的两个定型不太直接。 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来源于旧政权。 因此，它们只是温和地定型为民族主义，一个更大众化的意识形态。 但是民族主义在各方面都压迫它们——因为受中上阶层国家雇员和国家教育机构的推动。 其次，作为一个旧政权他们没有直接定型为资本主义者，或至少定型为近代工业资本主义者。 然而作为反动派他们确实对资本主义的敌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恨之入骨。到 1900 年“秩序党”明确意味着是支持资本主义的。 政治家更直接地定型为君主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 几乎所有人都是廷臣。 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构成了“统治群”。 这群人蜂拥行事，但不是煽动的。 有几个大臣和国务卿怀疑皇帝的神志，并商讨把他置于约束之下。 但他们从未行动，“他们不敢，因为，无论英明还是昏庸，除了俾斯麦，他们都是政客，但他们更是廷臣”(Albertini, 1952, Ⅰ， p.160)。

在形式上君主决定外交政策；在现实中，君主政体以分而治之和宫廷诡计的方式决定外交政策。 在滑向战争时扮演了一个无用的角色。士兵也是如此。 大多数皇帝的随从，他的大多数内阁成员，那些享有直辖特权的人，均是来自保守贵族家族的官员。 军队是旧政权的训练场。 近卫军团围绕着君主。 普遍用戒严令来维持秩序。

统帅部

在任何政权中都可以发现这些德国军事特征的痕迹。 在所有君主制国家中，军事部门仍支配着包括宪法和独裁统治在内的旧政权。 君主、宫廷以及统帅部共同运转，共同思考，也共同战斗。 军队生活的

仪式仍强调贵族和皇族之间的联系(许多国家现在仍这样做)。从参谋学院毕业、提升、受勋、调动、检阅都受到支配性的皇家精神气质的影响。杰出的军官出身于贵族或作为其服务的回报被封为贵族。军官配给能永保绅士生活。随着军队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征兵的逐渐普及(英美两国除外)，中产阶级的儿子以学员和预备役军官的身份参加到部队中来。所有这些政策可能看上去像是旧政权的高明策略，可以把中产阶级掌握在它的手心，但它也蕴涵了对旧政权稳定性的两个威胁：一个是普遍的威胁，另一个根据国家的不同而变化。

易变的后果是军官团当时蕴涵着一些社会政治紧张气氛。资产阶级对抗“旧社会腐败”被解释成技术专家现代主义对抗贵族保守主义。而在主要解决旧政权—资产阶级冲突的过程中，军队相对平稳地实现了现代化，与德国和英国一样。在法国，只有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军队才达成一致。奥地利军队在王朝鼓动者和国会—内阁控制之间仍是宗派化的，削弱了其斗争的一致性(Stone, 1975, p.124；Rothenberg, 1976, p.79)。1914年，俄国统帅部已经分裂了，不能把一个战略强加于不同的军队集团。俄国是在传统的将军防卫要塞的情况下进入战争的。而现代化者则通过铁路管制向前线输送他们的部队，造成北部和南部前线的协同作战(Stone, 1975, pp.17—27)。俄国军官团那时已有了许多对君主制逐渐失去耐心的自由派技术专家。在三年毁灭性的战争中他们抛弃了对君主制的忠诚。

但是所有的政权，无论自由主义政权还是独裁主义政权都面临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便是军官集团把中产阶级和旧政权团结在一起，它实际上却变得晦涩难解，隐瞒视听，且对政权和整个市民社会是潜在的破坏。那时贵族的日常生活已取消了军事和战术训练，更确切地说任何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取消了军事和战术训练。体育和操场格斗不再和战争联系起来。武装部队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内部等级森严有效地统一起来，与外部断绝了联系，对外部知之甚少。但是由于战争的工业化，在内部正在进行的事情十分重要。军事技术变得富于侵略

性，强调先发制人，并消除了狭隘的技术专家实施的烟幕弹，这个“烟幕弹”掩饰了外交的重要性和获取最终军事胜利的联盟建设。

统帅部的技术专家制订的计划能够抢在政客们之前实施。他们是否这样做取决于责任的沟通渠道。政党民主制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生来就反抗用军队对内镇压的暴虐的君主制。在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统帅部的计划通常受到政府的审查(Steiner, 1977, pp.189—214； Bosworth, 1983, pp.44—60)。1914年，法国军事动员受到普恩加莱的牵制，在距前线十公里处扎营，以避免贸然的边境冲突，尽管此举遭到将军们的抱怨。法国政府也否决了陆军元帅霞飞通过比利时进攻的计划，因为这会使英国持反对态度。毕竟英国和法国之间有关协约的一系列军事后果的磋商对内阁保密了五年，确实制约了外交官的行动。目前看来它会引起很多争议。在三个君主制国家中，指挥极不正规。没有内阁政府，君主是名誉上的统帅，但实际上往往由一个皇族任实际统帅，指挥取决于宫廷密谋。到1914年，奥地利军队是专制王朝“跨民族”的主要支柱。俄国和德国军队表面上创造了各自的帝国。德国军队把它对各国家惊人的影响程度归功于其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迅速而低伤亡的胜利。列强们往往把令他们强大的东西制度化。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军队的责任实际上减少了，因为，对德国国会负责的国防大臣的权力在总参谋长和军事预算权力面前衰落了。德国国会可以通过驳回七年军事预算来向该权力提出挑战，但是它从不敢这样做(Craig, 1955, ch.6)。

但是军队没有在就如何使用军事力量上达成共识。形形色色的陆军和海军派别互相竞争，对此几乎没有在政治上控制或在军事上进行协调(Herwig, 1973, pp.175—182； Kitchen, 1968)。军人们缺乏外交能力或兴趣。碰巧德国陆军是反俄派，海军是反英派；但是“统治集团”一点也不重视地缘政治、国际事务或中欧事务(后面所论及的)、联盟体系和经济动员。它把精力集中在战场的专门知识和国内保守主义上。在臭名昭著的1912年12月德国军事内阁会议上，将军们表面上劝说皇帝认

识到对俄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必要性——被认为是德国战争策划上的大规模升级。海军上将提尔皮茨抗议说军舰没有准备好，得到了十八个月的延缓时间(几乎到了战争实际爆发的当天)。但是这个表面上石破惊天的决策没有导致任何实际的战争准备。没有人重视外交准备(孤立俄国)、战争的经济问题，甚至陆—海军的协同作战问题。(Rohl, 1973, pp.28—32； Hull, 1982, pp.261—265)。陆军和海军被局限在狭隘的专家军国主义里。

君主政客和高级统帅是怎样走向战争的

在1914年7月末8月初，军事权力达到了它世界历史性的时刻。在7月28日和8月4日之间，当一系列军事动员转变成宣战时，战争实际上爆发了。俄国和德国的动员是战争升级的主要表现。

在俄国，沙皇和大多数政治家以及参谋机构的新领导雅努士凯维奇只支持反对奥地利的局部动员，而不支持反对德国的总动员——威慑奥地利，但不去挑衅德国。雅努士凯维奇在7月25日向沙皇，(也向德国人)提议说反对奥地利的局部动员是可能的。然而，他的高级指挥部很快通知他，铁路系统网络现状不允许任何短期的总动员。他们夸大其词，尽管局部动员可能妨碍以后的总动员，但局部动员还是可能的。在他们所关注的军事效率问题上，将军们做出了判断。而处理外交后果，即考虑他们可能实际同哪个国家交战，却不是他们的责任。

那时存在一种宫廷密谋的狂热。在7月29日，沙皇通过签署两个动员命令：一个局部动员，一个总动员而拖延了他的决定。是雅努士凯维奇拖延了这两个命令，但在以后的三十六小时里，他被命令首先去落实总动员，然后是局部动员，接着再进行总动员。在7月20日下午5点，他传达了总动员命令，这是走向战争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据称后来最高司令部的官员们拔掉电话以阻止任何更深的变动。德国人立

即听到了动员的消息并以为(像在自己的计划中)，这意味着实际的战争。 然而，高级司令部已向沙皇保证俄国军队能保持两到三周的防御动员状态。 在7月26日同德国大使的一次交换意见中外交大臣沙祖诺夫陷入困境，他问："对贵国来说动员当然也不等同于战争，是不是？" "也许在理论上不，" 大使回答，"但——一旦按下按钮，处于运动状态的机器就不会停止。" (Albertini, 1953, Ⅱ, p.481) 那个按钮，那个致命的比喻就这样开始生效了！ 但是即使是这种警告，意味着德国军事动员的准确的危险的警告也没有被俄国人领会。

俄国和德国领导人都不理解总动员和局部动员的区别，两者都使他们苦恼，且意义不大。 即使俄国仅仅动员反对奥地利，三国同盟的军事条款也迫使德国去进行总动员。 这将促使俄国立即进行总动员。 进一步说，在这一阶段俄国的任何动员都是错误的。 它激怒了德国，且在奥地利前线，它忽视了外交的军事后果。 俄国按兵不动的时间越长，奥地利的动员就会促使越多的奥地利军队从俄国边境奔向南边的塞尔维亚。 如果俄国决定再晚一点动员和入侵，则奥地利的防御将无法实现。 (Albertini, 1953, Ⅱ, pp.290—294, 479—485, 539—581;参见 Turner, 1968; Schmitt, 1966; pp.249—256,给出了俄国的观点。)

在学术研究和研讨中，找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原因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是十分恰当的。 但是在变化和危险环境中快速作出决定则不同了。 这种情况朝廷只是不能应付，军事朝臣想的只是狭隘的技术效率，外交大臣设想避免战争，但对军事事件一无所知，且在宫廷中影响很小。 大公爵们各自分立，皇帝集权的范围受到牵制；沙皇皇后受制于拉斯普廷。 俄国方面的逐步升级源于他分散的责任，王室的不胜任，以及特别容易被君主国接受的不得要领的计谋。 混乱理论适合此时的俄国。

第二次升级是德国在7月31日的反应：宣战准备就绪即对俄国或取消其动员或进行战争的二十小时的最后通牒。 德国动员意味着战争，无任何喘息的空隙。 1905年的史里芬计划的技术上的错综复杂及

精细的时间表进一步拓展了进攻性军事策略，这种军事策略在第十二章已探讨过。在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等所有中立国家的边境，军队已被动员和集结。在毛奇的1911年调整计划中荷兰被排除在外，但这使被进攻的其他部分成为必然。计划宣布，在动员的日子里，必须占领卢森堡的铁路，在第三天占领烈日(在比利时)。一旦德国开始动员，它不可避免的要打破中立，甚至会发生与法国的战争或与英国的战争。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不是各国高级统帅揭示出来的。直到7月31日，首相才被告知动员也包括立即打破比利时的中立。尽管所有外国高级指挥官都表示怀疑，其奥地利同盟对此也不知情。到8月4日战争发生，奥地利皇帝才知道烈日的情况。正如首相所认为的，这会导致英国发生战争。但改变计划已太晚了。德国走向战争的最后一步是由其高级统帅以独立的政治渠道进行的，没有全面的内阁。贝斯曼首相和参谋部机构首领毛奇是平等的，各有他们富有影响力的渠道，仅是臣属于皇帝。受人尊敬的提皮尔茨低于参谋部机构首领，但却又是一个更富影响力的宫廷人员。由于皇帝的不稳定性，他的情绪被关注和利用。从1912年起，毛奇赞成防御性战争。利用皇帝的好战性，他劝他在8月30日发布最后通牒，并在第二天发布最后通牒。他亲自向奥地利高级统帅保证，如果奥地利动员反对俄国，德国会全力支持。这时，奥地利外交大臣伯奇托尔德大声疾呼："是谁统治柏林，是毛奇还是贝斯曼？"(Turner, 1970, p.109)。提尔皮茨回答：两者都不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导间的集体协商从未发生过，无论在战争的政治策略问题的执行上还是在世界大战的前景问题上。我甚至未得到入侵比利时的消息，当入侵发生时立即引起了海军问题。(Albertini, 1957, Ⅲ, pp.195, 250—251)

从1912年起，外交部长毛奇和贝斯曼一直不断的煽动预防性战争。然而他们没有同工业家或金融家共同协商来讨论战争的经济后果。(Turner, 1970, pp.84—85)军人、外交家及资本家各行其是，促使他们各自不同的权利集团采取不同的专门政策。只有一个反复无常的

皇帝不受他们约束，高高在上，在柏林也是一片混乱。

在维也纳，主要的混乱集中于军方和外交势力集团之间，陆军元帅康拉德的凌驾于军方计划的最高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又无力控制外交，以决定奥地利的敌人是谁。迫在眉睫的德国的压力促使奥地利动员既反对俄国，又反对塞尔维亚。因此，在一场大战疯狂的改变着从塞尔维亚到俄国的边疆时，曾经发动过战争且急于准备反抗的国家有可能建立最统一的统治机构。

混乱也通过许多外交网络而下降。驻塞尔维亚的俄国大使哈特维格数年来一直鼓动贝尔格莱德反对奥地利。他的政府不批准，且宫廷支持者阻止他的免职。塞尔维亚首相实际上对在波斯维亚行刺大公爵的阴谋已有耳闻(它是通过在政府内的敌人组织的)。由于忘记了控制波斯维亚的是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他将警告错误的通知给了好战的奥地利内务部长，而内务部长封锁了消息。德国大使斯齐斯基鼓动奥地利好战分子，并在维也纳散布主战的外交部长杰戈的观点，而不散布犹豫不决的首相贝斯曼的观点，范 · 布罗讽刺的评论说，贝斯曼和杰戈组成了“一个公共异常灾祸委员会。”(Turner, 1970， p.86)在伦敦，德国大使里切夫斯基建议柏林要谨慎小心，但杰戈有时甚至是贝斯曼也对他的军事电文置若罔闻。

君主国确实富有侵略性，但这并不是因为任何孤注一掷的残忍的军国主义。第一：它们的侵略只是源于政体那几乎是随意的军国主义的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在国内或地域政治领域，它更主动顺从于军人，而不是自由政府。这是传统自由战争理论的合理部分，这种理论断言是独裁政体，而不是自由政体发动战争。(我现在这样认为)第二：那些军队已经发展为一种私有的特殊集团性的隔绝体。他们非常专业的特征致使他们更富有侵略性，专门性行动。第三：这场主要的灾祸性战争，是由于君主国局部性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偶然促成的。除了君主外，没有人拥有至高的权力和责任。正是这种内部的混乱夹杂着随意性的军国主义精神，使君主国处于危险境地。没有一个人能充分的控

制军队和外交渠道的影响来制定合理的、现实的决策。

我已经解构了国家或是强国。确实，“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行动者正式宣战，这一行为决定着世界的未来。然而，这个“行动者”实际上是形态不同的，是由派系化的权利网络形成的，体现着多重的结晶。在他之上便是执行者——平庸的君主和令人烦恼的总理、大臣以及外交部长——都依靠计谋来了解正在进行的事情。那么，在政党民主中又有什么不同呢？

政党民主

从康德以来，自由主义者(最近，甚至像玛格丽特 · 撒切尔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已宣称“共和政体”的“立宪的”自由主义的或民主的国家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而独裁国家则是好战的。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自由主义者有一种人类自然的乐观的天性——即自由个体将不愿走向战争——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视自由主义的政体为资本主义的，视资本主义为超国界的或世界性的。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道尔的研究使我们更加明确地给自由主义的和平性以定位。

道尔定义这样的政体为自由主义的，即它们拥有市场或私人财产经济，公民拥有司法权(公民权)，拥有代议制的政府，在这样的政府里，立法机构在公共政策上起有效作用，并且立法机构至少由30%的男性选出或由已达到一定的财富标准的能行使选举权的居民选出(在20世纪，他增加了妇女选举权这一标准)，他的政治标准就是我们所阐释的政党政治。他列出了18世纪晚期的三种自由政体——一些瑞士的州，1790年至1795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及美国。至1850年，有八个自由主义政体(包括英国)，至1914年有19个，至1980年有72个，然后，他确定了是否这些自由主义政权或其他政权曾经发动过现代战争。

道尔相当大胆地宣称：没有两个自由的政权曾彼此发动战争。但

他相当慎重的选择他的范围，即使如此他的证据在接合处也很牵强。他宣布 1832 年大选改革法案之前英国是不被当作自由政体的，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此不久之前，他曾同被认为是三个自由政府中的两个(法兰西共和国、独立之前和之后的美国)发生了大战。然而，即使英国的选举权(不均等的)向有财富、有成就的人开放，它也明显的符合其他标准。他的限制性历史时间框架也使之排除了 17 世纪后期的英国—荷兰海战，这场战争蔓延于那个时代最自由的强国之间。他说自由国家包括大约 1900 年的意大利，但不包括西班牙，但这两个国家此时有相当类似的“腐败”政体。这一点上，是有一点误导行为。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发现这样就避免了把美西战争作为一个例外。他也排除国内战争，然而美国内战发生在占支配地位的两个自由政权之间(以他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把他的断言限制在 20 世纪，那他会变成事实(到目前为止)——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发现。

但道尔并未像自由主义者辩护士那样在此停止。他也发现自由政权相当积极的走向反对非自由政府的战争，尤其在现代的第三世界。从二战以来，它们积极的疾呼并疯狂的侵略它们定义为“共产主义”(现在为独裁)的政体。为什么在这种自由政权之间的行为与其他类型政权之间的行为有如此不同的对照呢？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包含着许多真理。第三世界的政权，尤其是那些标明共产主义的政权，威胁着资本主义，而其他自由政权则不会。(尽管我不认为这是最终恰当的回答。并且，在共产主义可以构成威胁之前，美国在 20 世纪这段时间发动了对中美洲的侵略)。但在 19 世纪，在非自由主义政权也是前资本主义时，这一理论是没有很大帮助的。道尔给出了一个选择性回答：自由政权相信它们强烈的要求合理合法，因为它们依靠道德上自主个体赞同，自由政权尊重其他的道德自立，但认为非自由政权缺乏道德合理性，因而以意识形态的热忱攻击它们。

在道尔的对自由主义的有限辩护中，我发现了其优点。它保持了一点儿乐观，但又有些忽视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在一战前，他的自

由政权的外交政策比他所说的还要更大程度上受地缘政治的驱使。三个主要的自由主义强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的相互关系，在道尔把它们列为自由主义之前就主要以战争的方式顺利解决了。之后，不但英国，而且美国在它们利益一致的范围内通过殖民地种族灭绝或战争的形式来自由扩张。除非它们的殖民扩张或海军势力受威胁，它们不会发动对欧洲强国的战争，无论是否是自由主义政权。它们的自由主义(在对彼此时)在当时被定义为务实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对于法国来说同样真实。正如第八章所述，从1815年起，由于四国同盟的胜利结盟，法国被谨慎的中立起来，同时也保证了比利时和荷兰(相邻的两个自由主义政体)的中立。之后，若法国要攻击它们，将使法国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同时，对法国来说，要攻击比自己强许多的英国也毫无意义。(尽管它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确实相互冲突)

在皮埃蒙特—意大利成为自由主义政权之后，他的动机也同样的混合在一起。同法国的战争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可能性，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在该时期摇摆不定。但因为法国更多的受德国的威胁，且皮埃蒙特—意大利能从对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战争中获取利益。法—意联盟导致了1859年和1914年的战争。意大利更多的是通过地缘政治因素，而非自由主义的团结一致来确定了它在1914—1915年的位置(道尔提示的正好相反)。对于意大利来说，独裁的俄国攻击奥地利比自由的英国和法国攻击德国更为重要。同俄国联盟(与法国和英国联盟中立德国)，意大利从奥地利攫取了领土。

把目光投向剩余的欧洲自由国家，第八章已表明：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其他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经济依靠英国的全球经济。它们的外交政策部分的被英国主宰着，低地国家的地缘政治也受强国势力的限制。在19世纪期间，仅存的独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瑞典和丹麦。它们之间的战争必将是海战。1805年之后，它们都没有专业海军。无论何时，斯堪的纳维亚在成为自由主义政权之前曾经经历了一场长达两个世纪的权利和小型军队之间的遏止性平衡。瑞士的州由于

传统地缘政治的原因，无论它们自由与否，它都中立。 希腊没有自由主义的竞争对手。

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入欧洲之外的世界：由伦敦主宰的英帝国的白色统治充满了同样有选择力的自由主义，且在彼此攻击时没有地缘政治利益。 加拿大也没有攻击美国的任何欲望。 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根廷和智利在这段被道尔定义为自由主义者的时期内没有发动对彼此的战争(1891 年之后)。 对哥伦比亚(从 1910 年开始自由政权)来说，同它们两个政权的任何一个交战，在地缘政治上一直都是困难的。

以上详尽阐述了道尔的 1914 年前的自由主义政体。 我已找到了为什么它们不彼此交战的地缘政治原因。 但它们不是足以解释下面的两个例子——盎格鲁—美利坚认得和平与也许是斯堪的纳维亚内部的和平(为什么北部力量的平衡从未完全打破？)——两者都取决于更广泛的标准化的团结一致，而不是单纯的共同享有政治自由主义。 这并不是驳斥道尔，而是以两种方式修正他。

1. 在 1914 年，自由党民主政府由于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原因，比独裁专制政权有相对少的侵略性和军国主义色彩。 代议制国家在转移战争方面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包括道尔)所说的更好。 并非许多战争都简单的由单一交战国发动的。 大多数战争，比如一战，包含着一种外交政策急剧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变化的环境迫使利益的快速再计算。 自由主义者错误的羡慕独裁政权表面所拥有的隐私，灵活、敏捷和简洁有力的决定和行动的能力——这对于一个大国的统治来说，实行一项有效的世界政策通常是必要的(Kennan, 1977, p.4,他也是在道尔的同意下摘引的)。

但这章所陈述的正好相反，尽管没有一种政权完全连贯(每一个政权都是多形态的)，但能负责任的自由主义国家在追求现实利益时(包括转移代价昂贵的战争时)比君主制政权是好一点儿的。 我也相信，由于更加国际主义和较少的把单一的镇压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们在外交上争取联盟时比独裁政权更有优势。 这可能是在 20 世纪主要的战争中

民主政权战胜独裁政权的决定性原因。尽管它们不擅长军国主义，但它们在由联盟国动员更大的可动员性的军队方面更具优势。但那是第三卷要阐述的问题。

2. 道尔正确的强调了地缘政治的标准模式和思想体系，但标准模式不仅仅是政权形式。因为国家所共有的远远多于自由主义，因而存在于盎格鲁—美利坚和斯堪的纳维亚内部关系的限制性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种情形。分散的模式的共有将有助于防止不和理性的战争变为现实。因为它们并非为了某国利益而战——就像“一战”(尽管它们有助于继续进行部分的被意识形态定义的战争，就像拿破仑战争那样)。因此，民主政权与君主政权之间缺乏共享的模式加深了大国之间的误解，加剧了1914年的紧张局势。

第十二章已经阐释，政党民主政治在国内事务和军事事务上比在外交事务上更大程度的控制着政权。确实，在传统的对外政策的执行中，在政党民主政治国家中，这种阶级和政治政党的对外事务的相对漠视要比在君主政体中更多的导致孤立的自主。因为世界主义者，也是军国主义者的政权在宫廷中有更大的影响，在外交政策中有更多利益。但在危机中就不同了。不能花钱，不能建立同其他强国的正式约束，没有内阁和国会、大众媒体及众舆论的突发兴趣的多数人的赞同，不能宣战。在第三章，我把阶级、压力集团和民族主义政党作为潜在影响政治家和军队的主要权利网络加以区别分析。在危机中，它们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那时政策的选择可能早已限定。自由主义国家可能被限制在孤立的传统外交政策中。这可能导致一种毫无选择余地的悲剧性选择，即必须在战争和因后退而冒民族羞辱之险之间进行选择，或像格雷所说，“在战争和外交尊严间”进行选择。另一方面，政党中的政治家受公共所能接受的观念的限制。他们接受的公众舆论的基调很少是好战的。在没有民意测验的情况下去检验一个时代，我们必须依靠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为的公众舆论。在英国和法国，大多数政治家认为选民对传统的大国外交漠不关心，但除非自卫，他们是反对

战争的。 在变成第三世界的过程中，战舰是好的，由于较少的动员反对强国，因而外交困境也不存在。 在 1914 年，英国自由主义政府统治，包括三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和六个自由的国际主义者的内阁成员。 1911 年，该内阁以十五票对五票反对确定协约国。 罢工充斥着英国政治，并且在北爱尔兰濒临内战危险(可能在 2014 年发生)。 法国政治由于军事征兵的争论几近破碎，但却很少关注巴尔干半岛各国和阿尔萨斯—洛林。 法国媒体被戏剧性的政治谋杀案充斥着。 在普遍的漠视中，普恩加莱取得了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并操纵内阁支持他为所欲为的行动。 (Keiger, 1983;参见 Bosworth, 1983,关于意大利的叙述)政治家被期望私下里而不是公然的以战争相威胁来解决危机。 这就使政党民主政权产生了困难：尽管它们可能相信地缘政治利益需要坚定，甚至是准备就绪的战争，但它们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很轻易的这样说。 只有不执政的右派人士才可自由的这样做。

曾经有，且现在仍有，两个解决困境的方案，一个是由法国政治家，另一个是由英国政治家来举例说明的。 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帕勒奥洛将法国的方案比作潜在的决定。 法国政府曾向俄国将军和金融家们提供了军队和财政上的激励，诱导他们迫使沙皇结成法—俄联盟。 认识到现在已是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时间了，帕勒奥洛不断督促俄国领导人支持塞尔维亚，保持法国对它们的支持。 他没有能够将俄国的动摇或挑衅性动员报告到巴黎。 法国公共舆论绝不会瞥见俄国的犹豫或侵略。 如果需要走向战争，一定要保持坚定的自卫表象。 在危机期间法国外交很多都是不确定的(证明有罪的证件可能已被销毁。)很难估计法国外交欺诈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俄国的动员；它可能有助于动员战争，但这决不是决定性的。

英国自由主义政府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尤其在 Williamson, 1969 和 Wilson, 1985 关于下面段落的材料中)。 在总理阿斯奎斯默许的支持下，外交大臣格雷感到甚至不能就英国的意图向法国或俄国作出私下的保证。 他个人相信地缘政治逻辑意味着对协约国的尊敬，正如他的外交

顾问爱里·克劳和尼科尔森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相信对德国的摊牌已不可避免。这样，“政治家”已彻底被社会化为现实主义的价值观，致力于英国权利和荣誉的自卫，并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自卫。到大约1912年，对他们来说，德国寻求欧洲的统治权并取代英国作为领导大国的图谋已很明显。

作为一个近乎霸权主义的强国，似乎有助于形成一种高的道德腔调(就像今天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即使德国会再次使法国战败，这也不重要，因为他的海军不够强盛且不足以威胁不列颠群岛。重要的是，在他们已发表的声明中，这种结果，夹杂英国的懒散态度，将是一种民族“羞辱”，并包含着对他们已同法国达成的内在谅解的一种违背。毕竟，法国已撤军舰到地中海，并保证皇家海军将保持运河和平。格雷本人最好的表达了英国政治家一代所持有的荣誉意识：“当国家已衰落，他们在最后一息的自尊，如果确实无增长的话，也将不会消退。他们对民族尊严的坚守如塔西佗在最后一息对提比略的爱的掩饰一样。”(威尔逊在他1985年对协约国的研究中开头时引用的话。)

看看格雷是如何人格化国家的。它们具有人的特性，如尊严。在它们的位置上，有更多的现实主义的进退两难的窘境。英国地缘政治的利益在于与俄国达成的协议——来阻止发生同俄国的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并避免俄国涉足运河，这必须与法国达成协议，法国和俄国应友好相处。然而就战争来说它们都不能依仗英国的支持。因为以后他们可能被激励而去发动战争。因此，格雷的谨慎是有其地缘政治原因的。

然而，内政似乎最为重要。格雷和他的顾问认为——一旦德国攻击法国和比利时，威胁运河港口，英国舆论将一致支持以军事介入的方式维护英国的荣誉。但格雷相信，直至这件事发生，公众舆论和内阁多数将拒绝军事介入。把协约国转变成一个联盟或提出威胁德国都会分裂政府，因为几个大臣会辞职(宣战时两名已辞职)。这将迫使内阁辞职。保守党会支持格雷，并在自由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组成新政府。

这会毁灭自由党，甚至会导致爱尔兰内战。 因而格雷没有这样做。 他粗略的通知内阁并未征求他的集体意见。 外国政府被告知英国未做任何许诺，并对所有选择公开。 格雷对该结果反复公开和秘密声明，使好战派杰戈怀疑里切夫斯基大使在英国使馆关于英国介入的警告(Williamson, 1969， pp.340—342)。 德国外交家直到 7 月 30 日还相信英国将保持中立。 此时，他们已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如果他们不相信英国中立，他们不可能发动战争。

战后，贝斯曼和提尔皮茨痛心地抱怨英国的欺骗行为。 英国已诱使德国走向毁灭。 但事实并非如此。 格雷的行动是胆怯了些。 然而仍拥有他那真正的自由公众舆论的直觉所应允的尊严。 他不希望战争，在英国领导者中，没有倡导预防战争的，但形势要求的不是英国的尊严，而是提比略式或法国式的掩饰。 在公开场合或内阁中什么也不说，但私下里警告德国：若法国遭攻击，英国会介入；并不像法国私下警告俄国，任何挑衅都会减少英国介入的机会。 不像法国的欺骗、英国的自尊可能是导致战争危机的必要原因。 但格雷的错误不在于个人的习性或社会的无法解释。 它们源于不能解决军国主义政治的结晶；夹杂于独立现实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英国政治家，与自由主义政党和公共舆论主体相比，更多的拥护军国主义。 没有对英国地缘政治的最终决定，只有迷惑和世界大战。

因而在危机之时流行的观点，在政党民主中起了破坏性作用。 因为政党体系的调节，他允许对政体的传统孤立，然而又限制了他行动的自由，尤其他运用军事威胁的能力，同时，又没给政府一个实际可供选择的政策。 政府陷入危机，君主国的政治家较少受限制且他们不积极的政党民主政治活动不会被误解为漠视或懦弱，这两点英国早在四十到四十五年前已显示出来，当时德国已攻击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 (尽管当时还没有威胁德国的海军)。 除非决策者清楚的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有报应的行动会再次发生。 这就使得独裁政府更易发起攻击，就像二战前再次发生的那样。 正如道尔指出的，在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

间缺少共同的标准模式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会彼此和谐，而会彼此误解不同的多形态的结晶在外交危机中，这加速了战争爆发。

国会和政党很少创造外交政策。不稳定的半孤立的政府往往会使地缘政治衰落。他或像在英国一样导致犹豫不决，或把政府所操的舆论转向他所要求的目标，这两者在二十世纪的政党民主都曾出现。前者的典型出现于英国，后者的典型出现于美国，当时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操纵美国舆论转向战争。(Wilson 的资料请看 Hilderbrand, 1981, pp.133—135)

为进一步阐明这一点，让我从今天所认为的两个完全的民主政府中举出两例：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英国也在 1983 年卷入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在这两例中，几年以来，关于影响边远国家命运和使用一小部分可支配资源的决定，都是由一小群高层政治家和军事人员作出的，且实际上未受任何公共监督和影响。美国逐渐开始秘密地支持南越当局，为其提供帮助、军事硬件和顾问。英国开始减少在南大西洋的军事存在，也没标明任何持久的防御性义务。当南越衰落，阿根廷入侵时已是危机四伏了。美国和英国政府都不希望被看成是“败退”，且在一段时间里它们在国旗下和肤浅的政治民族主义下操纵了统一的公共舆论。当五十五万美国人在污秽的战争中被杀时，民族主义衰退了，美国撤退了。在它们用尽肤浅的民族主义之前，相对脆弱的敌人和好运气使英国取得了胜利。实质上，是两国政治家私自的决定而导致了其大规模的战争。尽管时间太早，还不能理解导致 1990—1991 年海湾战争的全部行动，但它们有相似的表象。

希望真正的民主外交政策的出现是很天真吗？在这种民主政策中，民众舆论和政党通常不会被困扰，它们可能在保存根深蒂固、大众社会利益约束的政权下公开讨论传统的外交政策，其中之一便是不会让许多人在无用的战争中丧生。

政党民主政治也是多形态的，主导性的民主政治是不连贯的，尽管

在君主国中表现不突出。不连贯的民主政治的出现并不在君主国的朝臣派系里，仅部分的存在于被认为代替宫廷、国会的机构里，但更重要的是，存在于日常现实主义者的隐私和政府自主的冲突中及全国“和平淡漠”的国家潮流里。(我们将看到在危机时他能转化成肤浅的民族主义者的夸张和言辞)这就引起了费解的问题：阶级和国家如此冷漠，以致允许他们的政府孤立了？果真如此，那是为什么呢？这两种政权类型不同吗？我将自己的焦点扩大到受欢迎的权力运作者身上，这主要是阶级和国家。

阶级、国家(民族)和地缘政治

再回到我的阶级组织的三种理想的典型结构中来。

1. 跨国界的：当阶级本身和组织跨越国家界限时，国家和民族大部分与阶级关系无关了。个人和集体利益由全球市场界定，而不是国家的领土。现代跨国阶级会更广泛的爱好和平。他们会拥有外国行业并监督政府把地缘政治转向调停外交。若跨国阶级在1914年已占统治地位，战争则不会发生。同样的推理可运用到无阶级跨国运动者中。例如，若天主教会能保留跨国力量达到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现实主义战争将不可能发生(尽管可能不是宗教战争)。我们可以猜想，现代这个时期跨国主义已衰退。

2. 民族主义的：一个国家的利益与另一国利益冲突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准阶级出现；在国际劳动力分工上有明显不同的利益。民族主义的阶级关系鼓励明确的领土统一和利益。鼓励侵略性的地理经济和地理政治。若这种阶级占统治地位，则大战可能源于民族统一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益的冲突。

3. 民族的：阶级本身和组织局限于各自的范围，而没有明显的指向外部世界。尽管阶级在国内进行争取国家认同的抗争，但他们在地缘

政治中是内向的、无力的。他们没有真实的地缘政治利益，也没有倾向于战争或和平。由于无知，民族的阶级可能把地缘政治留给专职的政治家。此后，战争或和平便不是大众的而是专业人员的责任(来自于旧政体)，且占主导地位的孤立的现实主义和外交优先直接延续到现代社会。国家阶级情绪可能被民族主义取代，这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或者是无知的，处于危机困境之中的阶级自发的把国内危机转向国外(例如，Howard，1970, pp.103—104)。或者是统治阶级和政权创建或操纵民族团结以便把国内的阶级对抗转向国际冲突(例如，Mayer, 1968、1981)。在这两种情况下，国旗飘扬，锣鼓阵阵，是外国人而非统治者遭攻击。在这种方式中，一个实质的政治民族主义是源于国家的有组织的阶级。

跨国阶级未导致战争，他们反对战争，但却被以下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完全统治。

1. 民族主义阶级，他们带有建立于他们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富有侵略性的地缘政治策略，能够理性的发动战争。这已被经济帝国主义论证：资本家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理智、谨慎的导致带有严重但可承受的战争危险的地缘政治，经济强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导致了利益要对战争负责。

但民族阶级也能以其他三种方式导致战争。

2. 国内阶级的挫败或侵略行动被统治者操纵来转向外敌，即社会军国主义的理论。由国内经济权力关系间接导致的阶级利益要对战争负责。

3. 国家阶级自发的发展为好战的陌生的恐怖：即政治民族主义的理论，政治权力关系和其本身要对战争负责。

4. 民族性困扰阶级仅存在特定利益群体的压制下，把地缘政治留给了旧政权，这要对战争负责。这是我所圈定的政治理论。这儿，经济权力的运作者避免了对外政策，使孤立的或与外交、军事有特殊关系的权力运作者对战争负责。

在政府和阶级类型的变动中，以上四种解释都起一定作用。单一的强国不能用来充分的解释战争或侵略。充分的解释必然牵涉所有的力量，我从资产阶级开始，依次来分析解释主要阶级。

资产阶级与经济军国主义

为了避免战争，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寄希望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跨国组织和资本的相互依赖性。一旦资本家的财产和市场模式设置成机构，企业将忽视国界去追求利益。阶级经济学家没有忽视国家，但认为国家间的贸易产生相互依存，由于国家资源不同，各国将优化它们最好的产业——即相对最终优势。尽管经济中可能产生争议，但战争破坏会使各国共同遭受损失。贸易也需要跨国经济协调以保证货币、信贷的转换顺利进行。因而资产阶级会支持和平的地缘政治。

英国自由主义者 J · A · 霍布森(1902)争论说，因为可理解的症结，帝国主义是当前资本的需要产生的。英国社会中的财阀拒绝同工人分享国家产品，因而产生剩余资本，然后向帝国输出。霍布森的理论被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列宁和卢森堡修正，他们补充说：利润下降，而非低消费是资本出口的根源。对于霍布森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家的竞争压制着国家走向领土军国主义和战争：新军国主义和对非洲的争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这种经济军国主义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错的，并没有剩余资本。最富侵略性的大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拥有最少的剩余资本，只有几个殖民地因为特定资本家的压力在此时建立；几乎没有被看作是好的倾销市场；且 19 世纪晚期的殖民扩张没有为任何国家奠基。18 世纪的民族兴盛让位于整个 19 世纪在疯狂的民族抵抗中对贫困领土的攫取，殖民竞争在 1880—1900 年间达到顶峰，这主要是英国同法国和俄国的较量。然而那时战争并未发生。这些强国并未发生战争。这种殖

民竞争实际在1914年以结盟形式作战。尽管殖民冲突开始包括德国并经常涉及兵戎相见的备战紧张局势，但它们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的。这时期殖民竞争并未立即攫取利益，也没导致战争。(Robinson and Gallagher, 1961; Fieldhouse, 1973， pp.38—62; Kennedy, 1980, pp.410—415; Mommsen, 1980, pp.11—17)

但经济军国主义理论仍可部分的保留。尽管殖民地并非如此重要，但更广泛的经济竞争是重要的。菲尔德豪斯错误的认为军国主义背后是权利和政治，而非利润。在埃及、苏丹和中亚，他标榜为政治的冒险活动被用来保护同印度的交流，这对英国来说经济上也是必要的。而且，几乎没有军国主义，没有为了自己的权利追逐是同考虑获取经济利益完全分离的。即使英国的新帝国主义不是由于倾销资本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因：在同德国和美国的竞争和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中，保持英国贸易和金融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没人知道非洲市场价值多少，但让别国攫取非洲然后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这是相当危险的。毕竟，南非是通过钻石和黄金的发现而由一个毫无价值的地区转变成这个时期一个获利丰厚的殖民地的。从这方面考虑，韦勒(1979)和蒙森(1980)总结说，政治和经济不应被分离。

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把定义阐释得更精确比完全抛弃他要好。问题关键不在于经济与政治目标的对立，而是两者混合的变动。请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八章所分析的六种国际政治性经济。

一端是市场利润，即一种资本主义的利润概念，这种利润是利用市场优势通过制定自由贸易条例而获得的。这种市场不被看成一种没有领土疆界的特定地理上的地区，而是一套跨国界的分散的确定的动能性活动，可能遍布全球。国家与利润无关，这是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并仍统治着经济学。这种理想类型在其内涵上是跨国的，是和平的，在走向战争时他肯定不会被理睬。

另一种概念更好的全部体现了领土意义上的一致和利益，并带有对领土的权威性控制。最具领土性的概念是地缘政治军国主义，把入侵

和它的地缘政治权利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对领土的控制定义为利益，这看起来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这种入侵不会是完全的非经济的即使希特勒(他没认真思考经济学)也想利用他所征服的领土资源，甚至有时把侵略直接指向经济目标（例如：罗马尼亚的石油）。但他的主导性逻辑并不是受国内经济的驱动。侵略的目标的选择主要不是基于资本家的利润观念，而是政权对地缘政治同盟结构和军事平衡的再计算。如果阶级和其他权利主体支持这种地缘政治性军国主义，它们就会在政治和军事利益面前屈从，举例说，就像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一种混合的市场—领土利润观念。保护主义是最温和的，仅仅是运用国家权利，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关税或进口限额来保护国内经济。重商主义在有争议的国际合理性法则中运用了更富侵略性的技巧，如津贴和倾销出口产品，国家指导国内和国外的投资方向及国家对垄断或国内企业在国外运转的支持等。这两种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便是资产阶级组织成为温和的民族主义者的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是重商主义政策可能会被其他大国定义为敌对政策。但作为回应，它们可能不会以大的战争相威胁。因为战争会威胁更多利益。更可能的后果是对保护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外交妥协。

然后我们继续探讨两种利润导致的军国主义。经济性军国主义控制外国领土，若需要时甚至可通过战争形式实现。正如霍布森和马克思主义者提示的那样，这种类型是由于国内经济或资本的需要而产生的。资本组织本身彻底变为民族主义，资本家阶级指向的是地缘政治和战争，而非相反的东西。这在19世纪晚期社会帝国主义获取殖民地时很少见。他还在另外的地方吗？最终，在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利润驱动会压倒国内阶级(或其他)的不满，并通过对外冒险活动来转移视线，冒险活动不获利，但他提高了利用国内阶级和利益群体的能力。

战争可能源于两种广阔的经济方式：或者是政治政权和军事特权阶级的地缘政治性军国主义将市场放在一边，尽可能的扩大资本家重商主义的合理性，或者是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的军国主义放弃他自身市场的

合理性并追随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政权和军队。第三种方式：妥协，也是可能的：战争源于资本家和国家权利网络的整体性，并牵涉到利润观念问题。

资本家是怎样认为的呢？他们很少系统的思考这些问题，但他们的设想大相径庭。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述，资本是在国际和国内部分之间分裂的。一些资本家确实全国性的联合在一起，由国家辅助来控制出口、进口和对外投资，但另一些则对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更感兴趣。其选择要受经济因素流动费用、贸易条件、自身规模及利润等的影响。(Gourevitch, 1986, pp.71—123)很多资本家赞成对第三世界人民的侵略性的地缘政治。但几乎所有资本家在对欧洲强国的态度上更谨慎，因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和战争的代价将是非常昂贵的。在欧洲，大多数仅实行了实际的保护主义，这并不表明是基本的国家对抗主义。关税在世界市场内与经济和金融相互依赖生活。一个主要特例(后面探讨)是俄国和德国的谷物竞争。它们的高关税使两国疏远并激起了德国的军国主义。

在别处强国的排列不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导致的。奥地利—德国联盟没有给奥地利带来经济利益。它需要外国资本，就与强国联盟，却什么也没得到。(Joll, 1984a, pp.134—135)法国和俄国变的在金融上互相依存，但这是它们互相谅解的结果而非原因。对法国和德国来说，经济竞争不是主要问题。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各部门之间不同)的竞争存在，但并不多于同美国的竞争，同美国的竞争中两个强国都无敌对关系。无论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把侵略性民族主义指向源于工业或商业资本家的竞争。两种经济实际上更为互相依靠。在1904和1914年间，英国成为德国最好的顾客，德国成为继美国之后英国第二大顾客。(Steiner，1977, p.41; Kennedy, 1980, pp.41—58, 291—305)。战争中强国的排列，从根本上不是源于保护主义、重商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

然而，如在第九章所述，至1914年，一种民族主义经济竞争观念盘旋于重商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之间，并扩展开来，尤其在德国，更坚定

的要求在国外的领土控制，以“中欧”和海军的“世界政策”的口号表达出来，这使同盟所带来的“包围”理论顺理成章(后边论述)。法俄联盟也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无论法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是什么，现在有足够的经济原因来支持沙皇。侵略性领土模式的利益和竞争存在的地方，便会恶化经济民族主义，但经济竞争不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原因，而是其产物。军事和政治权利运作者诱使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而非反之亦然的事。

地缘政治力量总是影响经济理论。没有任何利润观念真正和纯粹在经济上要求客观。他们的经济利益和选择权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其他来源。市场利润最近已成为一种“英国与启蒙运动与朝代”理论，他依靠的是共享的欧洲思想意识和外交，依靠的是英国海军和商业权利。他易受谴责之处在于他伪装了英国的利益。随着英国势力的衰退和对欧洲大陆事务卷入的减少，市场理论的基础似乎不那么客观了。尤其在德国那儿兴起了一种更受保护的被权威性的组织起来的。以领土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正如第九章所指出的，这作为经济理论比作为市场替代物更为准确。由于发展起来的普鲁士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市民的关系，这种资本主义正在运转并有相当的影响力。是这种权力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加强了重商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

但即使是民族主义经济竞争显著的地方，他也很少刺激资本家的战争贩运活动。资本主义的压力集团通常在殖民政策上是积极的，因为特定的工业或商业群体在特定领土上的生死攸关的重要利益，例如：大多数国家看到很小但有影响力的中国议事厅的出现急想在那儿深化西方的帝国主义。(例如 Campbell, 1949)但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很强，因为它们害怕代价昂贵的战争。因而，很少资本家在对其他强国时，能像流行的服饰和民族主义政党那样好战。参战会损害全球经济，这不是他们的经济利益所要求的。即使军火生产商也跨国化供应——在军事秘密中没有政府禁运——因而他们比起热战更倾向于冷战。战争的经济衰退如此明显，以致所有大国都希望战争时间短：数月内，整个

国际经济将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家倾向于给出和平性建议，但他们在制定决策的决定性场所——内阁、部、宫廷中是无足轻重的。 在敌人攻击面前，没有政府会采取详细步骤来发展经济计划组织。 在德国(正如在欧洲其他地方)，外交部几乎是排他性的，由知识贫乏，对经济事务不感兴趣的贵族组成。 德国议会中的民族主义批评家批判了这一现象，但毫无作用。 (Cecil, 1976， pp.324—328)。 没有政府会在敌对主义爆发面前计划经济征服(德国的侵略计划，Fischer 编目 1975， pp.439—460，在战争期间出现)。 资本家曾以跨国组织为代价发展某些民族主义者，但这是增长的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束，而非原因。 战争基本上不是根源于资本家的经济理性或重商主义者或经济帝国主义的多样性。

社会帝国主义和民众阶级

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是“内部政策”的紧张局势替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结果吗？ 政府把战争看作是解决这种紧张局势的方法吗？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答案很清楚是肯定的。 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把与塞尔维亚的战争看作是解决内部民族问题的唯一方式。 因为奥地利的侵略是战争的主要原因，这一“内部政策”是有决定性的，正如威廉森(1988)所观察的那样，“内部政策”是不可区分的，因为他跨越了奥地利的边界。 在涉及不同的国内问题和策略上，社会军国主义通常成为争论的话题。 君主国的问题是地区民族主义，不是阶级，哈布斯堡王朝的动机是具王朝性的，同操纵或合法相对无关。 让我们考察一下其他的权利。 阶级自发的或被操纵的政治民族主义要为战争负责吗？

正如前几章所指出的，在整个 19 世纪，阶级斗争变得更为广泛和政治化。 代表各阶级的组织在全国各地及国家宪法中抗争，并且一些阶级取得了国家公民资格。 公众舆论通过政党和压力集团之间的竞选活

动而制度化，并通过发行大量报纸来调节，军队招募带来大量军事经验。 因而国家阶级的“内部政策”与对外政策的执行关系更为密切(反之亦然)。

阶级地缘政治的不同是通过它们所拥有的公民权利的多少来确定的。 公民权利越完全，政治民族主义就越多。 我是从拥有最少公民权的阶级开始论述的。

在俄国，工人和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外，在奥地利和德国，工人大部分被排除，农民依据地区而被更大程度的排除在外。 尽管他们在三个政党民主的至高无上的国会中被给予了选举权和代表权(至少在英国给予了选举权)。 但工会和工人的党仍对国家的政治化经济不满，许多美国农民和法国农民也如此。

因而，对大多数工人和农民来说，国家并不真正是他们的。 当然，只有少数工人好战者是社会主义的皈依者。 尽管社会主义观念通过核心工业广泛传播。 (见第十七、十八章)。 农民也比我们所期望的更依恋于保守主义的组织(见第十九章)。 但许多农民仍部分的被父辈的雇主、教堂、种族语言社区统治着。 他们可能忠诚的跟随着自己的主人走向战争，就像有史以来的仆人们做的那样。 大众文学和大众媒体可能给国家、国旗和君主增加一些现代的、分散的选染的情感。 但一些局部的能动员工人和农民的权力组织，尤其是基督教堂和地区民族性少数民族社区，对集中化的民族国家有种矛盾的情绪。

农民通常是反战的，因为他们在军队征募伤亡中受害最大，正如我在第十二章中强调的那样，他们对军事的忠诚不在于民族主义，而在于军事纪律，这种军事纪律仔细地将本地部队的忠诚塑造成对更多部队的忠诚。 那些军队的象征日益民族化，但士兵和海员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由“有组织的迂回策略”和纪律产生，而不是由对真正国家公民权的意识形态的“自由”依附产生的。

因而，工人和农民并不强烈坚决地支持国家，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在外交政策中利益相对很小。 他们更关心为争取工会组织的

权利、受教育的机会、累进课税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或者说他们仍受制于当地社区陈旧的依附关系。但人们确实倾向于成为反军国主义者。因为军队仍压制他们(第十二章)。且他们国内舆论界的自由联盟经常是强烈的反军国主义者；而农民经常把军国主义、集权主义和军事征募等同。劳工运动反对军事预算，倡导社会和平主义，并论证说资本家和王朝战争都不包含人民的利益。在俄国，在农民和同样被排除于公民权利之外的中间阶级组织之间广泛存在这种情绪。在奥地利，民族性也被排除在外。在一些农民和中间阶级中产生了相似的激进的影响。在政党民主政治中，由于很少被排除在外，所以工人中既没有很多的军国主义，也没有对军国主义的很大怀疑。

但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的民族主义严重加强了国际紧张局势。一些“工人贵族”的理论宣称工人阶级被牵连到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竞争中，但他们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所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运动时期中代表名额明显不足，包括在第十六章提到的所有压力集团和暴动中有关的帝国冒险活动，如布尔战争或美国入侵菲律宾(Weber, 1968; Price, 1972; Eldridge, 1973; Welch, 1979, p. 88; Eley, 1980)。是谁真正导致了战争？显然不是工人阶级或农民。

工人阶级或好战者也被视为一个大的、超国界的团体。它的六条主要的思想体系(在第十五章中已说明)：互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几乎总是超国界的。因而，这大都是经济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观点。宣称他们同马克思一样，也是超国界的。尽管民族主义损害了美国劳工的超国家主义，但它增强了它的反军国主义性(为保美国清白，它反对对外的冒险活动。)几乎所有劳工领导都赞同共产主义宣言的那句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的圣歌是《国际歌》的不同版本。下面是不坚定的工团主义者的版本(Dubovsky, 1969, p.154)：

> 起来，忍饥挨饿的囚徒！
> 起来，世界上不幸的人！

为了正义怒斥罪恶,
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诞生。
世界将立于新的基地之上。
我们曾一无所有,我们将拥有全部。
这是最后的战斗,
让我们各归其位,
工业联盟
将是整个人类。

在主要的工人运动中很少有明显的民族主义，除美国外，也很少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特别是特定的时期内)因为“人类只有一个”。甚至连法国那激进的社会主义——法国和马赛的革命传统——在这一时期也有些沉默。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地区民族主义者，奥地利—匈牙利和爱尔兰的社会主义者试图获得他们的民族主义——但很少社会主义者支持军事人侵或国外战争。

社会主义也有两个小的但很有影响力的超国家的基础，他们与流亡者和知识分子密切联系。流亡者是强迫性的超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是积极的吸收超国家主义。整个19世纪，工匠好战者，由于流亡而被君主国惩罚。他们聚集在自由政权的日耳曼小邦和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及美国。只有在美国，他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相互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主要是流亡者和国际性教师及新闻工作者。这是超国家主义启蒙运动的真正继承人。19世纪晚期，在俱乐部、咖啡屋、小酒馆和杂志的流亡者和知识分子网络成为跨国界传播社会主义的潜在基础。马克思、布朗基、巴枯宁、傅立叶、列宁、卢森堡的读者及其家族很少能读一种外国语言。几个放浪不羁的世界主义者，主要是犹太人，作为翻译者和出版者就足够了。由流亡工匠和放浪不羁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在1864年建立了第一国际。在这个联盟之前曾建立了有效的国家组织，左派分子和好战者是坚定的超国家主义者。

但大量劳工组织成为民族的组织，无论它们的思想意识是什么，它们的活动没有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当保护主义、经济主义或工团主意想要回避国家时，它们通常是地区性组织，很少在国外。互助主义者向民族主义国家提出要求，因而能加强国家的领导。它们所取得的每次成功都加强了国家的承受力。民族国家是产生国内集体权利或个人权利，财富或安全的唯一现实环境。劳工是民族的，因为国内社会被民族国家权威性的控制着(这一点马克思从未认识到)。这使工人同资本家分离，现在的资本家很少需要民族政治的调节。他们能允许体现资本家财富关系的市场来统治，实际上，资本家组织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一些是超国家主义的，一些是民族主义的，还有一些是民族政党的。与之相对照的是劳工活动和组织被完全限制于国内。正如尤·盖达所说："尽管我们可能是国际主义者，但各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在国家范围内为整个人类的解放而工作。"(Weber, 1968, p.46)

国际组织可能会拥护超国家主义的观点，但到了1890年它已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的委员会，每个代表都代表着民族利益。民族主义国家积累和调控劳工的真正场所(Olle and Schoeller, 1977, p.61)。这使劳工的反战情绪中存在两个弱点：

1. 因为他的实践全部是民族主义的，所以他对地缘政治是漠视而非积极的。普赖斯总结说(1972, p.238)，与其说英国工人反对布尔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不如说是对之漠不关心。第一国际和其他国际劳工大会仍然谈论着商店，却没有有效地决策制定机构或大众追随者。面对战争，各国工人阶级的政策同其他国家互不依赖，从组织上说，这减弱了劳工们阻止战争发生的能力。

2. 人们对于军国主义的担心主要是国内原因，因为它承担国内镇压的角色。尽管人们担心自己国内的军国主义，但如果外国政权的军国主义有镇压性，人们会更怕外国政权的军国主义。法国工人害怕德国侵略，因为这是对共和国的反动威胁。德国和奥地利工人害怕俄国，因为它威胁所有工人的组织。只有受制于反动政权的俄国免受影响。

在其他地方，担心能被用来消除工人对战争的支持。

在 1914 年，这些弱点瓦解了超国家主义者和劳工领导们的超国界的鼓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大多数领导担心，如果他们反对战争，他们数十年建立起的影响深远的政党和工会组织将会在其他阶级的战时全力支持下被镇压。国外无产阶级不能保护他们。德国工人只有德国的组织，且这些组织必须全力保护。工人也不相信，他们能对抗政府所作的宣传，即主要的敌人是反动的俄国(Morgan, 1975, p.31)。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动机，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形式上继续反对军国主义所激起的战争。但他们大多数人认识到工人能够，也应该团结起来来保卫共和国。英国社会主义者没有对外政策，但他们追随他们的自由党同盟。工人阶级组织追随富有同情心的政党和政府，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有侵略性，而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受民族局限的，因而工人阶级不能阻止战争的扩散。

有更牢固的公民权的阶级也是民族性的组织在一起，但国家是他们的。因为国家象征着他们想象中的社团，他们更容易与它的“伟大”、“荣誉”和地缘政治利益相连。随着国家变为民族国家，国家的宗教原因可能变成宗教的民族利益。前几章已说明了中产阶级加入民族社会，成为投票者、陪审员、家庭的主人、仆人雇佣者、后备军官及国家教育、文化、市场的参与者。蒙森(1990, pp.210—224)制定了 19 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变迁图示，它开起了世纪自由主义和相当的和平主义，但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民族特性和感情变得富有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如种族优越性，陌生的恐怖，为国家和种族生存而进行的生死斗争以及流行的军国主义出现了。然而，在第十六章我有点怀疑这种被广泛持有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特点。民族主义的力量和特色在国家间不断变动，民族主义吸引的政治野心家和高等教育者远远多于剩余的中产阶级部分。它也仅是倾向于扩大政权意识形态并可能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政党民主在旧的世界主义和新的帝国主义对民族伟大性的认同上产生分裂，中产阶级也分裂了。

因而，无论是规模侵略性民族主义还是被政党民主政府蓄意操纵的社会帝国主义，都没有多大意义。右派集团拉拢它，却没有成功。一些敌视外国的人，包括报业巨头以好战的忠诚来鼓吹他。他们使政权不断变动，动荡不安。但他们不会变更其政策。英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模糊的，包括自由主义信念，他们认为国家带有世界性的人道主义、基督教主义、民主文明和更多的帝国情感。帝国主义具有对殖民地更富有侵略性的种族歧视特性，但在战争频繁的欧洲，它通常更具有防御性。政治民族主义倾向于扩大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法国及英国政府的真正防御性重新武装的政策。自由政府不怕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而是要求和平公正的公众舆论。这些国家有相当的社会压力，如英国的阿尔皮斯特罢工浪潮、法国的罢工浪潮及征兵暴乱，但政府并不经常用流行的帝国主义来解决这种紧张局势。

民族认同当时植根于集中和广泛的社会实践之中，但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如此。以前我们知道经济型帝国主义存在地缘政治的根源。因而，政治民族主义缺少民族阶级组织本该提供的精确的那部分经济利益。尽管有根据证明英国担心德国的竞争和保护主义，大众的反德情绪还是更加扩散开来。民族主义者将其帝国和海军的重要性置于直接的经济要求之前，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忽视了经济竞争，而反复谈论阿尔萨斯—洛林及对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军事力量的威胁。然而，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主义是不会稳定的。反对者的身份可能会迅速转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英国和法国民族主义从主要反对对方而转向反对德国。似乎为战争而存在的富有侵略性的沙文主义在危机中突然出现，并在此后同样快速的衰落。1914 年 8 月战争爆发时，劳合 · 乔治嘲讽说：“仅是过了个周末，战争就盛行起来。”(Albertini, 1957, p.482;参见 Weber, 1968, pp.31—32 关于法国迅速转变立场的问题。)

这种肤浅的不稳定性会在危机之时扰乱政权或被政权利用。如果政府在周末宣战，国家将积极的追随(主要是中间阶级)。这是在政党民主中实施肤浅的民族主义的诡计——现在仅是如此，只不过现在的国家

还包括工人阶级和妇女。但诡计是有局限性的，且一贯如此：最基本的中产阶级选民并没有预见到在另外一个强国的战争中所需的额外费用，更不用说牺牲生命了。(Steiner, 1977, pp.250—253)法国和英国政府还怀疑工人阶级的忠诚，即使是德国首先发起攻击(从 1914 年他们就为这个理由欢呼)。政党民主政府谨慎的关注着政治民族主义，但他们并未被严重的转移视线，且战争开始后他们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在另一个极端，在君主制的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更不明显。(Lieven, 1983, pp.38—46, 153—154; Kennan, 1984)1900 年之后，巴尔干半岛的危机助长了泛斯拉夫的民粹主义，这促成在斯拉夫民族反对日耳曼德国和奥地利的斗争中俄国的领导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泛斯拉夫主义者是中间阶级，很少得到工人、农民或贵族的支持。但俄国中间阶级的公民权是不明确的。与西方富有侵略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同，泛斯拉夫主义不局限于右派政治。从沙皇崇拜到极度的无政府主义，它无处不在。但政权并不热情友善。欧洲最反动的君主甚至不想告诉人们他的外交政策的执行情况，更不用说以普遍法则的形式使其合法化了。

因而，除德国外，对社会帝国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操纵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公众和政府习惯于彼此孤立。工人阶级和农民对外交政策过于淡漠，中间阶级民族主义的主要成分有过分的自卫性。在中间阶级，农民或工人阶级之间有相对较少的民族或超国家组织。他们的在主导性或地区间的相互封锁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中间阶级的积极与肤浅，农民的顺从，工人阶级的勉强以及军人的纪律，通过这些漏洞他就能在他们的赞许下发动战争。[1]

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和政体的变质

德国的侵略助长了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向世界大战转变。即使其他

地方社会帝国主义不明显，如果它在德国盛行起来，它的理论也会盛行。这种理论在德国的历史学家中间相当的受欢迎。自从费舍尔的关于德国战争的报告发表以来(1961，英文版 1967；1969，英文版 1975)，许多人已肯定了他的两个基本观点：德国的领导阶级具有持续的侵略性，准备并且希望在 1914 年之前进行一场为期十年的大战，它的动机既是为了通过社会帝国主义来解决国内阶级的紧张局势，也是为了取得世界的统治地位(Berghahn, 1973; Gordor, 1974； Geiss, 1976, 1984)。在政权冲突发生之前，只有费舍尔在对政权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强调的问题上作了让步。（Wehler，1970,1985)。我们不能回到外交政策的首要性或摈弃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理论。(Mommsen, 1976; Joll, 1984b)

德国的军国主义是无可置疑的。俾斯麦也操纵军国主义向低消耗的社会军国主义发展，即用殖民地来转移国内阶级和其他社会紧张压力。(Pogge Von Strandmann, 1969; Wehler, 1981)。以后的政府照此效仿。一个普鲁士部长说，他希望殖民政策将把国内视线向外转移，但这仅发生在一定限度内。因而，我们必须在德国国会中提到外交政策问题。因为在外交事件中，民族情绪通常能团结起来。我们外交政策的无可否认的胜利将在德国国会辩论中留下好印象，并且，政治分裂因之会缓和下来(Geiss, 1976, p.78)。

范·布罗总理在跟德国皇帝的一个亲信谈话时讲的更为深入：获取对君主普遍支持的方式是激活“民族主义信念”。一场胜利的战争会解决很多问题，就像 1866 年和 1870 年的战争挽救了王朝一样(Geiss 1976, p.78)。

马克斯·韦伯持有一种自由帝国主义的观点：

> 我们必须认识到，德国的统一是一个不成熟的恶作剧，这种恶作剧是国家在很久以前制作的。且如果这是德国世界强权政治的结束而非开头的话，由于其昂贵的代价还是不实行的好。

韦伯倡导的不是帝国主义代替改革，而是帝国主义和改革一同来实现德国的稳定和现代化。(Mommsen, 1974, pp.22—46)

在其他国家，体现这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观点是罕见的，并且，德国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团结国民反抗外国人。帝国的敌人被看作是外国势力和国内敌人的结合体——社会主义者、左派自由主义者、少数民族，并且首先是天主教徒。他们或多或少地被认为同外部敌人有关系——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与国际阴谋有关，天主教徒先是与奥地利，后又与罗马教廷勾结，教皇和斯拉夫人和俄国勾结，阿尔萨斯人与法国，自由党与英法勾结等(Wehler, 1985, pp.102—113)。政体社会帝国主义体现了部分分而治之的战略：团结核心的忠臣，新教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然后是中间阶级和天主教徒，孤立社会主义者、左派自由主义者和少数派。

然而，德国政府并未稳稳地操纵社会帝国主义走向世界战争(如Fischer、Geiss和Berghahn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政府期望能实行一种转移国内紧张局势的外交政策。但这种政策同发动大战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在这种政策和发动一场反对欧洲相邻的三大强国的两线作战的战争之间存在一条豁然展开的鸿沟。这样一场战争能去解决阶级斗争问题吗?

布罗不这样认为，他继续他以上引述的言论：另一方面，一场不成功的战争将意味着王朝的结束。他在1911年这样解释：历史显示，战后必有一段时期的自由主义，因为一个民族要求赔偿在战争中的牺牲和所作努力。但任何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战争会强迫王朝作出让步这种事，在以前似乎闻所未闻……谁会去做，并慎重的做考虑考虑后果(Kaiser, 1983, pp.455—456)。

他的继任总理在1914年7月进一步阐述："不能预见结果的世界大战必将极大的加强社会民主力量，因为它追求和平并将颠覆许多王权……"一场战争，无论结果如何，他必然导致现存秩序的巨变。

这不是离题的、不加考虑的评论。这是德国战前最后两任总理在

一场辩论中提出的，这场辩论是关于左派和右派在民众战争动员和阶级斗争中的影响的。尽管一些极端右派分子认为战争可能再度激起对王权的支持，但大多数保守分子认为的正好相反。大多数左派分子也这样认为。正如列宁在 1912 年在奥地利流亡时所写的：“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对全西欧的革命来说将是很有用的事情。但看起来弗兰茨·约瑟夫和沙皇尼古拉不可能给我们那种欢乐。”

如果能够保证胜利，社会帝国主义将是一个极好的政治战略。但战争本身不能提前保证他的胜利，且德国政治家们在这种自信思想的担架中也不可能进入大战。他们知道战争会危害社会秩序。我们不能谴责 1914 年德国的深思熟虑，前后一致的社会军国主义战略的侵略。

但“内部政策”和多种社会帝国主义可能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扩大德国的侵略(如 Kaiser, 1983 和 Wehler, 1985 已指出的那样)。如第九章所述，国内和地缘政治也被牵涉进来。从国内说，政府倾向“政治大联合”，将“生产性”(即有产者)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帝国的敌人(国内和国外的)。政府将在生产阶级中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贝斯曼将这描述为“对角线政治”，自由主义，“中欧”和“世界政策”三个竞争性国际政治型经济和外交结合体的出现，都同国内政治相牵连。对角线政治背离了自由主义，因而包含更富有侵略性的地缘政治。但他们又不在其他两种可能性中选择，因而向非现实主义的灾祸转移。

自由主义集中于像汉堡那样的贸易货物集散地轻工业和金融业资本上。它得到政权的支持，尤其是在威廉大街，它的外交官经常促成国际调停。他们推理说：法国割让且德国占有了阿尔萨斯——洛林；英国和俄国也不必对抗。1890—1894 年之间的总理卡普里维转向了对国内改革的自由主义的包装，转向了自由竞争的政治型经济，转向了英国的调停。但皇帝撤销了他的职务，而不是去调停工人阶级。之后，自由主义衰落了，失去了政权的支持，军事和政治民族主义者也反对他的对于保守主义者和农民都无利益的政治型经济。

由普鲁士容克领导的土地保守党，超越了保护主义而转向扩张主

义。 它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变成了俄国，内心主要的担忧是波兰劳工。海关关闭了进口俄国谷物的德国市场，这对于俄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打击，俄国需要以谷物出口来偿还机器制品的进口和债务。 俄国转向同法国联盟，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很糟的外交消息。 许多保守主义者通过传播条顿和斯拉夫人的种族冲突恶化了这一消息。 在财政和社会上保守的容克最初不愿投票赞成为军事侵略而征税和动员大量军队，但1909年之后，当他们想通过与民族主义政党联盟来扭转日益下降的国力时，政治动因降低了这种抑制性。 他们精选的工具是军队，他们的思想意识是沙文主义和日益增长的种族主义，他们的地缘政治视俄国为敌人，视奥地利为同盟，视一个德国统治的中欧为解决方案。 他们倡导混合的重商主义、经济帝国主义，通常指向西方的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

一些重要的工业家也支持保护贸易制度和扩张。 他们的动机往往是重实效和注重市场定位，但他们向政权的合并则增长了领土的利益概念。 因为主要的竞争者是英国、美国和法国，所以许多人支持世界性的重商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在对非洲的争夺中，他逐步升级为经济帝国主义(与政权自身的地缘政治帝国主义相连)。 当德国意识到在殖民争夺中起步太晚而无利可获，只能冒险与欧洲帝国交战时，这种观点平息了。 工业家们却没有就此止步。 他们对向东扩张也不感兴趣。 然而，源自于独裁政权的市场压力支持了侵略性的重商主义。 在1897年，这将他们和其他人卷入了海军。

德国海军的建构具有复杂的甚至个人习性的原因。 皇帝的个人激情、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的传播技巧及宫廷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 但伟大的德国海军的观念具有国内政治上的吸引力。 德国似乎由军国主义产生，然而军队的扩张是无可置疑的。 军队扩张不被许多中间阶级或天主教的南部德国所支持，因为他可用来集中镇压国内暴乱。 即使是高级统帅和容克们也不愿武装工人(对假定忠诚的农民的征募已达到其极限)，也不愿允许资产阶级在扩大的军官集团中占多数的统治地

位。但资本集中性的海军需要很少人力，不能被压制，并有利于重工业，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现代化。当工业家被说明服于战舰的经济优势时，他们同容克保守主义者和代表农民的天主教中心讨价还价。在1897年，增长谷物关税达成一致，作为对海军第二条具有决定意义的条款的回报。少数社会改革赢得了民族自由的胜利。(Kehr, 1975, 1977; ch.1—4)

战舰建设得到了政权、工业和许多中间阶级的支持，他被南方人和天主教徒所接受，没有任何人有力的反对，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扩大了就业机会)。传统的自由供应某一类市场产品的商人，像汉堡航运业大亨们转变成其信仰者。它迎合了四个高水平的政权：君主专制主义(因为他是皇帝的新玩具)、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且不疏远这四种集团国内的敌人。1900年之后，海军得到了他所要求的大部分资源。战舰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内部政策”即来自地方的经济利润，来自政权的局部分而治之的策略及国家已经不经意间制度化了的军国主义。

但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海军的“世界政策”在物质意义上讲很不现实。战舰被认定是保护德国商业和殖民利益的。然而，战舰更大程度上是用来与在北海上迎之而来的英国军舰相对抗的而不是保护商业或殖民利益。实际上，争论集中于战舰的象征性地位，而不是他实际的物质实体。贝斯曼辩论说，战舰对于德国来说是必要的，“为了他的伟大形象的总体目标。”(Jarausch, 1973, pp.141—142)。这种统计式的帝国主义，牵涉着带有民族荣誉意义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它缺少现实主义者或外国资本利润能提供的精确的理性。尽管战舰似乎是对准英国，但它的结果既不涉及“恐英症”，也不涉及对它的国外影响或军事政权的评价。

无意的外交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渲染世界权力的战舰建造，疏远了大英帝国并导致了德国注定要失败的海军竞赛。英国是处于领导地位并能够把它的大部分全球海军引向国内海域的。正如150年以来一

样，英国外交集中于“海洋”政策。“我们是鱼”，索尔兹伯里勋爵宣称说。皇家海军保留着英国基本的军队，国内水域防御绝对优先。在1913年格雷毫不掩饰地说：“海军是我们唯一的防御方式，我们的生命依靠它，且只依靠它。”英国政治家认为，如果德国攻击法国，但又不保证比利时中立的话，英国必须开战。一支大规模的德国海军在低地国家港口能够发动对英国致命的打击。

如果德国能减少其大陆的义务并协调与俄国或法国之间的矛盾，那么德国的资源能达到提尔皮茨的目标，即德国和英国主要舰船的比例为2∶3。这会中立英国的海军力量(尽管结果还不明确)。但“政治大联合”意味着不仅是德国“生产性”阶级的团结，而且还有他们的外国敌人。德国的外交没有争取俄国，因为容克没有从制度上被抛弃。他们也不试图打破法—俄联盟。在国内，政权包含着小派别，掺杂着政治成形，也未抛弃他们的外交敌人。一个外交后果是德国被它的敌人包围了，没有独立的资源保证，德国海军不会统治北海，德国已然将英国推给了敌方协约国，而且也不可能打败英国或消弱英国对大陆协约国的援助(Kennedy, 1980, pp.415—422)。

且结果证明确实如此。慎重、成功的“内部政策”对于“对外政策”产生了无意识的、灾难性的后果。国内权力胜利的对抗外国强国，助长了外国的客观威胁和德国的狂妄。我们不想伤及俄国、英国和法国，为什么他们对我们如此敌意呢？从1906年起，政权把德国描述成“循环的地缘政治合谋的牺牲品”。费舍尔学派将之作为受公众舆论操纵的政权，创造了支持宣称侵略是唯一的防御战的论断的国家(Geiss, 1976, pp.121—138)。比起合谋，我更倾向于混乱，把政府盲目的作这种决策主要基于国内原因，很少考虑外交后果，因而政权对外国的反应感到吃惊。但包围孤立政策的信条使德国更可能报复。这是一个领土与军事的比喻，引用皇帝的话说即用“锋利的宝剑”冲过“吊桥”突围出去。

最后的联合团结包含了中间阶级、南部德国人以局部分而治之政策

为先导的天主教徒、激进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地区少数派被成功的孤立。但成功动摇了德国的中心政治。正如第十八章和十九章所述，富有生产力的主张中央集权论的马克思主义在被排除在外的左派里活跃起来，不但未被天主教的自由主义者的务实联盟阻止，反而削弱了它招收农民或天主教徒的能力，而被卷入政权的中心党则同保守主义妥协，而不是激进的自由主义。正如第十六章所述政治民族主义集中了公务员和国家教育机构，且变得比其他国家更倾向于民族崇拜和民族主义。从一种意义上说，这仅仅扩大了政权的优先权，但它也减少了自身行动的自由。由于疏远了工人和少数派，政权只能依靠中间阶级的投票支持。由于放弃了国会的全权统治，政权只能依靠它自身官员的忠诚。他们的民族主义压力是富有影响力的，并动摇着社会的稳定(Eley, 1980)。

在国外包围孤立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夹攻之下，主张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权有向狂热发展的倾向。比起英国或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更无力打击敌人，且无论是通过资本家还是现实主义者的利益限定，更都具有更少的可操纵性。这是对德国政治狂热元素的一个基本的政治解释，它不是建立在阶级的经济忧虑或他们认为的“现实恐慌”基础之上。(在第十六章我已推翻了这种理论)

1914年7月，贝斯曼指出了德国为什么处于困境之中：

> 这种早期的错误——使每个人都面临挑战，把你自己放在每个人的位置上考虑，这种方式实际上不会削弱任何人。原因在于：毫无目标，对即使很少声望的成功的需要及对每个公众舆论潮流的担心。以外交政策而喧嚣的民族主义政党想保持和加强他们的地位。(Stern, 1968, p.265)

他很精明，但是这种精明来得太迟了。他已经放弃了外交努力，转而采用皇帝提出的“锋利的宝剑”。

社会帝国主义对德国的外交是重要的，但这是一种转移和无意识的

后果，而不是蓄意的政治策略。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辩论说，政权没能解决国内问题，从而导向对外侵略。相反，它在将绝对主义转向现代半独裁君主制的成功导致了地缘政治的灾难。德意志宫廷和国会的秩序是通过增加国家成形(通过允许大多数局部性派别保持他们的德国敌人的意识为代价)而取得的，这同联合精英的合力论是相似的(Snyder, 1991, pp.66—67)。有高度集中的权力，且在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经济保护主义和军事准备中拥有集中权力和利益的精英们彼此同意对贸易的积极支持，从而产生了比任何单独一个精英所期望的还要更具侵略性后果。因而，正如布罗和贝特曼所意识到的，德国被放到了“每个人的位置”上。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就必须在容克、君主、陆军、海军、工业资本家及中央集权论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进行选择。布罗在攻击容克的免税特权中败下阵来。贝特曼支持外交妥协时，被中央集权论的民族主义者挟持并被削弱。

政权继续走向任意的、欠考虑的帝国主义。地权平均论又盛行起来，且从 1912 年起，军队的扩展多于海军。到 1914 年，只有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失败了。在他们的现实主义优点方面，在中欧和国际政治之间没有达成协议。政权的摩擦持续不断，外国敌人也未被抛弃。政权中包含着资本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且变为民族主义者，这些团体都没有优先权，关于这种政权最终代表谁也没有进行最终测验。的确，它在林林总总的派别间的流行依赖于避免这种测试。它是流行的，但它的流行又威胁到和平及它自身的生存。这种无意识行动的后果的威力从未具备如此的灾难性。这种半独裁的合并性战略的国内胜利证明了它的地缘政治的傲慢。

如果这还不够，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因素促进了德国的衰落。这场由军国主义导致的世界战争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世界历史的不幸，这源于他的地缘政治地位。它的封建领主的敌人是他的东方邻居和最大的陆上竞争对手，即俄国的重工业(舰船建造业)的敌人便是西部的英国，即最大的海上强国，而这两个对手的明显同盟是同样令人苦恼。且让

人担忧的是南部的法国。 一个处于欧洲中心的强国又一次陷入同时攻击两翼的陷阱，并采取了我们在第八章所提到的别国采用的方式。 毫无疑问，德国在中欧的领土地位加强了它的傲慢。

结论

任何特定的事件都有其特定的原因。 抛开普林西波的幸运(计划的暗杀已经失败；当大公爵的敞篷马车出人意料地经过他身旁时，普林西波已退到一个茶馆里)，抛开几个斯拉夫人和奥地利人的卤莽，抛开几个外交官和将军的错误，则大战可能不会在它发生的时间发生，甚至根本不会发生。 详细的研究更普遍的、结构性的原因，我只能从这种普遍的潮流中解释，这种潮流使某些地方的战争形成可以或可能的结果。偶然事件会发生，但它们只是偶然性的被无意间彻底忽略的东西可能有一个全面的长期潜在的永恒的模式，尤其对于参加者来说。 这一卷并不提供永久性的东西。 它也不会在它所涵盖的一百五十六年里提供足够长时间来彻底考察这种可能性，但它已开始这样做。 这一章是对这个开头的延续。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解释不能单独或主要集中于对内与对外政策。 决策是由国内和国外政策所决定的，并牵涉到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 民族国家国内的联合导致了政治民族主义倾向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广泛阶级和政治阶级之间更多的斗争；在强国加强地缘政治中，政治家和军事家代表着这一切。 没有任何国家能孤立于其他国家而在独立的真空发展；各自都以没有预计的方式影响他国。没有人能控制全局或预测其他民族、阶级、政治家或军人的反应。

“内部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学派都错误地把社会和国家看作是体系，中央集权的和同一性质的体系。 在“内部政策”的观点中，阶级和其他国内势力运作者理性的决策通过诸如经济或社会军国主义的政

策来调和他们的利益。从“内部政策”现实主义的观点看，政治家是理性的计算地缘政治的利益的。这些学派都承认，运作者会犯错误，现实主义者试图把错误整合到他们的微观解释之中。然而错误计算的规模确实惊人。运作者确实想理性的行动，核实他们民族、阶级和地缘政治的利益并寻求达到此目标的最经济的方式。但没有人成功，这是1914年8月最系统的特色。它源于重叠的、交叉的权力网络相互作用的无预计的后果。运作者在策略间相互作用的无预计的后果。运作者在策略间相互效仿和转移。这种策略的相互作用是不可预测的，且结果最终是灾难性的。

这种“模式化混乱”因处于现代国家中心的制度化矛盾而恶化。

一方面，现代政治家的外交和现代军事家的专业主义是系统化的，因而他们控制了我们在第十一章至十四章所描述的大量的权力基础。通过他们作战争冒险的决策，政权和强国被颠覆，经济荒废，百万人被杀害或致残。“内部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家所列举的“好的缘由”似乎仍然适合这种水平的冒险和危险。然而，无论政治家还是军队，阶级还是民族，都不能在这种“好的缘由”的基础上行动。因为，另一方面，享有最高权力的国家制定“它们”决策所凭借的结构是无序的，有四种明显的方式。现代国家在结果上是中央集权的，但在结构上是多元的，部分化的。

1. 君主政体：在这儿，传统条例和危机政策的制定都是通过错综复杂的谋略完成的，而军方能在危机中自动行动。君主和他们的顾问制定了部分分而治之的策略，精心的避免任何一部分负责外交责任。他们制定计谋，希望集权于自身，当工业家、资产阶级议会雄辩家及政治民族主义者崛起时，他们被卷入了分而治之的计谋之中。在对战争负不同比例责任的三个大帝国——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之中，贵族、将军、资本家、政党贵族的势力达到了国家的顶峰，影响到国王本人的统治，致使他有时小心谨慎有时胆怯懦弱，并最终导致卤莽的行动。

2. 政党民主：这儿我把常规条例和危机决策的制定区别开来。危

机决策的制定集中于国会和内阁，在这里最终的责任是相当明显的确定的。然而，旧政权和共和党贵族政治家的常规外交决策的制定比在君主政体中则更为私人化、孤立化和自动化，因为阶级和政党主要是被民族或当地组织掌握的。他们的孤立有两大缺陷：政治家不能为达到外交目标而任意分配资金，他们也不能威胁战争。这意味着他们在威慑力方面是欠缺的，即必须欺诈的策划或必须等到被攻击时才能表现出侵略。政党民主的划分是介于半孤立型的旧政体和现代国会及内阁之间的。它的派别主义在危机时通过急剧的外交政策反映出来，并在与政治民族主义的自由和军国主义形式的抗争中被削弱。

3. 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侵略性、领土性的外交靠近。政治家们认为大国变动已使世界更为危险。军方发展了侵略性的策略，并轻视外交，且制定了对士兵和海员的有效的局部性纪律。但市民和国内机构的增长使国家倾向于民族国家，并减少了政权的孤立。社会生活中立化，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依恋。在这样的民族内，一个更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出现了，尽管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于国家行政人员和国家教育制度之内，但在中间阶级及主要的宗教及语言社区内慢慢扩散。社区民族的定义在增长；地方的和超国界的民族定义在衰落。经济利益的领土定义，在和平保护主义、重商主义以经济军国主义之间转换，牵涉到政体假定的现实主义地缘政治更普遍的民族主义认同和荣誉。

4. 因而，所有政治就显示了外交的无力和不稳定性。军方转向专业技术管理能力。现在只是半孤立性的政治家证实了市场的不连续性。少数跨国组织支持和平外交；少数民族主义压力集团支持从直接的经济军国主义转向侵略性的地缘政治，尤其在殖民地方面。但大多数阶级和其他权力运作者变得局限于民族组织和政治的牢笼，不关心常规外交事件，但在危机中却很焦虑。他们的外交政策大多由国内政治决定且是肤浅的和夸张的。工人阶级、大多数农民及资产阶级和政党民主中的一些中间阶级，因为国内的原因而反对军国主义，并保持着夸张的跨国主义和和平主义。尽管他们的观点不规律的限制着政治家，

但他们不能制定外交政策。

多样化派别主义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更为深入。这两大国一方面被旧政权的君主、政治家和军方不可摆脱的纠缠，另一方面又被阶级和现代民族所困扰。它们走向了现代国家多样化成形的极端。这两个强国(和斯拉夫的)侵略应对战争的爆发有直接责任。我拒绝了德国人把责任转向包围孤立主义和英国霸权的企图，因为德国人从这种情形下获得的利益比它在战争中可能获得的还要多。德国的侵略是欠考虑的或不现实的，它产生于旧的君主政体，加上军事特权等级及民族阶级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奥匈帝国增添了明显的混乱因素：一个铤而走险的王朝和将军加入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者的行列。俄国宫廷增添了它升级的军事动员造成的军国主义混乱因素。政党民主增添了他们的混乱因素，无力通过威胁战争来惊醒他们人民的限制，政治家们不规律的保持着半孤立性。政权不同程度的分担着现代国家潜在的矛盾：国家的权力影响越来越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日益派别化和多样化。但国家仅仅反应的是现代社会，拥有大规模的集体力量，他们普及的权力网络有其片面性。正如我对“一战”所作的分析和理论。“一战”恐怖的展示了现代国家结构和现代社会。

今天的变化还不足以使我们完全满意。我们已经从“一战”中学会了怎样去避免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吗？或者我们继续重复这场悲剧和战壕中这年轻诗人的命运吗？

致德国

你像我们一样盲目，你的伤痕无人指明。
没人宣言要征服你的土地，
探索着穿过思想局限的原野，
我们跌倒但我们不理解，
你只能瞥见精心设计的未来。
我们只有思想中渐渐狭窄的路

我们站在各自最珍贵的立场上

咒骂着、憎恨着、盲目的交战。

(Charles Hamlton Sorley

D. 1895, Aberdeenshire, Scotland;

d. 1915, Battle of Loos. Flanders)

注 释：

[1] 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自对公众舆论和参战士兵反映的各项研究。 我将在第三卷分析这些，但有一项支持我观点的关于法国的研究，请参看 Becker, 1977。

参考文献

Albertini, L. 1952, 1953, 1957.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J.-J. 1977. *1914: Comment les Français sont entrés dans la guerre*. Paris: PUF.

Berghahn, V. R. 1973.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Bosworth, R. 1983. *Ital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London: Macmillan.

Campbell, C. 1949. American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In *American Expans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 J. R. Hollingsworth. Malabar, Fla.: Krieger.

Cecil, L. 1976. *The German Diplomatic Service, 1871—1914*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raig, G. 1955. *The Politie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esit, W. 1982. Kaiser Wilhelm II in the context of his military and naval entourage. In *Kaiser Wilhelm II: New Interpretations*, ed. J. Rohl and N. Somb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yle, M.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s 1 and 2.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

Dubovsky, M. 1969. *We Shall Be All*.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Eldridge, G. C. 1973. *England's Mission*. London: Macmillan.

Eley, G. 1980.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view from the throne: the personal rule of Kaiser Wilhelm II. *Historical Journal* 28.

Fieldhouse, D. K. 1973.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Fischer, F. 1967.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5.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 Chatto & Windus.

Geiss, I. 1976.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 W. Koch. London: Macmillan.

Gordon, M. R. 1974. Domestic conflic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British and German cas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6.

Gourevitch, P. 1986. *Politics and Hard Tim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erwig, H. 1973. *The German Naval Officer Corp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ilderbrand, R. C. 1981.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Hobson, J. A. 1902.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Nislet.

Howard, M. 1970.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his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Temple Smith.

Hull, I . V. 1982.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Ⅱ , 188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rausch, K. H. 1969. 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 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s calculated risk, July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

1973. *The Enigmatic 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 and the Hubris of Imperial German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oll, J. 1984a.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Group.

1984b. The 1914 debate continues: Fritz Fischer and his critics. I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 W. Koch. London: Macmillan.

1984c. 1914: the unspoken assumptions. I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 W. Koch. London: Macmillan.

Kaiser, D. E. 1983.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5.

Kehr, E. 1975. *Battleship Building and Party Politics in Germa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Economic Interest, Militarism and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iger, J. 1983. *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Kennan, G. F. 1977. *A Cloud of Dang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84. *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Kennedy, P. 1980.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2. The kaiser and German Weltpolitik. In *Kaiser Wilhelm Ⅱ : New Interpretations*, ed. J. Rohl and N. Somb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London: Fontana.

Kitchen, M. 1968.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1890—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och, H. W. 1984. Social Darwinism as a factor in the new imperialism. In his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d War*. London: Macmillan.

Lafore, L. 1965. *The Long Fus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ieven, D. C. B. 1983.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Mackinder, H. 190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23 (reprinted by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1951).

Mahan, A. T. 1918.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Mann, M. 1988. The decline of Great Britain. In M.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Mansergh, N. 1949.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Group.

Mayer, A. J. 1968. Domestic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or of Hajo Holborn*, ed. L.Krieger and F.Stern. London: Macmillan.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London: Croom Helm.

Mommsen, W.J. 1974. *The Age of Bureaucracy: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Max Weber*. Oxford: Blackwell.

1980.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0. The varieties of the nation state in modern history: liberal, imperialist, fascist and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nation and nationality.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ation State*, ed. M. Mann. Oxford: Blackwell.

Morgan, D. W. 1975. *The Socialist Lef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orgenthau, H.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Olle, W., and W.Schoeller. 1977. World market competition and restrictions upon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policies. *Capital and Class* 1.

Palmer, A. 1983. *The Chancelleries of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Parker, G. 1985.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Platt, D.C. 1979. Economic factors in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ew imperialism. In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ed. C.Emsley. London: Croom Helm.

Pogge von Strandmann, H. 1969. Domestic origins of Germany's colonial expansion under Bismarck. Past and Present, no.45.

Price, R. 1972. *An Imperial War and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emak, J. 1967.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1871—1914*.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Robinson, R., and J. Gallagher. 1961.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Rohl, J. 1973. Introduction. In *1914: Delusion or Design? The Testimony of Two German Diplomats*, ed. J.Rohl. London: Elek.

1982. Introduction. In *Kaiser Wilhelm H: New Interpretations*, ed. J. Rohl and N. Somb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hl, J., and N. Sombart (eds.). 1982. *Kaiser Wilhelm II: New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crance, R.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Rothenberg, G 1976.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Schmitt, B.E. 1966.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 2 vols. New York: Fertig.

Snyder, J.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einer, Z.S. 1969. *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 189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Stern, F. 1968. Bethmann Hollweg and the war: the limits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or of Hajo Halborn*, ed. L.Krieger and F.Stern. London: Macmillan.

Stone, N. 1975. *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New York: Scribner's.

1983.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London: Fontana.

Taylor, A.J.P. 1954.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odd, E. 1979. *Le fou et le proletaire*. Paris: Laffont.

Turner, L.C.F.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chlieffen pla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4.

1968. The Russian mobilization in 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 1970.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rnold.

Weber, E. 1968.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in France, 1905—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hler, H-U. 1979. Introduction to Imperialism. In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ed. C. Emsley. London: Croom Helm.

1981. Bismarck's imperialism, 1862—1890. In *Imperial Germany*, ed. J.J.Sheehan.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5.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 Leamington Spa: Berg.

Welch, R. 1979.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Williamson, S.R., Jr. 1969. *The Politics of Grand Strategy: Britain and France Prepare for War, 1904—191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Wilson, K. 1985. *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附录：

国家岁入及雇佣状况的附加表

表 A.1 国家雇佣状况:奥地利(奥匈帝国 1760—1860 年及奥地利 183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奥地利		奥匈帝国	
	奥地利	奥匈帝国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1760		15.00	10 奥匈	0.06	26	0.17			250	1.66
1770		17.00							200	1.17
1780		22.00	11 奥匈	0.05					310	1.41
1790		23.00							350	1.52
1800		24.00							325	1.35
1810		25.00			31	0.12			594	2.38
1820		27.00								
1830	15.83	29.63	55 奥	0.35	111 奥匈	0.37	242	1.53	410	1.38
1840	16.86	30.50	62 奥	0.37	126 奥匈	0.41	280	1.66	475	1.56
1850	17.82	31.10	72 奥	0.40	140 奥匈	0.45	318	1.79	485	1.56
1860	19.13	33.50	190 奥匈	0.57			308	1.61	535	1.60
1870	20.60	35.90	102 奥	0.50			177	0.89		
1880	22.14	39.04	118 奥	0.53			162	0.73		
1890	23.90	42.69	254 奥	1.06	697 奥	2.92	188	0.79		
1900	26.15	46.81	297 奥	1.14	864 奥	3.30	230	0.88		
1910	28.57	51.39	334 奥	1.17	899 奥	3.15	247	0.86		

注释：

1. 1830年以前的所有数据涉及整个奥地利(奥匈)帝国，而1860年以后的所有数据仅指奥匈二元帝国时期(有时称为西里西亚)，因此不包括匈牙利(因为一般无法得到有关匈牙利的类似数据)。

2. 直到1880年，有关政府职员人数的数据通常来自政府内部的资料，此后的相关数据取自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统计数字，因此，在1890年有关文职人员的数据呈现出一个巨大飞跃，对此应谨慎对待。

3.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奥匈帝国：1760—1790年，Dickson，1987，Ⅰ，p. 36；1790—1910年，*Beitrage zur Osterreichischen Statistik* 550，1970，Ⅰ，pp. 13—14——提供了1786、1828、1857、1869年以及1880—1910年的数据(其中也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已对缺乏数据的几十年给出估计数字。奥地利：1830—1910年，Bolognese-Leuchtenmuller，1979：Ⅱ，p.1。

军职人员的数据：1760—1790年，Dickson，1987，Ⅱ，pp. 343—355页；1800年，Rothenberg，1978——野战军，警卫部队以及其他原地待命但已被动员的预备役部队；1810年，Rothenberg，1982，p. 126——“1890年实际动员计划”；1830—1910年，Bolognese-Leuchtenmuller，1979，Ⅰ，pp.57—60以及Ⅱ，p.5——现役的陆军和海军职员；1850年和1860年(实际是1857年)的数据是指奥匈帝国，但不包括伦巴第和维也纳；1860年以后的数据仅指奥地利Reichshalf。

文职人员的数据：1760—1810年(实际到1806年)引自Dickson 1987，Ⅰ，pp.306—310；1830—1850年(实际是1828、1838年及1848年)的中央政府文职人员数引自《K.K.统计月刊》，1890，pp.532—534；1830年(实际是1828年)各级政府文职人员数引自，Macartney，1969，p.263；1840年各级政府文职人员数是从特格博斯基1843：第306页给出的关于1839年的类似总数及麦卡特尼1969：第263页给出的关于1842年的类似总数中推测得出；1850年各级政府文职人员数引自K.K. *Statistiche Monatschrift*，1863，pp. 104—105——总计52 000名人员，假定包括全部行政官员的26%(正如在1845年及1848年中公职人员所占比例)；1870—1880年各级政府文职人员数引自K.K. *Statistiche Monatschrift*，1873，p. 22；1881，p.54——包括公职人员及67%的法律和卫生工作者(在以后的人口普查中被归类为公共部门)；1890—1910年的数据引自*Osterreichisches Handbuch*，1890、1900、1914，K.K. *Statistiche Monatschrift*，1904，p. 696——然而，Bolognese-Leuchtenmuller，1978：Ⅱ，表60的注释虽然再现了19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但是无法解释1890年和1900年文职人员的数量分别降低到495 000人和617 000人的现象。

表 A.2　国家雇佣状况：英国，176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1760	6.10	16	0.26			144	2.36
1770	6.41					37	0.58
1780	6.99					193	2.76
1790	7 065					74	0.97
1800	8.61	16	0.18			422	4.91
1810	9.76	23	0.24			517	5.30
1820	11.30	24	0.22			115	1.02
1830	13.11	23	0.17			132	1.01
1840	14.79			43	0.29	163	1.10
1850	16.52	40	0.24	67	0.41	197	1.20
1860	18.68			76	0.41	325	1.74
1870	21.24			113	0.53	242	1.14
1880	25.71			118	0.46	246	0.96
1890	28.76	90	0.32	285	0.99	276	0.96
1900	32.25	130	0.40	535	1.66	486	1.51
1910	35.79	229	0.64	931	2.60	372	1.04

注释：

1. 1840 年的军职人员数据包括在编的民兵和警察，但不包括志愿军。1850 年的数据包括在编民兵和警察，以及被征入伍的领取抚恤金的退伍军人(最后总共达到 16 720 人)。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Wrigley and Schofield，1981。

文职人员的数据：中央政府——1800—1830 年根据下议院的数据统计、英国议会档案和 1797、1810、1819 年及 1827 年公职人员的编制所测算出来的；1840—1880 年引自 Mitchell and Deane，1962；1890—1910 年，Flora，1983：Ⅰ，p.242。各级政府——1840—1880 年引自 Mitchell and Deane，1980；1890—1910 年引自 Abrammovitz and Eliasberg，1957，p.25。实际年份是 1891、1901 和 1911 年。

军职人员的数据：1760—1790 年及 1810—1860 年的数据来自下议院的统计、英国议会档案：1760—1770 年引自 1816 年的档案，12，p.399 以及 1860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p. 547—549；1780 年(实际是 1781 年)引自 1813—1814 年的档案，11，pp.306—307 以及 1860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p.547—549；1790 年(实际是 1792 年)和 1810—1830 年的数据引自 1844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169 以及 1860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p.547—549；1840—1850 年的数据引自 1852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30，pp.1—3；1860—1910 年见 Flora，1983，Ⅰ，pp.247—250。1800 年联合陆军部队的数据见 Fortescue，1915，vol.4, part 2 p.939，海军的数据从 1860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p.547—549 得出。

表 A.3　国家雇佣状况:法国,176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1760	25.70					460	1.78
1770	26.60					220	0.82
1780	27.00			350	1.29	240	0.89
1790	27.19			275	1.01	230	0.85
1800	27.35			250	0.91	800	2.93
1810	27.35					1 000	3.66
1820	30.46						
1830	32.57					400	1.23
1840	34.23	90	0.26			350	1.02
1850	35.78	146	0.41	300	0.84	390	1.09
1860	37.39					460	1.23
1870	36.10	220	0.60	374	1.03	600	1.66
1880	37.67	331	0.87	483	1.28	540	1.44
1890	38.34	348	0.91	472	1.23	600	1.55
1900	38.96	430	1.10	583	1.50	620	1.59
1910	39.61	556	1.40	562	1.42	650	1.65

注释:

1. 法国国内征募的新兵人数在 1800 年总计约有 350 000 人，1812 年约有 450 000 人。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1760—1780 年，Riley， 1986，p.5；1790—1910 年，Dupeux， 1976，p.37。

文职人员的数据：各级政府——1780 年的估计数获得于 Necker， 1784(参见正文)；1790 年和 1800 年(实际是 1794 年和 1798 年)的估计数取自 Church， 1981；1850 年(实际是 1846 年)的政府官员名单引自 Block， 1875，pp.117—119；1870—1910 年的相关数据引自 Flora， 1983，Ⅰ，p.211。 中央政府——1850 年(实际是 1846 年)的相关数据引自 Vivien， 1859，pp.172—178，以 Jalien-Lafferrière， 1970 作为参考修正，并且不包括军职官员；1870—1900 年，引自《人口普查》和《分类统计结果》，实际所指年份为 1866、 1876、 1891 年及 1901 年；1910 年，引自《法国年鉴》1913：第 264 页。 实际所指年份为 1913 年。

军职人员的数据：陆军——1760 年的数据引自 Kennett， 1967，pp.77—78；1770—1790 年，引自 Lynn， 1984，p.44， Scott， 1978，p.5；1800 年和 1810 年(实际是 1812 年)，引自 Addiugton， 1984，p.26， Rothenberg， 1978， pp.43、 51—55 页，Chandler， 1966；1830—1870 年，引自 Block， 1875， Ⅰ，p.566(不包括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 海军——1780 年，引自 Dull， 1975，p.144；1790 年，引自 Hampson， 1959，p.209；1810 年，引自 Masson， 1968，p.257；1870 年，引自 Block， 1875， Ⅰ，p.583。 1860 年以前有关海军职员其他年份的数据均为推断估计数。 陆军和海军：1880—1910 年，引自《法国年鉴》1913：“往事摘要”，第 132 页。

表 A.4　国家雇佣状况：普鲁士—德意志帝国，176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普鲁士	德意志帝国	普鲁士		普鲁士		德意志帝国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1760	3.62								150	4.14
1770	4.10									
1780	5.00								188	3.76
1790	5.70								195	3.42
1800	6.16		23	0.37					230	3.73
1810	7.00								272	3.88
1820	11.27								150	1.33
1830	13.00								150	1.15
1840	14.93		16+	0.11+					157	1.05
1850	16.61		32+	0.20+	55+	0.33+			173	1.04
1860	18.27				86	0.47			149	0.82
1870	24.57	41.01	135	0.55	283	1.15			400	0.98
1880	27.19	45.23			413	1.51	704	1.56	434	1.07
1890	29.84	49.43			535	1.80	900	1.70	529	1.12
1900	34.27	56.37							629	1.05
1910	39.92	64.93			c.1 000	3.92	1 700	2.35	680	1.05

注释：

1. 1870 年以前得军职人员数据是指普鲁士；1870 年以后的数据是指德国。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普鲁士——1760—1810 年的数据来自 Turner，1980；1820—1870 年的数据来自 Kraus，1980，p.226；1870—1910 年的数据来自《普鲁士王国的统计年鉴》1912。德国：1870—1900 年的数据来自 Hohorst 等，1975，p.22；1870 年的数据实际上是 1871 年的。军职人员的数据：普鲁士——1760—1810 年的数据来自 Jany，1967；实际的年份分别为 1763、1777、1789、1813、1820、1830、1840、1850、1859 年。Jany 所列的关于 1820—1840 年的数据并不包括军士或军官，并且将其向上调整了 23%(这是 19 世纪普鲁士陆军中军士和军官的正常比例)；1870 年普鲁士的军队总人数是 315 000 人(贾尼加上了 2 400名海军人员)。德国——1870 年的数据来自 Weitzel，1967，表 8；1872 年的数据。1880—1910 年的数据来自 Hohorst，1975，p.171；1890 年的数据实际上是 1891 年的数据。文职人员的数据：普鲁士——1800 年的数据的估计数字是由一名普鲁士的高级军官“以保留”的方式提供给 Finer，1949，p.710(正如他在 1850 年的估计一样低得离谱，他的保留态度也许是正确的)；1840 年，Bülow-Cummerow，1842，p.225，1839 年的公职人员数字；1850 年，普鲁士王国的 1849 年年鉴表和官方 Nachtrichten(Tabellen und amtlichen Nachtrichten den preussischen Staat für das Jahr 1849)，公职人员在 1849 年的数字，因此 1840 年和 1850 年的数据大约对全国的雇佣状况低估了 20%—30%；1860 年(实际是 1861 年)的数据来自 Jahrburch für die Amliche Statistik 1863；1870、1880、1890 年(实际上是 1869、1882 和 1895 年)的数据来自《普鲁士王国统计手册》，1869、1898；1910 年(实际是 1907 年)的数据来自 Kunz，1990。德国——1880—1910 年的数据来自《丹麦王国统计年鉴》1884，p.19，1889，p.14，1909，p.33(实际是 1882 年和 1895 年)；1910 年(实际是 1907 年)的数据来自 Kunz，1990。

表 A.5　国家雇佣状况：美国，176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1760	1.59						
1770	2.15						
1780	2.78						
1790	3.93	0.7	0.02			0.7	0.02
1800	5.93	2.6	0.04			7	0.12
1810	7.24	3.8(估)	0.05(估)			12	0.16
1820	9.62	7	0.07			15	0.16
1830	12.90	11	0.09			12	0.09
1840	17.12	18	0.11			22	0.13
1850	23.26	26	0.11			21	0.09
1860	31.51	37	0.12			28	0.09
1870	39.91	51	0.13			50	0.13
1880	50.26	100	0.19			38	0.07
1890	63.06	157	0.25			39	0.06
1900	76.09	239	0.31	1034	1.36	126	0.17
1910	92.41	389	0.42	1552	1.68	139	0.15

注释：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 11 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1760—1780 年美国的数据，引自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表 A.6—8。文职人员的数据：中央政府——1790—1810 年的数据是根据美国国家档案，第 38 卷的数字，详情如下：1790 年(实际是 1792 年)的数据在第 1 部分，pp.57—68；1800(实际是 1802 年的数据在第 1 部分：pp.260—308；从 1810 年推断的 1810 年和 1816 年的数据在第 2 部分：pp.307—396；1820—1910 年的数据在美国，1975，表 Y308—317。各级政府——1900—1910 年的数据来自 Fabricant，1952，p.29。军职人员的数据：美国，1975，表 Y904—916。实际所指年份是 1789、1801、1821、1831、1841、1851、1861、1871、1891、1901 年以及 1911 年。

表 A.6　国家岁入状况:奥地利,1760—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table>
<tr><th rowspan="2">年份</th><th rowspan="2">总收入
(百万弗罗林)</th><th rowspan="2">直接税</th><th colspan="2">间接税</th><th colspan="2">国家财产</th></tr>
<tr><th>普通商品</th><th>盐,烟草专卖品</th><th>印花税,各种收费</th><th>垄断利润</th></tr>
<tr><td>1760</td><td>35.0</td><td>53</td><td>19</td><td>16</td><td>2</td><td>10</td></tr>
<tr><td>1770</td><td>39.5</td><td>48</td><td>17</td><td>16</td><td>9</td><td>10</td></tr>
<tr><td>1780</td><td>50.1</td><td>41</td><td>18</td><td>19</td><td>13</td><td>10</td></tr>
<tr><td>1790</td><td>85.6</td><td>27</td><td colspan="2">36</td><td colspan="2">NA</td></tr>
<tr><td>1800</td><td>65.5</td><td>29</td><td colspan="2">45</td><td colspan="2">NA</td></tr>
<tr><td>1810</td><td>25.0</td><td>30</td><td colspan="2">42</td><td colspan="2">NA</td></tr>
<tr><td>1820</td><td>112.2</td><td>44</td><td>20</td><td>30</td><td>4</td><td>2+</td></tr>
<tr><td>1830</td><td>123.0</td><td>39</td><td>23</td><td>22</td><td>4</td><td>12</td></tr>
<tr><td>1840</td><td>193.3</td><td>25</td><td>23</td><td>26</td><td>4</td><td>25</td></tr>
<tr><td>1850</td><td>202.5</td><td>29</td><td>24</td><td>24</td><td>4</td><td>18</td></tr>
<tr><td>1860</td><td>355.1</td><td>27</td><td>17</td><td>25</td><td>9</td><td>26</td></tr>
<tr><td>1870</td><td>259.6</td><td>35</td><td colspan="2">30</td><td>15</td><td>21</td></tr>
<tr><td>1880</td><td></td><td>32</td><td colspan="2">31</td><td>20</td><td>17</td></tr>
<tr><td>1890</td><td></td><td>NA</td><td colspan="2">NA</td><td>NA</td><td>NA</td></tr>
<tr><td>1900</td><td></td><td>28</td><td colspan="2">30</td><td>17</td><td>25</td></tr>
<tr><td>1910</td><td>1 159.2</td><td>28</td><td colspan="2">29</td><td>17</td><td>26</td></tr>
</table>

注释:

1. 实际所用年份为:1763、1770、1778、1821、1830、1841、1850、1859、1868、1883、1898、1913 年。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1760—1780 年的数据,引自 Dickson, 1987, Ⅱ, pp.382—383;和平时期的纯收入,“印花税和各项收费” 等同于 Dickson 的“其他类”的分类。1790—1810 年的数据来自:Czoernig, 1861, p.122;1800 年和 1810 年的总收入正如 Beer, 1871, pp.390—391, 所重新估算的那样它考虑到了货币的变更(这极大地减少了 1810 年的总收入,也可能减少得并不多)。那些年份的其余收入的大部被 Czoernig 分类为“特殊” 栏,可能是一个混合的类别。1820—1860 年:引自 Brandt, 1978, Ⅱ, pp.1072—1073、1100。1820—1830 年的一般收入;在这些年份中享有“垄断利润”的企业正在消失,这些利润假设是从总收入中扣除直接税、间接税和印花税及各项收费之后的剩余(其数量在 1820 年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或许它已被混入到高得非同寻常的“盐专卖品”类别中)。1870—1910 年的数据引自:Gratz, 1949, pp.229—230。

表 A.7　国家岁入状况:英国,1760—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英镑)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邮票和邮局
1760	9.2	26	69	4
1770	11.4	16	70	4
1780	12.5	20	71	5
1790	17.0	18	66	9
1800	31.6	27	52	12
1810	69.2	30	57	11
1820	58.1	14	68	16
1830	55.3	10	73	17
1840	51.8	8	73	19
1850	57.1	18	65	16
1860	70.1	18	64	16
1870	73.7	26	59	12
1880	73.3	25	61	16
1890	94.6	26	50	18
1900	129.9	31	47	22
1910	131.7	27	47	22
1911	(203.9)	(44)	(36)	(17)

注释：
1. 1800 年的数据实际上是 1802 年的数据。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Mitchell and Deane， 1980：公共财政表格。

表 A.8　国家岁入状况:法国,1760—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法郎)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1760	259 *l. t.*	48	45	7
1770				
1780	377 *l. t.*	41	49	10
1790	472 *l. t.*	35	47	18
1800				
1810				
1820	933			
1830	978	40	22	38
1840	1160	约 30		
1850	1297	约 28		
1860	1722	约 23		
1870	1626	26	31	44
1880	2862	21	38	41
1890	3221	18	36	42
1900	3676	21	36	43
1910	4271	22	33	45

注释:

1. 仅指一般收入，不包括所有贷款。
2. 数据引用的相邻年份有：1751、 1775、 1788、 1828 年。
3.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1760—1790 年：Morineau， 1980， p.314，他把牧师的捐献作为国家财产归类为直接税和假设的补贴。 全部以图尔城制造的里弗为计算单位(l.t)。 1830 年(实际是指 1828 年)的数据引自：Hansemann， 1834。 1844—1910 年的数据引自：《法国年鉴》1913：第 134—139 页；1840 年直接税的数据等同于中央政府的四类直接捐赠的总额，再加上所估计的潜移资本所获税的 5% 。

表 A.9　国家岁入状况：普鲁士，1820—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马克）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铁路	其他工业	总和
1820	96	36	33			30
1840	169	24	34			41
1850	183	22	32			46
1870	550(651)	24(20)	10(24)	24(20)	30(25)	65(55)
1880	805(982)	21(17)	8(25)	30(25)	22(18)	71(58)
1890	1744(2 140)	10(8)	14(30)	51(42)	15(12)	76(62)
1900	2607(3 139)	8(7)	13(28)	54(44)	16(13)	79(65)
1910	3732(4 630)	11(9)	3(22)	58(47)	16(13)	86(69)

注释：

1. 所有数据指一般收入，不包括所有贷款与公积金。

2. 数据引用的相邻年份有：1821、1844、1871 年。

3. 1870 年及以后：各数据仅涉及普鲁士(不是指整个德意志帝国)。括号以外的数据来自普鲁士政府的财政收入统计。括号内所加的数据占帝国岁入的 60%(几乎全部来自间接税)。普鲁士的人口占帝国总人口的 60%，各邦向帝国上缴的财政收入通常来自人口税，因此括号内的数字可能是更精确的估计。

4.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1820—1850 年：Leineweber，1988，p.315。注明：1850 年普鲁士财政收入约是德意志大邦的平均数，小邦的收入依靠传统的政府资源(Heitz，1980，pp.406—408 的数字)1870—1901：Prochnow，1977，pp.5—7。

表 A. 10　国家岁入状况:联邦与州的岁入:美国,1820—190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美元）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1820	25	10	62	26
1830	31	5	71	21
1840	33	18	42	37
1850	69	23	58	20
1860	100	26	54	18
1870	501	26	58	16
1880	446	15	67	17
1890	584	16	64	20
1900	837	16	58	26

注释：

1. 计算方法：1820 年政府岁入是当时各州的半数，到 1870 年比例约为 3/4，到 1900 年达到所有州收入的总和。 这些州每年计算人均收入，再乘以当年美国全国的总人口数得出岁入总额。 然后所有州的收入之和为联邦政府的总收入。

2. 国家财产包括邮政岁入。 1975 年美国的数字不包括邮政岁入，只有当邮局产生盈余时，才将盈余算入。

3. 各时期的政府财产岁入来自邮政，早年还来自运河通行税，19 世纪中叶还有土地特许费。

4.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1975 年

美国 1975 年的统计：表 Y352—357；美国 1947 年的统计：pp.419—422；Holt， 1977，pp.99—324。

表 A.11　国家岁入状况：联邦的岁入：美国，1792—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美元）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1792	4		98	2
1800	11		89	11
1810	10		87	13
1820	19		80	20
1830	27		82	18
1840	24		56	44
1850	49		81	19
1860	65		82	18
1870	430	17	68	15
1880	367	1	82	17
1890	464	0.2	80	20
1900	670	2	71	27
1910	900		69	31

注释：

1. 国家财产主要指邮政收入。美国 1975 年的统计数据是邮政的净岁入，只有当邮局产生盈余时，才将盈余算入。我已将所有邮政岁入统计在内。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人口：美国 1975 年的统计：表 A.6—8。岁入：美国 1975 年的统计：表 Y352—357；美国 1947 年的统计：pp.419—422。

表 A.12　国家岁入状况:美国各州,1820—190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美元)	主要的岁入来源				
		税收			国家财产	其他
		直接税	间接税	商业		
1820	5 930	25	7	17	43	8
1830	4 263	25	1	14	42	18
1840	9 085	24	4	40	19	13
1850	19 462	53	1.5	23	22	1
1860	35 643	62	1.6	13	18	6
1870	70 911	64	1	17	16	3
1880	79 125	63	0.1	19	18	1
1890	119 988	60	1	20	18	2
1900	167 407	52	4	23	20	2

注释:

1. 1820—1900 年全美国总人口的数据是以各州数据为基础得出的总和(参见表 A.10 的注释 1)。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1820—1900:计算根据 Holt, 1977, pp.99—324。

译者说明

本书由众多译者通力合作完成，具体分工如下：前言及第一、二和三章：姚朋；第四章：安蕾蕾、杜晓德；第五章：安蕾蕾、陈莉；第六章：安蕾蕾、夏春红；第七章：安蕾蕾、金旭东、陈莉；第八、第九章：孙建霞、刘平；第十章：孙建霞、刘平、杜晓德；第十一章：孙建霞、夏春红；第十二章：林琳、刘平；第十三、十五章：林琳、陈莉、房艳丽；第十四章：林琳、杜晓德、朱昆仑；第十六章：王灵、刘平、金旭东；第十七章：陈春华、朱昆仑；第十八章：陈春华、王永芹、夏春红；第十九章：张玉芝、陈莉；第二十章：陈世英、房艳丽；第二十一章：王仕英、金旭东、刘平；附录：林琳、杜晓德、陈海宏。

陈海宏负责全书的审译、组织和统稿工作；朱昆仑负责全书的校译和校译的组织工作。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new edition(978-1-107-67064-8)** by Michael Man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2015年出版)

一、世纪文库

《中国文学批评史》 罗根泽 著
《中国通史》 吕思勉 著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剑农 著
《国学必读》 钱基博 著
《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 著
《通史新义》 何炳松 著
《中古欧洲史》 何炳松 著
《近世欧洲史》 何炳松 著
《工具论》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张留华 冯艳 等译 刘叶涛 校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 [德]维尔纳·桑巴特 著 安佳 译
《马基雅维利的德行》 [美]哈维·曼斯菲尔德 著 王涛 译 江远山 校
《货币和信贷理论》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著 孔丹凤 译
《捕获法》 [荷]雨果·格劳秀斯著 张乃根 等译 张乃根 校

二、世纪前沿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 [英]迈克尔·曼 著 刘北成 李少军 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 [英]迈克尔·曼 著 陈海宏 等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 [英]迈克尔·曼 著 郭台辉 等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全球化(1945—2011)》 [英]迈克尔·曼 著 郭忠华 等译
《科学与宗教引论(第二版)》 [英]阿利斯特·E.麦克格拉思 著 王毅 魏颖 译
《国家与市场——政治经济学入门》 [美]亚当·普沃斯基 著 郦菁 张燕 等译 王小卫 郦菁 校
《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美]艾伯特·O.赫希曼 著 卢昌崇 译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美]查尔斯·蒂利 著 陈周旺 李辉 熊易寒 译

三、开放人文

(一) 科学人文

《大众科学指南——宇宙、生命与万物》 [英]约翰·格里宾 玛丽·格里宾 著 戴吾三 戴晓宁 译
《阿尔法与奥米伽——寻找宇宙的始与终》 [美]查尔斯·塞费 著 隋竹梅 译
《解码宇宙——新信息科学看天地万物》 [美]查尔斯·塞费 著 隋竹梅 译
《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 [英]G·E·R·劳埃德 著 钮卫星 译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 [英]G·E·R·劳埃德 著 孙小淳 译